“布拉格之春”前后

“布拉格之春”前后

〔美〕塔德·舒尔茨 著

张振第 丛林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Tad Szulc

CZECHOSLOVAKIA

SINCE

WORLD WAR II

根据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71 年版译出

“布拉格之春”前后

〔美〕塔德·舒尔茨　著

张振第　丛　林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75印张　393,000字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3203·019　定价：2.10元

（内部发行）

译者前言

本书原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作者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他出生于波兰，熟悉东欧国家的社会情况以及苏联同东欧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一九四八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局动荡时，他作为记者与捷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亲身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同时，掌握了大量材料。这本书作者是在这种背景下，把观察的历史，把官方[illegible]资料与个人观察和感受结合起来，详细地叙述了“布拉格之春”前后的经过，并作为背景介绍了东欧各国在苏联控制前后发生的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

本书的前半部分介绍了东欧各国党如何先后把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赶出去，谈到了战后初期在解决东欧国家之间的问题时，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矛盾，接着叙述了苏南关系的破裂以及此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东欧引起的反响，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波匈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六十年代末东欧国家经济上控制的加强，以及群众[illegible]争。等等

本书的后半部分集中地叙述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酝酿、发展，苏联干涉和捷克斯洛伐克斗争的全部过程，六十年代初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危机，围绕着经

济改革党内展开的斗争，斗争由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斯洛伐克问题的突出，捷领导人的更换，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的斗争，苏联施加的种种压力和组织围攻，杜布切克集团的对策和周旋情况，八月入侵与苏联政治阴谋的受挫，刺刀下的谈判与“城下之盟”，胡萨克乘机而起进而取代杜布切克，苏联控制的逐步加强，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作者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时为止。

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史料，还介绍了这些国家相互之间以及各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情况，它对研究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志们来说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当然作者是资产阶级报社记者，立场是反共的，在不少问题上表现了资产阶级偏见，这也是明显的。

目　　录

第一部分：黄昏

Ⅰ　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红军来了……（3）

Ⅱ　布拉格棋盘……（19）

Ⅲ　贝奈斯的晚年……（34）

第二部分：黑夜

Ⅳ　人民民主制度……（57）

Ⅴ　制造铁幕，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一年……（70）

Ⅵ　大清洗……（107）

Ⅶ　捷克斯洛伐克的冬天仍未过去……（154）

Ⅷ　四处造反……（165）

第三部分：黎明

Ⅸ　是回光，还是启明？……（209）

Ⅹ　一九六〇年：新的十年新的希望……（235）

XI 骚乱 …… (251)
XII 诺沃提尼：半截子暴政 …… (267)

第四部分：白日

XIII 向左右冲杀出去 …… (301)
XIV 诺沃提尼的垮台 …… (331)
XV 杜布切克指挥序曲 …… (365)
XVI 布拉格之春 …… (436)
XVII 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 (472)

第五部分：黑夜重新来临

XVIII 入侵 …… (541)
XIX 终结与开端 …… (627)
XX 展望未来 …… (676)

第 一 部 分

黄　　昏

回顾往事　　洞察未来

I

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

红 军 来 了

捷克斯洛伐克当前的这场戏——苏联指挥的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深重灾难——早在大约二十五年之前就开场了。这里充满了辛辣的历史讽刺，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整个酝酿过程以及它悲剧性地被肢解和毁灭的过程中，人们都深切地感觉到这种讽刺。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应该从一九四五年讲起。舞台就是五月九日的布拉格，当时，这个到处是被摧毁的街垒的疮痍满目的城市，正在欢迎把它从六年多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苏联军队和坦克。四天以前，即五月五日，正当苏军从东面、美军从西面向这座美丽的古都逼近的时候，捷克爱国者发动了反对正在龟缩的德国驻军的起义。到解放的那天，燃烧着的建筑物冒出的刺鼻浓烟，仍然萦绕在布拉格八百座尖塔之间，笼罩在查理大桥圣徒的石像之上，飘向俯视着这座千年古城的赫拉德强尼城堡和圣维特大教堂。春天的温暖阳光穿过

烟雾，给布拉格涂上了一层金色（这个城市正是以此闻名于世的）。可是，正当人们欢庆解放的时候，在起义中有两千人牺牲、四万人负伤的消息却使他们黯然神伤。

五月七日凌晨，当捷克的简短起义正在进行的时候，德国最高司令部在法国的兰斯签署了向盟国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文件。一切敌对行动应于五月八日午夜停止。但是正在退逃的纳粹部队的后卫仍想控制布拉格，驻在附近的党卫军的一个师被召来镇压起义和掩护撤退。德国人的想法是要使自己脱身，尽可能往西向美军投降，以免被向前挺进的苏军俘虏。

位于伏尔塔瓦河左岸高地上的大炮轰鸣着，炮弹雨点般地飞过河面，落到布拉格的巴黎大街和老城广场上。十五世纪建造的市政厅被直接击中。这所优美的建筑物的背面的弹痕至今仍历历可数，这是捷克人有意留下来未加修理的。它的损坏了的后墙俯视着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小公园。三十年战争期间，在一六二〇年的白山战役失败之后，一度取得独立的波希米亚的领导人——扬·胡斯新教改革派战士的精神和民族主义继承者——在那里被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胜利者哈布斯堡奥地利人处决了。这是经常令人沮丧的捷克历史中最令人沮丧的时刻之一。

同奥地利的战争是捷克异教徒向教会统治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制度进行的第二次挑战。第一次是十五世纪

时胡斯发动的反抗，其结果是改革者被处以火刑。意义重大的第三次挑战当然就是一九六八年——对莫斯科的思想宗教及其强权制度的挑战。无疑，时间将告诉人们，这次尝试是否也已经失败了。在密切观察了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的戏剧性的事变之后，我自己的看法是：尽管苏联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这一事件并不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灾难深重的历史中又一个简短而英勇的插曲的终结，而是标志着本世纪以来我们所知道的共产主义的最大质变的开始，如果不是它彻底的垮台的话。

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不但必须同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新兴运动，包括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奉行独立政策联系起来理解，而且也要同苏联所发生的一切联系起来理解。苏联国内由于不满所引起的骚动——少数民族中抗议的再起，莫斯科对不满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的审讯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不能、也不应该把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及其后果看作在真空中发生的历史事件，也不应该用捷克胡斯革命运动的精神和他们帅克式的思维方式等陈腐说法来解释。历史可以在灾难和悲剧中前进，但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九年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一逻辑将不适用于将来。

而同时，捷克人仍然象过去一样，十分热衷于保存他们民族悲剧的象征。在老城广场，矗立着被纳粹破坏的市政厅，附近的那块草地，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于一六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处决二十七名波希米亚知名人士的地方。跨过卵石广场是一座扬·阿·考门斯基的塑像，他是一位十七世纪的主教、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晚餐室刻着胡斯的预言，总有一天，捷克人民将当家作主。（布拉格美丽的巴罗克建筑及其城堡和尖塔都是反改革运动时期血腥岁月的见证人。）在经历了一九六八年八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回过头来看捷克人在战争刚结束时把一九四五年五月第一辆开进他们首都的苏联坦克陈放在布拉格斯米赫夫区斯捷班尼克兵营前的石座上这件事，就显得是一种讽刺。今天，在瓦茨拉夫广场，人们乘警察不在的时候把鲜花和蜡烛放在圣瓦茨拉夫塑像的前面（瓦茨拉夫是十世纪波希米亚的一位公爵，由于他进行改革被杀害在教堂门口）来纪念一九六八年被苏联坦克打死的布拉格青年。苏联的坦克真的好象是和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有着不解之缘。

事实上，一九四五年占领布拉格的本来不一定是苏联坦克（苏军的占领就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场戏许多讽刺场面中的第一幕），相反，应该是乔·佩顿将军的第三军的美国坦克来占领这个城市的；若是那样的话，欧洲战后历史的写法就会大不相同了。

温斯顿·邱吉尔在《胜利和悲剧》一书中回忆说，他，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三个月前在雅尔塔会议上曾达成协议，“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谁先到谁就可以

夺取”。照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中的形势看来，美国人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先到达布拉格的。

在那些关键性的混乱的日子里，军事形势是这样的：第三军已穿过拜罗伊特，四月十九日它的左翼已经插入捷克斯洛伐克。佩顿军的右拳沿着多瑙河向南击去，攻入奥地利，在前往维也纳的路上攻克了布拉格东南的林茨。（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五月第一周美军到达奥地利迫使苏联同意四国共同占领这个国家，而不再坚持它曾试图强加于人的一国占领。这样在一九五五年国家条约签订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中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当然，这一类比不能直接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它作为一个盟国不能由四大国占领。可是，如果布拉格是美国人解放的，这就会产生一种心理影响，使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的民主制度感到强大有力，在共产主义的夺权挑战面前不至于表现得那样脆弱。这一点是可以说得通的。）

当美国的军队正进入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刻，邱吉尔深信，盟国同苏联不断恶化的关系——雅尔塔会议后两个同盟国同斯大林在奥地利和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上就发生了争吵——会从美军占领布拉格一事中得到很大好处，至少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使捷克斯洛伐克不致被纳入苏联轨道自然是这位英国首相关心的另一件事。于是他指示当时在华盛顿的外交大臣安·艾登去争取美国的同意。四月二十一日艾登在给邱吉尔的回电中表示赞同：“如果美国人占领捷克首都，那将

给俄国人好的看，无疑他们会乐意邀请苏联大使参加美国和我们的活动，而这同俄国人对待我们的作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他们的观点是，西方先于俄国人到达布拉格会形成一种政治平衡，这种政治平衡在别的国家中非常缺乏，已达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三个由红军解放的前纳粹盟国来说，俄国人把盟军管制委员会中的美国和英国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排斥在外达几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共产党的地方机构就建立了起来。波兰象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是个盟国，在那里西方盟国的政治影响被大大削弱了。英国认为，如果美国人首先进入布拉格，西方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幸福承担了义务。使他们形成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四月五日起，民族阵线临时政府已在临时所在地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希策成立了，正等待着迁往布拉格。这个几天前在莫斯科组成的政府是由爱德华·贝奈斯总统领导的——这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后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到国外——但政府内的关键职位却被共产党人占据着。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设想，在未来的岁月里贝奈斯博士是需要西方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而美国人占领布拉格会使提供这种支持成为可能。

就象一九四八年事件所证明的那样，邱吉尔在整个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相当大的预见性。指出下列事实是有益的：除奥地利外，捷克斯洛伐克是当时东欧或中欧唯

一的一个可能由美军和苏军共同解放的国家。别的地方俄国人已经单独解放了。

四月三十日，邱吉尔在下述信件中同不到三周前在白宫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直接讨论这件事：

> “无容置疑，由贵国军队解放布拉格以及尽可能多地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领土会使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大为改观，并会对邻近国家产生很大影响。相反，如果西方盟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不起重大作用，那么，这个国家将走南斯拉夫的道路。
>
> “当然，若由艾森豪威尔采取这一行动，是不应当干扰他对德作战的主要行动的，但是我认为，上面提到的极为重要的政治考虑应该引起他的关注。”

无论是杜鲁门总统，还是美国国务院开始对邱吉尔的反应都是良好的。在他的回忆录中，杜鲁门说，代理国务卿约·格鲁曾催促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严肃考虑这一意见”，理由是，美军若能推进到流经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一线，“那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在同苏联打交道时，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磋商之后，杜鲁门总统五月一日电告邱吉尔说，下面是得到总统同意的艾森豪威尔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态度：

> “苏联总参谋部现在打算进军伏尔塔瓦河谷。我的打算是只要现在的军事行动许可，就继续前进和摧毁一切残余的有组织的德国军事力量。

如果那时需要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而条件又许可的话，我们合乎逻辑的行动方向应是比尔森和卡罗维发利。我将不采取我认为军事上不明智的任何行动。”

艾森豪威尔确实进军到了比尔森和卡罗维发利，南面到达伏尔塔瓦河上游地区的捷克-布杰约维策。为了进行四月攻势拨归佩顿指挥的第一军第二师向南挺进两百公里，四月十九日到达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与第三军的第十六师会合，于五月四日夜参加进攻比尔森。德国将军冯·马耶夫斯基向捷克爱国者投降两小时之后，比尔森就于五月五日早晨落到了第十六师和第二师的先头装甲部队手中。几乎在同时，捷克人在首都举行了起义。

象第二师战史记述者所写的，比尔森人民欢迎美国坦克甚至比巴黎市民欢迎其解放者更加热情。比尔森市长照传统的方式用面包和盐欢迎了第二师师长罗伯逊少将。捷克小孩高兴地爬到坦克顶上，人们在大街上唱歌跳舞彻夜不停。

但是，捷克人马上就催促美军司令官向布拉格进军。比尔森起义的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约·马塔斯在一九六八年向布拉格周报记者谈话时回忆说：

“美国人到了我们这里，但布拉格仍在呼救。美军和我们国外部队的联络官西特克中校来见我，我们一块去请求魏尔凯将军（副师长）援助……魏尔凯将军无权单独决定任何问题，但他答应电告在纽伦堡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回电说我们得等到早晨四点……早晨四点来电说，艾森豪威尔不同意去那里作战，关于布拉格的问题已另有决定……"

正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政治考虑和军事行动方面的犹豫不决使盟国失去了布拉格这张牌。邱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说，"没有协议禁止他（艾森豪威尔）占领布拉格，如果军事上可行的话，"他回忆说，虽然俄国人同意美国进至卡罗维发利——比尔森——捷克-布杰约维策一线，但五月四日他们对第三军一直推进到伏尔塔瓦河和布拉格的想法"作出了强烈反应"。

艾森豪威尔曾提出过这种想法。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迪安准将在美国与苏联军事联盟一书中报告说，苏军参谋长阿·安东诺夫对这一建议的反应是"强烈抗议"。"从安东诺夫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苏联外交的精明——他们打算将捷克斯洛伐克拉入苏联的轨道，不能考虑让捷克人感激美国解放其首都。"

苏联的反对引起了华盛顿的反应。象杜鲁门总统所写的："当然，我同意邱吉尔的意见，占领象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这样大城市是有好处的。但事实是，象东欧这些国家，这些大城市都在苏联控制之下，或即将落入它的控制之下。"他继续写道："俄国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们知道这一点。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我们就坚持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办法就是严格执行我们的协议，并坚持要求他们也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五月六日凌晨艾森豪威尔指示佩顿实际上拒绝捷克人对他下属军官的要求，停留于卡罗维发利——比尔森——捷克-布杰约维策一线而不再向捷克斯洛伐克纵深挺进。这时佩顿的坦克从卡罗维发利或比尔森到布拉格只有两小时路程，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抵抗处于总崩溃状态，俄国人在伏尔塔瓦河谷以东还有一段距离。捷首都对第三军来说是唾手可得。可惜美国上层决定不走这步诱人的棋。

邱吉尔再次试图尽力改变局势。迟至五月七日，除试图镇压起义的德国党卫军师外，伏尔塔瓦河谷仍然处于军事真空，这时他电告艾森豪威尔："我现在仍然希望你的计划不会禁止你向布拉格挺进，如果你有部队，又不会很快遇到俄国人的话。如果你有部队，这个国家又是空的，我想你是不会把自己手脚束缚起来的。"

历史正是选择了这一天来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第一次嘲弄。

大概是出于自己决定，也由于比尔森和其他已解放了的地方捷克人的坚持要求，佩顿五月七日秘密地特意派出使者去向新成立的领导起义的捷克民族委员会提出，美国装甲部队可于五月八日凌晨进入布拉格。但是佩顿的使者解释说，由于极端微妙的政治局势，只有在捷克民族委员会的邀请下才能这样做。

接见美国人的人正好是约·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位

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他表面上是委员会的副主席，实际上是它的真正头头。（出于策略上考虑，共产党人找了一位非党人士来作委员会的主席——他就是列·普尔哈拉将军，虽然布拉格起义主要是共产党人筹划的。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格局——共产党的一贯伎俩——已经开始出现。）三十四岁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最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当党的大多数上层领导人——如克·哥特瓦尔德和鲁·斯兰斯基——住在远离战火的莫斯科，有的藏身于占领下的法国或者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他留在国内，进行地下斗争。他当过面包师和工会积极分子，一九三七年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他晋升到党的书记的高位，在纳粹占领下，他进入了第四届地下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现在作为民族委员会的发言人，斯姆尔科夫斯基告诉佩顿将军的特使说，布拉格的捷克人宁愿由俄国人解放而不愿被美国人解放，虽然苏联部队离布拉格城区还有一整天的路程。他这么做肯定没有得到新成立的科希策联合政府的批准，这个政府也不一定知道此事。许多年之后—— 一九六七年，当不再在思想上禁止承认美国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时，——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一次公开集会上解释说，他拒绝佩顿的建议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军的占领会影响到共产党对捷克斯洛伐克将来的计划，这一点比尔森的低级共产党人显然没有考虑到。事态发展表明，邱吉尔在给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坦率

的电报中所说的并不是异想天开。

佩顿只好接受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决定，于是依·科涅夫元帅率领下的苏联部队就在五月九日凌晨进入了布拉格。就象艾森豪威尔后来如实向英美联合参谋部报告的那样，美军沿着他们五月五日的占领线停了下来，“而红军在清除了伏尔塔瓦河东西两岸残敌之后就占领了布拉格”。

可是，有的捷克人曾经希望结局不是这样。有一张明信片可以为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主要在波兰的压力下（这是我的出生地，它参加了八月的入侵）以我的所作所为超出了《纽约时报》记者的职责为理由，我和我的妻子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一位年纪较大的布拉格旅馆的雇员偷偷地交给我妻子一张明信片。很明显，这是一张珍贵的纪念品，在它的画面上是正在行军的美国士兵侧身像和以布拉格塔影为背景的欢呼的人群，上面盖着交叉的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国旗上方的文字是：“美国士兵之歌——奥·布列哈曲，比尔·鲍威尔词。”上面有一张带着希特勒侧身像的东德一点二马克的邮票和纪念戳：“捷—美—解放比尔森—5·5·1945。”

在明信片背面认出这个不知名的抒情诗人叫斯·比·鲍威尔。上面印的英、捷文歌词是：

> 捷克斯洛伐克胜利日。比尔森人民用“你们好！”和“万岁！”的欢呼声欢迎我们！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日

子，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一个最伟大的日子。美国人将永远怀念我们如此珍爱的人民，珍爱的人民。

在写地址的地方有用打字机打的已退了色的英文和捷文："感谢美军！"

这是过去的声音。它提醒人们，捷克斯洛伐克当前这一场戏确实是大约在二十五年前就开始了的。

有关一九四五年五月事件的一件奇怪的事是，斯姆尔科夫斯基这个使苏军占领布拉格成为可能的人，从而帮助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政权的人，在五十年代苏联指挥的大清洗中却陷身囹圄四年，然后，作为一名主要的进步共产党人，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中又成为莫斯科集中攻击的主要靶子。在强加于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难以置信地曲折多变的政治路线中捷克斯洛伐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提供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画。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包括匈牙利和波兰在内，有那样多的要人时而掌权，时而坐牢，时而又掌权，时而失宠，时而恢复名誉，然后又失宠。他们接受荣辱的惊人锻炼和对不断变化的不同命运逆来顺受的能力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机会来理解这么多共产党人深信不疑地盲目忠实于他们教会似的党的特殊心理。

斯姆尔科夫斯基只不过是把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六八年联系起来的许多人当中的一个。正当他在布拉格作出他的命运攸关的五月决定时，一个名叫卢·斯沃博达的五十五岁的共产党将军（他以前是科涅夫元帅部下捷克

斯洛伐克军团的司令）当了从莫斯科迁往科希策的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非党”国防部长。虽然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斯沃博达都是老共产党员，可是没有理由认为在那些重要的日子里他们已经相互认识。同样，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些功绩和他们在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中所起的作用——斯沃博达当时是有可能不让共产党夺权的——得到的报答却是在六年之后被自己的共产党同志判处徒刑投入监狱。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脑子里也从未闪过，由于命运的安排，他们会参加著名四巨头公然反抗苏联武装入侵的越轨行动——斯沃博达将军是作为受尊敬的、慈祥的共和国总统而斯姆尔科夫斯基则是作为享有盛名的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主席参加的。

古·胡萨克为一九四五与一九六八年之间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联系，他是一个带有知识分子特点的斯洛伐克律师，他在斯洛伐克作为共产党员的经历与斯姆尔科夫斯基在捷克地区的经历相类似。一九四四年斯洛伐克举行反抗德国人的起义时，他只有三十一岁，他是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管内政的委员、斯洛伐克地下共产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一九四四年八月，他同一个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代表团一起从斯洛伐克的一个秘密机场飞往莫斯科。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参加了共产党代表团，与贝奈斯总统领导的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谈判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政治安排。他的同事们后来回忆说，他是那时主张成立联邦共和国、使斯洛伐克获得自治权的少数几个共

产党人中的一个。一九四五年以后，他在布拉格的党和政府工作中提升很快，但到一九五一年他也以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陷身囹圄。在狱中度过近九年之后，又恢复了名誉，胡萨克当然就在一九六八年以改革派领导人之一的面目出现。然而一年以后，他却鼓吹对苏联实行"现实主义"政策，放弃了自由主义，在杜布切克下台后担任莫斯科恩赐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当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和胡萨克一九四五年协助规划民族未来的时候，那些命定要在一九六八年享有盛名或遭受辱骂的其他人仍然默默无闻。除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斯沃博达外，四巨头中的另外两名成员，杜布切克一九四五年还是个不知名的二十三岁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斯洛伐克起义中他两次负伤，他的哥哥尤利乌斯牺牲。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日子里任总理，一九六九年自由派政治上失败之后仍任总理的奥·切尔尼克，是俄斯特拉发的一个年轻锁匠。作为一个努力上进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他通过夜校获得工程师学位，但只是到了一九六〇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派总统安·诺沃提尼提升他为内阁技术部长的时候切尔尼克才为人们所注意。他没有象胡萨克那样遭到监禁——除了俄国人入侵后被短期禁闭之外——象他这样的人，从共产党正统转到自由主义异端再回到正统是相当容易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中思想上变化无常的另一个

恰当例子就是卢·斯特劳加尔。当科涅夫元帅的坦克开进布拉格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二十一岁在布拉格学法律的大学生。斯特劳加尔是诺沃提尼的内务部长，在六十年代掌管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一九六八年他认为担任改革派政权的副总理是可能的。七个月之后，他又很容易地同苏联入侵妥协，他参加了胡萨克和切尔尼克的"现实主义的"掌权的三套马车，甚至比他的两位同事显得更加亲苏。

但是最有资格充当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六八年联系人的是诺沃提尼本人。布拉格解放时他在纳粹集中营，他很快进入斯大林分子上层，他在五十年代审判案中的作用赢得苏联赞赏，这个人令人讨厌地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直到一九六八年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赶下台为止。无论在当时还是入侵以后俄国人都不愿伸一个指头使他重新掌权。在那些以自己的政治生涯把一九四五和一九六八年联系起来的人们当中，诺沃提尼是共产党政治中唯一的一个被完全遗忘的人。

Ⅱ

布拉格棋盘

和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或者匈牙利人不同，对捷克人来说，在一九四五年相当热烈地欢迎苏联解放者并不困难。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传统的反苏情绪。那里的共产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合法的（这是与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不同的），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是受到充分尊敬的。比方说有些捷克斯洛伐克最优秀的作家在战前常向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投稿。慕尼黑以后，苏联是反对张伯伦和达拉第把捷克斯洛伐克奉献给希特勒的唯一的世界大国。

一九三九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纳粹的傀儡斯洛伐克国以及它同贝奈斯的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很明显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打击，但这些事很快由于战争的爆发就被人淡忘了。后来贝奈斯总统主动地甚至是甘心情愿地与在莫斯科的捷共领导人制定战后时期的安排，而一九四五年四月他的政府就把总部迁往莫斯科。

尽管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基本上仍是一个亲西方的

国家，如果它有选择机会的话，它很可能会选择美国来解放。象我们看到的，无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人担心如果把国家完全交给苏联和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朋友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早在五月六日不安的邱吉尔就电告杜鲁门总统说，东欧的局势已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在那里同斯大林举行一次会议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告诉总统说，“我们应该坚持我军在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主要的美国中央战场和英国战场业已取得的或将要取得的阵地。”这就是波茨坦会议的前奏。

他为捷克斯洛伐克争辩的实际上是要求美军至少要留在他们已占领的卡罗维发利——比尔森——捷克-布杰约维策一线。但这也是枉然。由于政治上的乐观，美国在当年十二月决定把它的部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回到重建的德国和奥地利占领区。

尽管邱吉尔很担心，但是在布拉格并没有随着苏联坦克的到来建立起一个公开的共产党政权。一九四五年以后几乎有三年时间，捷克斯洛伐克享受着自由的蜜月，至少是抱有幻想和缓遭苦痛。亲西方的民主派和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在贝奈斯总统的领导下平静地执政，这位六十一岁的总统回到了他一九三八年流亡时离开的赫拉德强尼城堡。

与此相反，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它们直至战争结束时还同纳粹一起作战，只是在红军即将

到来时才转到这边来——莫斯科很快地强行安插了自己的人，逐个用坚定的共产党政权来替代动摇的联合政府。在波兰，由于它处于从俄国到东德的交通要道，斯大林首先从莫斯科派了一个纯共产党的临时政府到卢布林，在同英国和美国经过一番英勇的争夺战之后才同意把伦敦流亡政府的斯·米科怀奇克集团作为小伙伴包括到华沙新政权中去。在德国的苏占区，随着英美部队的迅速撤退和苏军的大量到来，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未来萌芽，更是毫无问题的。最后在南斯拉夫，铁托元帅不需要俄国人插手就宣布成立了他自己的共产党国家，而阿尔巴尼亚马上就落到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则不同。自从托·加·马萨里克一九一八年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以来直到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纳粹占领之前，它曾是东欧国家中一个唯一起作用的民主国家。那部分世界的其他国家曾组成了一个半法西斯的王国，波兰是个近似法西斯的共和国。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他的导师和朋友退休之后一九三五年他继任了总统）都曾同中左的民族社会党有联系（该党建于一八九八年，它与德国的国家社会党毫无共同之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布拉格附近的工业城市克拉德诺成立，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拥有传统的拥护者。战前它的党员人数大约只有八万人。但它在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中的

影响却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所表示的范围。作为这个国家的四大政党之一，它一般控制着百分之十左右的选票。（一九二五年它赢得了最大的胜利，在三百个议员的议会中取得了四十一个席位，仅以五席之差落后于领先的农民党。）

在纳粹占领时期，共产党人无论在捷克地区还是斯洛伐克，都利用政治上的真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一九四四年的斯洛伐克八月起义主要是他们负责发动的，他们在捷克的地下工作也很活跃。其它组织的民主抵抗活动是分散零星的、缺乏组织的、不大有效的。一九四四年随着苏联进军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组织者就开始公开活动，而党的组织，在没有别的现存政治势力与之抗衡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了起来。当贝奈斯总统一九四五年到达莫斯科最后谈判建立和平时期政府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势力已经是一个不得不加以考虑的现实。面对这种局势和苏联在欧洲所起的明显主要作用，贝奈斯很显然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参加联合政府。

有助于作出这种抉择的是战后欧洲的现实，也是由于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历史上形成的反俄情绪。（这在邻国波兰就大不相同，波兰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为止，在俄、奥、普三国瓜分下几乎度过了一百五十年之久，而一九三九年九月又遭到苏联入侵。）虽然斯大林一九四三年曾向贝奈斯保证，在赶走纳粹之后会将靠近乌克兰的山区罗塞尼亚归还捷克斯洛伐克，而他后来改变主意，

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还没有回来进行政治谈判之前就把这个省并入了苏联，对此贝奈斯和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似乎准备忍辱负重地加以承认。至于将来，贝奈斯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传统和克里姆林宫的诚实意图。

伦敦的贝奈斯政府以前同俄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接触是相当频繁的。一九四三年九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产生了苏捷友好同盟条约。那是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大使一九四四年同苏联接触为斯洛伐克起义取得军火的，当然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共产党人起了突出的作用。捷苏一九四四年五月的协议为建立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区的政权作了准备。

这样当贝奈斯和他的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托·马萨里克的儿子）飞往苏联首都去开始谈判的时候，已经存在着自由派和共产党人合作的背景。和波兰的情况不同，捷两派地下军——一个忠于伦敦政府，一个忠于莫斯科——之间没有深刻的仇恨，他们没有遇到象波兰流亡政府所遇到的问题——数以千计的同胞被俄国人处死和放逐的悲剧。

再有，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立场来看，贝奈斯是个非常合适的人。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具有象其它一些伦敦流亡政府那样严重的“反动”色彩（总的说来它们也确是如此）。也很象是那样的，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认为贝奈斯本质上是天真的，他们选择了耐

心等待，而不搞不必要的和不成熟的苏联想象的那种激烈斗争，他们有信心，这样最终他们是会掌握权力的。

贝奈斯和扬·马萨里克率领伦敦代表团，而共产党的代表团则由捷共有纪律的老领导人组成。它的团长是克·哥特瓦尔德，党的四十九岁的总书记。尽管他是莫斯科路线的终生追随者，一九四五年他同贝奈斯谈判中曾提到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二把手是鲁·斯兰斯基。这个四十四岁的犹太人在莫斯科度过四年战争岁月，一度在基辅游击队总部工作，一九四四年作为党的主要秘密代表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个主要谈判者是瓦·柯别茨基，四十八岁，是个共产党记者和宣传专家，他整个战时都是在苏联度过的，早年曾是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最后还有古·胡萨克，他是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位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作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负责内政的委员，是斯洛伐克利益的代言人。

莫斯科会谈大约进行了一个礼拜——贝奈斯不断受到共产党的压力，他们马上就提出了他们的内阁名单——一九四五年四月四日，贝奈斯总统和共产党人就他们的民族团结政府达成了协议。初看起来，在当时环境下贝奈斯干得非常出色。他本人被肯定为共和国总统。在二十个内阁席位中，共产党人只占七席。陪同贝奈斯到莫斯科的爱·塔博尔斯基，一位捷克的外交官和历史学家，在他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一书中回

忆说，年迈的总统颇为欣赏哥特瓦尔德。“哥特瓦尔德强调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和他明显地不希望切断同西方的经济联系，给贝奈斯总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贝奈斯博士感觉到，哥特瓦尔德不喜欢正统主义和他相当高的现实感会使他尽可能避免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塔博尔斯基博士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看到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已经挣脱了苏联的束缚，哥特瓦尔德“也许曾考虑过，这样的道路比投靠斯大林要安全些。”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异端的第一颗智慧的种子可能在布拉格之春之前的二十三年就已经种下去了。

尽管贝奈斯总统对其谈判结果甚感满意，仔细的观察表明，他是为自己搞了一个危险的特洛依木马。政府总理是兹·费林格，五十五岁，一个老资格的捷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贝奈斯战前和战时驻莫斯科的大使。不久贝奈斯就沮丧地发现，费林格表面上虽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忠实递球人。四位副总理中两位是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是代表捷克共产党的副总理，威·西罗基是代表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副总理。一九四五年不存在真正分开的捷共和斯共组织（实际上捷共从来就未同斯共竞争过）。这不过是用来迫使贝奈斯接受两名共产党副总理的手段而已。西罗基，一位四十三岁的老共产党员，在莫斯科度过了大部分的战争时光，参与领导过斯洛伐克起义，后来成了一个特别

阴险的人物。

内阁本身由十六位部长组成，使西方观察家高兴的是只有五个部纯属于共产党人。但是这样的五个部——内务部、情报和文化部、教育部、农业部和社会福利部——是具有战略性的部，他们把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手段交给了共产党人。

内务部，包括警察和特务机关由瓦·诺塞克掌管，他五十三岁，是一位著名的工会工作者和党的领导人，曾任贝奈斯领导的流亡政府——伦敦国家委员会的副主席。情报和文化部由瓦·柯别茨基掌管，他控制报刊宣传、广播、剧院、电影以及其他由国家支持的艺术活动。教育部交给了兹·尼耶德利博士，一位深受尊敬的音乐评论家、布拉格和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尼耶德利当时六十七岁，被党看作是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但大家都把他看作是一位“革命老人”。农业部由尤·朱里什掌管，他四十一岁，战前是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国会议员，是一位有高度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战争期间他在德国监狱里度过了四年。塔博尔斯基指出，任命诺塞克为内务部长，朱里什为农业部长就使共产党人控制了两个部，“这两个部在贯彻捷共早期的农业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没收被赶走的德国人和‘捷奸’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照塔博尔斯基的说法，这两个部变成了“捷共中央委员会的机构，它们严格地贯彻执行了捷共的指示。”

至于国防部，莫斯科谈判参加者一致同意，应由“非党”人士担任。但是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却是一位共产党将军，后来又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卢·斯沃博达。

面临这一难对付的共产党阵容，贝奈斯总统能够依靠的主要人物只有扬·马萨里克，这位在西方和国内都知名的人士留任外交部长，并成了他最亲密的同事。在其他非共产党部长中只有外贸部长胡·里普卡（他在伦敦曾任情报部长）、工业部长博·劳什曼、食品部长瓦·马耶尔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尽管是短暂的。其他人很快就被历史遗忘了。

当这一颇为独特的内阁一达成协议，贝奈斯总统就从莫斯科回到苏军新解放城市科希策，在捷克斯洛伐克土地上正式建立他的政府。五个星期之后，当俄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解放布拉格之后，这个新政权就在波希米亚的古老首都庄严地宣誓就职。

贝奈斯政府在科希策建立之后就于四月五日公布了它的“在本国领土上的第一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政府的纲领”。在起草这个纲领过程中共产党人起了主导作用——实际上当贝奈斯还在莫斯科时他们就把它交给了贝奈斯——但是科希策纲领是经过精心考虑起草的，它看起来不象一个共产党文件，而倒很象英国工党制订出来的东西，尽管它要求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在这个纲领中提出了银行、主要工业、保险和动力资源的“国有化方向”，但只字未提国有化

私人财产。在农业方面，甚至连“国有化方向”都未提及，而强调的是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小农和中农。（这当然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武器。）共产党一九四五年的战略是强调温和、合作、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和其他可能取得国内的支持和国外的赞赏的政策。因为滋事生非的时候尚未到来。

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说，这笔一揽子交易看起来真有点吸引力。然而人们必然要提出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当苏联势力和共产主义在整个东欧正在扩张的时候，在一个共产党控制的政府里，贝奈斯究竟认为他能够实现什么目标呢？反过来说，他的对手又会怎样对待他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呢？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两人都是聪明而又有经验的人，他们不可能不想到，在一个驻满了苏军又与苏联接壤的国家里，而且还是如此清楚地并入战后正在形成的苏联政治地理体系的国家里，把国防部、内务部和情报部交给共产党人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如果他们需要先例的话，只要看看罗马尼亚就够了。在捷苏莫斯科谈判前几周，俄国人在罗马尼亚搞了一次残暴的、但是成功的政变，推翻了由尼古拉·拉德斯库将军领导的联合政府。拉德斯库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联合“国内派共产党人”推翻了约·安东内斯库的法西斯统治，在战争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使罗马尼亚从纳粹阵营转到盟国阵营。在年轻的国王米哈伊尔的支

持下，拉德斯库的联合政府似乎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因为这个联合政府不仅包括非共产党人，而且还包括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内派共产党人，他们与长期流亡在莫斯科的罗共集团有矛盾。（可以看到，这些国内派共产党人是东欧的第一批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他们比南斯拉夫铁托的反叛早四年，比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几乎早十二年，比布拉格之春几乎早二十五年。更有趣的是，这些人和他们的继承者，一九六五年以后又掌了权，甚至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罗马尼亚的民族共产主义向苏联挑战。）由于战前地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从未超过一千党员，而一九四四年八月以后罗共的发展也不算快，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施加直接影响来左右局势。派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安·维辛斯基，这位白发苍苍的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担任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大审判案的总检察长而闻名于世的。

维辛斯基一九四五年二月底到达布加勒斯特，他要求米哈伊尔国王立刻以未能"维持秩序"为理由解散拉德斯库内阁，任命一位名叫彼·格罗扎的亲苏政治家为总理。格罗扎是所谓民族民主阵线的领导人。维辛斯基提醒国王在罗马尼亚驻有百万苏军，限他在一百二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作出决定用格罗扎来替换拉德斯库，并在第二天中午以前任命一个完全新的内阁。否则，他警告国王说："罗马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格罗扎的民族民主阵线政府于三月六日就职——

这个政府只存在了两年半就被俄国人提出的清一色的共产党政权所代替——这是在贝奈斯与捷共组织他的政府之前不到一个月发生的事情。

可是当他们准备从伦敦飞往莫斯科的时候，贝奈斯总统和扬·马萨里克似乎感觉到，他们不得不信任共产党人，尽管有罗马尼亚的先例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波兰争吵。就如贝奈斯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那时已经太晚了），“我当时仍然相信苏联领导人的诚意。”这当然可以归咎于一位善良和诚实的人的天真。很明显，贝奈斯表面的天真在共产党的早期战略计划中是一个主要因素。可是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的，这不是事实的全部。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从欧洲的新形势看，一九四五年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选择余地是极为狭小的。事实上他们同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中所受到的限制，恰如他们一九三八年在同德国和纳粹的关系中所受到的限制一样。尽管它具有亲西方的倾向，但被西方所遗弃却是托·马萨里克一九一八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无法摆脱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曾受到伍·威尔逊总统的支持，这也变成了一种讽刺。）整个这段历史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歌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经常是“欧洲的一位孤独的人”。

帮助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西方在希特勒一九三八年要求和接管苏台德区时（据说这是他“在欧洲的

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一九三九年纳粹又开进布拉格时就撒手不管了。严阵以待的贝奈斯总统尝到了西方对其前房孩子的忠诚的痛苦教训。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他接到通知说，英国和法国已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屈服，同意由德国、波兰和匈牙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背着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贝奈斯缓慢而沉重地告诉他的内阁，"用这种办法来对待一个独立的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我发现，大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并不把小的国家和民族看作是平等的一员。"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贝奈斯对西方感到痛心和缺乏信心的开始——由于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而对英法缺乏信心，不太明显地对美国也缺乏信心。（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当法国人寻求支持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告诉他们说，美国将不会"出一个人，花一分钱"。）在流亡伦敦时，贝奈斯再一次发现，西方对捷克斯洛伐克很少有兴趣。虽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法国和英国军队中打仗，但是直到一九四一年贝奈斯才得到英、美对他的流亡政府的正式承认。一九四三年他在华盛顿同罗斯福的会晤并未使他对未来岁月感到乐观。

当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一九四五年三、四月间面对共产党人谈判时，他们在组织战后政府时会准备接受那样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妥协，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如果不走这一步，他们的另一种选择是再回到伦敦去，但这么一来他们就丝毫没有希望能影响捷克斯洛伐克未来

事件的政治方向，只能让苏联按自己的条件先建立一个地方“联合”政府——象它在罗马尼亚已经作的和波兰正在作的那样，——或者立刻把一个清一色的共产党的统治强加给这个国家。（在这里还可以指出一件有意思的事：在一九五二年的“叛国”案审讯中，控告斯兰斯基的罪行之一就是，他曾批评哥特瓦尔德没有在一九四五年为共产党人夺取全部政权而要一直等到一九四八年。）

贝奈斯已经是一个患病而又疲惫不堪的人，他当时似乎决定，先让一步，再等待时机。他深知西方就象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那样，不会伸出一个指头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有邱吉尔四月的首次警告，西方的政策，特别是美国政策的趋势是尽可能快的从欧洲脱身，集中力量于太平洋战争。雅尔塔会议以及后来英美同斯大林交换的信件在政治上真的给了斯大林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自由统治权。虽然英美在整个春季在波兰问题上打了一场政治后卫战，但是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也会这样干。

贝奈斯一生的最大悲剧是，在每一个转折关头他总是作出可怕的决定。这也许是他的或者捷克人的个性，每当面临巨大压力时，他总是选择妥协和退让。一九三八年他决定不抵抗德国人，尽管他的国民是愿意打仗的；象他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对内阁一次讲话中所解释的：“那是很难决定的，是接受条件，拯救民族呢，还是进

行战斗，而遭受屠杀呢，……历史将作出判断，怎么做是正确的。”贝奈斯一九三八年的抉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一九四五年同意组成那样的战后政府和一九四八年同意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抉择的根源。想到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历史，这种态度也是它决定不抵抗一九六八年苏联的入侵的根源。

Ⅲ

贝奈斯的晚年

贝奈斯总统在设法把他的分裂和混乱的国家从战时的混乱状态引向和平秩序的时候，是感到日益寂寞和孤立的。他这是在逆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欧洲历史的潮流而进。庄严地高踞于布拉格城和急流而去的伏尔塔瓦河之上的赫拉德强尼城堡中的总统府，已经不再是共和国权力的真正中心。实际上这位年迈的、非常忧郁而又自尊的人从流亡中带回来的只是行政权力的外表而不是权力本身。

现在，在由春季进入夏季的时候——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经过七年压迫之后的第一个自由的夏天——真正的权力中心已转移到布拉格市内捷共中央所在地的一座灰色的建筑物中去了。那里具有坚定信心的一群人又在安排策划压迫捷克斯洛伐克，这次是以马列主义信仰为名的。他们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它的军队仍占领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它的“技术专家”不声不响地、精心地工作着，但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议会民主自杀

西方——当时关心太平洋战争、波兰的命运和铁托南斯拉夫的扩张主义——对乌云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上空积聚照例不大注意。华盛顿和伦敦看来是满意的，在一位受尊敬的民主主义者贝奈斯总统领导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在进行统治。他们也不想过问一下，在这种乐观的幻想后面会是何等恼人的现实。

而现实是，共产党人为使党变成为国家的领导政治力量正在不知疲倦地进行工作，渗入从工会到农民合作社、妇女、青年和学生组织、体育俱乐部和睦邻友好组织等一切可能的现有组织，并夺取这些组织。在这一工作中他们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地方人民委员会，它们表面上是属于民族阵线政府的，但是越来越成为共产党的行动单位，成为党的公开的区、县、街道和工厂委员会的平行机构。（以后在共产党整个统治时期，它们被作为有用的辅助组织而被保留了下来。）

共产党本身则马上掀起了一个吸收党员的强大运动。瓦·柯别茨基控制新闻纸张的分配权，他还熟练地掌握着广播电台，这样就使国家的整个宣传机器为捷共服务。宣传工具强调说，共产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社会改革派，敦促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参加共产党。公民们不但被鼓励、邀请和引诱去参加党，共产党的代理人还到处宣传党证可以打开获得较好的职业、升级、官方照顾等等的大门。特别在工厂、机关中和对本性保守的农民来说确实如此。共产党通过瓦·诺塞克和尤·朱里什

掌管的内务部和农业部的分配土地计划来吸引和促使农民转变。采取这种办法，诺塞克没收那些被指控为在纳粹时期当过“叛徒”或“捷奸”的日耳曼和匈牙利等少数民族的土地，而朱里什则以相当于一季收成的代价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许多杰出的外国观察家、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相当轻易地相信了共产党信奉民主的表白和作法。在美国报刊上和其他地方以惊喜的心情报道说：一个共产党的农业部长把土地分配给新的农民——土地所有者；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不寻常的例子，在那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允许互相竞赛。对于正在国内继续努力建设一个政治上巩固的共产党的苏联人和捷共来说，这正是他们希望在国外造成的印象。

大力征收党员运动可能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即共产党应该是精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不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但在现阶段，战略是通过议会道路最终夺取政权——意大利共产党曾作过同样的尝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党必须尽可能地发展队伍。因此，捷共党员战前总共只有八万人，到一九四六年五月（那时贝奈斯政府执政刚刚一年）已经增加到一百一十五万九千一百六十四人，而民族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的力量就相应地削弱了。

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是由斯兰斯基总书记领导的，协助他的有六十一岁的安·萨波托斯基（他是革

命工会运动的主席、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总统），雅·杜兰斯基（五十五岁，一个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党的副总书记）和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刚被选入政治局，他曾拒绝美军进入布拉格）。在斯洛伐克，党的活动是由下述人员领导的：卡·斯米德凯，四十八岁，他是斯共副主席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卡·巴契列克，一个相当冷酷无情的人，后来名声极坏；无处不在的胡萨克，当时担任斯洛伐克党的副主席、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副主席和负责运输和公共工程的委员；拉·诺沃麦斯基，知识分子，他同胡萨克一起由于强调斯洛伐克的立场后来吃到苦头。关键性的布拉格组织掌握在四十一岁的诺沃提尼手中，他当过机修工，一九四五年他从纳粹茅特豪森集中营出来后就立即投入了党的工作。他代替斯姆尔科夫斯基当了布拉格党组织的首脑，而后者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是他俩的命运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到五十年代，以后在一九六八年他俩的命运又发生了联系。

在民族阵线政府中，副总理哥特瓦尔德和西罗基以及五位共产党员部长（在总理费林格、国防部长斯沃博达的帮助并在几位民族社会党内阁成员的顺利配合下）与总部设在城内的斯兰斯基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密切地协调他们的活动。就党的上层领导来说，真正管事的是哥特瓦尔德还是斯兰斯基，这可以讨论。但实际上这关系不大，因为他们经常接触。

在赫拉德强尼城堡山脚下的漂亮的契尔宁宫，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在计划和执行与西方和苏联都保持关系的富有希望的贝奈斯外交政策。但他的第一副手是弗·克利门蒂斯，一位四十三岁文雅的斯洛伐克人，无论战时在伦敦和现时在布拉格他都是忠实于捷共的。

就这样，从一九四五年五月贝奈斯政府建立时起，共产党灵活的各级组织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都运转起来了。赫拉德强尼城堡里的这位年迈老人实际上无法左右局势，局势很快就摆脱了他的控制，特别是在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进行迫害和施加暴行方面情况尤其如此，这一措施是受到共产党和其他一些人积极支持的。

尽管贝奈斯支持并签署了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的法律，但他很快就对虐待、监禁和屠杀这些少数民族数以千计的成员感到很吃惊。活象纳粹统治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痛苦遭遇一样，日耳曼人家庭——其中许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了几个世纪——遭到了报复，这真是民族历史中最乏味的一页。纳粹式的手段常常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政权机关执行，它们有时还起法庭的作用，而且很容易地就把群众召集起来。当贝奈斯或他的代表设法干预这些暴行时，多数情况下都无人理睬。由于共产党控制了内务部和警察，实际上毫无办法来阻止这种报复行为。

为了在这些和其他一些事情上在捷克斯洛伐克保持某种政治上的平衡，贝奈斯无法指望得到西方的支持。

他所组织的政府已得到了西方的承认，邱吉尔和杜鲁门都似乎认为，布拉格基本上一切都不错。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东欧的主要问题是波兰问题，而英美同盟关心的问题是：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非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使在西方打过仗的现在打算返回家乡的波兰士兵得到保证等等。盟国急于想阻止在波兰建立一个暴虐的共产党政府，正是为了保卫这个国家，一九三九年爆发了战争；但是它们没有想到，在捷克斯洛伐克潜伏着同样的危险。贝奈斯在解放后五月十二日的第一次讲话中，实际表示了和解。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人说，一九三八年“西方世界对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让他们这样说吧，战争已很好地报偿了这种不正义的行为”。但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又被西方盟国丢在一旁听其自然，而贝奈斯也未作出大的努力来改变它们的想法。

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国部队告别了比尔森，到十二月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撤退完毕。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最后一个外部源泉——如果不说是对贝奈斯本人的支持的话——也就不存在了。邱吉尔已不再是英国首相，他的继承人克·艾德礼似乎对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感到担心。美国向广岛和长崎丢下了原子弹，对日战争胜利地结束了。现在美国的呼声是“让孩子们回家去”，不想在欧洲惹新的麻烦。

但对贝奈斯来说，问题越来越严重。战时捷克斯洛伐克未遭到重大破坏，布拉格实际上完好无缺，高度发达

的民族工业情况很好，但总的经济形势在恶化。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冬季出现了物资短缺和失业，随之而来的混乱和不满，有利于共产党发展它的力量。

接着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举行了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它是同捷共的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的）——共产党得到选票的百分之三十八（捷克地区占百分之四十二，斯洛伐克占百分之三十），获得三百个议席中的一百一十四席——几乎得到它一九二五年所获席位(那是它战前获得席位最多的一次)的三倍。反对派的最初反应是庆幸共产党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虽然它拥有众多的党员。贝奈斯的民族社会党获得百分之十八点二的选票；天主教人民党获得百分之十五点八的选票；总理费林格的社会民主党得到百分之十二点八的票。共产党现在成了国内最大的党，能够在此基础上组成新政府，但是单独的一百一十四席在议会里是少数，有人曾经希望其它政党能拒绝同他们联合形成多数。

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被费林格粉碎了，这位马克思主义同路人，宣布他同共产党联合，把社会民主党的三十九席加上共产党的一百一十四席，总共就有一百五十三席，正好占议席的百分之五十一的绝对多数。这一行动使费林格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挖墓人”的名声，后来他在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中得到地位作为报偿。（二十二年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发现费林格仍是苏联和共产党正统路线的积极而忠实的支持者。）

由于共产党获得多数票和它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联盟，贝奈斯总统就不得不任命哥特瓦尔德为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理。七月三日哥特瓦尔德任命了一个二十六人的内阁，包括九名共产党部长，其它三名部长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估计是会与共产党合作的；加上他自己，哥特瓦尔德想他可以控制十三票，即内阁成员总数的一半。共产党似乎干得不错，通过议会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分支——这是一种无可争议的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选举前的两个半月，温斯顿·邱吉尔就察觉到了新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三月五日在米苏里的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他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有一道铁幕降临到大陆上"。他谈到了在波兰自由政府遭到否定，苏联控制了东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统治，即将要取消的匈牙利的联合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出现的局势。克·哥特瓦尔德作为共产党的总理夏天在布拉格的就职似乎证实了邱吉尔对东欧事态的估计。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人象历史继续表明的那样，是难以预料的人民。到了一九四七年克里姆林宫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都有理由对这个国家表示担心。尽管共产党表面上控制着议会，但对夺取整个政权的最终目标、消除非共产党民主制度的遗迹和非共产党的政治来说似

乎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相反，这一目标变得相当捉摸不定。

事情发生在对外政策方面。自从一九四五年撤军以后，西方对苏联侵犯欧洲首次作出了反应。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签署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对希腊和土耳共的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法案。由于担心受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帮助的希腊共产党在希腊的叛乱，可能导致完全接管这个国家，美国决定不但支持希腊的政治制度，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准备进行直接干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询问过海军，美国舰队进入希腊海港是否困难。土耳其得到援助以便能更好地抵抗苏联的压力，即使希腊一旦落入共产党统治之下它也能够进行抵抗。

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国务卿乔·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宣布了一个美国与欧洲经济合作的庞大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当年夏季将在巴黎举行一次落实这一计划的会议。国务卿马歇尔指名邀请东欧国家参加。

在捷克斯洛伐克，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很可能不但给主张与西方保持联系的人象贝奈斯和马萨里克，而且也给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哥特瓦尔德总理留下了强烈印象。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非常需要外国援助。由于共产党指导的经济实验并未完全成功，国家无力克服战争破坏留下的后果，因而想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马

歇尔计划成员国的思想就具有很大吸引力。马萨里克说服了哥特瓦尔德及其共产党同事们，使他们相信应该参加美国的计划。同华沙紧急磋商表明，波兰人具有同样的想法。七月四日——在未同苏联讨论的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内阁一致通过参加马歇尔计划。

这一决定的消息震动了莫斯科。几天前苏联人在布达佩斯发动了一场政变。这是一九四五年罗马尼亚政变的重演，它推翻了联合政府，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权。捷克斯洛伐克会同时插足敌人阵营的打算肯定使克里姆林宫深感震惊，这种打算不但被看作是危险的，而且也是荒唐绝顶的。于是哥特瓦尔德总理被邀去莫斯科解释他的行动。七月七日他同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和司法部长普·德尔季纳，一位民族社会党人一起飞往那里。

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同愤怒的斯大林的会见使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一次尝到了触犯苏联人的味道。回想起来，类似的紧急召唤也曾送到其他异端共产党领导人那里，苏联领导人也向他宣读取缔令。塔博尔斯基在他的书中报道说，哥特瓦尔德在莫斯科会谈后告诉马萨里克和德尔季纳说，“我从未看到过斯大林那样大发雷霆……他严厉谴责我接受邀请参加巴黎会议。他无法理解我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他说，我们的行动似乎准备背弃苏联。”

哥特瓦尔德和马萨里克立即向布拉格打电话报告；当天晚些时候召开了一次紧急内阁会议。部长们一致通过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就象三天前一致通过接受它一

样。贝奈斯本来是可能进行干预的，尽管会冒决裂的危险，但他得了中风，病倒了。七月十日捷克斯洛伐克发表声明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参加可能会被解释为一个反对与苏联及其他斯拉夫盟国友好的行动。”莫斯科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二十万吨小麦以示安慰。

一九六八年初我问布拉格的一位捷共主要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战后这个国家的经济保持那么多年如此低的效率。他告诉我，“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这是斯大林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后果，是二十年来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我们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是试图来弥补过去的这些错误。”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能够兴起的另一个根源。

如果说克·哥特瓦尔德由于他试图推行独立于苏联之外的共产党外交政策而在莫斯科吃到苦头，那么国内政策上的新风暴又在等着他。

首批迹象在那年夏天就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不管是普通公民还是政治家们都对共产党及其政策表示疏远。看到共产党的声誉随着选举达到高峰，民族阵线中的其它党派也要开始相应地行动。虽然共产党党员数目实际上还在增加，但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只增加了两万名。相反，贝奈斯的民族社会党虽然没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共产党人拥有的保护资助，在同

一时期却增添了十万党员，总共拥有六，
过了捷共党员人数的一半。政治家们估计，计
四八年五月举行的选举中，共产党人不可能再一次得
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反费林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斯洛伐克的几个小党的联合得票数有可能大大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共产党威信的下降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这在一九四六年帮过共产党的忙，现在由于哥特瓦尔德是总理转过来反对共产党了。中间阶级中的许多人由于迅速的工业国有化而感到不安（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全国工厂数的百分之六十已经国有化，尽管科希策纲领没有号召这样做）。警察和内务部的过火行为适得其反，因为全国对"叛国犯"的报复情绪和反对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情绪已经低落。司法部长德尔季纳这位内阁中少有的几个公开反共的人士之一感觉到有足够保障来积极抵制他的同事诺塞克的活动。约·蒂索、战时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纳粹傀儡总统，经过一场含糊不清的审讯之后于四月被处以绞刑，但是现在司法部长开始监督起政治案件的审讯来了。对共产党的反击就这样开始了。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计划参加马歇尔计划问题上的急煞车也可能起了部分作用。

但哥特瓦尔德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在全国来说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斯洛伐克来说是同多数派民主党的关系。布拉格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否定了费林格一九四

六年同……下尔德……成的"……社会主义路线"联合行动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的代表大会上以二……十……票对……八十……票把费林格从……的位子上拉下来，代替……的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长博·……。……各党……民主……不断同以胡……克为……的……各党……进行挑战

这些事变的总结果就是共产党失去了和平地通过议会取得政权的……景，哥特瓦尔德精心……的政策……达到……标。哥特瓦尔德曾希望，……一九四六年……选举……利……加……它与社会民主党……联盟……使它在一九四八年的……举……取得……的优势，最终消灭贝奈斯及其……者。现在这一指不……了。……共产党迅速改变策略，……出了一个……的……行动……。

在马萨尔……事件上受到……大林……的……下来的……哥特瓦尔德……受不……的政治失败……激……线各政党组成……的……集团……修补他们政治……。但……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人民党直截了当地抵制了这次会议……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批评到处增多的情况下，哥特瓦尔德发出了同"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最后决战的战斗命令……的目标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

使哥特瓦尔德……斯洛伐克……的工具就是……胡萨克。他……了无情地……政治……的才干，这种才干使他在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得到了很大

好处。胡萨克政府十月六日宣布破获了一起斯洛伐克的“大叛国”阴谋案，开始逮捕了三百八十人，主要是民主党党员。十月三十日共产党通过斯洛伐克工会举行了一次激烈的游行示威，要求民主党人从政府辞职。这是往后不到四个月在布拉格所发生的事件的预演。胡萨克未经同他的民主党部长们磋商就献媚地宣布整个政府辞职。虽然立即成立了一个新的斯洛伐克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共产党仍处于少数，但胡萨克却已制造出了一种危机气氛，以利于他将来的行动。

与此同时，哥特瓦尔德也为下一步行动定了调子。

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中，承认在党的队伍中对同非共产党政党的共处政策存在着一种“厌烦和甚至怀疑的情绪”。他说“有的同志”觉得，在一九四五年就应该给“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而不应让其参加联合政府，他这样说可能是指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在回顾其它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所执行的路线时，他报告说，国际形势也在恶化。他说，“外国反动派”正在威胁捷克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国内反动派”也正在钻进民族阵线；民族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曾参与被胡萨克的警察机构在斯洛伐克破获的“法西斯阴谋”等等。

一九四五年的蜜月现在已清楚地结束了。一场公开的斗争即将到来。十一月底马萨里克飞往华盛顿向杜鲁门总统解释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除对方表示同情以

外，他是否得到了任何东西很值得怀疑。

新年——一九四八年——一开始就给共产党人带来了坏消息；但这只能坚定他们卡死民主人士脖子的决心。柯别茨基情报部的民意测验机构向党报告说，最近一次测验表明，一九四八年五月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也许只能得到百分之二十八的选票，而两年前曾得到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上年十二月在各大学举行的学联选举中，共产党候选人只得到百分之二十的选票。党甚至正在失去青年。

所以到了非行动不可的时候了。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党到处组织行动委员会，在工厂和农场，城市和乡村都建立起了革命行动委员会。斯兰斯基在中央委员会建立了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力量，为将来一有机会就发动一次明显的暴乱进行协调准备工作。内务部对非共产党的主要政治领导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据说发现了一起同美国武官有牵连的间谍案。在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不加解释地逮捕民主人士的事情开始了。紧张和惶恐不安的气氛笼罩着布拉格。

危机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五）爆发了。议会开会听取司法部长德尔季纳关于所谓“反共和国”的阴谋案的调查情况。在联合政府存在的整个三年期间，内阁中这位唯一的最勇敢的共产党的反对者德尔季纳指控内务部不适当的干涉调查。然后他告诉代表们共产党控制警察的程度：公安部门中九个局级负责人中

五个是共产党人；政治警察总局的三个主要职位全由共产党人占着。

正在报告进行期间，有消息传到议会说，内务部长诺塞克解除了布拉格警察部队的九名非共产党军官的职务，用忠实于捷共的人取而代之。激动的民主派议员当即要求被革职的军官复职和投票弹劾诺塞克。这就成了转折点。哥特瓦尔德和诺塞克对这次投票置之不理，于是十二名非共产党部长于二月十八日提出辞职，从而使政府垮台，迫使贝奈斯任命一个新内阁。但是贝奈斯没有马上接受他们的辞职，紧张的谈判连续进行了好几天。捷共政治局在哥特瓦尔德的布拉格别墅里连续不断地开会（据说这个别墅同内务部的保卫局和苏联大使馆有直通电话联系）。

二月十九日又有一个新的具有威胁性的因素加进了这场危机。这就是不久前还是驻捷大使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佐林突然抵达布拉格。佐林坚持说，他来是检查关于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谷物的谈判情况的。但很少有捷克斯洛伐克人认真对待这一解释。过了不久就清楚地表明，佐林的布拉格之行同苏联另一个外交部副部长安·维辛斯基三年前访问布加勒斯特非常相象，他的使命就是施加压力，迫令更换政府。

他来访是为了影响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这是八个月中苏联的第二次干预——当他在共产党的外交部副部长弗·克利门蒂斯陪同下驶离布拉格鲁津机场的

时候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佐林立即去拜访了在契尔宁宫里的住所发烧卧床的马萨里克并告诉他，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反动”分子的活动感到不安；正在恶化的世界局势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更加忠实于苏联及其“斯拉夫”盟国。他这个言谈婉转的人——不象维辛斯基拍案大叫——劝告马萨里克说，莫斯科只是希望哥特瓦尔德的政治努力能获得成功。这是用很文雅的方式告诉马萨里克，苏联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

佐林向社会民主党主席劳什曼讲话就直率一些。他提出警告说，如果社会民主党要同反对派部长们保持接触——他提醒说，这些人是投靠“外国反动政府”的，——“那么，苏联就可能被迫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他还劝告食品部长伊·彼得说，“苏联永远不会舍弃自己的朋友。”

虽然当时没有苏联部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佐林似乎暗示，在必要的情况下军事干涉也会发生。他从不把问题绝对地说清楚，但自从他的飞机在布拉格着陆的时刻起，贝奈斯及其同事们就不能不生活在苏联入侵的威胁之下，或者至少生活在内战的威胁之下。就象贝奈斯后来所说的，那又是一次十足的慕尼黑。当然，这些关于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关于苏联不会背弃它的朋友之类的话二十年之后又在布拉格听到了。苏联行为的格式是不大改变的。

但除苏联干涉的可能性之外，贝奈斯还不得不对付

面临的巨大而又危险的内部压力。作为准备武装暴乱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又使武装民兵活跃起来了，他们是一九四六年被政府解散的一九四五年的革命民兵的继承者。

全国民兵司令是约·帕维尔将军，他过去是个工人，曾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过，后来成为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中最著名的捷克志愿军军官。他曾指挥过著名的季米特洛夫营，一九三九年初，当西班牙共和国处于崩溃边缘时，他组织过纵队的最后一支部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拘留一段时间，以后从法国回国，并立即参加了共产党的保安机构。他的副手就是约·斯姆尔科夫斯基。

二月二十日夜斯姆尔科夫斯基发布命令，宣布布拉格所有的民兵从第二天上午六时起处于“战斗状态”，全市民兵七千人每人发两百发子弹。布尔诺军工厂的工人们用卡车送来了弹药。与此同时，捷共政治局向州、县党委会发出指示，“准备清洗民族阵线中的反动分子，开始在工厂组织工人自卫队”。确实已经宣布处于战争状态了。

另一个迫使贝奈斯最后接受十二名部长辞职的压力是近七千名参加革命工会运动代表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来到了布拉格，大会由共产党事先安排将于二月二十二日开幕。这样，对抗的架势就摆开了。

唯一能够对付不断增强的共产党压力的力量就是军

队。但是国防部长斯沃博达，这位作为“非党人士”参加科希策政府的共产党将军，早就站在革命一边。当危机出现后，斯沃博达公开讲，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在苏联保护之下和站在“进步和民主阵营”一边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共产党组织的在布拉格老城市政厅举行的改组过的民族阵线的一次大会上讲话说，他保证“军队与人民在一起……谁要破坏人民的团结那是危险的，必须消除这种危险”。可是在当天，贝奈斯在赫拉德强尼城堡召见斯沃博达，问他如果警察和民兵试图夺取政权，军队是否支持政府的时候，斯沃博达曾经回答说，军队会是忠诚的，如果他从总统那里接到书面命令要求采取行动的话。紧接着斯沃博达就实行他的诺言，用禁止军营中所有反共的高级军官外出的办法来消除“破坏人民团结的”分子。

由于控制着共和国大部分军事力量的三个人——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帕维尔——的有效联盟，终于迫使贝奈斯接受了在佐林的支持下哥特瓦尔德许多天来一直在努力实现的新政府。在斯洛伐克，那是古·胡萨克把最后一颗钉子钉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的棺材上。作为斯洛伐克政府主席，他通知组成多数的反对派的部长们说，他们被解除职务了，因为他们思想上的同事们在布拉格的政府中辞职了；他任命共产党及其追随者来代替他们。这一行动与他二十一年后的行动完全合拍。

二月二十五日，一个灰色的星期三下午，爱·贝奈斯在赫拉德强尼城堡从哥特瓦尔德手中接受了经佐林批准的新内阁名单，在签署之前他犹豫了，但哥特瓦尔德又提出了一个有几百人的“反动分子”名单，如果总统不肯签署，这些人就要吃苦头。想到慕尼黑那一天，“他们背着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他签署了哥特瓦尔德提出的文件。

第 二 部 分

黑　　夜

长夜降临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土上

Ⅳ

人民民主制度

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起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这个名称的全部含义就是丧失公民自由和完全屈从于苏联的利益和愿望。

随着布拉格的被接管，现在东欧已完全陷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波兰的联合政府已不存在，波·贝鲁特是国家元首，弗·哥穆尔卡是共产党（正式名称叫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这两个人都是老牌共产党人，虽然不一定是最坏的共产党人。（如果把共产党领导人政治路线的重大变化都看作矛盾，那么，哥穆尔卡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实际上是扮演了一系列重要而又似乎是矛盾的角色。）

在罗马尼亚，格罗扎总理和米哈伊尔国王领导下的非党政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垮台了，年轻的国王被迫逃亡。几个月之后格·乔治乌—德治成了党的第一书记，他代表一度流亡国外的共产国际罗马尼亚局颇有势力的“莫斯科派共产党人”。

在匈牙利，共产党人——通过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和普希金大使得到苏联的支持——首先搞掉了小私有者党，然后准备吞掉社会民主党，安排圆脑袋的马·拉科西担任执政党共产党的头子，约·卡达尔作他的副手，拉·拉伊克为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兼内务部长（后改任外交部长）。正象共产党报纸编辑约·雷瓦伊后来所讲的那样，"由于苏联和苏军在这里经常帮助和支持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加强了。"苏联总督们的行动方式都是相同的：维辛斯基一九四五年在布加勒斯特，伏罗希洛夫和普希金一九四七年在布达佩斯，佐林一九四八年在布拉格。

一个东欧国家发生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在其他国家引起迅速的反应，所以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反叛以及后来象匈牙利的拉伊克、波兰的哥穆尔卡、罗马尼亚的巴特勒什卡努、保加利亚的特·科斯托夫等人的命运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都有重大影响。所以，他们都是布拉格史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策略上的考虑，共产党人不急于马上完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的假象，贝奈斯被劝说留任总统，至少在名义上。同样，马萨里克留任外交部长，斯沃博达继续任"非党"国防部长。其余二十二个内阁位子中，共产党占十二个，四个归费林格控制的社会民主党，余下的给了被说成是代表非共产党人的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士。

不管怎样，共产党有它自己的人——斯沃博达负责军队，诺塞克掌管内务部。勇敢的普·德尔季纳（他在政变后自杀未遂）的司法部长职务由阿·切皮奇卡取代，他是哥特瓦尔德的女婿，战后一代人中的强硬派共产党人。从马萨里克共和国民主时代过来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对这些打下去的人还有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而切皮奇卡代表的却是无情的现代共产党人中的新的一代，在思想和权力上都是务实的专家治国派。他马上就恢复了一九四五年刚一解放就被解散了的人民法庭，开始了改革捷克斯洛伐克司法制度的两年司法计划，并忙于起草一个强制劳改法。

贝奈斯为什么同意留任总统，让共产党人能借他的名字当招牌来搞政变呢？这可能是个永远得不到满意答复的问题。他的一些知己朋友和同事们相信，他担心他的引人注意的抗议性引退会引起内战和苏联的入侵。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贝奈斯觉得只要他还是总统，即使是名义上的，他就能够对共产党人起一种抑制作用。一九三八年当他的国民和军队准备战斗的时候，他决定不同德国人打仗，一九四八年他又不进行反抗，这两者之间有某种一贯性。他毕竟是个精疲力尽、重病在身的人，曾两次严重地中风，他已失去了战斗意志。从真正意义上讲，自从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离开赫拉德强尼城堡回到他的故乡，布拉格以南的塞泽莫沃·乌斯吉（此后就未再返回总统府）他就已经交出了执行权，或者说

他原来还掌握的执行权的残余。（也许应该指出，七十二岁的斯沃博达将军一九六八年春当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后表现就不一样，他在苏联入侵那一天愤怒地拒绝了由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顽固不化的费林格和苏联大使向他提出的“通敌”内阁各部部长的建议名单。当然把贝奈斯同二十年后生活在完全不同条件下的斯沃博达进行比较，可能是个完全没有根据的历史类比。何况一九六八年敢于反抗的斯沃博达到一九六九年竟变成了恭顺的斯沃博达呢。）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马萨里克愿意在哥特瓦尔德人民民主政府中任外交部长呢。贝奈斯离开布拉格之后，马萨里克成了最后一个把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联系起来的重要官员。但是他的作用却受到了外交部里他周围的共产党官员的限制。据认为，共产党人是把马萨里克作为一个有用的橱窗来利用的，以缓和事变的尖锐性。但在另一方面，根据他的朋友们的意见，马萨里克本人希望能再战斗一些时候——跟贝奈斯一样，后者明显地是想以自己的存在往好的方面影响局势。

事情也许是那样，但马萨里克进退维谷的处境只延续了两个星期。三月十日早晨在契尔宁宫的院子里，在他的四层楼住所的洗澡间的窗子下面发现了他摔坏了的尸体。马萨里克死的背景二十二年之后仍是一个谜。有或多或少根据的各种分析和当时掌握的现场证据表明，不

是自杀就是谋杀。接受自杀一说的人们谈到马萨里克在政变前后那些日子里的沮丧和悲观失望情绪。他们也争辩说，没有明显理由说明为什么苏联秘密警察希望把他害死。（这里他们可能犯了用西方的逻辑来套苏联想法的错误。）那些相信他是被谋杀的人——并认为这件事是苏联国家安全部干的——宣称，他的住所里有进行格斗的痕迹；他们还指出，马萨里克是决不会自杀的——因为他受了他的伦理学家父亲的强烈影响，他的父亲曾写过一本谴责自杀的书。而且，他也可能是被无人知晓的第三者暗杀的。

马萨里克被安葬在拉尼的一块小墓地托·马萨里克墓的旁边。拉尼是一座离布拉格二十五英里的小城，那里是老总统的夏季避暑庄园。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当局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扬·马萨里克之死的整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在调查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刊自由地提出了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谋杀阴谋的看法。但苏联入侵后这项调查就销声匿迹，不了了之。尽管如此，这件事却有利于复活马萨里克的传奇——经过二十二年黑暗岁月之后，它成了唤醒捷克民族主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马萨里克问题在苏联同杜布切克政权打交道时成了一个突出的刺激性问题。这样，马萨里克之死对于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主义者来说要比他活着带来的好处更大。但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胡萨克政权又紧张地搞起

前些时候中断了的调查来，并宣布说，马萨里克之死是一次“不幸事故”的结果。这是一种奇异的妥协，既否定了过去官方作的自杀结论又否定了虽非官方但广为流传的谋杀说法。

哥特瓦尔德就任总理之后，就准备全面推行使捷克斯洛伐克公有化的计划。外交部副部长弗·克利门蒂斯被提升为部长来接替马萨里克。三月十一日——即马萨里克死后仅仅二十四小时——哥特瓦尔德就向议会提出了他的政府名单，以二百三十票获得信任，没有反对票。有几名议员回避了投票。

与此同时又掀起了征收党员的运动——从三月七日起的一周叫做“哥特瓦尔德征收党员周”——这在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任何地方都是没有先例的。一九四六年五月捷共党员人数为一百一十五万九千一百六十四人（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九），而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就增加到二百五十万（占总人口百分之十八）。新党员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二月二十五日之后入党的，其中包括许多拥护现政权的社会民主党人。这就是说每三个捷克斯洛伐克成年人中就有一名党员，这是列宁从来想象过的情景，他把共产党规定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哥特瓦尔德的征收党员运动几乎一夜之间就使捷共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大的共产党。（苏共居第一位，它的党员人数当时为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按人口比例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员人数为苏联的四倍半。）三分之一的

党员是妇女，其中一半是家庭妇女，这有力地表明思想改造之风多么深刻地深入到家庭生活内部。

自由职业者也涌向共产党。根据爱·塔博尔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一书中列举的数字，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前捷克地区只有一百四十三位律师是捷共党员——布拉格只有五名——但在政变之后总共一千九百四十名律师中参加党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九名之多。虽然一九四九年征收党员的闹剧已经冷了下来——党员人数降到一百七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一人，候补党员为五十二万二千二百八十三人——但党的辅助力量由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团）有了一百万团员而扩大了，它把十四到二十六岁的青年组织到全国两千个基层组织中去。

研究这些数字不可避免要提出一个令人迷惑难解的捷克人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可能使人感到不快。捷克人的这种明显的民族癖性曾一再地表现出来——在一九三八和一九四五年之间，然后在一九四八年，最后又在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一九四八年政变之后出现了全民性的参加共产党的高潮；在一九四八——一九六八年的黑暗时期全民性的沉寂；一九六八年中迅速转向改革派；最后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之后，甚至某些最杰出的自由主义分子在接受亲莫斯科的“现实主义”领导方面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性化。

诚然，在上述的每一个时期中捷克人都受到可怕的

压力。甚至在一九四八年政变之前，公民们也曾受到微妙的，但有时也是非常明显的压力，要他们参加捷共，入了党就能取得个人的好处或者提升职务。政变之后行动委员会的残酷清洗从民族生活的重要部门把“革命的敌对分子”消灭掉，同时吓唬其他人接受新的现实。随之而来的不停的警察恐怖，迫使人民循规蹈矩。

但是被迫接受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和积极支持一个至少在私下多数人所厌恶的制度，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说来也奇怪，斯洛伐克就是个恰当的例子，那儿只有二十三万六千人参加党——只占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相对的冷淡也许是由于斯洛伐克本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区——除了布拉迪斯拉发，科希策等工业中心和其他几个少数城市外，这个国家基本上是农业国——或者是由于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不管是什么原因，实际情况是斯洛伐克人对共产主义并不太热情。尽管苏军一手解放了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党的上层领导集团中有象卡·巴契列克、威·西罗基和更加有争议的和复杂的胡萨克博士等杰出的斯洛伐克人，实际情况依然是如此。

对于这种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变后布拉格的捷共全国领导对斯洛伐克的自治问题失去了兴趣，而在另一方面，胡萨克博士在他作过重大贡献的接管政权之后，出于某种古怪的政治动机把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共产党诗人拉科·诺沃麦斯基提拔到党的高级思想领导层中去——当时正是共产党知识分子正统观念或

者说无所作为的思想在布拉格占上风的时候。与此同时，另一个斯洛伐克人首次进入了共产党的领导层，他的民族主义在未来的年代里将对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起重大作用。他就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斯洛伐克中部城市特伦钦酵母厂的一名工人，他当了当地党的县委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

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民共和国这场进攻战的指挥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三巨头"，即哥特瓦尔德、斯兰斯基和萨波托斯基。第二层的指挥是掌管情报部的瓦·柯别茨基（他忙于把斯大林的文化路线强加给全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和雅·杜兰斯基（他负责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结构适应于苏联的发展概念）。约·斯姆尔科夫斯基一度在政治上失宠，虽然还留在中央委员会内。帕维尔将军在国家安全机构身居高位。可是奥·切尔尼克，一九六八年的一位重要人物，那时还是摩拉维亚维克托维采钢铁厂一个不知名的锁工，在夜校学习工程学，在奥帕瓦和俄斯特拉发党的县委会学习做党的工作。

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过程包括清洗、逮捕直至立法工作。共产党以外的政党的总部被搜查，他们的出版物被封闭。非共产党的官员被行动委员会或"上面的"命令赶出中央各部和其它官方机构。政权的"资产阶级"敌人被关押起来，或被送往矿井、工厂和农场劳动。十月份司法部长切皮奇卡建立了一个审判反共和国罪的特

别法庭，当局可以要他们做任何事情。那些逃脱了逮捕的人设法逃往国外，这一行动本身就又构成一种新罪行。逃亡国外的人中有胡·里普卡，政变前贝奈斯内阁的一名部长，也是他的最亲近的一名顾问。

新政权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就是赫·皮卡将军，贝奈斯政府战时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一九四五年后任军队副总参谋长。皮卡在战争期间了解伦敦和莫斯科以及国内抵抗组织之间秘密情报联系，他能够证明贝奈斯政府和在莫斯科的捷共产党人之间战时合作的程度，似乎也熟悉费林格大使和斯沃博达将军战时在莫斯科的活动情况（当时斯沃博达统帅属于苏军指挥的捷军团）。一九四九年他以"叛国"罪名被捕和处决。一九六八年底捷军事法庭为他恢复了名誉——这是在苏联入侵之后，但有趣的是仍得到斯沃博达总统的同意——真相大白：他的主要罪过就是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的被捕和审讯部分原因是为了缩小西方大国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起的作用；接着官方宣传就把美国描绘成蓄意拒绝在一九四五年向布拉格进军，听任纳粹残杀捷克爱国者。

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苏军解放布拉格三周年国庆日——议会作为制宪议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新宪法，以代替一九二○年的宪法。议会通过的宪法是西欧议会制度和苏联典型之间的一种奇异的混合体。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新文献具有相当自由主义的措辞——比方，

它保证反对任意捕人，"作为一条规则"不许进行新闻检查——而是要看哥特瓦尔德及其同事们如何来贯彻它。那里有足够的漏洞来使象诺塞克和切皮奇卡这样的部长们随心所欲地来引用宪法，他们处理国家事务的方式很难指望执法会是宽大的。

五月三十日新政府举行了预定的国民议会选举——共产党一月份作的民意测验本来表明在这次选举中它是会失败的——结果是共产党得二百三十九席，其余的六十一席也大多数属于它的同路人。现在哥特瓦尔德在议会中拥有了可以起作用的多数，但这只是就理论上而言，因为国民议会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一块橡皮图章。当选的人中有斯兰斯基，克利门蒂斯和胡萨克等人。

现在政府能够回过头来利用议会来使工业和其他财产国有化成为合法了。当然五·九宪法只是原则上服务于这一目的，接着在一九四八这一年就通过了九个具体的国有化法案。工商业中的私人成份被降到百分之五点一，这个百分比是由五十名职工以下的企业组成的。所有的国内批发商业和所有的对外贸易均被立即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哥特瓦尔德仍然关心自己政府的法令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他就迫使贝奈斯签署新宪法。他不断去休养地访问这位患病的老人，但是贝奈斯拒绝签署。六月七日在当了十三年总统之后，他在辞去总统职务的文件上签了字。在给哥特瓦尔德的附信中，他表示了伤感的希望，

希望“共和国能避免一切灾难，希望全体公民能在相互容忍、友爱和宽恕中生活和工作，希望他们也祝愿人能享受到他们自己应认真享受的自由。”当贝奈斯看着总统旗从他的塞泽莫沃·乌斯吉别墅降下来的时候，哥特瓦尔德正在布拉格紧急内阁会议上讲话。这位共产党总理在谈到贝奈斯时，似乎是在真诚赞扬一位已成为他私人朋友的人（虽然是思想上的敌人），称他为“总统—解放者的杰出继承人，解放斗争的领导人，也是一位新秩序的共同创建者。”

九月三日贝奈斯去世了。两年以后，他和老马萨里克——“总统—解放者”——成了莫斯科和捷克斯洛伐克宣传机器指挥的宣传运动恶毒攻击的靶子。这种攻击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仅有的这两位民主总统的热爱和尊敬就强烈地表现出来。

六月十四日政府改组之后，五十二岁的克·哥特瓦尔德当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象一个拍马屁的人所说的那样，成了“第一位住进总统府的工人”。他不再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有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己道路”，既是总统又是党主席，无疑他成了国家最有权势的人，因为这两个岗位都具有充分实权的。他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激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但幸存下来，——不过一九四七年他还是受到了惩罚：他没有被提名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指派

了他的新对手斯兰斯基）——现在他能够满意地回顾他当上党的舵手十九年的历程了。

安·萨波托斯基接替哥特瓦尔德担任总理；斯兰斯基继续留任捷共总书记（当时他没有想到自己当权的日子有限了）。唯一看得到的失意者是兹·费林格和教育部长“革命老人”兹·尼耶德利。他们两人都曾希望被提升为国家元首，尽管他们即使担任这一职位也只具有纯礼宾性质。哥特瓦尔德前往克里米亚度假——也是去见斯大林——回到赫拉德强尼城堡之后就着手来充分建立他的新秩序。

V

制造铁幕，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一年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在匈牙利，当社会民主党人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同共产党合并组成拉科西领导下的匈牙利工人党时，这个国家里别的政党对共产党的抵抗就彻底消失了。从这些成就来看，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是非常成功的。但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同苏联关系的破裂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主义世界。它涉及到民族独立，同时也涉及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能否在每个国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或者只能跟着苏联走这样的基本问题。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战时游击队领导人、共产党主席、后来又是共和国元帅和总统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决定单干，这等于是一次巨大的地震，从此以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再未能完全恢复过来，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中的领导作用永远不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

南斯拉夫反抗莫斯科是对克里姆林宫共产主义教会的尊严首次公开挑战——是自从一九一七年以来首次出

现的意味深长的危险的共产主义异端——它首次积极地把“民族共产主义”带进共产主义事务中来。它在过去在本国打仗的共产党人，即国内派共产党人同那些大部分时间在莫斯科度过的即莫斯科派共产党人之间明确地划出了一条界线，并发动了一场延续了二十年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观察二十多年这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可以毫无问题地说，是铁托的南斯拉夫把埋藏在苏联的共产主义五国中的民族主义力量诱发出来的。从波兰和匈牙利一九五六年的反抗中（虽然南斯拉夫选择了不谴责苏联坦克入侵布达佩斯的立场），从阿尔巴尼亚一九六一年对苏联的背叛中（具有讽刺性的是，阿尔巴尼亚这样做是出于它自己反南斯拉夫的理由），从罗马尼亚整个六十年代悄悄进行的、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的反抗莫斯科的行动中以及最后从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之春中都可感觉到南斯拉夫的影响和启示。当然，在这里列举的事件中都没有自觉地或明确地提出“铁托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这个共同的东西却贯串其中，都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八年的贝尔格莱德之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斯大林把自己的意志彻底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是在毁掉它的民族特性的时候，铁托拿出他的民族主义来向斯大林挑战。

长期以来就狂热地相信，思想的力量能够改造人们和民族的命运。马克思明确地相信这一点，列宁和托洛

茨基相信这一点，共产主义新的一代继承者也相信它，他们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社会正义"的原则和口号而生活而牺牲。而苏联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发源地，永远是这种思想的源泉——这变成了一条被人们公认的定律。莫斯科的吸引力和世界各地都有一批非常精明的人对它的盲目忠诚，使共产主义——与它一起还有苏联的权势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到处传播。过去，这种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对党的神圣观念的忠诚，哪怕在残酷迫害、发生背叛或者毁掉忠诚分子中某些最杰出人物的名誉和生命的情况下都没有被摧毁。但这种异乎寻常的魔力一九四八年却在南斯拉夫被粉碎了。这并不是由于铁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学说的更好的解释者，而仅仅是证实了民族主义本身具有比共产主义思想大得无可比拟的力量。南斯拉夫的问题不是探寻一种更好的或者更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二十年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这个问题，那里出现了一种简单而又合乎逻辑的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综合体——而是两国民族利益的赤裸裸的对抗。只是在许多年之后当南斯拉夫的民族独立得到合理保障之后，铁托才允许向公民自由和向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一相当进步的方向自然演变。

象南斯拉夫反抗莫斯科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米·吉拉斯（他后来成了铁托自己国内思想意识固执性的牺牲品）所指出的，在南斯拉夫业已发生的和在共产主义世

界正在发生的是“思想的没落”。在写他自己国家的事情时，吉拉斯在他的著作《不完善的社会》中评论说：“巴尔干各民族经受了几个世纪的考验，他们处于东西方之间，他们正是综合自己的和外来的、本土的和异乡的、各种社会模式和抱负而塑造自己的个性……对这些民族来说再好不过的是充当其它民族的桥梁，不论它们的制度和思想如何，而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对于他们具有斗争性和创造性的子孙来说没有再比向所有思潮开放——自寻答案更崇高和高尚的了。”已去世的路易斯·亚当米克一九五二年写了一本最有见解的早期的关于铁托南斯拉夫的书《鹰和根》，他曾更加清楚地解释了南斯拉夫对克里姆林宫的深思熟虑而又令人遗憾的反抗的基本原因：

“南斯拉夫的背景中包括希腊和拉丁的古典文化、基督教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西方’文化的其它方面。铁托、（爱德华）卡德尔、（莫沙）皮亚德等人是在‘西方’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西方’式的批判。他们都读过大量俄国文学。有的书已渗透到他们的性格之中。但他们也深受南部斯拉夫民族文化的熏陶，他们自然更多的是‘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或者两者都不是，他们把批判的眼光转向这方又转向那方，既看到它们好的方面也看到它们坏的方面。他们的本质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而又保存着自己的核心和倾向。”

吉拉斯和亚当米克说的关于南斯拉夫的这些话显然也适用于同样“处于东西方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南斯拉夫背景中存在的因素对于扬·胡斯、考门斯基、卡夫卡、卡·恰佩克和马萨里克的国家来说就更起作用了。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反抗苏联的历史上和文化上的逻辑必然要在一九六八年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行动中体现出来。跟他们的南斯拉夫兄弟一样，捷共产党人也是从含有斯拉夫影响的“西方”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应该注意到，这一冲突既关系到苏南两国也关系到两个强有力的人物——渊源于早在战时就产生的不和。而这种不和又是由下列事实引起的：铁托率领的游击队到一九四五年已扩大到八十万人，在战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牵制了德国三十个师；当他感觉到斯大林所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南斯拉夫的利益，而是符合苏联的长远利益时，他就不准备接受斯大林的领导。他决心要把南斯拉夫引向共产主义，可是必须在他自己的领导下，而不是在斯大林的控制下。于是铁托就决定消灭他的对手——反对法西斯的但代表右翼的德拉让·米海洛维奇将军，尽管烦人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呼吁要有更大的灵活性以免触犯英美。虽然他是一个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铁托一定还记得就在战前共产国际几乎要把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解散，因为据莫斯科判断，它没有取得成果。也许他不愿战后受到莫斯科的新压力，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同非共产党人一起组

织联合政府，这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注意到解放之前贝奈斯和哥特瓦尔德之间交易，他一定估计到了苏联东欧政策的大体格局——一种典型的联合政权，在这种政权下，“莫斯科派共产党人”很可能不仅牺牲非共产党人而且也牺牲“国内派共产党人”以夺取权力——他没有兴趣玩这场游戏。

铁托也想成为自己国内事务的主人并确立自己的对外政策而不必顾忌苏联的意图。（例如，在苏联部队一九四四年在贝尔格莱德和南斯拉夫东北部驻扎的五个月期间，根据铁托传的作者弗·戴迪耶尔的材料，这些盟国士兵要对一千三百四十起强奸南斯拉夫妇女案和一千二百零四起抢劫案负责。元帅的反应就是向苏联领导提出强烈抗议，象这样的事其他欧洲共产党领导人连做梦都不敢想。后来对苏联部队的约束就更严了。）一九四五年春天，当他在的里雅斯特地区和奥地利南部的领土利益同英美的抵制发生冲突时，铁托就没有理睬斯大林的警告。当时还不准备同西方摊牌的斯大林，不断向他转达邱吉尔和杜鲁门的抗议，铁托回答说，“我们不想被当作进行国际交易的诱饵。”一九四六年十月南斯拉夫击落了两架飞经其领空的美国空军运输机。许多有地位的东欧专家认为，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些日子里，铁托实际上是个比斯大林更革命的共产党革命家和外交政策上更冒险的冒险家，而斯大林执行的是一条比较慎重的路线以避免过早地引起西方的反应。

当一九四七年九月共产党情报局建立来接替为消除西方顾虑而于战时解散了的共产国际时，南斯拉夫的两位代表——吉拉斯和铁托的另一个亲密战友爱德华·卡德尔是最热情支持的人。对比之下鲁·斯兰斯基就相形见绌了，当时他所主要关心的依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坚固的共产党统治。另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是：过了不久斯兰斯基就由于他的南斯拉夫同事们对共产党情报局政策的急剧改变而变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牺牲品。那时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恶化。铁托很快就认识到，两国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在南斯拉夫组织的联合股份公司中，南斯拉夫是吃亏的。这类在苏联许多卫星国中组织的公司是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商业和经济的双边协定的前身。按照这种双边协定，产品、原料和食品按价值浮动的贸易卢布规定的价格向苏联出口，反过来卫星国又得接受苏联的任何剩余物资，积累了巨额的贸易盈余，在账上看起来满不错，但很少有用处。贸易卢布是任意地和人为地强加给各种商品的一种苏联贸易货币。铁托对苏联拖延用现代化武器重新装备他的军队也很生气。生活在一个掠夺成性的世界上，他懂得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需要比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的陈旧武器更好一些的武器。

促使他头脑清醒起来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对斯大林干涉他改组巴尔干的计划也很恼火。这位南斯拉夫元帅的想法是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继而把巴尔干东北部的

罗马尼亚和西南部的阿尔巴尼亚合并进来建立大巴尔干联盟。考虑到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版图大小，相对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铁托设想出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巴尔干同盟或联盟作为一个由贝尔格莱德指挥的工具不是没有道理的。斯大林相信南保联邦会有利于莫斯科（保加利亚人几乎完全处于苏联的政治控制之下，他们和南斯拉夫在马其顿问题上没有解决的老争执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贝尔格莱德），因而他同意铁托的计划，但他暂时还不同意铁托的全盘计划。这又反过来使铁托改变了主意——他的正确理由是单独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会给南斯拉夫送来一匹特洛依木马。

铁托的下一个步骤是决定不管其他情况如何发展，先把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用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办法对待阿尔巴尼亚。一九四八年初，铁托以虚构的地拉那的要求为借口向阿尔巴尼亚派出了一个战斗机联队并准备开进两个南斯拉夫师。苏联由于在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沿岸有自己的战略利益，就鼓励以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的亲苏派向苏联要求援助。斯大林觉得关于派出空军联队的事无论如何是应该事先同他磋商的，于是就要求铁托停止行动：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行动超出了共产党单方面行动所能许可的范围。

随着这次交换意见而来的是两国政府间一连串的紧急磋商。为了对解决争执进行最后一次尝试，铁托（他自

己不愿去）在三月份派吉拉斯和卡德尔去莫斯科，到那之后斯大林告诉他们说，“不是你们的过错，可是你们的政策”要不得。吉拉斯在他一九六一年写的《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中叙述了这些情况。斯大林担心的是，巴尔干联盟会成为一个莫斯科很难控制或根本无法控制的实体。而在另一方面，铁托也清楚，如果他在巴尔干争执问题上屈服的话，他所珍爱的独立将会丧失干净。他的反应是：南斯拉夫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单干。

尽管人们可以说，铁托为了贯彻其矛盾的巴尔干政策轻率地制造了一场人为的危机，但争论的根本问题是南斯拉夫是否有自由将来不经斯大林批准就可奉行任何一种政策，对于这一点，铁托和斯大林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场复杂的巴尔干游戏是一个考验。现在铁托被迫放弃这个巴尔干计划而着手建立抵御苏联的国防力量。战线已经拉开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铁托召开南共中央全会使其拥护者对出现最坏情况作好准备。他告诉中央委员会说，跟苏联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上讨论的问题”，而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问题”。此后不久，当莫斯科对南斯拉夫作出典型的指控，说它背弃苏联时，南共反击说，“不论我们大家是多么热爱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决不能不热爱自己的祖国”。

在四月和六月之间，斯大林想通过消灭不服从他的人的传统手段来解决南斯拉夫问题。苏联动用了它掌握

的一切政治手段，施加了巨大压力来迫使铁托倒台。在南斯拉夫联邦内部煽动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企图使塞尔维亚共产党反转过来反对铁托。苏联还曾试图渗入到南斯拉夫秘密警察中去并争取南斯拉夫军队的领导人。但是拥护铁托的力量太强大，不容易被拉出去。他的秘密警察仍忠实于他，卖力地关押了数千名苏联同情者。实际上，俄国人压得越厉害，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就越强烈。

到六月底，斯大林就遇到了第一个此后一直折磨着他和他的继承人的极大困难。即使这场紧急危机可以暂时掩盖起来，但要摆脱铁托的这一挑战还得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共党政府出来碰碰运气。斯大林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己又是一个乔治亚人，他当然清楚地意识到发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有多么巨大力量，可是他哪能眼看着他自己刚刚勉强凑成的帝国瓦解呢。虽然用政治手段推翻铁托的企图失败了，斯大林还可以用武装干涉。可是俄国和南斯拉夫没有共同边界，入侵必须得到南斯拉夫三个近邻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合作。这会把巴尔干半岛各国投进一场大战，此外这三个卫星国是否忠诚，斯大林也没有把握。对于这一切铁托当然也是清楚的。

留给莫斯科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进行驱魔辟邪，这个任务交给了共产党情报局。它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布加勒斯特发表了一个坚决的宣言，实际上把

南斯拉夫排斥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铁托及其拥护者被加上了一大串反共罪名，从“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一直到南斯拉夫农业集体化的失败。鲁·斯兰斯基同其他人一起在这个共产党情报局的文件上签了名。

但按照处理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传统，苏联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同南斯拉夫断决外交关系。这种战略有其微妙之处：它把同南斯拉夫的争执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南斯拉夫则把它完全看作是纯粹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这种随后被说成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做法，以后一遇到保护国反抗的问题就被莫斯科拿出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苏联不致单独卷入到同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两国争端中去；而且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到处可以博得共产党人的同情和起迷惑作用——利用他们对莫斯科不可动摇的信心。还有，这样做可避免激化民族感情。因此南斯拉夫人对把他们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反应是感到悲伤和十分吃惊，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真的跟苏共一样，对马列主义是忠诚的；为了反驳共产党情报局的指责，他们开始实行一个群众性的农业合作化计划和其它一些正统的共产党政策。但是当时思想意识上的反应也是明显的，即经济自由化和更“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它同民族主义感情一起不但出现在南斯拉夫而且也出现在整个共产主义集团内部。莫斯科以后才发现，在思想意识

本身开始衰退和没落的时期，玩弄思想意识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七月铁托主持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它代表这个国家的四十七万名党员。预计到苏联新的压力，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就是把党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维辛斯基来到贝尔格莱德参加多瑙河会议，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来窥测一下南斯拉夫盔甲上的弱点，但没有找到。铁托完全控制着局势。当时他五十六岁，年富力强，精力旺盛（虽然他的游击队老伙伴亲切地叫他“老头子”）。

苏联的下一个行动是经济封锁——苏联与南斯拉夫的贸易一九四九年降到一九四八年的八分之一——和精心制造一种印象，似乎铁托仍面临着对方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铁托要严肃对待的威胁。象他后来所报告的那样，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南斯拉夫同共产党情报局国家边界线上发生了一千三百九十七起边境事件。

一九四九年一月就苏联入侵的可能性问题，路易斯·亚当米克同铁托进行过一次长谈，他引用了铁托下面的话：

> “对我国的进攻……并不能排除。……如果要进攻的话，今年（一九四九年）夏天以前看来不大可能，估计苏联军队也不会参加。我们的邻国就是使用苏联武器，我们

也能容易把他们赶走。这是因为他们的士兵不想打我们，他们的心不赞成这件事。那些可能想冒这场风险的人跟我们一样也懂得这一点，所以进攻不大可能成为现实……当然，如果苏联军队自己来进攻我们，比方说，调动许多由亚洲兵组成的师来打我们，那就不容易对付了。可是，这种情况简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为什么苏联军队不会调来进攻我们呢？有好多条理由。我可以给你讲两条：第一条，它会加深各地进步分子由于共产党情报局决议而对苏联幻想的破灭；第二，它可能造成比方说比一九四八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更大的世界性不安。”

历史已经证明，铁托的估计是正确的。它可能也证实了下述估计：由于斯大林认识到南斯拉夫人是要反击的，入侵可能导致出现莫斯科无法控制的难以预计的局势，他取消了对南斯拉夫的进攻。

最终苏联还是没有能割掉南斯拉夫这个毒瘤，尽管它充分知道将有传染其他共产党政治机体的危险。在没法消除这个毒瘤的情况下，莫斯科就来尽可能地孤立它。但是这种努力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传染病顽固地一再在别处出现，给克里姆林宫一批又一批领导人不断提出棘手问题。

为了使民族共产主义这个危险不致在东欧蔓延，苏联走上了一条凶狠和残酷镇压的狂热道路，它是继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之后出现的一次最恶劣的共产主义群众性恐怖。在苏联这场预防性的报复面前，

共产主义集团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奇怪的是，一个最驯服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莫斯科反常的魔鬼学公式中，最犯忌的是铁托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经历。除了这些主要思想罪之外——这种大思想罪有时一个人有一条，有时一古脑儿都加到某个人头上——还有尘世罪，象背叛、间谍、犹太复国主义，战时向盖世太保出卖同志、同英国情报机关、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较小“反动”国家的各种安全组织的秘密联系等。这些指控几乎没有例外地指向身居高位的共产党领导人，其中有些人几周或几天前还在克里姆林宫受到款待和欢呼，突然就无缘无故地被捕了。

乍一看，这种思想意识批判和刑事指控的奇异混合是如此之荒谬，以至于使东欧的许多人认真在想，年迈的斯大林是否已失去了理智，他的同事们是否同现实失去了联系。真的，怎么能指望公众会相信，那样多的官方领导人，他们有战前为共产主义斗争，战时在地下抵抗纳粹坐牢的光荣历史，怎么突然变成了可恶的托洛茨基分子、铁托主义分子、苏联的秘密敌人、祖国的叛徒呢？在战后年代里有许多共产党人习惯于跟着莫斯科的政策转，加在他们崇拜的偶像身上的指控是要考验他们的忠实程度。莫斯科公布这些指控甚至要冒信任危机，但在这种明显的疯狂之中，它都是相当有办法的。

苏联发动这场无情的猛烈的反铁托主义的反击战，

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消灭已出现的“民族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它在哪里有可能出现就要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苏联政策具有一贯性：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南斯拉夫危机时期，克里姆林宫就认识到在共产主义各独立分支中内在的这种危险性，它一九五六年就着手在波兰和匈牙利消灭它，一九六八年又在捷克斯洛伐克消灭它。莫斯科寻求解决的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卫星国的民族主义威胁到苏联领导下的共产主义的团结一致和民族主义瘟疫传播到苏联本国去的问题。

关于第一点，因为铁托元帅的独立宣言令人痛心地表明，“民族共产主义”按定义就是拒绝在共产主义事务中所谓的苏联的领导作用。而这又反过来对作为欧洲的一个民族力量的苏联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形成了根本威胁。因为苏联战后精心地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新型的东欧卫星国防疫圈，有理由认为，苏联是不愿容忍对这个集团的侵蚀的。而且，造成这种威胁的是共产党人而不是信誉扫地的反动派，这对苏联来说就显得更加危险。如果苏联没有能把铁托主义在南斯拉夫立即加以扼制，那么它肯定不能允许这种危险的东西在其他共产党国家首都再次抬头。

至于第二点，民族主义在东欧的泛滥，特别是在共产党当权的东欧的泛滥，会给苏联本国的统一以致命的打击。在乌克兰，在克里米亚鞑靼人、亚美尼亚人、乔

治亚人、拉脱维亚人、蒙古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中闹民族主义的情况还是记忆犹新，决不能让它再闹起来。苏联领导人还没有忘记，有多少乌克兰人和鞑靼人在四十年代曾同纳粹入侵者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母亲”，他们一直注意到国内民族问题具有的潜在爆炸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地说民族主义，特殊地说共产主义 民 族 主 义就必然成了禁忌。在夺取政权的时期，有的地方，例如斯洛伐克，允许一定程度的高度控制下的民族主义，甚至允许自治，以求加强当地的共产党，这从策略上讲对莫斯科也许是合适的。但是一九四五年苏联人竭力反对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一个联邦国家，并在五十年代痛斥过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这都是有案可查的。当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后，捷克一斯洛伐克联邦国家终于产生之后，俄国人对任何一点真正的地方民族主义都采取了防范措施。

在处理历史上一直折磨着东欧和中欧的少数民族问题时，莫斯科总是力图使少数民族服从于它自己的和共产主义的战略利益。举例来说，把有大量匈牙利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特兰西瓦尼亚划归罗马尼亚而使罗得到好处，因为这符合苏联人使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地区力量保持相对平衡的意图。（可是后来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对这一步骤感到后悔。）马其顿的民族主义者被煽动起来拥护保加利亚，反对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少数民族也是这样干的。如此等等。但从广义上讲，民族

主义，尤其是民族共产主义，是一个必须无情加以消灭的威胁。对付它的办法就是把它描绘成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对立的修正主义运动。于是铁托就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形容词“法西斯”一起，这就成了一顶份量十足的大帽子了。从此“民族主义”的指控就成了彻底思想背叛的标志。

把“托洛茨基分子”的称号无缘无故地加在铁托头上，并不是因为他表现出了任何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或偏差，而是因为这顶帽子能使正统的信仰者在心理上容易把铁托和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被说成是背叛马列主义的突出的修正主义异端的人联系起来。

反对铁托异端公式中的第三个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罪状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挑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东欧人来也不是一个任意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比他们当时能意识到的更大的预见性。克里姆林宫有双重理由对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的志愿人员持不信任态度。一个理由是那些曾在西班牙战斗过的共产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共和国失败后曾作为德国人的俘虏留在法国或者在法国搞过地下斗争——曾受过较多的西方思想以及苏联称之为“世界主义”的熏染。第二个理由是这些自称是东欧“自由志愿军”的大部分是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而人们难以肯定，在对苏联不大方便的环境下，这种理想主义会不会

再度抬头。这是一个正确的估计，虽然是带讽刺性的：莫斯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铁托主义出现之前，就一直在消灭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东欧人甚至苏联人（更不用说西班牙的流亡者了）。然而今天的欧洲共产主义舞台却成了这些“自由志愿人员”积聚之地，而他们中的许多经受了战争和清洗而幸存下来的人，十多年之后成了东欧和西欧的进步派领导人。

的确，国际纵队里东欧人员的历史在共产党的历史中构成了特殊的一章，自具特色的一章。因为这些人在西班牙的经历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本能的友谊，而他们的人数又很可观。

捷克斯洛伐克的约·帕维尔作为季米特洛夫营营长在西班牙战斗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西班牙内战老战士中还有下面这些人：弗·克里格尔，一位医生，是苏联入侵前杜布切克领导的主席团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委员。阿·朗登，一九四九年二月当了外交部副部长。奥·萨沃茨基，当时是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利·霍夫曼，一九四八年之后成了哥特瓦尔德个人安全负责人，一九六八年当了国民议会军事和安全委员会主席。拉·霍尔多什，一九五〇年当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副主席。奥·赫罗马特科，一九五〇年任军事学院的党代表。曾任国际纵队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的党委书记的奥·什林成了布尔诺州的党委书记。安·斯沃博达一九四八年以后成了党中央军事部部长。卡·杜费克，一位职业外交官，一九六八

年当了外交部外国新闻司司长。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共产党进步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五十年代铁托分子审判案中受到牵连。

在南斯拉夫人中间，铁托本人一九三六年是巴黎向西班牙输送志愿人员的"地下铁路"运输队的负责人。他的助手是爱·卡德尔和博·基德里奇（此人后来成了南斯拉夫国家计委负责人）。吉拉斯，他那时还不认识铁托，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秘密声援西班牙组织的积极工作人员。到西班牙去的约有两千名南斯拉夫志愿人员，其中二十四位在游击队、后来的正规军中成了将军，其中包括总参谋长伊·戈什尼亚克、科·波波维奇（诗人，游击队将军，一度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在西班牙打过仗，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阿·贝布莱尔、后来当了南驻美大使的弗·波波维奇、还有布·乔皮奇（一位曾指挥过第十五国际纵队的著名南共领导人）。

波兰贡献出的人物有：卡·斯维耶尔切夫斯基，他用瓦尔特将军的假名在领导第十四纵队和第三十六精锐师之后当了国际纵队司令。斯维耶尔切夫斯基一度担任过莫斯科军事学院教授，一九四五年成了波兰战后第一任国防部长。一九四七年三月他被秘密暗杀，接替他国防部长的是马·斯皮哈尔斯基，也曾担任过西班牙多布罗夫斯基旅的旅长。

在保加利亚人中间，伊·基诺夫将军，西班牙内战时的一位旅长，一九四九年任总参谋长，多布罗夫斯基旅

的老战士莱·达尼亚诺夫，六十年代初期任副总统。

现在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主张各国共产党有自主权的主要发言人路·隆哥曾任国际纵队的总监。他的前任、已故的帕·陶里亚蒂曾任西班牙共产党的战术指导。

但是一些共产党强硬派也在西班牙工作过。拉·拉伊克，匈牙利的内务部长，后改任外交部长，是第十三国际纵队拉科西营政治教导员，曾在战斗中受重伤。艾·格罗是匈牙利党最高层中的一个很坏的人，在西班牙内战时曾是共产国际的一名政治代表。一度曾任阿尔巴尼亚总参谋长、现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穆·谢胡在西班牙当过副营长。克·哥特瓦尔德一九三六年是国际纵队阿尔瓦塞特基地的政治顾问。瓦·乌布利希这个顽固的东德党的总书记跟德国的秘密的肃反队一起在西班牙呆过一个时期，在那儿——这并不令人惊奇——搜寻托洛茨基分子。

在苏联派往西班牙的军事人员中，伊·科涅夫、罗·马林诺夫斯基、基·麦列茨科夫、康·罗科索夫斯基和涅杰林安然渡过了对西班牙老战士的清洗，战时升任元帅而获得声誉。但象扬·阿·别尔津、阿·斯塔舍夫斯基、弗·阿·安东诺夫—奥弗先科和米·科尔佐夫这些人，在他们回到苏联后就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被处决了。

把西班牙老战士很快诬蔑为潜在的铁托分子是由波

兰总统贝鲁特清楚地透露出来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波共中央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贝鲁特指责说，由斯皮哈尔斯基将军领导的西班牙多布罗夫斯基旅中的许多前志愿人员是“法西斯警察的间谍”，战后他们已钻进波兰政府的上层领导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讲话是在波兰出生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接替斯皮哈尔斯基任国防部长四天之后讲的，而他也是一个西班牙老战士。

在捷克斯洛伐克，哥特瓦尔德总统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告诉中央委员会说：

> “西班牙共和国失败之后，大批的纵队志愿人员落入法国集中营。在那儿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坏，他们首先成了法国间谍机关施加压力和敲诈勒索的对象，然后美国的、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特务机关也参与其事。这些间谍机关利用志愿人员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困境招募他们中的许多人当了特务。那些被美国和法国招募的人直接为西方帝国主义服务。那些被德国盖世太保招募的人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就跟其他盖世太保的特务一样被划归美国特务机关领导”。

这样苏联领导人就以耍思想戏法的惊人本领捏造出一套指控，把铁托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巧妙地同法西斯主义、背叛、间谍和受盖世太保和一切可以想出来的西方情报机关联系在一起。莫斯科还额外制造出了一个犹太

复国主义，以利用在东欧经常潜存的反犹太主义。

所有这些都是被莫斯科用来作为反对铁托主义在东欧传播的强大武器的。但是它也被用来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服务：区分"莫斯科派"共产党人和"国内派"共产党人。当时有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不论是否铁托分子，有的是在国内抵抗运动中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有的是在西方外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根据苏联的想法，"莫斯科派共产党人"再度掌权的时刻到来了，这些在苏联度过战争岁月的人，毫无疑问地忠实于它，他们回国后会照顾莫斯科的利益。

"本国共产党人"和"莫斯科派共产党人"之间的不和早在铁托最终同苏联人决裂之前就在整个东欧酝酿发展；即使这位骄傲的南斯拉夫元帅不起来反抗克里姆林宫，清洗仍会是迫在眉睫。

比如，罗马尼亚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个小小的非法的罗马尼亚党内的一些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同共产国际中的罗马尼亚局不和——在一九四四年莫斯科派遣的人到达这个解放了的国家之前，就迅速地掌了权。这也许是开始形成的民族共产主义的最初征候，这些国内领导人进行抵制，拒绝让位。在莫斯科的主要代理人，一个难看的女人安娜·帕乌克领导下，在布加勒斯特的机构中得到一些支持之后，"莫斯科派共产党人"就发动了对地方派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他们成功地处决了党的前总书记斯·福里什，一九四八年四月又逮捕了

司法部长卢·巴特勒什卡努。在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正在为摊牌作准备。南斯拉夫的分裂行为成了立即在全线行动的信号。

但是伴随东欧整个这种趋势而来的一个无法避免的嘲弄是，正当巴特勒什卡努被囚禁的时候，在布加勒斯特发生了一件不引人注意的事情。一位名叫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默默无闻的机关工作人员被选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结果他竟成了苏联帝国中民族共产主义主要鼓吹者之一。

肃清铁托分子大清洗的雷电首先击中了波兰。它所选择的目标就是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政府副总理、四十三岁的弗·哥穆尔卡。

从苏联一九四八年的战略来看，把哥穆尔卡挑出来从政治上予以清除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象三十年代苏联历史所充分显示的那样，预防性清洗是一个传统武器。事实上有理由相信，甚至在铁托和苏联最后决裂之前，已经决定要搞掉哥穆尔卡了。哥穆尔卡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一个铁托主义者，他准备把波兰领导到同南斯拉夫相似的道路上去或者他同铁托密谋勾结，尽管很自然地是这样指责他的。要害的问题是：在敏感的俄国人看来，如果让哥穆尔卡继续掌权，他可能会发展铁托主义——也就是民族共产主义——的倾向。他之所以被看作是"不可信赖的人"，主要是由于他是一位"国内派共产

党人”，早在“莫斯科派共产党人”随着挺进的苏军到来之前，他在地下党和反法西斯的共产党地下运动中就出名了，尽管自从一九四五年他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以来，哥穆尔卡同“莫斯科派”的共产党同志们合作得很顺利。

哥穆尔卡之所以被怀疑还由于他的明显的民族主义感情，他战时抵抗纳粹的斗争经历又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点；而在波兰，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是同反沙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哥穆尔卡出生的时候，波兰的许多地方包括华沙在内是属于沙俄的；他和他同一代的许多人都是在反沙俄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象许多国内派共产党人那样，他看不出波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之间有什么矛盾。对于把过分的爱国主义看作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相矛盾的苏联来说，这确实是危险的。早在战争时期哥穆尔卡就表现出他的独立特色，经常无视莫斯科电台给予他的抵抗组织下达的指示。据一种说法，他个人曾阻止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把伦敦领导的地下军成员出卖给盖世太保。战时同哥穆尔卡接近的人说，他不同意莫斯科的时候很多，不少情况下还非常激烈。

和平到来之后，这位顽强、严肃而又不妥协的人对波兰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例如，在一九四四年他跟同伴们谈到过“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不久，在从划归波兰的德国地区把工业设备运往苏联的问题上，他又卷入了同莫斯科的一场争论。他的理由是，经济上遭到战争破坏的波兰，如果从一开始就

从它新得到的西部各省搬走重要的工业设备，那它就很难恢复。

当铁托的反叛正在开始摇晃共产主义这条船的时候，哥穆尔卡显然不可能得到莫斯科的信任。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突然遭到与会者的一致攻击，因为他在所作的主要报告中强调了波兰独立的历史重要性。在通常情况下，他的报告可能不引人注意地过去的，而这次却明显地成了他的敌人正等待着的一个机会。在中央委员会一般委员照例是不会自发起来造反的。此后不久，他的同事们开始对他施加压力，让他“为了党的利益悄悄隐退”。

哥穆尔卡妥协了，同意去度假。这就使他躲过出席六月二十八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铁托被正式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到七月他又突然重新履行他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是一次总反抗。党则宣布他犯了“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予以反击。这一危机一直延续到八月底，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一次戏剧性会议上，哥穆尔卡承认了对他指责的“真实性”，同意辞职。对他进行最恶毒攻击的人当中有泽·克利什科。他是负责干部工作的党中央书记，是哥穆尔卡最亲密的同事之一；还有斯皮哈尔斯基将军，他曾在哥穆尔卡的地下军中负责情报工作，这个人不久自己也受到怀疑。第二天中央委员会宣布了把哥穆尔卡调离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致批准”

了这项决议。哥穆尔卡也被解除了副总理兼收复领土部部长的职务。一直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波·贝鲁特被选来代替他任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这个新党是由共产党和同路人社会党合并而成的。

一年以后清洗又开始了，一九四八年控告哥穆尔卡的人成了牺牲品。但是首先又让哥穆尔卡露面在九月七日党的机关报《人民论坛报》上发表攻击“铁托集团”的文章。但这还不足以使莫斯科相信，波兰的危险已经过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俄国人又迫使贝鲁特接受罗科索夫斯基为波兰国防部长以代替斯皮哈尔斯基，这是公开任命一位苏联官员来控制一个卫星国武装力量的唯一的例子。（他出生在波兰，但他的整个成年生活都是苏联公民，现在贝鲁特很快就为他取得波兰国籍而办好了手续。）

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三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又变成了攻击哥穆尔卡新浪潮的讲坛。虽然他进行了顽强而有条理的辩护，他还是被指责同纳粹合作和对苏联“缺乏信心”（这个说法以后令人讨厌地经常被重复）。他于是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谴责斯皮哈尔斯基将军和克利什科是“法西斯警察的间谍”和西班牙战争老战士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保护人，并解除了他们的一切职务。波兰军事机构受到清洗，十九名军官被处决。被监禁的人中有斯皮哈尔斯基和军队反间谍组织负责人瓦·科马尔将军。大逮捕的疯狂浪潮席卷全国，

犹太人首当其冲。

一九五一年八月简称U.B.的保卫局人员在哥穆尔卡居住的一个僻静山区休养地逮捕了他。明显的理由是莫斯科坚持要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上层领导人“招供”和被处决之后、与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酝酿的大规模审讯同时，在波兰搞一次对铁托主义分子的示众审判。前面三个国家的案件的“证据”都成功地搜集到了，因为被告都被苏联指挥的审讯人员压垮了。唯有哥穆尔卡继续在抵抗，使他的折磨者感到失望，他竟奇迹般地度过了这次清洗。这就是哥穆尔卡奇异的政治生涯的第一章的终结。

哥穆尔卡是一九四四年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唯一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重新掌权的一个人物，他奇异地代表了连接东欧战后解放到六十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悲剧那些不寻常年代的整个综合性过程。但他的命运和古斯塔夫·胡萨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两人在五十年代都是惨遭折磨的囚徒，后来为了维护正统的共产主义事业又是思想上的同盟者。两人都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人物，两人都值得深入研究，以便理解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理。

到一九四九年春季波兰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克里姆林宫的十字军就把注意力转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在当时

似乎自相矛盾地又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集团——以残忍的手段和令人吃惊的速度自行处理问题。在铁托—斯大林决裂之前，阿尔巴尼亚党主要是受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科·佐治控制的（他当过乡下的白铁匠），虽然恩维尔·霍查、一个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担任着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佐治是贝尔格莱德政权的真正傀儡，贝尔格莱德指挥阿尔巴尼亚及其共产党很象莫斯科希望指挥它的所有卫星国那样。想同南斯拉夫建立联盟的是佐治集团。霍查和他的人，另一方面，是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为他们弱小而又非常不发达的国家争得尽可能多的独立。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情况要求它依附于一个较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霍查的使人感兴趣的地理学理论是：保护者离它越远，对它的国家就越好。所以，它选择了相当远的苏联而不要邻国南斯拉夫（一九六一年又选中最远的中国而不要苏联）。阿尔巴尼亚作为“民族共产主义”的一个不寻常但又十分有效的例子，按照它自己的政治逻辑去办事，它猛烈抨击一九六八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并退出了华沙条约，它的理论根据是：这是一个修正主义打击另一个修正主义（这当然得到中国赞同）。这是巴尔干的狡猾同曲折离奇的共产主义思想搀和在一起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不论怎么说，霍查和西班牙战争的老战士、总参谋长穆罕默德·谢胡在南苏决裂期间保住了他们的权力。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第二天，阿尔巴尼亚党的中央委员会（现在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就谴责南斯拉夫是“叛徒”和“托洛茨基分子”。一度被铁托保护的佐治立刻认识到风在朝哪个方向刮，他也参加了对铁托的进攻。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八月佐治被解除了党和政府的职务，十一月就被逮捕了。一九四九年六月他被秘密审判并处决。在此之前一个月，他的最亲密的同事——政治局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潘·克里斯托，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诺·凯伦蒂，内务部副部长瓦·科列茨基，国家保安警察负责人瓦·米特罗约里和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诺塔被判处长期徒刑。第二年霍查和谢胡又进行了针对政治局委员阿·谢胡（同总参谋长谢胡没有亲属关系）和其他人的第二次“巩固性”清洗。这样铁托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就被民族主义派消灭了，这受到了俄国人的热情称赞，一直到十多年之后这个民族主义又掉过头来反对俄国人的时候为止。

在保加利亚问题就更复杂了。在这里早就应该对指控、“罪证”和审讯进行准备工作，但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苏联安全顾问和他们的保加利亚同事才开始行动。

在保加利亚被选中送上绞刑架的人是科斯托夫。他是代总理、党中央委员会政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科斯托夫一九一九年参加党，当时只有二十二岁，他非常忠实于党的事业，一九二四年他宁愿从

索非亚警察总部的五楼窗口跳楼自杀而不愿在酷刑下屈服和出卖自己的同志。他自杀没有死，摔断了两条腿，背部也受了伤，但活了下来，终生成了一个残废驼背。但他的精力非常旺盛，战时成了保加利亚“国内派”共产党的主要人物，一九四八年之后成为患病的乔治·季米特洛夫的当然继承人，季一度是共产国际负责人，后来是保加利亚的总理。

科斯托夫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也因此而送了命。一方面他是一位完全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苏联的崇拜者。作为保共主要负责人，战后他同意以他的名义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清洗，其结果是经“人民法庭”审判处决了两千一百三十八人。东欧的其他共产党国家都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恐怖。一九四六年保加利亚和盟国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又一次爆发了复仇情绪，处死了农民党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尼·佩特科夫和许多其他人。季米特洛夫和科斯托夫无疑都参与了这些事件，因为他们在保加利亚是掌管一切的。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当科斯托夫五十寿辰时，党报在其祝贺社论中说，“你的成就是伟大的，科斯托夫同志，你是党的建设者，党员群众的导师和教导者。”

但是科斯托夫也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至少在他处理苏联利益和保加利亚民族利益问题的时候。他当然不是一个莫斯科意义上的“铁托主义者”，但他同克里姆林宫卷入了关于苏保联合股份公司和保向苏联提供货

物这样的问题。有一次，他根据国家保密法不让苏联人得知重要的经济数字，这当然是一个最异乎寻常的顶撞行为。莫斯科的贪得无厌在保加利亚也引起了它在南斯拉夫、波兰和罗马尼亚已经引起的类似问题，科斯托夫甚至亲自去向斯大林表示过不满。他对铁托关于南保联邦的原建议也持否定的立场，虽然开始时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赞成过这一思想。总而言之，当铁托主义的定时炸弹已经爆炸，俄国人感到必须对东欧很快加以清洗的时候，科斯托夫已成了一个不受信任的人。

深受克里姆林宫信任的伏·契尔文科夫（除别的因素外，他还是季米特洛夫的妹夫）被指定来消灭科斯托夫。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科斯托夫被解除了所有党政职务，并被指控为在贸易谈判和向苏联代表提供经济情报方面曾推行了一条对苏"不真诚和不友好"的政策。他也被指控在国家机关中容忍"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鼓励了这种倾向。"

一连串的示众性审讯立刻接踵而来，除科斯托夫外还涉及到三十三名保加利亚官员，包括十名政府部长。他们的罪名很多，从"铁托主义"一直到充当法西斯间谍、英美代理人和南斯拉夫情报人员。科斯托夫本人被说成曾同美驻保公使密谋策划。清洗在党政军机关进行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叛徒名单中列有军队总参谋长伊·基诺夫将军（曾是西班牙内战志愿军）；军队情报负责人彼·弗兰切夫将军；军队政治部主任鲍·巴尔加兰诺

夫将军；国家秘密警察局的局长们斯·鲍格丹诺夫、乔·加涅夫和尼·扎德戈尔斯基；保加利亚国民银行行长查·宗切夫；财政部长姆·萨克拉罗夫；交通部长斯·顿切夫；外贸部长约·鲍日洛夫；还有电气化部长留·凯拉科夫。

保加利亚安全专家和他们苏联顾问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在法庭进行真正审判之前，要所有被告在书面“供词”上签字。这些“供词”是把折磨、暴力、持续的、不断加强的心理压力结合起来，最后使被告真的相信自己有罪而取得的。沿袭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的一套做法，所有的“证词”都是交叉证实的，一人牵涉到全体。

科斯托夫也在“供词”上签了字。但是当他被带进索非亚的法庭，要求当庭证实时，这位顽强的共产党人反抗了。由于驼背而在法庭上受到嘲弄的他，可能回忆起二十五年前为了不出卖原则，他曾跳楼自杀的事。现在他告诉法庭，他在监狱中签的供词是假的，是逼供的结果。面红耳赤的法官们立即切断了他的麦克风，科斯托夫被迫停止他的长篇愤怒发言。然后他的难友和国家证人又重复了对他的指控。当夜科斯托夫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置无人知道，但第二天他请求法庭原谅他的冲动。他也向党中央写了信，对自己在法庭的“谎言”表示悔过并保证：若他能得到宽恕，免于一死，他将立功赎罪。（在共产党历史中在法庭上否认自己签字的供词的唯一的先例是战前莫斯科审判中的尼·克列斯金斯基。克列

斯金斯基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和间谍。在法庭上他说，他从亲身的经验中知道，只有在审判时，他才会有机会说出真情。他天真地说，“我曾想，只有象我今天所做的这样，当庭声明一切都是假的，我说的话才可能传到党和政府领导人那里。”克列斯金斯基为自己的无罪斗争了整整一天，但第二天他声明收回自己的话，他承认他的表现是出自一种强烈的虚伪羞耻感。他被证明有罪，被处决了。）

但科斯托夫是一九四九年保加利亚清洗中唯一被处决的人；其他被告均判处徒刑。接着对一些次要的共产党人继续进行了审讯，都给予了监禁惩治。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一共开除了九万三千名党员，几乎等于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一九五〇年六月，一名共产党领导人评论说，党仍然受到“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科斯托夫主义和铁托主义的损害。”可见，特·科斯托夫死后仍然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嘲弄对象。

当保加利亚准备审讯科斯托夫的时候，拉伊克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在匈牙利被捕。苏联人可能是认为，如果让某一个国家不举行这种示众性审讯这会是示弱，会招致另一次铁托式灾难。

拉伊克当时只有四十岁，肯定是一名“国内派共产党人”。他曾在西班牙作战，当过拉科西营的领导人；在法国曾被拘留两年；一九四一年他回到匈牙利，很快就被德国人逮捕，但他在狱中领导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一九四四年他被送到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战后回到匈牙利，拉伊克很快在布达佩斯共产党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九四八年六月当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成立匈牙利工人党的时候，拉伊克成了十四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即政治局）的一名成员、战略性的书记处八名书记之一，兼内务部长。作为内务部长，他对监禁明曾蒂大主教负有责任。但拉伊克进入上层领导后不久，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国内派共产党人”和以党的总书记拉科西为首的“莫斯科派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了。

照老规矩由莫斯科派发起攻击，带头的是拉伊克政治委员会的同事格罗。指出下面这一情况是有必要的：格罗知道拉伊克在西班牙的情况，他不是一位“自由派志愿军”，而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去指导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的。不管怎么说，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政治局开了一整夜的会议上，格罗指责拉伊克准备组织军事政变接管工人党。他说拉伊克正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军营组织一支特别警察部队，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它，并把它置于他的内务部直接指挥之下。拉伊克拒绝他正在准备一次政变这一指责，他坚持说，苏联军事当局知道他改组拉德茨基警察部队的计划。虽然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决裂已经发生，但格罗没有攻击拉伊克是铁托主义。作为临时性的平衡措施，拉伊克从内务部被调到外交部并保留了党内的职务。

拉伊克又过了将近一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一九四九年五一节他还是继拉科西之后最受群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五月十五日他还被选为国会议员。但六月十六日拉科西和格罗又对他发起攻击。拉伊克突然被捕，被撤消了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他被指控为"法西斯间谍"、"铁托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党内莫斯科派完成了准备工作，现在示众审讯的舞台已搭起来了。

虽然从九月十六日一直进行到九月二十四日的审讯过程与东欧其他地方对铁托分子的审判案很相似，但拉伊克案件具有其特别狡诈性。拉伊克及其审讯运动不仅同铁托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同代表唯一神教服务会的两名美国人诺埃尔和赫尔曼·菲尔德的阴谋活动相联系，通过他们据说同艾伦·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有联系。诺埃尔在匈牙利被秘密逮捕，他的兄弟赫尔曼在波兰被捕，虽然华沙政府否认知道此事。

拉伊克审讯中的另一个特别的方面是，在对"铁托主义分子"的清洗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志愿军之间首次建立起了重大联系。（三年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审讯中这一点反映得特别强烈。）克里姆林宫决定要在比华沙审判哥穆尔卡案件时大得多的规模上证明，共产党的西班牙老战士是现实的或潜在的叛徒，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而又是非常危险的集团。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布达佩斯人民法庭判处拉伊克、共产党组织委员会成员提·索尼和中央委员会委

员安·萨拉伊绞刑。拉伊克曾供认，西班牙内战时他曾是霍尔蒂上将秘密警察的特务；所有被告在供词中都同意，铁托是“最凶恶的叛徒、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傀儡。”从拉伊克的审判记录看，好象被告是铁托而不是拉伊克，当然这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是真实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匈牙利广播公司副主席帕·尤什图什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其他几十名人士受到了较轻的惩罚。两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高级军官——参谋长兼军队政治部主任乔·帕尔菲中将和贝·科龙迪上校分别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一九五〇年夏新的清洗把社会民主党人、匈牙利工人党主席和国家元首阿·萨卡希茨、党的副总书记乔·马罗山、司法部长和党中央委员伊·里埃什、军队参谋长拉·肖廖姆将军、军队总监拉·库蒂将军和柯苏特军事学院院长卡·雷瓦伊将军等人关进了监狱。他们当中的党政干部由于他们过去是社会民主党员，军队干部——许多人又是西班牙内战老战士——则由于被认为同拉伊克和“铁托主义”有关系而受到惩罚。

一九五一年春在清洗的第三阶段象亚诺什·卡达尔这样杰出的国内派共产党人也被判处徒刑。从一九四八年起他就是党的副总书记，他还代替拉伊克任内务部长。到那时为止唯独捷克斯洛伐克幸免于席卷共产党阵营的恐怖浪潮，但这不过是暂缓执行而已，绞索已渐渐拉紧了。恐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更大的恐怖；人们很有理由

提出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苏联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助长它的势力，还是恰恰相反使它日益失势？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一次讲话中，铁托提出了他自己的预见性的分析："每一个工人阶级都有能力进行战斗，争取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刺刀从来没有正确地传播过一种进步思想，也没有促进过社会改革而只能带来奴役。"

VI

大 清 洗

一九四九年捷克斯洛伐克外表上看起来是个调整得比较好的苏联卫星国。除斯洛伐克以外（它总是个特殊情况），由哥特瓦尔德、斯兰斯基和萨波托斯基领导的“莫斯科派共产党人”牢牢地控制着局势。那些被看作是“国内派共产党人”居于从属地位：约·帕维尔任内务部副部长；约·斯姆尔科夫斯基任国营农场和林业总局局长和农业部副部长；安·诺沃提尼是布拉格党组织的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他对莫斯科的忠诚是不成问题的。

曾同莫斯科有过麻烦的哥特瓦尔德，在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权之后发展起来的盛行的个人迷信之中成了斯大林的高级伙伴。他不断被说成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他的肖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到处与斯大林的像挂在一起。所有党政机关都在学习苏联的榜样，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单调思想原则充斥于报刊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之中。只有在官方声明的泛滥之中才能闻到

一点新政策的气味，甚至连一点也没有。

比方说，情报和文化部长瓦·柯别茨基、一位不知疲倦的演说家，一九四九年五月曾告诉党中央委员会说："为了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我们正在重新评价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文学成果，对在资本主义时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正在进行审查。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能使民族精神生活复兴和在我们社会主义努力中起促进作用的民族文学作品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

作为一个新闻宣传工作者的经历使柯别茨基处于捷克斯洛伐克文化沙皇的地位。他毫不迟疑地告诉中央委员会说，"新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是我国思想和文化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要起伟大的作用。"他说，政权是"思想意识纯洁性的捍卫者"，它应使国家摆脱"坏的文学"，以便消除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羹剩饭"以及"思想上混乱的唯理智主义"。

为了使他的言论变成行动，柯别茨基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图书馆和书店，并派人去清理私人藏书。爱德华·塔博尔斯基曾作过估计，私人图书馆中的七百万册藏书"被变成废纸"，有三百万册被移交给公共图书馆，有四百万册被封存起来等待对它们作出思想意识上的判决。共产党以前捷克和斯洛伐克作家的大部分作品被禁止了——这里包括诗作和剧作，现在被官方仇恨的托·马萨里克的著作和公认的捷克斯洛伐克当代最著

名的作家卡·恰佩克的作品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恰佩克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单是因为据说他在一九二四年曾写了一本名叫《为什么我不是共产党人》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尽管共产党的纲领中撒谎说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并不存在……如果共产主义坚持把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当作无用的破烂货加以取缔，那就再见吧。"为了取代资产阶级文化，柯别茨基使那些愿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式并按照他的苏联同行安·日丹诺夫的思想创作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在全国泛滥成灾，也拚命发行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其他被批准的俄国作家的小说，以及象哥特瓦尔德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和斯兰斯基关于统一农业合作社的报告（这个报告竟出售了九十二万八千二百五十份）使之充斥市场。

老态龙钟的教育部长兹·尼耶德利在共产党夺权之后说，"我们将根据我们的需要来改变人的性格……我们将不满足于人的自然天赋。"这一指导思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校和大学中得到贯彻，首先是清洗教师，接着就实行纯马列主义的课程表。俄语成了必修课，尽管许多学生上了八年学之后仍决心不学它。

电影工业早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骄傲，但它被贬低为——用柯别茨基的话说——向人民提供"有真实说服力的、能激发我们建设热情的、能成为愉快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源泉的有价值的动画面。"负责实现这一纲领的

人物就是伊·亨德利赫，他后来被提升为党的主席团委员，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物竟并非出自他本意地为一九六八年的自由化打开了大门。

在经济方面，集体化和迅速为苏联提供工业品成了这一制度的突出特点。没有任何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曾想过要去向斯大林抱怨，苏联单方面地掠夺捷克和斯洛伐克工人的劳动成果。相反，同苏联友好是全民口号，捷苏友协拥有近二百二十万会员。无论动机是真正的友谊还是真正的机会主义，友协的名单表明共和国内每七个公民中就有一个会员。

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捷克斯洛伐克遭到“铁托主义”或任何类似东西的威胁，那看起来是荒唐的。但早在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就首次努力证明，的确存在着铁托主义的潜在威胁。

也许是自己实现自己的预言，但现有证据表明，拉伊克审判案在匈牙利刚一结束，苏联安全部门和被挑选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秘密警察小组、一个“平行的警察组织”就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清查铁托主义的事务来了。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五四年后尽管逮捕仍在继续，但不大引人注意，一直进行到一九六七年）捷共清洗大逮捕和大审判的历史对理解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的事件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它说明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是斯大林残酷

镇压之后被压抑的感情和失意情绪的爆发。除了三十年代苏联的审判案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发生的某些事件外，我们还未曾见过哪一个共产党国家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被那样大规模的党内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整个一代人在政治上遭到毁灭。甚至今天都不可能精确地估计出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多少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被关进监狱和被剥夺了体面的生活手段。据恢复名誉委员会一九六八年收集到的初步资料表明，有几万人被捕，有几十万人失掉了职业。一九六八年搞自由化试验的领导人如斯沃博达总统、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古·胡萨克和约·帕维尔等都是早期清洗的受害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其次，一九四九——一九五四年的清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机会来了解共产党的行动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方面的内情，这一套方法在政治上毁掉布拉格之春的人们和一九六九年回到卑鄙的共产党正统的过程中也采用了。它们也充分暴露了那些在五十年代起过重要作用，而在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又是中心人物的人们的人格和政治品质。哥特瓦尔德和他的盟友如何在五十年代早期清洗捷共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九六九年胡萨克指挥下——在他再次改变效忠对象之后——进行清洗的历史的一个不祥的序幕罢了。

在一九六九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共产主义的团结已遭到严重破坏，因而做法不得不十分慎重和世故。但是那些愤怒的词藻，影射在西方和在国外的犹太复国主

义中心策划的“反社会主义”阴谋，为了“帝国主义”的最后打击而削弱捷克斯洛伐克等等，使人不得不惊奇地联想到五十年代为野蛮清洗辩护而说出的那些话语。

起先，一九四九年的逮捕、监禁和处决似乎很少同使克里姆林宫头痛的南斯拉夫问题有明显联系。相反，它们似乎都是些孤立的，在战后年代非常典型的共产党人之间互相算旧账的那些难以捉摸的案件，虽然偶尔涉及到布拉格领导的警告。处决一九四八年被捕的赫·皮卡将军，据一九六八年苏联人侵后为他死后恢复名誉的决定称，主要是关于同苏联人战时交换情报问题上发生争执的结果。对于一九四九年七月绞死米·莫拉科娃博士，也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她是一位政府中级官员，是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严重叛国罪”而被处死的第一名妇女。同案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还有：沃·杨德茨卡博士（他是政府主席团第一司司长和前纳粹集中营难友联谊会主席）和弗·博布利克博士，他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夺权前一直在政府主席团工作。奇怪的是，他们两人在一九六九年五月都被正式恢复名誉（他们实际上一九六〇年宣布大赦时已被释放）并附有法医证明说，为了迫使他们在“供词”上签字曾使用酷刑。同样奇怪的是，如果不是不祥之兆的话，他们和其他几个被恢复名誉的坐过监牢的人公开抱怨说，他们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诉就是由十九年前对他们逼供的那些公安干部来审理的。布拉格之春时被撤换的那些公安干部在古·胡萨克（他也

是坐过牢的）的政权下又悄悄地恢复了职位。

一九四九年这一年共产党政权也对罗马天主教神父和希腊天主教神父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匈牙利一九四八年监禁了明曾蒂，捷克斯洛伐克象通常一样比匈牙利晚一年，逮捕和审讯了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约·贝兰，判处他十四年徒刑。（波兰的红衣大主教斯·维辛斯基直到一九五四年才被捕，因为波兰的天主教徒为他们的教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贝兰大主教是一位非常有声望并比明曾蒂更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他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了三年战争岁月。这是对教会进行的三次清洗中的第一次，在这一回利托姆涅日采的主教斯·特罗赫塔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当时已六十三岁的布尔诺主教卡·斯科皮与捷克－布杰约维采的约·赫洛乌奇主教一起被判处二十年徒刑。数以千计的神父、男女修士被关进监狱，还有一些被迫到工厂和农场劳动。当主教们以"叛国"、"间谍"和同梵蒂冈有联系而被审讯的时候，驱逐神父、男女修士就更是公开地进行，其目的就是要把教会这个活动单位消灭掉。这一行动是同有计划地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消灭掉同时进行的。在总结这些工作时，一九五八年司法部长骄傲地宣布，"从前的剥削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员（商人、小业主、医生、律师、公务人员、修女和神父）占被判刑人员的百分之七十。"

一九四九年进行了无数次这样的逮捕和审讯，但第一个同清洗铁托主义分子相联系而被拘留的是埃·洛布

尔博士，当时他任外贸部副部长。他是在匈牙利拉伊克审判后两个月即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捕的。洛布尔博士碰巧是犹太人又是斯洛伐克人，象后来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为了叙述捷克斯洛伐克清洗这一极为复杂的情节，可将审讯的准备过程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当时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当局正想摸索出一个头绪，并使在布达佩斯审判中所得到的“证据”尽可能用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苏联的国家安全部。与此同时，莫斯科开始向布拉格当局施加压力，要它上演一场反铁托主义的示众审判。但是花了四年时间才使整个事情走上轨道，这一事实使人强烈地感到，在清洗捷共领导这一工作中，当初对朝哪个方向去——走多远——都是非常没有把握的。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莫斯科、布拉格的内务部和党的上层领导人所一致同意的第一批清洗目标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特别是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者），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战时同西方有联系的人和犹太人。患病的斯大林迅速煽起了这种反犹太人的情绪——他曾把犹太人叫做“那些无根的世界主义者”——这在莫斯科的“医生阴谋案”和同时进行的对苏联犹太人的清洗中达到了高峰。把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西班牙内战

老战士、“西方分子”和犹太人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全然不合逻辑的，如果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证明一个铁托主义阴谋案的话。典型的仇敌名单全有了，接着安全机器就开动起来。

一种显然卑鄙的作法是，最高领导人先利用一批人去消灭另一批人，然后又另找一批人来消灭这一批人。这一格局清楚表明，所有的计划都是在莫斯科而不是在布拉格制订的，简单的理由是，捷共领导和安全机关的头子不大可能去从事为自己掘墓的工作。

当第一阶段展开时，布拉格统治机构的真正核心是由总统兼党主席哥特瓦尔德，总书记斯兰斯基，总理萨波托斯基，副总理西罗基，和政治局的斯洛伐克委员卡·巴契列克组成的。在安全机构方面，权力表面上属于内务部长诺塞克，内务部副部长约·帕维尔和奥·瓦列什和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局长奥·扎沃茨基，后面三人都是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

就象事态不久表明的那样，真正的警察权力是掌握在司法部长切皮奇卡和党中央干部部长拉·科普日瓦手里的。工作中的关键人物是科普日瓦，他不但控制着党的机器而且在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合作下正在建立一支“平行”的秘密警察。性情粗暴，常常大发雷霆的科普日瓦在往后的日子里与利哈乔夫将军和名叫马卡罗夫和加尔金的两名苏联国家安全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顾问”一起成了显赫人物。利哈乔夫和马卡罗夫是苏联国

家安全部的高级官员，拉伊克审判案一结束（他们在那里的一个“顾问”团工作）他们就立即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国家安全部派出的小组到达布拉格正巧是在马·拉科西向哥特瓦尔德提交拉伊克审判案得到的关于某些捷克斯洛伐克人士参加铁托分子阴谋的“证据”的时候。负责同其他东欧国家安全部门联系的瓦列什也收到了类似的情报。

捷克斯洛伐克党把自己的官员同“铁托分子”问题联系起来的第一个明显迹象是《纽约时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透露的，该报称，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由于他的太过分的“独立思想”和具有危险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受到怀疑。克列门蒂斯博士在伦敦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光，在为一九四八年政变作最后准备时，他同苏联外交官瓦·佐林密切合作过，在扬·马萨里克死后当了外交部长（他曾作马萨里克的副手三年）。《纽约时报》发表上述消息时他在纽约，率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很清楚这一消息使他深为不安。《纽约时报》的报道正巧出现在在布达佩斯对拉伊克及其同伙判刑后的一个月，对匈牙利共产党人进行的一长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猛烈攻击肯定会使克列门蒂斯想到，他所读到的报道可能有相当的真实性。

作为美联社采访联合国的一名记者，我也是每天缠着克列门蒂斯要他对传闻他即将被清洗一事发表评论的

几十名记者之一。说实话，当一个人被公开问到，他作为外交部长所代表的政府是否真的等他一回国就要把他关进监狱，他的处境是很尴尬的。但是现代新闻采访就是这样干的，克列门蒂斯有风度理解这一点，因而没有作出什么不客气的反应。我回顾那些日子——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当我们跟着他出出进进成功湖的联合国大会场时，他只是微笑着，抽着他的烟斗。但是至少有一次他说，联合国大会在圣诞节结束时他“当然”要回捷克斯洛伐克去。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和布拉格联系的情况怎样——当然无人知道。但是关于克列门蒂斯表现出明显不安的话肯定传到了布拉格，因为十一月底他的妻子鲁德米拉到了纽约，其含义就是哥特瓦尔德总统对他个人保证，所有的谣言都是“帝国主义”编造的，政府仍然对他充分信任。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不能排除当时哥特瓦尔德可能真的相信，克列门蒂斯是没有危险的。洛布尔博士碰巧也在同一星期中被捕，但这一巧合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不过，据人们所知，清洗计划并不是哥特瓦尔德制订的，而是由科普日瓦、巴契列克和切皮奇卡（哥特瓦尔德的女婿）周围的一小撮内圈人物制订的，并同莫斯科直接保持联系。虽则拉伊克审判案刚一结束，克列门蒂斯就被确定为清洗对象——《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是准确的——但又过了十六个月之后公诉人才准备好起诉。计划中的审判案的规模甚大，需要长

期而艰巨的准备工作。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克列门蒂斯回到了布拉格。四天之后他的秘书特·弗洛林在街上被国家安全人员逮捕。当克列门蒂斯生气地询问时，诺塞克告诉他，他对此事毫无所知。他接着又向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呼吁。三天之后哥特瓦尔德打电话给克列门蒂斯说，弗洛林的被捕不是政治原因，这个案件会很快得到解决。可是这个案子却一直没有解决。

在一月和五月之间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一系列似乎是、或者真的是互不关联的逮捕。有的是内务部的正规秘密警察干的，另外是科普日瓦的"平行"警察组织干的。再次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关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是互相矛盾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很好地互相配合。但是也有明显迹象表明，科普日瓦和他的二十四名苏联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顾问正在秘密策划消灭正规的政治警察。（一九六八年底也出现了这种现象。）

第一批的逮捕主要是指向多多少少有点名气的西班牙内战老战士；这应该说是对许多身居高位的西班牙内战老战士，特别是对那些在安全部门工作的人们的警告。很明显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国家安全人员拘捕了五名西班牙内战老战士和六名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多·克莱诺娃，国际纵队的一名医生；艾·科赫诺娃，一名志愿军；一位名叫帕弗利克的共产党员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都在西班牙打过仗；弗·维塞拉，曾在国际纵队

的卫生部门工作；以及他的丈夫费格尔，一名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富商，她是在西班牙共和国陷落之后在法国认识他的。看起来大概是在布达佩斯审讯案中匈党组织书记蒂·索尼供出了他们，说他们是“铁托主义”和“间谍”中心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支的成员，这个中心据说是由诺·菲尔德这位神秘的美国人建立的，拉伊克审判案的许多方面都同他有关（索尼已被处决）。

这六个似乎是不重要的小的逮捕后来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它提供了科普日瓦的特务所需要的与布达佩斯阴谋案的直接联系。其次，它在这些所谓的“铁托”代理人和大批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重要的党、政、公安干部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联系的线索就是克莱诺娃、科赫诺娃、帕弗利克夫妇和费格尔夫妇同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身居高位的西班牙内战老战友保持着友好关系。这就是科普日瓦及其苏联同事们准备消灭已建立起来的安全机关和身居高位的非莫斯科派共产党人所要采取的办法。

与此同时，对这六位“西班牙人”进行了迅速的秘密审判。弗·维塞拉侦查期间在布拉格郊区的鲁津监狱里自杀。其他人被移交给了匈牙利当局。

回顾五十年代所使用的这些方法，人们不得不对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构中清除自由派和中间派所使用的方法与五十年代的方法之极端相似感到吃惊。这两次清洗中，罪名都是从杜

会关系和个人经历而来。在这两次清洗中，安全机构人员做工作的结果是在政治上毁灭了自己。他们中的某些人竟有了两次这样的经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说第一批西班牙内战老战士的被捕和他们同布达佩斯审判有牵连开始还有这点相对的共同踪迹可寻的话，那么，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突然对没有污点的有着正统经历和同莫斯科有巩固联系的共产党人的打击和对广大的非共产党中间阶层的打击。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突然撤销了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忠顺的编辑威·诺维中央委员的资格并把他开除出党。诺维被指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而被捕。（这位永远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随着一九六八年自由化的到来而再一次失去了他的党内地位。苏联入侵后，他成了回到正统路线上去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另一个同时被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和同诺埃尔·菲尔德有联系的高级官员是米·雷曼，萨波托斯基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司长。根据科普日瓦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雷曼在侦查期间自杀了，他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一长串被称为自杀、被诱使自杀或真正政治自杀案中的又一个牺牲品。

同样不明不白的是，斯沃博达将军被解除了自一九四五年解放以来一直担任的国防部长职务，而扬·德尔加奇十天之后又被解除了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在部队中清洗的开始，以后它的规模发展到相当之大，五

十四岁的斯沃博达将军暂时被明升暗降，当了副总理，负责国家体育运动总局的工作，这明显地是个意思不大的工作。一九五〇年的做法就象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做法一样，在完全搞掉一个人之前常把他从重要岗位调去担任挂名职务。切皮奇卡继任国防部长。

与此同时，科普日瓦的警察缉捕队向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这个油水很大的目标发动了正面进攻。在这里，行动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切尔宁宫一直处于莫斯科共产党人控制之外。不但作为部长的克列门蒂斯是个战时在伦敦的斯洛伐克人，而且外交部高级官员中有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大战期间他们或者在西方或者在纳粹集中营里，而且许多是犹太人。

比方说，三十五岁的副外长阿·朗登有许多方面能遭受打击：他在西班牙打过仗；以后在法国的抗德组织中工作过，被关过纳粹集中营，他的妻子是法共党员，战后他在法国住了几年；又是个犹太人。他也不幸认识诺·菲尔德，当他在一家瑞士疗养院休养时向菲尔德的唯一神教服务委员会借过一小笔钱。副外长瓦·海杜，当时三十六岁，战时在伦敦，是BBC的广播员，犹太人。卡·杜费克是西班牙内战老战士，曾在土耳其和英国任外交官，是部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一九六八年他任外交部外国新闻司司长，是他奉命通知我把我作为《纽约时报》记者驱逐出境。）爱爱·戈一戈尔德斯图克，犹太人，一九四九年任驻伦敦使馆参赞，后任驻以色列公

使。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型性格中少有的几个人之一，二十年来他在政治上是始终如一的。他五十年代被监禁，后来成为布拉格之春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最后，整个外交机构还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和非党人士，越来越多的人向西方叛逃使它感到难堪。

随着洛布尔博士的被拘留——后来在审判中他被挑选出来作为阴谋集团中第一个加以逮捕的成员——科普日瓦之流的政治迫害者现在就把力量集中到外交部和外贸部，把它们作为证明“铁托分子阴谋”存在的主要地方。因为这两个部的官员们不可避免地同外国保持着职业上的联系，控告他们的“证据”是很容易收集到的。因为外交部的一些人同国家安全机构官员有密切的个人联系，大部分是由于他们过去在西班牙的关系，科普日瓦的特务组织就有可能按这一线索来牵制秘密警察的行动，后来进而对付党的上层领导。就这样，清洗工作的格局一步一步地形成了。

苏联顾问们开始时显然没有一个蓝图，他们的工作就象玩拼板玩具，边走边看，并不太清楚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一九六九年当莫斯科和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要来证明布拉格之春是外国势力精心策划的“右派反革命活动”时，它们又是这样干的。阿·朗登关于五十年代清洗的书《错综复杂的布拉格审判案的见证》引述了一位开始曾同苏联顾问工作过的西班牙内战老战士阿·萨麦茨的话：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在拉伊克案件以后，他们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说，在我们中间肯定有一个叛国的阴谋集团……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渗透到党和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

根据他们给予我们的指示，我们就对那些通过他们的工作或关系‘可能进行过’叛国活动的人进行逮捕。至于证据，那是在逮捕以后才开始寻找的……我曾接受过一名名叫鲍里索夫的苏联顾问的命令，叫我亲自交给他一份从一个被控人員中得到的所有证据。我提醒他说，党的总书记已收到了一份有关的简报。他粗暴地把我顶回，命令我不要对他的命令讨价还价。

我也同其他的苏联顾问有过接触，如知名人士利哈乔夫和斯米尔诺夫。他们搜集每个人的黑材料，特别是那些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包括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在内……

他们来到之后，就开始通过完全忠实于他们的‘可靠的人’渗透到（国家）安全机构的各个部门。用这种办法他们很快就成功地在安全部门内——他们被认为是在那里正式工作的——建立起了只服从他们命令的平行的警察组织。”

萨麦茨也谈到，所有的审问简报被立即翻译成俄文。

“平行警察”在五〇年初很快和很有效地对克列门蒂斯及其主要同事进行了监视。阿·朗登写道，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定期被安全官员召到他们设在德伊维采的总部或内务部长时间询问关于他认识诺·菲尔德的情

况和他的其他国外关系。作为副外长他不能制止安全人员。克列门蒂斯本人曾向朗登和海杜抱怨说，他被人盯梢，这些人不是他的警卫人员。

最后无可避免的打击落到了克列门蒂斯身上。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三日，哥特瓦尔德总统在赫拉德强尼城堡召见他，要求他辞职，理由是他在部里执行了“有缺陷的”干部政策。第二天克列门蒂斯辞职一事就在布拉格公布了。

据了解一九五〇年事件的捷克斯洛伐克官员们说，有正当理由相信，苏联人曾要求立即逮捕克列门蒂斯，但哥特瓦尔德出于个人忠实感抵制了，因为他认为，迄今所搜集到的反对这位被解职的部长的“证据”没有足够说服力。可以相信哥特瓦尔德曾至少设法为他的同志们保持一定的面子。克列门蒂斯这样就得到了将近一年的延缓期。

为审判进行准备的第二阶段开始于一九五〇年的五月二十三日，这时拉·科普日瓦已从中央委员会干部部的幕后走了出来，变成为新成立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干部部的工作由他的一位最亲密的同事布·科列尔来代替。）奥·扎沃茨基领导的国家安全局也同时从内务部中分出来，归并到科普日瓦的新部里。内务部本身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同样有理由相信，是哥特瓦尔德运用他的影响阻止逮捕瓦·诺塞克和副部长帕维尔。诺塞克虽

然长期以来就是莫斯科路线的忠诚奴仆，但他有弱点，因为他在伦敦度过了大半战争时光，同克列门蒂斯有密切联系。帕维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这段历史当然对他不利。

到五月底，莫斯科派共产党人已占据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关键职位。科普日瓦成了警察沙皇。切皮奇卡掌握着军队。西罗基成了新的外交部长同时仍保留副总理的职务。于是就立即向共和国的“敌人”发动了公开进攻。五月二十四日，即科普日瓦掌握安全机关的第二天，西罗基在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了下面一段关于他的斯洛伐克同胞克列门蒂斯的话：

> 一九三九年共和国被占领后克列门蒂斯流亡到国外。苏德（互不侵犯）公约签订后（这个公约对进步人类具有伟大意义，因为它粉碎了英美帝国主义卑鄙的背叛性的计划），他站出来反对苏联，采取了阶级敌人的立场。
>
> 在苏芬冲突时，在苏军解放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时，他继续采取了这种阶级敌人的立场。在伦敦，克列门蒂斯同志同贝奈斯总统周围的资产阶级流亡分子搞在一起，他的活动和广播讲话是按照资产阶级路线进行的。作为副外长和外长，他仍坚持这种立场。这位背离者不曾考虑到战后阶级斗争的未来发展。

西罗基的讲话正式开始了对“铁托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狩猎季节”。民族主义的斯洛

伐克是开始猎捕的明显目标。

虽然克列门蒂斯是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但西罗基利用这次代表大会摧毁了斯洛伐克的整个自治机构。十九天前被解除了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胡萨克被西罗基指责为“民族主义者”和克列门蒂斯的追随者。著名的斯洛伐克诗人、胡萨克的朋友、行政委员会委员拉·诺沃麦斯基受到了同样的对待。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和斯洛伐克游击队联合会负责人卡·什米德凯的命运也是如此。

在党和政府中控制了所有的战略位置，摧毁了斯洛伐克这个阵地，莫斯科派对于上演一场有计划的审判似乎已准备就绪。或者是为了把事情弄得更完善一些，或者还有一些暗藏的反对势力尚待清除，这些政治迫害者又呆了六个月没有动手，继续加强着他们的阵地。

这些时间的大部分被用来为即将开始的逮捕准备“证据”。例如阿·朗登回顾说，科普日瓦曾讯问过他关于当时表面上仍是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扎沃茨基战时是否犯有“背叛”罪，是否同在法国的德国秘密警察合作过等问题。实际上对每一个稍为重要一些的党的干部都搜集了大量文件档案材料。当时的情况好象是莫斯科及其布拉格同事们对究竟如何去做还心中无数，好象一位经理，他搜集到了大量预测材料，但还没有下令生产，因为这些材料尚未整理出个头绪来。在准备人为制造的

审判案这个弄虚作假的邪恶世界里，这种类比也许是不错的。

不久，行动命令下达了。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科普日瓦的秘密警察按所分配的任务在全国展开了扇形攻势。

在年底之前落网的最著名的共产党人有布尔诺州委书记奥·什林（布尔诺是仅次于布拉格的第二个最主要地区，一个比较自由化的地区，一九六九年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和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副总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玛丽·什维尔莫娃。关于什林案件，他被拘捕的大概理由是在国际纵队中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组织的书记所起的作用和他的犹太人出身。但对什维尔莫娃女士的被捕甚至使接近“内层”的人士都感到迷惑不解。她是莫斯科派共产党人、战时抵抗英雄扬·什维尔马的著名未亡人，也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卡·什瓦布的姐姐（连他也无法保护她了）。什维尔马一九三七年夏天曾随同一个党代表团到西班牙去慰问过捷克志愿军，这一点可能被用来反对他的夫人。但是她被捕的理由一直到一个月之后哥特瓦尔德发表了正式的看法才清楚了。同时这些逮捕对公众都是保密的，因为科普日瓦主管的部正在准备新的打击。

考虑到新的一轮逮捕，政府忙于把可能的牺牲者从高位上降下来。方针是尽可能把那些已解除了高位的人们保留下来。迅速逮捕什林和什维尔莫娃女士一定另有

原因，而象克列门蒂斯和胡萨克等人虽然早就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但一直未被触动。斯沃博达将军在体育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一九五〇年十月帕维尔将军被调离内务部副部长职务，被任命为边防军司令；十二月他又被送进了中央党校学习，这当然是十分可笑的。他告诉阿·朗登说，“这同威胁我们的东西来比，是微不足道的……不久之后我们这里肯定会有我们的拉伊克事件”。西班牙老战士安·斯沃博达被解除了党中央军事部部长的职务。奥·赫罗马特科，也是一名西班牙内战战士，被撤销了军事学院党委会的领导工作。

十二月二日对教会进行第二次打击时，有九名罗马天主教高级人士被布拉格法院以“叛国”和“间谍”罪判处长期徒刑。布热弗诺夫地方本涅迪克丁修道院院长扬·奥帕塞克被判处无期徒刑。摩拉维亚地区奥洛莫乌茨的名誉主教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

接着，一九五一年一月大清洗开始了，它是以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空前凶猛的逮捕浪潮开始的。

根据前国家安全部部长卡·巴契列克这样的权威人士一九六八年谈，斯大林最亲近的同事之一阿·米高扬五一年年初访问了布拉格，向哥特瓦尔德建议说，苏联认为一次对“铁托分子”示众审判是绝对需要的。哥特瓦尔德反对，但斯大林的一个电话就制止了他的反抗。科普日瓦直接从拉·贝利亚那里接受了指示。

在审判准备的第二阶段，据信被捕的有二万五千人

之多，包括党、政、军、公安机关，实际上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它不管是捷克人还是斯洛伐克人，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打击，它吞噬了西班牙内战老战士、战时抵抗运动领导人、坐过纳粹监牢的人、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凡是被贝利亚、利哈乔夫和科普日瓦怀疑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人被流放到波希米亚北部的乌斯季城。

不再反抗的哥特瓦尔德总统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正式同意了清洗，他把奥托·什林和什维尔莫娃女士称为计划夺取政权并变捷克斯洛伐克为"第二个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叛徒和阴谋"集团的领导人。全国陷于恐怖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共产党的大人物一个接着一个失宠和被投入监狱。阿·朗登是一月二十八日第一批被捕的；斯洛伐克的国务文化秘书拉·霍尔多什二月二日被捕；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卡·什瓦布二月十六日被捕——据说他曾拒绝继续同苏联国家安全部合作；克列门蒂斯最后于二月二十七日被捕。到了秋天，同其他斯洛伐克人一起，古·胡萨克、诗人诺沃麦斯基、卡·什米德凯（他曾任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一九五二年死于狱中）和当时任哥特瓦尔德私人侍卫长的列·霍夫曼也被监禁起来了。

另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纠缠不清的事情是，特伦钦县委第一书记、三十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胡萨克由于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和"铁托主义"而被监禁起来

的同时被选进了斯洛伐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奇怪的是，当时杜布切克在共产党机构中的提升正好与胡萨克的失势同时发生，而在十八年之后胡萨克又受命于莫斯科把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的杜布切克赶下台。有理由相信，那时他们两人只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

帕维尔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也在一九五一年被捕了——斯姆尔科夫斯基是在失去国营农场和林业总局局长职位一个月之后于四月被捕的。在安全机构中扎沃茨基在几天之后也跟着他的上司什瓦布被投入监狱。接着在四月被捕的有：内务部副部长瓦列什、奥·赫罗马特科和安·斯沃博达。国防部副部长贝·雷岑将军(犹太人)和总参谋部的扬·科波尔德将军于三月被捕。

从党的领导人来说，十九名州委书记中有六名（包括奥·什林在内）在第一次高潮中被投进监狱。被捕的还有党中央国际部部长贝·盖明德（犹太人）；党的副总书记约·弗兰克（犹太人）和《红色权利报》前任编辑安·西蒙（也是一个犹太人）。

在政府中被捕人中有：外交部副部长瓦·海杜，犹太人，四月二日被捕；外贸部副部长鲁·马尔戈留斯，犹太人；财政部副部长奥·费舍尔，犹太人；总统府经济司司长卢·弗雷卡，犹太人。外交部被捕人员中除克列门蒂斯、朗登和海杜外，还有爱·戈尔德斯图克、卡·杜费克、情报司司长贝·克林格、伊·哈耶克（他后来在布拉格之春时当了外交部长）、帕·卡万（他是驻

伦敦大使馆的新闻专员）以及其他许多人。在围捕中落网的还有美联社驻布拉格记者美国人威·奥蒂斯，他后来以“间谍”罪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

布拉格区的几大监狱——庞克拉茨、鲁津监狱和科洛杰伊城堡（曾一度是哥特瓦尔德的夏季别墅）——布拉迪斯拉发的列奥尔多夫监狱和国内的每一个监狱都因囚车每天运人来而有人满之患。

斯沃博达将军在哥特瓦尔德以部长太多的特殊理由解除了他负责体育运动的副总理职务之后于一九五一年底被捕。实际上，斯沃博达的被捕是一件骗局中的骗局的结果：不知是谁由莫斯科打给科普日瓦一封假造的电报说：“斯大林不信任斯沃博达。”这当然就足够把这位白发苍苍的苏联英雄直接投入监狱。但更令人奇怪的是，莫斯科竟没有人出来纠正这一错误。在斯沃博达一九六八年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前五天，他向一位布拉格记者谈了当时扣在他头上的罪名：他是“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成员”；一九四五年他曾派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官员到比尔森去同美军接洽，向美国人提供了“重要情报”；最后还说他正在策划一次“政变”。这些指控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一九四五年四月当美军到达比尔森时，斯沃博达作为莫斯科批准的新政府的国防部长正呆在科希策。但在一九五一年布拉格疯狂的气氛中，根本无人想到要怀疑一下这些指责。

当九月六日中央委员会在布拉格举行会议时，大家，

甚至包括搞清洗的人员在内，都认为，示众审判前的围捕行动已经结束了。除了几万人被捕外，几乎有十五万人被开除出党。实际上每一个可以想得出有颠覆嫌疑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都安全地关进了监狱，几十名重要人物——从帕维尔到克列门蒂斯，从斯姆尔科夫斯基到胡萨克正在被科普日瓦的特别安全干部日夜折磨和审讯，这些干部在与他们的苏联国家安全部“老师”密切联系之下，正在为审判准备“证据”。但是象通常那样，莫斯科为捷克斯洛伐克还准备了惊人的一招。而西方也象通常那样，对这个国家的命运知之甚少，而关心就更不够了。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惊人的一招是审判准备工作的第三阶段。严格地讲它同第二阶段是部分重迭的。因为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始的逮捕高潮一直疯狂地进行到年底。但从历史角度看，第三阶段的开始可以从中央委员会的九月六日会议算起。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令人迷惑不解地解除了斯兰斯基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就象一九四八年八月波兰的哥穆尔卡事件那样，如果没有外部巨大压力，矛头指向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自发性的“民主”造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来说，斯兰斯基是一位受尊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同哥特瓦尔德总统一起掌管着国家的政治命运。当时的问题是谁要搞掉斯兰斯基，理由是什么。

斯兰斯基在共产党内的资历和表现甚至从莫斯科多疑的观点来看也是无懈可击的。党建立时他刚二十出头，那时就入了党。与比他年长四岁的哥特瓦尔德一起，他成了“卡尔林”左派集团的骨干，这个派别在二十年代的斗争中曾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是一位一本正经的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未背离过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战争年代他呆在莫斯科，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秘密派遣回国，作为党在国内的主要代表来筹划解放后共产党的行动。一九四七年当哥特瓦尔德总理因为同意让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几乎断送了自己生涯的时候，他甚至于比哥特瓦尔德更受莫斯科的宠爱。斯大林对哥特瓦尔德的愤怒也表现在让斯兰斯基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出席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而不让哥特瓦尔德去。斯兰斯基留下任捷共的常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一九四八年六月他是在开除铁托的文件上签名的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当对铁托分子的清洗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已开始具体化时，斯兰斯基仍居高位，在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他被指定来发表对斯大林的正式祝词。一九五一年四月，当科普日瓦和苏联国家安全部机器已在高速运转之时，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还发表了斯兰斯基写的一篇称颂斯大林“天才”的长文，《红色权利报》在布拉格顺从地转载了这篇文章。

直至今天仍不清楚的一个秘密是，从四月到七月底

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致使克里姆林宫转而反对斯兰斯基和并下命令清洗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反对斯兰斯基的决定是莫斯科作出的，甚至没有同哥特瓦尔德和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们商量。这样，当七月三十一日斯兰斯基五十大寿时，捷克斯洛伐克党还授予他社会主义勋章，中央委员会给他发了一封由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总理署名的热情的贺电。情报部长、党的主要宣传家瓦茨拉夫·柯别茨基为《红色权利报》写了一篇社论，说他是“共产党革命家的杰出典范”，“列宁和斯大林旗帜下的一名忠诚和热情的战士”和“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的亲密和忠实的合作者。”共产党传统上是重视生日的，斯兰斯基也收到了从所有东欧国家和世界各国发来的贺电。

也许使他感到很惊讶的是，没有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整个苏联报纸对他的生日毫不予理会。在苏联，这种事情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它从礼宾角度发出的这个信号是带有特尔斐神示性质的。斯兰斯基对克里姆林宫的礼仪有足够的经验，他肯定看出事情不妙，出了问题。但是布拉格还未正式得知斯兰斯基即将失势，八月十八日《红色权利报》还粗心大意地报道，列托夫飞机工厂的工人前一天将这个工厂命名为鲁道夫·斯兰斯基飞机工厂来表达他们对“哥特瓦尔德同志的最亲密战友”的“感激和热爱”。

正好三个星期之后，《红色权利报》告诉群众说，

中央委员会已解除了这位“列宁和斯大林旗帜下的忠诚和热情的战士”的总书记的职务，原因是他在“挑选党的干部工作中”犯了错误和不适当地干预政府机构的工作。由哥特瓦尔德代理他的职务。在九月八日这一天的报纸上情报部长柯别茨基急急忙忙向深感迷惑不解的读者解释，斯兰斯基曾企图把他所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变成“党的领导机关”，这一机关则越过负责同志，背着他们进行工作。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紧闭着的大门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人们不知道，但明显的是莫斯科及其布拉格代理人还不想完全搞掉斯兰斯基。他还被允许承认错误和留在政治局内，在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和西罗基之后作为第四号人物。不清楚的是，他还被任命为副总理。与此同时，党的全国各机构负责人在一份高度机密的通报中被告知要对他提高警惕，通知说，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

> 斯兰斯基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明了以他为代表的错误对党的危害……在国家行政机构中委任斯兰斯基以负责的职位，这就给了他机会在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并在他所活动的新领域内来证明他自我批评的真诚性。……坦白的承认错误和斯兰斯基同志自我批评性的声明是他在新的岗位上充分实现其任务以造福于工人阶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条件。

毫无疑问这是要对斯兰斯基进行考察，但一般认为他的下台是党内问题，与哥特瓦尔德二月里谴责的对“铁托主义叛徒和阴谋分子”来势很猛的清洗没有关系。对共产党上层来说，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如果不是直接的权力之争的话，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据认为这是哥特瓦尔德在向他的同事报私仇。在中央委员会的通报中没有提到背叛或“铁托主义”之类的东西，但当哥特瓦尔德不无所指地向中央委员会说，应该对把“阴谋分子”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负有责任的不仅是什林和什维尔莫娃女士时，斯兰斯基可能已意识到了他面临的可怕危险了。

这新的一幕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人们不清楚。有可能哥特瓦尔德仍在抵制要最终清除斯兰斯基的苏联压力，就象早些时候他曾抵制搞示众审判的整个意图一样。比如说，十一月初在布拉格出版了斯兰斯基选集，标题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老是落后一步的《红色权利报》还称赞它是“在研究我党历史方面和在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方面将进一步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现在重新回顾整个事件的发展，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克里姆林宫当时已得出结论，为了使即将举行的审判显得合乎情理，需要揪出一个大人物。把什林、什维尔莫娃、胡萨克、克列门蒂斯、斯姆尔科夫斯基、帕维尔、朗登和洛布尔这些人凑在一起只能弄成一个不大可能的和相互矛盾的“阴谋家”大杂烩；审判案的设计者一定

感到，需要有一个象特·科斯托夫或拉伊克这样大的人物来充当这班人马的头子，作审判案的首犯。为什么选中斯兰斯基，而不是哥特瓦尔德或萨波托斯基来作对象，仍然是件众人猜测不定的事。阿·朗登在他的书中回忆说，他在狱中的提审员在一九五一年里一再告诉他，党“需要一次审判”，而且清楚地表示尚未作出决定如何来组织它。朗登给人印象深刻的叙述表明，直到当年十一月安全“工作人员”还在无数的囚犯当中从各个方面寻找证据，好象一个人在黑暗中寻找正确的足迹一样。回顾一下朗登同萨麦茨的谈话也是有益的，这位捷克安全人员一九四八年曾同苏联国家安全部人员一起工作过。他谈到苏联“顾问”命令他把所有审讯简报交给他们，甚至在文件已经送给了党的总书记、即斯兰斯基的情况下也必须如此。而重要的是萨麦茨也曾告诉朗登，苏联国家安全部专家“收集所有人的黑材料……包括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在内。”

斯兰斯基最后被挑选出来作审判案中的明星，可能由于他是犹太人。在政府上层的早期逮捕中主要是集中在犹太人身上，而斯大林本人又不断地为犹太人问题所萦绕。这一点可能是个决定性因素。

也许事情就是那样，反正鲁·斯兰斯基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被捕了。四天后一份官方公报告诉人民，“最近查明了过去未曾掌握的情况，鲁·斯兰斯基犯有积极的叛国活动罪”，因此为了“侦查目的”把

他拘押了。

哥特瓦尔德从未解释过这些“过去未曾掌握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突然出现的。如果不说数百名，那么至少有几十名重要人犯被审讯了将近一年。从当时情况看，斯兰斯基的“罪证”不大可能是在十一月中和十一月底这十几天里突然具体化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哥特瓦尔德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宣布：“新查明的情况”证实斯兰斯基“在反党反国家的阴谋集团中起领导作用。”一夜之间斯兰斯基就变成了“铁托分子”和“叛徒”。

为了揭露斯兰斯基在“阴谋集团”中的“领导”作用，捷共邀请了过去从未请过的大量客人到赫拉德强尼城堡的悬挂着华丽的吊灯的西班牙大厅里来列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宣布撤销斯兰斯基的一切官方职务和开除出党后，哥特瓦尔德就开始宣读控告书。控告书称，被开除了的总书记“有意识地支持敌对和犯罪集团的一切颠覆活动”并“曾试图背着总理另建立一个特别的党的中心”。为了把斯兰斯基同早些时候被清洗的人联系在一起，哥特瓦尔德说，“在调查各种被捕的地下集团的过程中，很清楚地查明，斯兰斯基是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阴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反党反国家阴谋的领导成员。”在指控的最后，哥特瓦尔德还补充说，“西方帝国主义特务机关计划让斯兰斯基逃往西方，我们已掌握了它们的计划和確凿的证据”。

捷克斯洛伐克示众大审判的舞台现在搭好了。

尽管克里姆林宫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一个阴谋集团案”已花费了三年时间，但为了使审判案胜利完成还得需要一年时间。监狱里关着几千名犯人，为了把那些互不相干的“铁托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间谍”的分子拼凑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案件，布拉格的检察官和审讯“工作人员”为此还得对自己的工作成果进行一番剪裁和加工。这样复杂的任务甚至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案苏联的检察官都未遇到过。如果照这些指控的票面价值来看，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说，只有某种奇迹才使共产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免于早就陷入背叛的深渊和毫无抵抗地落入恶意的西方以及铁托手中。

既然有这些隐藏很深的颠覆活动存在，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还能成功地保持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呢？对此布拉格领导有一种解释。它不仅对了解一九五一年的历史、而且对了解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即斯兰斯基审判案结束三周后国防部长切皮奇卡向捷共全国代表会议发表的讲话中可以找到这一解释：

基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苏军在这次战争中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比以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者认为，如果要进攻苏联，就象希特勒进攻苏联那样，其结果对他们

来说只能是一场灾难。因此，他们从许多方面，准备了好几手来策划对苏联的进攻，以便在发生各种情况时都能得到保证。

根据他们准备的一种可能，苏联的近邻捷克斯洛伐克被看作是进攻苏联的一个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一九四五年以后西方帝国主义者亲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共和哥特瓦尔德同志领导下的人民，绝不会自愿成为这些纵火行为和计划的忠顺执行者。因此他们想借助于一个卑鄙的、背叛性的第五纵队来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美帝国主义者认为，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在外表上和形式上继续属于和平阵营，继续是苏联的一个正式的盟国，一直到发动进攻前的最后一分钟为止，那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

在对帝国主义有利的时刻，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五纵队就会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开辟一个战场。到打起来，他们就会把一把匕首插到苏联的背上；他们打算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打算把它的最高司令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用暴力排除掉。很清楚如果象南斯拉夫的铁托及其匪帮那样提前暴露，这个第五纵队就不可能实现其计划。

因此他们特别注意掩盖军队中敌人的第五纵队的破坏活动，采取一切办法避免暴露。只有在叛徒和破坏分子提前暴露的极端不利情况下，他们才会考虑使用我国的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来干涉，采取象在南斯拉夫那样的办法用武力接管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

帝国主义者从托洛茨基破坏分子同苏联的斗争中遭受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在对军队的破坏活动中选择了最复杂和最阴险的形式。根据这些指示，叛国阴谋集团的所有

成员甚至把对党的最微小的不同意都隐藏起来。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代理人斯兰斯基、雷岑及其同伙表面上宣布他们忠实于革命事业，鼓吹按苏联的榜样办。实际上他们做的则是另一套。

阴谋集团的破坏活动受到千方百计的保护不使其暴露。党和国家机器的一切线索都掌握在斯兰斯基的手中，所以在美帝国主义的指示下，斯兰斯基能够阻挠暴露破坏活动的一切努力。在一九四八年五、六月之前，贝奈斯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有可能阻挠暴露自己和改正偏差的一切努力，他对军队中的阴谋活动伸出了强有力的保护之手。毫不奇怪，叛徒和阴谋分子感到他们十分安全，以为走向最后目的道路对他们是畅通的。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哥特瓦尔德同志的工人铁拳以雷霆万钧之势击中了这些叛徒……

一九五〇年秋季哥特瓦尔德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决定对军队上层领导进行改组，这个决定改变了到那时为止存在的情况，对敌人的背叛性计划给予了粉碎性打击。

一九五〇年秋季逮捕什林之后不久，哥特瓦尔德同志根据特有的事实就得出结论：当时所暴露出来的敌对活动带有铁托背叛的所有标志，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斯兰斯基是这一危险的主要代表人物；哥特瓦尔德同志当即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克服这一危险。指望得到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支持的叛徒斯兰斯基甚至在什林被捕之后也并不认为他的罪恶行径已经注定要完蛋了。他使用了何等虚伪的手法试图避免别人对他的怀疑，把主要罪行都推到什维尔莫娃、什林和其他人身上，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最后在事

实面前，他被迫承认了自己的背叛行为，包括他在军队中搞的阴谋。他为自己的背叛付出了代价……

如果我们不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最亲密和最好的朋友——斯大林同志那里得到帮助，要消除损失和在短短的两年内迅速增强我国的防御能力是不可能的。

无论谁读了这篇讲话都会感到，它同从布拉格之春的废墟上发出的讲话和文章有何等可怕的相似之处。切皮奇卡费劲编造出的论据即：斯兰斯基及其一伙在他们悲惨地垮台之前，为了有利于他们第五纵队的活动一直试图保持一种印象，仿佛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亲莫斯科的领导人在影射攻击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及其同伴时，以惊人相似的措词重复了这一论据。

过了近二十年之后，往事仿佛又重演了，不仅调子相同，而且措词几乎都是一样的。扬·佩尔纳日，这位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之后代替帕维尔任内务部长的人发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红色权利报》上的一次对记者谈话中说：

在一九六八年这一年之中，在国外敌视社会主义的人的支持下积极活动的内部势力……对国家机构，军队和警察，展开了集中的攻击……这些攻击的目标就是使警察解体，失去行动能力……他们注意的中心是军队和公安机关中的局势。他们估计，只要军队、公安机关和国家行政组

织一瓦解，他们就可以通行无阻了……

内务部已经获得了一些证明西方特务机关计划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如果我们把这些计划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具体活动加以对照，我们就发现他们几乎是一致的。

当然在一九五二年，清洗得到审讯人员从他们的牺牲品那里取得定案"供词"的本领对清洗大有助益。从斯兰斯基被捕到对他的开庭审判的一年中，苏联国家安全部指导下的工作人员搜集和整理了几百名犯人的"供词"。这一年的工作不仅在施加心理压力的现代方法方面，特别是在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牺牲人的尊严和对客观真理的理性认识方面都提供了不寻常的范例。

从幸存者的无数叙述来看，审讯人员之所以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供词"，不仅由于他们使用了刑讯折磨和威胁，而且也应归功于他们无限的耐性和精明能干。阿·朗登在他的书中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坐牢期间曾经被搞到这种程度，他会证明他一岁的儿子也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有人问他的话，在许多情况下，被判刑的人是如此深信自己的"罪行"，甚至后来在恢复名誉过程中他们被宣布无罪时，他们真的感到震惊。朗登也曾令人寒心的谈到，他的妻子，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个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的妇女，曾写信给在狱中的丈夫说，

如果他背叛党的罪名在法庭得到证实的话，她就不可能继续作他的妻子。直到她最后相信了审判是诬陷时，朗登夫人才认为有可能同她的丈夫恢复感情。

审讯“工作人员”中的知名人物有鲁津监狱的监狱长杜贝克少校和科霍乌特克大尉，此人战前是俄斯特拉发反共警察队的一名成员。他们同科普日瓦和苏国家安全部人员密切合作。

在为审判工作做最后准备时，这些审讯“工作人员”就越出了个别人的“供认”罪行的范围，进而人为地罗织了一张巨大罪证网，其中每一个人几乎都控告其他人犯有共谋罪。比方说，斯兰斯基证实他把“铁托分子”和“叛徒”安插到党的、军队的和政府的要害部门。克列门蒂斯、朗登、海杜和其他人被利用来在外交部证实这件事，而帕维尔、扎沃茨基和什瓦布被利用来在国家安全部证实这件事。在这种互相牵连致罪的制度下，一名前西班牙志愿军就会承认，在西班牙共和国失败之后他跟别人一起在法国集中营作了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朗登和帕维尔“承认”，他们领导了一个西班牙内战老战士的秘密组织，而这个组织又通过诺·菲尔德同“铁托分子”和美国情报组织保持联系。最真纯的个人关系这样就变成了阴谋活动。几位前“西班牙内战老战士”，包括帕维尔、朗登和扎沃茨基在内，曾经同做过国际纵队总监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路·隆哥在布拉格一起吃过一顿饭，审判案的“证据”使它变成了一个“铁

托主义的阴谋活动”。被告的犹太人也愿意把“叛国”阴谋活动同“犹太复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把自己和别人都牵连进去。交叉控告这种制度的优点是，在公开的法庭上立刻与同案犯当面对质就没有人能够否认自己签字的“供词”。最后在精心罗织“供词”的这个古怪的世界里整个事情就变得梦魇一般似乎是可能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庞克拉茨监狱举行的示众大审判的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在十四名被告和三十三名证人——他们都是经过安全“工作人员”完美无缺地训练和排演过的——都“供认”了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之后，检察长约瑟夫·乌尔伐列克在总结发言中就能这样胜利地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根据只有检察官们知道的理由，几百名主要罪犯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组分别进行审判，也不清楚他们是按什么标准分的。但主要审判案是斯兰斯基和他的十三名同案犯——十四人中十二人是犹太人。）象十四人中的一员——朗登后来所写的，整个演出没有露出一点“马脚”，演员和舞台布景都调度得好极了。也许这些案件中最具卡夫卡特色的是，受审人员想在法庭上看到审讯他们的“工作人员”称赞他们的表现，就象孩子们渴望得到严格要求的父母或老师的称赞一样。

在同一天，在所有的人都正式地认罪之后，判决宣布了。十一名被告被判处死刑，三名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死刑的有：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贝·盖明德，党

中央国际关系部前部长；卢·弗雷卡，前总统府经济司司长；约·弗兰克，前党中央副总书记；贝·雷岑将军，前国防部副部长；卡·什瓦布，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鲁·马尔戈留斯，前外贸部副部长；奥·费舍尔，前财政部副部长；奥·什林和安·西蒙，红色权利报前编辑。

判处无期徒刑的有：朗登；瓦·海杜，前副外长；还有前外贸部副部长埃·洛布尔，他是早两年被捕的。

象检察长乌尔伐列克所说，这一审判案在捷克斯洛伐克意味着摧毁了象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阿尔巴尼亚的佐治……罗马尼亚的巴特勒什卡努，……波兰的哥穆尔卡那样的"叛徒集团"。在这种措词下，他们的罪行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宽大处理。因此哥特瓦尔德总统就拒绝了他们的申诉。除斯兰斯基外，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在十二月三日被绞死前都向哥特瓦尔德写信宣称他们无罪并告诉他，他们"承认"仅仅"是为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斯兰斯基审判案的结局就被告从"社会主义法治"所受到的待遇来说似乎是使人望而生畏的。一九六八年布拉格的自由派周刊《报道》写道：

当十一名被判死刑的人被处决后，工作人員D碰巧在鲁津监狱见到了（苏联）顾问加尔金。当时在场的有司机和两名負责处理骨灰的工作人員。他们说他们已把他们

装进了一个土豆口袋，他们来到布拉格郊区是想把骨灰撒到田野里。看到冰封的路面，他们又想把骨灰撒在冰上。司机笑着说，他从来没有在他的塔特拉车上同时运送过十四个人，三名活人和十一名装在口袋里的人。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消灭斯兰斯基集团之后，至少还有六十人因与这个叛国阴谋集团有牵连而受到审讯，还有不知道几千人含含糊糊有一点理由就被捕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等待审判或释放已等了长达三年之久。现在当局面临着处理所有这些案件。这项责任交给了卡·巴契列克这一位“内圈”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他当了一个短时期的新建立的国家监察部的部长之后，一九五二年六月代替科普日瓦任国家安全部长。一九五三年二月他还当了副总理。在他当捷克斯洛伐克警察头子期间，有三十五名他的斯洛伐克同胞——一九四四年由威·津戈尔率领的一个共产党游击队小组——一九五一年被布拉迪斯拉发法庭以“背叛”和“反国家活动”罪判处徒刑，他们的刑期加起来共达二百三十年之多。

就在这时候在莫斯科发生了一件事，它不可避免地要使共产主义的历史改写，推动一场新的竞争和权力斗争，同时，在苏联和东欧掀起一股强大的希望之流，希望专制主义总有一天要完蛋，某种类似自由的东西要开始兴盛起来。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晚七十三岁的约瑟夫·斯大林的逝世。他患“脑溢血症”失去知觉和

说话能力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

虽然斯大林已经死了，哥特瓦尔德从参加他导师的莫斯科葬礼回来后不到三周也随之进了坟墓，但是巴契列克还在为未了的案件工作。斯大林的去世后处决了贝利亚，和苏联的突然“解冻”，使数以千计的囚犯从西伯利亚的监牢中源源不断地归来，尽管如此，恐怖之夜仍然笼罩着捷克斯洛伐克。改组后的布拉格领导跟从前一样是斯大林主义者，权力现在掌握在继哥特瓦尔德之后任总统的安托宁·萨波托斯基，总理西罗基和代替斯兰斯基任总书记的安托宁·诺沃提尼，以及国防部长切皮奇卡、副总理和公安头子巴契列克、副总理杜兰斯基和宣传头子柯别茨基等人手中。这是一个紧密结合的集团组成的政治局，它是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去世而停止清洗的。这个国家依然同西方文化影响隔绝，演奏爵士乐是犯法行为。有位美国外交官，他是一名第一流单簧管演奏家，在冒风险的秘密爵士音乐会上偷偷教年轻的捷克人爵士乐。

这时巴契列克出了个主意，把这些重要罪犯分成七个组来分别进行审判：即经济学家，托洛茨基分子，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安全官员，军官，外交官和包括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威·诺维在内的杂类。政治局批准了巴契列克的计划，审判机器又开动起来了。

第一批要审判的是外交官，他们的案件于一九五三

年五月开审了。被判刑的人中包括戈尔德斯图克（无期徒刑）和杜费克。总共有三百五十名外交人员被解职或被判处徒刑。接着是安全人员组，约·帕维尔以“西方间谍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人们认为他是捷克斯洛伐克清洗历史中遭到最残酷刑讯的一个人。他的同事瓦列什被判二十二年徒刑。在军官中间，斯姆尔科夫斯基被判处八年徒刑；随着斯沃博达一九五〇年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而被赶出总参谋部的德尔加奇将军在春末夏初也被判了刑。斯沃博达本人在收到伪造的“斯大林电报”之后从一九五一年起一直关在监狱里，但从未真正审讯过。负责党和军队之间联络的赫罗马特科和安·斯沃博达分别被判处十二年和十五年徒刑。

部分由于清洗所产生的恐惧和紧张气氛，部分由于抗议币制改革（它强使捷克斯洛伐克人用五十旧克朗换一个新克朗），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突然在比尔森爆发了一场工人反抗。波希米亚西部的工业城市比尔森是斯柯达大汽车工厂所在地，是使比尔森啤酒闻名于世的古老啤酒厂也在这里。但比尔森也是一九四五年五月美军解放过的城市，它的人民比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更西方化。

在这次自战争结束以来首次公开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抗中，斯柯达工厂数百名工人在那个星期一的早晨用重型卡车猛撞大门，冲出了工厂，随即同工厂的民兵展

开了追逐战。一个目击者报告说，一名民兵向一位妇女开枪，愤怒的群众把他踩死了。这个工厂约五千名工人游行到市政厅，抗议币制改革，高喊：“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掠夺！”

在市政厅，比尔森市长约·迈因策尔走到窗户口去安抚群众，但气氛变得越来越恶劣。他向他们说，“工人同志们”，“你们有一位工人总统……你们的政府是支持劳动和工人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工人们的利益”。但工人们变得不耐烦了。发出了“呸！可耻！”的叫喊声。接着他们开始呼喊：“我们要求一个新政府……我们要求自由选举！”接着，砖头石块投向了市政厅，工人们高唱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窗子被打破，工人们开始爬进市政厅。一位工人抢过迈因策尔讲话的话筒，高喊：“我们要求自由选举！”“我们一定要搞掉共产党恶棍！”下面的群众响应着又喊道：“我们要求自由选举！”与此同时，冲进室内的工人把斯大林、马林科夫、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的半身像扔出窗外。他们还扔出苏联国旗和各种文件，群众放火烧了它们。成功的狂热控制着群众。“我们已经推翻了政府！”人们喊着。“自由又回来了！”在这种古怪情绪下，谣言都被当作真事，工人们互相转告说，在布拉格和斯洛伐克也爆发了同样的示威游行。接着一个拿着麦克风的人说，比尔森需要支援。

比尔森确实需要支援，因为它是孤立的。两辆卡车

把上着刺刀的士兵运进了广场。跟着来的是整车的警察。但是公安部队不愿去对付群众，他们持消极态度。群众决定游行到比尔森监狱去解放犯人。他们洗劫了法院。他们又把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半身像扔出窗外，烧毁文件。一辆警车被他们俘获，他们在车上插起一面大的美国国旗，这时爆发出了一阵掌声。一队工人游行队伍向解放比尔森的美军烈士纪念碑走去。另一群人去向早就被拆除了的托马斯·马萨里克塑像的旧址走去。一个写着苏联万岁的标语牌被烧掉了。在市政厅广场，不知谁画了一张贝奈斯的巨幅画像，放在市政厅的一个窗户上。

中午群众开始散开了。许多示威者回家吃饭。趁他们不在的时候，边防部队占据了广场，士兵们把它封锁起来了，肩并肩地站成两行。但下午群众又聚集起来了。当斯柯达工厂的下午下班的工人加入了示威队伍时，群众同部队互相拥挤，打了起来。有一个工人用装着石块的皮包打警察。一辆救火车开来，在广场上接上水龙带，开始向群众喷起水来。但有个工人用一把快刀把水管切断了。示威群众同边防部队与警察间出现了短暂的僵持局面。随后从布拉格调来的军队——运步兵的卡车、摩托车、坦克和大炮开始在广场上集合。一辆坦克转动了起来，炮口指向群众。示威群众开始后退，象一位目击者议论的那样，“你不能赤手空拳地去同坦克斗。”便衣警察开始抓人。不到天黑广场上除了军队之

外就空无一人了，这些军队以后占领广场达一周之久。

第二天国家公安人员就在比尔森四处搜查，查问哪些工厂和商店的职工星期一没有上班，这些人就有参加骚动的嫌疑。那些未能解释缺勤理由的人被迅速地解雇了。步队和民兵在城市里巡逻了一星期。在比尔森周围乡间，增援部队一直处于戒备状态，一旦需要就可开进城内。接着就开始了逮捕。公安人员抓了不少六月一日的示威者，装满了比尔森的所有监狱。

这就是六月叛乱的结局，但斯大林的逝世在共产主义帝国的一潭死水里掀起的波浪仍在扩大。一周以后在苏联集团控制的地区里又发生了一次起义。

六月十三日东柏林的青年起来反对俄国人，用石头和铁锤同苏联坦克光荣地战斗了一整天。这是铁板一块似的苏联集团中出现的第二次骚乱信号。但在捷克斯洛伐克，由于第一个信号是在比尔森发出的，柏林事件必然会导致更加紧控制和更严酷的恐怖。

九月巴契列克辞去了国家安全部部长职务——这个部被撤消了——回到斯洛伐克去从西罗基手中接受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工作，而西罗基则集中精力于总理工作。警察任务由迅速提升的年轻共产党员新任内务部长鲁·巴拉克接管了。这时清洗机器仍在自行运转着。迟至一九五四年三月还处决了奥·扎沃茨基，萨波托斯基总统拒绝为他减刑。

巴契列克到斯洛伐克加速了“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分子”的审判，而这些案子中的主要人物是古·胡萨克，他几乎已经蹲了三年监牢。在长期等待后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开庭审判，判处他无期徒刑。拉·霍尔多什（曾任文化国务秘书）被判处了十三年徒刑；诗人拉·诺沃麦斯基被判处十年徒刑。斯洛伐克党的中央委员会（那时杜布切克在这个机构里已工作了三年），据认为是批准了这些判决的。关于斯洛伐克被关押和判刑的人数虽无确切数字，但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这一年间，斯洛伐克法院收到了两千零十三起要求对清洗受害者恢复名誉的申诉。

数以千计的服刑的男女现在被分散在有很好安全设施的监狱里——象布拉格的庞克拉采和鲁津监狱，布拉迪斯拉发的列奥波尔多夫监狱——以及几十个矿井和国营农场中，在那里进行艰苦的劳动。成百上千的人在雅希莫夫和普日布拉姆铀矿里劳动，从残酷惩罚的意义上说，就如苏联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样。奇怪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是毫无希望地去到矿区和农场的，而那时的苏联囚犯在斯大林之死给他们国家带来希望的鼓舞下却开始在沃尔库达集中营骚动起来了。捷克斯洛伐克人还得再等待一年才能够感觉到预示黎明即将来临的第一股微风。

Ⅶ

捷克斯洛伐克的冬天仍未过去

斯大林刚一去世，非斯大林化运动就开始席卷共产主义世界，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年势头越来越大。早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贝利亚就宣布犹太“医生阴谋”案是诬陷。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斯大林已经解除了贝利亚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职务，由斯·迪·伊格纳捷夫来代替他；但那时贝利亚是副总理，又负责安全工作，他就开始进行私人报复。四月七日他命令逮捕伊格纳捷夫的得力助手米·柳明，并以“制造”医生冤案罪名处决了他。这一特殊的处决同捷克斯洛伐克有密切关系，因为柳明作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直接负责斯兰斯基审判案的准备工作，还负责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公安工作。

非斯大林化过程的第二阶段——同莫斯科的权力斗争同时进行——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正在成为苏联政治新头目的乌克兰领导人尼基塔·谢·赫鲁晓夫的压力下，贝利亚本人的被捕。贝利亚是在苏联党主席

团开会时被打死的，根据赫鲁晓夫同法国社会党议员皮·科曼的谈话，大概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许多被称为“贝利亚匪帮”的人被处决了，包括一个时期任贝利亚助手的维·阿巴科莫夫和两位策划和指挥拉伊克审判案和捷克斯洛伐克清洗的人，即利哈乔夫将军和他的助手马卡罗夫。

很清楚，克里姆林宫——和赫鲁晓夫，他是一九五三年九月正式成为苏共第一书记的——极力想摆脱斯大林的遗产，除别的事情外，已准备好要推翻“铁托阴谋”案及其血腥后果。随着莫斯科这一政策的改变和对“反铁托分子”行动负有责任的国家安全部人员的清除，匈牙利政府于一九五四年底撤消了拉伊克审判案所引以为据的对诺·菲尔德的一切控告，他在被监禁五年之后获释。（菲尔德是在苏联国家安全部指挥下由捷克斯洛伐克公安人员逮捕后引渡给匈牙利人的。）波兰当局多年来一直否认知道赫尔曼·菲尔德（诺埃尔的兄弟）的下落，这时突然把他从华沙监狱释放了。关于“铁托分子”的虚构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总是落后于共产主义总趋势一步，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一样——无视现实和历史，仍在沿着斯大林的道路沉重而缓慢的前进。诺沃提尼、萨波托斯基及其同事们显然对改革之风是感觉迟钝的。哥特瓦尔德死后对他的个人迷信仍在继续，虽然《红色权利报》已不再单调地把斯大林和他一起歌颂

了。对苏联"集体领导"的新概念，布拉格的头头们只是在口头上应付应付。一九五三年四日二十四日布拉格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教育法案，它骄傲地宣称，该法案"是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下"，"为培育新的一代社会主义社会骄傲而勇敢的建设者而起草的"。整个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机器仍在进行清洗和审判，一直继续进行到一九五四年，处决了前安全头子扎沃茨基，判处古·胡萨克无期徒刑。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萨波托斯基总统和党的头子诺沃提尼骄傲地为俯视布拉格和伏尔塔瓦河的位于列特纳山上的巨型斯大林塑像举行揭幕典礼。这已经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十个月了。如果说这一姿态是为了博得苏联新领导人对他们好感的话，那萨波托斯基和诺沃提尼就同赫鲁晓夫的想法很不协调了。诺沃提尼做的唯一的一件适应新情况的事就是在赫鲁晓夫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于一九五三年九月也给自己弄了个党的第一书记称号。但是诺沃提尼由于理解历史非常低能，终于有一天要付出自己的政治生命。

由于处决和监禁几乎全部摧毁了党的旧机器，萨波托斯基和诺沃提尼忙于提拔新的一代忠实追随者，以便将来继承他们的位子。由于胡萨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帕维尔和许多其他一度出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被保险地搞掉，投进了监狱，晋升之路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得多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无条件地忠实于党的路线和

一个驯服听命的机关干部所具有的本能。沿这样一条路爬上党的官梯的有希望的新人中就有年轻的斯洛伐克人亚·杜布切克和捷克人奥·切尔尼克（他比杜布切克大一个月）。一九五三年，已经是斯洛伐克党中央委员的杜布切克被任命为斯洛伐克主要城 市 之 一 班 斯 卡-比斯特里察的州委第一书记。而在一年以前，切尔尼克已被选为摩拉维亚北部大钢铁和煤矿城市俄斯特拉发州的州委书记。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一份官方简历说，“由于一九四八年他作为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清除非党分子的工作，当时就认为他政治上是可靠的。”考虑到一九四八年切尔尼克只有二十六岁，党龄还不到三年，这样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当杜布切克在党的阶梯上爬上新的一级时，斯沃博达将军被偷偷地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斯大林下令纠正一个冤案而布拉格领导拖延许久才加以执行的唯一事例。由于老总统不愿谈这件事，手头又无材料可查，关于斯沃博达被监禁的细节，以至于确切时间至今仍弄不清楚。但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接见布拉格新闻记者时斯沃博达谈到，由于接到莫斯科一封伪造的电报说“斯大林不信任斯沃博达”而被囚禁了一年多一点时间之后，他是怎样被释放的，下面就是他谈的令人惊讶的情节：

“他们把我关起来，我就蹲在鲁津监狱。我想大概是一九五二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为哥特瓦尔德同志举行了一次宴会。我的女婿是大使馆的秘书，我女儿那时正在莫斯科上学。就象在所有宴会和庆祝会上经常出现的那样，那次宴会上也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干杯。就在这时苏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突然举杯说，‘我为斯沃博达将军的健康干杯。’我们大使馆里的人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已经在监狱里蹲了好长时间。因此干杯之后大家沉默不语。然后有一个人打破了沉默，说明了我的处境。科兹洛夫斯基叫我女儿打电话到布拉格，告诉我夫人说，苏联人相信我，斯沃博达是无辜的。斯大林向布拉格发了一封电报：‘请释放斯沃博达将军。’我是在监狱里得知莫斯科这些讨论情况的。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的妻子告诉我，苏联同志信任我时，我会有什么感想，虽然当时我是一名囚犯。

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出狱是容易的，那就错了。卡·巴契列克到监狱来看我，向我转达哥特瓦尔德的问候，并告诉我，我的囚禁多多少少是出于误会。于是我就问巴契列克，‘我为什么要呆在这里？’他回答说‘我们怕你逃跑，怕你自杀’。

可以理解，我是不喜欢这些遁词，于是我就很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说我有什么罪的话，那么巴契列克、萨波托斯基，还有哥特瓦尔德也应该跟我一起坐牢。

巴契列克接着问了我六个问题，想知道我是如何工作和跟谁一起工作的，然后就走了。大约一周之后，他们放我出了鲁津监狱。真的，是斯大林间接救了我的命，而你

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软心肠的人。我要说，'在监狱里他们对待我是相当不错的。'"

尽管被释放了，斯沃博达的完全恢复名誉"仍然花了很长时间"。访问他的记者评论说，"将军从监狱被释放后，人们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仍然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找到了一个职业，在一个合作社里工作。"

斯沃博达的职业是在特热比奇农业合作社当会计。要不是赫鲁晓夫一九五四年六月到布拉格出席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问及他的话，他也许会呆在那里一直到死。战时在乌克兰前线他们互相认识，赫鲁晓夫提出要见这位将军。尴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马上把他从特热比奇接了回来，（他在那个合作社里呆了一年多）；就如布拉格记者所评述的，这"就帮助将军又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于是他获得了他的权利。"

让斯沃博达公开露面仍然使布拉格领导人感到不安。党代表大会刚结束，诺沃提尼就告诉他，"你可以回忆回忆杜克拉战役的往事，但我们不准备公布你已经恢复了名誉。"诺沃提尼明显不满苏联为斯沃博达而施加的压力，很生气地拒绝在政府里给他安插个工作，说"他只能使问题复杂化。"捷共似乎是厌恶释放、恢复名誉和使牺牲者恢复权力的想法——尽管在许多东欧国家这种情况正在出现——作为一种妥协，最后同意在一九五四年十月把斯沃博达选入国民议会。但两个月后将

军被提升到议会主席团。

到国民议会后斯沃博达发现兹·费林格已经当了一年多国民议会主席，他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年为党做的工作终于得到了报赏。（一九五四年费林格又增加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职务——捷共政治局委员。）这是斯沃博达和费林格第二次相逢——第一次是老将军在一九四五年的费林格联合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最后他俩还在一九六八年梦魇似的戏剧性环境中第三次相逢。

一九五三年斯沃博达的被释是侥幸和例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捷共中最顽固地反对重新看待审判案的人也不得不动摇了。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于一九五四年五月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捷共有了自主权。

比方说到了十月，一位不知姓名的军事检察官到列奥波尔多夫监狱会见阿·朗登，向他询问关于约·帕维尔的案件。这是布拉格政权机构中有人产生怀疑的第一个有案可查的例子。朗登告诉这位检察官说，不仅对帕维尔的控告是捏造的，而且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审判案都是冤案假案。朗登在书中回忆说，当时这位官员变得脸色"苍白"，答应向他的上级报告这一谈话。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又杳无音信。回头路是漫长和迟缓的。

但在一九五五年初，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来逐渐放松警察恐怖并为仍有几万人还关在国家的

监牢里，这种越来越难办的情况寻找某种出路。这就是在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四十五岁的克·伊内曼领导，他是一位有争议的老党员，战争时期他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后来在党中央任部长，他的政治生活在以后的年代里发生了怪异的变化。

伊内曼很明显是在内务部长巴拉克的直接控制下领导他的四人委员会的。有理由相信，巴拉克——他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越过老的和更有声望的领导人被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是这次审查的背后推动力量，这标志着第一次严肃地复查一九五一——一九五四年的审判案件，而萨波托斯基和诺沃提尼对接受这一点是极为勉强的。巴拉克究竟是一位成长中的进步分子，或仅仅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这还是一件人们猜测不定的事。除了少数著名和诚实人之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忠诚和观点多年来被动摇得太厉害了，要作出公正和准确的历史判断真是难上加难。随着似乎是进步而来的常常是退步(反之亦然)，结果，即使一个人不想使用机会主义这个词，想用合乎逻辑的或直线的成熟过程来看待他们中多数人的政治生涯是几乎不可能的。

就以巴拉克这个具体例子来说（这件事后来变得相当重要），在这个特别的节骨眼上，党的强硬路线的领导竟把这样大的权随心所欲地交给一个人，实在是令人惊讶。一方面人们可以争辩说，困惑的领导需要有一位

象巴拉克这种类型的第一线人物。但在另一方面，后来的事变表明，诺沃提尼并不是一位世界上最好的知人善任之士，不是一位政治斗争的能手。而共产主义世界形势发展之快也使布拉格领导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在匈牙利政府一九五五年春给拉伊克完全恢复名誉和赫鲁晓夫去贝尔格莱德同铁托言归于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坚持把数千名以"铁托分子"罪名判处的人关在监狱里是站不住脚了，若不说它是绝顶荒谬的话。

克·伊内曼的作用比起巴拉克来甚至争议更大。一九五五年五月伊内曼和他的委员会约见了朗登，问起帕维尔和奥·瓦列什案件的背景——这是继那位军事检察官七个月前询问之后的第一次的继续追问——而伊内曼得到的印象肯定是好的。伊内曼告诉朗登说，他的案子还不能着手去办，因为他是跟斯兰斯基集团一起被审判的。但在这次和以后的访问中，伊内曼显得非常关心任何一个揭露审判非法性的证据。他一再警告朗登和其他人要当心国家安全机构，其理由是，他们要苦斗到底来阻挠揭穿他们编造的"证据"。但另外几种说法认为伊内曼是诺沃提尼的秘密情报员，倾向于阻挠为清洗受害者恢复名誉。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八年期间他任国家出版局局长。随着布拉格之春的兴起他丢掉了这个职位。苏联入侵后，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亲苏保守派，同极端反动的党的死硬派勾搭在一起。在一九六九年杜布切克被赶下台之后，他在《红色权利报》上激烈谴责共产党的进

步新闻记者。事情也可能是这样：作为党的巨大机器中的一个几乎未受到历史注意的小人物，他反对五十年代的冤案，但他不可能同他成年生活大部分时间受其熏陶的共产党的正统思想决裂。

不管情况是不是这样，一九五五年对上层领导施加的压力以及巴拉克、伊内曼等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九五五年年中，杜贝克少校和科霍乌特克大尉这两位鲁津监狱关键性的“工作人员”和在清洗审判中许多“证据”的编造者被捕入狱。几个月之前，他们从前的领导，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头子被处决了。

在监狱中，犯人的待遇有了惊人的改善。负责监狱工作的内务部副部长英·科塔尔（他本人也是一名前纳粹集中营囚犯），一九五五年夏天决心去列奥波尔多夫监狱检查那里的生活情况。他在那里会见了帕维尔、瓦列什、洛布尔、朗登、海杜、戈尔德斯图克、霍尔多什、赫罗马特科和安·斯沃博达。他询问了他们的要求，向他们提供了好的牢房，象朗登所谈的，还自动提出送书给他们读。

一九五四年底朗登的妻子已有几次被允许去探监，当时她已不再认为他犯有“背叛”党的罪了。他通过她把写在小纸页上的记述一九五二年事件的稿子偷运了出来。朗登夫人利用这些材料去向那些态度越来越友好的党的高级官员反复要求复查他丈夫的案子。一九五五年十月，朗登由于患肺病，被转送到普列什的疗养院。党

仍坚持要保密，但是很清楚，他的恢复名誉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一个月以后，斯姆尔科夫斯基、帕维尔、瓦列什和其他几个人被释放了，党的调查人员确认他们是被诬陷的。他们坐了四年牢。一九五六年二月二日朗登被正式平反了——他是斯兰斯基案件中第一个恢复名誉的被告——恢复了自由。他在狱中几乎呆了整整五年。仅在一年之前，科霍乌特克还告诫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供词"，因为"你一定不要忘记，你是因犯严重叛国罪而被判刑的人，你必须记住你的地位"。现在他自由了，而科霍乌特克却在共产党司法系统的惊人变幻中进了监狱。但是还有一些人——其中包括胡萨克和洛布尔——还要坐很长时期的监牢，因为在改正错误时，党的机器转动得很慢。就象铁托在同赫鲁晓夫停战之后一九五五年七月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公开承认错误感到很为难，"因为死者已无法复活了"。

一九五五年底亚·杜布切克，这位忠诚而有培养前途党的工作人员接到通知，离开斯洛伐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他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党委书记职务，到莫斯科上苏共高级党校——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特殊标志。作为克里姆林宫的一名被保护人，他要在那里呆三年，而在这期间重大的事件将要震撼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Ⅷ

四处造反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科学理论原则上排除准确预测由感情激发起来的反抗何时和怎样从人们心里喷发出来。这种反抗是无法用决定论、经济发展趋势周期性的变化或辩证分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来估计出来的。因此，既不可能、确实也没有必要以任何程度的准确性来说，一九五六年的伟大反抗是在何时和怎样在东欧爆发出来的。

但确定不移的是，这一反抗是在诗人、作家、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哲学家的鼓舞下从青年中诞生的——正是对这类人共产主义正统派既无法理解、管辖，也不能接受。斯大林在世时，这种感情和思想就已存在，但被可怕的恐怖镇压和随之而来的破灭感所压抑。苏联的日丹诺夫，捷克斯洛伐克的柯别茨基和什托尔和波兰的雅·贝尔曼控制和滥用一切文化表现手段，强制推行他们“社会主义”审美观的极端平庸标准。斯大林的逝世成了一个里程碑和希望的象征，希望自由思想和创造将开

始复活。这种希望只是一种本能而不是一种认识，它缓慢地而又不可逆转地在东欧传播着，最终变成为一种可怕的革命力量。

我们已经知道，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捷克工人在比尔森举行了第一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六月十三日东柏林青年度过了袭击苏联坦克的光荣的一日。他们的反抗被迅速镇压了下去。在政治控制逐步缓和下来的同时，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才使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把他们的创造天才这个武器同政治行动联系起来。当然他们并不是在真空中行动，传统还是起作用的。在东欧，诗人们既可能是艺术家又可能是哲学家，但通常是革命家。如果没有诗人们起来反对三国联盟统治的斗争，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各族人民的春天”就不可能爆发。波兰的亚·密茨凯维支、波希米亚的扬·聂鲁达、罗马尼亚的博林廷奈亚努都是歌唱自由反对压迫的诗人，就象俄国的普希金一样。一九五六年也是这样，波兰有中年诗人亚·瓦齐克（共产党员）和年老的安·斯沃尼姆斯基（非党员）起来推动车轮转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有雅·赛弗尔特和弗·赫鲁宾，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在苏联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有叶·叶夫图申科和安·沃兹涅先斯基。

如果需要用个日子来表明东欧知识分子反抗开始最早的一天，那也许就是一九五五年的八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华沙的文学周刊《新文化》发表了瓦齐克的一首

辛辣的长诗《成年人之诗》。瓦齐克把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贡献出来使自己几乎变成了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桂冠诗人。突然间，他发表了这首诗，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他的祖国描写如下：

伟大的迁移建成一种新的工业，
波兰未曾有过，但历史上却曾有过。
它是靠空话过活，
纵然有说教，生活得却越来越野蛮，
在有毒的煤气中，在煎熬折磨中，
工人阶级被移民所同化。
很多被浪费掉了，如此之严重，剩下的只是残渣……

当抽象的秃鹰鉴别我们头脑的时候，
当学生被锁在不透光的教科书里，
当语言被简化为三十个咒语时，
当想象之灯枯竭的时候，
当月球上下来的人剥夺我们鉴赏力的时候，
那真正的忘却就将危险地来临。
是我丧失了观察的能力，还是有视而不见的天赋？
但我要留下一个简短的评论，新愁组成的诗句。……

他们跑向我们大嚷大叫，
共产党人永不会死亡。
还不曾有过不死的人。

只有纪念常在。

越辛劳的人就是越有价值的人。

他们跑向我们大喊大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斫破手指是不痛的。

他们斫破了自己的手指。

他们感到疼痛。

他们失去信仰……

我们在地球上要求这个：

为了辛勤劳动的人民，

为了开门的钥匙，

为了有窗户的房间，

为了没有寄生虫腐蚀过的墙壁，

为了对打小报告的仇恨，

为了神圣的人的时光，

为了能够安全地回家，

为了简单地区别言行。

我们就要求这个，为我们所知道的地球要求这个。

它不是靠赌博赢得的，为它百万人在战场上丧生，

为了一个清晰的真理，

为了自由的面包，

为了热情的理智。

我们每天都在要求这个。

我们向党要求这个。

向统治制度和当局的这一挑战，雅·贝尔曼当然不

会不注意，他是把波兰的文化沙皇和秘密警察头子的职务不协调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贝尔曼立即撤了帕维尔·霍夫曼《新文化》编辑的职务，并召开了一次波兰作家协会的特别会议把瓦齐克开除，这样将来就可以不许他公开发表东西。

自从一九四八年哥穆尔卡拒绝接受撤销他的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之后，这是波兰党要打的第一场公开的仗。作协不愿开除瓦齐克。霍夫曼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发言中说，“对于判断文学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为党服务的东西，什么是反党的东西的权利，贝尔曼同志想独自加以垄断。可是，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的知识比他更多，也有许多同志比他为党工作的时间更长，得的成绩也并不比他差。”

瓦齐克写的这首《成年人的诗》和霍夫曼为这首诗辩护的话代表了突然发展了理智独立感的共产党人提出的根本性挑战。这是对总是由党的机关控制思想和垄断政治的挑战，对党的纪律的反抗。这样一种挑战在以后的许多年中一直缠着东欧共产党的统治集团不放。作为制度内部产生的一种具有强烈爆炸性的东西，波兰知识分子的猛击对莫斯科来说要比铁托的“民族共产主义”不知危险多少倍。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对于瓦齐克呼求的清晰的真理……自由的面包……热情的理智必不可免地要由苏联坦克一九五六年在布达佩斯的切佩尔岛和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作出回答，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再

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作出回答。压倒一切的一点是清楚的：正统的共产主义一定要用机枪手来对付诗人，用坦克来对付思想。要是瓦齐克知道在苏军占领了布拉格之后苏联坦克的首批目标之一就是包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所在地，那么可能会给他一种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感觉。他的确是布拉格之春的精神教父。

在华沙，瓦齐克及其盟友在一九五五年夏秋期间同波共的斗争中获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当局在经济困难的困扰下和对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的非斯大林化进程迷惑不解的情绪下，采取了不急于同知识分子搞新的摊牌的方针。相反，为了争取主动，一度允许波兰新闻记者享有他们从未有过的某种新闻自由。大学生被允许把《直言》周刊办成战斗的自由派刊物，它一夜之间就享有盛名，显得非常突出。其他报纸和杂志也争先恐后地跟了上来，突然间波兰几乎有了自由的新闻制度的美好感觉传遍了全国。反抗一旦搞起来，就无法停留在原地。长期沉默的剧作家，小说家和电影工作者都发表了他们的创作。但是事情就象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使长夜昏睡的其余居民觉醒起来，特别是要使他们相信，除了他们对之有切身体会的“坏”的共产党人之外，还有“好”的共产党人。这一过程在波兰未能取得成果，因为别的地方发生了事情，而且党的进步派没有进行始终一贯的政治领导来利用这一次反抗。然而通向布拉格之春的道路毕竟是从华沙开始的。

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下一个为共产主义自由化而斗争的冲击，或至少似乎是这种斗争的冲击发生在莫斯科。

它的发起者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他用来消除对斯大林的记忆和个人崇拜的手段——以及消除苏联党机器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期内的许多建树的手段——就是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夜到二十五日凌晨向一千四百三十六名苏共二十大代表作的著名的秘密报告。

可能是出于要在苏联残酷的政治环境中一劳永逸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及认识到要想在复杂而变化着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苏联的共产主义必须纯洁自己和恢复活力这一系列原因，六十二岁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及其实践作了如此全面的控诉，以至于使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完全变了样：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搞“大规模镇压”，他的“迫害狂”，他的“独裁专制”，屠杀他最亲密的同事，制造清洗和审判案致使几十万人丧生；谴责他迷恋于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制造他战时“军事天才”的神话，实际上他是个懦夫，几乎使苏联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他同铁托灾难性的破裂，还列举了一长串的其他罪行、不法行为和错误。报告是如此之长，竟使赫鲁晓夫从深夜一直宣读到第二天天亮。

在作结论时，赫鲁晓夫定了一个调子，甚至在他被赶出领导地位，接替他的人逐步回到斯大林主义都不可

能根本改变这个基调。他说："我们必须坚决消除个人崇拜，一劳永逸地谴责和根除同马列主义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它同党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是不协调的，要不屈不挠地反对任何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这一实践复活的企图。"

他说，共产党"必须完全恢复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反对个人独断专行，滥用职权。必须彻底纠正作为个人崇拜消极影响结果而长期积累起来的违犯社会主义革命法制行为造成的种种罪恶。"

这个三万字的秘密报告以及三十件从党的机密档案中摘录出的附件是战后共产主义历史中最富有戏剧性和最重要的事件。它使苏联共产党人大为震惊，几天之内它的冲击波就传到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所造成的罪恶以及他宣布"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之后，共产党使用的老方法就永远不可能再用，尽管秘密报告的直接后果是在整个东欧造成了后来导致斯大林主义旧病复发的形势。赫鲁晓夫报告的影响在他自己对波兰和匈牙利暴力干涉和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两次事件之后仍然存在。特别值得听一听的是，布拉格之春的自由派几乎使用了跟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语言来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起来反对违犯"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而苏联的入侵可以看作是对赫鲁晓夫主义的背弃。而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九年六月在世界共产党会议上最后接受"在多样化中求统一"

的妥协只不过是对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戏剧性的二月之夜所确定下来的和预见到的共产主义特点的确认。

虽然赫鲁晓夫要求二十大代表保密，但要说赫鲁晓夫确实希望他的秘密报告能长期保密，那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要一千四百三十六人保守机密。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还下令准备了他秘密报告的译文供“外国共产党人之用。”短期内，大部分外国共产党都收到这个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向党员作了传达。在这种情况下，文件不可避免地会落到西方非共产党人手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一个东欧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它。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美国国务院用英文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报告。

秘密报告正好是东欧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需要的一种鼓舞，它鼓舞他们去争取一定法制和自由，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合乎民族尊严地处理本国事务。在捷克斯洛伐克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这是行动的号召。同华沙和布达佩斯一样，布拉格的报纸出于明显的理由没有刊登这个秘密报告，但是西方的广播电台，党组织的透露（在党内进行了讨论）和口头的传播使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都知道了。

不用说，象诺沃提尼及其同事们这样的人是不欢迎它的。赫鲁晓夫不但谴责了斯大林，通过批判这个亡灵谴责了使斯大林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永存下去的企图，而且他还公开破坏了从一九五一年起就成了捷现领导政

治基础的反铁托运动。诺沃提尼本人上升到党的上层地位，部分原因就是如官方描述的他在揭露斯兰斯基阴谋案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而赫鲁晓夫却在二十大讲清楚了整个反铁托的政策是荒谬的：

斯大林的任性不但表现在决定国家的内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处理苏联的国际关系方面。

党的七月中央全会仔细研究了同南斯拉夫发展成为冲突的理由。斯大林在这里起了不光彩的作用。南斯拉夫问题中没有通过同志式的党内的讨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并不存在重大理由来扩大“事态”；完全有可能来阻止同那个国家关系的破裂。这当然不是说，南斯拉夫领导人没有错误或者没有缺点。但是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极端夸大了，其结果就同一个友好国家断绝了关系。

我回忆起苏联和南斯拉夫间冲突开始被人为地煽动起来的那些日子。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我被请去见斯大林，他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一封信的副本问我，“你读过这个吗？”

未等我答复他就接着说，“我伸一伸小指头——铁托就要完蛋。他一定会垮台。”

我们为“伸一伸小指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句话反映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就是这样干的……

不管斯大林伸的是他的小手指头还是大指头，而且凡是他能使出的招数他都使了，铁托还是没有垮台。为什么？道理就是，在我们同南斯拉夫同志不和这件事上，铁托后面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作为后盾，这个民族在为自由和独立

而斗争中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他们支持了自己的领导人。

你们看斯大林的自大狂已到了何等地步。他完全丧失了现实感；他的怀疑和傲慢不仅在对苏联个别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同许多兄弟党和国家的关系上都表现了出来。

我们仔细审查了南斯拉夫的问题，并找出了适当的解决办法，这受到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人民的赞同，同样也受到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群众和所有进步人类的赞同。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关系是符合社会主义整个阵营的利益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但在秘密报告之前，对东欧共产党持强硬路线的统治者的压力就已经日益增强了。不过执政党——和他们的反对者——几乎都未料到赫鲁晓夫正在准备谴责斯大林。（肯定曾有过某种暗示，要对斯大林进行非神化。阿·米高扬，这位老独裁者的万能博士在二月初波共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讲话中竟然奇怪地未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只要仔细研究《真理报》就会发现，斯大林的神话正在迅速消失中。）而在布拉格，华沙和布达佩斯，日感焦虑不安的上层领导人已经开始对党内的日趋严重的骚动有所反应，尽管反应还很微弱，甚至那些头脑最闭塞的人也开始明白，某种形式的和解或妥协是必要的。斯大林逝世所引起的紧张以及在苏联的反应肯定迟早应该加以消除。

某种类似解冻的东西早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就在匈牙利出现了，拉科西和思想比他更自由化的总理伊·纳吉

同意释放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间谍”、“叛国”和“铁托主义”罪被监禁的卡达尔。关在瓦茨监狱的三年期间，他遭受到了特别残酷，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但现在拉伊克即将被昭雪，拉科西和纳吉认为，释放卡达尔是明智的，虽然在他出狱之后仍“被排除在考虑之外”达两年多之久。（需要注意的是，卡达尔在匈牙利被释放之日正是胡萨克和几十名其他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判处长期徒刑之时。布拉格的政治觉醒实在是个缓慢的过程。）

当瓦齐克在波兰轰动知识界不久之后，匈牙利的作家也开始动了起来。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广泛的，在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再次得到了证明，华沙和布达佩斯间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久·海伊等作家和著名的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蒂·德里公开起来反对苏联推行的文学必须忠诚于共产主义的教条——这里他所攻击的目标是日丹诺夫死后仍被苏联推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破烂货——和反对党的官僚们继续不断地干预文艺事业。在一份广为流传的备忘录中，德里抱怨“反民主的方法”使国家的文化生活陷于瘫痪。不久，匈作协执行委员会几名委员辞职以表示他们同意德里的观点。同波兰的情况类似，匈牙利的作协也站出来领导刚出现的这一反对现状的造反行动。

一九五六年四月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们继他们波兰

和匈牙利同行之后也跟上来了。他们乘捷共党内和国内感觉得出的日益增长的普遍不满的浪潮而起，不满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象萨波托斯基总统这样一位正统派的人物也不能不对此加以考虑。

在他对全国的新年祝词中，萨波托斯基开始消除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铁托主义妖雾，他辩解地说，这一切产生于“错误的情报和敌人的破坏活动。”他提出捷南关系应得到改善并承认两国关系“破裂后的宣传运动走得太远了。”

可是，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布拉格领导也没有敢轻率冒险地大搞恢复名誉。在捷共中央，一九五六年三月举行的全会上，诺沃提尼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要人们相信哥特瓦尔德并没有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反而谴责整个党围绕着业已去世的总统造成“虚假的”不可触犯的灵光。诺沃提尼也发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使“一些”司法和公安人员错误地认为，他们是“阶级斗争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可以搞“过火行为”和“独断专行”。巴拉克比诺沃提尼走得更远，他在中央全会上说，实际上是由于斯兰斯基本人的过错，才“非法地”让把铁托的名字同斯兰斯基联系在一起。根本不顾他的“供词”是逐字逐句被逼出来的，巴拉克轻率地宣布，斯兰斯基“欢迎对南斯拉夫领导同志错误控告所造成的气氛。”这种令人震惊的指责等于说斯兰斯基是故意自杀，甚至还将此事说成是他的自私的“反社会主义”的

行为。

只有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领导人才会堕落到发表这样荒唐的声明，这简直是对中央委员会最唯命是从的委员们的智力的一种侮辱。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中央全会证明党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由于急需一名替罪羊，诺沃提尼及其“集体领导”伙伴们就解除了阿·切皮奇卡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同时取消了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为什么决定牺牲这位近八年来属于清洗和镇压主要执行者之一的人，官方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不久前还向从帝国主义魔爪下把捷克斯洛伐克拯救出来的斯大林表示“感谢”的切皮奇卡是已故哥特瓦尔德的女婿这一点已经不再起作用了。）牺牲切皮奇卡这个据认为自己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力量”的人明显地是为了安抚正在兴起的国内批判运动和正在捷共党内酝酿的反抗。但这是徒劳的。

群众情绪非常之高涨，正是这时作家们起来向当局挑战了。这次反抗的讲坛就是一九五六年四月底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以前，由柯别茨基作为他的庞大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而于一九四九年组织起来的这个作家协会是当局的驯服工具。它的会员资格受到限制。作家要按党的路线当时所要求的去写，而报赏就是由柯别茨基控制的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对于象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有强大文学传统的国家，一九四九年以后经历了贫乏平庸的时期。那些拒绝

听从命令的人就只好去翻译外国作品或者去写足够逃脱书报检查的晦涩的诗作。

当作协代表大会四月二十三日在国民议会大厦举行的时候，党的领导还以为它只不过是另一次盖橡皮图章的行动。实际上，为了使作家们有好感，萨波托斯基总统亲自出席了会议，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告诉作家们说，“关于文学工作党不曾向作家下过指令，今后也不会下指令。”如果在一九四九年也许会安静无事地过去，但这已是一九五六年，作家们没有心思来听这种明显的谎言而不加批判。此外，他们心中有很多话要说，他们的心里话开始在控诉性的发言中迸发出来。在造反发言中，五十五岁的捷克最杰出的抒情诗人雅·赛弗尔特站起来要求从监狱中释放在大清洗期间被不公正地判刑的作家和其他公民。这位远在一九二九年就被开除出党的人激动地谈到他的被孤立和被监禁起来的同行。（其中一位就是拉·诺沃麦斯基，这位斯洛伐克诗人在被赶出作协之后因“有意识地宣传非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倾向”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在赛弗尔特发言之后，弗·赫鲁宾、米·弗洛里安、米·霍卢布等诗人和作家也起来控诉斯大林——哥特瓦尔德时代人们遭受的压力和侮辱，并详细地讲述了党是怎样迫使他们按照官方路线写作的。他们谈到保·雷曼其人，他是个苏台德区日耳曼人，既缺乏文学知识又未能很好掌握语言，柯别茨基却任命他来决定什么书

籍可以出版。造反的作家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准确而又带预言式的口号是："作家是民族的良心。"

统治当局起初由于完全出乎意料而不知所措，接着就开始反击了。它的许多领导人充分了解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意识到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危险。在四月二十八日的会议上，萨波托斯基指责赛弗尔特和赫鲁宾是"煽动者"，党的机器迫使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个宣言，承认捷共是"伟大革命变化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并感谢它的"正确和英明的建议"。在共产党的奇异心理世界里，一纸正式决议不管它多么虚假却比现实更有分量。党认为反抗已经被压了下去，于是就心安理得了，尽管赛弗尔特和赫鲁宾都被选入了作协的中央委员会。

但是作家代表大会并不是一切，捷克斯洛伐克还将有新的反抗出现。五月霍卢布、弗洛里安和其他几位作家开始编辑一份名叫《五月》的杂志，并在它的周围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五月"小组来讨论和推动他们的文学活动。别的青年知识分子仿效《五月》杂志的榜样，组织学习和朗诵小组，在会员家中聚会。被禁止的文学书籍得到阅读和流传。火花又逐渐地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生活中燃烧起来。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事业成功地摆脱了一些官方的思想影响，允许青年制片者和导演们发挥他们的想象力。阿·波列德尼雅克（一九六八年他成了一位胆略和信仰出众的人）一九五六年被任命为电影事

业的负责人之后宣布说，“党接受了相信电影工作者及其责任感的原则。”

下一步就轮到学生了。也是在那一年的五月里许多决议书送到政府，要求废除苏联专家帮助起草的一九五三年的教育法案，批评党控制下的高等教育制度整个来说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五年官方承认，大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在低年级时就被淘汰了，这就是教育制度不合理的一个证明。）中等教育也受到类似的批判，其原因是它没有为大学打好基础。

为党内分歧和不安定已忧心忡忡的捷共，更加不能再忍受这些了。作家们的反抗打击到党的思想和宣传工作的要害，而常常受到教授们的支持的，学生们的批评和要求则有导致丢掉整个一代人的危险。牺牲切皮奇卡是一回事，这么做是皆大欢喜，但容忍对党的智慧提出根本性怀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伪装的比较自由的假面具立即撕了下来，反击开始了。

首先柯别茨基亲自出马，在《红色权利报》上攻击说，学生们的批评“是要把我们的教育制度不仅拖回到一九五三年以前，一九四八年以前，而且甚至要拖回到第一共和国时代的状态。”诺沃提尼六月十一日在捷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谴责了“关于阶级利益调和与妥协的改良主义幻想……为资产阶级和反社会主义宣传要求自由的呼声……和那些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党的政策的批评的观点”，他指责有人企图在“自由”的借口下

把时钟拨回到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岁月，而且还想把这种观点“贩运”到党内来。象共产党人常表现的那样，他缺乏自我批评，而是揭露说，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开会讨论一个月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负责思想工作的一些干部“对马列主义的基础表示了很大怀疑。”他的含义似乎是，很多人错误地解释了赫鲁晓夫的报告，现在应该由布拉格的思想家来拨乱反正了。

当布拉格的领导人试图使蓓蕾初放的反对派沉默的时候，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已迅速发展到使他们感到惊恐不安的地步。不仅知识分子的反抗蓬勃高涨，而且反抗已扩大到实际政治领域中，而最糟糕的是，这两国的当局在压力下似乎在屈服退让。

在波兰，波·贝鲁特作为国家的总统和党的第一书记仍在管理这个国家。但自由化的压力迫使波共悄悄地在一九五四年释放了哥穆尔卡；这大体上与卡达尔在匈牙利恢复自由同时。但区别至少在于，哥穆尔卡从未被审讯和判刑，这使顾虑很多的释放显得容易些。三月十二日贝鲁特在访问苏联期间去世了，一夜之间哥穆尔卡变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人物，虽然当时他仍呆在家中默默无闻，而一位名叫爱德华·奥哈布的党的干部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仍然能从外面发挥着某种影响，就象戴高乐从政界自行退休后发挥的那种作用一样。换句话说，人人都知道，沉默寡言的哥穆尔卡会重

新掌权，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党和政府继把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审判期间的秘密警察头子斯·拉德凯维奇赶出政治局之后，五月六日又通过撤销雅·贝尔曼的职务来开始洗刷自己。从监狱中释放了三万人。斯彼哈尔斯基将军和克利什科被释放并恢复了党内职位。

在匈牙利，知识分子要求为伊·纳吉恢复名誉的压力日益高涨。纳吉是一位比较进步的人士，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五年曾任总理，但以后就默默无闻了。当时党还没有充分准备好让纳吉恢复权力，但三月二十七日拉科西采取了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步骤。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他宣布，最近的调查使最高法院确信，拉伊克审判案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案件是建立在由加·彼得中将及其在匈牙利秘密警察中的同伙所"捏造的控告"之上的。按照拉科西的说法，秘密警察滥用了自己的权力。最高法院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复查一系列旧的案件和下令释放约三百名"无根据被判罪"的人。三周之后拉科西公开承认在他统治下所犯的"错误"。他在毁掉自己统治的政治地位方面——以及他的个人地位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匈牙利人可以自由地猜测他不久必将垮台。

在这种局势下事变在逐步升级，匈牙利知识分子受到鼓舞提出新的要求。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匈牙利作家协会及其出版物《文学杂志》。作家们不再局限于要求

文学自由，而是对制度展开了全面批判。在作家协会四月全体大会上，会员们以一百票对三票否决了党推荐的作协总书记候选人，选了一位非党员诗人当总书记。作协的新主席团包括了象帕·伊格诺杜什和拉·卡萨克这样的反对现制度的作家。

作家协会变成为对现制度不满和进行批判的中心，但不久它就有了兄弟组织。晚春时节，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劳动青年团中的年轻知识分子、作家、新闻记者和作曲家建立了裴多菲俱乐部——山道尔·裴多菲是匈牙利的一位抒情诗人，一八四九年被杀死在街垒上。他的十九世纪的信条完全合乎一九五六年情况："人民要是统治了诗，他们也就接近于在政治上进行统治。"裴多菲俱乐部就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着手组织经常的讨论会。甚至军官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些集会。很难令人相信的是，党的报纸《人民自由报》竟在六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把裴多菲俱乐部称作有价值的讲坛，建议匈牙利领导人参加它的辩论。一周前，这个俱乐部曾辩论过为拉伊克恢复名誉的问题，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向他的遗孀致敬。六月二十七日五千多人站在大街上通过麦克风听裴多菲俱乐部的一次辩论会，在这次辩论中首次公开提到了纳吉的问题。会议彻夜进行，变成了近似反对拉科西统治的一次骚乱。这时动乱已从布达佩斯扩大到农村，据一位匈牙利共产党作家说，农民坐车到农村书店花一百福林去买一份《文学报》，它在正

常情况下只卖一个福林。

所有这些活动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似乎是难以相信的。对布拉格的强硬路线领导人来说，匈牙利党不但在危害自己，也在危害这一地区的所有“人民民主国家”。

然后六月二十八日，一个暖和的星期四，波兰又采取了行动。与一九五三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在比尔森的反抗类似，波兹南的起义主要也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但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当时整个波兰处于反抗情绪之中。齐斯波冶金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但波兹南（这是波兰西部的一个城市）和华沙都无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工人派了一个三十人的代表团前去首都，警告机械工业部长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六月二十八日将举行罢工。罢工在共产党国家是不允许的，工人们被警告说，如果他们走上街头，将会遭到坦克镇压。

这一威胁的话被传回了波兹南，六月二十八日早晨齐斯波厂约一万六千名工人从工厂出发游行三英里来到市中心的自由广场。沿途又有其他工厂的几千男女工人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一边游行一边唱着古老的爱国歌曲和宗教歌曲。他们打着旗子，上面写着“要求面包和自由”。据目击者说，开始游行示威时有十万人参加。到了市政厅，那里没有官员们愿意或者准备接见工人们，有人传言，说去华沙的工人代表被捕了。于是有大批群

众拥到公安总局去同秘密警察对质。就象一九五三年在比尔森和柏林一样，这些波兰群众开始喊叫，“俄国佬滚回去！”

这时响起了枪声，警察向群众开了火。工人和青年们冲进民兵的武器库，武装自己，准备战斗。街上的车辆被推翻来当作街垒。现在真的成了一场革命。另一批群众去到监狱并立刻攻占了它。犯人被释放了，机密文件被烧毁了。当局召来了武装部队，但士兵们拒绝向人民开枪。有一种说法称，一辆坦克的坦克手们驾战车参加了造反的行列。

这天晚些时候，特别安全部队从华沙赶到波兹南。这些部队是完全忠于政府的，不象城防部队有地方观念。他们开来坦克和大炮，对准骚动的群众。在整个波兹南激战了两天。在反抗结束时，死了五十四人，受伤两千多人。到七月一日，骚动全部平息了。

波兹南事件震动了波兰，自从战争结束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波兰领导为不断加剧的暴乱吓住了，把它看作是范围更广大的问题的一部分。直率的波兰报纸也是这样看，发表的文章告诉全国说，波兹南起义是出于工人们的正当要求。

但这甚至对于间接帮助波兹南炸弹爆炸的赫鲁晓夫来说都已经过线了。七月二日莫斯科的官方声明把骚乱说成是“外国收买的挑衅者和破坏分子”挑动的。东德报纸谈到“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阴谋。不管赫鲁晓夫似

乎给了进步分子多么大的鼓励，现在苏联又回到了老一套；由于它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它就把这一点置于思想意识问题之上。这样一个不祥之兆匈牙利人本来是不应该忽视的。（难以令人置信的是，铁托竟加入了谴责的大合唱，他也说波兹南是“外国代理人”插手的。一切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都不能宽容对当局的这种挑战，铁托也不例外。）

在布拉格，诺沃提尼政权似乎对波兹南事件及其后果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这一事件证明了捷共的警告是正确的：放松控制只能导致“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活动。由于自由化浪潮在波兰不顾苏联的告诫继续高涨，布拉格的反应好象波兰成了敌人，而不是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波边界被封锁了起来以阻止“颠覆”的瘟疫渗入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广播受到干扰——好象它们是BBC、美国之音或自由欧洲电台；捷报纸谴责波兰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报刊提到“修正主义”，并公开批判亚·瓦齐克、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莱·科瓦科夫斯基和扬·科特以及新闻记者维·沃罗希尔斯基，这个记者曾报道说波兹南工人的事业是正义的。

就如同在波兰一样，匈牙利自由化进程的势头也日益高涨。波兹南事件是一剂兴奋剂，而不是一剂抑制剂。七月十八日拉科西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在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参加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被解除了党的第一书记的职

务。米高扬曾在一九五一年代表斯大林命令哥特瓦尔德搞大清洗，他是莫斯科在斯大林逝世后权力斗争中少数几位幸存的高级领导者之一，现在成了赫鲁晓夫的解决东欧难题的能手。普遍认为，把拉科西搞下台是米高扬的手艺，但如果得出结论说，苏联人一方面在匈牙利推动自由化而另一方面又在波兰阻止自由化那就错了。莫斯科很少对失败者抱同情，而当时是非把拉科西搞掉不可了，他犯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罪过：一方面他同意对拉伊克的清洗，而这件事克里姆林宫现在想忘掉，另一方面他又在匈牙利给予了太多的自由。

被选来接替他的人是相当丑恶的艾·格罗，莫斯科派的一名无条件的代理人。但奇怪的是，同一次中央全会还任命卡达尔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可以看出，莫斯科仍在匈牙利修补篱笆。但对卡达尔来说，这是回到权力中心的一次重大飞跃。

与此同时，一场重大的权力斗争正在华沙进行。一方面有被称为纳托林派的保守派；纳托林是首都华沙附近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子里有苏联大使潘·波诺马连科度周末的别墅，他就在这里同他的波兰朋友们举行会议。另一方面也有进步派。保守派在波诺马连科的鼓励下极力主张恢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进步派包括知识分子明显地要求实现共产主义民主化。七月二十二日苏军解放波兰十二周年时，布尔加宁总理在公开讲话中清楚地说明了前一派的正式路线：

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在所谓民族特点的口号下来削弱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联系的企图……这是在扩大民主的借口下破坏人民民主力量的企图。

波兹南就是国际反动派没有放弃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企图的一个证明。……

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敌视我们事业的分子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机构来放毒。有些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屈服于这些敌对影响，竟忘记了党的新闻事业首先应该是马列主义的忠诚和始终如一的先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斗争中有战斗力的宣传者。

当紧张局势发展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时，动摇不定的党的领导转向了哥穆尔卡，他正在一个治疗他肺病的疗养中心耐心地等待这一不可避免的召唤。但他又象戴高乐那样，只愿按他自己的条件来接受这一召唤。这些条件就是：在他承担任何责任之前必须重新接受他入党和从政府中排除那些他认为同必须要改变的某些政策有牵连的人。奥哈布和党的各派领导人不断去找他，但哥穆尔卡对他提出的条件寸步不让。最后，在八月四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通告全国，恢复了“哥穆尔卡同志”的党籍。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只有哥穆尔卡能够恢复党的团结和缓和国内的气氛。但那些曾一度把他关进监狱的人仍想延迟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们提议让他重新参加领导，但处于较低一些的地位而不当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用沉默顶了回去。这一沉默也回避了对斗争中的

哪一派对他最具吸引力这个问题的回答。但到九月，当统治当局企图在波兹南组织一系列审判而遇到更大困难的时候，哥穆尔卡站到了受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的自由派一边。奥哈布和西伦凯维兹早已参加了这一派。（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主席初秋在北京告诉奥哈布，中国共产党支持波兰自由派反对新斯大林主义。）哥穆尔卡的新态度包含了他对经济改革的浓厚兴趣，他的经济顾问也是从进步阵营中吸收的。

现在，波兰人完全清楚哥穆尔卡站在哪一方面，知道他是一位权力竞争者——国内的自由派编辑们注意到这件事。他的地位变得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莫斯科都急于让他回到领导岗位，当然是要他处于受亲苏派包围的地位，人们悄悄地向他提供了政治局委员和以前副总理的职位。但是哥穆尔卡对此不感兴趣，或者说感到不满足。他决心要以他那一派人的领导者的身分重新执政，并排除掉那些他认为对波兰利益有损的人，（这些人中之一就是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这就是说，哥穆尔卡现在公开触犯俄国人，从而使局势更加紧张了。）一场主要危机已接近于爆发点。

十月十四日政治局在华沙开会决定解决危机的下届中央全会的开会日期。作为一个没有先例的步骤，哥穆尔卡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分应邀列席。会议决定中央全会于十月十九日举行。哥穆尔卡的支持者在全波兰敦促工厂和其他“工作中心”把华沙淹没在要求选哥为第一

书记的决议海洋之中。亲苏派则进行反击，在他们追随者中间寻求支持。接着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局势若恶化得太厉害，苏联可能进行军事干涉。自由派准备战斗，奥哈布和西伦凯维兹使用诡计任命瓦·科马尔去领导特别安全部队。可以相信，在同苏联发生冲突时，由于参加西班牙内战而被监禁多年的科马尔会使自己的精锐部队站到自由派或者说波兰人一边的。

接着赫鲁晓夫发了一封电报，说他愿意作为一个客人参加波共中央全会。奥哈布答复说，时间不合适。赫鲁晓夫则坚持，他无视波兰人的愿望发电说，他已在赴波途中。他的明显目的是迫使波兰人让罗科索夫斯基留任国防部长，但波党的回答是不等到中央全会开会和批准，就在十月十八日的一次秘密政治局会议上任命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

十月十九日开始摊牌了。那天清晨，赫鲁晓夫带了一大帮苏联高级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华沙条约国部队最高司令科涅夫元帅（这个共产党的军事同盟是一九五五年组成的）、军队总参谋长阿·安东诺夫，还有十名将军在华沙军用机场降落了。就象一九六八年事件所再次表现的那样，苏联相信最高级的集体威慑力量。

甚至赫鲁晓夫还在机场时就发生了第一场冲突。他同哥穆尔卡争执起来，发现这位以前的阶下囚前一天已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书记。根据公布的纪录，赫鲁晓夫当

即大嚷起来："这是一种背叛行为。我们非来不可。这不光是一个波苏关系问题。你们威胁到我们在德国的地位。你们危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背叛"这个概念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具有迷人的价值。二十年来它曾被用在铁托、哥穆尔卡、匈牙利人身上，最后十二年之后又用在捷克斯洛伐克人身上。关于苏联对其他共产党、东欧和甚至全世界的态度，它比其他大套言词或内幕都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在位于长长的乌雅斯多夫斯基大街末端的贝尔维德尔宫中，赫鲁晓夫就他有权出席波共中央全会一事同哥穆尔卡、奥哈布和其他波兰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舌战。这时哥穆尔卡被告知，苏联部队正在从设在波兰的基地，从苏联和东德向华沙进军。哥穆尔卡和奥哈布问赫鲁晓夫这是不是真的。苏联领导人同他们的将军们简短商议之后，回到屋内说，是的，华沙即将被包围。

就象那个紧张的早晨的故事所传说的那样，据说哥穆尔卡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军队不立即撤退，他就不继续会谈。他还说，他要通过电台向全国人民讲话，通知他们面临的局势。这是整个危机的关键时刻，这也是华沙同几周后在匈牙利出现的局势和十二年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局势之间的不同之处。波兰有哥穆尔卡及其支持者的坚强领导，如果需要他们准备战斗。

沉默了片刻之后，赫鲁晓夫说，"我们将命令所有部队停止前进。"但苏联部队仍在继续前进。在中央委

员会总部，当苏联人在贝尔维德尔宫等着的时候，哥穆尔卡被批准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中午哥穆尔卡恢复了同赫鲁晓夫的谈判，而这时他的支持者就分头到华沙各工厂去发动工人作出在危机中支持哥穆尔卡的决议。大学生们站在领导一边。在华沙六十英里外，科马尔将军的坦克封锁了苏联装甲部队的去路。哥穆尔卡再一次说，他不在“苏联枪口威胁下”会谈。这时科涅夫元帅做出了一点贡献——他的话在许多年之后就变成了一句历史成语——他说他的部队只是在进行“例行演习”。十月二十日凌晨二时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终于达成协议，发表一项简短的联合公报说，苏联领导人访问了华沙。没有象赫鲁晓夫要求的那样提到波苏“友谊”。苏联人同意把他们的部队撤回到基地，交换条件是哥穆尔卡答应今后继续举行会谈和保证波兰继续留在华沙条约内并允许苏联人继续在这个国家驻扎军队。赫鲁晓夫打消了影响新政治局组成的一切企图。凌晨，苏联的这一班人马飞回国去，看起来波兰人用不眨眼的斗争赢得了这场对抗。

十月二十二日哥穆尔卡发表广播讲话，阐述了他的纲领：

> 社会主义的不变原则归结为废除人对人的剥削。而达到这一目的道路可以是不同的，实际上也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范围内，每个国家都应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在一个独立的国家中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主权政府。这个权利应当得到充分的和互相的尊重。应该是这样的，我愿意说，一开始就应该是这样的。

民主化的道路是在我国条件下走向建设最好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我们将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民主化的过程来破坏社会主义。我们党站在民主化过程的最前列……只有党才能够引导这一过程。

波兰危机结束于十月二十二日，而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危机就开始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两者是真正不可分割的整个事件的组成部分。从这年年初起波兰和匈牙利就一块儿沿着哥穆尔卡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道路”前进。现在波兰人在同赫鲁晓夫的摊牌中的明显胜利推动匈牙利人反抗莫斯科。但匈牙利的血淋淋的悲剧反过来又给波兰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悲剧。

匈牙利真正是完全自由的新闻详细报道了波兰的斗争。它告诉匈牙利人关于赫鲁晓夫的威吓企图，关于最后的对抗，关于哥穆尔卡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讲话。这一切都是需要的。匈牙利争取更大自由的运动全年都在逐步加强进展中。十月六日为拉伊克举行了隆重的再葬典礼，与他一起举行葬礼的还有一九四九年审判案中的其他牺牲者，这是为洗刷清洗耻辱作出的一个姿态。要求纳吉重新掌权的呼声与日俱增，变成了这个国家压倒

一切的政治问题。这时传来了哥穆尔卡的胜利消息，十月二十二日布达佩斯又开始行动起来。有五千人参加在建筑工业技术大学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会议进行了七个小时，对波兰表示了声援，会上也提出了匈牙利青年的十点要求的文件。十点要求中包括撤出在匈牙利的苏联驻军。

第二天几千名学生在一群造反作家的率领下，游行到了波兰大使馆和约·贝姆的纪念像前。贝姆是一位波兰将军，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他来到匈牙利帮助它进行争取自由反对奥地利和俄国的斗争。布达佩斯的市民们很快就加入了青年的队伍。到傍晚之前共有三十多万人涌向充满阳光的大街继续尽情地表示他们对波兰胜利的喜悦心情，并希望这也会在匈牙利出现。

黄昏时分群众开始从贝姆纪念像越过多瑙河向议会广场移动。天黑之后，要求熄灭议会大厦顶上的大红星的喊叫声四起，在欢呼声中红星熄灭了。接着群众要求纳吉出来同他们见面并要求任命他在政府里工作。几小时之后，一个作家代表团劝说纳吉从住所出来，一位官员领他到议会大厦阳台上向群众讲话。他讲话很简短，要求群众散开，但他讲的话人们几乎听不到。与此同时，格罗同赫格迪什总理刚从贝尔格莱德出访回国，在电台用后来被描述为“粗暴”的语调讲话。这就深深触怒了匈牙利人，首都到处响起了“打倒格罗！”“处死格罗！”的喊声。在布达佩斯另一个地方，群众把一座斯大林的

巨型塑像推倒了，那里响起了“俄国佬滚回去！”的口号声。斯大林塑像的头部被人们吐上唾沫，被砸成碎块。

格罗讲话刚一结束，一群年轻人就去到布达佩斯广播电台要求广播反映学生要求的文件，这个文件现在已扩大为十六点。当一个代表团正在里面谈判的时候，匈安全部队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开进群众队伍。下午九时以后从楼上向下丢催泪弹；这时安全人员突然从门口冲出来，开始向四面射击。联合国调查人员后来报告说，至少有三人死亡。从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建筑物窗户向外射击继续了二十分钟，有许多人受伤。现在群众开始后退，但有一群青年人高举着一位被害者的血衣。开枪的消息传到仍聚集在议会前面的群众那里，群众又聚集到广播电台四周的狭窄街道上。运载正规部队的军车和三辆坦克开到现场，但军官和士兵们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从广播电台大楼不断向外射击，击中了坦克，打死了两名军官和许多青年。来自郊外工业区的工人随即夺取了卡车，拿着士兵们给他们的武器冲向广播电台。在兵营里，军火库向工人们打开了。有一个工厂的一群工人抢到一千支枪和弹药。安全部队的军车被推翻并烧毁了，与此同时示威者用轻武器向广播电台射击。

在党报《人民自由报》编辑部，另外一群人要求发表学生的十六点要求，安全部队向群众开枪，打死了许多人。但是武装起来的暴动者在天亮之前就占领了广播电台，而其他的人就去烧毁卖俄国书的书店。十月二十

四日早晨，区的警察局和党部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被占领了，群众得到了更多的武器。

苏联的坦克和部队于十月二十四日凌晨开进布达佩斯，激烈的战斗在他们同受到警察及匈牙利部队支持的愤怒的群众之间展开了。从一系列看来互相矛盾的声明中，布达佩斯居民得知，六十岁的纳吉已被任命为总理——这是学生要求之一——和“政府向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部队求援。”但不清楚要求苏联干涉的请求是如何提出的和在什么时候提出的。现在回顾这一事件，看来纳吉完全不可能做这件事。这就开了匿名请求苏联军事干涉的先例——一九六八年在布拉格又重复了一次。

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境，“革命和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共产党政府的职能。起义现在已变成了有许多匈牙利军队与武装的平民并肩战斗反击苏联坦克的完完全全的革命。只有安全部队支持俄国人。

十月二十五日警卫纳吉办公地点所在的议会大厦的苏联坦克为了支援匈安全部队突然向聚集在议会大厦前等候见纳吉的两万五千名左右赤手空拳的群众包括妇女和小孩开枪。在这场集体枪杀中被打死的人估计达三百到五百之多。纳吉这时被强硬路线者禁闭在相隔一座楼房的共产党总部，在那里苏共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正在与匈方谈判解除格罗的第一书记职务，由卡达尔来接替他。当群众向党的总部移动时，里面出现了一片混乱，因为亲苏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安全机关官员担心

他们的性命。

苏联希望格罗去职，其动机可能是想使革命结束和停止战斗。格罗逃到苏联控制区，让纳吉到国会去组织一个新政府，纳吉于十月二十七日邀请共产党的和非共产党的部长们来参加这个政府。党进而宣布，新政府将会立即开始同苏联谈判它的撤军问题。在起义者取得某种胜利之后，十月二十八日政府下令停火；“自由战士们”的城市游击战术使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牵制了苏联坦克，入侵军队在镇压革命方面进展甚微。在季里扬军营，匈牙利部队在帕·马莱泰上校的指挥下成功地抵抗了苏联的进攻。

十月二十九日纳吉解散了匈安全机构，从而使自己摆脱了它的领导人的压力。十月三十日他正式取消了一党制。卡达尔以党的第一书记身分讲话同意取消共产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地位，“以避免进一步流血”。一位内阁部长答应举行自由选举。奄奄一息的独立小私有者党和民族农民党的代表参加了内阁，他们拥有同共产党同样多的部长。纳吉公开否认他曾邀请苏联进行干涉。

当新政府十月三十日就职之后，停火就完全生效了，这是一周来第一次在布达佩斯被破坏的街道上没有听到枪声。同一天苏联部队开始撤离城市。正常工作将于十一月五日，星期一恢复，与此同时一种紧张的新的政治生活在匈牙利开始了。四处在建立政党和革命委员会。似乎革命已经成功了。出现了希望，光明的未来即

将来临。数以千计的被安全机构监禁的人释放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曾遭受到残酷折磨。十一月二日红衣大主教明曾蒂获得了自由。

但是十一月三日事情发生了变化，后来证明这是不祥之兆。纳吉从联合政府中去掉了几位共产党部长，其结果是这一看守内阁（等待选举）在政党席位分配上同一九四五年盟国管制委员会所批准的一样。时钟好象拨回了十一年。当纳吉政权开始它的组织工作时，被提升为中将的马莱泰上校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至于卡达尔，他建了一个新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在广播讲话中说，匈牙利作家、新闻记者、学生、工人和农民“站在前列同拉科西专制主义和政治流氓行为斗争。”他说，新的党要保卫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奴隶式地摹仿外国榜样，而是要走一条适合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的道路”。他呼吁其他政党通过加强政府来克服外国干涉的危险。似乎共产党人已甘心承认自己的失败，而卡达尔则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领导人了。然而他的策略却是更加复杂得多的。

他的策略实际上是在同从十一月一日起苏联部队正在开进匈牙利这一形势相配合——纳吉接到苏军行动的报告。很明显，卡达尔是在玩弄政治欺骗，以便给他的苏联朋友争取时间来重新集结部队。纳吉召见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告诉他苏联部队返回匈牙利是违反华沙条约协议的，如果增援部队不撤退的话，匈牙利会废除这

项条约的。与此同时他要求莫斯科开始谈判最后撤军问题。安德罗波夫对纳吉说，苏联准备进行谈判，新部队是来替换曾在匈牙利作战的部队的。纳吉回答说，这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匈牙利将向联合国申诉。

当接到又有更多的苏联部队侵入匈牙利的消息后，纳吉通知安德罗波夫说，他的政府要立刻退出华沙条约。稍后政府通过了这一动议，宣布匈牙利中立。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前，纳吉说，“我们向我们的邻邦呼吁，向远近的国家呼吁，要尊重我国人民不可改变的决定。这完全是真实的，我国人民也许是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一致作出这一决定的。匈牙利的几百万劳动者们！以革命的决心，忘我的劳动和巩固的秩序来保护和加强我们的国家——自由、独立、民主和中立的匈牙利吧！”

十一月三日晚同苏联谈判撤军有了相当大的进展。甚至同意最后一批军队离开时要有军乐队奏乐。但仍有一些细节尚未解决。晚上十点匈牙利的谈判人员在国防部长马莱泰领导下到达布达佩斯附近的多克伊苏联军事基地去参加为他们和最后一次会议而举行的宴会。就一些细小问题讨论一直进行到深夜。在整个夜晚马莱泰同在布达佩斯的纳吉就谈判的进展情况保持着电话联系。

临近午夜纳吉发现，他同在多克伊的代表团的通讯联系受到干扰。从布达佩斯派往多克伊的侦察组未能返回。联合国关于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

苏联军事代表团和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在多克伊的谈判，事实上是由于一个没有军衔符号的人——伊·谢罗夫将军、苏联安全警察头子的到来而中断的。在苏联军官的陪同下，他宣布他是来逮捕匈牙利代表团的。苏联代表团团长马利宁将军对于这样的干扰感到吃惊，做出了愤怒的表情。谢罗夫将军于是就同他耳语；结果马利宁将军耸耸肩膀，命令苏联代表团离开现场。匈牙利代表团于是就被捕了。因此，纳吉先生（十一月四日）凌晨五时五十六分广播要求马莱泰将军和伊·科瓦奇将军及代表团其他成员立刻返回岗位履行他们的职责就是枉然的了。

早上五点二十分，在他向他的将军们发出命令前三十六分钟，纳吉在布达佩斯科苏特自由广播电台向他的人民广播："这里讲话的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今天天亮时苏联军队进攻我们首都，其目的显然是要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部队正在战斗中。政府坚守岗位。我向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这一事实。

在布达佩斯的一片隆隆炮声中，纳吉口授了下列声明：

这一场战斗是匈牙利人民为争取自由反对苏联干涉而进行的战斗。我只能在我的岗位上坚持一到二小时。全世界将看到，俄国军队无视所有的条约和协定在如何镇压匈牙利人民的抵抗。

全世界的人也将看到俄国人如何绑架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总理，从首都把他弄走，因此毫无疑问这是最粗暴的干涉。我愿在此最后时刻要求这次革命的领导人如有可能就离开这个国家。我要求把我在广播中所说的，和革命领导人在议会会议中达成协议的一切都记入一份备忘录，革命领导人要向世界各国人民求援，并向他们解释，今天是匈牙利，明天或后天这种命运就会落到其他国家头上，因为莫斯科帝国主义是不知止境的，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上午七点十四分科苏特自由广播电台用匈语和俄语广播了下述声明："匈牙利政府要求苏军官兵不要射击。避免流血！俄国人现在是我们的朋友，将来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上午八点七分科苏特自由广播电台沉默了。

纳吉口授完他的最后声明之后可能就离开了办公室去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要求避难。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早晨六时，卡达尔的一份预先录好的声明由位于布达佩斯东南一百英里的索尔诺克的广播电台广播了，他说他正在组成一个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卡达尔要求人民解除"反革命匪帮"的武装，帮助新政府实现它的纲领。

作为纳吉的保护人，南斯拉夫政府建议，卡达尔写一份允许纳吉及其同伴自由回家的书面保证，如果这不可能，就允许他们去南斯拉夫。纳吉拒绝了卡达尔要他去罗马尼亚的反建议。他也拒绝接受卡达尔的要求，即

辞去政府职务，作一个关于自己活动的“自我批评”，宣布自己同情卡达尔政权。南斯拉夫人告诉卡达尔，只有在卡达尔书面保证向他提供自由回家安全保证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同意纳吉离开大使馆。卡达尔回信说，匈牙利政府无意因为纳吉及其一伙人过去的活动而对他们实行制裁。

联合国报告中所讲的关于纳吉最后几小时自由的情况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他避难十八天之后，“一辆大轿车开到南斯拉夫大使馆来接这一伙人回家。苏联军事人员来了，坚持要上汽车，南斯拉夫大使因此就要求两名大使馆官员同车前去以证实纳吉先生及其随行人员确实象双方协议的那样到达他们家里。但大轿车开到了苏军司令部，那里一位苏联中校命令两位南斯拉夫官员离开。然后这辆汽车在苏联装甲车的押送下开到一个不知去向的地点。”

后来卡达尔公开宣布说，纳吉及其同伙根据他们的要求去了罗马尼亚。但一年半之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先是莫斯科，接着是布达佩斯承认，举行了一次秘密审判，纳吉和马莱泰将军已被处决了。

在他们被捕之后到被处决之前，纳吉和马莱泰究竟在何处，没有准确的踪迹可寻。有的消息说，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纳吉确被送到罗马尼亚，一九五七年六月又被带回布达佩斯。审判据说继续了一个多月，根据这些消息说，许多控告纳吉和马莱泰的证据是在莫斯

科准备的。我们甚至连他们死的日期都不知道。

在纳吉去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那天，红衣大主教明曾蒂去到美国公使馆要求保护。他获得自由前后只有八天。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仍作为“美国政府客人”留在那里。

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证明，对莫斯科来说根本不存在象“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之类的东西，尽管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可能曾这样讲过，哥穆尔卡在他认为在华沙同俄国人胜利对抗之后也曾满怀希望地重申了这一点。正是这个由于谴责斯大林及其方法曾激起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希望的赫鲁晓夫，下令镇压了匈牙利的反抗，又是他同卡达尔一起消灭了纳吉。如果波兰的局势在匈牙利反抗期间失去控制的话，他也会清除哥穆尔卡的。

以数千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匈牙利革命的结局使那个国家逐步实现本国形式的社会主义或某种程度的民主化的希望终结了。匈牙利的例子也慢慢地使波兰人的希望消失了。哥穆尔卡逐步取消了波兰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二年之后布拉格之春使捷克斯洛伐克百花盛开。而匈牙利和波兰却变成了莫斯科的驯服追随者——以至于用他们的军队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

但在一九五六年底和一九五七年，忠诚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集团则成了波匈事件的胜利者。诺沃提尼和萨波托斯基对共产主义世界的看法证明是正确的

——虽则一九五七年一月赫鲁晓夫曾紧急召唤萨波托斯基去莫斯科再次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一切正常——他们不再需要装作放松对国内政治和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了。斯大林的巨型塑像仍然耸立在列特纳山上，俯视着布拉格；胡萨克和许多其他人仍呆在捷克斯洛伐克监狱中而无声无息，对于统治当局来说，对于敢于向党的智慧挑战的知识分子予以严惩又变成时尚了。一九五六年的解冻由于一九五七年的寒风而再次结冰。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景看来连一线光明都没有。

第 三 部 分

黎　　明

微光初破黑暗　旭日开始东升

IX

是回光，还是启明？

波匈起义后，东欧的岁月从自由化、“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意义上看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〇年底为止。但如果认为五十年代末就是简单地回到斯大林逝世前的时期，那也是不确切的。这是一个充满巨大矛盾和新的动乱的有控制的后退时期。它也是新的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形成的时期，一个重新思索、重新组织营垒、准备卷土重来的时期。这当然不是说一九五六年的自由派领导人是在有意识地退却，深入隐蔽，等待时机，发动新的反抗。东欧这些年代的历史发展是更加复杂、更带自发性和本能的成份的。

首先国际局势同战争刚结束时期有了明显不同，那时斯大林从实用目的出发把他的卫星国组成的大帝国同外界影响完全隔绝。现在来往不断增加，旅游业也开始了，同西方的贸易在增长，思想交流在加速，总之，参加世界事务的思想在不断增强。东欧的孤立状态结束了，这是大势所趋，甚至苏联坦克血洗布达佩斯也不能使之

改变。其次，历史的自明之理也得到了证实，即失中有得——有时是不声不响的胜利。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解，若不是经验主义的那就是本能感觉到的，即苏联的一统天下有了裂痕，而斯大林逝世后出现，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波匈的挑战而加深了的分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由于下令干涉匈牙利，克里姆林宫曾暂时控制住了局势，但没有魔法能使浪潮永远后退。浪潮又在重新掀起，起初很远很远，慢慢就越来越接近苏联的堤坝。一九五七年在苏联最可靠的卫星国保加利亚发生了一场小型的作家造反；在严密控制的罗马尼亚一九五六年出现过骚动，而在匈牙利起义之后，一九五七年又出现了危险风暴的征兆；在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正在紧张而审慎地试验新的思想，在党的青年干部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

对赫鲁晓夫和苏联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某种缓和。但是这种缓和可能带来的好处，即同东欧建立起一种可行的关系，在莫斯科内政和外交问题的混乱和矛盾中被丧失掉了，而且也从未被理解过。苏联在同铁托南斯拉夫的关系上在共处和新的政治争论之间摇来摆去，在东欧各国首都陷入搞毫无意义的阴谋之中，在同美国的关系上开始搞和解，后来又搞冷战，急不可耐地卷入卡斯特罗的革命古巴的事务，总而言之，执行了一条充满矛盾忽冷忽热忽左忽右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又跟中国闹翻，把阿尔巴尼亚也丢掉了，与此同

时又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激起新的反抗思潮。

我曾表示过我的信念，一九六八年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布拉格之春正式的被镇压在东欧各国争取社会主义人道化、自由化、民主化和民族化的长期斗争中只不过是个插曲而已——它肯定不是整个过程的终结。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打了败仗，但正如后十年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苏联并未赢得战争；出于同样理由，捷克斯洛伐克又打了一个败仗，但这场战争肯定没有失败。八月的入侵和一九六九年四月杜布切克的下台在西方引起了一种感觉，“黄粱美梦完结了”。但现在已经能够看到更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场美“梦”也许毕竟还没有终结。

我相信，如果对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下去之后的整个东欧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解的话，这一前景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因此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罗马尼亚悄悄发生的事情上去那是重要的。因为早从一九五七年起它在东欧的历史中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罗马尼亚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罗马尼亚平行主义”。最初，它是出于民族主义，主要关心的是肯定罗马尼亚在共产主义中的民族权利和特性，而不是关心自由化或民主化。对后面这几个方面缓慢发展的兴趣只是在六十年代末才出现的，可是，看起来似乎讲不通的是，这时罗马尼亚在向苏联进行有力挑战和坚持它的独立性方面实际上比捷克斯洛伐克走得远得多。布加勒斯特之所以能进行这一挑战，包括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

行猛烈的谴责而不受惩罚，是因为它的政策是异乎寻常的微妙和精明。

罗马尼亚的行为的民族主义成份实际上甚至比南斯拉夫也要多得多。南斯拉夫在一九四八年之前不存在反俄国的传统，而对俄国心怀恐惧和仇恨，如同对土耳其人那样，却是罗马尼亚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当沙皇俄国帮助罗马尼亚结束土耳其人数世纪以来对罗的统治时，它索取的代价是割去罗马尼亚一块领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接受这一沉痛教训之后，罗马尼亚人花了一大笔钱修建了一条防御俄国人的防线，这使布加勒斯特继巴黎之后成为世界上设防最严密的首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解放罗马尼亚（罗军开始是站在纳粹一边打仗，占领过敖德萨）的代价是割去了比萨拉比亚。甚至有足够理由相信，俄国人和一小撮罗马尼亚"莫斯科派共产党人"对由米哈伊尔国王和他的将军们与罗马尼亚"国内派共产党人"一起举行的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政变持怀疑态度，这次政变使罗马尼亚从轴心国转到同盟国阵营。虽然政变打击了德国军队，但是莫斯科还是愿意看到由苏军来解放布加勒斯特。这一事件继续引起怨恨，助长罗马尼亚"国内派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不满。

另一个说明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因素是，它是在斯拉夫民族汪洋大海中的一个非斯拉夫民族孤岛。罗马尼亚人的祖先是古代达契亚人，一个以顽强好战称著的伊

利里亚部落，最后被罗马人征服。罗马尼亚的文化和语言主要渊源于罗马和拉丁。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拥护君主制的人和共产党人都认为他们在文化上比他们的斯拉夫邻国优越。当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积极强调本国的民族主义时，就着重强调他们的达基亚一罗马传统，而要把斯拉夫和俄国的影响降到第二位。（罗马尼亚的这种特殊感要比匈牙利人表现得多得多，匈牙利也是个非斯拉夫民族，但它颇为模糊的来源更多追溯到蒙古亚洲而不是伟大的世界文明古国。）

尽管有这些背景，但布加勒斯特的领导人还是决心作优秀的和忠诚的共产党人——符合要求的共产党人。一九四八年开除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情报局文件是在布加勒斯特起草的，罗马尼亚党签署了这个文件。可是，尽管莫斯科和苏联国家安全部施加了压力，罗马尼亚仍然没有进行对“铁托主义”的清洗和审判。罗马尼亚党的总书记乔治乌一德治也许不得不应付以“红色的”安·帕乌克为首的罗共党内的受莫斯科指挥的集团，但他懂得如果他允许搞反“铁托主义”的清洗，他自己的脑袋就会搬家。相反，乔治乌一德治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即在布拉格处决斯兰斯基集团之前六个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内完成了一件异乎寻常的清洗莫斯科派共产党人的工作。安·帕乌克、瓦·卢卡和泰·乔治斯库被撤消了领导职务，他们是分别负责外交、计划和秘密警察的党中央书记。

这次清洗是否是对莫斯科的一个公开对抗行为，还是可以讨论的，但从一九六二年起布加勒斯特的领导人一直坚持这一点，把它看作罗马尼亚走向独立政策的转折点。保·伦德瓦伊，一位对东欧问题有深刻观察力的评论家在他写的《网中之鹰》这本书中提醒人们在接受这种说法的表面价值时要当心，他指出，斯大林在世时，不经过莫斯科同意要搞这类"清洗"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时苏联军队仍然驻扎在罗马尼亚，克里姆林宫是决不会忍受这种傲慢无礼行为的。伦德瓦伊设想，莫斯科也许简单地认为，为了罗马尼亚党内的和平，为了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平息国内的不满，牺牲安·帕乌克等三人是值得的。但事实是，乔治乌—德治之所以能够消灭自己的对手，主要是由于迄今为止代表莫斯科在罗马尼亚掌管军队的四十八岁的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将军转到了"民族主义派"一边。这可能不是偶然的，波德纳拉希是出生在被苏联割去的比萨拉比亚的人。总之，这一大改组标志着罗共党内的莫斯科集团在罗马尼亚政治中的影响的完结；就象事变表明的那样，以后罗马尼亚的政策以别的共产党国家所未有的一贯性越来越强调罗马尼亚的民族特点。

在另一方面，乔治乌—德治，甚至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仍不允许搞放松政治控制的试验。一九五四年四月前司法部长巴特勒什卡努在监禁六年之后被处决了；现在所掌握的证据表明，这是乔治乌—德治及其公

安头子亚·德勒吉奇在内部清算老账。这是自一九四六年以来所知道的唯一的一起政治死刑。在巴特勒什卡努死后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三十七岁的名叫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中央委员被提升为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他一度是共青团领导人、从一九四八年起就是党中央委员、一名杰出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齐奥塞斯库是乔治乌—德治保护下的一个人。在他参加政治局之前几小时政治局决定了处决巴特勒什卡努，这是他的幸运。这样齐奥塞斯库就能够以有一双“干净的手”的领导人出现，能够自由地为巴特勒什卡努死后恢复名誉，谴责乔治乌—德治；就能够作为一个名声未被沾污的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世界上，有资格来反对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还有一点重要的情况应当指出：当一九六八年齐奥塞斯库站出来反对苏联人侵捷克斯洛伐克，使罗马尼亚的独立变成东欧事务中一个主要因素的时候，他的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就是比萨拉比亚人波德纳拉希。

齐奥塞斯库和杜布切克的政治生涯之间有着一种有趣的类似之处。同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卡达尔和胡萨克等人相比较，人们肯定会把他们俩看作是东欧共产党的第二代。那么老一代人的斯大林主义过火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他们身上呢？当巴特勒什卡努被处决时，齐奥塞斯库是中央委员，作为政治局委员，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制止了斯大林死后罗马尼亚自由化的爆发。我们知道杜布切克是一九五四年进入斯洛伐克党

的中央委员会的，那时胡萨克和斯洛伐克的其他民族主义者已被判处了长期徒刑。没有材料证明他曾反对过这一行动，他更不曾反对过两年后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可是罗马尼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并没有抓住齐奥塞斯库和杜布切克过去这些表现来反对他们俩，既然如此，要是外国人还以此来责备他们，那不说是过分自以为是，至少也该说是貌似有理而实则不然了。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作为"国内派共产党人"，他们相对来说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病态精神紧张状态，和五十年代清洗的罪恶复杂事件没有牵连，因而他们能够与他们的人民具有共同的感情，而他们的前辈却没有人能具有这一点。他们俩都是共产党正统机构的产物，在他们政治生涯的早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具有什么特殊的领导才能。这件事本身不但足以说明他们俩人，而且也足以说明今天的共产主义和今天的东欧的特点。同某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大人物相比，他们既不具有烈火般的激情，也不具有突出的清晰思维。他们代表着一种言语朴实的、没有什么超凡魅力的新领导人，这也许是正是东欧人抛弃了那些夸夸其谈、令人头脑发麻的莫斯科派演说家之后所需要和所要求的那种领导人。

我们将在后面谈到，由于不同的原因，齐奥塞斯库和杜布切克变成了唯一享有和博得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广泛群众支持和同情的欧洲共产党领导人，他们被看作是民族领袖。（铁托当然是一个特殊的，但是是很

重要的例子：战时的民族抵抗运动的领袖和反抗苏联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还有点洞察力，抓住这一事实，他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之所以没有能推翻铁托，是因为在这个南斯拉夫人“的后面有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作后盾，这个民族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它给予它的领导人以支持。”）

不管怎么说，乔治乌—德治及其同事们，包括齐奥塞斯库在内，一九五八年正在忙于制定他们民族独立的蓝图。正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决定撤退战后一直驻扎在罗马尼亚的苏联军队。这明显的是他的一九五八年短命的“和平战略”的一部分，但是总的说来还不清楚，这是出于他自己的主动呢（若是的话，又为什么），还是为了满足罗马尼亚的要求。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这是一件十年后使勃列日涅夫深为悔恨的事。

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起义后这一时期开始，政治路线变得更为强硬。当萨波托斯基总统应赫鲁晓夫的紧急召唤于一九五七年一月访问莫斯科时，他定出了调子。对苏联所代表的一切都表示了赞同，从感情上说是又回到斯大林主义。他到达莫斯科之后宣布，“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同苏联的友谊是最基本的。”这正好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听到的话。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度感到高兴，在宴会祝酒时对萨波托斯基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是苏联共产党的

……最好的、最亲密和最尊贵的朋友。”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萨波托斯基决心朝拜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墓，在献的花圈上写着“献给社会主义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布拉格领导人一厢情愿，显然认为，十一个月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曾是一个不慎重的轻率之举，应该被体面地遗忘掉。于是《红色权利报》在一月二十九日的社论中写道，“非斯大林化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只能意味着削弱自己和给反动势力让路。……它还是另外两种明显思想的藏身之所——使友谊松懈和背叛同苏联的联盟……谁为非斯大林化和所谓的民族共产主义擂鼓助威，谁就是在追随美国国务院编导的官方调子。”

诺沃提尼和萨波托斯基在一个一切安排得很好的斯大林主义的——或非斯大林化以后的——世界里要比在自由化的不肯定的世界里要感到舒适得多，关于这一点，萨波托斯基一九五七年回来后作的一次颇值得注意的声明说得很明白，他说，“据我个人多年经验，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我服从一项我可能认为是不公正的决定往往要比我顽固地反对它得到更大好处。”

随着苏联干涉匈牙利而克服了自由化的危险之后，萨波托斯基和他的朋友们立即开始使那些曾如此“顽固反对”的人们沉默下来。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作家们。早在上年十二月份青年团的报纸《青年阵线报》就谴责他们缺乏“真正的马列主义精神，”一月份又责骂他们

"逃避现实"的倾向。当四月斯洛伐克共产党举行会议时，赞扬苏联之声同对制度批评者的攻击之声交相呼应。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准备，到时统治当局就要对前一年的作家造反实行惩罚。在作家代表大会六月二十八日的会议上，诗人弗·赫鲁宾被迫公开为他一年前引起知识分子动乱的讲话做检讨。党再一次表现出了它自我欺骗和把表面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的天性，因为它高兴地把赫鲁宾的公开认错当作捷文学界一切又重归于好的保证而接受下来。实际上赫鲁宾的个人投降与作家们的真实情况没有丝毫联系，他们直接转入地下，从未放弃过争取知识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斗争。党还给予了作家和编辑们其他一些小的处罚，但这都不足以削弱他们的斗志。赛弗尔特没有认错，仍留在主席团。《五月》小组仍然存在，《五月》和《新生活》仍在继续出版。在所有这些继续进行的、虽则表面上看来不是那样热烈的活动中，产生了一代作家，他们十年之后帮助发动了一场对莫斯科派共产党人的致命打击。除了赛弗尔特和一九五六年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爱·戈尔德斯图克外，还有诗人杨·普罗哈兹卡，一九五七年他二十八岁；剧作家伊·克利马，二十六岁；瓦·哈维尔，二十一岁；斯洛伐克小说家拉·姆尼亚奇科，三十八岁，等等。

反应迟钝、自我陶醉的统治当局花了两年时间才发现他们未能成功地领导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回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上来。这时党下令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召开了一次作协的特别会议，从主席团赶走了赛弗尔特等四名自由派分子，把斯大林主义思想家拉·什托尔、伊·陶弗尔以及六名追随者安插进去。几个月之后党封闭了《五月》和《新生活》杂志，自认为又给予了另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作家们却忙于为“抽屉”而写作——这种办法证明比搞党组织自己有经验、对之十分熟悉的秘密活动具有更大的革命爆炸性。

在政治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重新斯大林化是非常成功的。当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七月访问布拉格时——在捷共中央全会对苏联发出新的赞扬一个月之后——他高兴地告诉切卡德大型冶金工厂的工人们说，“我们离开你们时深信，列宁主义的事业在捷克斯洛伐克是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赫鲁晓夫比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知趣，在这一讲话中没有提“斯大林主义的”事业。

布拉格也放慢了对大清洗受害者案件的复查工作。对当局来说，被释放和恢复名誉的人数已经太多了。因此，内务部长巴拉克——他是参与了许多的释放工作的——在中央委员会一九五七年六月全会上说，“有人对我们的法律作了错误的解释”，其结果就得出他所说的“错误结论，即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意味着对犯罪者持某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他自己做了错事还大言不惭，跟他的许多同事们一起批评最高法院和各级地方法院在惩办“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罪行时太宽大了。《红色

权利报》引用总检察长巴尔图什卡抱怨的话说，“在司法工作中有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他气愤地指责说，有那么一些重要的党员和政府官员“希望看到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斗争的主要战场是在复查案件和处理时实行宽大”，他们忘记了“阶级敌人及其同盟者想借党对社会主义法制问题的批评而捞到好处。”

接着九月份巴拉克的调查委员会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肯定清洗期间判决的绝大部分案件是正确的。巴拉克的报告据认为在重新斯大林化之前起草时方向不是这样的，但现在的报告（有根据设想，巴拉克签署这个报告是很勉强的）也得出结论说，“揭露”斯兰斯基对党“有很大帮助”，对他判处死刑是“正义的和公正的”。唯一令人宽慰的是，部分地由于巴拉克的早先努力而已经获释的人——斯姆尔科夫斯基、帕维尔、戈尔德斯图克、朗登及许多其他人——没有被重新逮捕。

最后的收尾工作是一九五八年为两个人恢复了名誉。这两个人是杜贝克少校和科霍乌特克大尉，他们是鲁津监狱的两位主要“工作人员”，斯兰斯基审判案“证据”的主要制造者。由于捏造罪证，一九五五年他们被认为是有罪的，继莫斯科处决了苏国家安全部他们的头子之后，他们也被捕了。恢复名誉之后科霍乌特克现在安静地退休了，而杜贝克则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旅行社担任重要职务，一九五八年又蒙奖赏，担任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捷克斯洛伐克馆的主办人，而他的许多牺牲者

却仍蹲在监狱里。就象一九六八年人侵之后一样，一九五八年秘密警察的权力又重新得到肯定，又有能力关心起自己来了。

另一个表明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法制”是如何工作的典型例子也是发生在一九五八年：摩拉维亚南部伊赫拉瓦地方法院（以“颠覆捷克斯洛伐克罪”）分别判处六名修道院修士一年到四年半的徒刑。布尔诺的七名修女也被判了类似的刑罚。这是一九四八年以来对教会起诉的第三个事例，虽然应当说范围是有限的，但对修士们的控告表明，这种精神仍然浸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司法机构。看来是修士们对政府在早些年的清洗中反对教会和宗教组织的行径公开表示了不满：这就被认定是“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普遍仇恨”，因此就是“颠覆行为”。伊赫拉瓦法院就是这样把修士们的态度定为犯罪行为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萨波托斯基总统，这位忠顺而缺乏个性、并不是太不受人喜欢而又喜爱民间音乐的人，在布拉格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他的总统职位由诺沃提尼来接替，从而把这一职位同党的第一书记结合起来了。作为第三任“工人总统”进入了赫拉德强尼城堡，当过金属制造工人的诺沃提尼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无可争议的领袖。但是他当总统在政治上没有带来任何不同，在主席团他周围的人全是些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主义的疲惫不堪的老面孔和少数几个年青的、但同样忠顺的人如

巴拉克之流。主席团仍由这些人构成：西罗基，一位顽固的斯洛伐克人，从一九五三年起任总理；巴契列克，前国家安全部长，现任斯洛伐克党的头子；宣传头子柯别茨基；经济学家杜兰斯基；还有年迈的费林格。在一九五八年六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又增选了几个主席团委员：伊·亨德利赫，一位成长中的思想家、一度担任过电影业负责人，他是来接管柯别茨基的宣传帝国的；帕·戴维，一位不出名的斯洛伐克党的工作人员，迄今仍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缠绕着；奥·西穆涅克，他从一个工程师升任化工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是进入捷共上层的第一名技术专家。

在一九五六年爆炸性的连锁反应之后，为了加强他对东欧的控制，赫鲁晓夫不得不结束他同南斯拉夫不可靠的蜜月。他面临的难以决定的选择是：究竟是容忍南斯拉夫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方面不断发展其独立性，还是自食其秘密报告之言（他在这个报告中曾指责斯大林在同铁托破裂中的“可耻作用”）对他和苏联来说坏处更大呢？但这一巩固过程需要一种魔鬼学，就象一九四八年所需要的那样。匈牙利被征服了，波兰也给挤得无路可走，莫斯科现在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除了南斯拉夫外已没有可以利用的思想敌人了。这样赫鲁晓夫能够合理作出的辩证法决定就是使铁托再次正式成为马列主义对立面。

对局外人来说，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似乎有些令人茫然不解，更不用说前后矛盾和使人感到为难了，如果赫鲁晓夫在他一九五六年秘密报告所引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大分化之后，他还想被人严肃对待的话。但是对于一个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受过灵活变化教育的共产党人来说，赫鲁晓夫攻击铁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需要有一个思想上的敌人，如果没有的话，也得制造出一个来。赫鲁晓夫有搞这种外交政策特技的非凡天才——就象这一年他同美国打交道时表现的那样，他从“戴维营精神”转到新的冷战冻结再回到缓和，整个兜了一个圈子。

同时，对共产党的东欧来说南斯拉夫的存在是十分令人不安的，这一点是明显的。从政治上说，铁托的不结盟政策使南斯拉夫在东西方的冲突中走向真正的中立。她犯了接受美国援助的滔天大罪——在斯大林禁止共产党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之后——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五年之间这种援助在经济方面达六亿美元，在军事方面达五亿八千八百万美元。更重要的是，在铁托异端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变成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样板，而共产党世界的其他地方则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生活水平低下，供应不足和党对经济的管理一片混乱。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对比就是个恰当的例子。用数字来比较是危险的和会误入歧途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使用的是以指数和百分比来表示的莫斯科式统计方法。

尽管如此，一九五八年在按人口计算的收入增长方面，南斯拉夫已跃居前列。在工业方面，南斯拉夫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捷克斯洛伐克只有百分之十点九。南斯拉夫的成就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还由于这个国家战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而那时捷克斯洛伐克已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了。还有，南斯拉夫的生产率是不断实行分散管理的结果——一九五〇年决定进行一种集体管理试验——而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建立在中央规定的强制性的生产指标这种严格窒息性方法之上的。

但主要的区别还在于生活水平。捷克斯洛伐克按照斯大林的思想着重发展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的生产，而南斯拉夫则二者并重。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居世界第二位，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还远远落后于某些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农业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强迫实行了几乎全面的集体化，而南斯拉夫人面临着巴尔干农业低效率这个历史问题，于一九五三年从实际出发放弃了低效率的强迫集体化，鼓励个体农业。结果产量较高并发展了多种经营。一九五八年布拉格的食品商店或消费品商店里商品极为短缺，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其他城市，顾客通常都可买到供应充分和品种多样的商品。

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受到工人缺勤的困绕，缺勤率一九五八年达到百分之九，因为工人们寻找各种借口

呆在家里，“为啥操那份心去？”劳动力的流动——不断的调换工作——一九五三年约占到劳动力的半数；一九五八年仍占四分之一以上，当时采取了所谓反流动措施。在南斯拉夫，分散管理讽刺性地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业，但缺勤微不足道，劳动力流动也不比其他西方世界严重。工人委员会的集体管理制度提供了一种刺激，而受思想束缚的东欧经济则不敢尝试。只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还有罗马尼亚才敢试验物质刺激、利润分成和集体管理。连苏联的经济计划人员，重新发现了利别尔曼的思想，也开始对工人实行物质刺激。

由于这些正反方面的理由，赫鲁晓夫觉得有必要发动反铁托的第二次思想攻势。他不象斯大林那样麻木不仁，从未想到“动一动他的小手指”或用其他类似办法来推翻铁托。他是非常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攻击是纯思想意识方面的——或者不过是为了摆摆样子——它的目标是有限的，南斯拉夫人知道这一点，于是就以苦笑置之。

没有一个当权者象布拉格的诺沃提尼集团那样对第二次反铁托运动感到更为高兴的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监狱中仍然装满着反铁托主义清洗的牺牲者，而反铁托魔鬼学的复活给了捷共领导以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一九五六年他们曾经失去过。

这一进攻首先是一九五八年从保加利亚开始的，当时苏联又挑起马其顿问题，这是保加利亚人永远关心的

一个问题。一九四八年同铁托决裂是从铁托对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开始的，所以这第二轮争吵从保加利亚领土问题开始也合乎逻辑。所以，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六月去索非亚参加保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利用这一机会宣称，共产党情报局十年前开除南斯拉夫“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他在两年前曾宣称，“南斯拉夫问题不存在通过同志间党内讨论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完全有可能避免同那个国家断绝关系。”这样两种判断竟然出自同一人之口！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曾解释说，“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关系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而赫鲁晓夫这时却在索非亚争辩说，铁托是“修正主义者”，他曾帮助过匈牙利叛乱（可能是指苏联坦克推翻纳吉政权之后，驻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使馆允许纳吉避难），他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洛伊木马。”铁托对一九五八年苏联的谴责并不象一九四八年那样担心，他仅评论说，“在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大会上如此多地提到南斯拉夫使我感到它似乎是南斯拉夫党的分部的一次代表大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积极地跟着谴责铁托。赫鲁晓夫访问索非亚刚一结束，在六月举行的捷共代表大会上，诺沃提尼就几乎用同样的语言说，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原则上是正确的”。在他对一九四九年决议号召起来推翻铁托表示遗憾的同

时，他又攻击南斯拉夫“从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主观主义出发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六月二十三日捷共代表大会奉命通过了一项决议，批评“南共联盟宣扬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立场。”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人已预见到了赫鲁晓夫的进攻，自己先走了一步。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土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的一份出版物提到南斯拉夫时说，它的“革命只是部分地获得了成功”，嘲弄式的提到所谓“工人委员会”，傲慢地说南斯拉夫的经济是“停滞”和发展杂乱地出现，并指出有一种朝着“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趋势。一九五八年四月当苏共抵制南共代表大会时，捷共也照着做了（在苏联直接命令下一九六九年又重复了这一姿态）。驻贝尔格莱德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代表大会，但当南斯拉夫的一位高级官员指责莫斯科对铁托党的态度时，他紧跟在苏联大使之后退出了会场。

只有一件事铁托的诋毁者不可能对他进行指责，这就是南斯拉夫国内政治生活的自由化。在一九六六年以前，铁托并没有在进行经济试验和执行灵活的对外政策的同时实行政治自由化。秘密警察仍然在监视着持不同政见者，不论是否共产党人。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有一个犯人颇受人们称颂，他就是四十七岁的米·吉拉斯。他从前是游击队的将军，后担任过国家的副主席。吉拉斯的罪名就是他曾公开主张，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实行政治自由和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在一九五三年写的

《新阶级》一书中批评了共产党新官僚的过火行为，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中透露了他同这位已去世的独裁者打交道的许多情况。由于这些过错，吉拉斯一九五四年被赶出党中央，后来又被监禁。他坐了九年牢，在布拉格之春以前，他成了当时东欧少有的几位真正现代马克思哲学家中的一位。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的反铁托运动丝毫没有促进共产主义的团结，这是有案可查的。相反，这几年给苏联带来了两个难对付的大问题，它们甚至十多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并从根本上威胁着苏联指挥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残存部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古巴。

莫斯科和北京的分歧一九五八年就在民族利益问题上具体化了。斯大林曾决定性地帮助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和一九四九年之间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但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历史上的不和和竞争很快就超过了他们思想上的联系。问题很简单：应该由苏联，还是由中国来决定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政策？争论的真正原因至今尚不清楚，但这一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当中国人跨过鸭绿江，跟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公开打仗时，苏联人却仅限于口头上侧面攻击华盛顿，这种谨慎态度当然使中国人很生气。后来到一九五八年莫斯科就拒绝继续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么做并不是没有合理理由

的，如果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可能有一天苏联会成为北京炸弹的首要目标。由于感情不断恶化，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数千名技术专家，削减了对毛政权的经济援助，最后逼使中国选择，“要么跟我游，不然就淹死。”

可能中苏间的争论还有更深的根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哈里曼回忆斯大林在同他私人谈话中告诉他，毛不值得信任。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哈里曼告诉我，斯大林曾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没有毛泽东的与现在不同的、亲苏的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认蒋介石国民党的原因。哈里曼说，当蒋开始垮台时，他才转向毛。

中国象南斯拉夫十年前那样不肯屈服，并从思想意识上攻击苏联领导作为回敬。按照共产党政治的作法，毛把苏联人扣在铁托头上的同样帽子——修正主义扣在赫鲁晓夫头上。为了使事情复杂化，北京宣布忠于斯大林的遗产，也谴责铁托是“修正主义者”，但他们的根据同对赫鲁晓夫的根据是截然相反的。对铁托来说，中国和苏联两个都是斯大林主义者。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标志着共产主义国际政治中的一场极端混乱的语义战，这样，一个共产党批判的“右倾分子”成了另一个共产党心目中的“左倾分子”。对不同的共产党来说，进步、保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赋予了这种令人心烦意乱的文字游戏以更大的混乱，因为中国和阿

尔巴尼亚谴责苏“修”入侵捷“修”领土，然后又联合起来在宣传上支持布拉格。

但是这种语义的争议影响深远。中苏争论在亚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不能排除，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因素之一是认为必须牢固地控制东欧以便有最大的自由和资源来对付中国的威胁。那末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也是捷克斯洛伐克事变的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苏联是按典型的斯大林方式借助自我欺骗和响亮的宣言来寻求解决问题的。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赫鲁晓夫把八十个外国共产党召到莫斯科来同苏共一起发表谴责中国和南斯拉夫的正式言论。有的与会者，象听话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积极地签署了文件。其他人象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是违心干的。但赫鲁晓夫却失去了北越党和北朝鲜党。这就是损害莫斯科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领导中心作用的开始。尽管他们当时很听话，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不会没有听到民族共产主义唱得迷人的歌曲。

在同中国公开分裂之前，赫鲁晓夫又使苏联卷入古巴——这给苏联事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是一个政治上和思想上贪心、可怕的失算和最终同一个象毛泽东和铁托那样富有弹性和独立性的人发生冲突的例子。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一位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的三十三岁的大胡子游击队领导人推翻了巴

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使在两年前在最东部马埃斯特腊山开始的造反达到了高峰。卡斯特罗这位本能的和精明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是自由主义的、非共产主义的“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莫斯科和古巴共产党愚蠢地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注意到它。二十一个月以来共产党人认为卡斯特罗和他领导的运动是“资产阶级”盲动分子，因而思想上厌恶它。一九五八年九月当卡斯特罗胜利在望时，古巴党（它的党员曾一度在巴蒂斯塔政府里当部长）派了一个特使到马埃斯特腊山去同他谈判。这是在由于共产党拒绝合作使七·二六运动号召的一次总罢工失败后的五个月之后。也有理由相信，一九五七年一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理人曾按照党的指示出卖了四名亲卡斯特罗的学生给巴蒂斯塔警察，使他们送了命。

当权之后，作为革命政府的总理，卡斯特罗决定反抗美国。他的目标是在整个拉丁美洲搞激进的社会革命，他认识到，这只有通过跟“美帝国主义”彻底决裂才有可能完成。没收美国在古巴的财产，拒绝仍抱希望的艾森豪威尔当局提供的经济援助，卡斯特罗在推行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时向苏联求援。卡斯特罗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愿意接受莫斯科向他提供的东西，但是他有着深刻的记忆，不打算用屈从苏联来代替屈从美国。这一点赫鲁晓夫当然是不懂得的，在卡斯特罗胜利后不到一个月，他派米高扬去到古巴，他武断地认为古巴是个候补卫星国。从那时起，苏联就陷进古巴，一直到今天还

不能自拔。

赫鲁晓夫幻想在离美国海岸九十英里处得到一个战略据点，他急不可待地要资助和武装古巴革命，结果使莫斯科每天要花费一百万美元左右。但苏联的一贯做法就是把它的卫星国拖进它自己的行动中去，根据这个传统，赫鲁晓夫也命令东欧各国都要向古巴提供经济援助、技术知识和进行贸易。这样，最重的负担不可避免地落到捷克斯洛伐克身上。捷克斯洛伐克除了继续向苏联出售和提供它所要求的原料和工业品外，现在她还得向古巴派专家、供应武器、食品和工业设备。（后来捷克斯洛伐克的设备还得供应越南。）象捷外交部新闻司长卡·杜费克一九六八年在布拉格向我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一个革命不使用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后来当一九六一年初美古外交关系中断时，古巴指定捷克斯洛伐克在华盛顿代表它的利益。

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革命之间还有令人感兴趣的人员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就体现在弗·克里格尔博士这个人身上。克里格尔博士是一位犹太人出身的自由主义的共产党医生。他生在波兰，一九二四年（当时他才十六岁）起就是一位富于战斗性的共产党人；一九三四年他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医学院毕业。两年后他去西班牙，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名医生一直服务到一九三九年。他在法国被扣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同西方盟国一起战斗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中的医疗队。一九

四五年克里格尔博士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他被选为布拉格地区党委主席团委员。他在那里同斯姆尔科夫斯基、诺沃提尼和卢·斯特劳加尔一起工作——布拉格之春时期当他起着主要的和戏剧性的作用时他又同这些人相逢。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后，他当了卫生部副部长。他虽于一九五二年被解除了副部长职务，以后几年在布拉格的医院里当心脏病专家；但是，象他这样一个犹太人出身、有官方的突出地位、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西方战线的历史的人，五十年代初期竟没有被捕和清洗，这既是个秘密而又近乎奇迹。一九六〇年捷共派克里格尔博士，这时已是个快活的秃头的五十二岁的人了，去作古巴革命卫生部门的顾问。他在古巴一直呆到一九六三年，在那里他边享受加勒比海的阳光，边回忆西班牙内战的往昔，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就立即投身于进步的共产党政治。

X

一九六〇年：新的十年新的希望

一九六〇年的到来和新的十年的开始，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似乎具有特殊的心理影响。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讲：人民现在可以说，“可怕的五十年代”终于过去了。某种新的东西在流传着，某种东西在向人们窃窃私语：某种变化将要发生，他们会看到的那一天也许不会太远了。

真的，一九六〇年开始带来了有希望的变化，虽然从结构来说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苏联政治体系中一个巩固的部分。七月十一日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宪法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体从人民民主制度提升到社会主义共和国。迄今为止，只有苏联在正统的共产主义世界里占据这一高位——表示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规定的那样正前进在走向真正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罗马尼亚是在一九六五年才改成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个代替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宪法的新宪法失去了西方议会制度的最后一点痕迹，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时期这

种痕迹至少在纸面上还存在。现在新宪法的前言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实质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胜利了……我们已进入了我国历史中的一个新阶段，我们决心走向新的更高的目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积聚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

但是实际上，这一过渡加强了严格的苏联型立法条款，比如正式建立“地方人民法院”，新宪法不提小土地私有权或小业主私有权；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五日诺沃提尼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还保证要消除“自由主义的、假民主分权原则的所有残余。”这最后一点是抄袭苏联的，意思是说把政府和党的所有职权统一到捷共控制之下，甚至在理论上都要废除立法和司法的独立。很明显，自从军队中的、公安部门中的和政府各个部的代表参加决定一切的捷共中央委员会和绝大部分部长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的时候起，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权早就不存在了。国民议会和司法系统只是做那些党叫它做的事情。

但是人们的行为不可能被规定到宪法中去。当捷克斯洛伐克宣布社会主义结构胜利的时候，生活正在远离它，也推着诺沃提尼及其追随者一道走。也许是为了庆祝，或者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接受新宪法，宣布了大赦，给监禁九年的古·胡萨克带来了自由，给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审判案中被判处徒刑的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自由，给远在大清洗时起的其他案件中的受害者，

象经济学家埃·洛布尔带来了自由。

胡萨克出狱之后，就到布拉迪斯拉发地下建筑公司去任职。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年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前高级官员又回复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一九五五年获释的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国营农场和林业总局工作一年之后被任命为摩拉维亚巴夫洛维采农业合作社的主任，后来又被调去领导波希米亚北部的耶斯特瑞比的合作社。帕维尔将军仍在捷体育协会工作。一九五三年获释的斯沃博达将军，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是国民议会议员，是布拉格军事历史研究所的高级官员。他仍然忠于苏联，在捷苏友协和反法西斯战士协会中积极工作。

在国民议会通过苏联型新宪法的同一天，亚·杜布切克被选入捷共中央委员会，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中又一个这类讽刺性的巧合。而另一个这种巧合当然是，杜布切克进入党的内圈正是胡萨克被释放的时候。这两个斯洛伐克人的命运似乎总是交叉在一起的。

杜布切克荣任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是一种特殊嘉赏。还不清楚是谁和什么原因推动领导当局选他到书记处这个关键岗位上，把他放到许多知名的、有经验的、或许是更有资格的党的工作人员之前。虽然在斯洛伐克党中央任过职并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年，三十九岁的杜布切克在全国还完全不为人们所知。他的自由主义的进步倾向，如果一九六〇年就有的话，是肯定不会使仍忙于

拔除“修正主义”魔鬼以及与此有关的邪恶的诺沃提尼喜欢他的。比较最合理的猜想是，党感到书记处需要新的血液，杜布切克看起来比较合适，是一位模范党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好相处的、没有争议的斯洛伐克人（党始终要保证斯洛伐克在最高机构中的代表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杜布切克是摩拉维亚人奥·切尔尼克的对应人物；切尔尼克也是三十九岁，同样是一个迅速提升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一九五六年就进入了书记处。

在捷共的结构中，书记处是个战略性的政治机构。书记们分工负责党的干部、军队、公安、经济、外交等部门。书记处也协调中央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比如有关军事、公安、国际关系、宣传等等。政治局（以后不久就改称为主席团）在政治和思想上起主要的指导作用，书记处则处理日常事务、人事和行政工作——这很明显使书记处拥有很大权力。如果它放手大胆地干，就可能凌驾于主席团之上。（可能一九五一年对斯兰斯基的指控中唯一正确的一点是，他作为总书记企图把书记处变为“领导机关”，而把政治局搁在一边。）

一九六〇年杜布切克进入书记处时，书记处共有九名成员。打头的是诺沃提尼，第一书记。另一个兼书记处书记的主席团成员是伊·亨德利赫，理论家。其他的成员除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外，还有布·科列尔，即清洗时代替科普日瓦任中央干部部长的那个人；弗·考茨基，实际上是捷党内的苏共代理人；弗·克鲁金纳；安·

克尔切克和弗·苏普卡，战前的捷共议员。最后三个人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人物。在由老家伙控制的主席团中唯一比较新的一位是内务部长巴拉克，他还兼任副总理职务。其他新进人物——亨德利赫、帕·戴维和西穆涅克——丝毫也改变不了这个机构的保守性和斯大林主义的性质。但在另一方面，巴拉克自从他一九五四年突然被选进政治局之后就一直试图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来改变主席团的这种性质。一九五九年当重新斯大林化正在大力推行时，巴拉克就开始在一系列事情和原则问题上同诺沃提尼发生争执。注意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即当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这两位未来的布拉格之春的建筑师在每件事情上随大流的时候，巴拉克却是第一个向统治当局及其哲学挑战的共产党高级官员。

巴拉克是在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重病痊愈回到公共生活中来之后开始他的这一挑战的。这段间隔时间给了巴拉克时间和机会来重新思考他和捷共在正在变化的世界中的地位。总之，巴拉克是向诺沃提尼的广泛个人权威挑战，——人们强烈感到，诺沃提尼的行动开始象个小斯大林——他怀疑新宪法中提出的、最后体现在定稿中的观念，即不许在党、执行机关政府、立法和司法之间实行分权。

由于在主席团内他的立场得不到支持，重新复查旧审判案件也得不到鼓励，巴拉克做了第二件异乎寻常的事：在给赫鲁晓夫的一封密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

见。正好这时宪法已经通过了，取消了分权的“假民主”观点，而他的信就成了严重违犯共产党纪律的行为。他在信中伤害之外又加侮辱地写道，按他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困难是同消除“个人崇拜”“缓慢和不坚决有关”。最后他告诉苏联总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某些成员参加过五十年代政治审判案的准备和组织工作。这句话的矛头是清楚地指向诺沃提尼，同样也是指向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巴契列克、指向布·科列尔，在较小程度上也是指向柯别茨基。这就近乎是颠覆行为，因而赫鲁晓夫把巴拉克的信转给了诺沃提尼也就不足为怪了。

接着来的就是一段肮脏的插曲，带有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味道，它导致巴拉克的毁灭。首先，一九六一年六月他被调离了内务部长的职务（作为内务部长他控制着秘密警察）。然后党就着手制造一桩反对他的政治和刑事案件，企图迫使巴拉克的私人秘书弗·耶尼什少校控告他阴谋推翻诺沃提尼的政权，企图取而代之，当总统和第一书记，但是耶尼克少校拒绝了，于是计划又改变了。耶尼什和巴拉克一起被控告从政府资金中贪污了一千美金。这一异乎寻常的控告是导源于一九六〇年的一件事，当时诺沃提尼率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那一年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其他许多政府领导人都出席了联大会议——他从代表团的经费中拿了一千美金给自己买了一架特殊照相机。当时感到为难

的代表团坚持要把钱要回来（这样账目才能平衡，才没有人会被指控贪污）。在这种情况下巴拉克命令耶尼克从内务部经费中拨一千美元给驻纽约的捷联大代表团以取回借条。

这一惊人事件的策划者就是卢·斯特劳加尔（这位三十七岁的亲莫斯科共产党人当了不重要的农业部长之后，接替巴拉克任内务部长）和米·马穆拉，中央第八部（安全和军事部）部长，他是捷克斯洛伐克最恶劣的人物之一。斯特劳加尔—马穆拉计划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这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充分表现了出来。那天夜里诺沃提尼总统戏剧性地冲进巴拉克办公室，为贪污一千美元事逮捕耶尼克少校。为了使事情更加完满，诺沃提尼还带来了西罗基总理、内务部长斯特劳加尔、马穆拉和马穆拉的助手普罗哈兹卡。巴拉克也被请来目击这一逮捕。堂堂的共和国总统为了可能被牵连到贪污一笔微不足道的经费而亲自出马，深更半夜去逮捕一名小官员，这肯定是异乎寻常的事。斯特劳加尔和马穆拉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之后又重新得到关键性的掌权地位就更加令人莫名其妙了。就象巴拉克和耶尼什的律师勒·什瓦茨博士后来讲的，诺沃提尼这帮人的行动变成了一幕低级的滑稽剧。他说：

耶尼什被捕之后，诺沃提尼转过身来问斯特劳加尔，他是否有权这样做……斯特劳加尔回答说，他不能肯定，

但是诺沃提尼毕竟是国家元首，最高统帅和第一书记……耶尼什说，'总统同志，这不符合事实！' 但是诺沃提尼先生大声叫嚷，不让对方讲话，不许他用"同志"这个称呼，说要把他开除出党。然后普罗哈兹卡先生连逮捕令都没有就把耶尼什送进了鲁净监狱。

此后不久，巴拉克也以贪污罪被捕。普日布拉姆的最高军事法庭判处他十五年徒刑，判处"同犯"耶尼什十年徒刑。但是这一"刑事"案件的政治原因被泄露出来了：一个党内文件谴责巴拉克一九五七年的报告是"制造混乱和无益的"。于是巴拉克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一九六二年巴拉克的被埋葬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他的举动可能是堂·吉诃德式的和幼稚的，特别是越过诺沃提尼去向赫鲁晓夫告状，但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竟没有一个人——特别是包括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在内——为维护巴拉克作出一点点公开表示。

捷共党内的新矛盾是如此之激烈，以致在巴拉克判刑六个月之后又任命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调查清洗案件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的头子是德·科尔德，一位年轻的来自俄斯特拉发的党干部，从一九六一年起就在党主席团内工作。主要对经济感兴趣的科尔德主张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正是由于他，自由派共产党经济学家奥·希克才能出来设计所需要的改革。（后

来，科尔德和希克决裂了，原因是科尔德忠实地支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的苏联的方针）。

诺沃提尼政权被迫重提斯兰斯基审判案这笔八年老账的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掀起了第二次非斯大林化的运动。照例诺沃提尼要学莫斯科的样子，或者至少要装出学的姿态。

第二次非斯大林化运动产生的原因看来是由于苏联内部的压力（赫鲁晓夫刚刚击败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也是由于共产主义世界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和整个国际局势。看来有必要到处去修补一下篱笆，使冷战缓和下来。一九六一年赫鲁晓夫已放弃了反铁托的第二次行动，又一次开始向南斯拉夫调情。同中国的矛盾对苏联来说变得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明显懂得，东欧的某种团结是会有帮助的。但是赫鲁晓夫不但没有治好他的东欧头疼病，反而又得了两种新病：一个是阿尔巴尼亚，另一个是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头疼病都直接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有关，间接地也同中国有关，苏联同这两个国家的困难一定要跟莫斯科—北京长期不和联系起来考虑。阿尔巴尼亚成了中国在东欧的主要政治发言人，而罗马尼亚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独立主要是靠她在中苏间保持等距离的中立政策来保证的。（应该注意到

这一点，中苏争论是在一九六〇年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化的。）

苏联一九六一年跟阿尔巴尼亚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只是由于斯大林同铁托决裂才使阿尔巴尼亚免于被南斯拉夫吞并。所以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同铁托的和解对恩维尔·霍查及其同事们来说是个致命危险。他们意识到，作为同莫斯科政治和解的代价铁托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搞掉他们，他们还知道，苏南联盟很容易导致牺牲阿尔巴尼亚以满足南斯拉夫的野心。霍查用迅速消除政府中一切潜在的亲苏派和亲南派人物和靠坚持忍耐度过了危机。当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发动第二次反南运动时，阿尔巴尼亚人虽仍有疑虑，但安心多了。

但当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地拉那时，这种疑虑又增加了。他可能是为了再次同南斯拉夫人言归于好而去向阿尔巴尼亚人做工作的。但不论从那方面看，这次旅行是不成功的。阿尔巴尼亚人不相信赫鲁晓夫的保证，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建议，即他们的经济应该牺牲地拉那领导人如此珍爱的工业发展而建立在农业基础上，持怀疑的态度。赫鲁晓夫当然想削减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经济的投资。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同罗马尼亚的关系上同一年犯了同样的错误，带来了同样悲惨的后果。

如果阿尔巴尼亚一九四八年得救是由于苏南分裂，那么它一九六〇年能够生存下来就是由于苏中分裂。决

定玩中国这张牌，出席罗共代表大会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在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中支持了中国的立场。赫鲁晓夫企图报复，一个月后就支持地拉那的亲苏分子搞政变（失败了），还利用阿农业遭灾欠收狠狠降低食品供应，企图饿死阿尔巴尼亚人。在十一月举行的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和霍查几乎打了起来。会议文件中对南斯拉夫的谴责不再能安慰阿尔巴尼亚人了；他们不相信苏联人，决定利用北京来反对莫斯科。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期间，苏联和解的努力完全失败了。霍查把他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中国代表身上而不理苏联代表。

此后，赫鲁晓夫又转向强硬策略。他从阿尔巴尼亚撤走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盟国的技术专家，从亚得里亚海的发罗拉基地撤走了苏联的潜水艇，最后宣布取消苏联对阿的一切援助。中国立即乘虚而入，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一笔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数额和苏联集团刚取消了的贷款相等。现在分裂成了官方的全面的分裂，十一月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共产党国家关系中空前绝后的事情。赫鲁晓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说阿尔巴尼亚犯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

在某种意义上说，阿尔巴尼亚对于苏联犹如古巴对于美国。它是位于苏联帝国边沿上的一个小国，尽管苏联是一个巨大的、以核武器作后盾的强国，但制服不了

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抗。由于同苏联和同它周围的俄国忠顺卫星国没有共同的边界，阿尔巴尼亚就不用担心会遭到通常的陆地入侵。那里古巴转向苏联求援，这里阿尔巴尼亚转向中国求援。现在两个世界帝国——美国和苏联——都缺乏压倒优势来对付不听话的民族主义小国，从而也缺乏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力量。

凑巧和阿尔巴尼亚同时发生的罗马尼亚危机则更加微妙和不露声色，它语气和缓，但实际上很厉害。它甚至没有撕破脸皮。罗马尼亚共产党外交的精明和慎重，从长远来看对苏联是更加危险的。它基本上等于宣布罗马尼亚在共产主义世界政治、思想和经济上的独立。但它还另具含义：布加勒斯特的领导跟阿尔巴尼亚一样，从中苏分歧的扩大中觉察出了对罗马尼亚的实际好处。

罗马尼亚的挑战具有双重形式，既有经济上同莫斯科的争执，又有政治立场上的解放。经济方面是关系到苏联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劳动分工的概念，具体是从多瑙河三角洲附近加拉茨钢铁厂问题上的意见不和表现出来的。

苏联的想法是，东欧经济应该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保护伞下面实行完全的一体化，这个组织成立于一九四九年，是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对立面而建立的。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苏联控制下的经互会的计划工作者就能决定，哪个国家应集中在工业发展上，集中到哪类工业上，哪个国家应该把主要力量用在发展农业上和次要工业上。

这种蓝图表明，一旦这一程序付诸实施，工业国家将同农业国家交换产品。苏联由于它的幅员广大和经济的多样性，被指定为发挥工业和农业两种作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经具有工业结构，应该成为经互会中的工业国家。波兰将介乎两者之间，因为战后它的工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仍然是个农业国。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应努力发展农业。这不过是早先的做法——通过强制性供货苏联从它的卫星国拿走它所需的东西，向这些国家倾销它不需要的东西——的现代化翻版而已。（苏联人向东欧国家——和其他亚非不发达国家——正在倾销的商品之一就是从古巴接受的高价糖，它是用来交换苏联的石油、工业设备和食品的。）

对于这套想法，罗马尼亚坚决不干。乔治乌—德治主席及其主要经济规划者阿·比尔拉德亚努立刻向莫斯科清楚地表明，罗马尼亚不打算把自己变成为苏联和经互会的"蔬菜园"，如果必要的话，它将准备单独发展工业。他们争辩说，苏联的一体化思想将损害罗马尼亚的民族利益。罗马尼亚很愿意同经互会合作，但它不能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几乎同时罗马尼亚通知莫斯科说，它有兴趣利用信贷和设备来扩大加拉茨钢铁厂的生产能力。

苏联当即加以反驳，愤怒地指责罗马尼亚违反"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准则，并声称由于没有必要扩大加拉茨钢厂的规模，罗马尼亚不能指望得到苏联援助。乔治

乌一德治飞往莫斯科同赫鲁晓夫举行一次紧张的会谈，在会谈中他通知赫鲁晓夫说，罗马尼亚将向西方寻求合作来建设加拉茨钢厂。他一回到布加勒斯特，就命令向西方所有公司公开投标。（及时向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公司提出签订合同。）面临着有被完全丢在一边的危险，苏联也表示有兴趣投标；按照罗马尼亚以后在所有经济项目中所执行的政策，根据同西方竞争者的平等条件它同罗签订了一个冷轧厂的合同。

在政治方面，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举行的罗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很长的会议上强烈地表现出了罗马尼亚的独立性。乔治乌一德治和他的高级同事——主要是毛雷尔总理和主席团委员齐奥塞斯库——利用中央全会来攻击苏联干涉罗共内部事务。

他们还提出论据说，甚至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前他们就开始了非斯大林化。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国内派共产党人"和"莫斯科派共产党人"间老的斗争的继续。全会上的发言人把罗马尼亚党的战时和战后历史描述成为"国内派共产党人"和"外来分子"、"外来集团"的长期斗争的历史。他们谈到，解放后有的同志惨遭亲莫斯科派领导人的逮捕和处决，仅仅因为他们曾在"反西班牙佛朗哥的国际纵队战斗过或在法国同德国占领者斗争过"。他们指责"莫斯科派共产党人"在罗马尼亚传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勾结在一起，贬低一九四四年八月反纳粹起义的

重要性，还在党内阻挠提升那些“同工人阶级和人民有联系的党员。”

象保·伦德瓦伊在《网中之鹰》一书中指出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和明显反苏味道的这一次罗共中央全会是一个隐蔽的独立宣言书……它的重要性当时被忽视了的这次中央全会是罗共走向同罗马尼亚人民完全一致的重要的第一步。”当时采取的启发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其含义必然是反苏的——的步骤之一是，布加勒斯特的领导为达契亚-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杰出代言人、已去世的历史学家尼·约尔加恢复了名誉。

罗马尼亚策略之漂亮就在于莫斯科没法同它公开争吵。表面上他们谴责斯大林主义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几个月前刚从这个集团的阴谋中挣脱出来。虽然在拜占庭式微妙的掩盖之下，罗马尼亚声明的真正意思还是清楚的。布加勒斯特不想破裂，适可而止，不逼使苏联作出强烈反应。而苏联人正忙于对付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也不想同罗摊牌。这样罗马尼亚就能连连得分，侥幸取胜。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中国的影子，罗马尼亚也同中国眉来眼去。

由于赫鲁晓夫想在国内击败反党阴谋分子和为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争论辩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受到了危险的影响。新的非斯大林化使其容忍罗马尼亚的诡计，使其第二次同铁托和解，使其一九六二年在保加利亚进行了一次苏联指挥下的清洗，使比较温和的党的第一书

记托·日夫科夫当了总理，也使苏联在东欧其他地方不可避免地执行比较宽容的政策。甚至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古巴秘密布置核导弹问题上同肯尼迪总统的对抗都未能使他在东欧放弃这些政策。（实际上，当卡斯特罗对于后来撤走导弹感到恼火从而转向中国时，对赫鲁晓夫来说就更加迫切需要坚持非斯大林化的方针。）而从中直接受益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

XI

骚　　乱

这一次，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又以一定的速度发展着。一九六二年十月诺沃提尼终于使自己相信，列特纳山上的斯大林巨型塑像——八年前由他和萨波托斯基骄傲地揭幕的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像——是不合时宜的。工人们被召来移走这座纪念像，在拆除由许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塑像围绕着的巨大塑像时尽可能不要声张。对布拉格人民来说，这是时代正在变化的象征。移走塑像——正好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进行非斯大林化一周年——当然并不意味着诺沃提尼及其伙伴们真的服输，要认真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非斯大林化。这只不过是为了对付党内和全国日益增长的不安的一个策略性行动。

在政治战线上，知识分子和青年共产党员提出新要求；要求使捷克斯洛伐克摆脱思想冰期。镇压匈牙利反抗已成为历史的过去，新的力量正在集结起来向顽固的统治者挑战。在经济战线上，危机接着危机给政治上的

不满火上加油。多年来的管理不善，由思想意识而不是由内行指导经济带来了苦果。上层的混乱、工人缺勤和劳动力的流动使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由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七点七降至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五点七和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三点一。象捷克斯洛伐克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不现实的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牵制下，在按照苏联命令向古巴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国内迫切需要的产品的这个沉重的负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危险的经济衰退。农业的景况更是悲剧性的，因为生产比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六。供应短缺严重，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在指派工人到缺乏劳动力的部门去的时候，党组织在工人中亲一派疏一派：当煤矿或农场需要增加劳动力去补上亏产时，党把对它忠实的党员留在劳动不太费力的工业企业和服务行业，而让政治上“可牺牲的”男女去挖煤或种地。这样，党对经济管理的干预就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愤懑。

为了应付这些积累起来的问题，诺沃提尼政权又使用把小的让步和严格的纪律结合起来的老办法，而没有采取任何面对现实的措施。斯大林像当然是被推倒了，但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举行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对国内政治上的不安的唯一的明显让步是指定科尔德委员会来审查过去的清洗案件。捷共领导指望，科尔德，它的一位“内层”人物会又一次送来肯定五十年代判决的案件是公正的报告。代表大会的其余时间是用来通过正统

的法规，向知识分子和其他制造麻烦的人宣读取缔令。诺沃提尼和亨德利赫用长达几个小时的讲话来警告作家和其他人在工作中要注意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倾向，重申党的神圣路线的不可触犯性。与此同时，党悄悄地继续搞它所习惯的那一套，用奖金和国外旅行来收买那些可能反对维护现状的人和更优厚地奖赏那些经过考验是忠诚的人。

一九六二年年底诺沃提尼及其同事们显然认为，政治局势是在他们牢固的控制之下——这再次表明他们无法克服自我欺骗和只会从百依百顺的会议逼出来的形式主义决议的空话中看问题——连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倾向于同意这一点。但到了第二年，所有幻想和欺骗都开始破灭了。从那时候起，诺沃提尼及其同事们就一直走下坡路。毫无疑问，一九六三年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八年这段时期内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之中，所有的政治、思想、知识分子和经济问题都忽然突出出来了，使诺沃提尼政权失去了控制。

很难准确地说出，是哪一件事，在那一点上牵动了全局。事件如此迅速地相继发生，它们汇合成了一股历史巨流。尽管诺沃提尼拼命修补缺口，党的整个结构还是开始破裂了。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掀起了自一九四八年文化黑夜降临捷克斯洛伐克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抗。而经济危机也达到了高峰。也许引起连锁反应的事件是科尔德关于复查洗清时审判案件的报告。因为科尔德委员

会发现，审判案件是捏造的假案，“证据”是被篡改了和编造出来的，复审过去的判决和为受害者恢复名誉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也许有人会停下来惊奇地问，什么东西使得受信任的上层机构的共产党人——开始是巴拉克，后来是科尔德——顶住强大的政治压力，不仅寻求真理而且还为揭露真相而斗争呢？回答如果有的话，那也太复杂和矛盾了。尽管科尔德一九六三年有历史性功绩，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却完全投身于亲莫斯科的保守派阵营。曾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为正义和恢复名誉进行过斗争的巴拉克在他一九五七年的报告中来了个大转弯，一九六二年又勇敢地参加了斗争。相反，象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这样注定要来领导一九六八年的自由化运动的人，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却袖手旁观，一言不发，虽然他们当时已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我们就要看到，杜布切克实际上是站在诺沃提尼一边反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管怎么说，共产党干部的心、灵魂和头脑是个谜——在人的言行一致、道德和自尊方面是个奇异的秘密。

无论如何，是科尔德的报告打开了一九六三年的闸门，因为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被处决和判刑的人的阴魂不散，纠缠着诺沃提尼的政权机构。虽然这个报告直到四月才正式提出——八月才公布——但有明显迹象表明，党的领导早在三月就知道此事，并开始了

相应的行动。三月七日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院长约·乌尔伐列克（为了报赏他在斯兰斯基案件中作为总检察长所起的作用才委派他担任这个威严职位的）“由于健康原因”宣布退休了。官方声明说，他以后将集中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法律问题，这就泄漏了内情。很明显，当局是不能让一个在短期内即将被公开揭露为罪恶地制造假证据、从而把十一名共和国的杰出公民送上了断头台的人继续当最高法院院长的。当然牺牲可以牺牲的人对诺沃提尼来说并不新鲜，几星期之后他还要这样干的。

搞掉乌尔伐列克之后，诺沃提尼就立刻进行反攻，否则就会危及党的最高权威。他三月底在俄斯特拉发举行的一次共产党战士集会上的讲话中承认，“我们在这里需要批评就犹如日常饭食中需要盐一样”。但他警告说，“谁也不能触动共产党、它的纲领或者我们的社会主义秩序。……对每个人来说它必须是、今后仍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提到他在知识分子中的敌人时，他大嚷大叫党有权“指导文化活动，正如它指导和领导整个国家生活一样”。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没有批评的垄断权”，不是“与其他人不同的特殊人物”，不是降临人间从他们的崇高地位——良心来判断人民生活的天官，他们不能在这种人间活动的基础上作出超绝的结论”。

这是说大话。但一周之后，四月四日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党中央秘密会议上，诺沃提尼对最高领导进行了一次自五十年代大清洗以来最大的改组——不同的是这

一次的政治牺牲者正是发动清洗的那帮人。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的国家安全部长、醉心于穿将军服的卡·巴契列克被赶出了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并被解除了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职务。接替他在主席团的职位和任斯洛伐克党魁的是亚·杜布切克。杜布切克现在身兼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斯洛伐克党魁三要职。实际上这使杜布切克在党的上层机构中的地位仅次于诺沃提尼和亨德利赫。如果说巴契列克的被革职是为了使党摆脱斯大林主义过去最糟糕的一面的明显需要决定的，那么杜布切克在上层的出现决不能看作是自由化的一个姿态。他有一个忠诚党员的良好声誉，他是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可能就是为了提升才送他到那里去培养的，他将在将来的长时期内忠实于诺沃提尼及其镇压政策。对于一九六八年在布拉格广为传播的一种说法，即杜布切克一直就是一个秘密的自由派，我们不能轻信。

第二个被诺沃提尼清洗的人就是布·科列尔，党中央的干部部长，一名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作为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主要合作者和捷国家安全部长拉·科普日瓦最亲密的心腹在进行审判案期间起过重要作用。科列尔现在被解除了中央书记的职务，赶出了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另一个被开除出党的人是阿·切皮奇卡，哥特瓦尔德的女婿，他担任过司法部和国防部部长，是清洗的主要设计师和辩护人之一。

诺沃提尼和捷共中央接到科尔德报告之后在一九六三年的中央全会上采取了这些步骤。他们所牺牲的正是一年前巴拉克在给赫鲁晓夫的倒霉的信中指出要对清洗负责的那些人。这可以证明巴拉克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不能使他获释出狱。诺沃提尼是不会释放怀疑是和他争夺权力的人的。

四月中央全会所采取的措施非常重大而且突然，科尔德报告是十分使人震惊，因而这两件事都长期保密——党的清洗和杜布切克的提升保密六个星期，科尔德的调查报告保密四个半月——以便捷共有时间向全国党组织解释这些事情。但现在抗议的气氛弥漫全国，知识分子用不着等中央决定的消息才采取行动。不管怎样，诺沃提尼的明显让步再也堵不住日益高涨的浪潮了。

知识分子公开反抗诺沃提尼统治的第一枪是在布拉格中央全会后三星期，四月二十二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打响的。斯洛伐克人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十年前的大清洗中首当其冲；按他们的人口比例来看，他们遭到的打击比捷克人还严重。一九六三年反对这些清洗的思想情绪表现为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复活和反对在捷克斯洛伐克依然存在着的斯大林主义残余。

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作协代表大会上，是恢复了作协会员资格的拉·诺沃麦斯基、小说家拉·姆尼亚奇科和

作协的新书记卡·罗森鲍姆为会议定了调子。诺沃麦斯基谈到他的老朋友弗·克列门蒂斯。他告诉作家们说，斯大林主义是一件“荒谬可怕的”事情，它毁掉了千万人生活中的信任、自信心、了解、甚至忠诚和自觉。他说，“完全彻底地恢复事物本来面目”的时刻来到了。姆尼亚奇科，这位体格粗壮，正在完成《迟到的报告》这篇将在来年轰动捷克斯洛伐克的著作的人，在会上谈到了使那么多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苦恼的关于他们一度被迫接受斯大林主义过火行为的道德问题。他说，“我们中每个人的良好名声上都有一个永衡的污点，因为我们都谴责过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诺沃麦斯基等人。”罗森鲍姆展望未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新的力量已经集结起来抵制任何想恢复斯大林主义的“个人崇拜”及其“非人道”的方法的企图。

知识分子的骚动很快影响到大学，就象一九五六年一样。五一节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发生了学生反对统治当局的游行示威。

五月二十二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作家们都包括在内，在布拉格开会。他们从一九五六年作协代表大会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愤怒而激动地对国内的局势表示了抗议和控诉。诺沃麦斯基谈到“集体罪过”：

整个局势的悲剧性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有些人或多或少地相信和接受了谎言，有的是由于害怕，有的人则诚实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在为正确的事业服务。悲剧在于下一事实——特别对于我们作家和新闻记者来说是这样——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整个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迷惑不解，不知所措，他们站不稳脚根。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米·瓦列克在会上鼓吹为在共产主义内部争取更广泛的自由而斗争，他的发言预示了一九六八年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他说，“我们当然要使我们党已开始进行的更新和净化过程继续下去……有必要朝下层、朝上层，实际上要在所需要的每一个方向把这个过程继续下去。

但是真正的激情爆发是出现在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斯洛伐克记者协会代表大会上。明星是当地新闻学校的教授米·希斯科。他指责当局阻挠党的“更新过程”，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斯大林化是“不真诚的”。他列举了许多应对在国内实行和维护斯大林主义负责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其中就有著名的斯洛伐克人西罗基总理。希斯科然后争辩说，作家和记者有权利和义务表示“正确的观点即马列主义的观点，即使是同某些官方人士的主观主义意见相冲突的话。”当希斯科宣布从今以后新闻记者应该“只尊重那些与社

会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冲突的指示”的时候，他也为一九六八年展示了蓝图。他说，这就意味着，共产党的觉悟“决不应理解为驯服地服从领导机关的庸俗态度，而应该是按照列宁主义的精神对党的事业的自觉地和忠诚地服务，是从不搀假的马列主义原则立场出发对一切事实作客观的判断，这些原则对于被领导者和领导者同样都具有约束力。”

这是号召拿起武器，诺沃提尼政权对它特别恼火，因为这个号召是来自要求改造党的共产党人而不是来自想要摧毁共产党的反共人士。希斯科和其他人在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的行动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几天之后，诺沃提尼就向他们和斯洛伐克人进行了反击，这样，他同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之间的公开战斗就打响了，这已经不是过去几年的狙击战了。

在一九四五年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第一届政府成立所在地，斯洛伐克的城市科希策的讲话中，诺沃提尼指名攻击希斯科，也批评了最近发表过公开言论的一些共产党人和非党员，指责斯洛伐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斯洛伐克的文化刊物《文化生活》刊登“间接攻击党的政策的文章”。他说，这在今后是不允许的。他警告斯洛伐克的编辑和作家们说，他们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公开讨论党中央准备解决的问题，从而破坏了党的纪律。这些问题当然涉及到为象胡萨克和诺沃麦斯

基这样一些斯洛伐克人恢复名誉的问题——斯洛伐克的棘手问题。

诺沃提尼反击斯洛伐克人的抗议不是孤军作战。紧接着新任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也参战了，他攻击希斯科公开讨论党内问题。作为党的忠实干部，他猛烈抨击"那些无纪律和没有耐心的同志不等待最高法院的决定，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努力为被不公正判刑的人恢复名誉和为纠正错误而坚持斗争的是他们而不是党中央"。

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说是过头话。当杜布切克讲话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已就科尔德的报告开了一个多月的会，想找出一个体面的保险的办法来摆脱困境，既不为仍被当作敌人的人恢复名誉，而又不致引起新的不安定。杜布切克可能是劝说人们要有耐心，但事实是，要不是知识分子和舆论造成公开压力，为许多人恢复名誉的工作还会拖更长的时间。

胡萨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九六〇年大赦后胡萨克就出狱了，但是不论杜布切克或是当局的任何其他人都不想为他恢复名誉。最后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由于斯洛伐克人的不断坚持要求，他的党籍才被恢复。他的彻底平反仍然拖着，但这时胡萨克已能够离开布拉迪斯拉发建筑公司，作为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员可以在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研究所得到一职位。在等待恢复名誉期间，胡萨克完成了关于一九四四年斯洛伐克起义

的著作。（在这个时期，胡萨克的命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掌握在杜布切克手中。我们可以猜想，这点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之后是否影响到他对杜布切克的态度。）

知识分子的斗争看来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是第一次使反抗的作家、新闻记者和艺术家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中的一个真正起作用的因素。他们现在开始使他们的影响在文化和政治自由的更广泛的范围内表现出来。

一九六三年五月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争得了对本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家"颓废派"作家弗·卡夫卡和卡·恰佩克的正式恢复名誉。需要这样做似乎有些荒唐可笑，但对作家们来说，这是具有根本原则性的一件事。他们举出理由说，只要还禁止阅读和研究卡夫卡和恰佩克的著作，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自由就不可能得到恢复。支持为卡夫卡恢复名誉的人是爱·戈尔德斯图克，他在大清洗坐牢后也将要恢复名誉。整个形势都带有卡夫卡的印记，本来，在共产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每件事都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谴责斯大林主义和谈论自由问题的新的一代剧作家和作家的首批作品问世了。剧作家瓦·哈维尔一九六三年当他完成他的大型剧作《花园舞会》时二十七岁。这是一个谈论非斯大林化和共产党官僚主义的讽刺剧。颇使人感到吃惊的是，当局为了寻求妥协竟让这个剧在布拉格上演了。它十分受人欢迎，因为公众喜

欢哈维尔讽刺性的使用共产党的隐语。研究东欧文化的一位美国作家约·布卢姆菲尔德计算过，哈维尔光在第三幕中使用"消灭"这个词或其略加变化的说法就达九十次之多；十五年来这个词都成了"禁忌"，布拉格的戏迷们当然听个没够。

就在同一时期卢·瓦楚利克，一位三十七岁的小说家出版了他的小说《一座忙碌的房子》，这也是攻击斯大林主义行为的。这标志着瓦楚利克登上政治舞台；他后来成为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类似性质的其他著作也正在创作中。姆尼亚奇科也准备好了要出版他的《迟到的报告》，拉·布劳利克，一位较年长的共产党员记者，正在完成一部描写斯大林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狱中生活的毁灭性的小说。

在一个文字的东西能比坦克引起更大注意的国家里，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不断夺得重要阵地。他们不仅又能够比较自由地写作和出版，而且他们中的自由派在一九六三年能在作协和记协掌握领导权，能够控制象布拉格的《文学报》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文化生活》、《文化创造》和《源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从这些阵地他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舆论和政治。统治当局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们进行反击，他们和党的正统派之间的斗争一直无结果地进行到一九六七年。

科尔德报告的结论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经过长期斗争之后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公布了。它包括四百八十一个被恢复名誉的党员案子，文件公开列举了七十个人的名字。考虑到在大清洗期间还有数以千计的被监禁人员未被提到，从数字上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文件。但它的政治重要性却是不寻常的，因为它包括了大清洗中所有主要受害者，而且众所周知，为这些人恢复名誉是公众压力逼出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当局悄悄释放了大主教贝兰，他整整坐满了一九四八年判的十四年徒刑。但捷共坚持要放逐他。贝兰离捷去罗马，一九六九年八十岁时死在那里，从未再看到他的祖国。

一九五二年被处决的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和他们的九名同案犯被洗清了所有指控的叛国、铁托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等罪名。但是奇怪的是，斯兰斯基、奥·什林、雷孝将军、奥·费舍尔和卡·什瓦布没有去掉“政治责任”或者说没有在同党有关的思想意识方面恢复名誉。很明显这是顾全诺沃提尼的面子的做法。这就造成了一种古怪局面，斯兰斯基和他的四位同犯在一九六三年只被恢复了“三分之二”的名誉；为了最后的“三分之一”，他们的鬼魂还得再等五年多的时间。

对于清洗的幸存者来说，恢复名誉还有勾销他们犯罪历史的实际意义，在可能的情况下，允许他们恢复党籍，这就为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开始新的政治生涯

打开了大门。胡萨克就属于后面这种情况，一九六三年三月他得到了彻底平反，还有许多以后在布拉格之春中很突出的人物也是如此。这一过程使人感兴趣的一个方面是，在斯大林时期被他们的党内同志剥夺了党员资格并被监禁起来的共产党员中，绝大多数愿意并迫切地希望重新加入党。必须再次提到他们这样做的动机问题：是出自对党的新的信任，是尽管遭受迫害但心理上无法同它割断联系呢，还是一种有意识的机会主义？

但恢复名誉并不能解决诺沃提尼的政治问题。公开承认审判案是没有丝毫真实证据的假案，就要求解除与清洗有关的更多人的职务，因为光对巴契列克、科列尔、科普日瓦和切皮奇卡等人进行处理显然是不够的。同时也有来自莫斯科的要求加速非斯大林化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继续衰退，迫切需要更换上层领导人以制止局势恶化。一九六三年工业生产下降百分之零点七，整个国民收入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三点七。情况是灾难性的，当时执行的五年计划的原定指标一年之内降低了三次。

被选来作主要替罪羊的人就是西罗基总理，他从一九四五年起就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物。他的名字一再同清洗联系在一起，作为总理在理论上他应对经济的崩溃负责。于是西罗基在九月份被撤掉了总理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副总理雅·杜兰斯基，另一个老资格的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人同许多较低级的官员一起被解除了职务（但

杜兰斯基还留在主席团内）。

新总理是约·列纳尔特，四十岁，斯洛伐克人，又一个新一代的党机关工作人员。象情况表明的那样，列纳尔特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能经受得住各种政治风浪，喜欢在党政不同岗位上变来变去。负责经济、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新任副总理是奥·切尔尼克。

还没有被委托改革脆弱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但被积极推荐来做这件事的是奥·希克，四十四岁，是科尔德保护的人。主要兴趣在经济方面的科尔德一九六二年把希克提拔到显著地位，使当时只是一个集中研究思想意识问题和社会政治科学的不重要的党的知识分子希克一跃而为党中央委员，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虽然希克在经济方面的学术地位不高——他没有这方面的学位——他对利别尔曼市场经济理论感兴趣，后来又对南斯拉夫的集体管理试验感兴趣。一九五八年他出版了《经济，利益，政治》一书。科尔德对希克的思想感兴趣，开始推荐他。一九六三年希克直接被指派参加中央委员会的思想意识委员会，但在一九六四年捷经济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时，他被调到经济委员会，开始计划改革。与此同时他写了一本关于经互会的书《论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问题》。

改组政府之后，诺沃提尼又再次着手来整顿摇摇欲坠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X II

诺沃提尼：半截子暴政

诺沃提尼稳定局势的努力是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开的一次专门研究思想意识问题的中央全会开始的。从下述意义上讲他是相当成功的，在以后的三年中他同共产党进步分子斗争有所缓和。经过一番努力他还能暂时控制住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本身也需要时间来重新组织和准备将来的斗争。

但诺沃提尼再一次错误地把策略上的有利条件当作了政治胜利，开始表现得好象从来不曾有过非斯大林化这回事，好象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可以撒手不管了。这样，他就全面地卷进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争论中去了——其中绝大部分是他自己惹的——最后他被自己激起的反抗所推翻。

同他一起力图控制仍具有爆炸性的国内局势的领导班子从思想意识上讲是可靠的，或者看起来是可靠的。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人觉得与一九六三年清洗前诺沃提尼为首的领导班子比较起来，它还不太令人反感。亨

德利赫和考茨基是亲莫斯科的思想、宣传和文化问题专家——他们大概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最迫切问题。公安工作掌握在斯特劳加尔手中，是一位可靠的强硬路线者。科尔德和切尔尼克分别从主席团和政府角度监督经济，而希克则在计划改革经济。总理列纳尔特和负责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似乎是没有特色的人物，外交部长戴维也是如此，他们都无条件地忠实于莫斯科。杜布切克只是在诺沃提尼在斯洛伐克问题同他进行无谓纠缠时才开始表现出他的个性。

使人吃惊的是，一九六三年研究思想意识问题的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预示了五年后出于同样理由在苏联入侵后由保守分子发出的恶毒和疯狂的攻击。这里出现的是正统的斯大林主义的马列主义阐述者同新的一代之间根本性的分歧。对新的一代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正义和自由，有持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阻碍地交流思想，每个国家的党有能力自己作出决定。这是关于共产主义在现代世界上作用的根本性的哲学上的冲突，它对整个思想意识及苏联在其中的地位提出了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比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人走得更远。匈牙利人只是想赶走俄国人。捷克斯洛伐克的思想挑战是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主张“多中心”的新思想相配合的——其中突出的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当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他们仍然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里提出这一想法时，同一思想被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采纳了，他一九

六四年同苏联领导人在雅尔塔举行会议期间写的备忘录中论述了这个思想；另外这个思想也被罗马尼亚共产党采纳了。

布拉格的官方反应具有通常的遁世者的特点。在思想意识会议上，诺沃提尼谈到捷克斯洛伐克报纸“毫无根据的胡作非为”，谴责文学刊物的“修正主义”和宣传修正主义的“可耻作用”。作家和新闻记者被指责“狡猾地诋毁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和进行政治“讹诈”。会上发出了加强党对宣传控制的号召（这又是一个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的预兆），提出警告若“修正主义的”编辑和作家不按党的要求行事，他们将被“坚定的”共产党员所代替。

一九六四年初在知识分子和统治当局之间曾有一个简短的休战。但在一个月之内休战就不复存在了。诺沃提尼再次拿起麦克风宣布，“在我们国家里自由只给那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人和维护它的利益的人，而不给那些宣传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概念的人们。”这当然就是禁止所有的不同意见。

因为许多对当局的批评来自斯洛伐克的文化刊物，诺沃提尼就同直率的斯洛伐克人争执得特别厉害。回过头来看，他粗暴地对待他们是加速他的统治垮台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但诺沃提尼却认为，只要他控制了斯洛伐克党的官方机构，一切都会好的。斯洛伐克两位高级

政治家——列纳尔特和杜布切克毕竟是他毫无问题的支持者，而杜布切克对斯洛伐克进步分子公开表示不耐烦也有案可查。

作为布拉格组织的反斯洛伐克运动的一部分，《红色权利报》四月份指责斯洛伐克报纸是“抗拒的和思想上敌对的”。杜布切克控制的斯洛伐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放弃了以前对当局的批评，转而响应官方路线。这只能激励反抗者更加坚定，《文化生活》、《文化创造》和《源泉》相继宣布，它们对真正马列主义的解释是正确的，它们将推行它们的进攻路线。《文化生活》火上加油，连载拉·姆尼亚奇科写的具有摧毁性的反苏小说《迟到的报告》。布拉迪斯拉发的出版社跟着出了该书的单行本。三十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有的还在黑市高价出售。一度曾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姆尼亚奇科不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少数人的阴谋活动，而看作是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根本歪曲。布拉格的《文学报》对这本书的“作者和出版者的难以令人置信的……勇敢”公开表示了敬佩。

下面就是诺沃提尼所能作的一切。《文化生活》的编辑帕·斯特夫切克被解除职务。姆尼亚奇科被调离斯洛伐克作协主席团，在一九六四年的选举中禁止他竞选国民议会议员。在布拉格，伊·肖托拉丢掉了《文学报》编辑的职务。

然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有三千名青年人聚集在

布拉格佩特仁公园里捷克十九世纪民族主义诗人卡·希·马哈的纪念像前举行诗歌朗诵会。几百名警察带着警犬和外包橡皮的警棍夫冲散了集会，学生们又打回来，喊着“自由万岁！”“打倒盖世太保！”的口号。青年们离开了公园，但黄昏在圣瓦茨拉夫塑像附近，他们又组织了另一次示威——这是一九六八年在市中心举行的盛大示威的前奏。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的反抗在扩大。流行歌曲和衣着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布拉格对爵士音乐和摇摆舞音乐着了迷，好象是在对斯大林主义年代里的单调和乏味进行报复。人们热衷于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的爵士乐，这已不再是秘密的了，当局已停止了对广播干扰。在官方奇怪的同意下，夏季举行了一次国际爵士乐会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扭摆舞以及类似的舞蹈成了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人中风行一时的东西。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出现了穿蓝色牛仔裤和留胡子的人。很清楚，反抗统治当局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办法，扭摆舞曲和长发变成了政治武器。当时《纽约时报》的宗教栏编辑约·科格莱访问布拉格和其他东欧国家首都，回来后向我指出，共产党国家青年人的共同特点是“崇拜约翰·肯尼迪，《夜间陌生人》的曲子，长发和牛仔裤。”无意中美国正在以特殊的方式帮助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积聚力量。这样诺沃提尼不但要同本国式的反抗进行斗争，而且也还得与关于肯尼迪的神话、美国的音乐和服装、爱·阿尔贝、

阿·米勒和田·威廉斯的戏剧作斗争，捷克斯洛伐克的剧院经理们正在把这些剧本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一九六四年布拉格的统治者已不再能够把这个国家同西方的影响和思想隔绝开来了。为取得西方外汇，他们需要西方旅行者，他们想搞贸易——思想、书籍和唱片就随参观者源源而来。

秋天，十月十一日，布拉格的大学生在瓦茨拉夫广场上几乎闹了四个小时。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有一个青年爬上脚手架顶高喊，“谁拥护共产党？”下面群众回答，“没有人！”

当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突然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时，诺沃提尼再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赫鲁晓夫的政策给他制造了麻烦，但诺沃提尼从一九五七年起就同他保持着热诚的私人关系。就在被革职前两周，赫鲁晓夫还同他一起在斯洛伐克一个休养地度过假。对赫鲁晓夫的倒台事先苏方没有向他透露而感到恼火的诺沃提尼，竟向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对这一事件表示捷克斯洛伐克的遗憾。苏联新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这一反应当然感到不高兴。尽管他是一个要把新斯大林主义带回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但他同老斯大林主义者诺沃提尼的关系从未得到过改善。

当骚乱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扩大的时候，苏联共产主义正统派在罗马尼亚遭受到另一个打击。它是以罗共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扩大会议发表的决议

的形式出现的。这一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被称为“罗马尼亚独立宣言”的决议自然是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比较谨慎的党的声明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声明大部分是通过攻击斯大林来隐晦地批评苏联的。如果说主要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九六一年的声明带有民族主义的味道，那一九六四年的决议就以正面形式表达了业已牢固建立起来的罗马尼亚的政治和思想立场。反抗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刚在开始形成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新观念，而罗马尼亚党已经以压倒一切的团结一致制订出一个严密的政治行动纲领。

一九六四年决议所表达的这一纲领的要点是：“谁都不能代替别的国家和党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任何一个党都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特权地位，不能把自己的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别的党。”

决议列举了罗马尼亚共产党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国家间关系应遵循的原则：“主权……权利平等……民族利益……不干涉内政……每个党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它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罗共说，这些原则是维护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所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们看到的罗马尼亚党的立场，除别的原因外，也是出自它一贯反对苏联的经互会计划的主张。几项原则

中包括不干涉内政这一条可能是直接针对一九六三年秋赫鲁晓夫策划推翻乔治乌—德治和他的政权（但未能成功）的政变企图而言的。在高级政治水平上的中苏争论的日趋尖锐化同时完成了两件事：首先，它使罗马尼亚人感到宽慰地得知中国共产党也拒绝苏联关于“老子”党的观念；它还使他们相信绝对必要阻止再发生把具有独立思想的党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的事。罗马尼亚党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曾积极参加签署共产党情报局攻击南斯拉夫的文件，现在在争取共产党“平等权利”的斗争中它发现同北京、地拉那和贝尔格莱德有共同语言。

关于苏联一九六三年阴谋在罗马尼亚恢复莫斯科统治的情况人们很少了解，只知道确有其事，知道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党坚强团结面前，曾不顾一切地策动过这一阴谋。一九六三年七月间，赫鲁晓夫曾把东欧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包括乔治乌—德治在内集合到莫斯科，强迫他们一致接受苏联集团内的经济一体化，但又一次遭到罗马尼亚的反对，迫使赫鲁晓夫把他的计划搁置起来。这时苏联人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决策。假若罗马尼亚起来公开反抗他们或者共产主义本身——象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干的那样——赫鲁晓夫就可以有借口进行一次讨伐。当勃列日涅夫相信神圣的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严重的威胁时，他毫不犹豫地下令进行一九六八年的入侵。但罗马尼亚的党完全控制着国家。它没有反抗性宣

传引起莫斯科思想上的担心和愤怒。罗马尼亚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活动，从未考虑退出这些组织。它所作的一切——当然不少——就是拒绝盲目追随苏联。它也拒绝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中国。实际上它还莽撞地试图调解中苏争论。总而言之，布加勒斯特的政策是恼人的，甚至是使人不安的，但很难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发动入侵，即使我们设想，刚从同美国在古巴的对抗中解脱出来、被同中国的争吵所困扰的苏联想用武力解决罗马尼亚问题的话。

于是赫鲁晓夫就想找个政治阴谋性的解决办法。人们知道他九月左右秘密去过布加勒斯特，可能既是为了给乔治乌—德治下最后通牒，也是为了在罗共领导集团中寻找支持者。但是乔治乌—德治及其同事们不吃这一套。罗党各级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准备参加这一政变。罗马尼亚问题的观察家们相信，赫鲁晓夫曾希望谋求波德纳拉希将军的支持，但是这位比萨拉比亚老人拒绝了，并进而把此事报告了乔治乌—德治。此时，齐奥塞斯库除在党内担任高级职位外还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他个人在军队中的威信，使他有足够力量保证军队支持现政权，即使波德纳拉希想搞阴谋的话。

罗马尼亚人能自我克制和老谋深算，不愿使没有搞成的政变的丑闻张扬出去。实际上在公开场合连一个字都未吐露，透露出来的都是间接而微妙的。即使间接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武器，罗马尼亚人聪明地利用了它。在

关键性的地方作出了暗示，过了一周左右，绝大多数国家都知道了俄国人干了某种邪恶的事。这是乔治乌—德治博得公众支持的手法之一，这一技巧后来被齐奥塞斯库提升到了高级艺术的地步。

就在此时，罗马尼亚由于毫不理睬苏共一九六四年初提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来谴责中国的建议而更加得罪了莫斯科。罗马尼亚的报纸几个星期都不告诉它的读者此项消息——而其他东欧各国的报纸则一栏又一栏地加以报道——罗共清楚地表明，它既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也不参加对中国的任何谴责。（后来事情发展实际情况是，为组织这次代表会议苏联花了五年时间，当它最后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举行时，没有发表任何谴责文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应归功于罗马尼亚的反对。）

前面已提到，共产党领导人对彼此的生日很重视，利用这种机会作为一种“微妙”的姿态来表示他们赞成什么和不赞成什么。罗马尼亚人也是共产党生日游戏的精采表演者。大概是为了强调罗马尼亚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乔治乌—德治一九六三年没有去东柏林祝贺乌布利希的七十寿辰。一九六四年四月他是东欧党的头目中唯一的一个抵制莫斯科为赫鲁晓夫七十岁生日举办的庆祝活动的人。实际上乔治乌—德治就在同一个星期召开了中央委员会，这是一种故意刺激人的恶劣作法。

三月底，在他生日之前，赫鲁晓夫突然来到布加勒斯特，住在苏联大使馆，叫乔治乌—德治去拜访他。自从

一九五六年他无视波兰人的愿望访问华沙之后，他就养成了一种习惯随意去访问他的兄弟共产党的头头，有时不经邀请，有时不予宣布。他在六个月之内第二次秘密访问罗马尼亚的明显目的，是想说服罗马尼亚不要同中国搞得太亲密了，或者不要发表同苏联正统派不同的文件。在叙述这第二次访问时保·伦德瓦伊报道说，乔治乌—德治得悉赫鲁晓夫来到他的首都时，冷谈地通知苏联大使馆说，罗马尼亚国家元首“不习惯到外国大使馆去进行谈判”，如果赫鲁晓夫想见他，可以下午到总统府来拜会他。他们真的会见了，肯定这次交锋的结果使他们的个人关系破裂了。罗马尼亚人的下一个步骤就是举行中央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

整个一九六四年，两国政府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罗马尼亚决定开始实行非俄国化政策，包括取消作为中学必修课程的俄语课；用西方的东西换掉了许多苏联繁琐的文学和理论的陈规戒律，这使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感到高兴。五月副总理乔·加斯通—马林飞往华盛顿同哈里曼商谈一项重大的经济协定，并把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我还记得，在加斯通—马林访问结束前夕在华盛顿银莲花大旅馆举行的罗马尼亚宴会上，我就听到出席这次香槟酒气四溢的宴会的东欧其他国家外交官关于罗马尼亚的不高兴的和恶意的窃窃议论。十二月罗马尼亚党拒绝了苏联关于参加计议中的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的邀请。

必须指出，虽然罗马尼亚非常强调它在对外政策上的独立性，但它在放松内部控制方面甚少作为。乔治乌—德治相信，每个党自己有权探寻它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在他的观念中却不包括已在吸引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化”。直到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他去世，罗马尼亚还是个共产党警察国家，虽然不声不响，但很厉害。秘密警察严密地控制着人们和思想。在乔治乌—德治统治期间罗马尼亚约有一万名政治犯，虽然到一九六四年底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释放了。

只是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作为乔治乌—德治的接班人继任党的总书记后，罗马尼亚的内部生活才有了一些放松。甚至齐奥塞斯库也未敢进行大胆的试验，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才采取重大步骤与乔治乌—德治的独裁割断关系。

为什么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尽管在对外政策上持有不妥协的立场却不想宣传和实行政治改革，这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似乎不论乔治乌—德治还是齐奥塞斯库都不相信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也不愿把共产主义变成多元化的政治社会。其次，他们两人都意识到，任何公开的修正主义行动会很快招致苏联的惩罚。莫斯科可以容忍——现在仍然在容忍——对外政策上一定程度的背离和独立性，但对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进行挑战肯定会招致立即的反击。这种事情已经在匈牙利发生过了，后来又在捷克斯洛伐克再次发生。最后，罗马尼亚没有进行过五

十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过的那种可怕的大清洗。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都不需要对付诺沃提尼面临的那种巨大洪流。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范围早就远远超出了难控制的一小批作家和记者，对当局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反抗。一九六三年的反抗已不是少数人在真空中的活动了。全国人民都在这样或那样地受到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根本改革的团结一致的运动的影响。

诺沃提尼的选择余地一天一天地变小了。奥·希克被允许来制定一个预定在一九六七年初开始实行的温和的经济改革计划，但当局知道进行这一工作需要科学院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合作。因为科学院越来越为进步分子所控制，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是不行的，那么做，诺沃提尼就会失掉为提高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使之摆脱困境所最需要的人。

几乎诺沃提尼采取的所有行动，无论是反面的或是正面的，都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作为斯大林政治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在那里每件事物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他简直无法控制新的、十分复杂的局势。在文化方面他被迫放松控制——允许出版书籍和剧本，允许西方影响的不断侵入——只能是鼓励已进行过一次冲击的知识分子渴望得到更大成功；而他的镇压行为结果又是自食其果。

首先是齐萨日事件。一九六三年五月领导集团改组

时，杜布切克成了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四十三岁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切·齐萨日被任命为捷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虽然齐萨日博士是个机关工作人员——清洗时没有受到伤害，一九五六年任比尔森州委书记，一九五七年来布拉格任《红色权利报》副主编，一九六一年任捷共中央思想月刊《新思想》主编——他被认为是个自由派，他的任命被人认为是对知识分子的让步。但是他的观点对保守的中央书记处来说是太激进了，四个月后，当诺沃提尼在九月份提升列纳尔特，改组内阁时，他被降为教育和文化部长。

走上新的岗位之后，齐萨日很快就着手改革仍以一九五三年苏联起草的教育法案为基础的捷克斯洛伐克教育制度。他使课程表更加灵活，削减党的思想灌输，努力使专业人员的任命摆脱党的控制。他同时同自由派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常保护他们。这位说话朴实、剃平头、戴眼镜的齐萨日很快就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他曾在查理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和其他地方的学生和教授中间享有声誉。象他那样鼓励对话和文化自由不可避免地要被当局排斥。但他不可能政治上被完全排挤掉——他在知识界的声望太高了——解决办法就是一九六五年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当大使。捷克斯洛伐克事务分析家当时评论说，齐萨日被送走并不是因为诺沃提尼不喜欢他，对他生气，而是因为害怕他。但是派齐萨日去布加勒斯特，诺沃提尼再一次表现了他做错事的本领，

他的这一行动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进步分子和具有独立思想的齐奥塞斯库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这种友谊在以后几年里起了很好的作用。

继齐萨日之后任教育和文化部部长的是伊·哈耶克教授——这一任命证明是诺沃提尼的一个更大错误，因为哈耶克在一九六八年成了布拉格之春的一位主要发言人。但是说句公道话，诺沃提尼不应为此而受指责，因为哈耶克个人历史是与党一致的。他被任命为教育和文化部长时五十岁。哈耶克是一位非常精明和有语言天才的人。他原先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九四八年夺权之后他参加了共产党。一九四九年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任命为布拉格政治经济学校副校长并被选为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当时他非常年青，才三十四岁。

五十年代的动乱没有触及他。当外交部进行大规模清洗时，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去纽约，在那里从一九五〇年呆到一九五三年。回到布拉格后他被任命为查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并写了一本名为《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破坏活动》的书，（这是一本攻击威尔逊总统及其在创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的作用的小册子）和一系列反美文章。一九五五年他任驻伦敦大使。一九五七年他任外交部副部长，一九六二年又被派往纽约，这次是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诺沃提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招回他，任命他为教育和文化部长。美国耶稣会大学教授和《美国》杂志编辑鲁·格

伯访问布拉格后写道，交给这位新部长的任务就是堵住"横扫全国的文化洪流"，从哈耶克的经历看，格伯这么想并不使人感到惊奇。至于哈耶克博士如何去完成他的任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九六五年初诺沃提尼任命主席团委员亨德利赫取代完全亲苏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弗·考茨基担任中央委员会思想意识委员会主席。亨德利赫是诺沃提尼最亲密同事之一，看来是最适合于在危机时刻领导思想和文化运动的。他和哈耶克应该通力合作，但亨德利赫的任命后来证明是个大失败。

一九六五年当局为努力使反抗的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撤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哲学家伊·斯维塔克查理大学哲学教授的职务。斯维塔克是一个瘦长难看但十分机敏和具有惊人智力的人，是新的一代当中第一批真正马克思思想家中的一位，又是在他的国家里首先公开主张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应该同党的思想混为一谈的哲学家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曾声明说，哲学家不应该是政治的扁佣文人和"拿着学位证书的小丑"，而应该是负责任的思想家。不久，他被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解职，开除出共产党，不允许他教书和出版著品，还吊销了他的护照。

反击行动中的另一个成就是迫令两个直言不讳的文学刊物《脸面》和《书的文化》停刊。《脸面》是作协的一个热情地支持文化和政治自由事业的刊物，它被指责

宣扬“无耻的自由主义”，党要求对编辑进行清洗。作协主席团一九六五年十月表面上同意这样做，但大约有三百名捷作家在一份宣言书上签名，抗议“再一次用行政措施来代替文学讨论。”主席团坚持要任用新编辑，但《脸面》杂志拒绝，结果一九六六年初这个刊物就根本停止出刊了。《书的文化》是教育部出版的刊物，由于经常刊登不受捷共欢迎的作家写的文章而得罪了领导。教育部就干脆把它停刊。

理论上说，当局对这些刊物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因为它们是政府自己出版的或是由政府或党控制的机构出版的。还有，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捷共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习惯于严格控制宣传的诺沃提尼和亨德利赫却不再经常和更严厉地采取镇压措施了。当局越来越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常常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电影事业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一九六四年以后它处于光辉的复兴时期。在摆脱了思想束缚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工作者就能生产出象扬·卡达尔和埃·克洛斯的《大街上的商店》和米·福尔曼的《金发女郎的爱情》这样的优秀作品，他们的自由只是偶尔才受到压制。

自由问题是在东欧各国同时都存在的问题。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政权把一次旨在使这个国家摆脱完全忠顺的苏联卫星国地位的军事政变阴谋消灭于萌芽之中。在

南斯拉夫，铁托总统一九六六年在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内自由化中戏剧性地搞掉了他的公安机构头子。

保加利亚的这一事件，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综合起来大体如下：一小批高级军官和外交部官员曾计划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或者是把日夫科夫完全搞掉，或者强迫建立一个不太顺从苏联愿望和共产主义正统的新政府来使日夫科夫中立化。这次政变——这是我们了解的战后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唯一的一次军事政变阴谋——是由国防部副部长、党中央委员伊·托多—戈伦尼亚、索非亚卫戍司令伊·阿涅夫将军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佐·克拉斯特夫策划的。另有三名重要军官卷了进去。所有九人战时都打过游击，都是“国内派共产党人”。可以认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受了近邻南斯拉夫的影响。

但是日夫科夫政权，据称在苏联情报官员的帮助下，在计划发动政变的日期前一周把阴谋粉碎了。托多—戈伦尼亚将军被捕后自杀。其余的人受审后被判处了徒刑。保加利亚政府从未谈过这次流产政变的全部过程，但在事件发生后一个月日夫科夫曾嘲笑式地谈到“一小撮可怜的冒险家。”他后来告诉一位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这次阴谋是“亲中国的”。（不到两年以前，一九六三年九月保加利亚审判和处决了它驻联合国的一名高级代表阿·乔治耶夫，罪名是“向美国提供情报”。这一案件也从未作过全面的公开解释。）这次政变计划

失败之后，保加利亚又重新陷入暗淡的卫星国地位。

在南斯拉夫自铁托撤销亚·兰科维奇副总统职务之后，国内自由的事业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兰科维奇的军衔是大将，他把他所领导的安全组织建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权力机构。兰科维奇下台和接着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中央全会后被开除出党的表面理由是，发现他窃听铁托元帅和多数高级干部的私人电话。兰科维奇的阴谋若如所说的那样，它之所以败露应归功于忠于铁托的军事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反过来窃听了这位塞尔维亚将军及其高级同事们的电话。但更为深刻的理由是，兰科维奇——此人一度曾被考虑作铁托的接班人——自己是一个强大政治集团的头头，据铁托同事们说，这个集团得到苏联的支持，它反对铁托最近进行的经济改革。同这件事搅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因素，即兰科维奇的地位助长了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的突出地位，而当时铁托正竭尽全力加强联邦中六个共和国的真正团结一致。

兰科维奇下台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安全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指责，进而大大缩小它在南斯拉夫生活中的作用。接着就是政治上普遍放松控制。获释出狱的人当中就有米·吉拉斯。兰科维奇本人没有被捕。七个月之后，铁托取消了对他及其同伙的刑事控诉。但是直到今天兰科维奇仍处在秘密监视之下，被当局认为是有亲苏保守错误的“宗派主义者”。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受到特别的监视和注意。

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这十八个月标志着向诺沃提尼政权进攻的最后准备阶段。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革命阴谋正在捷克斯洛伐克酝酿，那就又错了。反对现制度的运动——实际上是反对现有权力机构的运动——更象是一种自发的内部燃烧。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有几十个从事各种职业的非正式集团，他们互相并没有联系，也没有想去建立任何这种联系。这些人是在各种专门的科学和文化机构工作的，他们在总的倾向上凑巧合流了。有的人在捷共领导机构中工作——如经济学家希克和哈耶克——有的人在科学院工作、在电影业工作、在作协和记协工作或者就是报刊杂志的撰稿人、广播、电视的广播员和专门为写书写诗和写剧本绞脑汁的人。

当时气氛的显著特点是，党内党外都没有人考虑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没有人想推翻诺沃提尼，夺取政权。事实上在捷共领导层中也没有人能够——在这个时候杜布切克肯定不能——策划一次政变来使诺沃提尼退位。布拉格之春后，我向许多进步领导人提出过这一问题，他们一致的回答是，当时强调的是通过内部的迅速演变来改变局势而肯定不是进行一场革命。这有助于证明，第一，布拉格之春不是哪个人蓄意制造的；第二，当它真的来到之后，又缺乏统一的领导。

知识分子争取自由的斗争以前些年同样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只是步伐加快了。因为当局的书报检查官想互

相取消检查(他们中有些人秘密同情自由派)，卢·瓦楚利克才能够将他的小说《斧头》出版，它是一部描写共产主义制度下捷克斯洛伐克改造人的辛酸经历的小说，被誉为这一代人中的一部杰出的捷克文学作品。《斧头》的风格是由很好穿插起来的一位记者——叙述者——主人公来评论：他不再接受党要求党员作的“自我恐怖”行为。“捷克人的所有发明就是：我们是如此民主地对自己实行恐怖统治，无人能够幸免，以致达到无人可杀的程度”。作协授予瓦楚利克一九六六年文学奖金。

但另一位青年作家米·孔德拉的小说《玩笑》一直拖到一九六七年才出版，因为图书检查官要求他修改书中描写由于政治上“不可靠”被派去进行艰苦劳动的不带枪的士兵的一段情景，但孔德拉拒绝这样做。接着，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当局竟授予《迟到的报告》的作者姆尼亚奇科功勋艺术家称号，尽管两年前他被赶出了作协主席团，现在正在写《权力的滋味》这本书，它描写一位高级共产党官员开始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后来蜕变成一个腐化的独裁暴君。当这本书终于出版之后，它在捷克斯洛伐克起的作用同吉拉斯谴责新的“红色资产阶级”的《新阶级》一书十三年前在南斯拉夫所起的作用差不多。布拉格当然为写这种小说提供了一切所需的实例。诺沃提尼过着贵族式的豪华生活，他的别墅建在金斯基花园树木葱笼的小山间，里面安装着蒸汽浴及其它高级设备，外面戒备森严。党的其他官员(除

少数例外，如杜布切克）生活也相当奢侈，他们免费到别的共产党国家幽静的休养地渡假（他们也请别国官员到捷克斯洛伐克来渡假），还同外国同事们交换贵重的礼品。

知识分子的抗议现在超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某种类似国际声援的行动开始在各共产党国家的作家和艺术家之间展开了。苏联作家尤·达尼埃利和安·西尼亚夫斯基一九六六年二月在莫斯科被判处苦役时，一群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去到苏联首都进行抗议。（一九六八年入侵后，苏联的知识分子也企图这样作，其中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这种勇气而坐了牢。）

科学院的二十八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和建筑学家在哲学研究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的领导下一九六六年发表了一份关于在技术革命中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报告。这篇题为《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的报告警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不理解现代技术发展的意义，要把国家拉回到粗放式工业化的斯大林方法中去——而这是在东欧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已经承认，集约式工业化加上现代化的自动化是发展的正确道路，如果经互会集团不想远远落后于西欧的话，更不用说同美国比了。

当希克正在完成他的“新经济模式”改革和利赫塔小组正在调查实行科技革命时，科学院又开始了另一项

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项目。这是个革命性很强的项目，因为它触及到随着经济改革的进程政治上应进行些什么改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进行 这项 研究 的委 员会（应该叫作新政治模式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兹·姆林纳日，他三十六岁，是科学院的一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姆林纳日开始是个很谨慎的共产党进步分子——实际上他曾批评过作家们，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但他后来变成了布拉格之春的一位关键性领导人。

经济改革若没有政治上的改革相配合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的看法——这两种改革都要求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不仅在知识分子当中强烈地传播着，而且也不断在政府和党的比较年青的干部中传播着。姆林纳日委员会从政治改革必须伴随经济改革这一设想出发，它的研究马上就集中到人民群众对捷克斯洛伐克现行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的态度上来了。捷克斯洛伐克人远远走到罗马尼亚人，甚至南斯拉夫人的前面去了，这两国人仍然认为，经济自由化是可以的，而人民生活自由化是不行的。当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四日在布拉格开会期间，希克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说实行经济改革需要进行基本的政治改革，那些建议实行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的人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布拉格之春的思想轮廓就开始出现了。总的趋势是要求改革共产党的某些基本概念而不用触及共产主义本身。实际上新理论家们的概念是：共产主义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

自我革新。

新人就随着新的哲学在政权机构内外涌现出来，赋予这种哲学以具体形式。在政府内和党内，希克、哈耶克和齐萨日成了新思想的共同倡导者。政权外有姆林纳日、利赫塔、斯维塔克，查理大学的年轻哲学家卡·科希克和年青的优秀的经济学教授瓦·米勒。我记得有一次问米勒，他的学生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他皱皱眉头说，“甚至我的三年级的学生都知道，根本不存在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东西……经济学就是经济学。”

后来与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大人物的名字这时还没有明显地与这一复兴过程联系在一起。杜布切克几乎还是躲在斯洛伐克领导斯洛伐克党，尽管他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占有一个位子。外表上他还是忠于诺沃提尼，有时同反抗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磨擦。但是有些观察家相信，这段时间，他在保护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编辑和作家免遭布拉格打击方面做的事要比人们意识到的多。同杜布切克一起提升到党中央书记处，从一九六三年起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切尔尼克，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党的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主席团以代替七十多岁的费林格。据认为他和科尔德是支持“新经济模式”的，但要说切尔尼克对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应该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也抱赞同态度，这却无案可查。约·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九六五年任中央水利管理总局主席（部

长级），（这并不是进行思想控制的职务），他也是国民议会代表，在同一次捷共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是在进步分子的大合唱中还完全听不到他的声音。斯沃博达将军一九六五年接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勋章，并被授予捷克斯洛伐克英雄称号。他几乎不象是一个会对共产主义正统提出疑问或反抗苏联意愿的人。

一九六六年五一节布拉格也举行了当时已成为传统的青年狂欢。但是这一次有年青工人和机关干部与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活动。工人阶级，至少是青年工人，对政治变革漠不关心的状况开始消失了，尽管诺沃提尼还相信，工人们会起来保卫他的统治。在佩特仁公园马哈像前照例举行的诗歌朗诵会结束之后，年青人就下了山，经过伏尔塔瓦河大桥到瓦茨拉夫广场去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口号："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只有死了的共产党员才是好共产党员！"见了警察他们就喊"盖世太保！"五月二十五日对二十五名示威领导者进行了审判，分别判处五到十七个月的监禁。两位知名的学生领袖伊·米勒和卢·霍列切克虽未被判刑，但一九六六年底被开除出查理大学和青年联盟并被征召入伍——这件事使非政治性的组织变成了反对现政权积极活动的新温床。诺沃提尼政权有一种唤醒反对派的特殊才能。

统治当局盲目乐观，看不到形势已起了变化，想用

老一套华而不实的言词和惯用的威胁和报复来反击日益增多的批评。比如，捷共在三月迫使作家协会出版的周刊《文学报》组成一个不要进步“极端分子”的新编辑部。协会这时学会了如何对付这种惩罚，避免所谓的摊牌，提出了妥协建议，向捷共领导说这个刊物已改正了它思想上的缺点。又跟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一样：一个“好的”纸上决议胜过现实，当局感到满意了。

在五月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总的来说杜布切克成功地回避了同知识分子争论的问题。选来宣读禁令的是四十九岁的保守派党干部瓦·比拉克。直到三十二岁比拉克还是斯洛伐克的一名工人和党的小干部。他在杜布切克和胡萨克都参加过的一九四四年斯洛伐克起义中负过伤。一九五八年他突然飞黄腾达，被任命为政府中的不管部长，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副主席兼主管教育和文化的行政委员。他的学历是在捷共中央党校学习三年。一九六三年比拉克进入斯共中央委员会，地位在杜布切克之下，还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团委员。在这次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讨论知识分子作用时，比拉克宣称，有些人和某些作家缺乏“坚定的思想原则和……生活经验”。他说，认为年轻的共产党员可以免除政治上的牵连，因为他们的长辈曾无保留地支持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一种“有害的信条”。他还说，党从没有主张对作家和艺术家发号施令；但它有责任强调，“什么是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目标协调一致的，什么不是。”他鼓励知

识分子参加党的队伍，但警告说，“如果有人持同党的战略和策略相反的立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捷共代表大会五月三十一日开幕时，诺沃提尼亲自出马，向知识分子发动猛烈攻击。利用他典型的政治术语，诺沃提尼对下述情况表示遗憾，他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错误的政治思想引起的某种不正确的风气，反映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持片面的、不客观的、否定的观点，也反映在攻击党及其政策上。”他说学生们“对我们社会的价值持破坏性态度，”而某些文化刊物刊登的文章的调子是“虚伪的和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

诺沃提尼认为，有些马列主义“教员”受到“否定一切的观点”的影响，甚至积极宣扬这种观点，他不指名地威胁教育和文化部长说，“我们将作出一切努力来迅速改变和克服毒害全体青年的这种思潮。”他又对文化刊物吹毛求疵，说它在“时髦的自由主义外衣掩盖下”散布有问题的思想观点。诺沃提尼说，所有这些思想混乱“导致宣传同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相联系而虚构出来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主张不加批判地妥协地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思潮或形式。”

也许无意中诺沃提尼触及到了他和新的一代之间根本的思想分歧。他视为危险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东西，正是年轻的共产党思想家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沿着人道主义路线的重大复兴。这是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思想鸿沟。

一九六七年，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关键性的一年，是以统治当局发动的两个方面的进攻开始的。现在诺沃提尼大概也很清楚，他自己的处境已很危险，因而毫不奇怪，他力图改善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并对控制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作最后的努力，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利用大学、剧院、影院和报刊作为讲坛，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一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当局首先关切的是，如果不能改善经济，就会促使现在还很不积极的工人参加普遍的动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由奥·希克起草的、奥·切尔尼克和德·科尔德在主席团倡导的新经济模式改革纲领正式付诸实施了。它理论上的最重要之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现实地重新确定工资和物价；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和工人实行物质刺激和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把任意规定外汇比价的捷克斯洛伐克克朗变成为一种国际性可兑换货币。希克把所有这些都总结到他的一本新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经济》中去。改革的目标不仅要治愈国民经济中长期积累下来的弊病，而且还要使它具有国际竞争能力。除非捷克斯洛伐克能通过出口赚取硬通货来进口西方的技术和装备，否则它不可能实现工业现代化。

甚至捷克斯洛伐克最无知的经济学家——或者说东欧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知道，苏联没有条件来为它的集团中的伙伴提供这种技术装备。实际上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一个无底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之间它向莫斯科提供了八亿七千七百万美元的贷款，作为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发展新油田所需的石油工业设备的资金。捷克人然后又得以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一倍的价钱买进苏联的原油。由于投资和贸易，经互会，包括苏联在内，历年积累共欠捷克斯洛伐克十八亿五千万美元的非补偿性债务。这些欠款只能以苏联集团的货币形式收回，这些货币在国际上不能兑换，在西方就没有用处，或者从其他共产党国家进口捷不必要的东西，象保加利亚的西红柿或波兰的电视机。捷克斯洛伐克工厂为苏联原料加工的加工费也是用非兑换性卢布支付的。此外，莫斯科还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为了共产主义的团结向北越和古巴提供援助，这是一件花钱很多的事情；此外还要向阿拉伯人提供武器。

在这些打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只能依靠自己来改善经济并使它现代化。实际上在一九六三年危机之后也有过一些进步，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据报道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七和百分之八。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九六七年达到一千七百美元，而苏联是一千五百三十二美元，东德是一千八百美元。一九六七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增长了二十九亿美元，

尽管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对苏联出口。但是农业生产由于强迫集体化大伤元气仍停留在一九三〇年的水平上，存在着食品和消费品的严重缺乏。带着网兜的家庭主妇们一大早就在食品店门前排长队是布拉格的典型景色。

可以肯定说，希克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这时不可能考虑回到那怕是最低水平的私有经营，这种私有经营在波兰和东德是存在的，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不可能改变由于苏联贸易和投资政策给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造成的无底洞。特别是他们不可能公开建议与这些经济自由化的努力一起进行政治改革。同时，享受既得利益的党的官僚们反对改革；当局面临的问题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复杂化：对批发价格进行的必要调整引起了零售价格的上涨，而人民由于涨价受到的损失又未能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得到补偿。可以理解，改革只能在社会对其政治领导信任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则肯定不是这种情况。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因素，希克和许多其他人才在党的会议上力主政治改革是迫切需要的。但对诺沃提尼及其朋友们来说，这些论证犹如对牛弹琴，丝毫不起作用。

诺沃提尼不去寻求政治上的灵活性，相反他在一九六七年为“苟延残喘”而发动的进攻的第二阶段又同进步知识分子进行较量。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寻找粉碎知识分子反抗的办法。在二月中央全会讲话

中，亨德利赫攻击《文学报》和《客人到家》（后者在布尔诺出版）的“自由主义”。在一次长篇讲话中，他猛烈抨击一种“不是主要的、但不是不重要的文学、电影和观赏艺术流派，它在个别作品中把远离社会进步的人们的绝望和荒诞当作诗来描绘……创作自由绝不能理解为对观点模糊和无政府主义发放许可证，不能完全否定我们社会的生活。”

在三月举行的又一次中央全会上，又对作家、电影工作者和哲学家进行了新的攻击。当局禁止在捷克斯洛伐克上演《雏菊》和《关于聚会和客人的报告》等电影。不过当局也没听从国民议会有人提出的建议，把所有的进步导演作为“第五纵队”和“国家的内部敌人”统统予以取缔。

在二月全会上诺沃提尼宣布他决定把教育和文化部分成两个部。哈耶克教授留任教育部长，而把新的文化部交给了卡·霍夫曼，他是一位同莫斯科有紧密联系的极端保守的党的仆从。后来在准备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霍夫曼是从党中央思想意识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被提升为文化部长的。而接替他原来职务的是另一个名叫弗·哈弗利切克的强硬路线者。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起统治当局手里就有了一部新闻法，它自共产党接管政权以来第一次使新闻检查合法化。象一位现在生活在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Z·A·B·泽曼在他的《布拉格之春》一书中所指出的，这

项法律正好是在哈布斯堡王朝通过新闻法一百年之后生效的。这项新法律理论上讲是把检查限制在保护国家、经济和政府的机密的范围内，但在实践中，新的文化部有权来决定什么是这类机密。法律也授权霍夫曼只给各组织发放出版许可证，而不发放给个人，这就有效地禁止了任何党外或政府之外的人士发起出版一份新的报纸或刊物。毫不奇怪，新法律引起了作家和新闻记者的强烈抗议，他们不同意官方的说法，说这是向"社会主义"法制前进了一步。

当局可能以为，它已经使报纸上的批评沉寂下来，但在国民议会通过新闻法后不到一个月，知识分子就通过国家的广播网找到了另一个缺口。一月三十日布拉格广播电台就开始了以国内问题为题的一系列讨论节目，称它为《思考俱乐部》。难以想象的思想和难以出口的话语就这样从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吐出来了，因为参加广播电视讨论会的人要求随着经济改造也进行政治改革，告诉全国人民托·马萨里克和爱·贝奈斯的真正功绩，共产党人使这两位总统默默无闻已将近二十年了。这是为马萨里克恢复名誉的开始——它是布拉格之春哲学和政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也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工作人员进入了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

当一九六七年春天结束时，捷克斯洛伐克进步共产党人和粉饰太平的安·诺沃提尼正统政权之间的最后决战的号角就吹响了。

第四部分

白　日

光明照耀着捷克斯洛伐克

XIII

向左右冲杀出去

一九六七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对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共产主义的文艺复兴赖以发展的国际环境，是苏联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引起关注的直接原因是罗马尼亚，它顽强坚持独立态度，阻碍着苏联实行经互会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计划，使华沙条约军事同盟不能顺利地发挥其职能，破坏着东欧共产党的团结。在苏联早已失去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控制的情况下，罗马尼亚在苏联同中国的争论中采取的“自私的”中立态度（这是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在狂怒中打断乔治乌—德治的话时使用的字眼）正在使东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战线产生一条严重的裂痕，而其战略后果是很危险的。捷克斯洛伐克战斗的进步共产党人正以羡慕的心情，仔细关注着罗马尼亚的范例，他们也想在对外事务中摆脱苏联的指挥而独立行动。一九六五年被放逐到布加勒斯特当大使的思想进步的齐萨日承担起经常向他在布拉格的朋友们介绍罗马尼亚政策的任务。

从一九六四年的"独立宣言"出发，尼古拉·齐奥赛斯库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在一篇较短的演说中给予苏联的地缘政治学新的一击。这篇演说（不知何故它在西方没有引起注意）要求解散世界上所有的军事集团，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别国领土。诚然，齐奥塞斯库承认，只要北大西洋公约存在，华沙条约就应该存在，而且他也没有作出罗马尼亚想脱离华沙条约的任何暗示。但是他的讲话使人们不安地联想起铁托的"不结盟"，而且莫斯科知道，几年来罗马尼亚用各种办法不积极参加华沙条约的军事演习。因此，勃列日涅夫匆匆赶到布加勒斯特，去对齐奥塞斯库的演说以及他的整个政策（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的后果进行规劝。可是，在不动声色的齐奥塞斯库面前，他企图留下深刻印象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正如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会见乔治乌—德治时一样的微不足道。

接着，在六月份，罗马尼亚接待了中国总理周恩来。齐奥塞斯库对这次来访的处理如同他处理勃列日涅夫的访问一样巧妙。为了表明罗马尼亚是真正中立的（而不是象俄国人开始在怀疑的那样，要蓄意同中国人勾勾搭搭），齐奥塞斯库劝说周恩来不要发表攻击苏联的讲话。最后，这位中国总理不得不发表一篇不带争论性的，基本上是即席的讲话。这样，齐奥塞斯库就取得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很少有的荣誉，即他既迫使勃列日涅夫、也迫使周恩来尊重了罗马尼亚的立场。周恩来在这次不愉

快的布加勒斯特之行以后到了阿尔巴尼亚，他对罗马尼亚人说了一些刺耳的话作为报复，可是，同他们公开争吵，对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

罗马尼亚复杂的外交游戏中的下一场，是牵涉到华沙条约的领导机构——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六六年七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在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说和勃列日涅夫访问之后，罗马尼亚人立即着手破坏这次会议。他们发现勃列日涅夫打算利用这次会议来加强华沙条约并提高它的效率时，就向西方记者透露说，他们准备提议使华沙条约“多边化”。这就是说——人们在布加勒斯特悄悄地解释道——罗马尼亚要求华沙条约的每一个成员国在它的最高指挥部作决定时都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且罗马尼亚相信，它的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应该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罗马尼亚人直率地指出，华沙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指挥官必须永远由苏联军官担任。最后，精心管理的布加勒斯特谣言工厂还制造了一条消息说：罗马尼亚还将提议撤退驻在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苏联军队。而当西方发表的关于罗马尼亚的立场的文章引起了预期的效果——莫斯科的惊慌——之后，罗马尼亚发言人就简单地否认说，罗马尼亚没有这种打算。可是发言人的这一否认故意说得令人不能信服，而克里姆林宫当然也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

因此，当华沙条约国的最高领导人齐集于布加勒斯特时，苏联把它关于加强华沙条约联盟的建议搁置了起

来，以便阻止罗马尼亚提出自己的反建议。这正是齐奥塞斯库想要达到的目的。除了一个攻击美国“帝国主义”的决议之外，这次会议所做的一切就是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欧洲各国发展双边的和多边的关系，而不管其政治制度如何。宣言也建议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而齐奥塞斯库就道貌岸然地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

六个月以后，他又同样一本正经地用这个宣言来证明，同西德这个罗马尼亚在西方的主要贸易伙伴建立外交关系是正确的。这显然不是苏联在布加勒斯特起草这个宣言时的意图，而且，罗马尼亚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同西德建交确实是对苏联的一次重大的打击。在莫斯科看来，这是西德“复仇主义者”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的一种危险的渗透，是对东德政治地位的一个威胁，也给华约其他成员国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虽然，莫斯科早就同波恩建了交，但是，按照克里姆林宫的逻辑，对苏联是适宜的事，对它的仆从国家并不一定也适宜。

罗马尼亚的这一先例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仿效。由于西德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在西方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奥·希克的新经济模式改革准备同西方加强贸易来往，诺沃提尼同意考虑与波恩建交。但是，勃列日涅夫很快就说服诺沃提尼放弃了这个想法，这有点象（在较小的规模上）斯大林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一事的重演。在捷克斯洛伐克同东德签订了一个新的二十年的友好条约以后，苏联才勉勉强强允许

它邀请西德在布拉格设立一个常驻的商务代表处。

一九六七年初跟罗马尼亚又产生了新问题。那一年的四月，苏联在波希米亚的休养地卡罗维发利召集了一次执政的共产党和一些西方国家共产党的首脑会议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突出地要讨论中国问题。齐奥塞斯库拒绝派代表团参加会议，理由是罗马尼亚对会议的“性质、程序和宗旨”都不赞成。这是罗马尼亚第一次正式抵制一个共产党的高级会议（如果不算一九六五年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举行的非正式的预备会议的话）。齐奥塞斯库没有去卡罗维发利，倒是在布加勒斯特接待了铁托（他也拒绝了苏联的邀请）。这是一九五六年以后铁托第一次到布加勒斯特去，他的访问标志着这两个“修正主义”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的开端。三月份，齐奥塞斯库决心为理查德·M·尼克松铺开红地毯，这是在苏联领导人拒绝了这个当时是美国共和党挂名的领袖访问莫斯科的要求，波兰也拒绝发给他签证之后做的。这种政治上的预见所得到的奖赏是：一九六九年八月，当时已成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罗马尼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为了抵销东欧的这些分裂活动，勃列日涅夫设计了一个通过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铁三角”来加强共产党国家集团的军事战略思想。这个思想很受波兰和东德的欢迎，因为这两个国家对当时东欧正在发生的变化越来越感到不安。波兰和东德都有苏军驻扎，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却没有，勃列日涅夫就对诺沃提尼施

加压力，要他邀请华沙条约中的苏联部队在捷建立基地。但是，考虑到国内所面临的问题，诺沃提尼意识到，发出邀请的后果对他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因而拖延不答复莫斯科。可是不久以后，他就失去了对问题的控制权。

在整个东欧，苏联不得不同那些上了年纪的、身体衰弱的领导人打交道，这些领导人在自己党里已得不到重要的支持，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保持思想的正统性，他们不得不使用强硬手段。既然这些领导人还在位，就不能多指望从这个“铁三角”或者匈牙利、保加利亚能提出多少建设性的思想。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比较年青和富有想象力的齐奥塞斯库，但他在莫斯科的眼里却是一个危险的家伙。

在国内，克里姆林宫也面临着严重问题。苏联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先受到过赫鲁晓夫的鼓励，变得越来越敢于讲话和敢于批评了。对达尼埃利和西尼亚夫斯基的定罪反而使压力加重了。一九六七年又举行了新的审讯，把亚·金兹布尔格、阿·杜勃罗沃尔斯基和维·拉什科娃等三名作家判处徒刑和苦役，因为他们对以前的逮捕和审判公开提出了批评。

同时，在乌克兰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拉脱维亚人当中，民族主义的丑恶幽灵又在抬头了。早在一九六一年克格勃就曾逮捕过七个被认为是秘密的乌克兰工农联盟的成员，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并判了刑，罪名是煽动

脱离苏联（顺便提一句，苏联宪法是允许脱离苏联独立的）。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大约有一百名乌克兰人，其中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因为他们“煽动”和“散布反苏宣传”。这些被监禁的知识分子中有新闻记者和文学批评家维·乔尔诺维尔，他编过一本对以前乌克兰知识分子审判案的大事记；诗人和翻译家斯·卡拉凡斯基；历史学家瓦·莫罗兹，他写过一本秘密流传的《贝利亚后备队的报告》；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伊·久巴，他写过一篇专题论文《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批评家伊·斯维特利奇内；作家米·霍林；作家米·奥萨德奇和画家奥·扎利瓦哈。

如同在斯洛伐克一样，在乌克兰，知识分子争取自由的要求也是同民族主义的热情联系在一起的；而乌克兰同斯洛伐克接壤，两者之间可以直接来往，这一事实谁也不会忽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纪念战时几千犹太人在巴比亚尔惨遭纳粹屠杀的事件二十五周年时，伊·久巴发表了一篇令人注目的勇敢的讲话，他谴责苏联的反犹太主义，呼吁给犹太人和乌克兰人文化权利。他说：“这是我们对千百万在专制制度下牺牲的人应负的责任，这是我们对号召我们互相了解和友好相处的乌克兰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优秀儿女应负的责任，这是我们对我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乌克兰祖国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人类的责任”。在发表这篇讲话之后不久，久巴就被捕了。（在某种程度上讲，苏联知识分子要敢于站

出来对否定他们的权利提出抗议，需要比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同行们有更大的勇气，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不大会有坐牢的危险。不过扬·贝奈斯是个例外。这位三十一岁的作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被捕，罪名是秘密地给在巴黎出版的一本捷文杂志寄文艺资料。）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诺沃提尼政权的垮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围绕反犹太主义和以色列问题展开的。表面看来，一九六七年的"六天战争"同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毫无关系。实际上，这次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冲突对布拉格的震动是很大的。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诺沃提尼对这个问题笨拙的处理方式和他对苏联政策亦步亦趋的仿效，使这场冲突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以亲苏的瓦·戴维为首的捷外交部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声明，毫无根据地指责以色列勾结"与石油垄断公司直接有关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这一举动是同（至今尚未得到说明的）苏联对阿联的警告同时发生的，苏联告诉阿联说，以色列正在准备"进攻"叙利亚，于是开罗就立即宣布全国动员。这也可能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

战争打起来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以"我们早已说过"的架势发表了一篇声明，谴责以色列侵略阿联。六月九日，当这场闪电战已接近尾声的时候，东欧

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中东采取共同政策。甚至铁托也从贝尔格莱德来到莫斯科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苏联的建议是集体地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建议立即被与会者接受了。诺沃提尼和列纳尔特立即投了赞成票，波兰的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匈牙利的卡达尔和福克、东德的乌布利希和斯多夫总理、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也一样。甚至连铁托也投票赞成，但看来他主要是为了他同纳赛尔的"不结盟"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出于对共产党团结原则的忠诚。唯一持异议的是罗马尼亚人，这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齐奥塞斯库和毛雷尔总理不仅反对同以色列断交，而且拒绝在谴责以色列"侵略"的联合声明上签字。为了突出地表现他们的抗议，他们没有参加七月份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最高级会议。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却立即着手执行莫斯科决议。六月十日它继苏联之后第一个与以色列断绝了关系。六月十一日诺沃提尼在一篇讲话中重申，以色列犯下了"侵略"罪行。

这种反以色列的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舆论中引起了灾难性的反响。捷克斯洛伐克人马上就把以色列目前四面受敌的处境同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举目无亲的情景联系起来。那些想得更远的人，甚至在以色列的对抗态度和陷于正统的共产主义大海包围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目前处境之间看出某些相似之处。

以色列战争和莫斯科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肆意谴责也使人回想起在审讯和处决鲁·斯兰斯基时掀起的反犹太主义浪潮。从东欧的标准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的不受反犹太主义成见影响的一个东欧国家，它倾向于把反犹太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的压迫联系起来。而且，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看到苏联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迅速被打败时，还感到由衷的高兴。

因此，当齐奥塞斯库七月份在大国民议会会议上讲话，阐明罗马尼亚对中东的政策时，他也表达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他说："我们想诚恳地告诉我们的阿拉伯朋友们，我们不理解、也不赞同那些主张消灭以色列国家的人的立场。我们不想向任何人提什么忠告，但是，历史的教训表明，任何民族要想通过反对另一民族的生存权利来实现自己民族的和社会的理想是决不可能的。"

自然，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级官员中是不会有人持这种立场的。可是，在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在布拉格的交通部礼堂举行的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知识分子却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一九六三年以来这是第一次举行作协代表大会，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充满激情的会议，它成了反对诺沃提尼政权的运动中的转折点。

帕·科霍乌特，这位三十九岁的剧作家，过去曾以歌颂斯大林而出名，现在却变成了一位激烈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他把关于以色列的争论公开化了。听他

讲话的除了四百名作家以外，还有捷共主要的意识形态专家伊·亨德利赫、卡·霍夫曼以及思想日益进步的哈耶克。科霍乌特说，以色列有权利在六月战争中首先发起攻击，因为“象以色列这样的小国不进攻就不能保卫自己”，他这么说也就是公开谴责了当局的政策。他反对官方报刊给捷克斯洛伐克公众提供的关于中东危机的“片面”观点，并且宣称，以色列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模范”。他说：“以色列人把沙漠变成了花园”，几乎整个以色列的农业系统是沿着“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路线发展的。杨·普罗哈兹卡在随后的发言中支持了科霍乌特的立场。

但是最富于戏剧性的还是记者姆尼亚奇科作出的姿态。一九六七年八月他竟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以色列。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在罗马发表了一个声明来说明他所采取的这一步骤。这个声明当然不可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公开发表，可是它的抄本几天之内就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秘密流传开了。声明说：

> 我正在赴以色列途中。我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旅行来表示我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抗议。由于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被禁止公开说出关于中东危机的意见，我才被迫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办法。
>
> 要我支持——哪怕是以沉默来支持——一种导致消灭整整一个民族、毁灭整整一个国家的政策，这是不可能的……

一般地说，我过去一直不能理解我国对以色列的政策。西方把我们这种政策叫做“仆从国行为”。我认为这不十分正确。我们所做的超出了仆从国所需要做的事，我们干得十分积极主动。我认为，这是同至今尚未克服的过去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系的。斯大林时代在我国发生的政治审判案所带来的一切是特别令人不快的。斯兰斯基案件起了掀起一个反犹太主义浪潮的作用。这当然是和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它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没有消除。斯兰斯基案件和它引起的后果——反犹浪潮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充分的说明。

如果我们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继续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制度就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改革。必须消灭那种混乱状况，那些可以随意解释的法律体系、那些钻法律的空子的漏洞、以及统治者随意根据自己的需要把这些法律运用到根本不适用的案件上去的权力，这些胡作非为的情况必须消灭。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但是不能保证过火行为不会再度发生。

当局对姆尼亚奇科这一行动的反应是，取消了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开除党籍，还取消了他“功勋艺术家”的称号。这是一个无力的反应，当局这么做不过是自我诅咒而已。

关于以色列的争论尽管很重要，但究竟只是处于高潮的反抗活动的一个方面。一场大搏斗是六月五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开始的。这个青

年联盟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是党的官方机构的一部分，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的青年都可以参加。但是若干年来，参加青年联盟的人数从一九五八年的最高峰一百十一万二千人大大下降了。一九六七年盟员有多少，没有确切数字，但估计在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适龄青年中盟员只占百分之二十六。青年联盟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组织"辅助警察部队"，这就使它失去了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尽管如此，六月代表大会的意图仍然是想巩固青年联盟使其成为统治当局的一个权力工具。为此，诺沃提尼到会作了报告。（苏联令人费解地派了科涅夫元帅这位年迈的布拉格解放者作为参加大会的代表团团长。）尽管会上也例行公事地通过了那些预先写好的决议，但代表大会实际上只证明了一点：这个青年联盟只是一个空架子，在全国范围内大批大批青年人都对它感到格格不入，不愿意参加它。而大学生中的各种非正式社团正在取代青年联盟的真正职能，可是对于诺沃提尼和科涅夫或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来说，这些学生社团是毫无用处的。

三个星期以后举行的作家代表大会进一步反映了知识分子同布拉格政权的疏远。五月十一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斯洛伐克作协代表会议为这次代表大会定了调子。斯洛伐克作家们在代表会议上听了斯共意识形态专家瓦·比拉克的讲话，他号召作家们"大力开展政治活动和思想交锋"，同时又一次发出警告说，"一个艺术

家决不可脱离社会主义世界观，不可向敌对思想让步。”比拉克的陈词滥调人们早已听腻了，所以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的文艺刊物对他的这篇讲话根本没有作任何报道，相反，它们却报道了斯作协第一书记沃·米哈利克的讲话。他宣称，必须“经常不断地扩大自由交换意见的范围，必须使作协的生活全面民主化，必须对批判侵犯和歪曲人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加以支持和保护。”（斯洛伐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也发表了米哈利克的讲话）。

真正的好戏是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代表大会上开场的。泽曼曾经指出，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五十年前一九一七年五月布拉格作家的反抗行动的重演，那时发表的作家宣言等于“签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死刑执行书”。

在代表大会准备期间有些迹象表明，诺沃提尼政权仍然希望能封住知识分子的嘴。根据存在着两种艺术——“一种是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的艺术”，另一种是“为广大群众的艺术”——这个概念，捷政府的文化和宣传部为作协代表大会的活动准备了一份“只供官方使用”的蓝图。这份文件指出，只有这第二种艺术才具有“主要的社会意义”，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为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新偷运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中来，文化和宣传部建议“对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出评价并估量其社会意义”。同时，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亨德利赫

和霍夫曼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同作协主席团——主要是同孔德拉和瓦楚利克商讨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主要决议的写法。在这里又一次表现出捷共对这类决议的迷信，以为它们真能掩盖住事实真相。

在代表大会上带头发言的是孔德拉（他的作品《玩笑》发表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个月）。听了他的讲话以后，会议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孔德拉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最大的繁荣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歌颂马萨里克当政的时期——然后他接着说，“可是这一发展首先由于纳粹占领、然后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中断几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同周围世界隔绝，它的丰富的内在传统被破坏，它竟沦落为一种枯燥无味的宣传工具——这是一个悲剧，其后果将使捷克民族永远脱离欧洲文明。”

孔德拉对诺沃提尼政权在文化界的看家狗说：

> 我知道，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就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受到当时的知识水平、教育水平甚至成见等等的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时期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仍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于是，作家代表大会就朝着这个方向猛攻。帕·科霍乌特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当局对以色列的政策的讲话之后，宣读了《伊万·德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的作者亚·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这封没有能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宣读的信，抨击新闻检查制度，谴责苏联作家协会不维护协会会员的权利。信中说：

> 苏联宪法没有规定审查制度，因此，审查制度是不合法的，在公开场合也从未提及它，但是，在“中央文学和出版事务总管理局”这个含混的名称下，审查制度象石头一样压在我国文学的头上，迫使我国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
> 代表大会应该要求废除对文艺作品的一切审查制度，不管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而且应该力争做到这一点……应该使出版社不必得到当局的许可就有权出版书籍……
>
> （苏联）作家协会一贯表明，它自己就是最大的迫害者之一，它怯懦地将六百多名无辜的作家弃置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结果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在官方许可召开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宣读这样的信，这无异是打在党的脸上的一记耳光。这记耳光首先是打在党的高级代表伊·亨德利赫脸上的。在这以前，他已经和作家们愤怒地争辩起来，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充满了尖刻的谴责和对立的即席讲话。由于争辩得上了火，再

加上六月的天气又热，他脱掉了上衣，大声地滔滔不绝地训诫自己的论敌。现在，当科霍乌特在会上宣读索尔仁尼琴的信的时候，亨德利赫穿上了他的上衣，愤怒地大步走出了会场。几天之后，苏联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抗议，认为科霍乌特代表索尔仁尼琴提出呼吁构成了对苏联内政的干涉。

别的作家们也站出来批评审查制度，要求充分的文化自由。发言的人包括埃·戈尔德斯图克、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安·利姆和作家伊·克利马。但是，使大会达到高潮的是《斧头》的作者、国家奖金获得者卢·瓦楚利克的发言，他的讲话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二十年来的积弊毫不留情的公开控诉。他说：

这次代表大会不是在作协成員决定要开会之后就召开的……而是在统治集团宽宏大量地批准开会之后才召开的。他们批准我们开会，反过来就希望——千百年来统治者们总是习惯于这样希望——我们报以尊敬。但我主张不向他们表示尊敬。……让我们以公民的身份来玩这场游戏，就象我们是得到许可使用这个游戏场似的。在这整整三天之内，让我们象个大人、象个上了点年纪的人那样地行动吧！

我在这里是以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讲话的，这个国家我永远不会抛弃，但在这个国家里，我不可能满意地生活。……我是一个共产党員，我不打算、而且也真不想讨论党的事务。……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几乎没有一件事情

到了讨论的一定阶段不变成党的事务的，情况就是这样。

得到当局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贴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各级选拔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那些有个人魅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心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因此，这种选拔是失败的。这些人的遭遇如何？他们在哪儿？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做什么？

你们也许注意到，我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常常会感到，各行各业里那些领导我们的人能力都比我们差。我们大家一见面就大发牢骚。这是叫人讨厌的事，因为那些无能之辈和懒汉、那些啥事都不会干的家伙和智力低下的人，在和那些也许有理由发牢骚的人一起口出怨言。这样，就在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人们中间形成了一种虚假的、有害的一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世界上能想象出来的最糟糕的动机——大家什么也不想干。……在文学方面，风行的是情绪压抑、虚无主义和精神委顿。势利的人们在终日寻欢作乐。甚至连聪明的人也变得麻木不仁了。偶尔有个别机敏的人感到必须表现自己，他想向左右冲杀出去。可是，当他往上看看，看见了上面的一切，再往下看看，看见了那些想踩着他往上爬的人，他就不得不问问自己：“老天爷啊，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谁呢？”

正如我不相信公民和统治当局能够互相亲密无间一样，我也不相信文艺和统治当局能够和睦相处。……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两者是不同的东西，

它们是不相配的。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它们理解各自的地位，制订出一套受到尊重的规则来调整相互关系。……

我们文化的一切成就，我国同胞所做的和所创造的一切好东西，都是不顾我国统治集团多年来如此倒行逆施而创造出来的。这些成就简直是从它们那儿诈骗出来的。的确，本来还可以做更多事情，有些事情确实是可以做的。

但是，政府和领导正在鞭打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党中央书记伊·亨德利赫不是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宣称：党把文化当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积极因素、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党的政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努力加以发展吗？这难道不是一个目标？这难道不是领导？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呢？我看这是在拖后腿……

我看到而且听说，统治当局只有在遇到十分强烈的反抗时才会退却。没有道理能说服它。只有失败，只有那些花费了我们许多金钱、使我们神经很紧张的反复失败才能使它有所认识。我看，它的长远目标是要使过去的不良情况重新恢复，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危险。不然的话，他们说我们有一个作协，有一个出版社，还有一张报纸；又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听话，他们就把我们的这些东西拿走，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可是，他们难道真的能主宰一切吗？如果我们只是任人摆布，我们又算个什么呢，岂不是毫无价值了吗？那么我们又何必存在呢？不过，他们倒认为应该是这样的。那很清楚，基本上由一小撮人决定我们应该存在还是不应该存在，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想什么、感觉到什么……总之，关于文化的一切都由这一小撮

人决定。这就是我国文化的现状。……

正如我处在统治当局显然可以引起冲突的这种文化政治方面的局势中并不感到十分安全一样，我作为一个公民在这间房子外面，在这个讲台外面，在这个游戏场外面，也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可是，没有谁在整我，也不曾有人整过我呀——因为，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那么，我应该感激不尽啦？可惜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感到害怕……我看不到有任何可靠的保证。不错，法庭的工作改进了，但法官们自己也没有可靠的保证。我也看到，检察院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检察官有保证吗？他们感到安全吗？如果他们愿意，我倒想去他们那儿采访一下。可是你们想，采访的谈话能够在报刊上发表吗？我倒有胆量同检察官们讨论讨论，为什么过去遭到不公正的审判、现在已经恢复名誉的人不能自动获得他们原有的权利呢？人民委员会不把他们原来的房子还给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过，这些是不会登报的。为什么没有人向他们好好地道过歉？为什么他们享受不到受政治迫害者应享的权利？为什么我们给他们提供的钱少得可怜？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我们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裁缝不能到维也纳去住三年，为什么一个画家不能到巴黎去住三十年，然后再……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而不是一名囚徒回来呢？

我看不到任何保证。什么保证？我不知道。我不说了，因为我对此有很大的怀疑。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的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利的保证吗？然而没有这种保证是不可能进行创造的，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在这次大会开幕前，作协的机关报《文学报》向一批著名的

作家和诗人进行民意测验，问他们作家协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第一批回答在报上发表了，第二批回答新闻检查官不许发表。作家们向往的是什么呢？……

缺乏文化的政策会引起争取自由的斗争。我们老是讲争取自由，这使当局感到气恼，但它就是不理解，只有在那些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着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去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明年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第二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也是导致马萨里克的第一共和国毁灭的慕尼黑协定签订三十周年。第一共和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对它留下的遗产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家至今保持着沉默。有史以来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向理想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兴起。这个成就是进步的人民和进步的政治家们取得的，但这一点至今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而我认为是应该得到承认的。因为，作为一个成果，我们的国家是成立了，这个国家虽然还不够完善……却带来了高度的民主。这个国家中的公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无反感，但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国家发展的第二阶段才能实现。……战后，建立一个社会正义的国家的思想却被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所取代了。

当我们谈论这个时期，当我们寻求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和为什么我国经济落

后时，统治集团就说，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但我的观点是，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对于统治机构的精神发展来说这是无法避免的，而它们却强迫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来同它们一起经历这种发展过程。

必须认识到，二十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学校、生活福利等，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更高级的要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相信即使是小规模的劳动也有价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发展全民教育等。

我怕我们还没有登上世界舞台。我们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美名。

我并不想说，我们是一无所获，已发生的事一概没有价值。价值肯定是有的。但问题在于，它的价值是否仅仅是警告别人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呢？既然我们已经准确地认清了自己文化的危险何在，象我们这样的国家，难道非要成为使别人接受这类教训的工具不可吗？我建议，在作家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上进步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在三十年代就已经知道的事情……

我们并不想恢复第一共和国。我们的作家是社会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但这只能是他们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

当我批评统治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

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如果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到这里来问我们：这个理想能够实现吗？那么，作为我们的善意和公民的至高无上的忠诚的表现，我们只能回答说："我不知道"。

瓦楚利克的巧妙的发言——它后来被当作布拉格之春的基本文件之一——不仅表达了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的、而且也表达了全体公民的失望、担心和希望。它空前明确地描述了不久以后就被称为捷克 斯 洛 伐 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但也正如瓦楚利克正确地预言的那样，统治当局对他谈论自由"感到气恼"，不理解"只有在那些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它进行了反击。伊·亨德利赫在大会上再一次发言，严厉批评了造反的作家们，威胁要进行镇压。在会议厅外亨德利赫抓住瓦楚利克，指责他同纽约的捷流亡分子有秘密联系。这实际上是对他威胁说准备逮捕他，因为去年九月被捕入狱等待审讯的扬·贝奈斯被指控的罪名就是同巴黎的捷流亡分子有联系。不过，瓦楚利克倒没有出事。尽管亨德利赫发表了一通愤怒的正式讲话，他却对大会的一个决议表示了同意，这个决议要求修改出版法，把新闻出版审查限制在只涉及到国防的问题上，决议宣称："对于一个政治制度的最大控诉莫过于缺少伟大的文化"。决议中的如下一段是一个典型的妥协产物，其中不同的词句对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解释：

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使它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中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的倾向，以保卫自己。这样，社会主义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就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经验总结，就同解放人们之间的关系、争取更大的自由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对文化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得越是充分，它对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自由越是努力促进，那么，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越是巩固，越是经得起考验。

但是，捷共不许报刊发表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些发言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人才看到——而且作好准备要来最后镇压那些诋毁者。诺沃提尼六月三十日在布拉格对捷共中央党校毕业生发表讲话，亲自发动了这场攻势。

“有的代表说，我们在过去经历了‘第二次黑暗时代’，对于这种侮蔑我们是决不容忍的，”诺沃提尼说。“那些人攻击党的政策，攻击国家的内外政策，主张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否认阶级斗争，而在当今的世界上在两条阵线壁垒分明，互相对立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正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进行着”。第二天《红色权利报》发表了诺沃提尼的讲话，但是他的这些反驳肯定使那些长期受苦难的读者们困惑不解，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人”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

也许是纯粹的巧合，布拉格市法院在七月三日审讯了贝奈斯。他被控将文艺资料偷运出境，供给在巴黎的捷

流亡分子的杂志使用，为此他被判处五年徒刑，这个杂志的编辑帕·蒂格里德被缺席审判，判处十四年徒刑。接着，七月五日，诺沃提尼动身到苏联去渡假。这正是扬·胡斯因为宣传宗教改革的邪说被烧死的纪念日的前一天。

五十九岁的美国人查·乔丹八月十六日在布拉格神秘地、至今仍原因不明地失踪一事，突出地表明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处在一种特殊的黑暗时代。乔丹是一个为犹太人向以色列或其他地区移民服务的美国犹太组织“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的常务副主席兼总经理，是费城人。他八月十四日从布加勒斯特来到布拉格，以联合委员会常务负责人的身份来办理一些公务。

八月十六日晚乔丹离开他在埃斯普兰纳德旅馆的住所，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出去买香烟。但出去之后一直没有回来。八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将近两个星期以后，有人发现他的尸体脸朝下浮在伏尔塔瓦河上。捷克斯洛伐克警官认为他是溺死，不排除自杀的可能性。但美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和乔丹夫人都不同意这种解释。人们强烈地怀疑这是谋杀，有人怀疑是苏联特务干的。

因此，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聘请埃·哈德迈厄博士来进行独立的第二次尸体解剖。哈德迈厄博士是著名的瑞士法医病理学家，是苏黎世大学法医研究所所长。他解剖的结果发现乔丹的胰脏中有一种强烈的药物的遗迹。这一发现使人们接受了如下的看法：有人绑架了乔丹，并且放了毒药。（哈德迈厄博士指出：胰脏是能将外来

物质保持得最久的一个人体器官，因此，尽管尸体泡在水里近两星期之久，在胰脏中还能找到药物的痕迹。）

哈德迈厄博士的解剖结果从未公布过——我相信我现在是第一次将它公诸于世——人们很快也就将乔丹案件忘却了。但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也就是解剖乔丹尸体三个月之后，人们在苏黎世湖右岸的荒凉山区福尔什发现哈德迈厄博士冻死在离他锁着的汽车大约五百米的雪地上。在出事地点没有发现格斗的痕迹，对他尸体进行解剖的结果，也没有发现他受到打击或心脏病发作的迹象。日内瓦两家大报——《日内瓦论坛报》和《瑞士报》分别在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三日报道哈德迈厄博士神秘地死去一事时，都暗示是谋杀事件，并且指出，这位著名的法医病理学家曾应"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之聘检查乔丹的尸体。

至今还不清楚，查·乔丹明显的被绑架和被谋杀以及后来哈德迈厄博士明显的被害死，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但是，了解这两起神秘案件的美国官员和瑞士官员都相信，哈德迈厄博士不仅发现乔丹在落水之前就被人下了毒药，而且还找到了能证明这是谋杀的其他证据。瑞士当局从未公布过解剖哈德迈厄的尸体的结果，但有理由相信，苏黎世警方有证据认为，他也是被谋杀的。

至于乔丹之死，有几种解释——当然没有一种是结论性的——认为，他可能是由于进行了帮助犹太人从东欧迁走的活动而被害死的。其中一个说法是：谋杀可能

是狂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干的。一直到一年以后苏军侵捷之前，美国驻布拉格的外交人员还不断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进一步调查此案，但始终没有成功。一九六八年我在布拉格逗留期间，我曾向捷克保安机关的一个熟人提过这个问题（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已开始对扬·马萨里克在一九四八年同样神秘地死去一事进行调查）。这个熟人对我说："我建议你离乔丹的案子远一点，千万不要沾边。"

美国的调查者有证据表明，有人本想在乔丹去布拉格之前，在罗马尼亚把他杀死，但也许是罗马尼亚保安机关阻止了这一阴谋，也许是别的原因使谋杀者未能得手。驻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外国外交人员告诉我：在乔丹飞往布拉格的前一天，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当他和乔丹一起乘汽车从罗马尼亚首都去布拉索夫城时，他发现乔丹受到严重的药物影响。这个外交官说，当时乔丹站立不稳，几乎语无伦次，在汽车里不住地打瞌睡，但他明显地不是酒精中毒。因此，看起来谋杀者是尾随乔丹从布加勒斯特来到布拉格，在这里绑架并杀害了他的。

对美国和瑞士政府来说，乔丹案和哈德迈厄案都没有结案。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看来不大象是直接插手杀害了乔丹。但这一案件更加剧了布拉格日趋紧张的气氛。

从苏联渡假归来，并在八月份对斯洛伐克进行了一

次结果很惨的访问之后，诺沃提尼得出结论：现在该是一劳永逸地结束知识分子反叛的时候了。他和最接近他的谋士们一致认为，妥协的时期已经过去。九月一日他在总统府举行的宴会上对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说："自由主义"正在全国泛滥，目前迫切需要"公开站出来反对这种现象。……民主和自由是有限度的。"他还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允许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

扬·普罗哈兹卡接受了诺沃提尼的挑战。这位三十八岁的党中央候补委员九月十四日在《文学报》上发表一篇长文，纪念托·马萨里克逝世三十周年，他对马萨里克进行了热情的赞扬。这样，他就实行了在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出的誓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就要为自由而斗争到底。这倒不是近几年来第一次提起这位官方强令人们忘却的马萨里克，但是普罗哈兹卡的文章在恢复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建者的功绩方面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文中写道：

> 马萨里克得到了他的敌人的赞扬，（这种情况我们再也看不到了，）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所不赞同的意见他也能容忍，甚至给予赞扬。……他得到人们的拥护，但他并没有设法去争取这些人，更没有去腐蚀他们。……他是一位热情的政治家，他提出了高尚的原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这些原则。他始终是一位教育家和导师，

因为他知道，领导一个民族就意味着与这个民族的坏习性进行不断的斗争。……托·马萨里克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人民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九月末诺沃提尼着手把他不能容忍"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的威胁付诸实施。九月二十六、二十七两天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来批准惩罚措施。亨德利赫（他在党中央主席团受到他的保守派的同事们的攻击，说他对唱反调的人太宽容了）在全会上说："我国社会的伟大的集中的努力，正在受到那种脱离阶级内容和社会主义内容去侈谈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的说教的破坏。"

中央全会取消了普罗哈兹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瓦楚利克、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被正式开除出党，帕·科霍乌特和米·孔德拉受到严重警告。《文学报》划归文化和新闻部长霍夫曼直接领导，他马上就开除了该报的十九名编辑，并同意其余五名编辑辞职。霍夫曼说，新的编委会将知道怎样把"党在文艺批评和新闻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标准"贯彻到这份杂志中去。果然，当《文学报》在新编委主持下于十月份重新出版时，它变成了一种毫无生气的唯命是从的刊物，以致卖报人每星期都不得不把大量卖不掉的《文学报》退回去。为了不让作家协会按照自己的意图出版书籍，党剥夺了作协对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控制权，在文化部下面另外成立了两个出版社。编辑被撤职或者调走，对作协

出版用纸的供应量大大削减。文化部还接管了对生活困难的作家的补助基金。

我们没有看到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但消息可靠的人士称，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都反对进行镇压。

捷共在十二月份对出国旅行进行了限制，同时还“由于技术原因”取消了作家协会原定在布拉格召开的东欧作家和文艺批评家关于文学和群众文化的一次会议。作协的新主席团由十一名在六月论战中没有表态的作家、四名坚决拥护党的路线的人和一名自由派——摩拉维亚诗人和编辑扬·斯卡切尔——组成。

这样，在诺沃提尼看来，作家的反叛已经被粉碎了。可是，他不得不去处理另外两个问题：濒于崩溃的经济和斯洛伐克人对他的统治日益加深的愤懑。那些遭到打击的知识分子当时也许还不相信这一点，但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胜利已经在望了。

XIV

诺沃提尼的垮台

虽然诺沃提尼曾允许希克教授建立新的经济模式，但他在一九六七年这一年当中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希克进行这项工作。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十九年间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经济官僚机构，从信贷到劳动，一切决策和分配都是建立在集中体制之上的，这样的官僚机构是不会顺从希克提出的分权和拆除非常庞大的机构的思想的。在中央各部委、在各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中，在工厂和农场里，共产党的唯命是从的大小官员们，占据着舒适的位子，他们是不会被布拉格的那个小小的教授冥思苦想出的主意随便赶下台的。组织在联合公司——实际上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卡特尔——中的各工厂在处理相互关系或与别的部门的关系中没有任何自主权。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管理完全渗透了党的影响，实际上不可能按照经济考虑作出任何决定，人事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几乎总是压倒一切的。

尽管经济改革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正式开始了，

但由于受到保守的共产党官僚们的暗中坚决抵制，在这一年当中几乎没有作出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克自己在题为《社会主义下的计划与市场》一书中预见到这种情况，他说：新经济模式可能会遭到“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界或社会上的恶霸们”的反对。但他还是用乐观的声明来冲淡他的现实主义说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一项进步的社会发现或迟或早总会占优势，因为它是克服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前提”。但现实却与他的估计相去甚远。

例如，一九六七年的第一季度批发价格不是照希克的计划提高百分之十九，而是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这主要是因为这次改革允许联合公司的巨头们计算他们自己的生产成本，他们当然把成本往高里算，却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生产率，也不通过权力下放使工业变得更加灵活。习惯于墨守成规的共产党人宁愿继续让上面的官僚主义者关起门来任意作决定。这种办法，用一位布拉格经济学家尖刻的话来说，叫作“假计划”。结果短缺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发展成为一个费用昂贵的经济。希克本人在五月份不得不承认，自己早先是过于乐观了。他在对一个外国记者谈话时说：新经济模式“只在一些企业中和在一些小事情上被采用。……阻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害。……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继续把它当作儿戏，但到了明天，政府将不得不强迫推行这个（新经济）制度。……没有别的办法。”

由于诺沃提尼显然没有能力迫使他的庞大的共产党官僚机构接受这个新的经济改革，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就转向恶化。到了年中，经济又处于混乱之中。集中力量于“粗放”地发展工业，结果虽使国民生产总值没有下降，但实际上，经济又重新濒于崩溃的边缘。

尽管混乱是发生在生产或管理部门之中的，但问题的根源看来不是在生产和管理之中，而是在人的方面。共产党任人唯亲，把无能的人安排在关键部门的领导岗位上，正如瓦楚利克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的，“我们……都感到，各个行业里的领导人都比我们能力差”，工人们对他们的经理人员完全失去了信心。布拉格出版的《经济报》十月份登了一幅漫画，画中一位医生对一个大腹便便的病人说：“副经理同志，您已经能工作了，但您肯定不能胜任您的职务”。在那些大型机器厂、钢铁厂和汽车厂里，冷漠的工人不听从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们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曾经以质量闻名于世的捷克斯洛伐克产品，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以致外商都不愿意购买它们。

由于缺乏始终一贯的计划和物质刺激，工人缺勤和劳动力流动的现象又重趋严重。既然1960年的宪法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劳动权，人们就不必担心会失业，反正每个月都可以领到工资。当一个部门的劳动力明显过剩而另一个部门的劳动力不足时，就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城市调到另一个城市，而对他们的

生活，福利和经济问题却不多加考虑。谁要提出意见，表示不满，得到的回答总是：法律只保证人人有工作，但并未规定一个人该在什么地方工作。在布拉格大街上你就可以看到反映当时劳动政策问题的典型例子：几乎在每一个主要的电车轨道交叉处都有好几个人（常常是妇女）共同做搬道岔的简单劳动。大肆宣扬的首都瓦茨拉夫广场的第一个地下人行通道的建筑工程比计划推迟了一年才完工，行人不得不在木板隔起来的狭小过道里穿来穿去，才能从大广场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就在那个时候，贝尔格莱德已经建成了一系列这样的地下通道，他们没有怎么宣传，但效率很高）。布拉格的国际旅馆总经理处大厦的基础工程也比计划至少推迟了一年，后来发现设计蓝图根本不能用，只好作废。

经过十几年建设以后，住房问题仍然是个民族悲剧。当我第一次到布拉格时，一个满腹牢骚的经济学家对我说：“我们忙着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把建设住房给忘了。”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俄斯特拉发、科希策这些大城市，住房不足的问题十分尖锐，它在人们生活上引起的问题甚至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状况。年青人结不了婚，因为找不到房子，而他们父母住的房子又太小，容不下小夫妻俩，当然上帝保佑，更容不下他们的孩子了。已经结了婚的人常常还是夫妻分居。感情破裂了的夫妇又常常不敢离婚或分居，因为离婚就意味着男女双方中有一方无家可归。我在布拉格

认识一位离了婚的妇女，她找到了爱人，但等了十年，一直到她的女儿成年了，她把自己的住房移交给女儿之后才结婚，不然她一结婚房子就丢了。市政管理法规中对每个家庭分配多少平方米住房都有明确规定。

仍然是自己住房的主人的人数已经很少了，因为建造私人住房既不鼓励，也没有可能性。政府在每个城镇都盖上几幢装潢门面的住房，但从不发表反映住房不足情况的任何统计数字。就连那些装潢门面的住房，例如布拉格列宁大街的那些建筑，也因为无人照管很快就变得破旧不堪。门关不上，窗子破了，管子漏水，电梯（如果有的话）也很少开得动。我的一个外国朋友要找一个国营企业的油漆工——这儿工人都是国营企业职工——来油漆他家的门窗，等了三年才请到一个。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是被禁止的，因而不可能对住房问题或者其他经济问题对社会组织造成的危害进行任何研究。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只有几位经过训练的科学家，查理大学在最近几年才认真地讲授社会学这门课。我认识的一位年青妇女被派到斯洛伐克农村，用一年时间去考察吉卜赛人的社会。她恳求她的美国朋友送她几本关于社会调查的基础知识的书。当我告诉她奥·刘易斯是怎样考察墨西哥人的贫民窟和住在圣胡安和纽约的波多黎各人的生活，他有研究生当助手，有录音机、调查表和分类方法等等时，这个妇女简直羡慕得不得了。

对社会情况的衡量只有在个人亲自考察和第二手材料这个可靠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例如，人们知道，自杀案件和酗酒的人数非常之多，堕胎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要想从那些随意得到的数字中得出任何严肃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一九六八年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电视导演却用了一种赤裸裸的戏剧性的办法来表明，他的同胞们在这类事情上变得多么不顾羞耻。他在报纸上登启事希望收一个孩子为养子，但几乎没有人理他。于是，他又登了第二次启事，表示愿意用一辆菲亚特850型小汽车换一个孩子——这下子应征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经过他的安排，孩子的家长们——多半是母亲——自愿参加名叫“这是你的生活”的电视节目，在那种令人恶心的镜头里，他们告诉观众为什么愿意用孩子换汽车。一名妇女坦率地说：她的孩子太多了，家里该有一辆小汽车了。

用不着说，这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它们在人们心理上所引起的多重后果正在把捷克斯洛伐克拖入一场危机，而由此产生的不满意味着统治当局政治上的毁灭。既然希克的经济改革遭到官僚们的反对而无法前进，捷共就不得不竭力找寻一些现实的或容易见效的解决办法。于是，捷共中央在二月、五月和九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就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只要它在同知识分子进行斗争中能抽出身来的话。亨德利赫二月八日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表明，捷共领导相信，新的

经济改革是能够同传统的文化政策和政治方针并行不悖地进行的。李德利赫实际上拒绝了希克提出的、随着经济上的变革也必须实行政治上的改革的论点，他表示，捷共仍然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概念，即僵硬不灵活的集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对一切宣传工具的严格控制并统一其口径。

捷共中央在五月全会上企图集中力量解决劳动使用上的浪费，大量未竣工程和生产计划不适应外贸迫切需要等问题，其实，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已经够晚的了。当时总的形势非常之糟糕，捷共中央只好不顾住房建筑、工业基建和设备更新的需要，决定将基建投资削减十亿克朗(照当时人为规定的汇率算，合五千万美元)。由于批发和零售商品短缺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成本，企业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信贷政策扣得更紧了。一九六七年的经济计划要求捷对西方的出口额提高百分之十一，到八月份为止反而降低了百分之二。

杜布切克在九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发言，对经济计划失灵提出了意见。他指出，计划规定全国基建投资的百分之二十八用于斯洛伐克，在上半年实际上用于斯洛伐克的投资却低于百分之二十二。要求纠正这种不平衡现象，杜布切克建议建立一种投资基金，以便更好地分配现有资金。他实际上站在希克一边，要求实行更大的地方分权，这样斯洛伐克人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就能和人数更多的捷克人平起平坐，共享决定权。对于他所主管

地区的经济情况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在对待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其他意见，就逐渐把杜布切克推到公开反对统治当局的立场上去了。最后，诺沃提尼就是绊在斯洛伐克人的反对意见这块石头上栽了跟头。

从捷克斯洛伐克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斯洛伐克问题，超出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的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同属于奥匈帝国。但是，主要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方向却是不同的。

捷克人，这个居住在古老和历史上富饶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土地上的民族，是一个西方民族，他们是跟维也纳、总的来说是跟西方在一起的。实际上，把布拉格说成是东欧，这是不恰当的。如果一个无知的外国人这么说，布拉格人马上就会告诉他这不对，布拉格在地理上位于维也纳的西边，捷克是处于中欧。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哈布斯堡帝国时代是两个“历史省”，它们把知名人物送往维也纳议会当议员，送往政府担任高级职务，或者用其他方法来影响当时世界伟大文化中心之一——维也纳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大贵族切尔宁和洛布科维茨等人都出生于捷克，一直到今天，他们在文化上同维也纳的关系并不亚于同布拉格的关系。切尔宁伯爵是奥匈帝国最后一任外交部长。捷克也是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

可是，处于捷克斯洛伐克最东部的斯洛伐克却不同。它南临匈牙利平原，北边被沿波兰边界的塔特拉山和贝斯基迪山包围，斯洛伐克人是面向东方的。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的首府，多瑙河上的一个大港口，在维也纳以东仅有一小时的路程（从布拉格到维也纳有六小时路程），但从文化上和政治上看，它同维也纳的距离却要远得多。在奥匈帝国时期，斯洛伐克人是倾向二元帝国的第二首都布达佩斯的——从经济上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属于多瑙河流域；从人种学上讲，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在这一地区广泛地杂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定新的国界以后，几十万匈牙利人被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不少斯洛伐克人成了新建立的匈牙利的国民。（顺便提一句，这样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中欧和东欧造成了又一个少数民族问题。）

斯洛伐克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的民族特性一向是比较薄弱的。他们主要的传奇式的民族英雄扬诺希克，这位出没山林的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的绿林英雄，也是与斯洛伐克接壤的波兰高原胡楚乌人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之一。奇怪的是，也许并没有什么奇怪，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中的重要一段就是从一首歌颂扬诺希克功绩的斯洛伐克—波兰民歌中吸取来的。山区的农民至今还跳着这种曲调的舞，古老的抒情诗描写勇敢的山民挥舞着斧头（斧头是山盗的随身武器）在古老的石砌酒窖里跳舞的情景。斯洛伐克语，尤其是山区的方言，

同波兰语更相近，而不大象捷克语。

但是斯洛伐克人大概是对奥匈帝国感到厌烦了，而且也象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很容易地就接受了一八四八年的自由浪潮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特性。当马萨里克和西方协约国考虑着怎样更好地瓜分战败的奥匈帝国时，斯洛伐克人勉勉强强地表示同意参加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主要是一个农业地区，没有什么工业，成立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的想法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但是，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者曾从马萨里克及其同事们那里争得一项许诺，——或者他们认为他们曾争得一项许诺，即斯洛伐克在联邦内享有自治权。可是这种自治权却从未给予过，而事实上，捷克人对待斯洛伐克人的问题倒成了第一共和国历史上不大光彩的一页。这样，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了。它的主要代言人就是以天主教神父翁·赫林卡为首的自治党。一九三九年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希特勒把斯洛伐克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叫作“斯洛伐克自治国”，它的“总统”是蒂索(此人一九四五年解放以后被处决)。起初，斯洛伐克人对于有了自己的国家尽管是处于纳粹控制之下，还感到比较满意，但一九四三年抵抗运动成立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一九四四年爆发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抵抗运动主要是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组织的，他们领导了民族起义（如胡萨克），并在其中进行了战斗

（如杜布切克兄弟两个）。显然斯洛伐克人要比捷克人性格刚强，捷克人就不曾有过自己的有组织的游击队。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成了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最有发言权的鼓吹者。在战前或大战期间的斯洛伐克的右翼人物、赫林卡的自治党里富有战斗力的党员同接替了这些老式民族主义者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相似之处。当贝奈斯一九四五年同当时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人会面商谈战后的国家体制时，胡萨克成了主张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联邦的主要发言人。不管是在那时或者是现在，对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来说，民族主义和忠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但是在一九五〇年，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在莫斯科和布拉格的哥特瓦尔德政权眼中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此克利门蒂斯送了命，胡萨克等人被长期监禁起来。

作为对（五十年代初）大清洗的明显反应，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又重新复活了。一九六三年以后，斯洛伐克的党员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诺沃提尼政权，既是出于他们渴望文化自由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普遍反感，也是出于他们的民族主义。但到了一九六七年，斯洛伐克党，正如大多数有头脑的斯洛伐克人一样，分成了两派。姆尼亚奇科（他出生在摩拉维亚，但用斯洛伐克文写作，自认为是斯洛伐克人）、诺沃麦斯基、希

斯科、米哈利克这样的知识分子赞成在联邦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中保持斯洛伐克的民族特性。早在一九四五年就提出这种思想的胡萨克大力支持上述主张，他的影响在一九六三年恢复名誉以后又重新扩大起来，尽管他仍然留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法律研究所里不肯出头露面。争取斯洛伐克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反对诺沃提尼及其中央集权思想——这种思想只不过是马萨里克和贝奈斯思想的拙劣翻版而已。从斯洛伐克人的观点看，诺沃提尼是一无是处的，因为他的中央集权思想既伤了斯洛伐克人的感情，也剥夺了斯洛伐克的金钱。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理解——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对斯洛伐克有害的事对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也是有害的。这个论点使反对诺沃提尼的斯洛伐克人同反对诺沃提尼的捷克人结成了联盟。

因此，在斯洛伐克人看来，连中间派和保守派除了参加反对诺沃提尼的阵线之外也无它路可走。但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党内有意见分歧，即：把诺沃提尼赶下台仅仅是为了使斯洛伐克人获得权利呢，还是将导致全面的自由化。有些人要求两者，理由是：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和这种自由带来的平等地位就不可能实现合理的联邦制，这和不实行政治上的变革就不可能实现成功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道理。但另一方面，象斯洛伐克党的正统理论家瓦·比拉克这类人，他们只在有限的斯洛伐克问题上同诺沃提尼进行斗争，但对当时的主要政治体制却

没有任何争论。胡萨克当时处在不必对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公开表态这样一种有利地位上，他对斯洛伐克的权益表示拥护，但据了解，他对更广泛的争论问题却保持了沉默。既是斯共第一书记又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的杜布切克采取了中间派的立场。我们知道，他起初企图保持中立，实际上是支持布拉格政权。后来他反对镇压捷克的和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反对中央政府对斯洛伐克的经济歧视，从而逐渐地倾向于进步事业。当杜布切克第一次公开反对诺沃提尼时，看来他更多的是从斯洛伐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全国的角度出发的。不过，当时反对诺沃提尼的反叛运动势头正高，许多不同界线都给掩盖起来了。

诺沃提尼这个人真不简单，也真有点儿政治才能，他能把他所接触过的一切都变成了自杀用的炸药，以加速总危机的爆发。七月份在苏联休假回国以后，他和他的夫人决定到斯洛伐克去进行一次少有的正式视察。那已经是八月末，斯洛伐克正在举行纪念一个与旅居国外的斯洛伐克侨民保持文化联系的组织马季采（Matice）协会成立一百周年和第一所讲授斯洛伐克语的高等学校成立一百周年的活动。不知道什么缘故，诺沃提尼偏偏选择这个机会来抨击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在图尔昌的圣马丁发表演说时，他告诉听众们——其中也包括杜布切克和比拉克——说，斯洛伐克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一九四五年以来斯洛伐克经济的发展证明这个地区在中央

集权的制度下是欣欣向荣的。他在演说中谈到科希策钢铁厂（大多数有主见的经济学家都把这个厂看作“假计划”和浪费的典型）、布拉迪斯拉发石油化工厂，还谈到共产党给斯洛伐克开辟了整整一个新时代。他根据从列宁著作中错引的一句话，说什么联邦制只能是暂时的而不能是永久的，就拒绝考虑关于成立联邦的议论。针对群众对布拉格对待中东危机的政策的强烈不满，诺沃提尼辩解说，对阿拉伯人的支持是“反帝斗争”的一部分，而西方支持以色列就是再一次推行它在慕尼黑时期支持希特勒的政策。对大多数斯洛伐克人来说，这种言论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而且也是令人厌恶的废话。

讲完话以后，诺沃提尼会见了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杜布切克和比拉克。会见时有人提出，“马季采”协会的房子（其中一部分用作博物馆）已经显得太小了，如果能为它建造一所新的大楼肯定会受到斯洛伐克人欢迎的。诺沃提尼回答说，用不着盖什么大楼。他认为，“马季采”的收藏品应该搬到布拉格去陈列，而这个组织在国外的活动应该统一归口到由布拉格外交部领导的外交学会去管理。对于这么一个异乎寻常的建议杜布切克作出了什么反应，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记载。倒是比拉克这个忠诚的党干部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发脾气，向诺沃提尼高声嚷道：你没有权力作出这样侮辱斯洛伐克人的建议。接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诺沃

提尼怒气冲冲，拂袖而去，立即返回了布拉格。

诺沃提尼和斯洛伐克人之间日趋激烈的冲突的下一幕是发生在党的九月中央全会上。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反对统治当局镇压知识分子，并且指责诺沃提尼克扣国家拨给斯洛伐克的投资资金。在当时就说杜布切克是自由事业的旗手那是不够准确的，尽管如此，他作为诺沃提尼及其集团的积极反对者出现确是从这次中央全会开始的。

十月三十日(星期一)党中央又召开全会，辩论“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当局召开这次会议是想对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一个基本的总结，但是，斯洛伐克的问题却压倒了其他问题。当有人提出建立联邦的问题时，诺沃提尼再一次辩解说，斯洛伐克问题已经解决了，并指责主张建立联邦制的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杜布切克挺身而出，作了反击。九月中央全会以后他同诺沃提尼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互不相容的地步。当杜布切克到布拉格来处理党务的时候，他发现他住的“布拉格饭店”的房间里的电话线已由诺沃提尼下令给掐断了。（“布拉格饭店”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外宾用的招待所，它的电话总机接在党中央大厦——位于伏尔塔瓦河右岸的一座圆顶建筑物——的电话总机上。要往这个招待所打电话必须先拨党中央的总机，然后要“布拉格饭店”。）还有秘密警察钉他的梢。杜布切克是位外表温

和的人，当他知道这些诡计之后，便发火了。

就这样，在这为期两天的会议的第二天，杜布切克就站出来指责诺沃提尼的“行为象一个独裁者”，蓄意破坏经济改革。他指责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人亨德利赫擅自改动了党中央主席团早些时候通过的关于党的作用的基本决议的内容，损害斯洛伐克的利益。会议打算通过一项决议，作为八月以来在全国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结，以便使州和县级党的领导人相信，只有服从重新确立的捷共领导才能结束日趋严重的政治混乱。杜布切克对这个决议提出了抗议，他指责诺沃提尼无权干预斯洛伐克的事务，损害斯洛伐克的经济。他重申了他在九月中央全会上提出的指控。

诺沃提尼进行了疯狂的反击。他直接点了杜布切克的名，他说，如果斯洛伐克希望提高到捷克地区的经济水平，它就不得不依靠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帮助。既然杜布切克对过去这些事务的处理方式提出了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就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可以自行其是，而别再指望布拉格的帮助了。

辩论达到了进行威胁的程度。杜布切克向诺沃提尼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他说，这已经不再是个斯洛伐克的问题了，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治制度问题。“在讨论经济分立之前，我们必须讨论政治分立，从上面分起，从党的领导分起”。

诺沃提尼抓住扩音器，指责杜布切克及其追随者是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总统府西班牙大厅举行的这次会议乱作一团。通常的中央全会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领导人先发表一通圣哲似的言论，然后宽宏大量地让几个挑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官方的路线。这次会议可不同啦。斯洛伐克的代表们团结在杜布切克的周围，他要求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结构、工作方法和党与国家的关系实行根本性的改革。他说，这不仅是斯洛伐克人的看法，而且也是使共产党重新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的一项基本要求。这时，会上的捷克领导人也起来支持斯洛伐克人的攻势。然后，普通的中央委员就开始敦促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会上的辩论变得非常激烈，诺沃提尼只好要求休会。他提出的理由是：党的领导人要去参加在总统府另一个大厅里举行的庆祝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的活动，这项活动是不能推迟的。他的意图是想借此来平息一下会上的激昂情绪，不过他失算了。会议是休会了，但当天晚上布拉格又爆发了另一场新的危机。

晚上九点刚过不久，正当诺沃提尼和他的同事们在总统府设宴招待苏联贵宾，为俄国革命干杯的时候，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工学院的学生从位于伏尔塔瓦河左岸的斯特拉霍夫的破旧不堪的大学生宿舍列队出发，朝着总统府的方向前进。这次自发的游行同白天中央全会上的

争吵没有任何联系，大学生根本无从得知党中央的争论，他们上街是为了抗议学生宿舍经常停电，暖气不热这类虽然无足轻重，但令人气恼的事情。布拉格的秋天天气本来就很凉，到了十月底，学生宿舍简直是又黑又冷。学生领袖们对停电和暖气不热早就怨声载道，可是查理大学的领导和教育部对此都没有加以重视。

这天晚上学生邀请了几位布拉格的记者去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斯特拉霍夫宿舍里是个什么样子。正好这时候又碰上停电，一些年青人提议举行抗议游行。马上就集合了一大群人，他们绕着宿舍游行了几圈之后，就上了街，朝着市中心前进。这是一次通常那种熙熙攘攘的游行，年青小伙子和姑娘们手里拿着点着的蜡烛，弹着吉他，敲着小鼓，边走边唱："我们要光明，我们要光明！"

不久，学生队伍走到了洛雷塔广场的路口，他们沿着洛雷塔大街往前走，用不到几分钟就能到总统府。如果这样，他们的游行就可以被人说成是一次政治性的示威。因此学生们向右拐弯，顺着又陡又窄的聂鲁达大街（以扬·聂鲁达*的名字命名）下山，朝着山脚下的小城广场和伏尔塔瓦河桥的方向前进。

当他们沿聂鲁达大街走到一半的时候，警察把他们堵住了。年青人告诉警官们为什么他们要点着蜡烛游行。警官建议他们派几个代表去向当局的某个负责人提交他

---

* 捷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

们的抗议。但学生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以后会被人指控为组织非法的游行示威，而实际上游行是自发的。学生们笑着，叫着，挥舞着手中的蜡烛，情绪很愉快，不带什么政治色彩。然后，游行群众回过头来，沿着聂鲁达大街上坡，警察的汽车尾随着他们。步行的警察驱赶学生散开（但学生们无处可走，只有沿着这条街往上跑），至少三个青年被捕。

这时候游行队伍不再是心平气和的了。大学生愤怒地停住了，重新集合起来，又沿着聂鲁达大街往山下冲。这时，到场的警察更多了，他们驱赶着学生们沿聂鲁达大街往上走，穿过洛雷塔广场，一直追到斯特拉霍夫宿舍。他们用警棍打学生，还使用了催泪弹。这场骚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一日（星期三）凌晨，结果有十二名学生和三名警察受伤被送进医院，其中一名学生失去知觉，两名学生脑震荡。

近几年来，在此之前布拉格曾多次发生过学生骚动，但没有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但是这一次警察对举行非政治性游行的青年学生进行毫无道理的袭击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学生界的情绪空前未有地激动起来，佩特仁医院义愤的医生和护士们把那天夜里警察暴行的真相传播到布拉格居民当中去了。诺沃提尼的警察给日趋严重的危机火上浇油，住在布拉格的人事后说，当时他们感到气氛紧张。可是象往常一样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却前往莫斯科去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去了。

他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来。

十一月八日，诺沃提尼返回布拉格的那一天，查理大学哲学院（这是一座面朝红军广场和伏尔塔瓦河的灰色大楼）学生举行了五小时的会议，讨论斯特拉霍夫事件和它的涵义。哲学院年青的教授们是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传播者，他们与学生一起抗议警察的暴行。学生们起草了一封给教育部长哈耶克的信，要求查处对在斯特拉霍夫殴打学生事件负责的警察，要求禁止使用催泪毒气，当然还要求解决宿舍中的停电和暖气问题。教授们就走得更远。他们的决议要求内务部长约·库德尔纳公开道歉（库德尔纳是一九六五年四月卢·斯特劳加尔调到党中央书记处去之后接任内务部长的），调查警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并保证完全的学术自由。他们还要求哈耶克将他们的控诉书全文转交国民议会。现在诺沃提尼已经是四面楚歌了。

十一月二十日在查理大学哲学院举行的第二次集会变成了大学师生的九个小时的静坐抗议。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是破天荒第一遭。在举行静坐抗议之前，教师们曾两次在捷青年联盟集会，要求对警察的暴行作出解释。大学党委会通过决议，要求进行全面调查。（他们也公开表态，劝阻学生示威。）学生们在哲学院举行的集会上指责政府和报刊企图挑动工人反对学生——他们指的是一些显然是由当局策划的公开报道，说是学生们正在武装起来准备叛乱，并从国外得到帮助

云云。报刊在报道十月三十一日发生的事件时暗示说，必要时可动员工人民兵来镇压学生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治自由问题被提出来讨论了。很明显，斯特拉霍夫事件成了寻求实现国家根本性变革的一个借口。

也许出乎大学生和教授们意料之外的是，查理大学校长奥·斯塔里和副校长爱·戈尔德斯图克竟然参加了静坐抗议并且同造反的学生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尽管戈尔德斯图克在六月作家代表大会上同富有战斗精神的知识分子有牵连并且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仍被任命为查理大学副校长。这是晕头转向的诺沃提尼当权派偶尔对它的敌手们作出的一点微小让步，想起一点安抚作用）。斯塔里和戈尔德斯图克在有些问题上同意造反学生的观点，在另一些问题上不同意，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同情学生的。最后，集会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是对当局的最后通牒，要求当局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满足学生的一切要求，否则整个查理大学将采取联合行动。

但政府在十二月四日却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它正式承认警察采取了不必要的暴力行动。它表示斯特拉霍夫游行的领导者将不会受到迫害，并且宣布撤换学生宿舍的管理人员。工人们也开始挖沟，准备铺设新的电缆。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承认错误和这些让步反倒损害了诺沃提尼的威信，进一步削弱了他对政局的控制能力。诺沃提尼确实已陷入困境，在捷共最高领导

层，他的对手们——他们的人数突然增加到几十人——公然要求他辞职。

十二月初发生的两件事表明，诺沃提尼终于认清了他面临的危险。

一件事是十二月四日重要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突然在中捷克、北捷克和西捷克地区举行秘密演习——这意味着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在冰天雪地的波希米亚田野上举行这样大规模的冬季演习，如果不是前所未有的话，那么也是极其罕见的。因此，这次演习很可能意味着，诺沃提尼在动员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来保卫他自己。

第二件事是苏联驻捷大使斯·契尔沃年科给莫斯科发了一封急电，要求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来，以便亲自决定在当前捷克斯洛伐克两派极端对立的形势下，怎样做才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上述这两件事总的说来是没有联系的，不过据传，诺沃提尼曾向契尔沃年科提出，希望苏联给他以某种支持。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契尔沃年科曾经把诺沃提尼当作一个明智的政治人物，建议莫斯科支持他。后来伊·亨德利赫作的一句评论足以证实这一点，他说：勃列日涅夫的访问“其性质是对诺沃提尼同志有利的一种干预。”契尔沃年科对那样错误地判断捷克斯洛伐克形势可能是有责任的，记住这一点对于理解他在一九六八年入侵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很重要。契尔沃年科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从来就不是个非常成

功的人物。

契尔沃年科这个五十五岁的乌克兰人，尼·赫鲁晓夫的同乡和门徒，本来是一个从事哲学和教育的学术研究的党干部。这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九五五年以乌克兰党中央科学文化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出头露面。不到一年他就当上了基辅的党中央书记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为了使他熟悉国际问题，赫鲁晓夫派他当苏联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波兰和东德，一九五九年又带他到北京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从以后事情的发展看，此行的目的是把契尔沃年科作为苏联新任驻华大使介绍给毛泽东及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

尽管他完全缺乏外交经验，不熟悉亚洲事务，而他的外事实践也只限于到波兰和东德进行的短期访问，契尔沃年科一九五九年十月接任驻华大使之后却开始了他的最高的政治生涯。如同大多数苏联(驻华)大使一样，他还同时被提名为苏共中央委员。不过，他在北京任职的五年半期间，对于扭转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方面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当然，他的运气不好，因为他正好是在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的争论开始公开化的时候登台的，而且归根到底，一个大使必须执行本国政府的指示，而不能自行其是，随机应变，在苏联严格的制度下尤其是这样。看来客观环境使契尔沃年科作出了特别巨大的牺牲。他能够得到的直接情报越来越少。一个在北京的外

交人士当时说，契尔沃年科不得不依靠《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东西来猜测一九六二年三、四月间中共代表大会极端重要的秘密会议的情况。

赫鲁晓夫下台五个月之后，契尔沃年科从北京被召回。这也许是由于他在中国任期很长，同时苏联新领导当然也希望派驻北京的使节是同赫鲁晓夫没有瓜葛的。不管怎样，他一九六五年四月被任命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很难说是一种晋升。一九六五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还是一个可靠的附庸国，诺沃提尼还在苏联牢牢的控制之下，所以契尔沃年科的使命主要就是对布拉格同苏联平静的关系进行监督，庄严地出席总统府举行的各种庆典和捷苏友好协会的会议。在布拉格人们都知道他举止文雅、沉默寡言。此人矮胖，秃顶，好从眼镜后面凝视别人，但不大说话。没有理由怀疑，他除了同捷官方人士和热情的亲苏派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接触之外，还同别的人有来往。这些亲苏派常到座落在布拉格的使馆区和住宅区布贝内奇区绿树成荫的栗树下广场附近用围墙圈起来的苏联大使馆去拜访他。

契尔沃年科被派到布拉格去显然不是为了去处理重大的紧急事件的，但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却面临着这样的紧急事件。他的倾向是希望看到诺沃提尼能渡过危机——他肯定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仍然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他大概也希望勃列日涅夫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位苏共总书记是十二月八日秘密来到布拉格的，

很可能除了诺沃提尼最接近的亲信之外，没有任何人事先知道勃列日涅夫的这次来访。两天来勃列日涅夫同诺沃提尼及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界人物会谈，提出问题，研究形势。（在这两天中，唯一没有在布拉格的高级领导人就是杜布切克，据不少党内人士说，勃列日涅夫曾多次问起杜布切克。）但对于莫斯科是否将继续支持诺沃提尼一事却讳莫如深。这两天诺沃提尼和他的同盟者心情十分紧张，他的敌手们心情也十分紧张。如果勃列日涅夫决定支持遭到围攻的诺沃提尼政权，他的敌手们知道，他们要么公开同莫斯科对抗，要么只好放弃推翻诺沃提尼的努力。如果与此相反，俄国人决定抛弃诺沃提尼，那么他幸免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了。苏联的势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估量中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因素。

十二月九日晚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除杜布切克以外都出席了宴会。勃列日涅夫默不作声地坐着吃着，当宴会大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宣布：他即将离开布拉格回国。至于捷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他说："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他的这句话在几个月之后一定会使他懊悔不已，那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迅速地使他认识到，布拉格的领导权问题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苏联要干预的事。可是在当时，他却把这个不易处理的问题推脱得一干二净，要

求马上派汽车把他送往机场，而把诺沃提尼和他的朋友们弄得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还采取了一项预防性措施，但结果却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场戏中的一大讽刺。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他在布拉迪斯拉发作了短暂停留，去看望杜布切克，或者如一位捷共党员后来所说，去"观察他一下"。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本能也许使他意识到，杜布切克很可能是布拉格这场权力斗争中的获胜者。对那一夜他们两人会谈的情况外界一无所知，但令人奇怪的是，勃列日涅夫似乎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共如果由这位在苏联受过教育的沉静的斯洛伐克人来领导是会不错的。所以，作出过错误判断的并不只是契尔沃年科一个人。

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一九六八年初在刚由水利总管理局长升任林业和水利部长时，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访问时说："当我们（他指的是为推翻诺沃提尼而积极努力的进步集团）得知有人要求勃列日涅夫同志来访时，我们担心的是，他为什么要来。但是，当我们知道了他的观点时，大家都很高兴"。

唯一对勃列日涅夫访问的结果不感到高兴的是诺沃提尼。他也许料想到，一九六四年十月他曾经给克里姆林宫打过一封倒霉透顶的电报，对赫鲁晓夫的倒台表示十分惋惜，尽管事隔多年，仍然会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报复。不管怎样说，他的得力同盟者所剩已寥寥无几了，他最后的一招就是策划一场阴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诺沃提尼曾作出决定，在他的敌人在中央委员会集聚足够力量，发动致命打击之前，要发动一次军事政变。因为只要估计一下他就会看到，如果要投票，他很可能在主席团得不到多数票，甚至在中央委员会里得多数票的可能性也很小，尽管中央委员会塞满了他挑选出来的人。

在这次冒险行动中，诺沃提尼主要的助手是米·马穆拉。他从一九六一年起担任党中央第八部部长，负责党组织、政府和军队中的保卫工作。（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夜间诺沃提尼亲自出马逮捕据称是贪污了一千美元的鲁·巴拉克的秘书，在这次袭动事件中，陪诺沃提尼去的正是马穆拉。）这是一个面貌幽暗的人物，对于他的背景人们毫无所知，他也总是有意避免出头露面。可是他在诺沃提尼当政期间掌握的权力，同哥特瓦尔德时期策划大清洗的主要人物拉·科普日瓦不相上下。

参与这一阴谋的还有扬·谢伊纳少将，马穆拉的副手，分工负责军队中保卫工作。这个四十岁、农民出身、讲究吃喝的军官，由于党的支持在军队中青云直上，他也担任了国防部党组书记的重要职务，并且是国民议会议员。一九六三年当他是个三十六岁的上校时，追求魅人的高级生活的强烈欲望促使他同一些官方的作家和电影制片者结识。他的密友之一就是诺沃提尼总统的儿子、布拉格出版社经理安·诺沃提尼。参与阴谋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是国防部副部长弗·扬科上将。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国防部长博·洛姆斯基大将曾参与其事。

勃列日涅夫来访之前，在十二月四日布拉格周围的军事演习开始后，马穆拉、谢伊纳、扬科就开始在高级军官和党的领导干部中间做工作，争取这些人支持拟议中的先发制人的政变；他们明显地暗示说，必要时苏联将进行武装干涉来支持诺沃提尼和他搞的政变，并引用契尔沃年科的话作为证明。但他们力图不让斯洛伐克军官知道这个计划，怕被泄露出去。勃列日涅夫的来访并声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改变策略。策划阴谋的人现在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指望苏联的支持了。因此新的计划是：或者发动一次全面的政变，或者最低限度也要在中央委员会十二月十六日开会和（估计可能）撤销诺沃提尼的职务的时候，把部队开进布拉格，其意图是逮捕反对诺沃提尼的主要人物，包括杜布切克在内，从而迫使中央委员会放弃改变现领导的一切企图。不过将军们告诉诺沃提尼说，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已在进行的部分预备役的动员工作做好，并把部队部署妥当。于是，诺沃提尼就向中央委员会提议全会“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推迟几天举行。

大约在十二月十六日前后——这时有些细节不大清楚——阴谋策划者命令驻扎在布拉格以北约二十五英里的姆拉达军营的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步兵师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开进首都。与此同时，马穆拉签发了逮捕进步人士及其朋友的逮捕证。似乎已经万事具备了。谁

想到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的某个时候，捷军总政治部主任瓦·普尔赫利克中将得到了有关这一阴谋的消息，他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包括杜布切克在内的反诺沃提尼的领导人。

十二月十八日，调部队进入布拉格的命令还没有来得及发出的时候，党中央主席团的紧急秘密会议就开始了，会上有根有据地指控诺沃提尼即将发动一次政变。他答辩说，他对这个阴谋一无所知。可是从波希米亚的军事演习当天就骤然停止这一情况来看，准是他立即下令取消了这次政变计划。在党中央主席团继续开会的同时，十二月十九日又秘密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不断在主席团会议和在党中央大厦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间穿梭来往，各自为了自己的目的争取支持和选票，这时第一次有人正式提出要诺沃提尼下台。尽管中央委员们的塔特拉牌高级黑色小轿车来往飞驶，布拉格却很少有人知道，一场好戏正在开场。谁能想到，一次政变甚至一场内战只是在几小时之前被制止了呢？

但是，反对派在中央主席团里仍然没有集结起足够的力量来把诺沃提尼赶下台。难题之一是在由谁来接替诺沃提尼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当时在中央主席团的十人中诺沃提尼拥有六票：他自己、亨德利赫、国民议会主席博·拉什托维奇卡，政府总理约·列纳尔特、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米·胡迪克（他在私人关系上是杜布切克的对头）、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常驻经互会代表奥·

西穆涅克。要求诺沃提尼下台的有：杜布切克、奥·切尔尼克、德·科尔德、雅·杜兰斯基。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人都是希克的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后面三个人还是捷共掌管经济的领导干部。

经过三天的紧张斗争之后，事实表明僵局无法打破。诺沃提尼即使再失去一票也能保住自己，但是折磨他的人也有力量使这场斗争继续斗下去。如果这个时候在中央主席团里摊牌，党就会分裂，而斗争的双方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最后，会议作出决定在圣诞节和新年休会，过了年立即复会，继续辩论。十二月二十一日夜间发表了一条消息说，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从十九日起举行了会议，但没有作任何具体解释。这些迹象总起来告诉人们，争斗暂时处于均势，甚至都说不上是休战。布拉格市民在过节时，心情是忐忑不安的。

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星期三）复会，斗争继续进行。诺沃提尼在新年演说中忽然把自己打扮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战士和斯洛伐克权利的保卫者，想借此挽回点影响。可是，政界已经普遍得知党中央的权力斗争，公众中消息灵通的人士开始影响政治家们，促使他们赞成诺沃提尼下台。改革派也利用了圣诞节和新年休会的机会来争取支持者。就在这个时候，据几个月之后一家伦敦报纸登载的一则未经证实、但合乎情理的消息说，诺沃提尼出于其一贯的本性做了一件自挖坟墓的事。在一次中央主席团的会议

上，他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指责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将文艺资料秘密送给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的行动（扬·贝奈斯就是为此事在七月份被判处徒刑的）。亨德利赫听了愤怒地向诺沃提尼嚷道："安托宁，你想把我打成第二个巴拉克，是永远办不到的！……"

不管上述情节是否属实，事实是，多少年来一直是诺沃提尼最亲密的战友的亨德利赫的确把他的票投到另一边去了。总理列纳尔特显然是看准了风向，也倒向了另一边。这样，经过三天的混战之后，终于在一月四日（星期四）进行了表决，诺沃提尼被撤销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始终支持他苦战到底的只有三个人：拉什托维奇卡、西穆涅克和胡迪克。这三个人从此也就永远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同时，中央主席团决定"将共和国总统和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接着中央全会就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允许诺沃提尼留任总统。

（可是就在两个星期以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却作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决定，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并归一人，业已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国家元首，取代了斯托伊卡的职位。这确实证明，这两个具有改革思想的东欧共产党国家正在选择各自"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布拉格，选谁当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仍未解决。

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当时杜布切克并不是反诺沃提尼派和进步派公认的领袖。他只不过是造反者之一，他造反的动机第一是为了维护斯洛伐克的利益，第二是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胜利——在他看来这二者当然是紧密相联的。可是主席团里另外两个斯洛伐克人——列纳尔特和胡迪克的行动看来却是从个人的政治动机出发的。列纳尔特是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情绪已经指明了大势所趋之后才转变立场的，而胡迪克这个一辈子唯命是从的党干部却从未背离过诺沃提尼。这样，列纳尔特挽救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胡迪克就丧失了它。

杜布切克究竟怎样最后当选为第一书记的，至今还是不大清楚，有几种有点互相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在一月四日深夜、五日凌晨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提议选列纳尔特为第一书记，尽管这位总理倒戈投的一票发生作用使他下了台。获胜的一派则更喜欢切尔尼克，他当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表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可是列纳尔特和切尔尼克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有一个主席团成员，可能是切尔尼克，提议杜布切克作为候选人。

第二种说法是：反诺沃提尼派的领导人之一科尔德提议由曾任农业部长和内务部长、现任党中央生活水平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卢·斯特劳加尔作为第一书记候选人，可是他本人拒绝了，反过来他又提议切尔

尼克当候选人，而切尔尼克——据这个说法称——也不肯接受。这时，诺沃提尼提列纳尔特为候选人，同样也遭到列纳尔特的拒绝。于是，诺沃提尼提议选杜布切克当第一书记，以为他也是不会同意的。但是，没有料到，杜布切克却接受了提名，据说随即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当选了。

根据我同捷共中央委员和其他消息灵通人士多次的交谈，我本人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即提名杜布切克——这个在持续多日的辩论中实际上保持沉默的人作第一书记的，的确是诺沃提尼。那是发生在一月五日（星期五）凌晨五时。当时坐在会议室里的这十个人精神上和体力上都已疲惫不堪，这可能促使他们接受了杜布切克这个妥协性的人选。

至于说诺沃提尼提议杜布切克继任到底是估计他会拒绝这个提名，还是认为这个沉静的斯洛伐克人是为害最轻者，这很难判断。不过，我在布拉格听到的一种解释也许有一定道理，就是说，诺沃提尼——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希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而他认为杜布切克是最容易被推开的。还有一种类似的解释是：诺沃提尼认为杜布切克是一个忠诚的党的干部，尽管他在斯洛伐克问题上有不少糊涂观点，但总还不至于把党交给“自由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这类人。此外可以想象，杜布切克似乎得到勃列日涅夫的青睐一事也许影响了诺沃提尼。如果这是真

的，那么，杜布切克的上台就不只是一个、而是双重的历史讽刺了。

一月五日晚九时，广播电台向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的下台和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

X V

杜布切克指挥序曲

安·诺沃提尼的下台和亚·杜布切克的上台的特异之处在于，它并没有立即在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一种真正变革之感，更没有使人看到这是一场正在兴起的革命。似乎没有人自觉地认识到，老式的斯大林主义的近卫军战士被送走，新式的共产主义者登上舞台，这不仅是一般的政治上的突变，而且对整整一代都会发生影响。在布拉格或其他地方既没有群众欢呼，也没有欢庆胜利的游行。甚至连斯洛伐克人民也没有十分看重这件事，尽管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由一个斯洛伐克人担任全国最高的政治领导职务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对杜布切克上台明显地感到高兴，如同过去列纳尔特被任命为总理时一样，但仅此而已。

首先，这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于二十年来不断进行的抢位子游戏早已看透了，不管是由斯兰斯基、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还是诺沃提尼掌管党和政府，他们的日常生活总是那样贫乏单调和压抑不快，而他们

的领导人却又总是那样夸夸其谈，言之无物。那么——他们当中许多人耸耸肩膀问道——杜布切克上了台又会有什么两样呢？只有少数政治上特别敏感的人迅速理解了这一事件的涵义，而其余的人们则简单地把杜布切克接替诺沃提尼看作是政客们关在小房间里秘密交易的结果，对于未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其次，这次人事更动没有象往常那样随即发生对被废黜的领导人的猛烈抨击和清洗。相反，气氛很平静，表面上看是维持现状，因为经过二、三十年的多次清洗和报复之后，新上台的人希望实现一个和平的、文明的过渡，不要流血，不用审讯和监禁。诺沃提尼仍旧当总统，列纳尔特照样当总理，政府人选和捷共领导维持不变。实际上杜布切克的人在一月五日以后并没有清洗党中央主席团，而只是增补了四个新成员。

这四个人是：扬·皮列尔，这是一个颇为保守的共产党人，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当过副总理，以后当重工业部副部长；约·什帕切克，布尔诺州党委第一书记，很进步，四十一岁，是中央主席团中最年青的成员；约·博鲁夫卡，多兰尼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席，思想是自由派的；埃·里戈，一个思想保守的斯洛伐克人，吉卜赛血统，是一家钢铁厂的党委书记。什帕切克和博鲁夫卡比较倾向于改革，而皮列尔和里戈比较接近保守思想，结果中央主席团内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至于杜布切克，他实际上是一个公众所不熟悉的人物，而他也几乎不与外界往来，既不发表演说，也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也没有阿谀献媚者在《红色权利报》发表整版整版的传统的华而不实的捧场文章，共产党国家盛行通过这种方式来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人们一般都把布拉格之春看作一个伟大的改革运动，看作是大约五百年前胡斯运动的再现。但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战鼓擂，也没有号角鸣。只是在事后捷克斯洛伐克人回顾往事时，才以一月为界，把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事件分为“一月以前的”和“一月以后的”，其实一月是平静无事渡过的。居民们在这个奇寒的冬天，主要为着挣钱过日子和上街买东西而成天忙碌。

如果在开始的那些日子里，若干星期里，杜布切克没有以一个改革家、战士或革命家的面目出现，那很可能是因为他首先就没有想到这类事情。有人也可以说，他变成一个革命领袖是不由自主的，是改革的浪潮把他推上高峰的。总之，杜布切克是一个极难认识、理解和评价的人。只有很少几个知心朋友。他是一个腼腆的、内省的、复杂的人物，虽然没有大放异彩的才华，却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他既能如钢铁般坚强，又能象斯美塔纳谱写的纯捷克乐曲那样柔和。要想勾画出一九六八年一月杜布切克的形象，你只好依靠直觉和少数宝贵的材料。

第一个客观事实是：他是，而且在下台一年以后的

今天仍然是一个忠诚的、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员。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式的、由社会党转变成的共产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把家庭由美国迁回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又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去苏联。杜布切克在俄罗斯长大，从幼年起就受着共产主义的熏陶。他成年以后就全心全意为共产党工作，当他的职位提升以后，又在苏联的一所高级意识形态学校里学习了三年。这种背景对于象杜布切克这样的人具有重大意义。这里包含着一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忠心耿耿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异常严格的自我纪律，在党（如杜布切克这样的人始终认为党是崇高而神圣的）的利益需要时，他能够忍辱负重，牺牲一切。看看在苏军侵捷之后的杜布切克不禁令人联想起斯兰斯基案件的那些被告们，他们之所以承认了别人指控的罪名，只是因为党需要他们作出牺牲。

可是在杜布切克身上，这种忠诚和心理状态或迟或早——也许在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之前——要和他性格中的另外一些方面发生冲突。这些方面就是：他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一个斯洛伐克人，他的爱国主义和近乎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

在杜布切克刚掌权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具体计划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和她的共产主义改革到苏联要入侵时的那种程度，这一点是几乎可肯定的。因而，以后发生的一切反映了一个认识上、思想上、精神上和人性上的

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引导着杜布切克这个虽在其他方面讲求实际、但实属理想主义的人沿着一条探求“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即“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和使他的祖国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保持独立的道路前进。不可能准确地和科学地确定，究竟是哪一个因素、哪一个契机触动了杜布切克这个人，并且开始影响杜布切克这个共产主义政治家。我的一个在布拉格之春的那些日子里接近杜布切克的朋友相信，杜布切克身上的变化是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发生的，那时，由于获得了阅读党的档案材料的权力，他详细了解了二十年来迫害、暴行和冤案的血淋淋的可怕情况。我那位朋友告诉我说，杜布切克当时失声痛哭，发誓决不让这种事情在他的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重演。这段情节也许不够准确，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天真，但更好的解释我没有。

此外，他在那年一月和一月以后接触的人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共产党人。他们是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用开明的或进步的观点解释共产主义，从个人的切身经验或者从信念出发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他们当中有些是青年人，有些是中年人，还有些人是地道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杜布切克这个想在一片混乱中寻找出路的领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杜布切克不是一个拚命想揽权的人，他从来不想拿自己的权力去炫耀于人。当诺沃提尼和他的党的高级干部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时，杜布切克夫妇和三个

孩子在布拉迪斯拉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汽车，他的娱乐就是游泳（还有高台跳水）和看他最喜爱的特伦钦足球队赛球。他不抽烟——这同哥特瓦尔德和诺沃提尼的烟斗不离嘴成了鲜明的对照——只是偶尔喝一两杯葡萄酒。他的穿着保守，天气挺暖和还穿西服背心。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和情趣是属于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正如他在国内没有唤起人们多大的希望一样，杜布切克在莫斯科也没有引起多少不安。在他当选之后的第二天就接到克里姆林宫发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上个月到布拉迪斯拉发考察过他的勃列日涅夫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祝他工作"顺利"并且向他保证，苏共中央"坚信"，苏捷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诚挚友谊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没有理由认为杜布切克辜负了这种"兄弟般的"信任。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对这种"诚挚的友谊"应该是什么样子形成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在他就任之后不久，改革的强大压力从各个方面推动着他朝这个方向发展。

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压力首先来自五十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一些老的共产党员。五十五岁的古·胡萨克和五十七岁的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一月份开了头一炮。

斯洛伐克人胡萨克和捷克人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一九四五年共产主义渗透进捷克斯洛伐克和一九四八年的夺权事件中起过重大作用。胡萨克一月十二日在斯洛伐克的文化刊物《文化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旧的纪念日和新的希望》的文章，从此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兴趣并受到了赞扬：胡萨克在学识方面颇有名望，毕竟是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可是如果现在，在胡萨克撵走了杜布切克并且帮助葬送了布拉格之春后重读一下他的这篇文章，真叫人惊恐不安。它证明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能够在多么短促的时间里在政治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为争取个人的和民族的自由而斗争，为消除民族压迫、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而斗争，是我国历史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它构成了我们的民主传统和革命传统的基础。它引导我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人民确信——正如陶里亚蒂晚年时说过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有最广泛的自由，他们确实以有组织的形式参加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

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伟大思想中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实践中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忘却。……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以及解放以后，社会实践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原则，我们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的，根据这个原则人民群众坚持斗争直至胜利，也是根

据这个原则建立了我国各民族之间新关系。

回忆一下这些情况是有好处的。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就和进步，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蠢人才会闭上自己的右眼或左眼，只看到一方面而看不到另一方面。这些年来我们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能将民主原则运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从而导致各种社会机构的错误实践，使它们官僚主义化，使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受到干扰，同时引起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民族关系上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有些人也许想用幼儿园的方法来管理国家。孩子们，拉住我的手，都抓住那根绳子，不然你们会走丢的；这个你们先别问，你们还不懂，等你们长大了再问吧；还有，要是你们不听话，我就要处罚你们。我希望合乎逻辑的是：我们也是成年人，有文化的个人和公民；我们是成熟的和有文化的民族。必须从这点出发作出关于整个社会实践的结论……

今天的欧洲人要求知道他们的国家中正在争论什么问题，他们要求了解这些问题，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决定有关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条件的问题，选举领导人并且根据当选的领导人的功过加以赞扬、批评、甚至撤换。总之，他们要求把宪法规定的“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源泉”这一原则变成日常的具体实践。公民们要求他的公民权利和民族权利能够在民族的和国家的代表制度中充分得到实现，他们要求获得能自由行使选举权、监督权和责任制的保证。这是一个使我国的社会制度不断民主化的问题，解放并且发挥全国人民的创造力的问题，挖掘他们物质和精神潜力，

使他们积极关心国家大事的问题，通过各种制度实行并且保证千百万双手、千百万颗心团结合作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已经纠正并正在继续纠正各种错误和弊病。新年引起了我国人民的深思，也唤起了新的希望：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对于新思想的探索和思想的成熟也许将逐渐获得具体的成果，在整个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我们在全体进步人民支持下为发展我国社会的民主改革而作的努力，也许将加速解决亟已成熟的问题。这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场斗争。我们深信，对于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党的领导机关中进行的讨论和它在人民中间引起的反应唤起了新的希望。

也有必要回忆一下阿·杜布切克在（布拉迪斯拉发出版的）《真理报》新年号上写的这些话："过去的时期检验了过去取得的成就和我们今后保持和发展这些成就的能力。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向一个具有新的质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就是今天我们工作的特点，同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阿·杜布切克当选为我们党的领导人使他的这些话具有了纲领性的内容。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热烈欢迎和支持的……（着重点是原有的）

所有希望我们的问题能按照进步的精神得到解决，希望我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复兴过程得以完成的人都能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来，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但愿这些新的希望不是幻想，一九六八年已把我国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令人惊奇的是：在诺沃提尼下台之后，是胡萨克这个自由运动的局外人第一个用明确的语言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起来参加"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复兴运动；是胡萨克第一个站出来"热烈欢迎和支持"杜布切克关于建立一个"具有新的质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号召；先倡导这场革命，尔后又诋毁它，参与镇压它的又是这个胡萨克！

在发表第一篇文章之后三个星期，胡萨克又在《文化生活》上发表文章，对改革进度太慢表示焦急。在这家刊物二月二日出版的一期上，胡萨克指出：全国人民对新的局势抱有希望，但同时也怀有"旧有的怀疑态度"。

斯姆尔科夫斯基——这个人无所畏惧地把自己的思想坚持到底——一月二十一日在布拉格的工会机关报《劳动报》上发表了他对新局势的观点。作为一个部长和颇有影响的党的中央委员，他以相当权威的语气对读者们说：

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调整和克服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我们不能容许再度发生这种情况。关于问题应如何解决的不同观点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用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决不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高级领导职务不应当是终身的。应该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光荣地离开和回到高级职务，甚至最高职务。

在经济领域中，必须将经济改革坚决继续推行下去并

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发展，它的原则必须“贯彻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在社会领域中，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着重点是原有的）

全国人民应该重新团结起来，充分调动一切创造力量，改造，发展和创建一个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当前问题之所在。

可是，到那时为止，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真正的新鲜事物并不多，除了胡萨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一类人发表的寥寥数语外，不过就是在仍然受到审查的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开始谨慎小心地进行的一些政治讨论而已。诚然，从布拉格派出了代表到全国各地，向各级党组织解释一月五日中央全会决议所产生的变化的实质。这一行动是由新补选的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思想进步的布尔诺人什帕切克推动的。在有些简短的情况通报中，提到过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思想。但是，布拉格继续存在的观点模糊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到各州县。对于那些盘据在党的机关里、在诺沃提尼时代飞黄腾达的人来说，这些新提法只不过有些令人不安，但还远远没有引起惊慌。这些人也是玩世不恭之辈，他们过去也听过不少新的大话，听完也就丢在脑后了。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一千四百万人口——九百万捷克人、三百万斯洛伐克人、还有二百万少数民族——中的多数人来说，

在共产党迷宫中演出的这出戏所引起的遥远的回声只不过是一种玄虚的空谈，与他们的生活和生活世界是不相干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只有作家和新闻记者对新形势中蕴藏的巨大力量认识得最清楚。他们对发动整个这场运动作过重大贡献，现在他们急于想享受这些初步胜利的成果。

作协中央委员会一月二十四日在布拉格举行会议，这是诺沃提尼政权上年九月对这个组织及其成员的七月对抗行动进行制裁以后作协第一次开会。这一次开会没有受到党的公开干预，当局也没有施加压力来影响新领导的选举或者迫使作家们作出那些思想内容上能为当局所接受的决议。亨德利赫、霍夫曼及其助手们似乎突然对作家说的话和做的事不感兴趣了。

在新的自由气氛下举行的作协会议选举了爱·戈尔德斯图克为主席。这是一个中年人，可能比他的年青激进的同事们更加倾向于温和。扬·普罗哈兹卡竞选主席失败，但与斯洛伐克作家米·瓦列克一起当选为作协副主席。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的还有米·孔德拉。作协会议宣布从三月份开始重新出版上年九月被文化部接管的周刊。作家们感到这个刊物的原名（《文学报》）已经被当局玷污了，就决定将它改名为《文学通讯》。

经过改组的作家协会变成了改革运动第一个巩固的前哨阵地，它计划出版的刊物《文学通讯》将以自己的

宣传渠道武装进步派和公众。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间及稍后一段时间内，作协和《文学通讯》一直是自由派运动的主要动力。

尽管党的旧的思想监察员和新闻检查官在一月份已经自动靠边站了，作协如果没有杜布切克的同意是不可能选出自由派的领导和筹备出版《文学通讯》的。同样，当戈尔德斯图克宣称作协将争取释放扬·贝奈斯以后，很快就有了相应的行动。贝奈斯在三月二十二日获释，距这一问题的提出还不到两个月。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前所未有的事，在这里知识分子被判刑以后一般是不能减刑的。

但是，自由化并不是顺利地、一致地进行的。一月二十三日斯洛伐克党中央委员会选举瓦·比拉克为第一书记以填补杜布切克留下的空缺。尽管比拉克曾在斯洛伐克问题上同诺沃提尼激烈地争吵过，可是任凭你怎样想也不能把他这个人看作是进步派。相反，他的当选表明，保守势力仍然控制着斯洛伐克的党，而且在杜布切克到布拉格工作以后，他们将加紧控制它。比拉克的掌权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它表明在诺沃提尼下野、改革派上台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不会团结，相反将严重地分裂。以后的事件表明，杜布切克最终断送在他的两个斯洛伐克同胞——胡萨克和比拉克的手里。可是这两个人比起来比拉克至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的表现是始终如一的，有其自有的诚实。

亚·杜布切克上任之后不到四个星期，就飞赴莫斯科作为期两天的访问，其意图实际上是正式会见苏联领导人。他于一月二十九日到达苏联首都，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同他们讨论了从"加深"捷苏两国的"合作"一直到各种国际问题等一系列题目，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为计划在十一月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作准备而即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会议。

从一九六四年起克里姆林宫就想召开这样一次共产党代表会议，作为一九六〇年谴责铁托的南斯拉夫的那个会议的继续。但是它受到罗马尼亚和某些西欧共产党始终一贯的抵制。一九六七年齐奥塞斯库断然拒绝追随反以色列政策，并且使罗马尼亚和以色列建立了经济、文化关系，这样，罗马尼亚就再一次对莫斯科表示了公然的反抗。作为对罗马尼亚这种独立姿态的奖赏，罗马尼亚外长曼内斯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他是荣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个共产党外交家。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希望得到保证：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会执行一条干扰苏联的世界政策、干扰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活动的路线。

没有理由认为，苏联领导人是以冷淡和怀疑的态度会见杜布切克的，也不能因为这次访问是安排在一月底而不是在杜布切克上台之后立即进行的，就以为这是一

种故意的怠慢。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新领导人当选以后首先访问莫斯科，接受克里姆林宫的审查，然后再到这个集团的其他国家去对职位相当的领导人进行“礼节性访问”，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但这种访问的具体安排是根据双方方便的原则（只有在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可以例外），而四个星期之后再安排访问并不能认为是太晚了。无论如何，杜布切克一月六日收到过勃列日涅夫热烈祝贺的电报，从那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事足以使苏联改变态度。

杜布切克在莫斯科向他的东道主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同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关系不会因为捷领导的更迭而受到影响，他还说，他当然要在下个月派一个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参加会议。

杜布切克完全成功地通过了莫斯科的考查，这一点可以在访问公报中看出来。公报说，这次访问的特点是“热烈友好，诚挚，对会谈中涉及的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会谈的结果“取得了友好的谅解，这是同两党兄弟关系的性质相符合的”。从莫斯科发表这类公报时严格控制的口径看，上面的这些提法肯定表示了苏联最高的赞许。如果访问公报干巴巴地说：会谈是在“坦率和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那么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会谈总的没有达成协议而破裂了。这样的公报在一九六八年的后几个月里倒是出现过几个的。

八月苏军入侵以后，苏联报刊马上对一月份勃列日

涅夫和杜布切克在莫斯科的会谈作了一番完全不同的叙述，说是在会谈中就捷国内正在发展的对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威胁，对捷领导人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可是这种新说法是丝毫也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除了在杜布切克动身去莫斯科之前五天作家协会举行的选举之外，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具体事件，足以使克里姆林宫产生这样紧急的预感。惯于事后才聪明起来的苏联报刊发现，改写历史毕竟比预见历史发展要容易，正如一个布拉格的编辑在苏军入侵后对我说的，苏联历史学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预见过去”。

二月四日杜布切克在靠近捷匈边境的科马尔诺城和卡达尔会见。他们两人很早就已经相识，能说一口流利匈语的杜布切克向卡达尔介绍了他对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计划，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计划，给了卡达尔很好的印象。匈牙利当时也在推行一项谨慎的经济改革。二月七日杜布切克在靠近波兰边界的摩拉维亚工业城市俄斯特拉发和哥穆尔卡会谈。二月十九日，捷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国际联系的书记，十分亲苏的弗·考茨基飞往布加勒斯特，向罗马尼亚领导人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形势。在东欧各国进行这种寻求支持的礼节性活动中唯一的明显的遗漏，是杜布切克没有能同乌布利希会见，而这个人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变成了折磨杜布切克的主要人物之一。

改革运动在二月里增强了势头，它具体成形并明确了方向。认真地推行经济改革，强调对全国性的问题自

由发表意见和公开辩论，坚持正义和法制——这些就是编辑部里、日益增多的辩论小组里、查理大学课堂里、甚至在工会组织里的年青的共产党人称之为“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个说法很巧妙，很适合倾向于人道主义和抒情风格的捷克人的性格。

“布拉格之春”被人称之为一场革命。俄国人当然更愿意称它为“反革命”。我认为，在我们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的时候，给这些名词及其含义作出准确的解释，避免陈词滥调和空洞的口号是十分重要的。我自己的观点是：一九六八年起初是本能地、然后是自觉地、有计划有纲领地在布拉格进行的尝试，是一场十分深刻的哲学意义上的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在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倾向于西方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中进行的。捷克人是从这样一个哲学的、人文主义的和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根源可追溯到十世纪初的圣瓦茨拉夫时代；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以惊人的始终不渝和目标一致，经过胡斯运动和塔波尔派战士的斗争，十七世纪反对哈布斯堡的起义，夸美纽斯（拉丁语，即考门斯基）在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参加奥匈帝国的现代化建设，最后，在马萨里克的第一共和国时期达到了思想成熟和民族独立的发展高峰。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具有中左民主倾向的国家出现，是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态，其原因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而在于其中具有压倒

优势的斯大林主义成份，再加上它又代表了苏联利益，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对此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开始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达到高峰——是一个文明的、自由思想的西方社会对于塞在苏联大兵的行李车里从东方运来的骇人听闻的政治畸形发展所作的回答。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是：表达这种反应的人中有同莫斯科有着广泛联系的老党员，如斯姆尔科夫斯基、胡萨克（胡萨克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很有头脑，会看风使舵），克里格尔和戈尔德斯图克这类人，他们同杜布切克、什帕切克、希克、齐萨日、姆林纳日这样的新派共产党人和科希克、瓦·米勒、米·许贝尔及斯维塔克这样的理论家一起成了这种反应的代言人。因而，在一九六八年展开的这场斗争，从根本上讲是信仰者同庸人的斗争，是有思想的人同野蛮人的斗争。在这个时期的领袖人物中，只有古·胡萨克一个人在短短的八个月里作到了左右逢源。

正在成长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是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把现代的批判分析方法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第一批西方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了背着拜占庭包袱的东方学派——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活动范围。而且，这两个人当时握有实权在领导一场革命，然后领导一个国家。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他们从事意识形

态工作的僚属们滔滔不绝地发表的思想和言论，这些东西不管你怎么想也是不能叫做哲学的。

毫无疑问，西方在此期间产生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思想和哲学，出现了象吉·饶勒斯、韦布夫妇、哈·拉斯基、安·葛兰西、埃·布洛希、吉一保·萨特、阿·加缪和罗·加罗迪这样的思想家。赫·马可斯把新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中国的革命思想混杂在一起，从而使老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重趋活跃，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独创的见解，也没有提出对于解决世界的现实问题具有建设性的东西。总之，西方的思想家们没有处理政治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负担，用不着去对付那些变革和冲突。在这方面只有帕·陶里亚蒂是例外，他的影响在他逝世以后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扩大了，不仅在意大利党内，而且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是如此。年青的捷克斯洛伐克思想家们从事的工作，就是把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变成政治行动。

其他东欧国家在二次大战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只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试探性地重述一下，而且就连这么做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吉·卢卡奇已经被匈牙利当局控制住，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时，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对东欧新哲学作过重要贡献的波兰人莱·科瓦科夫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推进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时候，已经离开波兰到北美去了。切·米沃什离开国内时间太久，已不能代表波兰

的新思想了。一度当过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的亚·沙夫确曾在一九六五年发表的《马克思和个人》一书中代表了新的思潮，他写道："谁要是认识不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他就是忽略了社会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根本不理解这个思想。"可是沙夫的嘴也已经被人堵住了。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之外，只有米·吉拉斯仍不失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他著的《不完善的社会》一书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九六八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刚刚出现的革命，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理智和感情结合的产物。用共产党人的词儿来说，它带有意大利陶里亚蒂的"雅尔塔遗嘱"和他的"多样化中求统一"思想的烙印（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约翰·弗·肯尼迪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也为现代社会提出了与此相类似的主张）。因此，对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最强烈的反应之一来自意大利共产党中陶里亚蒂的继承人，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把布拉格之春的那些口号——甚至包括"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这个著名的口号在内——去掉，那么，使得这次捷克斯洛伐克的试验变成一场二十世纪真正的革命的东西是：这次试验着手把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政治、文化和学术自由的西方传统结合起来。这样的尝试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还从来没有人作过。反对它的人马上就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这个名词本身就有矛盾。可是，起着东西方之间桥梁作用的捷克人认为，他们能够把两者（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

人道的社会主义是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哲学。但是，东欧的这次文艺复兴在还没有来得及充分的和自由的试验之前就被勃列日涅夫的坦克暂时压下去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悲剧。

这次革命的实际规模——彻底的经济改革和对共产党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职能的重新估价——在自由发表意见、公开辩论和对话没有实现之前，是不可能合理地加以考虑的。二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一个单调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一言堂，它压制了不同意见，使新的思想不能产生。现在，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一月底一批新闻记者和作家访问了伊·亨德利赫（当时他还是党的正式理论家），要求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在一九六七年及其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记者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没有表现为争取自由发表意见的无畏战士。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和布尔诺的几次搏斗中，首当其冲的是作家、剧作家和诗人。几十个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这些人后来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和想象力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在他们写的报道和社论中甘愿跟在党的路线后面亦步亦趋。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和捷通

社驻西方的通讯员，同他们在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塔斯社、波兰的《人民论坛报》和东德的《新德意志报》的同行一样，写的通讯报道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片面而又恶毒。可是现在，这些新闻记者也投身到争论中来了。

令人惊讶的是：亨德利赫居然同意，现在是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的时候了。他没有权力修改一九六七年的新闻出版法，而当时还在摸索前进的党和政府还不打算修改这个法律。因而，就出现了实际上的新闻自由。新闻检查官们仍然留在编辑部里，不过手里不再拿着蓝铅笔和剪刀了。他们既没有挨批也没有挨揍，而是自然而然地改了行，承担起象煮咖啡或者打啤酒这类更富有建设性的任务。新闻记者不是喜欢报复的人——报复也不符合这场平静的革命的精神——他们对检查官们帮着准备饮料颇表欢迎。有些更加令人讨厌的检查官感到再呆在报社编辑部不是滋味儿了，索性就呆在家里或者到编辑部门口打一下上班钟片就回家。

二月一日至三日在布拉格举行了统一农业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农民的会议通常不算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杜布切克却选中了这次会议作为他公开露面的场合。二月一日，在他从莫斯科回国的第二天，他向到会的一千八百名代表讲了话。

杜布切克戴着眼镜羞怯而文静地读他写好的稿子，他开始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证明党关于农村社

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是"正确的"。捷共中央全会一月五日的决定"为人民在各方面发挥积极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把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发动起来了"。他不象诺沃提尼那样一有机会就发表一通夸夸其谈的讲话来鼓舞士气，他只是简单地说，新领导象信任工人一样，也信任农民，希望在完成今后的任务中能得到他们真诚的支持与合作。他向到会的人说，民主是和纪律一样重要，虽然过去官方强调的只是后者。

杜布切克说："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也包括处理人民的意见的方式；人民是否真正感到他们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作出决定，他们是否真正感到他们是在参与处理和决定这些重大问题……政府机关必须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让农民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主动性，而不是向他们发号施令，叫他们何时和怎么去收割和播种。"

然后杜布切克宣布：党正在准备一个"行动纲领"，它将明确规定"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并阐明"党在社会、国家和经济领域的当前政治任务"。这个纲领是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大宪章，捷共中央主席团二月六日正式开会进行了讨论。中央主席团也采取了坚定的步骤，宣布今后"党中央开会的气氛应该是，允许自由批评和建设性的交换意见，也允许对不同的建议和立场作出评价。"

中央主席团还许诺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和书记处开会讨论的情况将公开发表”，这是与过去的做法截然不同的。这等于宣布在共产主义体制内部实行真正的民主。中央主席团当时还受到诺沃提尼和其它保守分子的牵制，但仍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宣布人民代表机构——指的是国民议会——将代替党的机构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决策机构。新的领导正在进行真正的分权，取消共产党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包揽一切的有害作法。

这种新的民主在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上也自发地开始起作用了。杜布切克讲话之后，大会就不再象是过去那种幕后一切安排好的会议的开法了。事先没有安排的发言人站出来提问题、进行批评；预先起草好的决议被丢弃一旁，在会议的热烈辩论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建立一个能够自由地维护农民利益的，对制定国家政策的人能够施加影响的全国性农民组织，要求实现农业合作社的完全民主化和要求农业合作社享有与捷克斯洛伐克其他组织相同的权利。

二月二十五日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电台发表谈话，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主张党政分开。以后他又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发表在《红色权利报》上的），讨论自治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样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他发表在党的机关报上的文章中写道：“勇敢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社

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归根到底也是我们对于自己和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责任。”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勇敢的命题，即共产党国家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平等。经济发达的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需要建立“这样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它甚至可供有着成熟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欧洲工业国借鉴。”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观点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今后应该面向西欧。

这就意味着，总有一天捷克斯洛伐克要以某种方式摆脱苏联过于苛刻的监护。要使国民经济克服长期的停滞而重新振兴起来，捷克斯洛伐克人必须关心解决捷苏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经互会的发号施令、给俄国的贷款和供货、数额很大但非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等。在这一方面，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经济独立的思想自然就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注意。然后，完全合乎逻辑地，人们认识到政治上的独立也是至关重要的。

曾经当过外贸部副部长、坐了十一年监牢之后重新在斯洛伐克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埃·洛布尔在二月二十日的一篇广播评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复杂的、爆炸性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整好它在经济领域中“同苏联的不平等关系”？在同一个星期里，国防部出版的周刊《人民防御报》也发表文章，就过去共产党情报局以及其他共产党机关报对南斯拉夫的批评为南辩护。它赞扬南斯拉夫顶住了莫斯科的压力，认为是

值得效法的榜样。

老百姓也把国内的自由化和反苏情绪联系起来，这在二月十五日在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的奥运会上捷冰球队以五比四的比分战胜了保持不败记录的苏联队之后的反应中看得十分清楚。冰球是捷克斯洛伐克群众最喜爱的运动项目。捷克小孩和斯洛伐克小孩在结了冰的池塘上、甚至在大街上玩冰球，就象美国孩子玩棒球一样带劲。在格勒诺布尔赛球的时候，几十万人在看电视和听电台转播实况。打败了苏联队这件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的事，使全国人民激动万分，成千上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涌上街头，热烈庆祝。冰球在捷苏关系中起的重大作用在一九六九年捷代表队又一次打败苏联队时再度戏剧性地显示出来。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九六九年冰球赛的另一位著名的牺牲者，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向学生们讲话时象预言家似地谈到这种冰球政策的严重危险。他说：

当然，你们当中不少的人会认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是因为你们过去不关心政治，你们是在最近两个月才开始关心政治的。你们想，在我们的国家里什么都是苏联说了算。年青的朋友们，如果现在还有人这么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同志们，现在我们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基础上的。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常常看到年青人表露出他们对苏联的厌恶，在冰球赛的时候尤其明显。当然，爱什么还是不爱什

么，这是各人的私事，是不能勉强的。可是，你们必须考虑一个现实，你们去看看地图，在学校里或者在家里看看地图，看看我们的国境线，谁是我们的邻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政治之中的。……希望你们不要忽视我刚才说的话，不要拿它当儿戏；千万不要低估你们对我国安全所负的责任啊！

到了二月中旬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这场辩论不可能只是在理论上交换关于如何最好地治理这个国家的意见。顽固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们和在戒备森严的苏联使馆中，在契尔沃年科大使周围工作的苏联官员们，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能发现，现状正在他们的眼前变化着。逐渐传开了一种谣言，说是某种“反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正如进步的领导集团还缺乏明确的方向一样，保守派也没有一个有力量的人物能够把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织一个对抗性的运动。而在这两个阵营之间有着广大的群众（党外群众和党员群众），他们思想混乱，方向不明，对日益迅速发展着的局势心中无数。可是，任何立场和态度都是相对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希克、还有斯洛伐克的胡萨克之类的人要求越来越加快步伐。杜布切克在保守派眼中，甚至在苏联大使馆眼中是一个危险的激进派，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中间分子，他希望实现的是改良主义者所喜爱的中间道路。但不久之后，卷入运动的人们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一派

人的态度了。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就迅速地陷入了两种对立力量的猛烈冲击之中。

保守派最有力的武器是在某些党的会议上悄悄地散布的一种说法，即自由派推行的改革将直接危害工人的切身利益。他们告诉工人们说：如果让希克那一伙人实行那种改革，成千上万的人就要失业，工资要降低，物价要上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就会乱得无法收拾。这些自己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搞得一团糟的人，现在却摇身一变，以工人阶级利益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这倒颇使人惊奇。令人奇怪的是，进步派的确还受到了这种攻击的干扰，因为他们对自己事业的号召力估计过低，而对保守派的说服力估计过高。全国人民作出的最后反应对于斗争双方来说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一个政治家的艺术就是要能激流勇退。可是诺沃提尼甚至在被解除党的领导人的职务之后也没有懂得这种艺术。他把自己还当总统这件事看得过于认真了，居然站出来充当反改革派的代言人（这个举动很可能也使他的保守派同志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知道诺沃提尼已经完蛋了）。例如，二月十七日他对布拉格的切卡德工厂的几千工人发表讲话，歌颂他过去的政策的英明，对杜布切克倡导的前进方向的可怕危险性发出警告。（诺沃提尼不仅能继续坐在总统府里，而且还能自由发表政治性的演说，这反映了“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特点。要叫苏共在赫鲁晓夫垮台之后还让他到处乱跑，大吹大

播地公开反对勃列日涅夫体制，那根本是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此。）诺沃提尼珍爱切卡德工厂就象珍爱自己的眼珠一样——这个大工厂是他当权时特意精心扶持的企业之一。可是他的讲话只博得了有礼貌的寥寥几声鼓掌。这个讲话照样登载在解除了新闻检查的报纸上，但他的话引起的效果却和他的希望相反，这一点倒并不叫人感到意外。正如Z·A·B·泽曼指出的："诺沃提尼实际上帮了改革事业的忙，因为他这么一来就使辩论不得不扩展到工厂中去，扩展到广大公众生活中去。"

杜布切克政权对大清洗并不感兴趣，但对那些占据着权力很大、影响面很广的职位的人却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否则改革就有在内部遭到抵制的危险。当时进步派迫切需要控制的两个关键部门是思想文化部门和公安机关。杜布切克对改组中央主席团和政府的工作还没有准备好，这就意味着亨德利赫、霍夫曼、库德尔纳一时还不会下台。这些人的影响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急剧减小了，可是，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政府中，这些"执行"干部仍然掌握着权力的杠杆。从心理上讲，杜布切克倒是希望把诺沃提尼撤掉。让这个人继续当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而他所主张的一切目前正在被清除，这显然是太不协调了。可是要撤掉诺沃提尼还得等待适当的时机。

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在诺沃提尼下台后第一次开会，规划它今后的工作方针。这次会议具有

捉迷藏的特色。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清一色是诺沃提尼任命的，都是十足的教条主义者，要求他们马上转过弯子，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由主义的解释，这未免太过份了。可是，委员会却用隐语行话和一些人事变动解决了问题。它宣称，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认为必须“彻底克服对待文化艺术和对待知识分子的简单化态度”。党的干部应该集中力量完成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任务，不要去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这种提法的含义之一就是，告诉亨德利赫和霍夫曼不要再向知识分子发号施令，不要干预他们的事务。

例如，在两天以前，作协捷克分会正式向捷共（中央）提出，希望党代它向文化部交涉准予出版作协的新机关刊物《文学通讯》。在这个问题上文化部已经拖了好几个星期，作协要求拨给出版每期十六版的刊物十五万份所需的纸张，文化部老是不批（霍夫曼主管的这个部只肯给出版每期十版的刊物五万份所需的报纸）。看来党中央和意识形态委员会是支持了作协的这个要求，因为《文学通讯》第一期在二月二十九日就出版了，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都很丰富，十五万份立即被抢购一空。要是没有得到杜布切克的认可事情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意识形态委员会也撤掉了它的主席弗·哈弗利切克的职务。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接替帕·奥尔斯佩格担任这个职务的。奥尔斯佩格是一位历史学家，原来当过诺沃提尼的私人秘书，为他起草文稿。这是捷党员知识分

子中一个颇有意思的人，他能根据当时自己处在谁的影响之下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过他和胡萨克不同，他没有权力欲。他一九六七年由于进步的本能被撤了职，一九六八年参与了革命纲领的制订，到一九六九年他又转到保守派一边去了。如果把奥尔斯佩格说成是一个投机分子可能是不公正的，他只不过总是走在当时政治潮流的前面，而不管其方向如何。看来是他证实了维克多·雨果的名言：一个人和一头牛的主要区别在于，人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主张，而牛却总是吃同样的草。不管怎样，当时取代了奥尔斯佩格的哈弗利切克现在也下台了，由一个无名的保守派雅·科泽尔接替。这样的人选当时可能是符合党的需要的。科泽尔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太短，没有起任何作用。

公安机关的清洗是在二月八号开始的。这一天捷共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这是执行党纪的一个很有权力的机构——举行会议，着手计划“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作出更深刻的评价”。它宣称：“对本委员会和党的整个纪律检查系统的工作进行总结将使我们能够更负责任地、更准确地规定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的地位、任务和结构”，规定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方针”。用简单明了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党将不再用盲目的纪律束缚党员，不再对违反者加以惩处了。

二月十九日杜布切克主持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

讨论他在二月一日宣布要起草的党的行动纲领的草案；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应积极参与制订行动纲领的工作”。决定称：草案将由党的州委会讨论，然后在党中央所属的各个委员会公开讨论。在过去，党的纲领由中央主席团起草并通过，然后通知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就算完事。这次的决定打破了这种先例。行动纲领大部分是下面三个人起草的：奥·希克（他参加起草，强调了这个纲领的经济方面）、拉·里赫塔（他是哲学研究所派出的小组的组长，研究报告《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就是这个小组早些时候写的）、还有历史学家奥尔斯佩格。兹·姆林纳日（此人不久就正式成为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协助起草了纲领的政治部分。处于混乱之中的党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在制订行动纲领的工作中很少作为（如果不是根本没有过问此事的话），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这次中央主席团会议还撤销了米·马穆拉党中央名声不好的、负责保卫工作的第八部部长的职务。马穆拉实际上是捷克斯洛伐克保卫工作的头子，是苏联克格勃的密切合作者。虽然保卫工作原则上是归内务部主管，马穆拉却直接指挥这项工作，协助他的是内务部副部长威·沙尔戈维奇。这个斯洛伐克人真是捷克斯洛伐克舞台上一个坏家伙。他四十八、九岁，长得粗壮、黝黑，戴一副眼镜。他同时还是克格勃的联络官，后来在准备

苏军入侵时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保卫部门就象马穆拉和沙尔戈维奇统治下的一个国中之国，内务部甚至中央主席团都管不着它。撤马穆拉的职（杜布切克后来让他到列特尼亚尼的飞机工厂当一个职员）是改组秘密警察，使它听从政府指挥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可是，这些秘密警察头子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只是潜伏下来，伺机而动，就象他们在苏军入侵之后所表现的那样。为什么要撤马穆拉的职，官方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但知情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参加了诺沃提尼企图在十二月发动的先发制人的军事政变阴谋而被撵下台的。要杜布切克让这个曾经签发过逮捕他的命令的人继续身居要职，这未免太困难了。

接替马穆拉的是普尔赫利克中将，是他将政变阴谋事先告知了杜布切克，然后又劝说各军区司令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保守中立。普尔赫利克就任后，埃·佩比赫少将被任命来接替他当捷军总政治部主任，而这个斯洛伐克人后来又与胡萨克共命运了。诺沃提尼集团的重要人物中仍然担任敏感的保卫工作要职的只有马穆拉在部队中的年轻副手、另一个参加过十二月政变阴谋的人谢伊纳少将。可是，新政权还没有来得及撤他的职，他就采取了主动，结果酿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它永远埋葬了诺沃提尼政权。

二月二十二、二十三两天捷克斯洛伐克庆祝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夺权二十周年，虽则准确的日子应该是二月

二十六日。这个节日其实记得它的人并不多，更没有人想去纪念它，但又是忽视不得的。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卡达尔和乌布利希都来参加庆祝活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对新政权的现场观察，而这次庆祝活动也就变成了考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是否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一次机会。齐奥塞斯库也到布拉格来了，不过，他的观察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布拉格的建筑物上恭恭敬敬地挂上红旗和条幅，屋顶上和大楼入口处彩旗飞扬。总统府院子里的旗杆上升起了捷共的巨幅党旗，与三色国旗遥遥相对。其他庆祝节日惯有的装饰也无不齐备——可是这一切比以前更令人感到空洞无物。报纸上登载了勃列日涅夫在飞机场受到略带笑容的杜布切克欢迎的照片，新闻照片和电视中也看到了齐奥塞斯库没有表情的脸、哥穆尔卡和卡达尔脸上官样文章的笑容和乌布利希的山羊胡子。

对于杜布切克来说，这次庆祝活动向他提出了一个必须直接地、公开地回答的敏感问题。如果勃列日涅夫及其侍从们是来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的，那么，他就应该向他们解释和说明这种共产主义在一九六八年意味着什么。他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迅速结束了共产党常用的套语和保证友好团结之类的话，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人民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戏剧性变革之一。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生

活，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这样深刻的变革，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不幸的是：当时党的领导令人遗憾地没有能够避免的错误和缺点竟然也和这些确实伟大的变革一样巨大。在党内生活中也有过不少挫折，其后果我们至今仍然感觉得到……

在无端怀疑的气氛下，发生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消极现象，从而使上述问题以及同样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更加复杂化，由此受到损害的还不仅是共产主义。我认为，替一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忠诚地为祖国效劳过的人们真正恢复名誉，发展我国的进步事业和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为整个社会和党的全面民主化所作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从政府系统和党的系统两个方面来纠正过去的冤案，要彻底地、毫无保留地这样做。

科学和文化可能是党的活动中最复杂和最敏感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对象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工作需要人们深刻的理解和赞赏，而不能停滞，不能公式化，不能缺乏耐心和要求过急。在文化和科学工作方面也不是没有困难、挫折和错误的。不光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使人们产生了失望和幻灭之感。我们确实未能始终正确地评价其意义、效果，更为重要的未能分析其原因。结果我们在这个领域中就经常遇到不必要的冲突，使党同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可是，在各个领域中发生的这些缺点不能、也不应使我们对科学家、作家、电影工作者、艺术家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的公共活动，对他们这种活动的内容和方向失去信任，不应该把我们对他

们的政策建立在这种不信任的基础上。相反，我们的政策必须建立在信任和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之上。凡是对科学发明创造和艺术创作有害的东西，凡是有可能引起关系紧张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加以消除。……不过，党必须保证文艺创作要有助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形成，党不能放弃它的这个权利和义务。

我认为，要争取年青一代不能光靠训斥或者告诫他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对于年青人来说，这不过是日常的现实，被他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并不了解这些是经过斗争得来的。不过，这并非主要之点……

不能把青年的热情老是限制在歌颂我们成就的框框里。我国的年青人也想作出自己的成绩，实现自己的幻梦和理想，就象现在年长的人在年青时做过的那样，而当时革命曾给他们提供了机会。青年不能坐享其成。必须给青年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够发挥其积极性，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工作。这样就能使我国年青的公民完成他们作为一代人的责任。……

不把党看作一种进行政治领导的力量，而看作一个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枝节问题的机构，这种陈旧的观点近来又占了上风。……我们的许多行政部门、经济部门以及公众机构的工作缺乏有意义的实际内容，群众的积极性得不到鼓励，我们的许多工作流于形式，这些情况的产生主要应该由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理解来负责，对于这一点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了。……

对于我们党来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充分实现党的领导

作用首先意味着为发挥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各种意见的争论和交流提供更广阔的天地，让每一个共产党员充分地、如实地、及时地了解国内外大事，以便他能对党的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及其行动提出意见，对他工作的部门中党的活动提出意见。简言之，这在目前就意味着在保持基本的集中制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更多地、特别是更加深入地发展各种形式的民主，不仅是在党的上层组织，尤其要在下面，在党的基层和党员群众中发扬民主。

对苏联克里姆林宫学研究颇为细致的《纽约时报》的社论撰写人哈·什瓦茨指出，苏联《真理报》在报道杜布切克的这一讲话时，把上面引用的这几段话全都删掉了。讲话的其余部分还讲到捷、斯两民族的问题，其中暗示将为解决民族问题作出新的安排。

这样的想法看来是公正的，即勃列日涅夫以及和他同来的苏联代表团团员，乌克兰的党魁、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苏共中央书记处负责联系执政的共产党的书记康·卡图谢夫和苏共的一个州委书记库利钦科对于杜布切克讲话的印象是不好的。苏联人原来就怀疑这里在搞"修正主义"（如果还不把它叫做正在成形的"反革命"的话），现在这种怀疑更厉害了。但这一次他们仍然力图把苏捷关系描叙成是诚挚友好的。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不免把共产党在这类场合用的冠冕堂皇的词句运用了一番，可是他着重赞扬了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成就

和它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勃列日涅夫的这种反应当然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那么，当哥穆尔卡听到杜布切克关于党的作用的观点时，他在想些什么呢？十二年前他也曾试图实行一种类似的自由化的共产主义，但在苏联的威慑之下，他畏缩、屈服了。现在哥穆尔卡年已六十三岁，已经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坐在布拉格静听捷克斯洛伐克年青人阐述大胆的新纲领，而在华沙当时波兰青年也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动乱。

在杜布切克讲话的第二天，诺沃提尼在布拉格老城市政厅的庆祝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位总统自我歌颂了一番，又把前一天下午勃列日涅夫讲的意思大体重复了一遍，他这样做起码是不合时宜的。这次庆祝活动倒是免去了传统的阅兵式，这种阅兵式既可以说是恰当的，也带有一点讽刺意味。

就在这一天出版的国防部刊物《人民防御报》上登载了佩比赫少将写的一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揭露总统及其一伙曾在上一年十二月企图发动军事政变。文章没有直接点谢伊纳将军的名字，但暗示得十分明显，谢伊纳见势不妙，在两天以后逃离捷克斯洛伐克。由此引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丑闻。

谢伊纳带了他十八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年青妇女（据说是他儿子的女友），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本国到了匈牙利，由匈牙利乘汽车到南斯拉夫，最后到达意大利。在罗马，他前往美国大使馆，要求在美国政治避

难。一个亲苏的捷克斯洛伐克将军，颇受苏联武装力量信任的一位合作者，却要求美国人庇护，而他要逃脱的却又是一场实质上倾向西方的自由化共产主义革命——这种情况确实是奇怪透顶。谢伊纳获得了避难权，这主要是因为他掌握的军事情报十分可贵。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收留了他，将他从罗马秘密送往美国，让他居住在华盛顿地区某处，离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城的总部不远。那么，谢伊纳为什么选择美国作为避难所，而不到同他职业上和思想上都有密切关系的苏联去呢？这可能是由于，谢伊纳是个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他权衡比较，感到去华盛顿要比去莫斯科更为安全，生活也会舒适得多，因为克里姆林宫对失败者的憎恶是远近闻名的；此外，他能够为美国人提供大量的情报，而对苏联人来说他却是毫无用处的。

此后，在苏军侵捷前后的好几个月里，谢伊纳源源不断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他本国和苏联的军事情报——据说他参观过苏联的秘密导弹试验设施——还提供了不少关于国家安全的情报和关于干部的个人情况。在谢伊纳叛逃几个月之后，我在布拉格听捷军事情报人员说，使谢伊纳能够到"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旅行的外交护照是华沙条约总部的苏联军官在几个月之前批准发给的，因为他了解苏联和华沙条约的军事秘密，照例需要这样的手续。显然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护照他才能在二月二十五日安然通过匈牙利

边界，从而给这件异乎寻常的事件又添上一层讽刺性的色彩。我在从布拉格发给《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了批准发给他护照的事，可是当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谢伊纳讯问此事时，他却始终加以否认。不过我仍然觉得，关于批准发给护照的说法是准确可靠的，谢伊纳之所以否认这一点，乃是怕别人怀疑他的外逃是受莫斯科操纵的行动。

捷克斯洛伐克公众一直到三月一日才看到谢伊纳外逃的消息——虽然西方报刊和电台早已发表了这一新闻——但在此以前，捷国民议会在诺沃提尼的朋友拉什托维奇卡的主持下举行了秘密会议，剥夺了谢伊纳的议员豁免权，这就可以对他提出刑事控诉。这项刑事罪，照布拉格的报纸二月末的报道，就是谢伊纳过去在当农民的时候曾经贪污了政府价值两万美元的三叶草和紫苜蓿。

这种看起来有些荒谬的发展引起了深远的后果。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伊·雅库鲍夫斯基元帅二月二十八日飞抵布拉格，与杜布切克、诺沃提尼、列纳尔特总理、洛姆斯基国防部长举行秘密紧急会谈。会谈中讨论了谢伊纳的叛逃以及由此在情报方面和安全方面引起的后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但雅库鲍夫斯基到布拉格来同时还考察了华沙条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能性，这一点也不是不可能的。八月份苏军侵捷之后，捷军情报官员估计，组织这次进攻的参谋紧急计划工作肯定在二月末就开始了，因为他们认为，调动五十多万部队，包括装

甲兵、炮兵在内，还要组织五个国家充分的后勤支援，这项准备工作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诺沃提尼军事政变计划的被揭露，马穆拉、谢伊纳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扬科的卷入，就使诺沃提尼不能再担任总统职务了。要他下台的呼声响彻全国各地。三月八日捷军总参谋部就谢伊纳外逃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直接抨击了诺沃提尼和马穆拉，要求总统辞职。诺沃提尼在第二天作出的反应是取消了谢伊纳的军衔，撤销了授予他的一切奖章和勋章（这种做法未免有点不大道德，因为在那次流产的阴谋中把谢伊纳的协助列为头等重要因素的正是诺沃提尼自己），但是想要挽救这位总统已经为时太晚了。三月十三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卡·杜达照会美国国务院，根据一九二五年引渡条约要求引渡谢伊纳，因为他犯了刑事罪被控告。照会后还附了因犯"贪污"罪逮捕谢伊纳的逮捕证。接着，扬科将军在三月十四日自杀身死。

捷共中央主席团三月五日在杜布切克主持下开会，免除了亨德利赫全面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让他去负责政治组织方面的工作。接替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原在布尔诺工作的、年青的自由派的主席团成员约·什帕切克。亨德利赫暂时还留在主席团内，不过只是挂名而已。中央主席团的这次会议还规定了一套从党的最高领导到基层组织之间互通情况的制度。这套制度

是为了落实全党进行充分协商就行动纲领和其他新政策进行公开辩论的决定而规定的。主席团还开始讨论新的新闻出版法，以取代一九六七年的法律，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三月九日、十日和三月十七、十八日这两个周末，中央主席团成员分别与各州、县党组织举行了六十七次会议，讨论行动纲领草案和其他新的政策思想，这样，这种新的民主制度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党组织的代表向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如：怎样使捷共党员群众摆脱长期以来的消极状态，使党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根据“马列主义”原则解决令人烦恼的民族问题，使工人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明朗化，解决过去积累下来的经济问题和满足青年的要求等等。基层来的压力也促使中央主席团加速为遭到大清洗的人平反昭雪。

既然中央主席团鼓励党员讲话，对过去的“错误”和“不正常现象”的批评和控诉就象潮水一般地涌来。党组织坚决要求将那些由于早些年的活动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心目中声名狼藉的官员——其中包括诺沃提尼总统——撵下台。最后，主席团发现，出现了一股要求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的热潮。这种情况在捷共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因为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党员群众第一次成了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不单是个旁观者或者受害者。杜布切克的想法是：党必须恢复——或者取得——其灵活适应性，以便它能够接近人民。这些新马克思主

义者的梦想是共产党应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统治，而不是用暴力统治。

下面的事例能够代表当时新的气氛：《布拉格晚报》对待中央主席团关于言论自由的指示十分认真，竟然在三月十二日批评了它的发行者——捷共布拉格市委会，指责市委在月初不顾编辑的反对强令该报登载了一个旨在"迷惑群众"的声明。市委会的头子马·瓦塞利克是一个老派的共产党员（他与激进的作家卢·瓦塞利克毫无关系）。同一天布拉格电台评论员对干扰自由欧洲电台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广播表示抗议，他指出，公民应该有权收听他想听的任何广播而不受政府的干涉。第二天，日益变成自由化堡垒的布拉格电台又批评苏联报刊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发展不该保持沉默。（在尚未作出如何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叛的决定以前，苏联报刊电台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办法。显然，克里姆林宫不愿意让它本国的反对派得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正在怎么样实现民主化。）对过去的做法的抗议和谴责之声从党、政府和各种其他组织源源不断地传来，而这些组织机构过去只不过是捷共统治的驯服工具而已。

三月十三日内务部两个党组织通过一项决议，抗议部和司、局领导对保卫机关的职能问题采取"拖拉"态度。决议强调指出，秘密警察至今未能得到清理——这正是人们议论的题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对公安人员的态度"。换句话说，现在秘密警察也决心要

争取人民的支持和赞同了。在前一天内务部长库德尔纳已经向查理大学的学生公开道歉，谴责个别警察在斯特拉霍夫事件中“不必要地使用暴力”，并且宣布七个警方人员已受到惩处，赔偿所有受伤学生的损失。从今以后警察将带上号码牌值勤，以便于辨认。

可惜，这些措施采取得太晚了。国民议会主席团（在一月份以前它还是统治当局的一个驯服工具）三月十四日对库德尔纳和总检察长扬·巴尔图什卡投了不信任票。它还指示最高法院院长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恢复名誉的工作。同时，查理大学九十二名法律教师联名发表一封给巴尔图什卡的公开信，指责他拖延复查大清洗时的案件。诺沃提尼别无选择，只好在三月十五日宣布撤销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的职务，捷共中央主席团立即批准了这一措施。它也批准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撤销其主席米·胡迪克的职务和工会中央理事会撤销米·帕斯蒂日克领导职务的决定。(当时的气氛是如此激烈，以致这两个机构都驳回了这两个人自动辞职的请求，而是投不信任票将他们撤了职。）弗·巴尔比雷克，一个比较保守的机关干部，担任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代理主席。这个民族议会立即提出，应该建立捷、斯两民族之间的新关系，它本身应该享有完全的立法权。在工会中央理事会中，随着帕斯蒂日克的被撤职，人们对这个机构过去的奴隶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要求它今后独立起作用。力量强大的五金工会主席、思想进步的卡·波拉切

克当选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同时，外交部——五十年代大清洗时这里受害者最多——的党组织开会批判亲苏的外长戴维，而且还严肃批评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他们迫切要求惩处那些对过去“不正常状况”负有责任的人员，并且宣称，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在保持与苏联同盟关系的同时，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在别的部门中也是一片自我批评的气氛，要求撤换领导人和修改纲领的呼声四起。互相之间毫不相关的各种组织都纷纷动了起来，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族劳动人民联盟、天主教和平运动全国代表会议、少年先锋队、捷青年联盟中央主席团和布拉格大学委员会。全国性的准军事组织军人之友社的青年部分裂出来，宣布它将重新组织捷克斯洛伐克童子军（童子军在一九四八年被斥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而禁止存在）。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作家协会建议成立一个“批判思想俱乐部”。人民党和社会党过去一直是捷共领导下的民族阵线中忠顺成员，现在突然发现将来有可能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因而也在忙着制订自己的复兴计划。民族阵线也提出，五月十九日全国各级人民委员会选举时应实行无记名投票。中央出版局这个主管新闻出版审查的机关，提出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制度。

就这样，正统的共产党统治二十年之久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迅速地土崩瓦解，而且就象一个正在愈合的伤

口一样，新的组织在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可是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还在后面呢。当捷共中央主席团三月十三至十五日在杜布切克主持下开会时，领导集团宣布它已准备了人事变动的方案，将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这当然就等于签署了老的中央主席团中的绝大部分成员的政治死刑判决书。同时将切·齐萨日从驻罗马尼亚大使馆调回，任命他担任主管教育、科学、文化的党中央书记。在展望今后工作时，中央主席团宣称，将彻底结束国家生活中的一切“不正常现象”，恢复名誉的工作将加快进行，选举的民主程序将得到恢复。但它也意味深长地对一切“走极端的行为”发出了警告。

现在，当人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而二十年来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偶像和清规戒律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丢弃的时候，过去统治当局所竭力想使人遗忘的东西，现在人们却把它们记得越加清楚了，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回忆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怀念马萨里克。捷克斯洛伐克人三月七日自发地纪念了托·马萨里克诞生一百一十七周年，三月十日又纪念了他的儿子扬·马萨里克神秘之死二十周年。官方组织派的代表团以及成千上万名学生、工人和普通老百姓纷纷前往布拉格东南二十五公里拉尼镇的一个四周有砖墙的小小墓地，向马萨里克父子的坟墓表示敬意。报刊、杂志上写的文章，广播、电视的节目都宣传托·马萨里克的生平事迹，

使之家喻户晓。橱窗里和人们家里都挂起了他的照片，常常是他英武地骑在马上的那张照片；瓦茨拉夫广场的小商亭里突然卖起马萨里克的纪念章和明信片，这种纪念章和杜布切克纪念章一起，一卖就是几千枚，它们在"欧罗巴"旅馆门前交换纪念章的繁忙集市上也极受人们欢迎。

马萨里克神话的复活对捷克斯洛伐克有双重的效果，既是感情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人们希望这个国家现在能够变成"第三共和国"*，而马萨里克就是值得大家效法的一个伟大榜样。不过，如果对这位老总统的纪念令人向往他当政时代的民主自由的话，那么对他的儿子的死的纪念就突出了人们久已存在的怀疑：小马萨里克是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或者是它下令杀害的。这种怀疑的重新提出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了日益高涨的反苏情绪。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仍然是全国人民注意的中心。作为行动纲领最后公布前中央主席团同全国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协商的一部分，杜布切克三月十七日在布尔诺党的干部大会上讲了话。他进一步解释了捷共的新纲领——包括司法独立问题——同时也提出警告，让

* 马萨里克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称为"第一共和国"，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叫"第二共和国"。本书作者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恢复"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译注

大家注意。他重申：在他的领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忠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呼吁报刊编辑和广播工作者们不要把国家的重大问题过分“急躁”地提出来。他说，审慎稳重是必要的，以便“整个我们的社会确实能够掌握所提出的问题”。党希望报刊杂志能够“有助于加强新政策的基本方向”，促使“广大阶层的人民对党的政策采取积极的态度”。他表扬报刊、电台等宣传工具在这次新的政治运动中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说，“很久以来我国公民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过国家大事”。但是他也指出，报刊有时也表现得“不够慎重”。杜布切克在这里是想告诉新闻工作者们，他担心他们会做过头，让苏联抓住把柄，进行干预。在这以后，进步领袖们还反复地、日益强调地提出过这种劝告。

三月十三日和二十日轮到斯姆尔科夫斯基出面向青年人讲话了，他提出了党的复兴计划的目标，同时提醒他们不要过火。他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采尔纳”大厅向几百人讲话，给他的青年听众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三月二十日再次向年青党员和其他人讲话时，六千人拥挤在只能容纳三千人的“代表大会礼堂”里听他演讲。这个头发斑白，剃平头，面带笑容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很快就博得了群众的爱戴，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成了革命每日不可少的代言人。

他对青年说：“你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成为更加激

进、更加革命的人。但是我们年纪大一些人却应该注意使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期不致于发生任何意味着灾难的事情。”

继斯姆尔科夫斯基之后走上讲坛的是玛·什维尔莫娃。她原来是捷共政治局委员，五十年代大清洗开始时被捕，现即将被恢复名誉。她向听讲的群众叙述了过去黑暗的日子，她说：“人们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下，在精神压力下，要求给所有被说成是罪犯的人判刑，判处死刑；在那个时候我坐牢倒还痛快些”。

在“代表大会礼堂”里开的这次会进行了六个钟头，最后通过一项决议送交国民议会，要求诺沃提尼下台，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实行出国旅行自由，实行更有效的经济改革，而最重要的，是对一切事情都要“说真话”。这个决议也强调，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复辟资本主义；决议要求“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与苏联”建立“平等关系”。

在这段时期中，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也在清理内部，恢复活力。捷克斯洛伐克记者协会中央委员会三月二十一日通过决议召开非常代表大会，以便选举一个新的总书记来接替已辞职的阿·赫拉德茨基。在同一个星期中，《红色权利报》也采取了一项非常措施，宣布今后它将“独立地”为制定捷共的政策作出贡献。《布拉格晚报》、《青年阵线报》和南捷克州的《南捷克真理报》都任命了新的编辑。

国民议会主席团在三月二十日举行会议，就总统问题讨论“国内政治形势”。议会下属的好几个委员会要求召开一次国民议会特别会议，考虑对诺沃提尼投不信任票的动议。国民议会副主席、主席团成员、亲诺沃提尼的斯洛伐克人胡迪克提出了辞呈。

危机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杜布切克和党中央主席团三月二十八日召集了中央全会。同时新领导也采取了安全措施。因为得到情报说，苏联军队在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东部边界，即苏联与斯洛伐克接壤的地区调动，(捷)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即发出命令在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期间停止一切军事演习。杜布切克集团还记得诺沃提尼、谢伊纳、马穆拉曾经企图利用十二月的军事演习来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政变的事，因而他们不得不多加防范，以免有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已处在坦克的包围之中。

三月二十一日天主教会也对捷共施加了压力。布拉格教区的弗·托马谢克主教递交给杜布切克一份由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教、僧侣、修士、修女以及二万二千三百十七名天主教徒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使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杜布切克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在递交请愿书之前几小时，亲共的“天主教和平运动委员会”主席团撤销了它的主席约·普洛伊哈的职务。普洛伊哈博士是天主教人民党党员、卫生部长。接替他担任和平委员会主席的是托马谢克主教，不过这个组织几个月之后也

就不复存在了。

三月二十二日诺沃提尼终于顶不住了，他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他的辞职书写道：

尊敬的同志们，议員们：

我谨通知你们，我已决定辞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我这一决定是根据国内当前形势，經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其目的是希望这一步驟能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壮大成长。

请诸位议員相信，在我当总統期间，我始終是努力按照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根据我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我们祖国的利益而工作的。

作为共和国总統，我为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巩固我国的安全进行了努力。

我担任总統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提名，經你们，诸位议員同志们通过的。

我已将我辞去总統职务的决定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主席团。

对你们给予我的协助谨致谢意。

敬祝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很多新的成就，以造福我国人民，促进和平进步事业。

你们的同志

安·诺沃提尼

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主席团投票通过接受诺沃提尼辞职。按照宪法规定，在新总统选出以前，由政府代行总统职权。列纳尔特总理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代总统。

一个时代结束了。安·诺沃提尼离开了他呆了近十二年之久的总统府，他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夺权之后的第三位"工人总统"。从此以后，大概是根据他的敌人和过去的朋友之间的默契，诺沃提尼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头一号无人理睬的人（以后几个月发生的少数几次小的政治事件是例外）。

三月二十三日杜布切克和他的四位同僚被叫到德累斯顿开华沙条约国领导人会议。塔斯社发布的关于这次突如其来的会议的正式公报强调说，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听取布拉格代表汇报"实现旨在贯彻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路线的捷共一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的情况"。

这当然是一种含混的说法，目的是想制造一种错误印象，仿佛撤销诺沃提尼党内领导职务、选出杜布切克当领导的一月中央全会是"贯彻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路线"。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卡达尔、乌布利希和日夫科夫对他们上个月访问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发展大为震惊。现在他们逼杜布切克说明，他用他的行动纲领究竟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在这个自封的共产主义宗教法庭上，杜布切克的

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和他同去的人中只有切尔尼克可能会支持他的进步观点，其余三人显然是属于保守阵营的：代总统兼总理列纳尔特、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尔德和斯洛伐克党魁比拉克。列纳尔特和科尔德在一月份曾投票赞成诺沃提尼下台，可是现在他们断然反对杜布切克的政策。

德累斯顿会议是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派和华沙条约死硬派之间第一次大对抗，不过，塔斯社的公报把裂痕掩盖了起来，它平淡地宣称："与会者表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保证该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返回布拉格之后，在别人急切地追问会议情况时，杜布切克承认，确实有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遇到危险表示担心。但他说，他已经使兄弟党的领导人相信，从共产主义事业的角度看，捷国内形势很好。为了尽量减弱杜布切克是被叫去受训斥的印象，官方声明中还提到会议讨论了经互会范围内经济合作的问题。

当时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华沙条约同伙们关心的还不只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一九六八年初东欧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危险的动荡状态。就在诺沃提尼下台前后，华沙的反苏情绪突然高涨起来；在哥穆尔卡前往德累斯顿之前一星期，波兰首都爆发了一九五六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罗马尼亚人二月份公然退出了布达佩斯的共产党代表会议，这一次又拒绝参加德累斯顿会议，

使局势更加紧张。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人们一定会感到，一九五六年的精神又复活了。

波兰的动乱是从知识分子和文艺问题上开始的，这倒并不令人惊奇。事件是围绕波兰十九世纪大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发生的。密茨凯维支不仅是一位诗人，他也是随着一七九五年波兰被瓜分，俄国占领该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之后兴起的波兰独立运动的一位激烈的发言人。他是波兰东部立陶宛省维尔诺人，参加了秘密的反俄社团，著名的爱学社，其成员主要是诗人和作家。一八三六年，密茨凯维支是波兰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之一。他流亡国外，侨居巴黎时，担任了要求波兰人独立、平等的杂志《人民论坛》的编辑。不过，他首先还是一个诗人和剧作家。他是另一个流亡国外的天才波兰爱国者——肖邦的同时代的人，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所有作品，从叙事诗《塔德乌什先生》到公开反俄的诗剧《先人祭》，都反复表现了他对波兰和波兰事物的深情。当时统治波兰的沙俄官吏对密茨凯维支的作品的审查，与一个世纪以后他们的苏维埃继承者对苏联和东欧文艺作品的审查如出一辙。不过，有一个比较宽容的俄国总督在一八九七年同意在华沙市中心建一座密茨凯维支的像。在塑像揭幕的时候不许发表任何演说，可是，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伫立在这个身材修长的青年人的塑像周围，思绪万千，泣不成声！

在一九四六年波兰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密茨凯

维支仍然是一个为人们广泛阅读和研究的古典作家。一九六八年一月，华沙民族剧院决定上演《先人祭》。在一九六八年的形势下，这个决定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剧本的演出者大概是记起了密茨凯维支的这句名言："根据你的目标来估量你的力量，而不要根据你的力量来估量你的目标。"

在剧本上演的那些夜晚，华沙的观众们听到剧中的诗句"但我深知莫斯科鬼子的恩赐是什么货色：坏蛋们只是摘下了我的脚镣手铐，我的灵魂却会被他们钉得更牢"，"莫斯科给我们派来的全都是些公驴、白痴和特务"时，禁不住热烈欢呼。不到一个星期，《先人祭》竟然变成了一种反苏大示威。不久之后，哥穆尔卡亲自下令禁演。

《先人祭》的禁演构成了波兰镇压知识分子和犹太人的更大规模的运动的一部分。早在一九六六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瓦科夫斯基就被开除出党，原因是他在华沙学生集会上说，现在波兰还缺乏自由，所以纪念波兰十月事件十周年没有意思。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以后，哥穆尔卡政权不仅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在国内也发动了一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运动。按照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做法，犹太人失去了职业，住房也被没收了。虽然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使波兰的犹太人已由一九三九年的三百万急剧减少为一九六八年的三十多万，但官方推行的反犹太主义的狂热劲头却不亚于战

前。这种做法促使产生了许多尖刻挖苦的笑话。一个故事说：波兰空军指挥官下令禁止空军军官不要在食堂再举行庆祝会，这些波兰军官听到以色列的海市蜃楼式飞机和神秘式飞机打败了苏制的米格式飞机的消息之后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从波兰人反苏的角度说——“我们刚刚发现，以色列人原来是犹太人。”另一个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的故事说：一个华沙的犹太人在部里的职务丢掉了，上大学的女儿被开除了，他们家住的房子也被没收了，可是，他告诉他的朋友，他现在日子过得很好，他说：“你要知道我的开心事，这就是告发那些在纳粹占领时期让我藏在他们家里的波兰族人”。

到了三月份形势发展到了危机的状态。波兰作家协会对禁演《先人祭》提出抗议。科瓦科夫斯基不再保持沉默，他宣称：现政权正在毁灭波兰的文化。几千名波兰大学生占领了华沙大学校舍，当局派民兵和武装工人去驱赶学生。在持续几天的战斗中有好几十人受伤。后来得知，学生领袖中包括几个高级党政领导人的子女。

紧接着波兰党的领导谴责学生骚乱是受“犹太复国主义”特务的煽动。十二年前曾经以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共产党领袖的姿态启发过波兰人思想的哥穆尔卡，在三月十九日的广播和电视讲话中说：“华沙和其他城市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中的大部分是受了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欺骗和蒙蔽。”对他来说，这些主张温和的改革的人是同要求与苏联决裂的“激进派”同样危险的。

显然，今天的哥穆尔卡是不会容许在波兰进行一场“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试验的。发表了这次广播讲话之后四天，他就到德累斯顿参加华沙条约的宗教法庭对杜布切克的审讯去了。消息灵通的共产党人士称，哥穆尔卡和东德的乌布利希在这一次会议中已开始敦促勃列日涅夫考虑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不过，有理由可以相信，勃列日涅夫及其元帅们在此以前已经想到这种可能性了。

参加德累斯顿会议的华沙条约国领导人中没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四个星期以前，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预备会上，当叙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攻击罗马尼亚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时，由罗共中央主席团常委帕·尼库列斯库一米齐尔为首的罗共代表团就退出了会议。但齐奥塞斯库却参加了三月五日到八日在索非亚举行的华沙条约国最高领导人会议。不过，他在这个会议上对共产党团结所作的“贡献”是再一次拒绝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他举出的理由是：罗马尼亚不愿意在未来的意外事件中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样，罗马尼亚就成了华沙条约中唯一的反对这个条约的国家。持同样态度的当然还有法国和中国，这两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

虽然德累斯顿会议公报没有直接抨击布拉格，东德的宣传机器却在四天之后（三月二十七日），在捷共中央极为重要的会议召开前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发

动了攻击。德累斯顿公报称，会议“在真诚的友谊、平等、互相信任、互相支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与这一经过粉饰的公报相反，东德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库·哈格教授在东柏林哲学家代表大会上讲话说：“西德宣传中心在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运动中引述……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它们卖力地引用捷林业部长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它们非常详细地报道捷新闻记者和作家对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作用的攻击。它们对这些讲话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出现的这类现象公开表示同情。……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的这种行径使西德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可能在动乱中覆灭”。

哈格的讲话传到布拉格之后，捷外长戴维（他本人倒是一个正统的强硬派）立即召见东德驻捷大使彼·弗洛林，对他提出正式抗议。捷驻东柏林大使同时也当面向东德外长奥·文策尔和党中央书记埃·昂纳克提出抗议。东德在三月中禁止布拉格出版的德语日报——这是为捷境内日尔曼族少数民族出版的报纸，但通常在东柏林都可买到——在东德流传，以免放毒。东德和波兰都开始对布拉格电台的节目进行干扰。

莫斯科《真理报》开始了一种新的方针，即通过对西方报刊的批判来间接地、但明显地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三月二十八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西方报刊“利用‘苏联干涉’的陈词滥调来歪曲苏捷两党之间

的关系”。但是，《真理报》的文章宣称，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因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过去和现在一贯是建立在党的友谊、平等、信任、互相支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新方针不管是对谁有利，反正它也没有能持续多久。实际上，此后几天之中发生的事件使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形势都改观了。

三月二十八日，关系重大的、人们盼望已久的捷共中央全会在布拉格总统府的西班牙大厅开幕了，主持会议的是亚·杜布切克。他掌权已将近三个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已经发生了真正革命性的变化。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们显然并没有被德累斯顿的审讯所吓倒，现在他们已准备好了，要提出自己的革命纲领，并且要委任自己的人来执行这个纲领。

但是中央全会的第一项议程是提名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全会表决同意诺沃提尼辞职，然后暂时休会，让主席团和国民议会协商决定新总统人选。不少人，尤其是年青人支持曾任教育部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现任党中央负责教育和科学的书记切·齐萨日为总统候选人。可是，杜布切克和他的谋士们似乎感到，齐萨日一方面缺乏足够的资历和声望，另一方面又显得与党内极端进步的一派太接近了。在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指出，如果选齐萨日当总统，将使苏联太明显地感到

是一种挑衅。

另一个选择是七十二岁的卢·斯沃博达将军。他一九四五年任国防部长，然后任副总理，最后由于一系列的错误于五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监禁。这位白发蓝眼、面容慈祥的老将军是第一批恢复名誉的，并且在一九六五年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恢复名誉以后，他就一心撰写军事历史。这样的人是担任一个挂名总统的最理想的人选，既能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喜欢，也会叫莫斯科满意。于是，杜布切克向中央主席团提议斯沃博达为总统候选人，这个提议马上为大家接受，连诺沃提尼（当时他还是主席团成员）也投了赞成票。三月三十日国民议会根据党中央的提名进行表决，斯沃博达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在二百八十八票中获得了二百八十三票。捷语中“斯沃博达”这个词的意思是“自由”，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这位新总统不过是挂名的，可是他的当选却被人认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吉兆。布拉格的市民们同时还注意到另一个吉兆：军人和警察都不再戴红星帽徽了。究竟是谁下的命令，似乎没有人知道，但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标志，反映时代正在起变化。

中央全会在四月一日（星期一）复会。会上的主要发言人是杜布切克。他概括地论述了《行动纲领》的思想，共产党的新作用以及自从一月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逐渐形成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

在他以缓慢低沉的声调向中央全会做报告的时候，

杜布切克承认，当新领导在一月份“为新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并开始领导起来的时候，它还不可能对将来形势的发展制订出详细的计划”。但他争辩说，这种自发的过程比过去的工作方法优越，过去是一切都由党事先安排好的。不过，杜布切克非常清楚，本国的老派共产党员中以及华沙条约的盟国中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发展是否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点是颇有疑虑的。针对这种情况，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说：“事情的发展使许多人感到十分吃惊，他们担心党会屈服于压力，会放弃自己的阵地，会在局势的发展中随波逐流，担心党是否有力量对付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态度和有害要求”。

确实，很少有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如果不是根本没有的话）能够容忍当时正在开始的那些政治活动。在杜布切克做报告的前一天，即三月三十一日，三千名原政治犯在布拉格集会，成立了一个团体叫“K—231俱乐部”（231是《保护共和国法》的编号，过去就是根据这项法律将他们监禁的）。这个团体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分部，公开宣称它的目的是为恐怖统治下的受害者恢复名誉，伸张正义，赔偿他们的损失。但在这个K—231俱乐部的发起人中，有些人不可避免地想到要把这个俱乐部变成一个政治组织。照共产党的法律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政党（捷共以及受它控制的社会党、人民党）以及工会和青年等组织都应该是无所不包的民族阵线的

成员或者是共产党本身的一个机构。可是K—231俱乐部在目前阶段却无意参加民族阵线。它要求内务部允予登记，而在要求还没有获得批准之前，它就自行展开了活动。我记得曾经和这个俱乐部的一个领导人讨论过它的发展前途。这是一位早已退休了的将军，一九四九年企图逃离捷克斯洛伐克未遂，被监禁了十二年。他对我说，目前K—231俱乐部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政治组织，但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不过，政治的潮流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那就很难预料了。"

在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中有一批哲学家和作家正在计划尽快建立一个组织，他们打算称它为"非党人士政治俱乐部"。哲学家伊·斯维塔克就是他们的领袖之一。当建立这个俱乐部的思想逐渐成熟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政党，这个政党有朝一日可能会在公开选举中和捷共进行较量。

这些动向杜布切克都是知道的。他向中央委员会做报告说，存在着"许多种互不相同、互相对立的利益和态度，各自代表各种社会集团一定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他警告说，不能让"某些非社会主义的风尚"的复活和进行"报复"的叫嚣在"民主和恢复名誉的招牌下"变成合法。杜布切克和他的朋友们的基本思想——这是在布拉格之春令人兴奋陶醉的日子里应该铭记在心的主要之点——是：经过改革、恢复了活力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战胜其他一切兴起的思想派别。他说：

“我们不要害怕这种浪潮，让我们向这种浪潮学习。对我们党的信任和党内的自信心正在增强。”

在阐发这些新思想时，杜布切克已经自觉地走上了同勃列日涅夫相冲突的道路。在德累斯顿会议之后四天，在斯沃博达当选总统的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员的集会上发表了一个明确无误地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有关意识形态的讲话。他强调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直接影响”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他根本不提在捷共复兴中起了很大作用的“自下而上”的意见的重要性。当布拉格给予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却主张进一步加紧控制。他说：“在我们的时代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战线。”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里，“民族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可是，杜布切克对历史和对未来的看法却与勃列日涅夫的观点截然不同。对杜布切克来说，一九六八年和斯大林主义的冷战年代不同了，它要求实现“非对抗性关系的时代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他说，这就“需要创造、形成和发展一种适应新形势的政治制度”。必须有一个根据六十年代后半叶的世界形势制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纲领。“由于我们的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由于我们党的历史功绩，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我们认为，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权利宣告：共产党仍然是

我国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有组织的进步力量”。

杜布切克接着解释说，共产党必须对社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可是，它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只有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必须重新树立（党的）威信。……任何人的威信都不是一经享有就永远存在的”。

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杜布切克从一个机关干部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意识形态专家。他现在进一步坚决主张：根据这种新体制，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发展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一切“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享有独立地位的基础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和国民议会各自发挥其独立作用。这确实是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妥协：杜布切克一方面强调说，他并不主张恢复一九四八年以前的正式的议会制，但同时他又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山鹰社”——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这当然是行动纲领思想的关键之所在。这个纲领的主要之点是：共产党指导下的自由思想，实行真正的经济改革，为恐怖统治下的受害者恢复名誉。杜布切克要求中央委员会撤销将伊·克利马、卢·瓦楚利克和安·利姆开除出党的九月决议，并且停止执行对米·孔德拉和帕·科霍乌特的纪律处分。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出于巧合，捷克北部拉贝河畔乌斯季的州法院也在同一天宣布撤消一九五四年经最高法院批准的将十一名社

会民主党人按“进行危害国家的活动”的罪名分别判处八至二十年徒刑的判决。）

四月二日至四日中央全会最后解决了党的旧领导机构，产生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书记处、政府和国民议会的领导机构。可是，尽管杜布切克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他并没有能组成一个清一色的思想进步的领导机构，而是不得不同坚持旧观点的人妥协，这一事实反映了党内日益加深的分裂。杜布切克的力量不够，还不能使自己的意图在全党得到贯彻，这是使他始终苦恼的问题。

在党内，诺沃提尼、亨德利赫、拉什托维奇卡、杜兰斯基、西穆涅克、胡迪克和列纳尔特辞去了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帕斯蒂日克丢了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亨德利赫的党中央书记和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撤掉了。四月二日他在卸任前的讲话中说：“为了照顾党的团结，我企图将两种不可调和的极端调和起来……这是我的最大错误。”同一天，亲苏的党中央书记、中央法制委员会主席、意识形态委员会委员考茨基也下台了。布拉格的党魁马·瓦楚利克丢了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职务。党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帕·赫隆也撤了职。

诺沃提尼最后一个官职——民族阵线主席这一次也被撤掉了。他还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可是他的讲话多次被嘲弄性的笑声所打断。不过，他还是

乘机对新潮流提出了警告，他说："国内的消极力量正在被鼓动起来"。针对人们对他的保守派日益激烈的攻击，他说："说到恢复名誉，现在似乎是什么都要改正，为此而掀起的运动不可能起别的作用，只能损害我们的党"。最后他很尖刻地说："现在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我们千万不要给弄糊涂了。"

在清除旧领导人的过程中，拉什托维奇卡辞去了国民议会主席的职务，胡迪克也辞去了国民议会副主席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的职务。

可是事实证明，新的中央主席团是进步派所远远不能满意的，而中央书记处中有战略意义的职务却被保守派所占据，这些人对贯彻杜布切克的政策毫无用处，相反，他们倒是抓紧一切机会来阻挠破坏。在十一人组成的主席团中，杜布切克能够依靠的只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也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年青的布尔诺人什帕切克、弗·克里格尔（他是心脏病专家，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老战士，在当选为党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同时还当选为民族阵线主席）和奥·切尔尼克。可以明确看出的保守派是瓦·比拉克（斯共第一书记，一向是自由派的对头）、德·科尔德、奥·什维斯特卡（非常亲苏的《红色权利报》编辑）、扬·皮列尔和埃·里戈。还有一个中央主席团委员是弗·巴尔比雷克，新当选的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他倾向于保守中立。所以主席团里两派正是平分秋色。主席团三名候补委员是：马·瓦楚利克和切卡

德机械厂的头头安·卡佩克（这两个人都是坚定的保守派），还有日益转向正统派的列纳尔特。

科尔德、列纳尔特和诺沃提尼当政时的交通部长阿·英德拉属于保守派；齐萨日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派；斯洛伐克的斯·萨多夫斯基是同情进步的中间派；这样，中央书记处里的进步派有杜布切克、齐萨日、兹·姆林纳日和瓦·斯拉维克四人，保守派有英德拉、科尔德和列纳尔特三人。“中间派”有萨多夫斯基和奥·沃列尼克二人。米·雅克什，一个公开的保守派，被任命主管关键性的机构——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不过，主管党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是进步派什帕切克。

杜布切克在开始执行他的行动纲领时，他拥有的就是这样一个进步派和保守派混杂在一起的阵容。

行动纲领是中央全会经过大会发言讨论之后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通过的。这个长达六十三页的文件宣称，它的基本论点是承认有一条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坚持的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观点，声称：“党坚决谴责想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互相对立的企图……党将努力消除可能使各阶级和阶层间关系紧张的一切因素”。

在分析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前的经济形势的部分，行动纲领猛烈抨击了过去捷共喜爱的所谓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认为这种“虚伪的平均主义”是集约化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平均主义“是有

害的，因为它袒护懒汉和责任心不强的工人而损害勤劳和舍己为公的人，袒护非熟练工人而损害熟练工人，袒护技术和业务上落后的人而损害有才能的、积极主动工作的人”。

行动纲领与以往的做法大不相同，它明文取消了不许非党员担任工业、文教及其他部门高级领导职务的规定。它强调的是建立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而不是由共产党牢牢控制的）紧密团结、富有创造性的社会。它号召为过去的受害者充分恢复名誉，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邦共和国，制订新宪法来代替一九六〇年通过的按照苏联的模式写的宪法。关于观点自由和文化自由的问题，行动纲领是这样写的："文艺的社会影响是不能没有政治意义的。我们将注意使宪法保证的观点自由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共产党必须鼓励和引导文艺作品，努力使文艺作品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能够有效地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这是共产党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外交政策部分，行动纲领适当地提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表示要坚决与其他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它拒绝把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隔绝。它宣称："在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我们将积极地推行和平共处政策。我国的地理位置和作为一个工业国的需要与可能都要求我们执行一条更加积极的欧洲政策，其目的是发展互利关系，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

为了表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的心情和希望，行动纲领最后说：

>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形势。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运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而要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我们的国家对国际共运是负有责任的，它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主传统。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些条件，任何人也不会原谅我们。

四月六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斯沃博达总统提出辞职。总统立即要求新当选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组织新内阁。

两天以后（四月八日）切尔尼克组成了新政府，这个政府将与捷共新领导一起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新路奋勇前进。可是，正如党的领导机构一样，切尔尼克内阁也是一个古怪的混合体，其中既有支持行动纲领及其方针政策的人，也有反对行动纲领及其方针政策的人。

在五位副总理中，代表斯洛伐克的是古·胡萨克和一个知识分子——彼·佐洛特卡教授。这两个人都被人看作坚定的进步派。胡萨克的直接任务是起草新选举

法、起草新宪法和筹备实现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的联邦化。另一个自由派的副总理是奥·希克。第四位副总理弗·哈莫乌兹是一个缺乏特色的人物，他的任务是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经互会。第五位副总理是诺沃提尼当政时的内务部长卢·斯特劳加尔，这倒是令人惊讶的。有了他，亲苏的保守派在政府中就有了一个立足点。这样，在布拉格之春的政府诞生的时候就在自己的成员中包括了将来毁灭它的人，这真是一件怪事。仅仅六个月之后，切尔尼克、胡萨克（他在四月份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和斯特劳加尔就按照莫斯科的旨意形成了摧毁布拉格之春的三套马车；而在十八个月之后，连切尔尼克也滚落尘埃，只有胡萨克和斯特劳加尔两个人分享大权了。

二十三位政府成员的情况也是稀奇古怪的，自由派的代表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第一次大清洗的受害者、内务部长约·帕维尔、诺沃提尼统治的最后阶段站出来保护知识分子的外交部长伊·哈耶克、曾任驻伦敦大使的文化部长米·加卢什卡、教育部长弗·卡德列茨、司法部长博·库切拉和消费工业部长博·马哈乔娃。可是，政府中也有象对内贸易部长奥·帕夫洛夫斯基这样的人，他如此的亲苏，以至于他的下属都拒绝为他工作；对外贸易部长瓦·瓦列什也是强烈倾向保守派的人；化工部长斯·拉兹尔后来也投向了亲苏派一边；采矿部长弗·彭茨是一个没有特色的保守派，而国防部

长马·楚尔中将他在苏军入侵前和入侵后所起的作用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楚尔是斯洛伐克人，（第二次大战时）在德国部队中当兵，在苏联开了小差，参加了与苏军并肩作战的捷克斯洛伐克兵团。他入了党，在捷军中被迅速提升，最后在苏军总参谋部军校学习之后，于一九六二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从外表来看，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政权象似一座冰山。出头露面推行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英雄和支持者是杜布切克、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在低一层的还有奥·希克、什帕切克、帕维尔、哈耶克和加卢什卡；还有从卢·瓦楚利克到戈尔德斯图克、利姆这样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但是藏在水底下的却是改革反对者——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斯特劳加尔、列纳尔特，还有胡萨克和楚尔这样的神秘人物。

XVI

布拉格之春

从一开始，新的领导机构就象一个不和睦的家庭。杜布切克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起一个仲裁者和调和人的作用，一方面维持进步精神的活跃发展，同时又不致不适当地同保守派和莫斯科对立。

这是一种危险的走钢丝表演，在这种局势发展的关键时刻，杜布切克究竟是象他在中央全会上讲的那样真正在领导着这场革命，还是被革命的浪潮推着向前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实际上，这两种评价可能都是准确的。有些政策、方针，例如经济改革和党的复兴，杜布切克是希望以审慎的速度加以贯彻的，可是在另一些领域，例如对一切马列主义教条日益增多的疑问和越来越多的言论自由，他却主张以小心为上。不过，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太快了，不允许他的思想固定不变。

甚至在经济改革的领域中，杜布切克也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压力。四月十二日成立的旨在规划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委员会，却让一个不大懂经济的保守派斯特劳加

尔当了主席。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奥·希克连副主席都不是，只是一名普通委员。在中央主席团中抓经济的是科尔德，这是一个非常保守、同莫斯科关系密切的人，尽管他过去也主张实行经济改革，并且反对过诺沃提尼。这样，经济改革从一开始起就受到阻碍。希克要迅速推行工业管理的分权，建立互相竞争的市场经济，鼓励家庭经营的有控制的私人企业，但在斯特劳加尔和科尔德的阻挠下，他的愿望没有能实现。

杜布切克和他的进步派朋友们很快就认识到，三月底四月初的中央全会甚至连政治问题都没有能开始解决。一百一十名中央委员中，至少有四十人是坚定的保守派，还至少有三十人是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想改革。中央委员会中保守派的花名册中包括诺沃提尼（他中央委员的位置还保留）、比拉克、巴尔比雷克、前外长戴维、杜兰斯基、不倒翁兹·费林格、亨德利赫、霍夫曼、胡迪克、英德拉、卡佩克、科尔德、考茨基、库德尔纳、拉什托维奇卡、列纳尔特、洛姆斯基、威·诺维（他坐了许多年监牢之后又返回到保守派一边）、帕斯蒂日克、国内贸易部长帕夫洛夫斯基、扬·佩尔纳日、中央主席团委员皮列尔和里戈、西穆涅克、什维斯特卡、副总理斯特劳加尔和马·瓦楚利克。进步派领袖们认识到，如果真要贯彻执行行动纲领，就必须把上面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逐出中央委员会。诺沃提尼名声已经太臭了，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以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霍夫

曼、考茨基、斯特劳加尔、卡佩克、皮列尔和里戈为核心形成了正统派新的指挥部。这些人在四月中旬就准备进行反击，联合国内的同盟者，并同苏联驻捷大使馆和契尔沃年科阴谋勾结。进步派挫败他们的计划包含两个方面：在五月末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至少将最碍事的十二个党中央委员撵出去，然后，在夏末举行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一个完全新的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们估计在准备党代会的过程中全国会选出进步派党员作党代表。

对立双方的所有战略计划都是在四月里制定的。从进步派方面说，最有力的一击在四月二日就打出去了，这是伊·斯维塔克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说，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表明，扬·马萨里克是被杀害而死的，他要求立即调查核实。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第二天（四月三日）最高检察院就委派调查科长伊·科特拉尔博士重新调查这一案件。从一开始这个问题的含义就是很清楚的：如果杨·马萨里克确实是被害而死，那么苏联必然与此案有牵连。四月十六日《红色权利报》又提出，“贝利亚卫队”在这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使扬·马萨里克是被害的说法更增加了可信的成份。《红色权利报》以明显的挖苦口吻请求“我们的苏联朋友”在弄清马萨里克神秘之死的情况方面提供协助。

苏联插手杀害马萨里克案件的问题一公开，捷克斯

洛伐克报刊就全力投入了揭露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统治和苏、捷两国保安机关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国防部的机关报《人民防御报》在四月中旬发表了新任军事检察长米·里赫特中校的文章，其中写道："应该坦率地说，最大的罪恶昭彰的破坏法制的行为并非我国的产物，而是贝利亚的'长臂'直接造成的"。里赫特中校说："苏共二十大以后，原任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苏联)总顾问的马卡罗夫将军和利哈乔夫将军都在莫斯科被判处死刑"。这两个人确实是苏联秘密警察派驻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级联络官，他们在布达佩斯搞完拉伊克案件之后，又到这里来准备斯兰斯基案件。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防部长是哥特瓦尔德的女婿切皮奇卡。既然当时在布拉格谴责苏联应对大清洗负责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的事情，卡·巴契列克——此人一九五二年曾任公安部长——也发表声明说，马卡罗夫和利哈乔夫是斯大林硬要派来的，当时哥特瓦尔德并不愿接受；他还叙述了亚·米高扬到布拉格来安排斯兰斯基审判案的情况。巴契列克这么做显然是想为自己辩护，不过这已经为时太晚了。

揭露大清洗罪行的洪流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自杀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副院长约·布雷什建斯基博士四月二日在布拉格以南的巴比采村的树林中吊死了。此人从三月二十八日起就已经失踪，官方断定他的死是自杀。布雷什建斯基的任务是复查大清洗时期的案件，而据云他本人就参与过这些案件的准备工作。一九五一

至一九五二年当过鲁津监狱医官的约·索麦尔博士四月二十六日在他的布拉格寓所自杀。索麦尔伤害过的人当中就有新上任的内务部长帕维尔将军。四月二十七日布拉格公安处侦查科长伊·波切皮茨基中校在玛丽亚矿泉疗养地附近的树林中开枪自杀。与此同时，军事检察院宣布，与流产了的诺沃提尼的政变阴谋有牵连的前国防部副部长扬科将军三月份的自杀是出于政治原因。调查此案的人宽厚地声称，扬科当时害怕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潮流“向右走得太远”，以致使他无法与之相适应。

捷共的行动纲领和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莫斯科日益加深的关注。苏联报刊整整一个星期对捷共中央全会和行动纲领保持沉默，可是，苏共中央在四月九、十两日开会，听取勃列日涅夫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报告，其中特别谈到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他报告的题目是《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据报道，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详细论述了布拉格发生的事件，虽然他的报告文本从未公布过。官方发表的会议公报特别强调了“德累斯顿会议的重大意义”。

会议公报称，苏共中央全会“再一次表示，我们党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的不断加强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莫斯科的中央全会成了当代共运历史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因为这个公报等于是后来被人称为“勃列日涅夫主

义”的前奏，宣告苏联在它感到社会主义受到威胁的时候，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有权进行武装干涉。会议公报在表面上谈苏联问题的时候还说：苏共中央决定“对敌对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央全会认为“加强我们党的各项思想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四月十二日苏联《真理报》终于开始报道四月五日的捷共中央全会了，它围绕着那些最激烈的保守派对“过火行为”和对共产主义事业将遭到危害表示担忧的发言作了报道。《真理报》硬把一个根本不知名的中央候补委员博·赫努佩克当成布拉格中央全会的最主要的发言人来报道，此人在发言中谴责了“右派的过火行为”，并且威胁说，工人将走上街头来保卫正统的共产主义。换句话说，苏联读者从这种报道中得到的印象是：布拉格的会议胜利地保卫了共产主义的正统。在关于捷共行动纲领的报道中突出强调了纲领中的某些章节，结果使捷共几乎变得和苏共一模一样了。可是，同一天的《真理报》上又用两版篇幅发表了一篇长文，论述保卫思想的纯洁性和警惕“修正主义”的危险。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哪怕是最迟钝的读者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对布拉格的改革派进行攻击的当然不止《真理报》和赫努佩克同志。在行动纲领通过之后不久，瓦·比拉克就对新近获得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报刊、广播和电视训话了：

"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应该认识到，广播和电视是国家政策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和政策的工具。因此，它们不能为任何别的东西服务，只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服务。

我认为报刊、广播、电视没有能正确地反映许多中央文件和杜布切克同志的讲话中的全部丰富的思想和建议，这是它们工作中的一个缺点。……每一个命题都应该加以透彻的阐发，以便统一人民的思想，引导他们进行积极的工作。

当然，收集耸人听闻的报道，照抄资产阶级报刊上的文章，发表各种片面性的声明，这是很轻松的事，可是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按这种方式工作的人可能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抹杀党的先进作用，正在使许多正直的人蒙受冤屈。"

可是，苏联人的和捷克斯洛伐克本国人的诅咒看来都没有对日益高涨的布拉格革命发生任何影响。原来的反诺沃提尼同盟早已在关于行动纲领的辩论过程中和领导机关的人事变动中消失了，现在斗争正在两大营垒之间进行。杜布切克及其战友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中央全会上通过了行动纲领；但反对行动纲领的势力正在加强。在另一方面，进步派也正在巩固自己的阵地。四月九日，斯沃博达总统任命米·切若夫斯基为新的总检察长。四月十八日国民议会确认斯姆尔科夫斯基为议会主席。奥·博切克博士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在同

一天，捷共中央主席团指示切尔尼克总理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建立互利的双边经济合作关系"提出建议。这么做的意图明显地是想结束那种对苏联单方面有利的局面——捷克斯洛伐克向苏联提供机器和原料，而得到的却是无法使用的卢布。给切尔尼克的这种指示与下列报道是同时出现的：当时布拉格政府急需四亿美元的硬通货用以购买西方设备来更换工厂中陈旧的设备。消息说，布拉格首先要求莫斯科以硬通货偿还某些债务。这个要求碰了钉子之后，据说布拉格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捷克斯洛伐克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国）和西欧的一个财团提出了申请。发表在西方报纸上的这个报道使苏联大为恼火，致使财政部不得不在四月十七日专门发表声明加以否认。但总的说来，一有机会就表露出了捷克斯洛伐克是对哪一边抱有好感。在布拉格大学学习的一批北越学生四月二十七日在举行反战示威时烧毁了一面美国国旗。第二天马上就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学生的代表团来到美国大使馆表示道歉，并且献上一面新的美国旗。不过学生们所能弄到的唯一的一面旗子还是老式的四十八颗星的旗。他们的这种行动使美国外交官受到前所未有的感动。

四月后半月除了解决其他迫切问题之外，主要处理了恢复名誉的问题。为过去的大清洗及其以后惩处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是行动纲领的要点之一，也是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新政权的威信如何，在很

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能实现为这些受害者平反的诺言而定。四月二十五日，捷共建议“在党内并在政治上”为兹·赫兹拉尔“完全平反”，这位捷青年联盟的前主席，“根据有倾向性的、虚假的和捏造的指控”，于一九五二年被开除出党。平反以后，赫兹拉尔随即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广播电台经理。同时，新任最高法院院长博切克博士下令复审一九六二年的前内务部长巴拉克案件，巴拉克是迄今尚未获释的唯一的重要人物。新任内务部长帕维尔将军撤销了该部一九六七年八月因拉·姆尼亚奇科前往以色列而取消他捷克斯洛伐克国籍的决定。查理大学哲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为九名哲学教授恢复了名誉。在切尔宁宫（外交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张手写的布告，宣布外交部平反委员会从四月二十六日起在此室开会。布拉格市法院开始复审已故的约·库特尔瓦什尔将军、另外两名军官和两名平民一九四九年的“颠覆活动”案。

四月二十九日斯沃博达总统举行了一次象征性的仪式，将“社会主义勋章”和一级“二月二十五日勋章”归还给鲁·斯兰斯基的家属，将一级“二月二十五日勋章”归还给奥·什林的家属。这两个人在去世将近十六年之后才完全平反和恢复名誉。

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切尔尼克内阁在国民议会会议上提出了施政纲领。为了贯彻落实党的行动纲领中的思想，施政纲领提出了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

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这是向正确方向跨出的一个民主步骤。但在实际上，政府和国民议会所有的高级领导人同时也都是捷共领导人（切尔尼克总理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主席都是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因此，这种民主姿态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国民议会对此十分认真。政府还决定要重新规定内务部和司法部的职权，以保证在它们的办案活动中完全遵守法制。内务部长帕维尔是五十年代大清洗被捕人中受到最残酷刑讯折磨的人之一，这一点不是不起作用的；现在，在保卫公民的权利的斗争中他是站在最前列的。

就在这个时候，布拉格接待了两个不大受欢迎的客人。一个是华沙条约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表面上他是来与捷党政新领导人会晤，可是，他在一个月之内已经是第二次来访了，这使很多捷克人感到十分不快，尽管作为华约总司令访问该条约的一个成员国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第二个客人是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他是来签订新的保捷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四个月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他做的这件事，就不免令人感到奇怪了。他刚在国内渡过了弗拉查地区阴谋叛乱的风险，当他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场面时，他是自信和自恃的。

五月既给捷克斯洛伐克带来了希望，也给它带来了

组价鼓舞之下。他们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有了胜利，担忧的是，苏联会不会可能在这场革命开始前就把一切扼杀。尽管如此，当"五一"节在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布拉格的时候，整个布拉格是自信和欢乐的。

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里，庆祝"五一"节通常是官方仪式，党的领导人要发表华而不实的冗长演说，而布拉格的"五一"节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就和学生自由游行，与警察冲突，是一种可悲的紧张情绪笼罩在一起。可是一九六八年不同了，"五一"节变成了愿望得到实现的一天。这一天最出风头的人当然是杜布切克。他的长鼻子一笑就翘起，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不管他走到哪里，群众向他欢呼，他不时微笑，有时挥手。他还象往常一样有些腼腆，可是他接受别人送的花，给人家签名留念。可是那些苏联的领导人是要躲在保镖后面的，一个领导人不得不出来向群众讲话，在他周围筑起一道防护线。

以前庆祝"五一"节的时候，都是党组织派汽车和大轿车将共产党群众送到布拉格市中心来，向领袖们欢呼致意。这次可不一样。人们自发地来到这里，而且人数之多。童子军、穿制服的运动员和留着胡子的大学生列队游行，接受杜布切克的检阅。还有的挑着人挥动着国旗和红色旗帜，举着表情愉快的标语牌。瓦茨拉夫广场和老城广场上的气氛就象乡村集市一样，炉鼓

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男人们微笑着、欢呼着。

五一节那天斯沃博达总统在庄严的气氛中追赠弗·克列门蒂斯和约·弗兰克（原捷共副总书记，一九五二年与斯兰斯基一起被处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的称号。他还将共和国勋章授予原总统办公厅经济司司长卢·弗雷卡、原外贸部副部长鲁·马尔戈留斯、原《红色权利报》编辑安·西蒙以及原国家保卫局局长奥·扎沃茨基。在大清洗的幸存者当中，获得受人羡慕的共和国勋章的有：原副外长瓦·海杜和阿·朗登、原总统安全负责人列·霍夫曼，还有玛·什维尔莫娃。对已被处死的原党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贝·盖明德，总统追赠了劳动勋章。

可是“五一”节的欢乐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人们的担忧。现实毫不客气地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五月二日斯沃博达总统不得不任命被撤了职的捷共中央书记、追随莫斯科路线的头面人物弗·考茨基为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五月四日国防部长楚尔公开承认，报刊关于雅库鲍夫斯基元帅上周访捷时曾建议在最短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举行包括苏军在内的华沙条约各国军队的联合演习的报道是真实的。楚尔将军含混其词地解释说，演习的规模还没有完全确定，很可能只是一种“参谋演习”，而不是象一九六六年的“伏尔塔瓦”演习那样的全面军事演习。这条消息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就可以料到，华沙条约

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捷境举行演习，将对布拉格改革派领导人施加强大的压力。一个捷克朋友对我说："放他们进来之后，谁知道他们走不走？"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军事演习的威胁就象恶梦一样一直萦绕着捷克斯洛伐克，直到苏军入侵那一天。

五月三日晚上，在楚尔发表声明几小时之后，几千捷克人，有老有少，集合在老城广场举行一次事先得到许可的集会。可是，当时人们的情绪很坏，怨气冲天。会议很快就变成了反共反苏的示威。一个又一个人上台发言，诉说过去蒙冤被捕的情况，还有的人抗议波兰的反犹太主义行动，主张迅速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也有人要求给各个政党民主和自由。警察没有加以干预。不久，会场上人数逐渐减少，人们慢慢四散回家了。

可是，布拉格的市民却不知道，就在这一天的午夜，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比拉克"应苏共中央的邀请"乘飞机去莫斯科了。很明显，这次召唤是突如其来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准备在一系列问题上（包括计划中的华沙条约军事演习）同布拉格来的代表团摊牌，苏共中央在四月二十五日晚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捷代表团中有三个改革派领袖——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还有一个亲苏的保守派比拉克。经过了不足三十六小时，代表团在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以及其他官员会谈之后又飞返国内。会谈的真实结果秘而不宣；会谈

的正式公报只是简单地、带着不祥之兆的味道说，会谈是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个提法在共产党的习惯中就是“冷淡而没有达成协议”的代号。

深切的关注和不安之感笼罩着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感到有必要告诉人民一些情况，《红色权利报》发表了他的一篇谈话，其中说，在莫斯科讨论了经济问题；至于政治方面，“我们解释了我们是如何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而努力的，我们的苏联朋友们以谅解的心情听取了我们的解释。”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苏联人把杜布切克叫去训斥了一番，而杜布切克不得不为他的政策彻底进行辩护。比拉克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这一点没有人透露。杜布切克接着说，苏联人

> 表示相信，得到绝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能够顺利实现它的目标。在好朋友之间通常不会用客客气气的外交词令，而是互相平等地开诚布公地进行交谈。本着这种精神，苏联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担心我国的民主化过程会被人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必须指出，从一月中央全会以来我们党经常强调指出，它根本不同意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过火行为，而且把坚决反对这种过火行为看作自己政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杜布切克这次相当坦率的谈话只不过使布拉格人的顾虑更加深了。现在已经公开承认，苏联人对捷克斯洛

伐克感到“担心”，而布拉格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担心”很容易变成敌对行动。从一月份以来，布拉格严肃的负责的人士第一次开始谈论苏联入侵的可能性。他们这种预感的正确性可以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即入侵后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证实。在这篇文章中，克里姆林宫提供了五月四日在莫斯科同杜布切克及其同事们会谈情况的自己的一套说法：

> 在五月四日的莫斯科会谈中，捷共领导人自己谈到了该国局势的严重性。不仅如此，他们还说，他们国内政局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已经超出了纯粹内部事务的界限，影响到了苏联、波兰等兄弟国家”。这种观点我们当然同意。
>
>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还说，他们将采取必要措施来控制局势。他们当时一字不差是这么讲的：“敌人正在行动。他们想利用形势为反革命的利益服务”。
>
> 他们承认，敌人的企图首先是搞臭共产党，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们说，创建一个同捷共对立的合法政治反对派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反对派就其本质来说必然是反社会主义的，“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制止，就会发展成反革命势力”。他们说，他们知道哪些人在策划这种事，并且掌握了这些人同帝国主义联系的证据。他们明确表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

《真理报》的这套说法看起来纯属虚构，不仅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就是根据当时在布拉格的人掌握的事

实情况来看也是这样，除非文章里的“他们”指的就是比拉克一个人。要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甚至也包括切尔尼克在内，在五月里就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正受到“反革命”的威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在苏军入侵以后也没有承认这一点，甚至到一九六九年年中他们还拒不同意苏联坚持的关于“反革命”的说法。如果说比拉克在同苏联人单独会谈时讲到过上述的那些话，这倒是可能的，因为他的观点向来是这样。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莫斯科一直等到入侵以后才公布这套说法呢？这么做至多只能事后证明他们正确而已。

没有搞清楚的一点是：苏联领导人是否利用莫斯科会谈的机会逼迫杜布切克同意华沙条约军队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同意苏军常驻捷克斯洛伐克来“协助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西部边界。有些当时不在布拉格的外国评论家曾经设想，杜布切克可能作过这种许诺，但回国以后没有告诉他的同事和群众。可是，这种猜测看来很不准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军事演习问题上拚命拖延达好几个星期之久。后来的事实表明，演习是国防部长楚尔被迫最后同意举行的，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党和政府的领导。

返回布拉格之后，杜布切克发现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是和自己的思想一致的。这才使得他能在日益加强的苏联压力下暂时松一口气。隆哥这个忠实于陶里亚蒂传统的人，公开表示意共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的努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在野共产党的支持当然是很受欢迎的。

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国才两天，苏联的压力就又跟踪而来。五月七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否认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报刊关于扬·马萨里克之死可能是与“苏联保安机关的顾问”的活动有关的报道，称之为“捏造和挑衅性的报道”。第二天波兰大使沃·雅纽雷克照会捷外交部，抗议捷报刊、广播和电视关于波兰国内情况的报道。他指的是独立思考的捷新闻工作者针对波兰的反犹太主义和对参加过三月骚动的学生们进行迫害发表的大量评论。可是接收这个照会的捷克官员十分庄严地答复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刊是自由的，它应当发表什么、不应当发表什么是不能由政府规定的。

五月八日深夜，华沙条约国的领导人纷纷前往莫斯科去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总理会谈——这一点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不知道的。杜布切克没有接到邀请，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开会的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齐奥塞斯库则没有参加会议，忠实遵守他抵制旨在谴责别国共产党的一切会议的原则。（他在四月份主持召开了一次罗共中央全会，为已被处决的司法部长巴特勒什卡努恢复了名誉，而将此冤案的罪责归到内务部长亚·德勒吉奇头上。同捷克人的做法相类似，齐奥塞斯库撤销了德勒吉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许下诺言，要为更多的人恢复名誉，要更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

五月九日是布拉格极度紧张的一天，是一月以来最紧张的一天。这是庆祝苏联坦克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布拉格的二十三周年的节日。这个古老的首都到处挂满了红旗，公共建筑物上——从捷共中央大厦到巴尔托洛姆大街的布拉格市区警察局——都挂上很长的红色条幅，以便为节日增添一些感谢苏联一九四五年解放的庄严气氛。可是捷克人的心并不在这里。四天以前，成千上万的捷克人聚集在比尔森美军战士纪念碑遗址，挥动星条旗并献上花束（纪念碑在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夺权以后被拆毁了，但人们照旧到这里来表示敬意）；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也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美国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样，五月九日布拉格的庆祝活动不过是故意搞得热闹隆重而已。科涅夫元帅和一批紧闭嘴唇的苏联将军参加了庆祝活动，可是，悲观的捷克人却说，他们来是为了管教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并为华沙条约国的军事演习铺平道路——如果说他们来不是为入侵作准备的话。

为了急于看到正式的庆祝活动，我驱车经过斯米霍夫区的（一九四五年解放布拉格的）苏联坦克纪念碑附近，前往伏契克文化公园。在那蔓生的草地上，孩子们爬到几辆老式的苏联坦克上——捷克人，甚至年青的捷克人都不会忘记是谁解放了他们；在离那儿不远的一个露天剧场里，科涅夫元帅及其随行人员面无笑容地观看一个红军歌舞团的演出。

捷克人仍然在为杜布切克突然去莫斯科的事感到不安，尽管杜布切克在《红色权利报》上保证说，苏联人“理解了我们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而作的努力”。捷克人是很世故和多疑的，在楚尔发表了关于华沙条约军事演习的声明和科涅夫元帅到布拉格之后，捷克人不相信这种解释的表面价值。与此同时，消息灵通的捷共进步人士开始悄悄地告诉几个外国记者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警告杜布切克：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试验和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之间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相似之处。据说，杜布切克表示了异议。可是，在了解情况的捷克人中，很少有人相信俄国人是这么容易给打发走的。在那天（九日）下午，我同一个捷克新闻界的朋友喝酒。他对我说：“您会看到，该死的俄国佬迟早会侵略我国”。

也就在这一天中，总统府传来了好消息：斯沃博达总统发布命令，实行范围相当大的政治大赦，受惠者将达几千人。被赦免的人中包括非法离开捷境、至今仍在国外的人；对于其他政治犯，判徒刑三年者一律释放，徒刑三年以上者酌情减刑。凡已被监禁八年以上者立即释放。

可是，大赦的喜讯刚刚广播，忧愁就又降临了。华沙条约国首脑开会的消息从莫斯科传来，人们担忧地谈论着：反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已迫在眉睫。华沙、东柏林等地的报道都说，用坦克开路的苏联部队正通过波兰

向捷边境前进。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布拉格。把莫斯科的会议和苏军调动这两件事同时发生说成是巧合，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世界各地的报刊编辑开始考虑发生战争的可能；一个驻布拉格的美国记者接到通知，要求他写一篇谈论“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变成越南”的电讯。

在接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附近的波兰领土上有苏军调动，这一点是经过核实，确定无疑的；但当时是否真的就要对捷进行武装干涉呢？人们还猜不透。西方情报部门都知道，在通常情况下，苏联在波兰只驻扎一个兵员不足额的装甲摩托化混成师，约一万二千人。这个师常驻在波兰西南部的莱格尼查附近，在捷边境重要城市纳霍德以北约六十英里，位于通往东德的主要交通线上。可是，西方国家驻波兰武官五月九日晚发出的令人精神紧张的报告中讲的部队调动情况，其兵力远远超过一个师。从其他来源紧接着又传来消息，说苏军司令部早已将原来驻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和乌日戈罗德一带的第一喀尔巴阡集团军调到波兰，现正向捷东北部边境进发。

布拉格解放二十三周年竟然是在这种气氛下庆祝的，这真是一大讽刺。那天夜里，我的几个捷军界的朋友议论说，俄国人正在搞一次亮明旗帜的示威，警告杜布切克如果他坚持贯彻他的纲领就会大难临头。我的朋友们强调，关于苏军调动的消息，是有人故意透露给西方国家驻华沙的武官的。为了使这一蓄意制造的骗局显得更加逼真，几天来禁止几位西方武官——首先法国武

宫——接近波捷边界。不管这些情况是真是假，世界各国政府那天夜里都十分警觉，驻布拉格的记者们也都通宵未眠——我记得我是在晨曦降临在这笼罩着紧张气氛的城市时才上床的。

另外一派意见认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确实打算在五月九、十两日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没有扩散以前就加以切除。这种考虑在上一周杜布切克访问莫斯科之后更加成熟，因此才在五月八日将华沙条约国首脑们紧急召往莫斯科，要他们同意采取这一军事行动。从军事上看，在五月份实行一次比后来八月入侵规模小得多的突然袭击已经具备了可能性，因为，据捷克斯洛伐克军事情报机关了解，在二月底已经作为紧急应变计划开始了包括空军在内的部队调动和后勤支援工作。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不会抵抗这个正确前提下，五月份用二十万兵力可以迅速占领这个国家，正如后来在八月份调动五十万兵力达到的结果一样。

看来，问题在于行动的策划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华沙条约国当中，卡达尔是坚决反对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力主的“警察行动”的。据我事后从匈牙利党内人士中了解，卡达尔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争辩说，应该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找到一种“政治解决”的办法。这个年长而又成熟的人肯定回忆起了十二年前导致他上台执政的布达佩斯悲剧。至于日夫科夫，他可能对克里姆林宫

的任何决定都愿紧跟；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只须派一支象征性部队参加就行了，这支部队将经过黑海运往苏联。

当然，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苏共政治局中的意见分歧情况。根本不能够肯定，所有的或大部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月里都是“鹰派”观点，而且苏联红军司令部当时是否完全同意进行这一军事行动也值得怀疑。看起来勃列日涅夫和乌克兰党魁谢列斯特是最早和最积极主张侵捷的人。柯西金总理和苏斯洛夫据说起初是反对的。在军官中，华沙条约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看来是主张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的。可是，与广泛流传的消息相反，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五月份却是站在主张小心谨慎的人一边的。

为什么五月里没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假定确实策划了这一行动的话——一种比较说得通的解释是：当时在政治上还缺乏足够的“理由”。苏联的宣传机器才刚刚开始抛出材料，把布拉格描绘成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阴谋”的罪恶渊薮，因此，还找不到实行武装干涉的能说服人的政治借口。不过，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五月八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讨论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和政治制裁。据说卡达尔在会上又表示不赞成经互会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苏联在四月末已开始削减对捷的粮食供应。兹·姆林纳日五月初同一个美国驻布拉格

记者谈话中了这一情况。但是，这次谈话内容在报上公布以后，他又声明他的讲话被误用了。

不论在五月的这十天里可能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一件插曲已经突出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处于一种潜在的不安全感威胁之下的苏联，一旦发觉另一个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在接受它视为异教邪说的东西时，就很容易走到对这个国家举行军事进攻的边缘。这些情况也表明，正当布拉格之春欣欣向荣的时候，一种"围困心理战"是如何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这种"围困心理"从未摆脱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到八月才达到最高峰；到一九六九年初，当俄国人又一次感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威胁时，这种"围困心理"又曾一度复活。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苏联"围困"捷克斯洛伐克始终没有安全感，这是苏联干涉这个国家事务过程中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

这样，五月就成了布拉格的一个奇怪的月份：一个既令人鼓舞又消沉压抑、既乐观又悲观的月份。对于杜布切克改革派来说，这是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斗争的月份。斗争进行之激烈的只有一半得到党的上层的支持。华沙条约国家的报刊对捷克斯洛伐克人肆攻击，而布拉格也不客气地予以还击。看来，捷克斯洛伐克人已下定决心保卫自己的政治成果。吉拉和斯沃博达总统在五月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目的是实行民主的复

兴”。他是在纪念捷克人宣告自己在奥匈帝国范围内的民族存在的第一次集会一百周年的时候，以最高明的捷克方式说出这些话的。五月十日，在杜布切克的陪同下，他驱车前往离布拉格约三十英里的山村日普，就在那里他表达了捷克斯洛伐克为民主而献身的决心。

除了政界人物之外，布拉格以及全国各地的老百姓过着激动人心的沸腾的生活。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有一种本领，能够同时在两种不同的境界里生活。一方面，他们为当前面临的危险而担忧得几乎要神经错乱，同时他们又能够及时行乐，悠然自得。这种本领无疑是他们能够度过从宗教法庭烧死胡斯到五百多年以后苏军入侵所有一切民族灾难而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五月是举行“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时候，而这同当时的人民情绪非常一致。音乐节在斯美塔纳大厅开幕时，斯沃博达总统作为贵宾出席了。共产党总统出席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而当这位老将军站起身来，肃立倾听斯美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的时候，到场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几个月之后，这个乐曲成了代表捷克抵抗运动的音乐。捷克人和那年来布拉格的第一批外国旅游者很快就把民族剧院、斯美塔纳大厅、艺术家宫等演出音乐节节目的票子抢购一空。年青的美国钢琴家朱·卡特琴、希腊钢琴家吉·瓦哈夫埃尔、小提琴家亨·塞林举行了独奏音乐会。荷兰的一个交响乐团和布达佩斯交响乐团举行了一系列的演出。

布拉格的二十二家剧场天天满座。布里扬剧院上演了弗·兰格写的话剧《马上巡逻兵》，内容是长期遭到禁止的一九一八年捷克兵团打俄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民族剧院上演了新排演的剧《谁害怕弗·卡夫卡？》，这其实是《谁害怕维·伍尔夫》的捷文翻版。（卡夫卡死后于一九六三年恢复了名誉，他成了这次新的革命的象征之一。）著名的捷克丑角拉·菲亚尔卡脸上涂满了白粉在另一个舞台上出现。电影院上演年青的捷克导演伊·门泽尔的新片《被密切注意的火车》（此片作为一九六八年最佳外国片获美国大学电影奖）以及许多不久就闻名于世的新电影，门票也都被一抢而空。布拉格的夜生活也异常活跃。在市中心的一座名叫"雷都塔爵士乐俱乐部"的黑暗建筑物里，一个伴舞乐队十分准确地演奏了达·布鲁贝克的土风舞曲"第五号"，还带点博·诺瓦的怪异风格。夜总会里还演奏着三十年代的舞曲，照二次大战前的样子跳狐步舞，可是想进去的人要使劲挤，还需要给守门人一点贿赂才行。

当苏联军队沿着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进行威胁性的调动时，人们却过着如此丰富多采、欢乐愉快的生活，这不免使人感到很不调和。可是与这一切欢乐相反的也有一个风行一时的忧郁作品，这就是著名剧作家和作曲家伊·什利特尔和伊·苏希创作的音乐剧《最后的停留》。这个剧本在"地下室剧院"上演，说的是一家医院，主任医生安托宁（这是影射安·诺沃提尼）为一个病人治

病，这个病人明显地是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最后，病人给他治死了，这个医院也忽然变成了一所发狂的酒饭馆。

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见到什利特尔，他显得沮丧而悲观。他的音乐剧实际上是预告布拉格之春是不能持久的。他的思想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两个冬天之间的春天而已"。一个有着光辉的捷克名字的中年妇女绝望地勉强让自己相信，这次解放不会化为泡影；可是她对我说："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俄国人到底能容忍杜布切克多久？"

杜布切克政权当时别无选择，只有沿着这种边缘政策走下去。五月十日它正式表明它已获悉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调动：官方通讯社捷通社发表声明称，"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外交记者从消息灵通人士处获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事先得到关于华沙条约军队在波兰南部进行正常调动的消息。记者继称，捷克斯洛伐克政界人士认为，某些通讯社的报道，把这种部队调动说成是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乃是一种政治挑衅"。

这当然是完全不准确的。捷军事情报机关到五月九日晚还不知道波兰境内有部队调动一事。到第二天早晨，华沙条约驻布拉格的联络官才通知捷国防部，"部队调动"正在进行。捷当局既不愿使公众惶惶不安，但又不能不承认现实，于是就采取了引用广播电台"外交记者"的话这种间接方式。可是布拉格没有一个人受骗。

捷通社声明中说的"政治挑衅"可能是指西方的挑

衅，但实际的挑衅是从东方来的。代表捷共的《红色权利报》五月十一日既指责了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也指责了一家东德报纸，这家报纸称，美国军队在参加联合拍摄电影的借口下进入了捷境。《红色权利报》在谈到（华沙条约国首脑的）莫斯科会议时指出，“与过去类似的会议相反，这次会议的正式公报没有提意见一致和团结，由此外国记者推测，与会者没有达到完全的一致”。在捷、罗两国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华沙条约会议“第一次出现了”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结合。《红色权利报》的文章最后以讽刺的口吻表示，希望这次莫斯科会议的“参加者没有提出‘开除’捷克斯洛伐克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问题”，——这当然是不指名地联系到当年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事。

可是，叫《红色权利报》特别感到愤慨的还是《柏林人报》提出的指控，这家东柏林报纸竟说，美国兵伪装成拍摄电影《里马根桥》的临时演员进入捷境。这是一部关于第二次大战期间在莱茵河上发生的事件的电影，是由美国制片人戴·沃尔泊在捷克斯洛伐克拍摄的。沃尔泊向奥地利军队买了八辆拆除了武器的美制坦克作为拍摄电影的道具，为此他给奥地利人几辆大众牌小汽车作为代价。当时在布拉格的唯一的美国军人是担任电影技术顾问的一个退休的美军上校。《红色权利报》说，《柏林人报》的指控“简直是无稽之谈”，是“耸人听闻

的故弄玄虚"；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东德的宣传工具一连好几个月玩弄这种宣传手法，这个关于美国坦克的故事随即又在另外三家东德报刊上转载。华沙条约的宣传机器真是开动起来了。

在莫斯科，苏联知识分子的报纸《文学报》——它一直是苏联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重炮之一——五月八日对扬·普罗哈兹卡进行了攻击，故意把他的名字拼错，指责他反马克思主义，反苏。第二天《新德意志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德意志报》五月十二日又发表一篇社论，指控布拉格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安·什内达雷克"支持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攻击，反对捷政府制定的外交路线"。该报还连续发表文章，谴责捷革新派"与西德复仇主义者"狼狈为奸。五月十四日《苏维埃俄罗斯报》恶毒攻击托·马萨里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说他在一九一八年曾经用二十万卢布的代价收买人去暗杀列宁。华沙的《人民论坛报》却使劲地用自己的一套理由攻击布拉格，部分原因是由于查理大学提出聘请被华沙大学开除的四名犹太教授激怒了它。可是到了五月底宣传的格局已经明朗化了：指挥者是苏联，东德和波兰忠实追随，而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则尽量保持沉默。

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于这些攻击立即给予还击，这样就展开了一场怒火冲天的论战。布拉格电台五月十三日国际时事节目中的评论说，苏联、东德和波兰对捷的攻击

“是如此骇人听闻的蛊惑之词，以致对这一套颇为熟悉的人也为之瞠目结舌……我们从亲身体验中知道，少数几个人用什么方法和诡计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整个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近二十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相信，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这个思想五月十三日《红色权利报》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它发表了一份民意测验，要它的读者回答是否认为共产主义和民主是能够和谐共存的。民意调查的二十个问题中包括如下几条：

一个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化是否为实现民主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当只有共产党一党起领导作用时，你能说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吗？

共产党是应该通过努力促进自由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来实现其领导作用呢，还是应该对社会进行统治来实现领导作用？

新的政治制度在作出政治决定的时候，是否应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集团和阶层的人们的广泛要求提供自由、民主的讲坛？

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不是我国的内政，是不是必须由我国人民的独立意志来决定？

这次民意测验发表的时候，正是杜布切克在布拉格会见捷共各州委领导干部，与他们共同规划如何继

续贯彻其自由化政策的时候。杜布切克告诉他们，中央委员会将在五月下旬开会，各州的党组织必须开始为夏天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作准备。可是也是在这个星期里，我从两个苏联报纸驻布拉格记者口中听到了苏联对于捷民主化政策及随之而来的公开的批评运动最典型的反应。在同美国记者闲聊的时候，一个苏联记者指着《红色权利报》的民意测验愤慨地说："你能把这个叫作正派的社会主义批评吗？……正派的批评是这样的，例如《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批评伏尔加河的污染。这才是建设性的批评。"

布拉格政府五月十四日采取了一项措施，使它的改革计划变得更加清楚了。由政府总理和希克、胡萨克两位副总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共产党接管政权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清规戒律的记者招待会，西方记者不仅在人数上超过了华沙条约国的记者，而且实际上垄断了这次会议，三位政府领导人情绪很好地对所有问题作了充分的回答。

这个历时八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首先由切尔尼克总理讲话，他宣称，新政权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他告诉记者们，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报道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一个建立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新宪法正在起草中；此外还在草拟一个新的选举法。总理讲话之后，胡萨克副总理谈了选举法和联邦问题；希克公布了他对经济进一步实行权力下

放，以便提高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计划。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切尔尼克说，捷克斯洛伐克已邀请苏联总理柯西金来访，但是，估计他“不会在近期前来”。

可是三天之后柯西金却在布拉格突然出现了，这显然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措手不及。他是五月十七日傍晚，在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八名苏联高级将领组成的代表团在布拉格机场着陆五小时之后到达的。

这两批突如其来的访问的动机是什么？老经验的人想起了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高潮中赫鲁晓夫带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突然到达华沙的事。另一些人把这次柯西金的突然出现和上年十二月勃列日涅夫为了挽救诺沃提尼的政治生命访问布拉格的事相比。

不管怎样，一种危机的感觉在温暖的那一天传遍了布拉格。南斯拉夫外长马·尼凯集奇五月十五日曾在布拉格记者招待会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将对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发生影响。他这番话引起人们的猜测，南斯拉夫也许在倡议恢复它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同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建立的小协约国。建立这么一个从中欧的心脏一直伸到巴尔干的共产主义小协约国对于苏联的利害关系当然非常之大，光凭这一点也许就会促使柯西金匆匆来访。五月十六日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总理突然飞往布达佩斯与卡达尔会谈。显然，对整个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重新评价过程又开始了。

格列奇科率领的代表团是乘一架伊尔—18飞机在十

二点三十五分到达布拉格的。关于这次来访的消息通知得很晚，以致只有几名捷克斯洛伐克记者赶到了机场。来访的苏联将领之一是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据最近一家巴黎报纸报道，叶皮谢夫四月二十五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只要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援助，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当这位身材矮胖、挂满勋章的将军步入机场大厅时，布拉格电视台美丽而又穿着讲究的女记者杜·哈弗利奇科娃把话筒举到他的面前，问他是否确实曾提议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对一位苏联将军公开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哈弗利奇科娃小姐提问之后，跟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这个情景电视观众全都看到了。最后，叶皮谢夫勉强微笑了一下，用俄语说："这是一件蠢事"。格列奇科代表团为何到布拉格来的唯一官方解释是：他们是来同捷军队新领导人互相认识一下的。

在晚上七点的电视新闻节目里，布拉格电视台重播了叶皮谢夫回答哈弗利奇科娃问题的镜头，接着报告员打断了新闻片的播出，宣布柯西金刚刚飞抵布拉格。据事后了解，捷当局是在柯西金已经启程飞往布拉格的时候才接到他来访的消息的。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外交部长哈耶克，还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刚刚赶到机场，他的飞机就降落了。关于他来访的官方报道一片混乱，电视台第一次宣布时含混不清地说，苏联总理来是"短期休假和治病"的。一小时以后捷通

社发表公报说，柯西金是应捷共中央的邀请来访的，“估计柯西金先生在捷逗留期间，将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就双方关心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苏联人是想在最后一分钟争取和解，还是准备最后摊牌呢？苏联两个高级领导人到达布拉格的时机，一方面正是（捷苏等国）报刊展开激烈论战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正是捷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打算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向杜布切克提出新的挑战的时候。柯西金在国宾馆克拉马日别墅住了一夜，五月十八日前往总统府与捷领导人会谈，然后就带着他的孙女儿到卡罗维发利休养地去了，这样，他来捷克斯洛伐克似乎真是为了疗养的。有一条消息宣布，他将在卡罗维发利逗留十天。

这次柯西金来访显然是以鸽派的面目出现的。五月十八日晚捷当局感到颇为乐观，让捷通社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据“捷克斯洛伐克权威人士称”，捷方与苏联总理的会谈表明，“捷克斯洛伐克选择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苏联领导人的谅解”。当然，这不过是重申了杜布切克五月六日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说过的话。可是，受权与少数外国记者谈话的捷共官员强调，这次的评价是准确的。他们说，在莫斯科会谈以及随即召开的华沙条约领导人会议之后，曾存在着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装干涉的“现实可能性”，可是莫斯科后来断定，没有可能及时在布拉格组成一个会“要求”苏联帮助的政府，因而武装干涉的计划已被放弃。这可能是他们一

相情愿的想法，可是，五月十八日晚与我们谈话的捷共官员坚持说，克里姆林宫对捷亲苏的保守派大失所望，因此，它的态度也就变得缓和了一些。

根据这些捷共官员向我们介绍的情况，五月初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杜布切克去莫斯科之前拿到了四月二十五日苏共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稿，稿中把杜布切克说成是“修正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俘虏”，而叶皮谢夫将军确实在中央全会上提议，在布拉格发出“呼吁”的情况下对捷进行武装干涉。后来莫斯科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可见杜布切克去莫斯科之后在消除人们对他的这些指责方面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可是当华沙条约国领导人三天之后开会的时候，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又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在一天左右的时间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岌岌可危。但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又一次作出决定，不立即采取行动。他们同意推行乌布利希的第二个方案，即派一万一千名苏联军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与西德交界的地区，于是下达了五月九日部队调动的命令，一则作为对东德心理上的让步，二则也是对杜布切克的警告。

柯西金去卡罗维发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感到最危险的关头已经度过，捷通社受权宣布柯西金将与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讨论经济援助问题。当这位苏联总理在疗养地休息的时候，大约一万名捷克学生在布拉格游行，他们举着反苏的标语牌——其中之一是：“柯

西金，让我们来给你治病！”——为马萨里克和贝奈斯欢呼。这些情绪很好、高高兴兴的学生队伍旁有着学生扮的警察“监视”，他们挥舞的不是警棍，而是又粗又大的香肠。一个医科学生挎着一架纸糊的照相机，上面写着“秘密警察”的字样。真正的警察对这次游行示威丝毫没有干预，当晚新成立的非党人士政治俱乐部等组织五千名成员开会时也是这样。

五月这些日子里布拉格的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是：人们知道或迟或早总要出事，可是，象希腊悲剧中常有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毁灭的预感却同每天发生的、气氛与之很不协调的事件交错在一起。布拉格的学生挥舞着大香肠游行，而格列奇科元帅和他的智囊却在估量入侵这个国家的可能性。柯西金星期天（五月十九日）在卡罗维发利喝他的矿泉水，几千名东德、西德来的旅游者都没有认出他来。他穿一件深色大衣，头戴银灰色有丝带的礼帽，领着他的孙女伊利娜（还有五个小心谨慎的苏联保卫人员）散步，从一个泉眼走到另一个泉眼。下午，他在维多利亚式的黄色的雅沃里纳别墅小憩。

可是，到了星期三（五月二十二日），无情的现实又说话了。那一天格列奇科元帅一行突然返回莫斯科，外界纷纷传说他们对柯西金过份调和的姿态深感不安。布拉格捷共人士忧虑地报道说，格列奇科认为急需首先赶回去向克里姆林宫反映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实”情况。两天以后，捷当局宣布，华沙条约六月份将在捷克斯洛

伐克和波兰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以检验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协同和指挥能力，改进部队和指挥机关的战斗准备状况”。这里起了很大的变化。捷国防部长楚尔五月四日曾公开宣布，将在年末举行一次“指挥机关的演习”，因为夏季演习会妨碍收割庄稼。而且楚尔说只举行“指挥机关演习”，而新宣布的消息则提到要改进华约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毫无疑问，当柯西金在卡罗维发利举行会议的时候，格列奇科获得了成功，而这次军事演习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

在捷当局宣布这次演习的消息之前几个小时，柯西金匆匆赶回布拉格，提前四天结束了他的“疗养”。他立即前往总统府拜会了斯沃博达总统，接着，显然感到困惑的捷克斯洛伐克官员就说，谈判中突然出现了“新的困难”。前一天晚上柯西金同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举行了“艰苦的”谈判。第二天柯西金就飞回莫斯科，对他的休假期限为何缩短未作任何解释，而且比预定时间提前两小时起飞以躲避新闻记者。

后来的事件表明，这是苏联最后一次尝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既然杜布切克及其同僚们表明，劝说或收买都不能使他们放弃他们“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就只好采取别的手段了。现在，布拉格被迫同意举行军事演习，虽则以杜布切克为中心的政界领导人可能还没有充分理解它的含义，从此以后，苏捷两国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不祥的关系。

XVII

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尽管外来的威胁日益加剧，人们的注意力又重新转向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国内斗争。现在大家关心的中心是杜布切克决定在五月二十九日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

到了这个阶段，捷共内部自由派和得到苏联公开支持的保守派之间已经是营垒分明。对于自由派来说，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将提供机会将一百一十人的中央委员会中四十名死硬派尽可能多赶走几个，同时进一步推行民主化。对于以比拉克、科尔德和英德拉为首的保守派来说，这次中央全会可以用来显示“修正主义分子”缺乏群众支持，对行动纲领必须刹车。保守派还希望能保持中央委员会的现状，以便赢得时间到这年年底或者在华沙条约强行干涉的情况下进行反击。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听到老派共产党员的埋怨之词，说苏联的行动不够果断，没有坚决制服“叛徒们”。

至于杜布切克本人，他是被牵制在某种中派的立场

上的。他当然是同情行动纲领的，但他也为日益加深的两极分化而感到不安。他知道，如果让自由派不受约束地干下去，苏联就可能下决心动手。而且他也明白，他没有足够的票数来把保守派统统撵走；自然，他也不敢冒在表决时被击败的危险。因而到五月末他就开始叫大家小心谨慎。党中央两位自由派的书记齐萨日和姆林纳日代表杜布切克同报纸编辑和广播工作者会见，要求他们减少攻击苏联，甚至在别人挑衅的时候也避免进行论战。他们建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的公开辩论的调子应该平和一些，任何能使莫斯科感到捷共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作用"成了疑问的言词都不应该说。

可是，要使一个已经具有自己的势头和动力的运动放慢速度是很困难的（如果不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这一点大概杜布切克也意识到了。参加会见的编辑们同意齐萨日和姆林纳日的意见，认为小心谨慎是应该的，可是，如果苏联和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再次大肆攻讦，那就无法避免进行回击。

与此同时，捷共领导正在致力于推行它的纲领，这也增强了革命的势头。例如，政府在五月中旬采取了一个恢复宗教自由的重大步骤。托马谢克主教和文化部负责宗教事务的副部长埃·卡德列佐娃谈判的结果，捷三个天主教的主教恢复了他们中断了十八年之久的对教区的管辖权。同时，政府还同意梵蒂冈对原主教已去世的五个教区提出新主教候选人。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九四八

年强加在捷教会头上的国家对教会的直接控制已告结束。这还预示着作为亲共的民族阵线成员之一的天主教和平运动将不复存在，政府当局将完全不干预教会的事务。当我在与总统府隔一个广场遥遥相对的大主教宫访问六十八岁高龄的托马谢克主教的时候，他满意地告诉我说，尽管问题仍然存在，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巨大进展”。

同时，恢复名誉的工作大踏步前进。五月二十二日布拉格市法院撤销了一九四九年对一批外交部官员和教授判处徒刑的判决。这批被判刑的人中包括曾任扬·马萨里克的私人秘书的安·苏姆博士，他被判了二十二年徒刑。五月二十三日国民议会宪法法律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法律草案，为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六年间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五月二十五日斯沃博达总统授予过去大清洗的受害者卡·克拉帕列克将军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的称号。五月二十七日内务部长帕维尔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公安部门和监狱管理部门侵犯公民权利的“非法行为”。这些严厉的做法为控诉秘密警察的罪行打开了道路。姆尼亚奇科在内务部长帕维尔恢复了他的国籍之后，在五月初从以色列胜利地回国了。

这样，当捷共中央全会五月二十九日在赫拉德强尼城堡开会时，这种最富有意义的自由化正处于高潮中。在中央全会开始前的几天中，写给捷共领导的信件和电

报如雪片般飞来，纷纷要求撵走保守派；到开会的那天，一小群人聚集在城堡的铁门前面，对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进步派领袖的到来鼓掌欢迎。当诺沃提尼来到的时候——这是他辞职以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人们愉快地嘘了他。

但很快人们就看出，进步势力在中央委员会里不能控制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因此连一个保守派也开除不了。诺沃提尼留下的老中央委员会并不打算清洗它自己，虽则它在一月份让杜布切克上了台，四月份勉强地批准了他的行动纲领。进步派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将诺沃提尼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保守派到这个时候是愿意牺牲他的——并且暂停诺沃提尼及其他六名官员的党籍，以便审查他们在五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起的作用。（这六名官员是：前公安部长巴契列克、前司法部长斯·拉伊斯、前总理西罗基、审判斯兰斯基时任总检察长的约·乌尔伐列克、捷共中央干部委员会前主席科列尔和中央主席团前任委员帕·戴维。）对于杜布切克集团来说，这只是一个不太大的胜利。

开除诺沃提尼和暂停六人党籍是中央全会第一天决定的，但到了第二天全国人民对中央全会就不再关心，参加华沙条约军事演习的苏联部队已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布拉格电视台五月三十一日晚的新闻节目中放映了苏军车队从乌克兰的乌日戈罗德地区开进斯洛伐克的电视片。

这突如其来的部队调动使捷克斯洛伐克十分诧异，捷军事情报官员说，苏军的入境事先并没有得到捷国防部的同意。国防部长楚尔曾在五月二十四日宣布，军事演习将于六月份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举行；但五月二十九日以华沙条约部队总参谋长、苏联将军伊·卡扎科夫为首的华沙条约总部代表团到达布拉格之后，只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告，说苏、波、匈、捷四国部队将参加这次战争演习。现在，在这次演习的时间和规模问题上众说纷纭，一片混乱；而且很明显，连国防部长楚尔都不能准确地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要不然就是他没有说出全部事实真相。例如，楚尔在五月三十日晚向广播电台的听众们说，苏、波、匈、捷四国只派出“人数很少的部队”来参加“指挥部参谋演习”。可是后来他又说，参加演习的每一个师将由“二、三百人”来代表，而国防部人士报告说，这样被代表的师“至少”有十个。这样，所谓“参谋演习”的人数至少就增加到三千人之多。

这里还有别的矛盾。楚尔在五月二十四日说，演习是为了检验华沙条约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五月三十日他却说只有“通讯兵部队”演习，外交部长哈耶克在同一时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反复肯定，演习没有战斗部队参加。当西方国家驻布拉格的武官和外国记者们反复琢磨，究竟华沙条约司令部想举行什么演习的时候，楚尔将军的一席话使大家思想更乱了，他说：苏

联部队"正在将一种特殊的信号装置安在捷境内，这些装置我们自己在今年后几个月举行军事演习时也将加以利用。"有一个观察问题敏锐的西方外交官指出，看样子很象是苏联人正在安装尖端的通讯设备，以备在将来入侵时使用。八月二十一日，苏联人能以那么快的速度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建立起微波通讯及其他通讯设施，这个事实看来充分证明上述估计是正确的。

布拉格的《自由言论报》——这是捷社会党的机关报——五月三十一日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对这些军事行动的担心和注意。这家报纸把军事演习和苏联希望在捷长期驻军的消息联系在一起。它还说，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特殊情况"使早些时候发表的苏军不在捷长期驻留的声明的有效性成了问题。

这次军事演习所引起的激动和不安完全掩盖了人们对捷共中央全会的注意。全会是六月一日结束的。进步派在会上取得的另一项成就是使前国防部长洛姆斯基退出中央委员会，但杜布切克获得的唯一真正胜利是中央全会通过在九月九日召开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不过，这件事对立双方也是各有其打算的。杜布切克指望夏天举行的党代会选举搞得好，到九月代表大会上能够选出一个进步的中央委员会。保守派则把赌注下在与此相反的结果上，而且他们还指望十之八九会发生其他事件来帮助他们的事业成功。

在六月二日发给《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我引

用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高级官员的话，我认为，他的话很好地总结了捷当时的形势。他说：

> 正好在捷共举行中央全会，进步派试图驱逐‘斯大林主义者’的同一天，俄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组织军事演习，这从政治上看是非常不策略的，如果不称为之笨拙的话；对于这一点俄国人应该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如果没有别的更重要的考虑的话，他们是不会这么干的。
>
> 要我们相信在（捷共）中央委员会中的斗争和苏联人突然想要举行华沙条约参谋人员和通讯专家——他们共有几千人之多——的演习这两件事之间毫无联系，这等于要我们丧失理智……
>
> 人家给我们搞逐步升级，原来说的是少数将领的‘沙盘演习’，结果却变成了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大规模演习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对付这种沙盘演习阴谋。

现在，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地看出，一个反对这场自由化革命的阴谋正在进行中。在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出戏是颠倒过来演了。杜布切克本来希望团结进步派向保守派发动进攻，结果却不得不在保守派的进攻面前处于防守地位。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演习”的消息鼓舞了（中央委员会里的）“斯大林主义”派，他们比一月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和充满信心。中央全会开会的结果发表了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五点决议，即：

1、保证共产党对于社会的政治领导作用；

2、保卫社会主义的发展，保卫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

3、努力使新的政治制度能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相适应；

4、反对一切破坏法制、瓦解国家机关的企图；

5、在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运的关系。

如果这个决议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达到的成果相比较，这是一个倒退的决议。杜布切克清楚这一点；他终于下决心脱掉白手套，不再作息事宁人的中间派，他激烈地投人战斗了。中央全会闭幕之后两天他到了自由派的根据地布尔诺，在六千人参加的党干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政局进行了坦率的评价。

“右派”拒绝自动退出中央委员会使杜布切克不得不如此仓促地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他说，“右派”和“保守派”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中“最大的危险”。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人叫作“反动派”，并把他们的活动同苏联联系在一起。杜布切克指出，“在各种大小会议和公开场合，我们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我们驳斥了对捷苏联盟的一切攻击，就象驳斥对我们党的攻击一样。可是，我们仍然看到，尤其是在

最近一个半月之内，这么多的消极反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到会的党干部对他的讲话不断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说：

> 必须说清楚，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政策看作是别人应该效法的榜样。我们不会根据我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衡量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
> 我们保留根据我们的情况和传统来处理我国内部事务的权利。既然如此，我们也不要去剥夺别国的这种权利，不要发表各式各样的意见来干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杜布切克在布尔诺演说的时候，他的战友们也在全国各地——从波希米亚到斯洛伐克——向党组织传播共产主义民主的福音。进步派和保守派都知道，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今后几个星期要选举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决定谁胜谁负的时候。

六月初我随作协主席爱·戈尔德斯图克和副主席安·利姆到北摩拉维亚的煤炭和钢铁中心俄斯特拉发市作政治性的游说访问。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为自由化事业争取群众的工作。他们到俄斯特拉发来是由于他们以为，那里的工人出于对经济改革的恐惧是倾向于保守派的。可是在市政府礼堂举行的挤得水泄不通的大会证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会上谈到了政治自由、平反

昭雪、经济改革。到会的人提问题，当戈尔德斯图克和利姆轮流回答问题，阐述新的革命的时候，他们鼓掌表示欢迎。

保守派也很活跃。斯洛伐克党的首领瓦·比拉克与东德驻捷大使佩·弗洛林一起周游斯洛伐克各地，参加地方党组织的会议，发表演说，还将五十卷马克思全集的斯洛伐克文译本赠给弗洛林大使。但一般说来，右翼分子更喜欢找同情他们的党干部在小范围内悄悄地开会。在保守派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家是四十七岁的阿·英德拉，他现任捷共中央书记，在诺沃提尼时代任过交通部长和国家计委主席。保守派的捷共党员早在五月份就议论说，英德拉是苏联看中的人选，让他“在目前乌七八糟的情况结束之后”取代杜布切克。波兰的教条主义者对英德拉也颇为赞赏，他曾同波兰西里西亚颇有希望的党魁埃·盖莱克秘密会见过。

保守派的策略之一是散发几万张不署名的传单，指责进步派背叛社会主义。在布拉格一家工厂里出现的一张传单很典型，其中写道：“戈尔德斯图克、希克、克里格尔和齐萨日这些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发明者为了他们的私利企图欺骗我们。他们在‘自由化’的口号下钻进了领导机构，妄图夺取权力。实际上他们是想用修正主义的手段复辟资产阶级的第一共和国。”

杜布切克在布拉格没有公开出面来对局势表示关切，虽则人们知道他在党中央的办公室里每天工作十八

至二十小时。天气热了以后，他每天天刚亮就从他居住的招待所"布拉格饭店"出来，在大街上散步，这样习以为常。当过路行人偶尔认出他来时，他就停下来同他们谈谈话。有一天清晨我在街上碰到了他，互相问了好。对于处在他这样特殊情况下的人来说，他看起来十分轻松和安详。而在这以后的几个月中，他的确需要十二分的沉着和安详才能应付局势。

六月十三日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飞往布达佩斯去签署新的捷匈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看起来象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它名义上的同盟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的暂时缓和。这次访问使杜布切克有机会同他的朋友和袒护人卡达尔进行一次长时间的私人谈话。卡达尔究竟向杜布切克提出什么忠告——如果他提出过的话——这没有人知道；但他始终一贯地为避免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的最后破裂而进行了努力。此外，令人吃惊的是，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率领了一个议员代表团从六月四日到十四日从容不迫地访问了莫斯科。他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据一家报纸报道，勃列日涅夫"眼含热泪"说，苏联从来没有想要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但总的说来，这次访问的气氛是相当冷淡的，斯姆尔科夫斯基身不由己地在一些公开讲话中批评了捷新闻记者的"过火行为"。六月十七日外交部长哈耶克到东柏林作为期两天的访问。表面上看，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他们的对头们又言归于好了。不过，共产党的外交向来是带点

不现实的意味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正在带着每日常有的矛盾向前发展。内务部长帕维尔六月六日被迫任命维·沙尔戈维奇为负责秘密警察的副部长。沙尔戈维奇在马穆拉当权的时候就是秘密警察头子，名声特别臭。不管帕维尔任命此人当副部长是出于什么考虑，过不多久他就该后悔不已了。但在同一天国民议会选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五十年代大清洗时被捕入狱的列·霍夫曼担任议会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几天之后，鲁·巴拉克在监禁六年以后出狱。他是知名的政治犯中最后一个获得自由的。

可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减轻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压力。六月初国防部长楚尔接到一项秘密要求，要他许可苏联坦克和飞机参加计划进行的华沙条约"参谋演习"。不管他是否作出了这一许可，一个苏联坦克师的强大兵力在六月三日夜、四日凌晨从波兰悄悄地进入捷境，驻扎在弗里德克—米斯特克东北、离波兰边界约三十英里的利巴瓦军事营地。我是六月四日从一位国防部里的朋友处听到这一消息的。他还告诉我，为了准备所谓的"沙盘演习"，第二天将有大批苏联部队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领土。

因为关于这次演习的种种说法太混乱，我决定自己去实地看一看。六月五日清晨我乘着租来的、由一位捷克司机驾驶的西姆卡小汽车朝利巴瓦方向驶去。在从布

拉格通往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公路上，我们遇见了一批指挥交通的苏军警察。他们还架设了几处可以移动的电台。我的司机还注意到，这条公路沿线的所有桥梁都换上了新的交通标志，把可以通过桥梁的车辆的最大重量提高了一倍。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大规模的军事装备的运输即将开始。在驶离赫拉德茨市的时候，我们看见三架米格21型喷气战斗机低飞而过。在赫拉德茨和摩拉维亚的大城市奥洛穆乌茨之间，指挥交通的苏军警察就更多了。我们在奥洛穆乌茨发现了几辆用帆布遮着的、类似火箭运输车的车辆，车上的导弹是何种类型的不清楚。过了小里德克—米斯特克的时候，我们发现通往利巴瓦军事区的公路已经封锁。我们只好往回开，在赫拉德茨和奥洛莫乌茨之间的公路上我们碰上了一个苏联军队车队的后尾。

苏军车队行得很慢，我们和一些捷克斯洛伐克的小汽车和公共汽车超了过去。我们看到，这个车队（包括一百多辆车）主要是一个苏联的通讯部队的大型货车，有几辆救护车，车上的士兵穿着褐色的制服，还有炊具汽车，还有装着军官行李的军车。他们看来并不想保密。给车队领路的是一辆蓝色的捷警察局的汽车。士兵们向马路两旁的人挥手，大部分路旁的老百姓也向他们挥手。这看起来就像一次友好访问。我们跟着车队一直开到拉格努夫，车队在这儿另转方向，向赫拉德茨方向驶去。后来得知，这支

营是苏军的集中地点，集中在这儿的部队由雅库鲍夫斯基元帅指挥，于六月十八日在波希米亚西部举行了人们等待已久的“参谋演习”。从演习正式开始前两个星期的这一天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很容易得出结论：参加这次演习的总兵力一定有好几千人。他们代表了苏军的一切重要军兵种。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我写的关于苏军调动的报道，但我在阿尔克隆旅馆的门厅里却受到我的同行们的围攻，他们说我“肆意夸大事实”。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的错误是太保守了。不久之后大家都知道，为进行“演习”调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部队达一万六千人之多。

这一天恰巧是罗·弗·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伤重去世的日子。噩耗传来，在布拉格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那天晚上天下着雨，但几千名捷克人排队站在美国大使馆门前，耐心等待着在吊唁簿上签名。这个队伍同苏军的车队形成了奇怪的对照。

华沙条约的军事演习六月十八日开始了，这又引起了一次巨大的震动，它使捷克斯洛伐克充分认识了面临的危险。第二天，即六月十九日，杜布切克在布拉格飞机场举行的全国工人民兵集会上讲了话。作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也是全国工人民兵的总司令。他召集这个会议是为了平息要求解散工人民兵的呼声，同时争取民兵支持进步事业。可是，保守派还控制着民兵组织，这次集会竟变成了一次表示拥护苏联和正统共产党人的示

威。杜布切克以难以置信的神情听着到会的工人民兵通过一项决议，其中说："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污蔑或威胁列宁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而我国实行这些原则的基础则是我们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奠定的。……有些新闻记者散布资产阶级报刊上的种种歪曲报道，妄图破坏我们（同苏联）的友谊。我们不能同意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并与之划清界限。"

这是保守派的一大成功。这项决议马上就被送到苏联大使馆，两天之后就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接着，苏联工人支持捷工人民兵的"决议"源源不断地送到布拉格来。不过，莫斯科对捷工人民兵的这种立场所感到的满意却是短命的，因为两个月之后，捷民兵中就不再有人对苏联表示钦佩了。

与此同时，苏联报刊重新对布拉格的进步派发动了攻势。《真理报》发表文章，恶毒攻击自由派的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指责他离经叛道，并且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分子"有联系。捷克的《自由言论报》回击了对齐萨日的攻击。但捷克斯洛伐克的保守派仍然继续向改革派进攻，这一次他们又搞起反犹太主义来了。《红色权利报》气愤地公布了一封寄给作家协会戈尔德斯图克的反犹太主义的信，信中说，改革派的政策是犹太人制订的，是损害工人利益的；信里骂道："等着瞧吧，你们这些该死的犹太人，总有一天要和你们算账的。你们活不长了！"戈尔德斯图克写了一封公开信作答，

提醒读者们，反犹太主义在五十年代的斯兰斯基案件中就起过作用。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苏派在许多场合打出过反犹太主义这张牌，但是这张牌在捷克人当中从来没有起过象它在波兰人当中起到的那种作用。

当然，进步派也没有放弃战斗。相反，执政当局及其支持者继续采取攻势，为选举党代会的代表作准备。还需要说服工人相信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这件工作由希克副总理担任。他发表了一系列的电视讲话，在全国人民面前摆出了捷经济状况的严酷现实。他说，捷国民经济就象一个“空空如也的食橱”，已经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布施”了。他列举了一些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用以证明过去统治者留下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烂摊子。钢产量中的一半质量低劣，捷克斯洛伐克的产品中只有三分之一符合世界质量标准，捷克工人要劳动一百十七小时才能买一架半导体收音机，而西德工人只要劳动十二个小时；捷克斯洛伐克在住房建筑方面极为落后，用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口重工业产品使国家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最后一项牵涉到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的贸易安排。）

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开始把诺言变为现实。六月二十六日它取消了新闻法中关于新闻检查的条款。接着，又通过了一项法律，为过去大清洗和镇压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尽管如此，人们有一种悲剧即将发生的预感。那些善于思索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认识到，现在已经到了向全国和全世界陈述自己的希望和担忧的时候了。

六月二十七日发表了一份致“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及所有人”的声明，这是根据捷一批科学家的建议、由小说家卢·瓦楚利克执笔写的。这份被人们简称为“两千字声明”的文件风靡一时，立即传遍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成了布拉格之春的一份伟大文献。其全文如下：

起初，战争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存。然后，不幸的年月，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精神健康和品格的事件又接踵而来。人民的大多数满怀希望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纲领。然而，实施纲领的工作却又落入了那些不称职的人的手中。他们没有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丰富经验，缺乏实际知识和哲学修养，但是如果他们起码多有一些平常人的智慧和谦逊精神，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并让更有才能的人来逐步取代自己的话，也不致于走到这般境地。

共产党在战后赢得了人们很大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渐渐被官职取代，当它取得了全部官职之后，其他一切就丧失殆尽。我们不得不这样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中间的那些共产党人也是清楚这一点的，他们对这种结果的失望之感并不亚于他人。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由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使得它对那些权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可耻的胆小鬼和心怀鬼胎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涌入党内，影响了党的性质和作风，党内并未作出安排，以便使那些品行端正，能顺利地使党不断与现代世界相适应的人，无需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就能在党

内发挥更大作用。许多共产党人与这种堕落现象进行了斗争，但他们未能阻止已发生的一切。

共产党内的状况是国家内部同样的状况的缩影和根源。党与国家的合一，使党失去了与权力机关保持距离的优越性。国家和经济机构的活动无人批评。议会不再议政，政府不再掌权，经理不再管理。选举没有了意义，法律失去了份量。我们已不能相信任何委员会中的代表，对于能相信的人，又无法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办不到。然而更糟糕的是，我们几乎连彼此都不能相信了。个人和集体的荣誉感减弱了。老老实实就一事无成；按照才能给予估价，只是空谈。因此，大多数人对公共事务失去了兴趣，只关心自己和金钱。糟糕的是，今天连金钱也不可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坏了，劳动的欢乐消失了。简而言之，曾经威胁人民的精神健康及品格的时代，又降临到我国人民的头上。

我们大家都要对今天的状况负责，然而，我们中的共产党人要负更多的责任，而那些握有无上权力或是其工具的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掌握在一个固执己见的集团手中的这种权力，借助于党的机构从布拉格伸展到每个县和每个村镇。这个机构决定谁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农业合作社员的合作社，工人的工厂，居民的人民委员会都得听从它的支配。实际上，任何组织都不属于它的成员，连共产党也是如此。这些统治者的主要罪责和最大骗局是，他们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意志。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欺骗，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把我国经济的衰退，对无辜的人们犯下的罪行，实行阻挠把这一切公诸于世的

新闻检查制度，通通归罪于工人，而工人就要对错误的投资，贸易的亏损，住宅的不足承担罪责。然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工人有这种罪过。我们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每个工人都知道，工人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决定过。工人干部要由别人来决定。许多人都以为他们在掌权，但实际上是一个经过专门培养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干部阶层以工人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些人实际上占据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地位，自己成了新兴的贵族。然而，说句公道话，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早就意识到了历史上的这场肮脏游戏。现在正纠正冤屈的事情，改正错误，把决定权还给党员和公民，限制行政机构的权限和人数，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识别出他们。他们在同我们一道反对党员中的落后观点。但是许多干部阻挠变革，而且迄今仍然举足轻重！他们还一直握有权力手段，特别是在县里和村镇中，在那里他们可以隐蔽地和不受控告地利用这些权力。

从今年年初起，我们就处在民主化的复兴过程之中。它是在共产党内开始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讲，我们中间的那些对党已不抱任何期望的非党人士，也是了解这一点的。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也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开始的。须知，整整二十年来，只有共产党人能够过某种政治生活，只有共产党人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批评，只有共产党内的反对派才具有同对手接触的优越性。因此，民主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努力，是偿还整个党由于把非党人士置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对他们欠下的债的唯一办法。因而，对共产党无任何感激可言，也许对它应该给予肯定的是，它在真诚地努力利用最后的机会来拯救自己和民族的

荣誉。复兴过程并没有带来任何太新的东西。它所带来的思想和建议，有许多比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所犯的错误还要老些，另一些则是在明显的事态发展中孕育而生，早就应该提出，然而却受到了压制。别幻想这些思想现在是因真理的力量而取胜吧！决定它们胜利的毋宁说是旧领导的软弱无能，二十年来不受任何阻拦的统治，显然不可避免地使旧领导落到疲惫不堪了。当然，隐藏在这个制度的基础和意识形态之中的一切弊病，都必然要充分成熟起来。因此，不要过高估计作家和大学生提出的批评的意义。经济是社会变革的根源。正确的话只有在条件适当具备的情况下说出才有其意义。条件适当具备的情况——很遗憾，在我国只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整个的贫困和旧的统治制度彻底崩溃，在这种制度下，一些政治家在和平与安宁之中干下了既危害我们又损坏了自己声誉的丑事。因此，真理并没有获得胜利，不过是当其他一切都被糟蹋光了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真理了！因而，没有举国欢庆的理由，只有理由抱新的希望。

在这个富有希望的时刻——虽然希望仍一直受到威胁，我们向你们呼吁。经过好几个月之久，我们中的许多人相信可以讲话，然而就是现在还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我们既然已经这样讲话了，并且道出了如此之多的肺腑之言，我们就只有实现自己的使这个制度变得通情达理的目标。否则，旧势力的报复将是残酷的。现在我们主要是向尚在等待的人们发出呼吁。即将到来的时刻，对今后许多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夏天即将来临，这是休假的季节，按照旧习惯，我们

想放下一切。然而，可以打赌，我们可爱的反对者是不会去消夏的；他们会把受他们控制的人们动员起来，并且现在就想安排一个宁静的圣诞节！因此，我们要注意事态的发展，努力了解它，并作出反应。让我们放弃那些不现实的要求，即要求某个高级人士总能为我们对事情作出独一无二的解释，得出独一无二的明确结论。每个人都应该自己作出结论，由自己负责。共同一致的结论只有通过讨论才能找到，为此必须要有言论自由，而这种自由是我们今年在民主方面取得的唯一成果。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必须采取主动，作出自己的决定。

首先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观点——如果它出现的话——即可以在没有共产党人、甚至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某种民主复兴。如果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乎情理。共产党人有建立好的组织，要支持这些组织中的进步派。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归根结蒂，他们手中握有决定性的杠杆和按钮。公众面前摆着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也是第一次解决最大的不平等现象的纲领，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同样具体的纲领。应该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向公众提出自己当地的行动纲领。这突然又涉及到了一个十分平常的、人们期待已久的正确行动。捷共正在筹备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让我们要求新的中央委员会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更好些。今天，如果共产党说它今后的领导地位想依靠公民们的信任，那么，在我们能够相信现在它派去参加县、州党代表会议的代表的时候，再去相信这一点吧。

最近，人们为民主化进程业已停止而感到不安。这种感觉部分地是由于在激动人心的事态发展之后人们感到疲倦，部分地是符合下列事实的，即令人惊讶的揭露，高级官员的辞职，充满非凡勇敢的言词和令人陶醉的演说，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搏斗仅仅是隐藏了一些而已；为法律的内容和条文，为实际措施的范围而进行的斗争正在继续之中。而且，我们必须要给新的人——部长们、检察长们、主席和书记们一段工作时间。他们有得到这段时间的权利，以便经受检验，证明自己能否胜任。除此之外，今天对中央政治机构不能期待更多的东西。不管怎样，他们也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认真态度。

今后民主制的实际质量，取决于企业的命运和在企业内会发生什么。尽管我们进行了种种讨论，最后经济还是掌握在管理人员手里。必须发现和推举好的管理人员。确实，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工资收入很低，有的人生活情况更差。我们可以要求增加钞票——钞票可以多印，但同时它也就会贬值。所以还是让我们要求经理和主席向我们说明，他们想生产什么，成本是多少，打算卖给谁，价格如何，可以获得多少利润，其中有多少用于生产的现代化方面，多少可供分配。报纸上似乎平淡无味的标题，却反映了为民主或者为肥缺而进行的十分激烈的斗争。工人们作为生产者可以通过把什么人选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企业委员会来对这场斗争施加影响。作为企业职工，他们能为自己作出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天然的工人领袖，有才能和廉洁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工会机构，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党员。

如果说在目前这个时期对现今的中央政治机构不能有更多的期望，就必须在县里和村镇中争取更大的成就。我们要求那些滥用自己的权力、损坏公共财产、行为不正或残暴的人离职。必须找到迫使他们离职的方式，比如：公开批评，作出决议，游行示威，组织示威性的工作队，为他们退休征集礼物，罢工，不同他们来往等。但我们反对采用非法的、不礼貌的和粗暴的方式，因为这会被人利用去对亚·杜布切克施加影响。我们反对写侮辱性信件，要让人们普遍认识这一点，使人们收到这类信件时，将把它看作犹如是自己给自己发出的信件一样。我们要使民族阵线的活动活跃起来。我们要求人民委员会举行公开会议。对于那些谁也不愿意管的问题，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居民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去处理。这很简单：几个人聚集在一起，选举一个主席，认真作记录，公布自己的看法，要求解决办法，不要屈服于大声的威吓。让我们把大部分蜕化为官方传声筒的县报和地方报纸，变成所有积极的政治力量的论坛；我们要求民族阵线的代表组成编辑委员会，或者创办新的报纸。让我们成立保卫言论自由委员会。让我们在集会时，自己组织维持秩序的工作。如果我们听到奇怪的消息，就去核实它，派代表团去找有关单位，把他们的答复公布，贴在门上。我们要支持公安机关，如果它们惩处真正的刑事活动；我们的愿望不是制造无政府状态和普遍的不安局面。我们要避免邻舍间的争吵，对政治有关的事不要胡言乱语。我们要揭露密探。

夏天在整个共和国出现的生机勃勃的活动，会激起人们对安排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政体关系的兴趣。我

们认为联邦制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方式，而这也是达到关系民主化的重大措施之一。这种措施本身也不一定能给斯洛伐克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制度问题——在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各有一套——并不因此而得到解决。党和国家的官僚政权可以继续存在下来，在斯洛伐克甚至更可能存在下来，因为它似乎"争得了更大的自由"。

最近时期，外国势力干预我们国内的发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不安。面对一切优势，我们要庄严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要先冒犯别人。我们可以向自己的政府表示，只要它按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手拿武器来支持它；我们还可以向自己的盟友保证，我们将履行同盟、友好和贸易条约。怒气冲冲的指责和没有根据的怀疑，只能使我国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不会对我们有所补益。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保障平等关系，改善国内状况，把复兴过程进行下去，直到有朝一日在选举中我们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将有足够的勇气、荣誉和政治智慧，能够建立起这种平等关系并把它保持下去。这是世界一切小国政府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的问题！

今年春天象战后一样，重新给我们带来了大好时机。我们又有可能把名曰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共同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它的形态更能符合于我们过去的良好声誉和我们原来对自己相当好的估价。这个春天刚刚结束，已一去不复返了。到了冬天，一切便可见分晓。

我们致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及所有人的声明就此结束。它是在科学家的倡议下写成的。

这份宣言发表在《文学通讯》、工会报纸《劳动报》、青年联盟的报纸《青年阵线》和《农业报》上，签名者共七十人。但声明说明，这七十人"并非赞成这项声明的全部人名，而只是我们接触过的各阶层人民的代表"。看看声明签署者的名单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真正缩影。这些人在苏军入侵以后也是坚决抵抗的志士。签署者的部分名单如下：

贝·布拉胡特，布拉格民族剧院歌剧团演员，"民族艺术家"；

薇·恰斯拉夫斯卡，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者；

鲁·赫鲁辛斯基，演员，舞台监督；

亚·伊雷斯，电影制片者；

薇·卡维乔娃，查理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卡·科希克，哲学教授，捷共中央委员；

伊·克拉尔，布拉格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

卡·克劳特加特内，捷克斯洛伐克广播舞蹈乐队指挥；

伊·门泽尔，电影导演；

阿·拉多克，舞台监督，"民族艺术家"；

伊·拉斯卡，奥运会获奖者；

亚·赛弗尔特，诗人，"民族艺术家"；

布·塞克拉，查理大学生物研究所所长；

兹·塞尔维特，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

伊·什利特尔，作曲家；

奥·斯塔里，查理大学校长，捷共中央委员；

伊·苏希，诗人；

伊·特林卡，舞台监督，电影制片者，“民族艺术家”；

卢·瓦楚利克，作家，本声明执笔者；

亚·沃伊达，民族剧院演员，“民族艺术家”；

扬·维里赫，演员，“民族艺术家”；

埃·萨托皮克上校，奥运会获奖者；

达·萨托普科娃，奥运会获奖者。

此外，签名者还有工人、个体农民、一个饲养员、工程师、物理学家、律师、教师、歌唱家、经济学家。两千字声明发表以后，在布拉格及其他城市的大街上摆了桌子，征集签名。估计总共在声明上签字的人数有几万人。

两千字声明在四家布拉格报纸上公布之后不到几小时，莫斯科也就收到了它驻布拉格大使馆发去的声明全文。克里姆林宫的头头们对此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了。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的正式宣言——《真理报》提供了关于这次通话的消息——苏联整个的政治权力机构都动员起来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谴责这个声明，并要求与它划清界限。

苏联领导人对两千字声明的反应竟然达到这样异常惊慌的程度，这为人们理解克里姆林宫的心理状态和它的领导人难以治愈的不安全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说明。

我记得曾和东欧国家的一个共产党高级外交官议论布拉格声明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解释苏联的反应的：

> 你必须记住，五十年来俄国人已经学会了把共产党国家报刊上登的任何东西都看作"官方的"东西。苏联从来不曾有过言论自由的报刊，甚至连独立思考的报刊也没有。只要在《真理报》、《消息报》或者一家省级报纸，甚至一家科技周刊上登出一点东西，每个人都会把它看成是党或者政府的正式声明。它一定是符合官方路线的，否则就不能登报。因此，当俄国人在莫斯科看到《文学通讯》和其他几家布拉格报纸上登了两千字声明，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就象巴甫洛夫说的条件反射——这个声明是代表杜布切克等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没有想到——经过五十年的实际习惯之后，他们不可能想到，瓦楚利克以及在声明上签字的那些人是自由的公民，他们发表的是自己的意见。俄国人成了他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的俘虏。他们本来对捷克人就十分怀疑，看到这个宣言之后他们自然就认为这是捷当局搞的。你遇到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只要是白纸上写了黑字，那就是官方的东西"。

除此之外，两千字声明又是一个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的东西。它要求有一个更好的、更诚实的共产党，而莫斯科却要把它说成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挑战。它希望和平和秩序，敦促"邻舍之间"避免争吵，克里姆林宫却对它置之不理。它对政府表示效忠，说"我们支持政府，甚至手拿武器来支持它"，这句话被克里

姆林宫看成是实行武装的“反革命叛乱”的号召。宣言表示担心“外国势力将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这种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这也被看作是对苏联的指控。声明的最后一段说：

“今年春天象战后一样，重新给我们带来了大好时机。我们又有了能把名曰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共同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它的形态更符合于我们过去的良好声誉和我们原来对自己的相当好的估价。这个春天刚刚结束，已一去不复返了。到了冬天，一切便可见分晓。”这段话被看作最后的挑战。苏联《真理报》八月份在为苏军侵捷辩解的时候说，这段话等于“公开号召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本国的合法政府”。《真理报》还报道说：“我们党的领导人提醒亚·杜布切克注意这个声明的危险，作为一个纲领，它会促使反革命活动进一步活跃，”而杜布切克“回答说，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苏方的提醒将会受到极大重视，将为此采取最坚决的措施。”

究竟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对两千字声明是什么看法，这当然只是个学术性的问题。六月二十七日下午的现实情况是：莫斯科愤怒地要求采取行动，而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有成千上万的苏军。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只要一声令下，雅库鲍夫斯基元帅的部队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控制全国的战略要点，而部署在捷边界待命的好几个

师的兵力也可以迅速前来支援。假如捷军举行抵抗（这是很少可能的），苏联在几小时之内还可以再调几个师来，还有无限的空军可以支援它们。我想起了一个东欧国家的记者在华沙条约的军事演习开始时对我随便说的一句话："你要知道，假如捷克人胆敢越雷池一步，雅库鲍夫斯基就会驱车直奔总统府，对斯沃博达说：'伙计，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国家被占领了'。"后来我又得知，当时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另外还结集了三十万兵。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六月二十七日傍晚，杜布切克召集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比拉克和科尔德在会上强烈地指责他听任局势发展到能让"这样的一个声明"出笼的地步。主席团中的所谓"中间派"的委员们点头称是。经过同他的自由派同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克里格尔——商议之后，杜布切克悲哀地同意应该谴责两千字声明。不到几个小时就发表了一项中央主席团的特别声明，把两千字声明说成是"对于整个民主化过程的明显威胁"。在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党中央主席团（它是忠于比拉克的）发表了一个更尖锐的谴责声明。斯洛伐克人萨·科代将军在国民议会首先登台，谴责两千字声明。第二个发言的是切尔尼克总理，他谴责一切制造"紧张、恐惧和不信任法制的气氛"的人；他的讲话得到了国民议会的一致赞同。杜布切克对局势表示了"严重的关注"。阿·英德拉进而

发电报给各州党组织，要它们注意制止“反革命的煽动”。

第二天杜布切克又一次谴责了两千字声明，但同时还要求公民们参加民族复兴的事业。同时，全国一百个县举行了党代表会议，开始选举参加捷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布拉格官方对瓦楚利克声明的谴责表面上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谁也不知道苏联人的怒火是否真正熄灭，危险是否真已过去。乐观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危机已经渡过，一个比较安静的夏季即将来临。成千上万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开始离开城市到乡间去度假，另外不少人开汽车到奥地利、南斯拉夫、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去旅行。同时，几千名外国旅游者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汽车同参加演习的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和军用卡车混杂在一起，显得很不调和。从外表上看，捷克斯洛伐克是和平宁静的。那些在布拉格观看旧市政厅钟塔上的大钟或者在卡罗维发利和斯洛伐克疗养地附近露营的外国旅游者们，对于正在自己周围紧张进行的这出戏简直是一无所知。

可是那些悲观的人们却认为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有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指出，这种局势不可能老是悬而不决。要么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彻底地停止整个民主化过程，恢复新闻检查，另选新的领导人，要么这场自由化的革命继续增加势头，不可避免地迫使苏联动手干

涉。一个著名的布拉格记者六月底同我共进晚餐时说："我们要根据逻辑来判断。当前的（改革）运动势头很大，它唤起了这么多的希望，所以要叫它停止是不可能的。杜布切克不会让这个运动停止，而且除非发生什么突然的事变他也不会下台。因此俄国人别无选择，只有入侵我国。这场入侵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不过，这样想的人是少数。甚至那些预见到会发生新的危机和新的紧张局势的人也不愿意相信苏联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说："现在是一九六八年，不是一九五六年。世界已发生了变化。一九五六年的赫鲁晓夫能够搞垮匈牙利，一九六八年的勃列日涅夫却搞不垮捷克斯洛伐克了。"

布拉格电台七月一日宣布，华沙条约军事演习业已结束，七月三日雅库鲍夫斯基说，这次演习达到了它预定的目标，部分苏联部队已开始撤退。但如同往常一样，苏军的调动的情况总是神秘化和矛盾的。独立的观察家们看不到任何部队撤离的迹象，相反，发现了许多通讯设施。有经验的人一眼就看出，它们不是临时性的。

当时克里姆林宫是否已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出了最终的决策，我们不清楚。苏联显然是希望杜布切克能自行垮台，免得用兵。但一旦需要就举行入侵的准备工作已经作得非常充分，这样莫斯科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保持两种选择的自由。在苏联的权衡中，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的态度也是一个因素，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莫

斯科确信华盛顿不会在军事上作出反应。差不多有五十五万美军陷在越南；驻欧美军除了发动一场核战争之外，是没有力量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进行攻击的，而俄国人知道，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极为微小。克里姆林宫可以设想——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正确的——美国对（俄国）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将采取容忍的态度。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心目中，雅尔塔协定的精神仍然是有效的，越南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七月三日卡达尔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显然，苏联人终于说服了他，"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是有必要的，而且匈牙利军队一定要参加联合行动。当晚勃列日涅夫和卡达尔在克里姆林宫发表演说时，都嘲笑美国是一个"腐朽的、正在解体的"社会，仿佛是为了说服自己和全世界，美国不可能、也不愿干涉东欧的事务。勃列日涅夫进而指出，"资产阶级秩序的辩护人随时可以穿上任何假社会主义的外衣"，"在民族形式的伪装下"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削弱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兄弟关系"。他又一次预示他的主义说，苏联"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漠不关心"。卡达尔则说："匈牙利共产党人全力支持那些反对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为保卫工人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共产党人……我们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我们准备用一切手段给他们以国际主义的支持。"这些话已经再清楚不过地宣布要举行入侵了，可

是没有几个国际政治家认真看待这一件事。勃列日涅夫的话同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说的话差不多；卡达尔一九六八年在莫斯科说的话等于重复了他十二年前跟在苏联坦克后面登台执政之后在布达佩斯说的话。

杜布切克在七月八日收到了勃列日涅夫、乌布利希、卡达尔、哥穆尔卡和日夫科夫措词几乎完全相同的信件，要求他参加华沙条约国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两千字声明引起的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事业的威胁。由此可见，莫斯科并没有忘记这个声明，它再次利用此事来迫使布拉格就范。捷共中央主席团七月九日开会讨论这个实际上的命令，结果以多数票决定拒绝参加这一最高级会议。这一次连"中间分子"也站在进步派一边，只有比拉克、科尔德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卡佩克投票赞成接受召唤去参加会议。捷政府的答复中提议先举行双边会谈，然后再开总的会议。这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

七月十日，正当苏联报纸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势力"重新开火的时候，国民议会将莫斯科所不喜欢的自由派齐萨日选为捷克民族议会议长。不管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故意刺激俄国人，还是捷政局发展中自然而然的结果，克里姆林宫都认为这又是一种挑衅。七月十一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一篇长文，题目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基础的进攻"。文中把捷当前形势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两千字声明的签字者是——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同外国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反革命分

子”，他们在进行颠覆活动方面，比过去匈牙利“反革命分子”还要诡诈。《文学报》攻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克里格尔，说他对瓦楚利克的（两千字）声明表示同情；《真理报》也参与了攻击，并且阴险地警告说：“捷克斯洛伐克个别领导人”企图“缩小这个反革命声明的危险性”。

这又是一次要进行干涉的威胁。不过，跟《真理报》说话平时就是前言不对后语一样，该报七月十二日还宣布华沙条约在捷举行的军事演习“刚刚”结束。至于雅库鲍夫斯基七月三日就说演习任务已经完成，到十二日这九天之内发生了什么情况，没有人作任何说明，只是捷国防部后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由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发展的担忧”，部队的撤离推迟了一些时候。

但苏军拖延许久才开始撤离，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紧接着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又沿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进行了一次所谓反空袭防御演习，代号是“天空之盾行动”。这是七月二十五日宣布的。同时又向捷方发出了参加在华沙举行的共产党最高级会谈的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十二日答复称，如同它九日建议的一样，捷共仍主张先举行双边会谈。七月十四日这次最高级会谈开始了。苏联代表团的阵容非常强大；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乌克兰党魁谢列斯特、还有苏共中央负责与执政的共产党联系的书记卡图谢夫；哥穆尔卡

是东道主：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也带着自己最高级的助手来参加会议。

七月十五日他们起草了一封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药味很浓的信，这封信到十七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开会之后才公布。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解释这封信的是谢列斯特，而党的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则沉默不语，他没有去华沙开会，人们知道他是反对武装干涉的。

在起草华沙会议的信的时候，布拉格又打了克里姆林宫一记耳光。普尔赫利克中将发表谈话，建议彻底改组华沙条约。他认为华约的所有缔约国在决定问题时都应有平等的一票（齐奥塞斯库也是这种观点）；华约决不应该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这可能是对华沙条约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种警告。

可是，七月十六日在布拉格公布的华沙会议的信却十分明确地表示，华沙条约这个共产国家的联盟是非常肯定地要在政治上起作用的。信中说：

我们深信，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对你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进攻，有使你们的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从而危害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

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引起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

你们知道，兄弟党对捷共中央一月全会的决定是采取谅解的态度的，因为它们相信，你们党牢牢地掌握着权力杠杆，将引导整个运动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不会让反共的反动势力利用来实现其图谋。我们曾经相信，你们会保卫和珍爱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原则……

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了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捷克斯洛伐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立起来……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到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攻击共产党的讲坛，搞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毫无约束地大量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谎言，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正是反动派能够用《两千字》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这是一个严重危害党、民族阵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是在全国制造无政府状态的号召。……这个文件在捷共非常代表大会前夕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它不但没有受到驳斥，反倒受到一些普通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明显支持，他们附和了这些反社会主义的号召……这样就形成了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相容的形势。……

事态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由某些苏军单位参加的华

沙条约军队的联合参谋演习竟被毫无根据地指责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

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深信，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威胁正在危害着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切身利益，这样的局势已经出现了。……

我们每一个党都不仅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负责，而且也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保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权，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事业，要求对右派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动坚决勇敢的进攻，要求动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国防力量，要求制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的活动，要求党控制宣传工具——报刊、广播和电视，利用它们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要求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紧密团结党的队伍，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帮助敌人的人进行斗争……

我们表示深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制止反动派的图谋。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可以信赖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支持和多方面的援助。

华沙会议这封信中说的"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作为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威胁正在危害着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切身利益，这样的局势已经出现”的话，是对布拉格的最后通牒：要么刹车，不然就入侵。

杜布切克召集了党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一封反驳这些指责的复信，并决定七月十九日召开中央全会。这封复信的语气要比华沙会议的信温和得多，但它坚定地表示，捷共将继续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并宣称捷共并不认为华沙条约其他国家所说的“反革命危险”确实存在。

同一天，齐奥塞斯库总统和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尼凯集奇分别在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这两国政府预见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也是对它们的危险，齐奥塞斯库和铁托私下告诉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只要通知一下，他们二人马上就可以飞抵布拉格来表示道义上的支持。但捷方谢绝了他们的建议，认为这时他们来访为时过早。捷克斯洛伐克人感到把齐奥塞斯库和铁托留到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再请来也许更加有用。

捷共中央主席团在给华沙条约国首脑的复信中说：

> 你们来信中表示的某些担忧在我们捷共中央五月全会决议中已提到了。

可是我们认为，产生当前包含各种冲突的局势的原因在于，这些冲突是在捷共中央一月全会以前的许多年中逐渐积累形成的……

在根据行动纲领的路线实现思想统一的过程中，连我们党本身也不免发生内部的争论。这个过程的消极面之一就是在处理某些共产党员时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这主要是由于过去党的领导多年来实行了官僚主义集中制，压制了党内民主……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现实的理由把我国当前的局势叫作反革命局势，没有任何理由说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直接的危险，说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准备改变其现行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或者说存在着我国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体危险……

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确定的，这就是：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相互合作。我们将努力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加深我国和盟国——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今天确实存在着企图破坏党的威信、否认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领导我国社会的权利的倾向，我们并不掩盖这一事实，在五月中央全会上我们坦率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如果要问，把这种现象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治作用在反动的、反革命势力的压力下趋于衰退，这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

根据捷共中央五月全会的决议，由共产党员倡议，草拟出了一个具有约束性的民族阵线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民族阵线的全体成员赞成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的纲领性声明，它明确表示接受历史上形成的捷共的领导作用，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内外政策的原则……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工人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的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在目前形势下，如果兄弟党信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全力支持它的政策，那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最为有利的。根据这一理由，我们曾建议举行兄弟党领导人之间的双边会谈，作为成功地举行各兄弟党领导人会议的第一步……

我们在七月八日和十二日举行的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两次会议上讨论了五个兄弟党关于举行华沙会议的建议……不幸的是，我们十二日开会纯属多余，因为，不管这次会议结果如何，华沙会议已经决定于十四日召开——这一点我们是十三日通过捷通社了解到的，那时五个党的领导人已动身往华沙去了。……我们认为，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讨论这个党的政策和活动问题，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是起不了促进作用的……

我们把在最近的将来举行我们建议的那种双边会谈当作一项重要任务。然后就可以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开会的可能性，就会议的议程，人員組成，开会的时间、地点等达成协议。

杜布切克在七月十八日发表电视讲话，重申了捷共对华沙会议的信中所说的“反革命活动”的反驳。他以沉着而自信的语气告诉全国人民捷方正式答复的内容；第二天，捷共中央一致批准了这一行动。杜布切克及其同事们在一个月以前无法做到的捷共内部的团结一致，竟在苏联的压力之下出现了，这倒颇有点讽刺意味。甚至那些亲苏的活动分子如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之流也认为与其他委员一起投票来表示民族团结是更为明智的。如果克里姆林宫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思想情绪有一点起码的理解，那么这件事就足以叫它就此止步，考虑一下自己正在积极准备的行动会引起什么后果。但是，苏联领导人摧毁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听不进任何提醒他们谨慎小心的话。他们简慢无礼地拒绝了法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欧洲各国共产党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建议。

就在七月十九日捷共中央全会开会的那天，莫斯科又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了攻势。《真理报》报道说，在捷克斯洛伐克靠近西德边境的地方发现了一处埋藏的美国武器，以此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受“帝国主义者”幕

后操纵的又一线索。几个星期以来苏联一直批评布拉格当局，说它同西德有秘密联系；甚至在捷外交部已经公开声明，必须正式宣布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协定无效，捷与西德方可建交之后，苏联人还是这样说（我已经指出过，当时苏联和罗马尼亚已经同波恩有外交关系）。在同一天的《真理报》上还说，发现了五角大楼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文件”，它们暴露了推翻布拉格当局的阴谋计划。

苏联的第二方面的行动是把捷方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接了过去，作为自己的建议。俄国人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于七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在苏联某地——莫斯科、基辅或利沃夫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也是极为明智的。捷方的答复是：拒绝前往苏联赴会，坚持只有在参加军事演习的苏联部队全部撤离以后才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举行会谈。杜布切克及其同事们对此种态度不须作任何解释；每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明白，中央主席团的人一去苏联就再也回不来了。人们在苏联神秘地失踪的事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其中最近的一例就是匈牙利的纳吉。但完全出乎布拉格方面的意外，苏联竟同意了捷方的建议——这是因为苏联领导人非常急于同捷共中央主席团对话，否则对他们来说就未免太丢脸了。苏联《真理报》在七月二十二日发表这条消息时告诉读者说：捷领导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到“反革

命”的危险，但表现了改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愿望，因此，举行一次直接会谈将是高度建设性的。但与此同时，《真理报》又对“受到帝国主义反动派鼓励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右翼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攻讦。也是在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天，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交给捷外交部一份秘密照会，要求华沙条约的军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并对普尔赫利克将军关于华沙条约结构的意见提出抗议。

如果杜布切克政权认为，苏共政治局同意到捷赴会和完全撤出苏军至少是捷方取得的部分胜利的话，那他们的这种感觉是十分短命的。七月二十三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证明苏联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任何意图，相反还在施加新的心理压力。莫斯科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乌克兰地区以及俄罗斯共和国西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开始了一场苏联支援和供给部队的“大规模”演习。声明说，这次预定在八月十日结束的演习将由伊·巴格拉米扬元帅指挥，目的是为后方设施的组织，为前线部队军需品的运输和武器装备的修理制订规程。后备役被征召入伍，民用交通工具被征用。一个旁观者也许会认为，俄国人在一九六八年夏天不知道怎的患了演习热，但内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苏联红军正在为它的侵捷部队作最后的后勤准备。同时“天空之盾”防空演习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附近展开。这场空军表演已经为可能进行的干涉发出了信号。

苏军已全部撤离捷境的消息是七月二十二日宣布的，但就在第二天，一个企图核对事实的英国记者就发现一支约二千人的苏联军队，装备有坦克、装甲车和迫击炮，在斯洛伐克中部的齐尔纳城以东的地区宿营。那些坦克并没有装在运输车上，这一旅人丝毫没有即将撤离的迹象。要说这支部队是撤退时落在后面的唯一的一队苏军是不大可能的，看起来俄国人并没有遵守在双边会谈之前撤军的诺言。

同时，苏联报刊又对捷领导人发动了新的攻击。《消息报》发表了一个身份不明的捷克历史学家的信，指控内务部长帕维尔在斯大林时代曾参与组织事先定好口径的审判，“将无辜的人”判处死刑。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帕维尔在一九五一年就不担任内务部长之职，而且自己也被捕了，那时大清洗还没有大规模进行。可是《消息报》不管这一套，它公布的信中说，正在“恬不知耻地支持为幸存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帕维尔，应该为他早先犯下的“罪行”受到惩处。这不禁令人回想起五十年代的疯狂岁月，苏联人在下手干之前准备社会舆论的情景。同一天的苏军机关报《红星报》谴责普尔赫利克将军，说他关于华沙条约的意见是“毋庸置疑的造谣诬蔑”。

捷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应该作出一些让步，因此在七月二十五日决定撤消党中央武装部队和安全部，将这个部的部长普尔赫利克将军调到正规部队中任职，认为这

样做比撤销他的职务要好一些。但苏联报刊却根本不发表这条消息。捷国民议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宣称本国的国防——尤其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接壤的边界上——是有充分保证的。但这个声明也没有能使莫斯科息怒。国民议会的这个委员会还宣称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安全和它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也是有保证的。

七月二十五日（那是一个星期四）深夜，捷克斯洛伐克人得知，命运攸关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谈将于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在靠近苏联边界的捷克斯洛伐克某地举行。危机临头之感加深了。七月二十六日《文学通讯》出了一期号外，登载了捷知识分子对其领导人的呼吁书，它是由帕·科霍乌特执笔的。呼吁书中说：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的前夕我们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这种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几百年来我国的历史是一部受奴役的历史。除了短暂的两段时间以外，我们都被迫用非法的手段来争取民族生存。我们有好几次都走到了毁灭的边缘。

经过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希望，也是其他人的希望。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并不是解

决不是逃避国家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人类文明的唯一的真正出路。

我们曾经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将第一个站出来热情欢迎（我国的）这种发展。但事与愿违，我们被人加上背叛的罪名。那些给我们下最后通牒的同志们所发表的声明表明，他们对我国的局势发展缺乏了解。他们指控我们的罪行我们并没有犯过；他们强加在我们头上的那些意图，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防止发生这样的危险。你们的任务是说服苏共领导人，使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全部目标可以用四个词来表达：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社会主义”和“同盟”就是我们对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保证；对于为了共同事业我们与之并肩战斗了二十年的兄弟国家，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威胁它们真正利益的事情发生。“主权”将保证我们不会重犯过去曾把我们带到危机边缘的那些严重错误。

请你们在会谈中向对方解释，在我们的内部讨论中时而听到的过激言论，完全是过去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产物，这种统治如此长期地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思想，结果把不少人推向了国内反对派。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告诉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我们需要时

间，以便能够成为他们更加可靠的盟友。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今后的几天里，我们将每时每刻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们也时刻想着我们。你们正在书写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希望你们要审慎，但更要勇敢无畏。我们信任你们。同时，我们希望所有赞成我们意见的公民支持我们的呼吁。

这份文件是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声疾呼，是两千字声明合乎逻辑的继续，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的民族主义的声明。这份呼吁书公布不到几个小时，在全国各地就有几百份张贴在墙壁上，街头放了桌子，让其他公民们在这份致国家领导人的呼吁书上签字。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签了名，可能有好几百万人。

当天晚上，杜布切克在布拉格接见了工人代表。他向代表们说，他将从苏联人那里争取到更多的行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想把它同莫斯科的分歧弄到公开破裂的地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神经紧张，神经紧张就会影响安全。这个艰难的时刻要求我们极端的明智和审慎，而尽量不要感情冲动。……你们放心吧，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将不仅能成

功地捍卫我们的理想，而且还能赢得更多的行动自由。……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对我们谈判的最大支持”。

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着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危难。但全国的情绪同一九三八年的失败主义情绪迥然不同，那时，——照捷克人的说法——他们在慕尼黑“背着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这一次，领导是坚定的，全国人民也信任这个领导。一位布拉格记者说：“现在我国的情况更象一九四〇年的英国”。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日）莫斯科和布拉格的官员同时宣布，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谈将于次日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开始。这个偏僻的村庄是斯洛伐克东南角上的一个铁路小站，在捷、苏、匈三国边界交叉处附近。它的南边约十英里处是蒂萨河，这条河从匈牙利流入斯洛伐克，然后蜿蜒曲折地沿苏匈边界而下，最后重新折回匈牙利。经过切尔纳的铁路线是从乌克兰的乔普通往斯洛伐克的新城的一条副线。切尔纳离苏联边界不到五英里。

当一列火车从苏联载来九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列火车从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斯沃博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十一名委员，来实现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较量时，切尔纳突然变成了世界注意的中心。这样的会谈在共运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一九五六年十月

波兰事件时，赫鲁晓夫只带了三名政治局委员去华沙。一个月以后匈牙利爆发了起义，去匈牙利的也只有两名苏共政治局委员。为什么这次全体政治局委员都来了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苏联领导人之间是严重地互不信任的，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看法显然还有分歧，他们不愿意让少数几个人代表整个政治局来决定问题。

这样，切尔纳谈判苏联代表团的阵容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六十二岁）；总理柯西金（六十四岁）；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六十五岁），他倾向于当一个调解者；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六十六岁），他一九五六年去过匈牙利，但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则主张慎重；乌克兰党魁谢列斯特（六十岁），他是主张对布拉格采取激烈措施的；谢列平（五十五岁），原来是克格勃的头子，是一个“鹰派”；拉脱维亚党魁佩尔谢（六十九岁），他当过秘密警察，是民族主义的死对头；白俄罗斯党魁马祖罗夫（五十四岁），他也是一个强硬派；沃罗诺夫（五十八岁），他是一个专家治国论者，可能是反对采取强硬措施的。（留在莫斯科看家的政治局委员是波利扬斯基和基里连柯。）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是杜布切克，代表团也包括七十二岁的斯沃博达总统，他当时还不是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其余的代表是：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这两个人都是开明的进步派；切尔尼克总理，当时还是一个进步派；克里格尔，一个自由派；

科尔德，一个强硬的保守派；斯洛伐克党魁比拉克，他可能是中央主席团中最为亲苏的人；什维斯特卡，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斯洛伐克人巴尔比雷克，一个“中间派”；吉卜赛人里戈，保守派；皮列尔，也是一个保守派。

姑且不论苏捷双方代表个人的政治观点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切尔纳会谈是一次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对抗。苏联代表团的平均年龄是六十一岁弱，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平均年龄是四十七岁强，如果将因其职务而参加会谈的斯沃博达总统不计在内的话。

这次会谈原定举行一天，结果却延续了四天，由此可见会议双方之间的分歧和布拉格代表团内部的分歧是多么严重。第一次会谈是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上午在戒备森严的切尔纳电影院开始。但就在会谈开始之前，俄国人发动了一次宣传攻势。那天的《真理报》（早晨印出后赶送到切尔纳）强调捷对苏经济上的依赖。会谈开始后勃列日涅夫宣读了一个长篇声明，指责捷克斯洛伐克背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为“帝国主义”服务。他引用了一大长串从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上摘录下的言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指出新闻自由正在威胁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作用”，从而使这个国家脱离华沙条约和经互会。

在切尔纳会谈开始的那天，西方军事情报机关发现七万五千名驻东德的苏军向捷克斯洛伐克边界方向运

动，驻波兰的几个师也向南展开。配合苏军主力的还有两个东德的师。这些部队都是为了加强原已部署在捷克斯洛伐克周围的兵力。这到底是对杜布切克及其同事们日益加强的精神压力的一部分，还是入侵准备工作的继续，当时布拉格的领导人或者北大西洋公约部队的指挥官都无法确定。实际上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莫斯科显然是在玩弄彻头彻尾的欺骗计谋和突然袭击的两手策略。不管是怎样，这时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二者是配合得十分紧密的，俄国人在切尔纳会谈中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保留着随时采取任何一种行动的主动权。

杜布切克在切尔纳会谈中，拒绝了对方提出的一切指责，他坚定地宣称，这场革命的唯一目标就是建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坐在杜布切克身旁的斯沃博达总统，在勃列日涅夫说到（捷克斯洛伐克）“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时，气愤得满脸通红。这一天会谈的其余时间就由双方代表交错发言。到晚上十时半休会，苏联火车将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团拉回乔普去过夜。但杜布切克并没有休息，这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他在切尔纳周围散步，同铁路工人们聊天，工人们对他表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警察拦阻了前来采访的几百名新闻记者，根本不许他们进村。

第二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报纸又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批判。布达佩斯的《人民之声报》写道：“我们的历史经验表明，敌对势力必然会利用我们纠正错误的

过程浑水摸鱼，一有空子就钻，谋求他们的私利。”索非亚的《工人事业报》称，“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威胁正在日趋严重”，“（捷）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组织”正在把捷克斯洛伐克拉向“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布拉格汽车厂九十九名工人的来信，对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抗议。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会谈发生了危机。双方立场对立，完全不可调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中的保守派退出了会议。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对克里格尔说的一句话勃然大怒，骂克里格尔是“一个肮脏的加里西亚犹太人”。然后他就病了，或许是装病，回到自己的专列里去，会谈只好中断。但杜布切克去拜访了他，会谈又继续进行。不过，双方的对立情绪还很大，原定举行的宴会和记者招待会都取消了。

虽然八月一日（星期四）最后一次会谈的详情从未公布过，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这天会谈中杜布切克作出了重大的让步，或者给人的印象是他作出了重大让步。在苏军入侵之后不久，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高级官员告诉我——我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也是这么写的——杜布切克和勃列日涅夫达成了一项六点协议。照他的这种说法，杜布切克许下诺言：“对捷克斯洛伐克报刊实行控制”；不许在民族阵线以外成立任何政治组织；采取措施加强工人民兵和其他保安部队；保护反对

自由化纲领的保守派共产党人；停止在报刊上与苏联论战；至少将两名莫斯科最讨厌的自由派领导人撤职。这两个人就是克里格尔和齐萨日。

也许除了最后一点之外，上述的几点听起来是颇为可信的。一方面这些保证原则上满足了苏联的大部分要求，而另一方面它们是用十分一般的语言表达的，因而杜布切克在执行的时候可以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也可能上面这些协议对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来说各有不同的理解。会谈以后发表的简短的公报宣布，两天以后将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华沙条约国领导人的正式会议，这件事证明，勃列日涅夫在那个阶段只要得到一般的保证就可以满足，而不一定要具体的保证。如果不是双方都认为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协议的话，就不可能发表这个公报。但由于谁也没有弄到切尔纳会谈的记录，恐怕永远无法证明，破坏这次达成的协议的到底是苏联还是捷克斯洛伐克。

当天晚上杜布切克回布拉格以后对记者们说，他带来了好消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可以安心睡觉了。但布拉格的居民疑虑颇多，他们不那么容易就感到满足。切尔纳会谈期间四天之久的沉默，使气氛紧张到难以忍受的程度，现在人们要求解释。那天深夜，五千多捷克人聚集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坚持要求报告情况或重新作出保证。人们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接着，斯姆尔科夫斯基到了现场，登上一个阳台向群众讲话。从嗓音和面容来看，他疲惫不堪，他反复保证，捷领导人没有“背叛”

革命事业，但人们对他毫不留情地提出许多问题，又有人叫喊要杜布切克出来。斯姆尔科夫斯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同志们，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三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多少问题，他肩上要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都无法想象的。我敢保证，即使杜布切克同志来了，他用斯洛伐克话对你们说的，同我用布拉格人的捷克话告诉你们的，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语言。"

八月三日（星期六）华沙条约国领导人集合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堡的明镜大厅，签署一个空洞无物而又十分冗长的文件。在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宣言上签字的有杜布切克、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签字仪式上照例是所有到场的人互相拥抱接吻。问题在于，究竟是谁骗了谁。

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观点来看，布拉迪斯拉发宣言是一个胜利，即使这个胜利是短暂的。这个宣言没有提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危险，也没有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帮助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宣言中甚至连捷克斯洛伐克的名字都没有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似乎抛弃了华沙会议的信及其最后通牒，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一般性的、语意含糊的声明。（宣言的签署者保证在"平等、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互相合作，虔诚地谈到社会

主义建设，“在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多方面的任务就比较容易在我们每一个国家中完成。”宣言中还包含常见的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和以色列在中东的“侵略”政策的词句。）从俄国人的角度看，要说克里姆林宫忽然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存在什么危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俄国人很可能认为，较为有利的办法是用一纸空文掩盖住分歧，暂停论战，以便争取时间，让捷克斯洛伐克的保守派领袖为下一次摊牌进行更好的准备，或者用来组织武装入侵。

不管怎样，捷克斯洛伐克报刊和西方报刊都在欢庆胜利。（这么做本身可能就是错误的。俄国人是不愿意当众出丑的。）大家一致认为，危机已经过去。更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外出度假，其中包括副总理希克，还有外交部长哈耶克，他到南斯拉夫去休假。杜布切克八月四日在电视讲话中语气也很乐观。

但就是在这一片欢庆声中，也有一些人并不乐观，他们想要知道在布拉迪斯拉发宣言这一纸空文后面有什么名堂。事情顺利得难以令人置信了。布拉迪斯拉发充满兄弟情谊的盛宴之后，苏军并没有撤离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一步，这一事实看来是证实了这些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八月初我在华盛顿呆了一个星期，美国的高级官员告诉我，华沙条约有四十万大军放在捷边境线上，在波兰和东德机场上至少集中了三百架苏联军用飞机，它

们只消飞几分钟就能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目标。西方情报机关七月二十九日侦察到，兵力的最后部署现在终于完成了。不过这些部队还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莫斯科又一次采取了引而不发的姿态。首先，它要密切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

莫斯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的事件之一是铁托八月九、十两日到布拉格的访问。当铁托到总统府拜会斯沃博达总统时，几千个捷克人冲开了沉重的铁门，涌进总统府的院子里，把这位南斯拉夫领袖围在当中，还有人试图拥抱他。这次访问的含义是如此之明显（罗马尼亚总统下星期也将访捷，从而又有人议论起成立新的小协约国的事），以致保守派的《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斯特卡决定将报道此次访问的版面减到最小程度。此事引起了该报内部的争论，什维斯特卡专横地撵走了三个重要编辑，其中包括国际版编辑伊·霍赫曼。

捷国内政局发展势头越来越高也叫苏联人担心。定于九月九日召开的捷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业已结束，可以明显地看出，进步派胜利了。一个月之内，杜布切克就将拥有一个自由派的中央委员会。斯洛伐克共产党定于八月二十六日开代表大会，有理由认为，比拉克这个在切尔纳会谈中站在勃列日涅夫一边的人可能会丢掉第一书记的职务。八月十日《红色权利报》公布了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的党章草案。这个草案是由一个以什帕切克为首的小组委员会起草的，它规定，当

多数人作出决定之后，少数人仍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条实际上就把“民主集中制”的神圣原则一笔勾销，从而击中了正统的共产主义纪律的核心。新党章草案也主张公开讨论和秘密投票。

与此同时，布拉格的报纸公开谈论加快改革的步伐，也议论党代表大会可能取得的结果。如果杜布切克在切尔纳确实作出了“控制”报刊的保证，那么他显然没有着手去这么做。在布拉格的金融中心普日科皮街有一个小公园，这个公园变成了公开讨论的论坛——就象英国的海德公园一样——每天晚上布拉格的公民们，有老有少，纷纷到这里来听人们的即席演说和关于当前问题的辩论。又重新掀起了要求解散民兵的运动，但很快就被当局劝阻了。

八月十一日苏军又沿着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东南部和北部边界开始了新的演习。部队很可能已进入阵地随时准备发动进攻。人们相信在几天之前，克里姆林宫又受到了新的压力，要它即刻开始武装干涉。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公开表示，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布拉迪斯拉发拖延下来而没有立即进攻是犯了错误；同时布拉格的英德拉—比拉克集团坚决要求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们显然说服了苏联大使，他们有能力迅速成立一个对立的政权，呼吁苏联帮助。契尔沃年科把这个意见报告了莫斯科并附上了自己的建议。

八月十二日乌布利希同杜布切克在卡罗维发利会

谈，想要杜布切克保证向“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斗争，并同意华沙条约的军队驻在捷克斯洛伐克。他还希望杜布切克在同西德举行任何谈判之前须先与他商洽。这次会谈只进行了几个钟头，气氛冷冰冰的，结果乌布利希两手空空而回。他马上打电话到莫斯科给勃列日涅夫，他认为采取行动的时间已到了。

要准确地指出克里姆林宫究竟何时决定动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是不可能的。但已有的材料表明，至少在八月十日——即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十天——已经作出了初步决定，十一日开始的新的军事演习则是入侵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据报道苏联驻东德部队八月十四日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八月十六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军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飞抵东柏林进行最后的视察。第二天他们又访问了华沙，估计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苏联《文学报》八月十四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重新开始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八月十六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指责杜布切克政权没有信守布拉迪斯拉发宣言，但不知其确切含义为何。同一天杜布切克警告捷克人“不要太自由了”，并且重申，与苏联结成同盟是捷外交政策的根本。

八月十五日到十七日杜布切克花了许多时间接待来访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十五日晚我参加了斯沃博达总统在总统府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这是布拉格最后的

一个气氛松快的夜晚。几千名赴宴的客人在总统府的几个宽敞的大厅里转来转去，斯沃博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同齐奥塞斯库等人坐在大厅的一角，亲切活跃地吃喝交谈。契尔沃年科大使单独站在另一个角落里注视着这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当时他肯定知道，入侵已是迫在眉睫。我留在宴会上很晚才走。罗马尼亚贵宾走了以后，我找到了杜布切克，当时他独自站在大厅中间，手里拿着一杯葡萄酒。我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向他建议说，世界上对他这个人物很感兴趣，他是否可以为《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谈话呢？杜布切克微笑着表示，这个想法不错，不过他说，他现在太忙了，问我能否等到党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握手告别，他很快就离开了总统府。

齐奥塞斯库八月十七日离捷返国之后，事态就如脱缰之马一般地飞快发展。杜布切克应卡达尔的紧急邀请飞往靠近匈牙利边境的科马尔诺城。这位匈牙利领导人根据事先同莫斯科打过的招呼，责备杜布切克未能履行他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作出的诺言，并且重申了勃列日涅夫提过的要求：撤销克里格尔和齐萨日的领导职务。同乌布利希五天前的表现一样，卡达尔也坚持要捷克斯洛伐克同意华沙条约的部队在捷驻留。杜布切克返回布拉格之后召集了中央主席团会议，然后又发出了一份要求大家克制的号召。

但时间已经太晚。事已决定，难以挽回了。

八月十七日夜，当杜布切克在开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时候，一架苏联民航的专机在布拉格的鲁津机场着陆，送来了一批克格勃的高级专家。他们与苏驻捷使馆接触之后，立即与他们信任的捷内务部负责国家保卫工作的官员会晤，为占领以后应采取的措施作准备。他们主要的盟友是抓秘密警察工作的内务部副部长沙尔戈维奇。内务部长帕维尔和他的年青的助手们对此阴谋自然是一无所知的。这是动手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八月十八日苏联《真理报》再度攻击布拉格领导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表示愤慨。这家报纸特别抱怨说，曾在一封要求苏军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信上签名的九十九名布拉格汽车厂工人受到处分，被降了级。要拿这件事作为发动入侵的理由未免太不象话了，可是那时《真理报》手上没有别的牌可打。经过在布拉格汽车厂核对，事实大概是这样的：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只有四十四个工人，其余的签字人是他们的家属；而且他们没有同其他工人商量就以工厂党组织的名义写了这封信。厂党委书记迅速将收集签名的那个人停职，因为他违反了纪律。

布拉格电台的一个评论员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为了争得更多的让步，我们必须再一次说不行。……未来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员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却毫无感

觉。除苏联报刊上连珠炮似的攻讦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能促使他们提醒本国政府：一场侵略即将发动。紧张局势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外交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集结重兵已近一个月，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因而很少有哪个驻苏大使感到必须对本国政府发出警报。当时在华盛顿、在西欧国家的首都或者在北约总部都看不到任何戒备的迹象。约翰逊总统在白宫注意着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大会的情况，国务卿腊斯克准备飞往芝加哥参加大会，解释外交政策的要点。苏联人的欺骗手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可是，那些外交官们却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已在八月十六日悄悄地从黑海边的休养地回到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和许多中央委员也在周末秘密溜回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在星期天（十八日）花了许多时间给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打电话，通知他们苏联领导已决定下达侵捷命令。此事必须通知他们，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也要参加干涉。

第二天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包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重要的中央委员——在克里姆林宫秘密召开，以便批准侵捷决定。随后，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发了一封信，以最强烈的语气斥责他背叛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精神，但信中没有作出即将入侵的任何暗示。这封信也许被布拉格方面认为不过是苏联再一次

表示不悦而已。那一天柯西金分到的任务是发电报给约翰逊总统，通知美方他非常乐意参加约翰逊力主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讨论越南问题和裁军问题。柯西金建议在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其实他心里有数，到那时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占领了。这是苏联领导人为了彻底瞒过世人耳目无所不用其极地搞的骗局。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看，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在布拉格，八月十九日（星期一）是一个安静的夏日。这天上午斯沃博达总统接见了六名捷克和斯洛伐克天主教的主教，讨论国家与教会合作的问题。这是一九四八年以来捷总统第一次接见一个主教代表团。

布拉格的报纸遵照杜布切克上星期六的要求，没有与苏联报刊再作争论，而只是不加评论地刊登了莫斯科最近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论。但报纸编辑中有人大概是有了某种预感。《自由言论报》在评论铁托和齐奥塞斯库访问时写道："同我们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朋友的会谈给了我们道义上的支持，这种支持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很可能是十分需要的，因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外交战线上并没有取得全部胜利"。天主教的《人民民主报》说，这两次访问对捷克斯洛伐克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下意识地怀有一种害怕在关键时刻处于孤立状态或者单独干的变态心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一九三八年我们亲身体会到那种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友谊'究竟有多大价值"。

捷通社发的一条小消息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将于星期三、四两日在波希米亚举行演习，届时将有华沙条约的观察员在场。因为五月份以来陆续不断地举行过多次演习，很少有人对这条消息加以注意。然而这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表明苏联军方已迫使捷国防部接纳华沙条约的"观察员"，并将坦克调往西德边界方向。

布拉格电台一个忧心忡忡的评论员发出警告说："当我们在进行学院式的讨论的时候，那些伪装起来的保守派却背着我们把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和新闻记者排挤出关键的工作岗位，他们就象诺沃提尼当政时那样，是关着门悄悄地干的。"评论员指的是《红色权利报》编辑部的清洗以及另外一些莫斯科派的党员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的事。

除了这些事之外，这一天是平平常常的一天。切尔尼克总理发表谈话说，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考虑向世界银行和西方公司要求贷款的消息不符合事实，但他承认，（捷）个别企业愿意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取得贷款以增加生产。重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宣布，日本厂商愿意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小型轿车。两名苏联记者令人难以置信地来捷参加将在中波希米亚的科科林举行的关于欧洲安全的夏季讨论会。内务部宣布接到各类团体申请登记的申请书八份。一次民意测验——当时民意测验在捷克斯洛伐克风行一时，谁都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表明，该国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应由管理不善负责。另一次

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认为新闻记者的威信近来提高了，百分之八的人则认为威信降低了。

那天晚上杜布切克收到了由勃列日涅夫署名的苏共中央的信，谴责捷共背弃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决定。信中并未透露苏联正打算入侵，更没有透露第二天就要动手。杜布切克当晚没有把信给自己的同志们看，第二天上午按计划要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他想那时再念这封信。

八月二十日（星期二）杜布切克头一件工作是读《红色权利报》编辑什维斯特卡的一篇长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要有共产党？”什维斯特卡神气活现地作出结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今天有了难得的良机……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兄弟党紧密合作下，党正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根据真正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建设一个自由的社会。”文章的其余部分是针对该报编辑人员指责他在捷共代表大会前夕，把《红色权利报》变成保守派的据点一事，进行冗长而令人乏味的自我辩护。

中央主席团会议于下午二时开始，比原定计划推迟了四小时。关于九月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的讨论占去了整整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然后，科尔德和英德拉——后者经常以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主席团会议——坚决要求主席团听取扬·卡什帕尔——中央书记处一个右翼官员——分析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以来政治形势的

长篇报告。杜布切克想必注意到，这两个人的提议和他装在口袋里的勃列日涅夫十九日的来信之间有某种巧合，但他也没有理由再怀疑什么。他哪里知道，按照莫斯科周密安排的计划，卡什帕尔报告之后，比拉克和英德拉就要提出一个决议草案让主席团表决通过，而那时正是苏联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英德拉，还有主席团候补委员卡佩克（他们这几个人都准确地知道苏军入侵何时开始）几天前曾向克里姆林宫保证，（主席团）将通过一项谴责“反革命”的决议，同时撤销杜布切克的领导职务。下一步就是由新当选的捷共领导和内定担任代总理的英德拉发表声明，邀请华沙条约的军队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这次政变阴谋的准备工作中，一切都有周密的安排。那天下午四时，即捷共中央主席团开会之后两小时，内务部副部长沙尔戈维奇在党中央大厦对岸的内务部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他信得过的各司、处长以及上星期六到布拉格的几名苏联克格勃特务，这些特务的头子是一个名叫维诺库罗夫的军官。这次会议的召开确切地证明，内务部长帕维尔四个月来并没有能把秘密警察中的亲苏分子清除掉。虽然他不顾克格勃驻内务部总顾问科托夫将军的反对——政府也没有能撵走这位总顾问——撤了内务部副部长兼国家保卫工作负责人克利马以及该部三、四个司长的职务，但还是无济于事。

当他不知为何让沙尔戈维奇再次当了副部长之后，整个由苏联控制的秘密警察机构就又重新改组了。

在这次特别会议上，沙尔戈维奇通知他的僚属们苏军入侵当晚即将开始，并分配了当夜执行的任务。克利马等被撤职的干部被告知，在晚间十一点钟实行紧急戒备之后即来部报到。仍在部任职的保卫干部中，负责布拉格地区国家保卫工作的博·莫尔纳尔中校接到命令：召集部下准备逮捕党的进步派领导人。由一个名叫穆欣的克格勃特务监督这一行动。该部由约·里普尔中校领导的第二司负责在入侵以后制止非法的无线电台广播，特别要注意杜布切克的中央主席团可能搞出一个反对外国干涉的声明。第二司的第七和第十三处的任务是与前文化部长、现任中央交通总局局长卡·霍夫曼配合行动。万涅克中校——他同里普尔一起协助沙尔戈维奇策划了全部行动——命令第二处派人在当天夜里看住驻布拉格的“资本主义国家使馆”以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大使馆（这是为了防止捷公民在入侵开始以后到这些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当有些内务部官员对沙尔戈维奇布置的行动是否合适表示怀疑的时候，他立即对这些人说，他是与党中央委员会协同行动的。他甚至声称他有一条与杜布切克通话的专线电话，不过要说这位党中央第一书记会发出指示，叫人家搞掉他自己，恐怕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下午六时，捷通社总社社长米·苏列克来到他离瓦

茨拉夫广场不远的办公室，带来若干份请求华沙条约派兵入侵的“宣言”和侵捷五国部长会议的声明。

除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的官员以外，布拉格在星期二知道几小时之后入侵即将开始的人一共只有四、五十人。不过，捷克人是具有很强的预感能力的。八月二十日我外出兜了一圈，感到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气味。中午在埃斯普兰纳德旅馆吃饭的时候，一位颇有地位的进步派编辑担心地说，准会发生“某种不好的事”来破坏九月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将会有人“挑衅”，甚至可能发生叛乱，他说，那时杜布切克将不得不动用警察来对付人民。我们神经紧张地分了手。

下午我回到旅馆打算写一篇东西报道一下布拉格新出现的这种悲观情绪时，听到一家美国通讯社的报道：莫斯科正在开苏共中央全会。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广播：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当我在这炎热的八月的日子里和三、四个外国同行在布拉格大街上溜达的时候，我也产生了这样的预感：就要出什么事啦。果然，那时侵略的机器已经开动，罪恶的计划很快就要实现了。

第五部分

黑夜重新来临

XⅧ

入　侵

八月二十日（星期二）晚十一时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军队从北面、东北、东面和南面分十八路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凌晨，配备有轻型坦克、装甲车和反坦克炮的空降部队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机场降落。根据一个象时钟一样准确的空运计划，巨型苏制AN—12运输机每隔一分钟在布拉格鲁津机场降落一架。指挥这次空运的是一架苏联民航机，它于二十日晚十点半从利沃夫飞抵布拉格，停在通往机库的滑行道上专等空运开始，它实际上是一台活动指挥塔。另一架并非班机的苏联民航机于二十日夜将一批穿便服的苏联军官运到布拉格，这些人是前进指挥所的军官，他们降落后立即赶往苏联大使馆去同契尔沃年科大使、克格勃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保卫工作官员协调行动。

入侵开始的时候，苏联同时采取了两项外交行动。在华盛顿，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要求在下午六点——中欧

和华盛顿有五小时的时差——约会约翰逊总统，不过，约翰逊没有能在那个时候接见他。他的使命是通知美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局部事件，它不应该被认为是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威胁。由于约翰逊未能接见多勃雷宁，美国是从美联社从布拉格拍发的一条新闻电讯中得知入侵的。在若干小时之内，美国驻西欧的指挥官们根本无法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因为俄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雷达防御体系的干扰深入西德境内很远，以至于美国军官对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两眼漆黑。

俄国人过去曾几次干扰过北约的雷达，因而对这次雷达失灵的第一个反应是：苏联又在搞一次军事演习了。后来，西方的情报人员设想，苏联是不是又发展了一种新式的、非常尖端的雷达系统，它曾如此有效地掩护了它八月二十日夜间的行动。不管怎样，北约指挥官和西方国家政府是在两个小时以后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犯的，它们得到的第一批消息是布拉格电台的广播和外国记者发出的报道。

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居然能瞒过北约，实在令人吃惊，因为北约的情报来源是很多的。几个月来，华沙条约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的部署一直处于美国间谍卫星，U—2 摄影侦察机和北约自己的雷达设施的监视之下，秘密的电子设备窃听苏联的军用电传打字电报、微波通讯和军用电台并加以破译，西方国家驻东欧各国的武

官，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德的联邦情报局的间谍都在工作。因而，北约领导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周围的军事部署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他们不可能由于情报不足而分析不出有侵捷的可能性，如果不说是很大可能性的话。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这样大量情报的接受者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充分利用这些情报作出结论。也许，苏联策略中最有价值的因素是利用了西方心理上的弱点，他们不相信苏联真会发动一场入侵。

其结果是甚至到七月底八月初北约都没有下令进入充分的战备状态。从常理推断，根据当时华沙条约的军事集结情况是有理由进入战备状态的，因为谁也不能保险地预言苏联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八月初北约部队只不过进入了一种不大有效的"戒备状态"。当入侵终于开始之后，北约的通讯网又未能有效地起作用，许多关于苏军行动的重要消息相当晚才送到负责的指挥官手里。正如英国国防大臣丹·希利事后解释的，"随着危机（指苏军侵捷——译注）在八月里的发展，北约的弱点暴露了出来——通讯失灵，不仅政府之间的通讯，而且政府和军队之间的通讯都不灵"。

与此同时，契尔沃年科大使在布拉格的第一个外交行动就是在晚上十一点钟刚过就驱车前往总统府，通知斯沃博达总统：被这位老将军尊为友邦的国家的军队已经以社会主义团结的名义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材料说明当时斯沃博达的反应如何，只知他立即前往捷

共中央大厦，而在那儿主持主席团会议的杜布切克也才刚刚听到入侵的消息。

到此时——午夜以前——为止，一切都按计划执行。华沙条约五国的军队源源开入捷境而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制订出了一个如同军事教科书上写的那样正规的作战计划，而在六月、七月的两次演习中，苏联部队和通讯兵专家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逗留长达好几个星期之久，对他有莫大的助益。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伊·格·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入侵计划的实际执行也是同样出色的。实际上，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当时没有任何人反抗或者阻止这一投入了近五十万兵力的，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攻势，一周以后巴甫洛夫斯基已将一切安排就绪——从战术核武器起一直到保加利亚的军用流动厨房为止。

在开始入侵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投入了华沙条约部队二十四个师，近二十万人，空军支援和空运部队尚不计算在内。投入这第一期行动的是十六个苏联师、三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这支小小的保加利亚军队是先由保加利亚的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敖德萨，再从敖德萨空运到东德接近捷边境的行动出发地点。进行这么复杂的调动是由于罗马尼亚坚决拒绝保军过境或飞越其领空，（一个月以后当保军要撤回本国时，齐奥塞斯库仍然坚持了这一政策），而苏联则决心要保加利亚参加这次“兄弟

国家的”行动。

但是，如果说苏联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如入无人之境的话，那它的政治力量初遇抵抗就败下阵来。星期二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苏军入侵的消息一传到捷共中央主席团，抵抗就开始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由契尔沃年科大使精心制订的可爱的方案彻底告吹了。

如同他与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和什维斯特卡事先策划的那样，主席团会议果然在讨论一项要求制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共宣传”的决议时陷入了僵局。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赞成的票数不多，无法使之强行通过。“中间派”列纳尔特和巴尔比雷克按兵不动，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杜布切克被撵下台。实际上，巴尔比雷克离开会议室很长时间，洗手，上厕所，还打了几个无关紧要的电话。这样，以杜布切克为首的进步派就坚持住了自己的立场。

这时，入侵的消息传来了。但与苏联人的料想相反，这个消息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它没有使进步派陷入被动，形势变得反倒对他们有利了。消息是切尔尼克说的（国防部长楚尔给他打了电话）。杜布切克当时的神情好象被人打了一个耳光似的。他拿出了勃列日涅夫的信，并在会上宣读了，信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入侵的暗示。他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保证，我根本没有怀疑过、没有料想到，竟然会有人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反对我们。”他两眼含着泪水继续说：“我一辈子

致力于同苏联的合作，而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这真是我一生中的最大悲剧！”

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斯沃博达来到会场以后，杜布切克下令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英德拉马上溜出了会场，驱车前往苏联大使馆。比拉克、科尔德、里戈和什维斯特卡留下，长时间阻挠这份文告的通过。可是告全国人民书还是通过了，这是对苏联的政治计划的第一个打击。文告全文如下：

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

昨天，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晚十一时许，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党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主席团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保卫我国的国界了。

根据同样理由，没有命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和工人民兵保卫国土。中央主席团认为，这一行动（指入侵）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党和民族阵线的领导干部都应坚守岗位，他们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和规章作为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组织成员的代表当选担任这些职务的。宪法授权

的有关机关已召集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会议，党中央主席团也正在召集党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应付业已形成的局势。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

布拉格电台在星期三凌晨一时二十几分开始广播这个文告，但播出时霍夫曼和沙尔戈维奇的人把中波台卡断了。电台的技术人员就利用布拉格的另一个频道继续播出，这样，全国人民就在几分钟之内知道了真实情况。文告的上半部我是在旅馆的房间里用我的收音机收到的，余下的部分是在旅馆的车库里通过有线广播听到的。苏联的计划初步受挫。捷领导集团度过了入侵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并且能与全国人民沟通情况。

苏联人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捷通社的电传打字电报员拒绝发送苏列克*留下的、声称（捷）请求华沙条约国军队入境的电稿；他们在电传机上安上测试带之后就在黑夜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布拉格电台掌握在忠于杜布切克的广播员和技术人员手中，他们当然也不会广播那篇骗人的声明。就这样，苏联人陷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处境：一方面他们在军事上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但同时又无法将他们事先编造的那一套告诉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想把自己的整个行动说成是应捷克斯洛伐克的"请求"而进行的干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

* 捷通讯社社长。——译注

得到所需要的这种“确认”，而且以后也永远没有能自圆其说。

如果照那天凌晨的文告所说，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指示捷军和公安部队对入侵不加抵抗，因为已“不可能”了，那么这不仅反映了他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且也反映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性格。首先，莫斯科之所以敢于下决心入侵，是因为它冒险地估计到，捷克斯洛伐克不会进行抵抗，虽则华沙条约国中除苏联以外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最强，人数最多——拥有现役军人二十万，装备有坦克和喷气飞机。毫无疑问，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在入侵时动用了五十万大军是准备遇到抵抗的，不过这只是军事行动中通常的预防性措施。但是，如果勃列日涅夫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将进行抵抗——如同斯大林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估计到南斯拉夫将进行抵抗那样——那么就有理由设想，克里姆林宫当时就会得出结论：为了毁灭布拉格之春而血洗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代价未免太高了，从而就会去寻求别的解决办法。

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辩解理由是：既然明知抵抗一定会失败，任何政府都无权拿人民作牺牲品。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以后和一九三九年纳粹进军布拉格时，贝奈斯总统就是这样决策的；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在一九六八年也是这样做的。一个外国人是否有权利对此作出道义上的评价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南斯拉

夫、希腊等国人民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苦战到底，形成了强大的抵抗运动。捷克斯洛伐克人没有这样做，他们的行为至少在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的眼里看来，涉及到一个敏感的荣誉问题。当然这也有从长远来看是否可行的问题。

在纳粹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决定不抵抗之后，乔·凯南对此的评论是：贝奈斯的这一决定“最重要的可能是，为完成将来艰巨的任务保存了美好的年青一代——遵守纪律的、勤劳的、身体健康的一代，如果不采取这种屈辱的、但是真正英雄主义的现实解决办法，而是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毫无希望的抵抗，那年青一代无疑将成为牺牲品”。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又作了这种“现实主义”的选择，而且进行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富有想象力的消极抵抗，它在后来的九个月当中使民族自豪感大大发扬，把苏联搞得狼狈不堪。但到了最后，这种“现实主义”变成了一种歪风，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自豪感也逐渐消逝，人民最后不得不接受真正的现实：布拉格之春已经不复存在了。历史表明，捷克人比任何别的民族更善于等待时机。可是，一个精心的观察家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想，假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捷克斯洛伐克决心抵抗的话，那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东欧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

由于本书是在苏联侵捷两年之后写的，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某种预感都出现了，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

看法：捷军队和人民是否应该同侵略者作战的问题已经退居笋二位，而全国人民反抗的政治成果却突出出来。事实是：一方面在军事上对入侵根本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连短短几天的抵抗也没有，另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苏联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诚然，布拉格之春作为一次政治和思想运动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布拉格之春的精神远没有死，苏联至今也无法解决它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个东欧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我们必然的结论是：尽管杜布切克及其拥护者们统统被赶下了台，而且制造出了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莫斯科阵营中的忠实一员的神话，苏军侵捷却是克里姆林宫在政治上的惨重失败。假如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入侵一周年的时候苏军就没有必要在布拉格剑拔弩张，再次准备动手干涉了。这一切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俄国人的力量不管多么强大，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永远不会感到安全。

因此，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夜、二十一日凌晨的入侵并不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终结，相反，它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当所谓盟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想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速胜时，这个阶段就开始了，但时刻都发现，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策划者对该国形势的理解和解释实在是糟糕透顶。事实上，从最初的时刻起事情就出了毛病，他们在捷共中央主席团的阴谋破产了，捷共和政府的领导抢先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

这一简单事实就把俄国人精心策划的要立即扶植起一个傀儡党中央和傀儡政府的计划打得粉碎。他们本来希望让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八月二十一日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听到消息说："兄弟国家"的军队应新政权的请求来到了捷境，结果人民听到的却是：国家遭到了侵略。甚至在入侵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和占领布拉格的战略目标之前，抵抗运动就已经开始了。它是自发地产生的。

正当苏联的 AN—12 巨型运输机深夜秘密地在布拉格的鲁津机场吐出一批批空降部队和轻型装甲车，从东德和波兰出发的坦克纵队隆隆驶向布拉格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涌向了黑夜笼罩的首都街头。有的人是被着陆飞机的轰鸣声从睡梦中惊醒的；有的人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们互相打电话，或者互相敲打对方的门，告诉这个可怕的消息。装满了青年人的汽车在街上飞驰而过，喇叭齐鸣，号召人们到老城广场和瓦茨拉夫广场去举行示威。这些人是后来在首都市中心对侵略者进行短期浴血战斗的先锋队。

杜布切克以及中央主席团中支持他的人继续留在党中央大厦，等待事态的变化——这又是一件出乎阴谋策划者意料之外的事，他们以为杜布切克等会急急忙忙到外国大使馆去要求政治避难。凌晨二时，强大的布拉格党组织的领导人，颇有魄力的博·西蒙冲进党中央大厦，建议立即召开原定在九月九日举行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

代表大会，组织一次总罢工，并且起草一份致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呼吁书。杜布切克同意了这些建议。西蒙及其同志们倡议的这些措施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内就扭转了局面，使俄国人处于守势。

切尔尼克在告全国人民书写好之后就离开了党中央大厦，开车到河对岸克拉罗夫区的他的办公室去。这座黄色的建筑物原来是斯特拉卡军事学院，政府主席团现在在这里办公。他的目的是召开政府会议，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正在行使职权。不料在凌晨三时前，当他正在召集部长们来开会时，苏联军队冲了进来，一排伞兵上着明晃晃的刺刀逮捕了他。其他的官员被迫脸朝墙壁排成一行，而切尔尼克被头戴深红色贝雷帽的伞兵押了出去，带上一辆装甲车，不知送到哪里去了。

至今尚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捷共中央大厦又过了一个半小时才被占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瓦·斯拉维克以及一批职务较低的党干部并没有试图离开该处。凌晨四时半左右，三辆苏联装甲车跟在一辆带着苏联大使馆牌照的黑色伏尔加轿车的后面开到了这座有绿色圆顶的建筑物前。苏联部队显然需要苏联外交官、克格勃以及亲苏的捷便衣警察来带路。随即在几分钟之内又开来了许多装甲车、几卡车伞兵，还有一队坦克，包围了党中央大厦。端着冲锋枪的士兵站在离建筑物二十码处，任何人不许出入。一批军官和便衣人员这时走上楼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

夫斯基、克里格尔和什帕切克。斯拉维克设法逃脱了，没有被捕。这四位被捕的领导人暂时由苏联军人看守在大厦里没有带走，大概是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要等待上级的指示，或者正在考虑下一步怎样走。也是在凌晨时分，两个穿便衣的捷克人，大概是秘密警察，带走了党中央书记、捷克民族议会主席切·齐萨日，将他押送到市中心巴尔托洛米耶大街的秘密警察总部。

此时，苏军坦克封锁了伏尔塔瓦河上的全部桥梁，将布拉格分割为二。一些部队包围了河左岸的总统府和离总统府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外交部。在布贝内奇区的苏联大使馆内建起了一座军营。在河的右岸，苏联部队和坦克陆续包围了党中央大厦、国民议会、位于高尔基广场的布拉格电视台、报刊和杂志的编辑部、捷通社、作家协会和记者协会总部，到上午较晚的时候也包围了科学院。占领格局清楚地表明，占领布拉格的首批目标是控制政治中心和思想中心，可是过去不知说过多少遍，今后还要继续说什么，有必要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免遭“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哩！

入侵部队所有的坦克和车辆都涂上一条很宽的白带，以便与捷军使用的、同一型号的苏制装备相区别。

到了天将破晓的时候，苏联人已经控制了布拉格全城，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这就是布拉格电台。早晨四时三十分，布拉格电台从它设在离瓦茨拉夫大街不远的维诺赫拉德大街的主要播音室恢复了播音。不顾布拉格

和全国已被占领这一客观现实，布拉格电台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工具镇定地工作着。它反复广播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人民书，还源源不断地播送一些最新情况报导。这种情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眼看着自己处于侵略军的坦克包围之中，却能听到广播，不久也看到电视，它们声讨入侵部队的占领，并且井井有条地组织反抗。电台和电视台的技术人员迅速修复了播出设备，而且奇怪的是，苏联人和捷奸都没有能使这些自由的声音沉寂下来。捷克人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就证明了，甚至苏联的坦克也吓不倒他们。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这段事迹，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反映出了苏联侵捷在政治上的失败是何等惨重。

因为布拉格被分割为二，我们新闻记者也只好分头活动。在早晨四时左右，在桥上断绝交通之前几分钟，我开车从设在阿尔克隆旅馆的《纽约时报》办事处前往伏尔塔瓦河左岸的美国大使馆，同车去的还有我的捷语秘书兼译员基·沃列尼科娃。在此之前，我用阿尔克隆旅馆的电传打字电报给《纽约时报》驻伦敦办事处发了一条几百字的关于入侵的消息，但我担心俄国人会切断这条电传线路。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早在午夜就中断了。我想到，大使馆自己有一条电传打字电报线，如果别的途径都断了，我还可以用它来发报。美联社记者彼·雷哈克在阿尔克隆旅馆发出的急电使全世界知道了这次入侵事件，他也和我们同行。前一天下午刚到布拉格来进行例

行采访，收集经济情报的《纽约时报》记者克·范斯沃思仍然留在阿尔克隆旅馆，以便掌握伏尔塔瓦河右岸的情况。结果是，我们在河的两岸都留有记者，使《纽约时报》在了解局势发展的全貌方面具有了十分方便的条件。我们到大使馆时，雅·比姆大使已从他在布贝内奇区的住宅赶到使馆，使馆的工作人员正以非常高的效率顺利地工作着，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他们一直是这样工作的。比姆(后来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对我们的问题和要求十分理解并能友好地加以解决。他非常帮忙地让我们随时使用大使馆的电传打字电报——使馆同华盛顿的联系使用其他通讯手段——这才使《纽约时报》、美联社以及后来美国其他新闻单位能够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布拉格发出的新闻报导。假如不是比姆，而是我认识的一些美国驻别国的大使，他们不象比姆那样勇敢和善于独立思考，他们在这种处境下会怎样做呢？想到这里，我不禁不寒而栗。沃列尼科娃和我被安置在大使馆的接待室里，有一台收音机和打字机。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它就成了《纽约时报》的办事处。雷哈克懂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他同沃列尼科娃轮流守着收音机，他还和我轮流守着电传机。这部电传机使用起来真是得心应手极了。

那天清晨布拉格是一片混乱。苏联军队和象征性的保加利亚部队控制了全城，但他们无法与被占领的当地的人民对话。凌晨四时左右，在布拉格电台恢复播音之

前，我们在二百一十米的波段里偶然地收到了一个自称是“伏尔塔瓦电台”的很弱的广播。尽管我捷语懂得不多，但我也明显地听得出来，广播员是一个德国人，捷语的重音糟糕之极。不久我们就弄明白，“伏尔塔瓦”是“盟军司令部”设在东德的电台，它广播了入侵各国政府的声明，妄图解释它们为什么要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为了确使捷克斯洛伐克人知道有这件事，还将声明印成传单从飞机上和从坦克上撒向十分愤怒的群众。声明全文如下：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兄弟们：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向你们呼吁。

应捷克斯洛伐克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请求，我们已指示我们的武装部队前去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斗争，这些成果正日益严重地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的威胁。

我们这一行动是根据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承担的集体义务进行的，是根据要支援、巩固和保卫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和要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义务进行的。

受到帝国主义怂恿和支持的反革命分子正在夺权。夺取了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权力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捷

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二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斗争中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所创造的一切成果都加以攻击和嘲笑。

敌人煽动人民反对为社会主义献身的好干部，他们破坏了法制基础和法律秩序，肆意将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农民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迫害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忠诚的知识分子。那些践踏社会主义法律，正在准备篡夺政权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还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而这一切都是在所谓民主化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下进行的！我们相信，忠实于社会主义民主理想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不会受骗的。只有通过加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光荣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才能够得到保证。

标志着开始努力纠正过去错误的捷共一月中央全会要求达到的正是这一目标。我们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支持加强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目标。

近几个月来，巧妙地伪装起来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集中力量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钻进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的某些人掩护这些颠覆活动，从而帮助了反革命分子积蓄力量，准备最后夺权。

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举行的苏捷会谈中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总是说，他们要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击败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势力。他们还保证要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团结。

可惜，他们没有实现这些保证和诺言，这就进一步鼓励了反社会主义势力及其外国保护者加紧其敌对活动。敌

人正准备把这个国家彻底搞乱。

这些反革命分子以为，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特别是由西德复仇主义势力引起的复杂而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他们能够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但是，这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社会主义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援一个兄弟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你们的阶级兄弟已来支援你们了！

他们不是来干预你们的内务事务，而是来帮助你们打倒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消除对你们祖国的主权、独立和安全的威胁。

兄弟盟国的军队已来到你们这里，其目的是要使任何人都不能夺去你们在我们反法西斯共同斗争中获得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你们沿着光辉的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和独立的危险消除以后，这些军队就撤离你们的领土。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兄弟国家的紧密团结定将战胜敌人的阴谋。

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兄弟情谊万岁！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

写出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文件究竟是出于天真还是由于厚颜无耻和存心欺骗，这很难说。派兵入侵一个兄弟盟国，还要说什么“你们的阶级兄弟已来支援你们了”，这不管怎么说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良知和理智的侮辱。只有象契尔沃年科大使这样完全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实际的人才会错误地设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会相信这次干涉真是应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请求进行的。最后，这份呼吁书也成了苏联人不讲信用的见证。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任何一个捷共党员，不管他是多么亲苏，都没有承认请求外国干涉；不仅如此，连《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斯特卡、捷共中央主席团前任委员科尔德和皮列尔这些臭名昭著的保守派还特意公开声明，他们没有干这种“背叛”祖国的事。

颇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声明”只由五国政府签署，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出面。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多半也是党的领导人，不过，照共产党的礼宾规矩常常有必要加以区别。这个“声明”廉价地作出了两项任何神智正常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都无法相信的保证：占领军“不是来干预你们的内部事务”的（既然如此，捷克人要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呢？）；“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和独立的危险消除以后”，占领军即撤离捷克斯洛伐克。

莫斯科这样气急败坏地告诉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什么要入侵他们的祖国之后，就又编造出一番道理，以飨世

人。当然这里面写的无非是一路货色，但倒也不妨把它抄录下来，让人们再品尝一下，俄国人干出的整个这一勾当的与众不同的特异风味。这次是以塔斯社声明的形式出现，由伏尔塔瓦电台在凌晨五时二十五分广播的。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人也能知道他们是怎样向世界各国说明这件事的：

塔斯社受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因为同外国仇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相勾结的反革命势力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

这一决定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中规定的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这一决定也完全符合我们这些国家为保卫欧洲和平，反对那些曾经不止一次把欧洲人民拖入战争的军国主义、侵略和复仇主义势力而进行的斗争的切身利益。

苏联部队和其他盟国的部队已于八月二十一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一旦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安全的威胁被消除，该国合法当局认为这些部队留驻该国已无必要，这些部队即将迅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目前正在采取的行动不是针对任何别的国家的，而是服务于和平目的，是出之于对于维护和平的关心。

我们各兄弟国家依靠相互之间牢不可破的团结来反对任何外来威胁。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一根毫毛。

这份东西在一定意义上说比五国"声明"诚实一些，它还增添了两点新内容。第一，塔斯社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着重点是原有的），这一点五国声明没有承认。在这里莫斯科没有那么强调他们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是出于似乎是"无私"的愿望。第二，塔斯社声明业已包含了几个星期以后被人们称之为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的实质内容，它说：实行入侵的决定，符合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

既然对侵捷之举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作出了尽可能完善的解释，苏联的政治军事领导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他们实力控制下的布拉格究竟应该怎么办。入侵这一天刚一开始，莫斯科的头头们已经遭受到两个重大的失败。

第一个失败是："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很快就以准确无误的明确方式表明，他们对华沙条约的军队前来"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丝毫不感兴趣。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利贝雷茨、科

希策等几十个城市的大街上，市民们向苏军坦克和伞兵吐唾沫，扔脏东西，辱骂他们，而且在第一天的早晨还在好几处放火烧了装甲车。苏联士兵原来听他们的指挥官说，他们是去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反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现在看到市民们的这样强烈的反应，感到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年青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近坦克，把石油倒在破布碎棉上点燃后塞进坦克的排气管，几十辆T—55型和崭新的T—66型坦克就这样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广场上和大街上熊熊起火，发生爆炸。当他们不能这样攻击坦克时，他们就在坦克上画希特勒的卐字。俄国人吓坏了，以为这会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他们开枪进行了还击，有时是出于自卫，有时是无缘无故的，并没有人惹他们。在凌晨的几个小时之内，有几十人被击毙，几百人负伤。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服从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的命令没有抵抗，但是人民含着愤怒和仇恨的泪水在努力战斗。

如果说，人民在大街上的反应使俄国人目瞪口呆的话，那么政治家的反应就更叫他们吃惊了。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一直宣布不了据他们说是请求干涉的领导人的名子，也无法组成一个亲莫斯科的捷共领导班子或者政府。原定计划是想让斯沃博达出面，这样来维持表面上法统的延续性，但这位老人死也不干。当时斯沃博达总统实际上是被拘留在总统府，但他坚决拒绝参与任何组织新领导班子的事。相反，他接见那些设

法进入总统府的政府部长们。一位自由派的捷共议员阿·波列德尼亚克上午九时三十分同总统打通了电话，斯沃博达在电话里说，他已经要求苏联人允许他到大街上去视察，并且前往党中央委员会。十时零七分，几十名议员在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议会紧急会议（并宣布议会要连续举行六天会议），虽然议会大厦已被苏军包围；会议通过了一份致华沙条约五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撤退入侵部队。以八十老人兹·费林格为首的议员代表团前往苏联大使馆递交了这份抗议书。

捷克斯洛伐克人并不象契尔沃年科预料的那样一触即溃，相反，他们正在武装起来进行一场政治斗争；甚至连那些原来估计会支持华沙条约干涉的人，也气愤地参加了自由派阵营。那些俄国人最信得过的朋友，在民族感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也不敢出头来代表俄国接管政权。他们只有隐藏起来，不作声，不然，他们的生命就有危险。这次夜间的突然袭击比什么都灵地使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共产党团结了起来——关于这一点莫斯科当时和以后都无法理解。

八月二十一日清早，契尔沃年科大使和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在苏联大使馆同一小撮躲避在那儿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守派——英德拉、比拉克、皮列尔、科尔德、巴尔比雷克、列纳尔特、什维斯特卡等商谈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对如何处置当时被囚禁在党中央大厦的杜布切克等人以及被关押在飞机场的切尔尼克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但这些人同意应尽最大努力当天在布拉格召开党中央委员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俄国人和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一筹莫展，事先费尽心血准备的计划搞不成了，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苏联人的第二个大失败——与第一个失败同时发生的——是布拉格电台仍然继续在播音。早晨六时广播了杜布切克个人的呼吁，号召人民照常去上班（当时杜布切克是在苏联士兵的监视下，但他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限制，因而他很可能是打电话出来的。）六时三十五分，电台播音员以平静的声调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对占领者实行消极抵抗。七点差几分的时候，布拉格电视台通过郊区的楚克雷克发射塔恢复了播出（因为在斯特拉霍夫区的主要发射塔已被苏军占领）。八时十二分，它播出了捷科学院抗议占领的声明。

在早晨七时左右苏军指挥部决定用武力夺取布拉格电台。坦克开始从瓦茨拉夫广场向维诺赫拉德大街的电台大楼移动，另一些部队从东郊也向电台进发。但当时瓦茨拉夫广场挤满了几千群众，另外大批群众正在老城广场集合。七时十五分电台广播号召老城广场的群众散开，并且拆除他们用电车和公共汽车筑起的街垒。"自我克制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女播音员以平静的语调说。接着，一个男播音员说，电台大楼的楼下已经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女播音员又说，"我们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你们不要受人挑动！……武装抵抗是行

不通的……据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的布拉格大楼前已经开始射击，那里有六辆坦克……部队使用了曳光弹，也许还使用了实弹……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时间很紧迫……瓦茨拉夫广场的群众正在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

接着是一段沉默。七时十八分布拉格电台又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请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我号召你们保持平静。"广播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

七时二十五分一队苏联坦克在布拉格电台大楼前摆开阵势。但是，怒气冲冲的年轻人在离它们几百码的瓦茨拉夫广场筑起了街垒。广播员反复说："几百名群众正在以自己的身体阻止坦克前进。"

当我和沃列尼科娃在美国大使馆收听广播的时候，在收音机里也能听到枪声，还有苏联飞机在电台上空低飞而过的轰鸣声。这时，电台播送着斯美塔那缓慢而悲哀的《摩尔道组曲》；七时三十五分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播音员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做广播记录的沃列尼科娃听到这里，热泪不禁簌簌而下。我也感动得快要落泪了——，这不是作为一名记者职业上的那种通常反应。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收

音机里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我想，一切都完了。我跑上楼去用电传打字机发了一条消息，报导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终于被迫停播了。

十分钟之后我又回到房间里，布拉格电台奇迹般的竟又重新播音了。不知怎么的，播音员还能够播音，广播线路也没有被破坏。这一次由男播音员播，他说，受苏军包围的捷外交部要求电台广播它的一项声明，声明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非法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外交部负责情报交流的人是该部外国新闻司司长卡·杜费克。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是五十年代大清洗的牺牲者。他在那天黎明时分赶到外交部，然后就综合各国通讯社的报导（外交部有一条电传打字电报专线）和国内外的广播，整理出来供部领导参考。哈耶克外长那时正在南斯拉夫休假，但代理外长瓦·普列斯科特——这个人从来就不太同情改革纲领——代行他的职务，他和他的助手们起草了这份向侵捷各国政府提出的抗议的照会。这个杜费克以后还坚持工作了好几天。

上午八时十五分，布拉格电台广播了斯沃博达总统下面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

在最近几小时里，我国出现了复杂的局势。此时此刻我无法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我以我在担任这项职务时所承担的全部责任向你们

讲话，迫切地要求你们保持理智和完全的镇静。

希望你们记住自己作为我国公民的责任，为了祖国的利益，不要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希望你们象近几天来表现的那样庄严和遵守纪律，等候我国的合法当局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这时，布拉格电台又沉默了。这一次是苏联伞兵冲进了播音室，打断了播音。这是争夺广播大楼的战斗的紧急时刻。苏联坦克在维诺赫拉德大街上疯狂射击，炮弹和机枪子弹击中了街上的建筑物和停着的汽车。另一些坦克朝瓦茨拉夫广场最高处的庄严雄伟的民族博物馆开火，撞毁设在附近的街垒。但是青年人，许多是留着长头发的小伙子和穿喇叭裤的姑娘们，赤手空拳地同坦克搏斗，他们用火炬烧毁坦克，用断树枝抽打它们。

《纽约时报》记者克·范斯沃思当时正在瓦茨拉夫广场，事后他给该报发了一条这样的消息："当苏联坦克用机枪向一辆卡车扫射几分钟之后，本记者看到四个被杀害的捷克斯洛伐克年青人，其中一个人的头给子弹打烂了。……大街上人们流着泪，大声咒骂坦克的这种暴行。一辆坦克上大火熊熊，不能行动了。在布拉格电台大楼附近的另外两辆也着了火，退走了……一个捷克青年学生看着被机枪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民族博物馆说：'甚至连德国人在大战期间都没有干过这种事！'"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但是广播并没有停止多久。

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然后，比尔森、布拉迪斯拉发等几十个电台继续进行这场战斗。这就使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有时间建立起一套令人惊异的地下广播网，它使抵抗运动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

这套地下广播网显然是在几个月之前就筹划建立起来的，虽则布拉格电台和电视台的任何人都从未承认过这一点。这套地下广播网技术上运转正常，调度灵活，领导这项工作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台长兹·赫兹拉尔和四十二岁的国家电视台台长、深孚众望的国民议会议员伊·贝利康。他们两人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和播音员转入了地下。到了中午，“合法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就开始播音了，这使苏军指挥部感到很气恼而又沮丧。广播是从布拉格十几个秘密地点播出的：有的是地下室、私人住宅、不住人的阁楼，有的广播点十分明显，近在身边，可是苏联特务就是找不到在哪儿，气得没有办法；除了这些地点之外，当然还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其他城镇。当广播人员发现可能有苏联无线电追踪队在追踪他们时，他们就转移到预先准备好的地点去。有时候播音员还告诉收听广播的人说：“我们要转移了”，播音将中断片刻。转移时有的步行，有的用出租汽车、私人汽车，还常常使用救护车，装上广播器材，播音员就化装成医生和护士。俄国人连一个秘密电台也没有查到，也从未截获到转移的广播人员。这是因为捷克人见了苏联人什么也不说。在建立地下广播网时，捷军电台和内务

部电台还帮忙出过主意，提供过设备。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有人收听到内务部的电台，它提醒比尔森的广播人员赶紧离开，因为“俄国人正在接近你们”。但过了两天之后，秘密电台就不再需要这种帮助了，布拉格、布尔诺、俄斯特拉发和布拉迪斯拉发的电视台竟然也从秘密地点恢复了播出，节目有新闻，座谈讨论，甚至还有反对占领军的讽刺小节目。

布拉格街头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青年人高举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有的还染着死难者的鲜血，在街上游行，他们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还叫：“俄国人滚回去！”在这些义愤填膺的群众面前，苏军表现了相当的克制。他们接到命令只有在自卫时才许开枪，他们服从长官交代的纪律，虽则这个概念是相对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布拉格仅仅被打死了三十个人——而不是比如说三千人的原因。那天下午两辆苏军弹药车在电台门前爆炸，造成了伤亡；还有几百人是由在苏联伞兵用冲锋枪朝天射击或朝游行群众头顶上开枪时被跳弹打伤的。当然苏联需要的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上屈服，而不是一场大屠杀。

可是，这种政治上的屈服看来是越来越难以做到了。正午十二点举行了一次两分钟的抗议罢工，布拉格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连车辆都当场停驶；在这两分钟里，这座金色的城市陷入了可怖的沉寂。随即，当广播

电台恢复播音时，人们听到了合作社、工厂、部队、文艺团体等发来的无数抗议电报，似乎捷克斯洛伐克的每一个团体、组织都提出了抗议。

捷政府的十一名成员在消费工业部长博·马哈乔娃的主持下在总统府开会，表示尽管切尔尼克总理失踪，合法政府仍然存在。十二时五十五分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它这时已成了官方的喉舌）广播了这些部长们的声明：

> 一、我们坚决拥护合法选举产生的一切宪法和政权机构，我们坚决支持捷共中央主席团今天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
>
> 二、我们认为，在未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获得它的同意的情况下而实行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占领，是非法的行动，它违反国际法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签署这个声明的人当中也有化工部长斯·拉兹尔和外贸部长瓦·瓦列什。这两个人后来都参加了苏联人扶植的政府，拉兹尔在一九六九年建立联邦以后当上了捷克共和国的总理，而且是新秩序的最热烈的支持者之一。只有经过苏军入侵之后几个月的严峻考验才能把坚持自己信仰的人同那些看风使舵、升官发财的人区分开来。而在当时，当人民反对入侵的民族激

情空前高涨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现得象天使一样高尚。

到了这时，该决定如何处置杜布切克等人了。亲苏的公安部队军官、事先了解入侵阴谋的莫尔纳日中校上午九时把十个他手下的军官和三个克格勃特务叫到他的办公室，命令他们逮捕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莫尔纳日估计内务部长帕维尔也在党中央大厦，所以也下令逮捕他。克格勃和捷秘密警察都急于想抓住帕维尔，早些时候他的五名助手已经被捕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莫尔纳日的下属对逮捕杜布切克却很不热心。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分乘五辆汽车去到苏联大使馆。一个带着自动步枪的苏军少校和另一个苏联军官负责指挥这批人，他们立即来到党中央大厦。一个克格勃特务说："你们谁是好样的？谁敢去对杜布切克说：'我以英德拉同志为首的革命政府的名义宣布：你被捕了'？"沉默了一阵之后，一个名叫霍夫曼的人表示愿意干这一差事。一共选了六个人去执行逮捕任务，他们把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三人带到了党中央书记齐萨日的办公室，那里现在成了克格勃的临时指挥部，但他们没有找到帕维尔。这时大约是上午十一时左右。被捕的三位领导人被命令举起两手，他们被搜了身。但执行逮捕任务的人似乎没有接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指示。紧接着由克格勃军官纳利瓦伊科和穆欣率领的十九辆苏联坦克也开到了党中央大厦，他们也是去执行逮捕任务的。但当他们赶到时，发现这几位自由派领

导人已经被拘留。在这以后的三个小时中又进行了匆促的协商，结果又逮捕了一批捷共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中央主席团委员什帕切克。

最后，大约在下午两点钟，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被带上一辆苏联装甲车，在重兵押送下送到鲁津机场。切尔尼克总理在天刚亮时就被押送到这里来了。可是，甚至到了这个阶段苏联人似乎还不大知道到底该怎样处置这几个被捕的人。他们被铐上手铐，用一架苏联飞机送到斯洛伐克的特里·杜比军用机场，然后再用汽车押送到离斯利亚奇矿泉疗养地不远的一个谷仓里，在苏军看守下过夜。看来这几个人是在枪托的击打下被迫行走的。在斯利亚奇的情况如何，没有人知道，因为四位领导人中谁也没有讲过他们被拘捕后的详情；但切尔尼克总理在被释放后曾对他的部长们说："当时我曾担心，我和其他三个同志的性命恐怕是难保了。"外界知道的情况只是：八月二十二日他们从斯利亚奇转移到外喀尔巴阡的城市穆卡切沃，从那儿再送到苏联的利沃夫，关进了当地的监狱。他们遭到虐待和侮辱，不许他们换衣服，饭食也十分糟糕。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打算怎样处置这几个人，这一点世人恐怕永远不会知道了。他们可能被暂时留作人质；也可能留下来打算组织一次公开审判，莫斯科可能一度有此考虑，也有可能苏联人也曾考虑要处决一大批人；但也有可能当时克里姆林宫还根本拿不定主意。

让我们回过头来讲布拉格的情况吧。对占领军的抵制和反抗不断高涨。布拉格电台开始召唤捷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赶紧到首都来开会。广播说，代表大会将在第二天，即八月二十二日，在布拉格的切卡德工厂开幕。国民议会在第一副议长约·瓦洛的主持下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释放被捕的领导人，对苏军入侵和包围议会提出抗议，敦促占领军立即撤离，并向捷全国人民建议，"如有必要，大家一定会举行一次总罢工来自卫。"

在马哈乔娃部长的主持下政府又举行了会议，下午七时秘密电台广播了这个会议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长篇声明。声明宣称，虽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它仍将"行使宪法规定的职权，保证全国的正常生活"，声明再次要求华沙条约国军队撤退，并提醒全国人民决不要容许"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下选举产生的政府之外再建立任何别的政府"。

当夜幕降临在布拉格，第一天的占领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的处境异常特殊：一方面它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监禁和绑架了捷领导人，另一方面却又无法使不屈的人民接受它的意志。苏联占领者能够做到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彻夜鸣枪放炮。布拉格和波希米亚中部的盟军司令，近卫军中将伊·维利奇科在他设在布拉格北郊特罗亚的司令部发出命令，从晚上十时至凌晨五时实行宵禁，以免首都居民遭受到"极端分子和流氓分子的

危害”。“流氓”是苏联人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儿，凡是积极反对他们的人都被叫作“流氓”。这位维利奇科将军脱离实际的程度真不亚于他的最高司令官，他居然还宣称：“我认为，电台和电视广播，日报、周刊及其他刊物的出版事宜应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这是必不可少的。”

布拉格的报刊编辑们回答了这项命令——他们秘密印刷了第二天的报纸，自由电台也回答了这项命令，它在晚上十时三十分广播了斯沃博达总统的下列文告：

亲爱的同胞们：

在这命运攸关的一天中，我第二次向你们讲话。我们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时刻。苏联军队，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一起，进入了我国领土。这一行动没有得到按照我国宪法建立的政府的同意，尽管如此，我国政府出于对祖国人民应负的责任，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应付业已出现的局面，以便使外国军队早日撤离我国。

在目前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我在这一天中为此目的努力进行了工作。白天我召开了国民议会的全体会议，晚上我同政府的一些部长们讨论了有关恢复国内正常局势的一些紧迫问题。明天我将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希望也能同切尔尼克总理商谈。我完全知道当前局势所引起的所有问题和困难。亲爱的同胞们，我再一次向你们呼吁，迫切要求

你们保持最大限度的审慎，避免发生带来无法挽回后果的令人遗憾的任何行动。我特别恳切地向我们的青年呼吁。

我号召你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行动再一次表现出你们对社会主义、自由和民主的热爱。

我们决不能倒退。党的行动纲领表达了我国全体人民至关重要的利益和需要。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完成我们业已开始的任务。我们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为了我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要跟共产党和民族阵线在一起，坚持这种团结。

这样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在虚伪的、站不住脚的借口之下，苏联及其四个盟国侵略了一个和平的欧洲国家；这种事情从一九三九年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还是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上发生。世界对此将如何反应呢？

我认为，比入侵本身更令人震惊的恰恰是世界上没有反应。苏联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可能完全估计错了——除了他们设想捷军不会受命抵抗这一点之外——但是，有一点他们估计得绝对正确，即：所谓自由世界对于侵捷之举的反应不过是假惺惺地说几句遗憾和谴责的话而已。例如，当入侵的消息传到华盛顿之后，当时正在越南打一场所谓反对共产主义的灾难性的战争的约翰逊总统能够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他倒是半夜在白宫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得到侵捷消息之后不到五小时），来研究苏军侵捷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以及

如果出现了苏军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和南部边界继续前进的紧急形势时应采取何种对策。曾经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命运有过担心，因为对这两个国家也可以按照“社会主义团结支援”的原则如法炮制，甚至也对奥地利的命运表示了担心。

首先必须说清楚，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领袖们任何时候也没有指望美国和西方国家会一起派兵来保卫他们。象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这样自己都决定不进行武装抵抗的人，当然更不会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鼓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象往常一样，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孤军作战的。苏联人的战略估计也是十分明确的：有六十万兵陷在越南战场的美国，是对付不了用最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华沙条约五十万大军的，北大西洋公约当然更不在话下了。驻在西德的美军第七军，要靠横跨大西洋的遥远运输供应线，是难以同巴甫洛夫斯基将军的依托着国内基地的部队进行较量的。

发动入侵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将近二十万华沙条约军队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其中五万人集中在布拉格及其周围；估计有三百架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空运使用的飞机还不包括在内。有理由相信，苏联将这样大的优势兵力投入捷克斯洛伐克，不仅仅是为了使捷本国人民不敢抵抗，而且也是为了让西方明白，如果要作出任何军事反应就非一败涂地不可。这件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副产品是：它向西方表明，在欧洲同苏联打一场常规战

争是无望取胜的。八月二十日夜间北大西洋公约部队的司令官对苏军侵捷完全感到意外，大吃一惊，这就证明上述论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惊奇地问，哪儿有一点象样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呢？他们看到的事实是：约翰逊总统深陷在越南战争中，而且他还醉心于同柯西金总理举行关于裁军的“最高级会谈”，因此他根本不考虑对苏联侵捷作出任何有力的政治反应。很明显，当时华盛顿和北约各国首都首先关心的问题是：侵捷事件会不会破坏西方同苏联的缓和，它们只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作为大国游戏中的一个不方便因素能够早日为人们所忘却。这当然使捷克人感到伤心（虽则并没有令他们沮丧），因而，在入侵那天布拉格出现的成千上万条标语中就有“慕尼黑＝雅尔塔”这样的标语，这就不足为怪了。这标语表达了捷克人得出的一条结论：正如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协定导致了纳粹占领捷克一样，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一九四五年的雅尔塔协定造成了一九六八年的入侵。捷克人过去和现在都确信，在雅尔塔会议上世界被分成两大势力范围，一块是苏联的，一块是美国的，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既然捷克斯洛伐克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就很难指望得到西方的同情和支持，至多不过是在报纸的几篇社论中，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几篇正式声明中流几滴同情的眼泪而已。

另外一种值得一提的捷克人的想法是：西方的政治

早已深中犬儒主义和道德败坏之毒害，它势必要影响执行政策的人。布拉格以及其他地方的不少捷克人对美国人，尤其对美国新闻记者表现非常友好，但他们常常流露出对这种道德上的“大拍卖”的谴责。弄到末了，捷克人只好耸耸肩头说：“我们早就料到情况会是这样的。”

从我个人来说，当我看到苏联坦克隆隆驶过布拉格街头的时候，我对美国人没有能对侵捷表示抗议感到深深的失望。美国人反对美国当局打越南战争——我想这是正确的——但却对苏联侵捷不予过问，这不仅是前后不一致，而且我感到是背叛了美国人高尚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多数驻布拉格的美国记者就是带着这种羞愧的心情阅读麦卡锡参议员的讲话的，这位自由主义的头面人物看来是想把苏联侵捷的问题一推了事，竟然认为约翰逊总统半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是多此一举。我们当然知道，侵捷事件正好是美国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的时候发生的，可是，这些本来颇有见解而且心地也善良的人们却对世界性的问题采取了如此片面的态度，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美国新左派中的一部分人轻易地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打发掉了，这么一来，它就同全世界左派运动的步调完全不一致了（当然，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在此列）。

对苏联侵捷最强烈、最激动的反应却来自世界各种派别的共产党人，这不免叫人惊奇。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俄国革命以后共运历史上最大的分

水岭。一小批勇敢的苏联知识分子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抗议游行，结果他们被判了长期的徒刑。他们的行动超过了美国自由主义人士在华盛顿、纽约或芝加哥所做的一切。连派部队参加侵捷的东德也有人勇敢地公开举行抗议。

西欧最大的党，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事业，意共总书记隆哥对侵捷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英国、瑞士、比利时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共产党也对侵捷加以谴责。法共这个大党当时正受着战后最严重的党内危机的震撼，以罗·加罗迪为首的进步派迫使法共中央通过了一项谴责侵略的决议。有趣的是小小的美国共产党却同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党一起支持了苏联的干涉，其实，它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呢？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谴责入侵当然是符合它们的反苏路线的。对入侵最愤怒、最真挚的反对来自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冒着有可能变成苏联下一步进攻的目标的危险的。

在布加勒斯特，齐奥塞斯库八月二十一日召开党中央全会，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生中感情最激动的一次公开演说。无数群众聚集在党中央大厦前面，向齐奥塞斯库欢呼致敬，表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严厉谴责俄国人。八月二十二日齐奥塞斯库召开了大国民议会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内称："结束业已产生的冲突的唯一途径是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的领土，并创造条件，使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能够不受任何外界干涉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在苏联侵捷前四天访问过布拉格的齐奥塞斯库严肃地告诉他本国人民，他在访捷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足以成为以社会主义名义或以任何其他名义入侵这个国家的理由。（我们不应该忘记，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国，虽则是一个拖后腿的成员国；齐奥塞斯库完全清楚，存在着苏联入侵罗马尼亚的危险，这样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克里姆林宫在共产党东欧的问题。）

在贝尔格莱德，铁托元帅也发表了谴责苏联侵捷的谈话。他也是在八月份访问过布拉格。几天之后，齐奥塞斯库和铁托举行了会谈，研究如果苏联真的下决心用武力来恢复从塔特拉山一直到亚得里亚海的广大地区内的共产主义的正统统治，罗南两国将采取何种联合防御措施。

就这样，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场民主主义革命竟要由别国的共产主义者来捍卫，而世界上的民主主义者却袖手旁观。

在布拉格，共产主义的民主思想要比人们敢于想象的情况要成功得多。八月二十一日夜至二十二日凌晨，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党代表纷纷来到首都参加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乔装打扮，带着（以惊人的速度

制造的）假证件，通过苏军的关卡，躲过克格勃控制的捷公安机构特务的追踪来到布拉格。只有斯洛伐克的党代表——除五名以外——没有能来。在那些半途折回的人当中就有古·胡萨克，当时他是政府副总理，但还不是党的上层人物。从后来了解到的关于胡萨克的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为到布拉格参加党代表大会到底作出了多大努力。

当拥护杜布切克的党代表陆续来到布拉格的时候，那些被莫斯科选中组织新政府的人也在党中央招待所"布拉格饭店"开会，企图为苏军入侵辩护，并为苏联的干涉提供一个国内政治根据。由于那些呆在苏联大使馆的亲苏派领导人的推动，二十二名捷共中央委员——他们都是些不知名的保守派——在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三、四点钟在布拉格饭店开会。据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提供华沙条约国军队进占捷克斯洛伐克以来一直所缺少的那种政治解决。

可是，这是一次在苏军坦克保护下进行得乱糟糟的会议。直到晚上，参加会议的人数才达到五十人，约占全体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在后期到会的人中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德·科尔德、瓦·比拉克和弗·巴尔比雷克，还有中央书记阿·英德拉。陪同他们来的还有一些苏联军官，这些苏联人参加了后一半会议。扬·皮列尔是单独来的，卡·麦斯特克、维·诺维（他是一九五〇年斯大林主义大清洗中第一个被捕的党干部）和米·雅克什

这些保守派高级干部也是单独来的。还有一个参加会的人是马·瓦楚利克，过去的布拉格党魁和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此人一般被认为是保守派。但就是这个人几小时之后又出现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向大会报告了布拉格饭店开会的情况；这个自由派的代表大会将他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据瓦楚利克报告，皮列尔在布拉格饭店会议上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反对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理由是开这个大会将使形势"更加严重"。但是，会议并没有取得苏联人所需要的那种进展。用瓦楚利克的话来说，"虽然有占领军的军官在场，到会的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曾有任何个人或任何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要求过华沙会议信件的签字国派武装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连英德拉、比拉克和科尔德也不愿意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苏联的打算落空了。布拉格饭店会议所能做到的事不过是发表一个公报，支持杜布切克的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中要求人民保持安静、审慎和维护秩序的那段话。苏联侵捷的意图是要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但这次会议却始终小心地提到：不允许恢复"一月中央全会以前的情况"，而且把行动纲领当作捷共今后工作的基础。会议公报遵从苏联的旨意，建议与外国军队的指挥官建立联系；会议还给各州的党组织发了电报，"号召它们与占领军合作"（这是瓦楚利克的话）。瓦

楚利克得出的结论是："会议公报承认了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占领这个现实，但却不愿考虑另一个现实，即捷全国人民对华沙条约五国的行动表现出的无比义愤和公开反对。"

当布拉格饭店会议在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凌晨一时三十分散会时，苏联的政治计划没有能前进半寸。会议既未能组成捷共新的领导班子，也未能告诉心怀疑问的全国人民，那些请求外国军队入侵的"领导人"是谁。这一行动在政治上的惨败恐怕连契尔沃年科大使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就在这天夜里，不停地同莫斯科保持电话联系的契尔沃年科和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在苏联大使馆决定采取一个更直接的行动。当时在场的有十几个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党的集体领导班子"来取代杜布切克。因为就在这么几个捷克斯洛伐克人之间也无法达成协议，俄国人就决定，在选出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前，由比拉克、英德拉和科尔德三人组成三架马车来领导。他们几个人之所以达不成协议倒不是有谁抢着要当第一把手，而是谁也不愿意出头露面作头号的"吉斯林"*。与此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工农政府"的成员名单，指定英德拉当总理来取代已被囚禁的切尔尼克。在部长名单中有象奥·帕夫洛夫斯基这样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此人在入侵前是国内贸易部长，他由于胆小

* 吉斯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侵占挪威后拼凑的傀儡政权头目。——译注

竟好几个星期不敢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上班。

这一切写在纸上看起来挺不错，或者说还过得去，但是俄国人坚持政府名单要得到斯沃博达总统的批准，他们很希望保持法统的延续性，而且也不愿意把这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老人甩在一旁。八月二十二日清晨皮列尔和契尔沃年科驱车前往总统府，通知斯沃博达捷共将由一个三人小组来领导，并要求他批准新的政府。

可是，这位老将军，身着威严的军装，根本拒绝同他们讨论形势问题。据说他当时告诉这两个人说，他认为切尔尼克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总理，有关政府的事他只能同切尔尼克商讨。当然，这次谈话没有记录——皮列尔后来根本否认那天他去过总统府——但据可靠人士称，谈话是怒气冲冲的，总统坚持不让地要求，实现契尔沃年科一再说的局势“正常化”的第一步的条件，必须是释放被囚禁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当这两位使者离开总统府的时候，局势比入侵开始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僵。那天上午我见到一位捷共中央委员（那时他正要赶去参加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他对我说，苏联人走投无路，也许会搞一个军政府。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卡达尔这种人。”当时莫斯科是否考虑过采取这一明显的下策——扶植一个军政府等于公开承认政治上彻底失败——这倒无从证实。但当时布拉格的局势更加紧张，万分沮丧的俄国人这时把注意力集中到镇压措施上。

部队占领了前一天还未遭封闭的报馆；上午八时左右一队苏联士兵开始搜查科学院的文件档案。事后有人在那儿发现了这支苏军的指挥官建议给卖力搜查的几个军官颁发奖章的报告的副本。他在报告里可没有提到，他的一些士兵曾在科学院图书馆的书上拉屎；当他被提醒出现这种情况时，他对部下说，“不文明的行为”是不允许的。到上午九、十点左右电信总局也被占领了——显然是前一天给忘了——外国记者担心，他们的对外电报联系现在会被切断。甚至连美国大使馆的电传打字电报线也是经过电信总局的。可是，奇迹似的，而且令人费解的是，俄国人始终没有干扰过电报线路。清晨时分苏联装甲车用密集的机枪火力扫射了儿童医院。十一点钟维利奇科将军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在墙上张贴标语漫画，不许举行公共集会，并且继续实行宵禁。这时的布拉格街头已变成了反苏漫画和标语的大海洋，有的幽默讽刺，有的直接辱骂。街上指示牌告诉俄国人说，莫斯科离这里一千八百英里；有一张大招贴画告诉“伊凡”说，当他在布拉格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的“娜塔莎”正在同别的男人睡觉呢。墙上，商店的橱窗和住房的玻璃窗上写满了“杜布切克—斯沃博达”的字样，贴满了他们的肖像。在民族博物馆这座巴洛克式建筑的正面墙上，前一天苏联机关枪扫射留下了累累弹痕，有人在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是俄国的文明”，“俄国留下的纪念”等字样。

当苏联操纵下的政治活动陷于瘫痪的时候，几乎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捷共自由派发动了反攻。星期三的突然袭击使他们感到震惊，不知所措；现在他们获得了新的信心，有工作得极端出色的自由电台网，有神奇的电视以及地下出版的报纸。所有这些地下报纸仍然用原来的名称，如《红色权利报》、《自由言论报》等出版，发送工作则由自愿前来的士兵、警察和学生担任。在整个布拉格，有千千万万的人自豪地佩戴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的三色佩带和第一批出现的杜布切克纪念章。

上午九时国民议会全体会议复会，到会的议员有一百六十二人（其中大多数人是睡在议会大厦里的）。议员总数为三百人，这样到会议员已达到法定人数。尽管苏联坦克和伞兵就在门口守着，议会沉着地起草并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依法选举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由共和国总统按照法律程序召集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对华沙条约五国政府和议会提出坚决抗议，并且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任何合法机构都没有受权讨论外国军队进入我国的问题……没有批准进行这种讨论，也没有邀请华沙条约五国占领军前来我国。

国民议会坚决要求华沙条约五国速派一名或数名有资格、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前来，以便对捷克斯洛伐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就业已发生的非法行动作出权威性的解释。

向占领军提出这种要求是需要有勇气的，因为到此时为止，在布拉格市内及其周围的占领军坦克已有五百辆以上（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制订出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来准确估计这一地区内苏联的兵力），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发出了中午举行一小时抗议罢工的号召，在圣瓦茨拉夫塑像的上空升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在前一天苏军杀害青年人的地方，放上了鲜花。群众高举旗帜，在苏军坦克的炮口面前游行示威。

上午十一时十八分，在布拉格维索恰尼区的切卡德工厂的礼堂里，捷共秘密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由一名三十七岁的中央委员符·卡布尔纳宣布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在决定召开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在布拉格的中心，在苏联军队的鼻子底下秘密开幕，这真是一件政治组织工作上精心掩护和巧妙安排方面令人惊叹不已的奇迹。而这次大会的召开对此后局势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会的组织者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正因为他们是直言不讳地做这件事的。秘密电台通知党代表在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十一点钟到布拉格的切卡德工厂集合。俄国人听了之后马上就认为，大会大概是在另外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另一天举行，而且完全可以肯定是在另外的地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狡猾的、拜占

庭式的思想有时会从自作聪明弄到自作自受。苏军指挥部既然认为大会不可能在电台宣布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它也就没有包围切卡德工厂，也没有对星期四早晨六点上早班的工人加以特别的注意。俄国人和秘密警察不知道，那些穿着工人服装、看起来象是工人的人其实是党代表。厂警在工人进厂门的时候照例都要检查他们的证件，当天早晨他们照常这样做，可是这些厂警也是秘密工作的参加者，这苏联人当然是不知道的。稍微有些异乎寻常的现象是几辆救护车老是进进出出，走个不停。它们的作用是将那些知名的党的领导人载来开会，这些人如果也混在上早班的工人当中进厂，难免会被人认出来，他们就装扮成病人、医生、护士、司机等乘救护车进厂。

当大会开始的时候，到会的大概有九百多名代表。另一些代表趁中午和下午工人上班的时候用同样的办法来到。到晚上九时十五分大会休会时，夏天选举的十四大一千五百四十三名代表中已有一千一百九十二名出席了大会。

为了保卫代表大会的安全，也动员了切卡德工厂的工人民兵。民兵们带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和步枪，还有他们唯一的一门反坦克炮，守卫着工厂的大门。如果苏军发觉党代会在开会，民兵就准备保卫大会。这是一件更加不寻常的事，因为由老党员组成的工人民兵一般都是反对杜布切克革新派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苏联侵捷造

成的奇迹——举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捷电视台记者和几十名党员记者也混进了工厂。此外还有一批真正的工人也接受了任务，要他们造成切卡德工厂生产特别紧张的印象。

这样迅速而又细致复杂的行动究竟谁在幕后指挥的，这谁也说不出来。不过，大会的组织者当中很可能包括博·西蒙（这位四十八岁的布拉格党组织负责人在入侵开始后不到三个小时就首先提出召开十四大的建议）和党中央书记切·齐萨日（他是星期三深夜被态度友好的公安人员释放的）。

代表大会做了几件大事。它选出了一个二十七人的扩大的中央主席团；选出了一百四十四人的新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全党对杜布切克的信任；并且通过一项决议声称，如果立即释放被俄国人囚禁的捷共领导人和立即举行关于撤退入侵外国军队的谈判这两项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采取“措施”。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表明，捷共已完全转向了进步路线。当选的委员中没有一个知名的保守派；可是大会却在胡萨克缺席的情况下将他选入了中央主席团，大概是认为他虽然迄今没有担任党内职务，却是拥护杜布切克观点的一位副总理，而且在斯洛伐克政界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当时我就知道，有一批进步派人士对胡萨克有怀疑，那天晚上我给《纽约时报》写的报导中也提到：“他一般采取自由派的立场，但有的自由派人士不信任他。”

代表大会选举一个不大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工厂经理维·希尔汗在杜布切克恢复工作以前代理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和什帕切克都再次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新当选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中还有：齐萨日、副总理奥·希克（此人已上了苏联的黑名单）、作协主席爱·戈尔德斯图克、博·西蒙、副总理佩·佐洛特卡、党校校长米·许贝尔（他是一个激烈的自由派）、地下电台负责人兹·赫兹拉尔，还有斯洛伐克人斯·萨多夫斯基（这个人后来变成了一个亲苏派的头面人物）。

最后，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给杜布切克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杜布切克同志：

今天在这里开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向你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问候。我们对你为我们党和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国的青年人手执鲜血染红的国旗在布拉格游行，反复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这充分证明你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我国主权的象征。我们对非法囚禁你以及其他几位同志表示抗议。

代表大会再次将你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继续把你当作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坚信，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一定会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也将和我们重新欢聚一堂。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内容如下：

同志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们：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建立在全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和支持的基础之上的拥有主权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它的主权却受到了侵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它被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军队占领了。

这一行动的根据被说成是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威胁，而且干涉是应一些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的请求进行的。但是，中央委员会昨天发表的告人民书、共和国总统的第二次广播讲话、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和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团的声明都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有资格的党或法定的当局曾要求过这种干涉。

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反革命事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威胁。正如全国人民对以杜布切克同志为首的党的新领导的巨大信任所表明的，我国人民和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这些行动将逐步实现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思想。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背弃自己的条约承诺和义务，它丝毫也不想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为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却遭受到占领国军队的破坏。

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同盟关系、华沙条约、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协议遭到践踏。党和国家的几位领导人被非法逮捕，同人民隔绝，不能行使他们的职权。一大批中央机关被占领。这些都是严重的不正义行为。

代表大会坚决要求立即创造条件使一切立法和行政机构能正常工作，立即释放被扣押的领导人，使他们能履行

其职务。

八月二十一日在我国形成的局势是不可能持久的。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接受一个军事占领当局，也不能容忍一个靠占领军势力扶植起来的伪政权。

当然，我们的基本要求是外国军队撤离我国。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如果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不与我国自由的国家和党领导人开始谈判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如果不让杜布切克同志及时就此问题向全国人民讲话，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劳动人民在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时举行一小时的抗议罢工。代表大会也决定，如果它的要求不能满足，它将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这时候，瓦茨拉夫广场集合了大约两万人，准备在中午的一小时罢工时举行示威大会。布拉格人民并没有等待捷共代表大会的结果。油印的传单告诉捷克人不要同侵略者有任何来往。广场上的群众就象是由红、兰、白三色组成的波涛翻滚的海洋，似乎每一个人都拿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或者戴了三色佩带。一个人拿着扩大器告诉人们，党的代表大会正在布拉格某处开会，群众听了欢呼雀跃，高唱国歌。坦克顶上的苏联坦克手感到坐立不安，有些士兵钻进了坦克，接着，炮塔就开始转动起来。

中午十二时到了，一阵鸣声响遍了布拉格。楼顶上的警报器、车站和停车场上火车头的汽笛、工厂的汽笛、小轿车和公共汽车的喇叭，还有电车的铃都响了起

来，汇合成一股高昂强大的声浪。这标志着抗议罢工开始了。接着，鸣声戛然而止。瓦茨拉夫广场数万群众席地而坐，整个一小时一动不动。到处交通中断，人们既不走动也不谈话。寂静吞没了布拉格。在这无边无际的巨大人群的大海洋中，苏联士兵显得渺小而孤单。如果说沉默能致人于死命的话，那天中午瓦茨拉夫广场上的沉默就具有这种威力。

在占领的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上完全控制在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一致拥护的进步派共产党领导人的手里。苏联政府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在布拉格的苏联领导人采取了新的步骤，危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同事态后来发展的那样，危机的这一最后阶段是最危险的阶段，它持续了充满痛苦和冲突的四个昼夜。捷克斯洛伐克人知道，苏联需要作出某种形式的决定性行动来结束当前这种滑稽可笑的局面（克里姆林宫痛苦地看到，侵捷之举正在变成众人的笑柄），他们就执意不让苏联人得逞，下定决心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抵制。近两天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是非常之多的。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正当捷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和契尔沃年科大使到总统府去会见斯沃博达总统，以明确的语言要求总统同意以英德拉为总理的政府和英德拉一

比拉克—科尔德三人组成的党中央领导。他们告诉斯沃博达说，反革命活动正在蔓延扩大，“盟军”对此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只是由于“盟军指挥部”的耐心、善意和谅解，才使占领部队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但是，时间正在消逝。抵抗必须停止。他们声称，如果到下午六时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还不接受上述建议的话，苏军指挥部别无选择，只好组成“占领军政府”，迫令斯沃博达辞职，实行军事管制。

斯沃博达总统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么做是玩很高明的边缘政策,这位老人显然断定,巴甫洛夫斯基和契尔沃年科是在进行恫吓。他对苏联和俄国人十分了解，他当然知道莫斯科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军政府。同时，他也意识到，捷人民的反俄情绪十分高涨，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流血冲突。他估计苏联不敢重演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大屠杀，因此才敢以自己的地位作赌注。还有一点，捷全国人民空前的团结一致加强了他的谈判地位，这可能比他原来估计的支持力量还要强大。因此，他告诉苏联将军和大使说，只要杜布切克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仍被囚禁，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如果这些领导人不能获释，他就不再能控制住他的人民了。此外，他还说，局势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只同巴甫洛夫斯基和契尔沃年科谈判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归根到底没有决定权。他说，迫切需要安排他同华沙条约最高领导人会晤。经过三小时无结果的谈判之后，这两个苏联使者

走了，他们告诉斯沃博达说，将向莫斯科转达他的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发出号召在下午五时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苏示威。为此，斯沃博达、政府部长们和在切卡德工厂开代表大会的党的领导人在电话中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一致的意见是：这可能是苏联人搞的一次挑衅，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次示威搞起来。捷克人不能冒流血冲突的危险，否则就会给苏联人以借口，说捷当局不能维持公共秩序。地下电台网马上广播一份号召，叫大家不要去参加这次示威。播音员反复说："这是一次挑衅行动。"尽管如此，到了将近五点钟的时候，群众还是在瓦茨拉夫广场聚集起来。年青人举着国旗乘坐卡车赶来了。俄国人又调来了一些坦克，坦克和装甲车在民族博物馆门前一个挨一个地排成一排，炮口对准大广场和密集的群众。这时，开来了一辆警车，停在街口，一个大尉用扩大器说："小伙子们，走吧！别干蠢事啦！赶快散开。干吗要给占领军制造借口呢？难道你们不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吗？"

群众勉强听从了劝告。一些学生自动站出来帮助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指挥汽车离开现场。过了一会儿，大街上就空荡荡的了。苏联坦克兵也松了一口气。一场一触即发的冲突总算避免了。捷克人简直象孩子似的互相祝贺，为人民能遵守纪律而感到高兴。

但政治斗争仍在继续。晚上九点钟比拉克、科尔德以及另外几个保守派领导人到总统府去找斯沃博达，显

然是逼他同意苏联扶植的政府。这时，陪着总统的还有他的女儿和原任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刚刚回国的女婿米·克卢萨克。我的自由派朋友对我说，克卢萨克是同情苏联的，他们担心他会对这位年迈的总统施加影响，使总统走上邪路。他们对克卢萨克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一阶段，斯沃博达并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他再一次拒绝了由英德拉组阁的想法。

在晚上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那时苏军坦克正沿着伏尔塔瓦河进行炮击），斯沃博达接到契尔沃年科的一个电话，告诉他苏联领导人准备第二天在莫斯科接见他，以便开始高级会谈。斯沃博达回话说，他将于翌晨启程。当时政府一直在总统府开会，会议由当时在布拉格的最高政府成员，副总理斯特劳加尔主持。总统告诉了斯特劳加尔关于要去莫斯科谈判的事，要求他指派两名政府成员随他前往苏联首都。斯特劳加尔立即建议派胡萨克和国防部长楚尔前去。这样，几个月之后形成的胡萨克一斯特劳加尔联盟的最初轮廓早在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就已经出现了。斯沃博达竟找到斯特劳加尔这个人头上，实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大讽刺。此外，民族阵线派博·库切拉（司法部长，一个社会党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团。在这里还可以顺便说一下那天夜里政府会议讨论中的一件趣闻：政府命令内务部副部长沙尔戈维奇——就是那个指挥秘密警察准备迎接入侵的家伙——立即向总统府军事办公室作汇报，因为“据说

在国家保安机构中已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会议公报称，这项命令是根据内务部长帕维尔的建议发布的，他“经常参加政府的工作”。帕维尔在一个秘密的隐蔽地点工作，以免被克格勃逮捕。

斯沃博达是在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后就寝的，计划上午飞往莫斯科。但早晨六点钟他打电话给他住在鹿涧别墅（总统官邸）的妻子说，他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据说背着他成立了一个政府，因此他不去莫斯科了。这天夜里在混乱中度过的几小时中发生的事，事后回顾起来，有可能是英德拉未与别人商量，就自封为政府总理。他准是认为，莫斯科会谈一举行，他就没有可能当总理了。不管此事是否确实，斯沃博达反正是给契尔沃年科打了电话，告诉他莫斯科之行取消了。这位大使急忙赶到总统府向他保证，没有背着他成立任何政府，还对他说，苏联领导人正在等着他去进行谈判。上午七时五十分斯沃博达又给妻子打电话，说他即将启程。八时四十五分，仍然是官方喉舌的秘密电台广播了斯沃博达临行前的讲话：

昨天（即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同苏联的代表讨论了如何处理由于苏联等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土而形成的局势问题，特别是如何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合法机构的职能问题。由于讨论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今天凌晨向当时在总统府的政府成员们

提出要求，请他们同意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谈判。今天早晨苏联大使表示，苏联领导人对举行这种会谈抱积极态度。

下列人員将随同我去参加会谈：胡萨克、楚尔、皮列尔、比拉克、英德拉和库切拉。事后我们将向国民议会报告此行的结果。

亲爱的公民们，我感谢你们的支持和信任，我要求你们对我下一步工作继续给予支持。我呼吁你们保持冷静和克制，并用你们的自觉态度创造有利于我们即将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的条件。我们希望，我们能从这种可能给我们祖国和我国人民带来悲剧性后果的局势中找到无损于国格的出路，并向你们保证，我们将依照党中央一月全会的精神，继续沿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民主发展的道路前进。我们希望今晚就能回国，届时将立即向宪法建立的机构，并向你们，亲爱的公民们，报告会谈情况。

虽然斯沃博达说，皮列尔、比拉克和英德拉将和他同机飞赴莫斯科，官方发言人马上就对记者们宣布，这三个保守派不是正式代表团的成员，而是他们自己和苏联大使馆要求他们去的。尽管如此，斯沃博达提到他们的名字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疑虑，怕是进行某种“交易”。上午九时二十分自由电台广播说，总统请求电台澄清如下事实：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他主动提出的，他“向全国人民保证，他没有签署成立卖国政府的建议”。斯沃博达走的时候，带了他的秘书诺瓦克，女婿克卢萨克，还有保健医生同行。上午九时三十分总统座机从鲁津机场

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是近代史上最勇敢、最令人心碎的使命的开始。

关于苏联领导人同以斯沃博达总统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进行的折磨人的莫斯科谈判，我们弄不到任何详细材料，没有人见到过任何书面记录。编年史家所能收集到的材料，不过是捷领导人回国以后在公众场合讲话时简单提到的关于谈判的戏剧性经过的几段话；几段显然不完全的私人谈话，而且是第二手材料；一些个人有失检点说出的小故事，再就是大量未经证实的谣传。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在公开场合甚至在私人谈话时从来都不肯讲述他们落到俄国人手里之后的个人遭遇，同样，参加谈判的其他捷领导人对谈判的逐日具体情况也总是缄口不言。不言而喻，苏联人更不会提供什么材料了。因此，根据各方面材料凑起来的关于为时四天的莫斯科谈判的情况缺漏很多，无法令人满意，不过，根据对当时整个局势的了解，我们可以有一定的看法，从而可以推断出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时可能发生了些什么。自然，还有当时在布拉格同时发生的事件作为背景，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情况。

斯沃博达一行是在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当地时间将近下午一点的时候到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的。苏联人想把欢迎搞得隆重热烈一些。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都

前去欢迎。军乐队演奏了两国国歌。机场和从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上悬挂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事后在莫斯科还展出了照片，放映了新闻片，人们看到斯沃博达同苏联领导人一起站在敞篷车上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还有斯沃博达同欢迎他的苏联领导人热烈拥抱的镜头。不过，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中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这种场面，因此有人怀疑，这些照片多半是用洗印特技拼凑而成的。姑不论这是否真实，看看本周前几天在捷克斯洛伐克业已发生的事情，再想想以后几天在克里姆林宫将要发生的事情，苏联人搞这种样子的欢迎，未免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他们也太厚颜无耻了。

捷克斯洛伐克人一走进克里姆林宫，一道神秘之幕就把整个谈判的过程给笼罩了起来。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斯沃博达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双方就被苏联人囚禁的四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命运问题的争论，几乎就把星期五的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全用掉了。几种最可靠的说法一致认为，斯沃博达对俄国人说，在四名捷领导人获得自由以前，他拒不谈判任何问题。入侵那天他在布拉格就采取了这种立场，现在在莫斯科他仍然顽强地坚持这一立场。据信，他对苏联领导人说：别的姑且不谈，光是前一天在布拉格秘密举行的捷共代表大会就表明了捷克斯洛伐克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拥护这些领导人。他反复说，除非将这四人释放并让他们参加谈判，否则在莫斯科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对捷全国人民具有约束力。

他预言，布拉格将发生流血反抗。

俄国人则给予反击，坚持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反革命，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必须受到惩罚。有一种说法称，勃列日涅夫主动表示愿把这四个人交给斯沃博达进行公审。据说这位患高血压症的老总统听后，勃然大怒，他满面通红地嚷道：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是依法当选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是他的同事，他不能容忍别人指责他们。

俄国人说，总要找出"一种解决办法"，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非法的"，他们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达成一项协议。斯沃博达回答说，只要他的同事还被关在监牢里，就不可能讨论任何问题。有一种报导——由于它一再发表，人们都认为它反映了确凿的事实——称，斯沃博达曾威胁说，如果不立即释放四名捷共领导人，他就在克林姆林宫自杀。一个参加谈判的人说，在谈判中有一次斯沃博达拔出了自己的手枪以表示决心。我个人倾向于相信确有此事。斯沃博达虽然面容慈祥，却是一位倔强而易动感情的人——人们有时忘记，捷克人虽然很讲实际，但归根结底还是感情冲动的斯拉夫人——而且他有很高的荣誉感。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已经关系到他的荣誉问题了。

整整一天双方僵持不下。不过斯沃博达并不知道，苏联当局已经在星期四深夜把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

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从利沃夫带到莫斯科来，放在一个秘密的羁押地点。这几个人的命运现在成了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据说勃列日涅夫在谈判中曾对斯沃博达说，如果他们愿意，苏联部队可以随时将布拉格摧毁，希望总统记住这一点；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那么在必要时它会走得更远。又需要斯沃博达再一次判断，勃列日涅夫是否在进行恫吓。肯定他认为是如此，因为他坚决顶住了。

到达莫斯科之后，斯沃博达同布拉格的一切情报联系都被切断了。捷外交部想同总统通电话，国防部想同楚尔将军联系，结果都没有成功。斯沃博达一行对当天布拉格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俄国人当然什么情况都了解，他们得到消息说，那天中午又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比前一天的总罢工更厉害，在整个一小时之内，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一切均陷于瘫痪。千百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响应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号召闭门不出，大街小巷空无一人，使苏联军队完全陷于孤立。

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抵抗形式。人民响应自由电台的号召，把全国，尤其是布拉格，变成了地理上的无人区。苏军入侵以后，人民立即把各处路标都弄掉了或者倒转过来，使占领军的行动陷入混乱。苏联、波兰、东德的部队多次走错了地方，他们的后勤计划给搞得一团糟。例如，有一支波兰坦克部队在乡下转了几个钟头，最后还兜回到波兰领土上去了。城市和乡镇的政府

和居民拒绝卖食物和饮料给疲惫不堪，又渴又饿的外国兵，到处都这样，甚至连水也不给他们。在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当一个苏联部队的指挥官抱怨捷克人民对他们不友好的时候，这个镇的镇长对他说："水你们是能够弄到的，但你们却得不到友谊。"

这时自由电台在布拉格发动了一场"街道无名化"运动，叫市民们把街名牌甚至门牌都去掉或者涂上漆。广播员说："邮递员找得到你们家，俄国人找不到你们家"（许多人害怕克格勃逮捕）。人们还提醒送报的人不要让报刊订户单落到别人手里。到了星期五晚上，任何一条街上都找不到街名牌了，有的被弄掉了，有的喷上或涂上了漆，还有的换成了"杜布切克大街"或"斯沃博达广场"。连久居布拉格的老住户也为找地址发愁。在夜间实行宵禁的时候，苏军向那些挪街名牌的年青人开枪，但这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天下午，苏联哨兵和坦克兵拚命搜寻布拉格地图。他们拦截外国旅游者的汽车要地图。忠于苏联的捷秘密警察被派到担任巡逻的苏军坦克或装甲车队去带路。一个苏联坦克兵大尉无可奈何地说："我接到命令把部队带到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街上去，可是谁也不告诉我，这条街在哪儿"。

斯沃博达总统在莫斯科的顽强不屈和捷国内抵抗运动的日益高涨终于产生了效果。星期五晚上莫斯科发布了一条消息，宣布苏捷会谈（斯沃博达原来希望在当天结束）没有结束，将再继续一天。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听到的关于克里姆林宫会谈的唯一的一句话。午夜，两国代表团再次会谈。捷方发言的只有斯沃博达、胡萨克和楚尔，对那三个保守派斯沃博达和俄国人都不予理睬。又是一场具有爆炸性的谈判。可是，勃列日涅夫突然宣布说：为了苏捷友谊，苏联政府决定释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四人，并让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参加会谈。斯沃博达问，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四人回到布拉格之后能够继续行使其职权？勃列日涅夫不高兴地回答说，是的，他认为是这样。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凌晨四时至五时之间，四位领导人被带到克里姆林宫。据说他们当时已疲惫到难以形容的程度，身上很脏，衣服也给撕破了。斯沃博达含着热泪，热情地拥抱了他们。他们同躲在后面的比拉克、英德拉、皮列尔等三个保守派连招呼也没有打。

斯沃博达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很可能是他拯救了他四个同志的性命。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被苏联当局逮捕之后，又在他们的同事的压力下获释，并回到谈判者的地位，同原来关押他们的人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这样的事从来不曾有过。不管勃列日涅夫说什么这是为了友谊，这明显的是（苏联的）一次失败，双方都清楚这一点。可是当时再不打破僵局是不行了，因而斯沃博达才能如愿以偿。上午六时二十分，布拉格电台报导了胡萨克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称："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

同志……也参加了谈判。”

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大大松了一口气，到处洋溢着一种胜利情绪。人们一致认为，捷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所表达的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迫使俄国人释放了捷领导人。斯沃博达的英雄形象在他的同胞心目中显得更加高大了。唯一使他们担心的事，是胡萨克在电话中没有提到克里格尔博士。但不久人们获悉，他也已被释放，但勃列日涅夫坚决拒绝让他参加谈判。这是个个人恩怨问题：勃列日涅夫在切尔纳会谈中曾骂克里格尔是“一个肮脏的加里西亚犹太人”。

不过，四位领导人的获释仅仅是真正谈判的开始。赢了第一分之后，斯沃博达不得不面对俄国人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在十六点要求中最基本的一点是：要使苏军入侵实际上合法化，使苏军永久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俄国人一直把它叫作“暂时”驻扎），此外还有一长串的政治措施，用以压制改革运动，加强捷共保守派的势力，撤掉一批莫斯科特别讨厌的捷领导人的职务。勃列日涅夫也坚持必须宣布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非法，一切无效。这是一块政治试金石；显然，俄国人不能同一个如此直言不讳地谴责过他们的党的领导班子共同生存的。

这时，在布拉格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由唯一在布拉格的副总理卢·斯特劳加尔主持的捷政府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撤销捷公安部门中俄国主要的代理人沙尔戈维奇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政府下令对他的活动——

可能指的是他八月二十日为配合苏军入侵进行的准备工作——进行调查，并宣布他的一切决定无效。沙尔戈维奇和克格勃在入侵那天千方百计想要逮捕的内务部长帕维尔亲自出马掌管秘密警察，并且将那个下令逮捕杜布切克的布拉格州的公安工作负责人�尔纳日撤了职。凡是参与过入侵准备工作的公安部门的官员统统都被他撤了职。他宣称："我命令国家公安机构的正副指挥员们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和党的行动纲领正常地履行其职责，以便根据一月中央全会以后的发展方向恢复内务部各部门的良好声誉。"在入侵那天夜间被捕的忠实于帕维尔的官员都恢复了自由。

布拉格的星期六是气氛紧张的一天。一名妇女在克拉罗夫区政府大厦对面的一个电车站下车的时候，被坦克开火打死了，整天都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上午十时左右举行的十五分钟的罢工发展成为一次小规模的反苏示威。维利奇科将军发布了一项新的戒严令，内称："一批苏军官兵被杀害，坦克起火……为了制止挑衅活动，我已命令部队指挥官对那些企图袭击盟军官兵的人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天一黑苏军哨兵就对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开枪射击，数人被打死，两名部长的汽车遭到枪击。

整整一天没有得到莫斯科来的消息，只有胡萨克第二次打回电话说，谈判在继续。人们又担起心来。但到了晚上十时四十五分布拉格电台广播了斯沃博达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捷同志们和全体同志的衷心问候。我在出发以前曾对你们说，我一定能在当晚回来，广播会告诉你们结果……你们都知道，在这困难的时刻，如果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我是在一个特定……在……多年的……到达克里姆林宫之后，我们立即同苏联领导人开始会谈。我们认为，斯沃博达、胡萨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同志……参加谈判，这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同志已经和我们一起在为了一个谈判作准备。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延长在莫斯科逗留时间的原因。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斯沃博达、胡萨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在这里的其他同志的名义……请求你们保持冷静明智和自制……工厂，在田野，在一切工作岗位上，请继续做好你们的工作吧！你们这种……态度将是对我们下一步谈判的最好支持。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莫斯科继续进行首脑级的会谈，苏军和华约部队在布拉格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增加压力。前天夜里，苏军进占了政府的几个部，把那里的民兵缴了械。政府在当日上午发表公报说，“占领军指挥官提出了一个针对斯沃博达总统的行为、关于不侵犯文物建筑物和保护政府机关工作的声明”。公报继续称，“鉴于占领军的这些行径，政府已指示外交部就……

领军对人民的态度向有关各国政府提出抗议”。它这么做是为了要让全世界看到，好象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个主权国家似的。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这个大胆的文件是由副总理卢·斯特劳加尔签署的。这个人对苏联和占领的态度后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到一九七〇年初他竟领导了一个完全屈从于莫斯科的政府。星期天上午十点或十一点左右斯特劳加尔又签署了一封由政府、党中央主席团和国民议会联名写给斯沃博达的信（希尔汗代表党中央主席团，瓦洛代表国民议会签署）。这封长信指出，斯沃博达离开布拉格之后可能就得不到关于捷国内局势的消息了，信中告诉他说：“我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非法的、没有宪法根据的、毫无道理的占领，要求占领军撤退。”

考虑到斯沃博达一行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条件，这封信告知总统：“苏军已经两次试图占领外交部的发报台，这个电台是我们同驻外使领馆以及同您联系的唯一渠道。”

信中接着说：

“占领军机构至今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合作。这使他们变得更加紧张不安。国民议会及我国其他机构掌握了他们使用暴力的证据。我们强调指出，我们同在莫斯科以您为首的代表团之间不能就莫斯科谈判的内容交流情况，这

种现象是不正常的。……

占领军和我国人民都心力日益衰惫，精神日趋紧张，这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双方的紧张心理由于您和我国其他官员在国外逗留时间的意外的延长而更为加剧了。……让你们能更充分和准确地了解局势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你们进行下一步谈判所必备的先决条件。

因此我们建议，由党中央、国民议会和政府代表组成一个特别顾问组来向你们汇报情况，您可就他们去莫斯科一事提出紧急要求。我们还提出一个建议供你们考虑：谈判应暂时中断，休会一个短时期，您同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三同志返回布拉格一趟。

对于从布拉格派顾问组去向他汇报情况或者他和杜布切克回国一趟的建议，斯沃博达没有直接回答。可能是他无法作答。但几名捷共政治家——他们各自代表党内的进步派和保守派——在星期日下午启程前往莫斯科。保守派有弗·巴尔比雷克、埃·里戈、奥·什维斯特卡（以上三人都是前中央主席团委员）、强硬的前中央监委主席米·雅克什，还有曾任过总理的列纳尔特，他们到达莫斯科加强了亲苏派的力量。杜布切克集团则增加了兹·姆林纳日和布拉格的博·西蒙两人。原在莫斯科的捷驻苏大使弗·考茨基（他是一个老斯大林主义者）也参加了顾问组。现在，不算克里格尔，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领导人谈判的捷方人员已达十八人。这显然不是一个意见一致的代表团，也不是一个能协调工作的代表

团。已占多数的保守派抱成团儿，自己商量，有时也同俄国人商量。除了通过斯沃博达和胡萨克之外，他们实际上同进步派没有接触。谈判的重担落在斯沃博达、胡萨克、切尔尼克和杜布切克肩上，这是一项艰苦费力的任务。苏联代表团拒绝同意在谈判时作记录，因而捷克斯洛伐克人几乎是偷偷做一些笔记的。

既然布拉格的代表团都已经坐在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桌的对面了，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谈话就很强硬，要求对方完全投降。苏军要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直至“局势正常化”；可是谁也没有给“正常化”下个定义。（这个词将长期折磨捷克斯洛伐克。）书报检查要恢复。改革要取消。莫斯科思想上看不惯的人要撤职；勃列日涅夫提到的有：外长哈耶克（他当时正在纽约想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副总理希克、内务部长帕维尔、齐萨日、另外还有几个自由派。

下面就是俄国人星期日向斯沃博达总统提出的要求。这十六点从来没有公布过，但捷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几天之后，我从一个捷共高级干部手中弄到了要求的清单，我们把它发表在九月八日的《纽约时报》上。

1、按照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来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的政治发展方向。

2、宣布（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

3、通过书报检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

4、捷方宣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过反革命

活动。

5、群众性的舆论工具不得进行反盟国宣传。

6、在军队撤离时，其他小组（指苏联秘密警察机构）也将离开。

7、要求解除约·帕维尔内务部长的职务，因为他不愿同苏联的保安机关合作。

8、可以由（华沙条约）五国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决定，（对入侵造成的损失）哪些应予赔偿，哪些不予赔偿。

9、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必须根据布拉迪斯拉发协议加以调整。

10、捷克斯洛伐克将发表一个文件，申明捷政府过去没有要求、今后也不要求联合国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11、部长安排问题：撤销奥·希克和伊·哈耶克教授的（部长）职务。

12、发表一项声明，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在同西德接壤的边界线上防御力量不足，必须由盟国保证其安全。

13、莫斯科谈判的结果应严格保密，不得公布。

14、应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友谊和同盟关系。

15、发表一项声明，保证为苏联工作过的人……不会受到迫害。

16、宣布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的声明将在外国军队撤离该国之后发表。

俄国人坚持莫斯科协议要以上述各点为基础。斯沃博达及其同事们认识到捷克斯洛伐克不得不作出重大的让步，但他们决心在几个基本点上要坚持不让。整个星期日和星期一就花费在这上面。坚持的结果，斯沃博达取得了一点进展，就是在草拟的联合声明中不提“反革命”这个字眼。在这个问题上谈判几次濒于破裂。最后，俄国人让了步。然后，斯沃博达又向勃列日涅夫争到了一项协议——这就是第十六点——即只有等到外国占领军撤离之后，才能正式宣布捷共十四大无效。第六点，即苏联秘密警察机构与部队同时撤退的问题，也是斯沃博达坚持的结果。捷方坚持要赔偿入侵造成的损失，但莫斯科所能同意的只是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一问题。

在其余各点上捷克斯洛伐克人都投降了。他们同意在“局势正常化”以前苏军留驻捷境，承认同西德接壤的边界上防御力量不足。他们同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推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他们也同意对政府进行清洗。

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条件是被轻而易举地接受的。斯沃博达、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对于看起来是妥协性的东西总是寸步不让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沃博达一派人当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发展起来了。代表这种倾向的是胡萨克，他越来越起劲地劝说斯沃博达

等人要“理智”些；另一个代表是切尔尼克总理，这是更加令人惊奇的事。他也被苏联人囚禁和虐待过，但他大概是考虑到，如果他们采取“现实主义的”、随和的态度，那么他自己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能够有出路。斯沃博达在他的女婿克卢萨克的压力下也逐步朝这个方向转。杜布切克听了胡萨克和切尔尼克的劝说似乎也觉得有些道理。结果使斯姆尔科夫斯基陷于孤立。最后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论据摆在他的前面：苏联的威力。对方冷冷地告诉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说，如果不能照苏方提出的总方针达成协议，那么布拉格就可能——或者说将要遭到进攻。对方还把苏军在布拉格周围兵力部署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详情告诉了捷方。

根据跟踪占领军行动的西方国家武官和新闻记者估计，八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布拉格至少被装备有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箭发射器的三个苏联师包围着。他们用的是苏制飞毛腿火箭，相当于美军“诚实的约翰”战术导弹。飞毛腿火箭射程约一百英里，可携带核弹头或高爆炸力的常规弹头。我们不知道，布拉格周围苏军的飞毛腿火箭是否带核弹头。我们那些在城市周围偷看苏联兵力部署的人，无法深入到火箭武器群中去查看，发射核弹头所需的燃料设施是否同火箭活动发射器部署在一起。但我们估计，在这类行动中苏联指挥官是希望拥有核武器的。

我们的材料进一步表明，从斯沃博达总统飞往莫斯

料的那天（星期五）上午到星期日中午止，苏军在布拉格内外的兵力由四万人增加到七万人。我们统计，在布拉格周围半径二十英里的地区内部署了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再加上几个支援的炮兵营和后勤部队。炮兵装备的是用伪装网伪装的155毫米榴弹炮和160毫米迫击炮。市郊的另一些炮兵连则拥有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从这些大炮的方位角度来看，它们可以把炮弹直接打到布拉格市中心。在布拉格近郊区——包括鲁津机场和北郊的特罗亚军营——布置了至少有一个师的兵力。至少有五百辆坦克部署在布拉格市内和市郊，装甲车营和装甲运兵车还不计在内。此外还有几个伞兵营和正规步兵营。

在布拉格市内，有八十辆坦克驻在伏尔塔瓦河左岸的伏契克公园里。在紧挨着内务部的列特纳公园里有五十多辆坦克。此外在河的左岸还有一些较小的坦克部队分驻在总统府、外交部、什特法尼克步兵兵营和布贝内奇区的苏联大使馆附近。五十多辆坦克停在靠近国防部的一个大广场和通往这个广场的大街上。在伏尔塔瓦河的右岸，三、四十辆坦克停在通往老城广场的德劳哈大街上。四十辆坦克停在火车站（捷克人至今还叫它威尔逊车站）对面的公园里。二、三十辆坦克占据着瓦茨拉夫广场。此外可能还有一百五十多辆坦克分布在河右岸地区，监视着政府各个部、报纸编辑部、捷共中央大厦、市中心的各个广场、交叉路口和伏尔塔瓦河上的桥

梁。

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在纵深方面还受到分布在捷全国的华沙条约国的其他军队的支援，他们的兵力，据我们星期日估计，约有二十万人。到了第二个星期的中间，占领军的总兵力已接近六十万人。令人奇怪的是，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总部却始终坚持，入侵军队从未超过二十五万人。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北大西洋公约国家驻布拉格的武官们一致认为，占领军肯定超过五十万人，他们也是这样向本国国防部报告的。最后，布拉格的专家们的一致看法是：北约是在故意缩小入侵军队的总兵力，以便掩盖它的情报官员的窘困处境，因为他们对苏联发动入侵毫无所知，大吃一惊。这是一种危险的自欺欺人的把戏。当我在十月末访问北约总部的时候，竟受到美国军队和情报机关的高级官员的斥责，因为我坚持侵捷的华沙条约国军队至少有五十万人。他们说，他们得到的情报表明，我把总兵力夸大了一倍。他们的估计为什么同北约国家驻布拉格的武官们所计算的数字相差这么大，我找不到可以令人满意的解释。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证明北约和美国军事专家是如何错误地估计了华沙条约侵捷的兵力：负责系统分析的前美国国防部长助理A·C·恩索文十一月初正式收回了他在苏军侵捷后立即写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说：在苏军对捷干涉之后，“对北大西洋公约中部地区的短期或长期威胁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到了十一月恩索文写

道，对北约的“真正威胁——包括华约可以动用的兵力和它对北约地区使用武力的心理倾向——已经大为增加了”。在写给一位美国参议员的信中，他要求把他早先的估计取消，“以免这一错误长期流传”。

但在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述争论和考虑对于布拉格的居民和在莫斯科谈判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来说都未免太不切合实际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一天是整个危机中最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如果斯沃博达等人顽固坚持己见，苏联领导人并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使用武力，苏军指挥官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种是使用在布拉格的装甲部队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战术和恐怖行动，如采用近距离炮击，摧毁一些建筑物等。另一种办法是将部队撤出市区，使用部署在周围的炮兵轰击该市，使用的借口可以是：武装的“反革命分子”正在威胁要进行暴动等等。有人相信，当时苏联人确曾考虑采取惩罚性的军事行动来对斯沃博达等谈判代表施加压力，打垮他们的抵抗。在莫斯科谈判期间苏联急速增加在布拉格地区的兵力这一事实，支持了上述说法。

捷代表团签署莫斯科协定返回布拉格之后，在斯沃博达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发表的讲话中也清楚地表明，当时布拉格确有遭到武装进攻的危险。八月二十七日下午斯沃博达将军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时说：“近几天来我国局势的发展每时每刻都有导致最大悲剧的危险。我是一个军人，我知道，如果平民和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

发生冲突，会出现一场什么样的流血牺牲。因此，作为你们的总统，我认为我的职责是竭尽全力防止这一惨剧的发生，不使世代友好的两国人民无谓流血。”

斯姆尔科夫斯基八月二十九日的讲话是这样说的：

> 我们在莫斯科的谈判具有不寻常的性质……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到，在这种情况下作决定是极成问题的。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占领着我国，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同国内的联系受到了限制；我们只能得到很少的消息，甚至得不到任何消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对我国人民坚定态度的信任，而不是根据对局势的任何实际了解来判断问题。不过，对谈判对方的态度，我们倒是了解得比较准确，我们也猜测到，外国干涉军可能在政治上碰到了某些困难……
>
> 我们本来也可以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从而把局势弄到外国军队永远留在我国的地步，并且承担这种局势给我国的主权、政治权利和经济带来的全部后果以及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发展下去可能给更多人的身家性命造成的损失。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当时并没有忘记，到了某种关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坚决拒绝一切屈辱的解决办法，宁可敞开胸膛去对明晃晃的刺刀，也不能辱没我们祖国的荣誉和丧失国体……
>
> 但是，我们的考虑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整整考虑了一天一夜，我们意识到，目前这样的解决办法也许能为我国人民和历史认可，但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背叛……我请你们相信，我们并没有沉默，而是进行了尖锐的、反复

的斗争——既同我们谈判的对手争，也在我们之间争——我们使用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论据。

我们也是在占领我国的坦克和飞机的阴影下进行谈判和决定问题的。”

可是，布拉格的这个星期天是非常平静的一天，那一天阳光灿烂，市民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城市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人民简单地采取了藐视坦克和武装士兵的办法，好象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父母亲带着孩子们在阳光下散步，瞪着眼睛瞧俄国人。小伙子和姑娘们新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沿着占领军的行列来回走动，紧挨着这些大兵擦肩而过，就象沿着一排树木走动一样。年青的情人们双双对对，手拉着手，含情脉脉地秋波频送。教堂的门敞开着，人们安静地去做弥撒。查理大桥上古老的圣徒石像似乎也不愿理会那些穿着长统皮靴的苏联军官，他们举止颇不自然，互相在桥上拍照。伏尔塔瓦河上野鸭照常在游泳，几个胆大的渔夫竟然划船出去钓鱼了。

到了晚上，实行宵禁之后，照样能听到阵阵枪声。午夜前，在无人的总统府附近响起了格格的重机枪声。星期一凌晨二时美国大使馆起火了。当时在使馆的只有几个值班的外交官、一个五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分遣队、还有利用使馆的电传电报发最后消息的五、六个记者。起初，当滚滚浓烟冒出屋顶的时候，我们以为这座古老的大楼——原属奥匈帝国一家贵族的很可爱的宫殿——

是被燃烧弹打中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顶楼上的木梁和椽子被大使馆的焚化炉烤着了，因为炉子里两天两夜不停地焚烧机密文件。有一阵长长的火舌冲出了屋顶，我们以为这座房子完了。因为已经戒严，消防队来不了，比姆大使也无法从他的住宅赶来大使馆。可是，经过海军陆战队、外交官、记者、还有一个当过美国西部国有森林管理人的电影演员——他凑巧在大使馆过夜——的共同努力，火还是被扑灭了。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几个苏联士兵跑进美国大使馆的花园里摘苹果吃。两个不带武器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去到花园高处的亭子里摇晃美国星条旗。然后，大使馆的政务官马·加里森，这个年青而有才华的，凑巧又懂俄语的外交官走上花园的山坡去撵那些闯进来的不速之客。“这些苹果是属于美国的，”他说，“你们不能吃。”俄国人窘困地扔下苹果走了。

上午九时十五分举行了一次一刻钟的反苏示威。汽笛齐鸣，所有的汽车喇叭也叫起来。这似乎使俄国人害怕了，一排冲锋枪朝天齐射。在斯特拉什尼策火葬场——它的附近正是苏军的迫击炮阵地——正在为入侵后第一个被杀害的捷克青年兹·普日霍达举行葬礼。中午，政府在斯特劳加尔主持下开会，起草了一份对苏联政府的抗议书，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华沙条约国军队官兵们所采取的无法加以解释的、不能容许的行动”。这份抗议书还要

求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履行他不占据政府建筑物的诺言。国民议会仍然在开会。议会的大厦里专门辟出地方让男议员刮胡子，让女议员洗头发、吹头发。议员们已经连续开会五天了，那天晚上给他们放映了伊·门泽尔导演的影片《变幻莫测的夏天》。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了秘密会议，发表了一篇声明，内称："长期以来，人们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究竟是起传道者的作用还是起宪兵的作用捉摸不定，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正在返回屡经考验的哥萨克外交的老传统。"傍晚以前广播电台宣布，苏军将在下午六时封锁所有通往布拉格的主要公路，对违犯命令者"可能要开枪"。关于莫斯科谈判的进展情况毫无消息，气氛又紧张了起来。

但晚上八点钟以后，占领克拉罗夫区的捷政府大楼的苏军突然撤退了。一些敏锐的观察家认为，这是莫斯科谈判即将达成协议的信号。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晚，斯沃博达总统以及包括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内的十七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签署了苏捷秘密协定和告诉全世界在克里姆林宫里作出了些什么决定的公开公报。没有签字的只有弗·克里格尔，他一直未能参加谈判。捷共早期的进步派之一兹·姆林纳日——他也在这两个文件上签了字——事后说，他现在能够理解贝奈斯总统一九三八年的心情了。参加谈判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再也支持不下去的情况下接受这

个协议的，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拯救了自己的祖国，使它免于流血和毁灭。

下面是公报的内容：

会谈期间，双方在自由的同志式的讨论中，研究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活动的积极加强、近一时期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以及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等问题。

会谈双方表示坚决相信，目前形势下主要的问题是实现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作出的共同决定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规定和原则以及逐步将这次会谈达成的协议所规定的具体措施付诸实施。苏联方面表示，它理解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他们决心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和五月全会的决议，改善社会的管理方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双方就加速实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局势正常化的措施达成了协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将为达到此目的而准备立即采取的措施通知了对方。捷方代表表示，捷党和国家机构的各个部门一切活动的方针，是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发展和加强同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表达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加强友谊和兄弟情谊的一致愿望，苏联代表重申，他们愿意在互相尊重、平等、领土完整、独立和社会主义团结

的基础上进行最广泛的诚挚的合作。

暂时进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盟国军队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双方就这些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这将视该国局势正常化的状况而定。捷方表示，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已发布适当的命令，以防止可能干扰和平和公共秩序的事件或冲突发生。他也已指示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指挥机关与盟军指挥部进行联系。

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局势问题，捷方代表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要求将此问题提交安理会，并已向安理会提出要求将此问题从它的议程上撤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再次表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将决心坚决执行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有利于和平事业和国际安全的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将一如既往，坚决反对妄图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侵犯欧洲现存边界的不可触犯性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势力。双方再次表示，将毫不动摇地履行社会主义各国间多边的或双边的协议规定的义务，以便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防御力量，使防御性的华沙条约能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会谈是在诚挚的，同志般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

这篇公报——我想，它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识过的最没有人相信的文件之一——蓄意用浮夸乏味的文体，掩盖了俄国人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人作出的重大

让步和保证。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协议中的第十三点规定："莫斯科谈判的结果严格保密，不得公布。"其意图是准备将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条件逐步地、一点一点地向捷人民透露。因为连苏联都意识到，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极端爆炸性的气氛下公布事实真相，那怕是部分真相，都可能引起强烈的反应；当时两国政府都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作为一种姿态，公报含糊地提到苏联支持捷共中央一月全会和五月全会的原则。这两次中央全会温和地确定了布拉格改革派的目标；莫斯科之所以能接受一月全会决议，是因为它的提法十分不明确；而五月全会上杜布切克作出了最后的努力来提醒人们谨慎小心，实行妥协。但是莫斯科公报却引人注目地避而不提通过行动纲领的四月中央全会。

当然，公报中关键的内容是"双方就(盟国的)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这将视该国局势正常化的状况而定"。所谓"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五国军队"不干涉"该国"内政"的那段保证不过是一个语义学上的花招。自封有权进行干涉的并不是苏联军队，而是苏联本身，因此它才派军队侵捷。然而，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苏联军队又处于干涉的边沿。关于决心要"使防御性的华沙条约能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的一句露出了马脚，叫人一看就明白，执行"临时"任务的这些军队将无限期地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在莫斯科谈判以前苏联就争论说：华沙条约国

的军队必须驻在捷克斯洛伐克，以保卫捷同西德接壤的边界。

可是，说句公平话，斯沃博达还是争取到了几项对捷克斯洛伐克有利的让步，至少在相对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讲。首先，他成功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拒不承认在他的国家里发生过“反革命事件”。这不仅使布拉格将来同莫斯科打交道的时候可以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而且使杜布切克等四人有可能获得自由，恢复职务。此外，这还是克里姆林宫在宣传上和政治上的一个失败，因为它公开取消了入侵的根据，而苏联一个星期以来却向全世界大吹大擂地宣扬的正是这一点。同样，公报中也没有提到所谓“兄弟国家”的军队是应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请求而进入捷领土的这种说法。在占领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曾经大肆宣扬过这一点。当时莫斯科以为，一个捷奸政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上台掌权了。现在，这个倒霉的神话永远被埋葬了。因此，总起来看，在那种可怕的条件下进行谈判的斯沃博达干得要比人们预期的好一些。这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要比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看得更清楚。

斯沃博达在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黎明时分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演出的最后一分钟的戏中还得了一分。当捷领导人集合在机场候机室准备在凌晨二时飞往布拉格时，有人发现克里格尔没有来。斯沃博达当即询问，苏联官员说，克里格尔病了，不能和其他的人同机返国。

斯沃博达拒绝接受这种解释，他和代表团绝大部分成员一起说，克里格尔不走，他们也不走。这又是一次摊牌。苏联领导人又进行了商量，很快，大约在三点钟，克里格尔就被带到了飞机场。（他有病倒是真的。他是个糖尿病患者，而俄国人显然没有给他吃足量的胰岛素。）

当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登机回国的时候，布拉格的苏联装甲部队也开始从不少战略要点撤退。我和克莱德·范斯沃思守候了一通夜，等待斯沃博达回国——捷军事情报机关的朋友们向我们透露：已经签了一个协议，代表团即将回国。在黎明前的好几个钟头里，我们过一会儿就去向总统府眺望，看看象征斯沃博达在首都的总统旗是否升起来了。将近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听说苏军开始撤退。克莱德开车到市里转了一圈，回来报告说：伏尔塔瓦河上的桥梁已无坦克把守，装甲部队也已撤离什特法尼克的步兵兵营和一些政府机关的大楼。但布拉格其他地方的大量苏联部队并未离去。六点零几分代表团的飞机在布拉格鲁津机场着陆。只有英德拉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同他的苏联朋友在一起。人家告诉我说，他病了。但我本能地感到，这个本来希望在苏联扶植的政府里当总理的人，并不急于想回国见他的同胞。

上午八时零五分，布拉格电台——当时还是从它的秘密播音室播出，但这时已被认为是捷官方电台了——宣布，斯沃博达及其随行人员业已回到布拉格。接着，总统旗就从总统府的屋顶上升起。八时十五分电台广播了

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录音谈话。从讲话的声音可以听出，他都快给累垮了。他说："现在叫我讲话是很难的。我想通过广播电台向作出了这样巨大贡献的我国人民表示深切的敬意。我们都回来了，克里格尔也回来了。"

现在，全国人民期待着他们的领导人讲话，告诉他们在莫斯科作出了些什么有关他们命运的事。那天上午我在瓦茨拉夫广场遇见了一位熟识的捷克作家，他沮丧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又一次背着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XIX

终结与开端

当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斯姆尔科夫斯基去国民议会作为议会主席向议会作关于莫斯科协议的报告时，还不到十点钟。大群人等候着他，斯姆尔科夫斯基的黑色轿车只能很缓慢的行进。一张张焦急不安和怀有疑问的面孔窥视着轿车，人们向他挥手致意，轻轻微笑。看上去一下子老了许多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欢迎。苏联坦克在夜间已经撤离了国民议会，这座建筑物前面只留下履带压起的松土。当斯姆尔科夫斯基走进议会时，周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但在议会里面，从上星期三以来一直在举行会议的议员们只是简单地站起来默默地向他致敬。斯姆尔科夫斯基告诉他们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情况，要重新实行新闻检查，要取消各种政治组织，等等。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但消息很快就传到外边的人群中，在全城广为传播。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切尔尼克总理在赫拉德强尼城堡举行了一次内阁会议。斯沃博达出席了会议，政府通

过了实施莫斯科协议的第一批决定。杜布切克去到中央委员会向党内同事们汇报情况。下午两点四十分布拉格广播电台广播了莫斯科公报，忧郁的情绪笼罩着首都。捷克人是非常善于从字里行间领会的，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公报的含义。在全国激起了愤怒和失意的情绪。党组织和其他团体的自发性集会开始向布拉格电台发出抗议电报。广播员宣读了其中的一些，然后就呼吁安静，并通知说斯沃博达和其他领导人很快要向全国讲话。

在等候讲话期间，布拉格电台播送了全部的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命运》交响乐——它具有自豪和反抗的高尚情调。接着斯沃博达开始讲话。他开始谈到他们在莫斯科谈判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流血危险。他接着说：

> 我不想否认这几天事变所造成的痛苦创伤将长期存在……。
>
> 我们国家的地位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在，也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我同所有的同志们都回来了，这些曾被民主选出的同志们今后将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是走向我国生活正常化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很自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撤离取决于这一点。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在原则上达成了关于逐步实现完全撤军的协议。在完全撤军以前，这些部队驻扎在我国是一个政治现实。

但是斯沃博达再次向全国保证，政府将不放弃一九六八年的改革纲领，他说：

> 根据一月、四月〔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和五月捷共中央几次全会的精神，我们要象行动纲领和政府政策声明所表示的那样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加强它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性质……我们要继续把我国建设成为劳动人民的真正家园。我们决不从这一目标后退一步。我们当然也不允许那些同社会主义利益格格不入的人们加以滥用。为了这一目的，现在我们大家必须目标明确地坚决地作出努力。

总统的讲话未能消除捷克人的痛苦和失望。越来越多的抗议、决议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布拉格广播电台，它们马上就被广播了。在瓦茨拉夫广场和老城广场，年轻人聚集了起来，有人喊叫（这是）“第二次慕尼黑！”的口号。下午五点半杜布切克开始广播讲话了，他明显地处于一种精疲力尽的状态，有些话语前后不连贯，有的含糊不清，无法理解，他的声音常常中断，沉寂下来。但考虑到布拉格和全国迅速高涨的紧张气氛，他明显地感觉到，必须马上讲话以便在同胞中间寻求谅解。

> 我国人民将生活在一种其现实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意志的局势之中，正象你们现在感觉到的那样，我们在整个期间已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现实……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防

止进一步遭受苦难和损失，因为它不能改变现实条件，反而会把我国的不正常状态拖长。我们决心防止流血决不意味着，我们将要消极地屈服于业已形成的局势……苏联代表也想对我们的关系正常化作出贡献。

在今天的现实中，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前局势寻找一条出路。首先，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分阶段从我国领土上撤出五国军队的协议。因此对这件事的任何不信任都是没有根据的和有害的。这一协议、这一立场是我们今后行动的基本前提条件。我们已达成协议，马上将五国军队从乡村和城市撤到指定的地点。这当然也是同我们捷克斯洛伐克本国的机构在各个地方保证秩序和正常生活的能力相联系的。在这方面共和国政府今天已经开始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便我们的机构采取步骤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正常化。采取任何有碍于这一过程的行动，最终有碍于五国军队从我国撤离的行动，因而都是非常不慎重和危险的。我们整个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使这些军队尽快地全部撤走。在莫斯科谈判的基础上，政府已在这一方面采取了特别步骤。

我要极其严肃地指出，条件的正常化包括要求每个个人都不应无视现实而感情用事。在这一复杂时期，我们决不能听任感情摆布……这种支持将大大加强我们的力量，也将成为我们大家的责任，在这一复杂时期不放弃我们努力实现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我刚才所讲的，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我国的人民必须具有信心……我们怀着坚定决心回到工作中去创造条件以尽可能少的错误来继续实行

这一政策……忽视现实有时会走向冒险和混乱……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是尽快使我国局势巩固和正常化……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我们相信，你们将以你们的继续信任和积极参与来协助我们……我们相信，在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的程度的时候，你们会这样做的……这一现实决不能忽视。

这真是不简单，尽管他们被迫作出了一切让步，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仍然能够谈到保持布拉格之春的精神。更不简单的是——象事变表明的那样——他们说话算数。从最初开始，杜布切克就决心甚至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仍然做到保持他的尊严，他的反抗，保持他对在一九六八年短短八个月中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基础的思想的忠诚。那天下午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以为，杜布切克是出于天真或者就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安抚公众舆论。可是我对杜布切克及其人民以及他们的想象力和随机应变的才能都估计错了。

在他的人民充分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和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以前，杜布切克想暂时避免一场大的感情爆发。因此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在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同志讲话以后，有的电台曾对莫斯科谈判和为准备撤军所采取的措施散布不信任和怀疑情绪。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作法要特别提出警告。广播出煽动性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但有必要看到这种言论和进一步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所负责任之间的联系，而这种损失目前已经不小了。"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杜布切克特殊信任的一次测验：在他广播讲话之后几分钟，群众的情绪就改变了。那些整天通过和发出抗议决议的组织现在开始发出支持杜布切克的文电。“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这句在以后几天内传遍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口号，当时还没有提出来。但有一种看不见的信任感突然在这位文静而自我克制的人和数百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恢复起来了。有一种奇异的来自全民共同经验的政治魔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发挥着作用，它似乎可以说明那个在第一个星期内以及以后所发生的所有事件期间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人的团结一致。

与此同时，杜布切克将他从莫斯科谈判回来后的感情继续告诉本国人民。他在广播讲话中说：“我想很坦率地说，我们为我们目前的遭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和始终不渝地执行我们的政策。我们也必须注意不使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分子和倾向从目前复杂的局势中捞到好处。将来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一贯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这时他突然停住，沉默，延续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我想，他完全是在激动和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度过这几分钟的。然后他又缓过气来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次临时决定要讲，大部分是即席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我想你们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在家里的收音机旁，在大街上的扩音器旁

收听广播的人们泣不成声。这是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充分交融在一起的一刹那。

下午晚些时候，又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呼吁。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感谢全国人民极其良好的表现，特别称赞了广播员和新闻工作者，他们在秘密工作中保持了全民的大团结："我们也感谢报刊、广播、电视台的全体人员，他们在不可能到他们通常的工作场所去工作的情况下，在特别机构和许多公民的协助下，成功地建立起了能够进行工作的新的工作场所，在考验的关键时刻，他们传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感情。"中央委员会告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说："我们跟你们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

晚上，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杜布切克签署的一份"告捷克斯洛伐克全体人民书"说，"你们的信任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总之，在你们的信任和委托之下，我们的责任就是治理国家。如果你们要我们为你们服务，那就要创造条件让我们能够这样做。"

八月二十八日国民议会发表的一项声明表现了民族自豪感，它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能够保卫我国西部边界的"，号召政府"有条不紊地和坚决地要求规定期限，并在规定期限内尽速从我国撤走外国军队"；声明还要求，"应使一切宪法规定的、政府的和国家的机关，一切合法的报刊、广播、电视能不受干扰地自由活动并立即予以保障……同时我们还坚决要求，八月二十一日以

来所有被捷克斯洛伐克或外国机构非法拘留和监禁的我国公民应予释放。”

但切尔尼克总理，四位领导人中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通知全国，莫斯科协议已经取消了国民议会所谓的“一切合法的报刊、广播、电视……不受干扰的自由活动。”莫斯科秘密协议特别规定了，社会主义应通过新闻检查予以“加强”，于是切尔尼克就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政府已通过了一些关于报刊、电台和电视的非常措施，这是非常局势所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保政府对电台、电视和捷通社的影响。”

莫斯科协议的签字和捷领导人回到布拉格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局势。从八月二十八日国家领导人与他们的人民恢复联系之日起直到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在苏联统治下的日益冷酷的生活现实中标志着另一个里程碑）这一段时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可怕插曲。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政治力量不祥地冲突着，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办事的不拘一格和大胆想象力使苏联面临着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们从未预见到的考验与挑战。

我想，关于这一阶段要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世界上还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军事占领，由于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受罪的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而是苏联人。苏联人不得不同一个明显对立的政府和党的领导集团打交道，这

竟使整个占领在好几个月之内变成了嘲弄的对象。克里姆林宫最初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抓了起来，威胁着要把他们干掉，然后又被迫把他们放回到握有相当权力的地位上，因为没有他们而出现的真空会产生其他麻烦。俄国人就象多次证明了的那样，喜欢以黑白分明的方式想事，但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造成的局势充其量是粘灰色的。不但领导人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的行动都是油滑油滑的、鳗鱼似的、非常掣肘的。可以肯定地说，俄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刺刀是多得很，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我想是邱吉尔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你可以用刺刀干任何事情，就是你不能坐在刀尖上面。莫斯科协议签字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发展表明，“正常化”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意味着一回事，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说却意味着另一回事。

斯沃博达及其同事们还在莫斯科时，苏联人所拥有的心理和军事上的优势现在已经消失了。几天之后已经明显看出，苏联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立即进行残酷的镇压，或者暂缓稍待，看看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集团和社会中缓慢的但持续进行着的内部腐蚀过程是否可能有一天会带来入侵想要达到的结果。似乎是第一种选择——即作家协会八月称之为“屡经考验的哥萨克外交传统”——曾在苏联某些领导人的脑子里出现过。

但是苏联实际上处于政治和思想上非常脆弱的地位。当时我们大体上知道，苏联内部对处理捷克斯洛伐

克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深刻的意见分歧。据认为苏联的元帅们开始是支持入侵的，但后来向政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提出了抗议，理由是在政治局势明显地尚未为入侵准备好条件的情况下，就迫使红军进入行动。莫斯科的许多外交官相信，元帅们不大愿意作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屈从的工具，不想命令他们的部队去进行残酷屠杀。还有，据认为象米·苏斯洛夫一类的政治局委员担心镇压给国际共运的团结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入侵本身还要大。（苏斯洛夫仍然想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长期拖延的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他知道布拉格的战争会毁掉召开这种会议的一切可能性。）克里姆林宫最后选择了耐心等待的办法。布拉格微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象跳疯狂的小步舞一样，时而这里让一点，时而那里顶一下。

矛盾实际上是从俄国人自己开始的。入侵后约一个星期，克里姆林宫有人想到了——据说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助手们——东德部队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军为苏联提出了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同东德还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乌布利希的东德部队参加国外的军事行动可以被解释为违反波茨坦条约，尽管美国国务院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东德和西德均被各自的保护人重新武装了起来，但西德的军队却从未越出国境。莫斯科当时正在进行一个含义不明的外交行动，企图证明武装西德是对

联合国宪章两项条款的违犯。尽管这一短命的行动的目的尚未被弄明白，但东德军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总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入侵后一周东德军队悄悄地撤走了。

为了照顾乌布利希的面子，一位东德指挥官和几位联络官留在巴甫洛夫斯基将军的司令部里。伏尔塔瓦广播电台继续从东德进行广播——后来查明它是东柏林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发射台——占领军的报纸《消息报》，一份用很糟糕的捷克语写的粗鲁下流报纸，继续在德累斯顿出版，后来它又迁到姆拉达地方的一所捷军不用的印刷所里。（苏联心理战工作队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如果能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人读《消息报》和莫斯科的《真理报》，他们就会赞成占领的。成千上万份《真理报》每天从莫斯科不断地源源运来，由苏联的坦克手和巡逻队强塞给居民。它们成了在布拉格街道上生篝火的好材料。）

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方面来看，种种矛盾层出不穷。八月二十八日切尔尼克总理建立起一种自愿的新闻检查制度——在涉及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华沙条约国军队时原则上禁止使用“占领”一词，禁止对“外国军队”进行攻击——但与此同时他又解除了捷新社社长米·苏列克的职务，任命英·苏克来接替他。苏列克原是入侵阴谋集团的一个成员，他负责通过捷通社电台发出捷领导人要求入侵的“请求”，只是由于下属的怠工，他才没有能完成这一任务。几天前捷共主席团解除了莫斯科协议签字人什维斯特卡《红色权利报》编辑的职务，代替

他的是温和进步派伊·塞克拉，而塞克拉又任用了被什维斯特卡赶走的两名副编辑。内务部长帕维尔，在副总理斯特劳加尔的同意下，当斯沃博达还在莫斯科谈判的时候就解除了阴谋集团的又一个成员沙尔戈维奇上校秘密警察头子的职务。沙尔戈维奇回到了斯洛伐克家乡，以后又令人难以想象地出任捷驻布达佩斯领事，最后当了比尔森党组织的头头。另一个内务部副部长扬·扎鲁巴自杀。德·科尔德被放逐到索非亚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经济参赞。他的摩拉维亚选民罢免了他的国民议会议员的资格。这简直有点难以置信，莫斯科协议前后被清洗的人是亲苏的高级官员，他们为杜布切克的自由派分子所代替。

也是在八月二十八日一种有趣的政治局势正在布拉迪斯拉发展开，它后来导致了重大的后果。在那里斯洛伐克共产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声名狼藉的亲苏派领导人瓦·比拉克丢掉了第一书记职务。代替他的是切尔尼克政府的副总理、指定陪同斯沃博达去莫斯科的两位政府正式代表之一的古斯塔夫·胡萨克。这一选择标志着胡萨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晋升的正式开端。

除了几个具有特别锐敏眼光的布拉格自由派之外，人们普遍把胡萨克看作是一个进步分子。他在诺沃提尼统治下坐了八年牢，人们还记得，在一月份敦促那时仍犹豫不决的杜布切克领导集团起来执行更迅速的改革政策的第一批人当中就有他。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斯洛伐克

民族主义者，据认为这使得莫斯科和正统派共产党人对他感到讨厌。由于他的明显的爱国热情和自由主义，第十四次秘密党代表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当选为斯洛伐克党的首脑之后，胡萨克就作了一件十分奇特的事。他宣布不担任捷共中央的那两个职位，理由是第十四次秘密代表大会无效，因为大部分的斯洛伐克代表未能参加会议。更加奇怪的是，他还公开呼吁杜布切克也退出秘密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机构。布拉格的最初反应是，胡萨克只是为了使杜布切克免得为难，因为当时他正面临着如何使入侵前和入侵后两个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协调一致起来的问题，而这两套机构都是以他为首的。然而胡萨克的戏法却大为微妙，更加复杂。首先布拉格注意到，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谈判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宣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非法会议，这种事杜布切克不愿干，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曾大大有助于拯救他的性命。

捷国内的这一政治行动是在苏联报刊恢复对“反革命”的攻击时开始的。苏联《消息报》八月二十八日写道：“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反社会主义力量活跃起来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服输……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不是神话，至今它仍使人感到它的存在，妄图使局势恶化，扰乱人民，进行挑衅，使动摇不定的人民反对兄弟国家，总之一句话，使这个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塔斯社又宣称，“反革命分子”正在设法“煽动民族主

义的歇斯底里，散布不和和混乱……（捷共）党员参加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妄图分裂共产党，破坏它的战斗力。”

八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布拉格的报纸按照自行进行新闻检查的规定又合法出版了。自入侵以来第一次取消了宵禁。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有计划要实行正式的新闻检查和取消非共产党组织，诸如非党人士政治俱乐部和前政治犯K—231俱乐部等。斯姆尔科夫斯基暗示国民议会可能被要求制定一个正式的新闻检查法，他说，“我们将不得不在广播、电视和报刊方面采取特别措施以防止发表违背外交政策要求和共和国利益的文章。”他难过地谈到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不得不作出的这个和其他的让步，他评论说，“我们从未想到，我们必须要付出八月二十日夜到二十一日凌晨所付出的代价”。在对当时布拉格局势作最诚实的评价时，斯姆尔科夫斯基指出，即使捷克斯洛伐克履行了她所承担的一切义务，占领军是不是会撤退，对于这一点，说老实话“除了我们自己的智慧以外，没有任何真正的保证”。他告诉捷克斯洛伐克人说，“在最初痛苦和愤怒的反应过去之后，我要求你们表现沉着和冷静。”

这是布拉格烦恼和不安的一天，杜布切克两天前保证的效力开始消失了。伊·贝利康和兹·赫兹拉尔（他们俩人是电视和广播系统的负责人，也是秘密广播的组织者）显然是在苏联的压力下以“临时休假”为名被撤

职了。

八月三十日苏联驻布拉格的部队司令维利奇科答应，如果所有反苏的标语漫画很快清除掉的话，他的部队就从布拉格全部撤出。捷克人发疯似的清洗墙壁。捷共中央委员会里我的一个朋友下午告诉我——我们在城里一家顾客很多的咖啡馆会面——斯沃博达已向俄国人表示，同意将解除帕维尔将军的内务部长职务，由一位似乎受到苏联信任的比尔森人，不知名的政治家杨·佩尔纳日接替。第二天，当中央委员会在赫拉德强尼堡举行自六月份以来的第一次公开会议时，政府果真撤了帕维尔的职，任命佩尔纳日继任。晚上我同一位要好的布拉格编辑喝酒，他非常悲观地告诉我，“杜布切克正在被迫逐步变成卡达尔。”但这一点最后表明是个错误的判断。越来越具有卡达尔的特点的是古·胡萨克。

九月一日，中央委员会开会两天结束，产生了一个极好的由二十一人组成的自由派主席团，从而使党的危机似乎告一段落；杜布切克及其同事们的这一手使所有的观察家都大为惊讶。中央委员会吸收了绝大部分第十四次秘密代表大会选出的进步分子，把中委人数扩大到一百八十七人。原主席团委员中连任的有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什帕切克等自由派，加上斯沃博达作为名誉委员。新当选主席团委员的自由派有兹·姆林纳日；符·卡布尔纳，他是宣布十四大开幕的人；摩拉维亚的瓦·诺伊伯特；瓦·斯拉维克，他是杜布切

克的朋友；利·霍金诺娃，她是入侵后选出的主席团中唯一的女委员；布拉格积极的自由派博·西蒙；斯洛伐克的自由派瓦·希麦切克，安·加什基和约·兹拉克。选进主席团的保守派——选他们是向莫斯科作的姿态——只有比拉克和皮列尔。当选主席团委员的中间派有埃·埃尔班，一位经济学家；雅·赫特斯，此人以后又恢复了他一度有过的保守倾向；约·平卡瓦和斯洛伐克的斯·萨多夫斯基。主席团候补委员有：卡·波拉切克，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进步派主席；保守分子约·列纳尔特和弗·巴尔比雷克。

也许最重要情况是，胡萨克在拒绝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他当中央主席团委员之后又被选入了主席团。他的新的显要地位反映在《红色权利报》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把他第一次排在杜布切克、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之后，成为“在最严峻考验时刻证明值得我们充分信任的”领导人之一。这是真正的表扬，胡萨克现在正式进入了领导内层。很快就清楚地表明，他给自己提出的新任务就是从内部来夺取这个阵地。

除了胡萨克这个特例外，最大的秘密是，杜布切克势力怎么能够在苏联入侵十天后组成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上最自由化的党的领导集团。如果说莫斯科曾经担心在原定于九月九日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选出一个进步的中央委员会的话，那么现在表面上控制这个党的集团已超过了自由派最大胆的梦想。外交

人士和外国新闻记者推测，杜布切克轻率地无视俄国人，认真看待苏联军队将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诺言。杜布切克终于真的建议推行他的改革计划而无视苏联入侵的思想动机，这种想法使我们惊诧不已。

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胡萨克及其在主席团中很快就变成为他的不声不响但强有力的盟友的萨多夫斯基、埃尔班、赫特斯和平卡瓦这几个人注意不够。我们低估了比拉克和皮列尔在未来考验中潜在的重要性，我们对诸如姆林纳日、卡布尔纳、诺伊伯特、斯拉维克、霍金诺娃和三位斯洛伐克人的出现看得太重了。我们没有正确地预见到切尔尼克将要扮演的角色；我们忘记了通过米·雅克什，莫斯科派控制着至关重要的监察委员会。雅克什是一位记忆力极好并掌握着干部大量档案材料的人。也许是对斯沃博达总统政治上的才智估计过高了——他懂得在遭受攻击时如何表现得顽强不屈，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显得越来越不行——而最后进步派的坚强核心缩小到只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西蒙。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事实对俄国人来说是更加清楚了。但进步分子暂时又重新得势，他们利用每个机会来刺俄国熊。

但苏联人也在不声不响地索取代价。继帕维尔去职而来的是九月三日希克副总理的"辞职"。克里格尔离开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切·策萨日不再当中央书记，而去当主要是装饰门面的捷克议会主席去了。贝利康和赫兹

拉尔被排斥掉了。排斥莫斯科真正看不顺眼的人的工作实际上完成了。只有外交部长哈耶克仍留在原位子上，但他当时还在国外，掌管部里工作的是瓦·普列斯科特，他是不惜在重大问题上满足苏联要求的。作为西方记者，我们在外交部感到一股新的寒流，而现在象外国新闻司负责人杜费克这样的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是极端挑剔的。

九月份是个拉锯战的月份。反抗仍然很多，到处可见。数以百计的年青人仍在守卫着由旗子和花束簇拥着的圣瓦茨拉夫的塑像。要求苏联撤军的决议继续从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工厂企业和民众组织源源飞来。报纸在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名叫约·沃赫努特的文化部官员管理的松散的自愿新闻检查下，在照常合法地出版。苏联的坦克和部队仍占据着布拉格的战略要地，晚上装甲车和吉普车在市区巡逻。但政治上的压力主要落在亲莫斯科的保守分子身上。比如九月五日，《红色权利报》的前编辑奥·什维斯特卡和扬·皮列尔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否认他们曾参加要求入侵。什维斯特卡写道："我没有背叛我的国家、我们的共产党和我的共产主义信仰，""谣传我参加了要求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的人们的行列，这是不真实的……将来肯定会弄清楚，谁是所谓的捷奸和叛徒。今天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宣布，我没有背叛我的国家。"皮列尔在他的声明中说，他从未跟"任何人"商量参加或者组织某个新政

府的活动。他坚持说，八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二日的布拉格旅馆会议是研究使杜布切克从苏联囚禁下释放出来的办法，他会见斯沃博达总统是关于商谈莫斯科之行的事。

出头露面的是自由派人士。杜布切克访问了布拉格工厂，敦促工人们起来支持使社会主义“人道化”的过程。九月五日晚，又在原址恢复广播的布拉格电视台播送了斯美塔纳的歌剧《达利波尔》（又译《遥远的森林》），主题是农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捷克人最善于使用象征手法。

莫斯科对耐心等待可能具有信心，但局势变得太复杂了，不得不有所行动。九月六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库兹涅佐夫，这位苏联前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谈判老手来到布拉格来控制局势。（他同两天前被紧急召回莫斯科的契尔沃年科一同到达。）他立刻去会见斯沃博达，看来他是被派来长期监督“正常化的”，因为很明显，信誉扫地的契尔沃年科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苏联军队的行动也变得更具有威胁性。在布拉格以东七英里，一百多辆中型坦克排成一圈，似乎一旦有令即可行动。榴弹炮和迫击炮的炮口依然指向这座城市，首都街道上的装甲车在加速移动。又一次出现了危机感。

当库兹涅佐夫巡视的时候，——在主席团授权杜布切克谈判逐步撤走苏军之后，他会见了杜布切克——胡萨克作了首次重要讲话，给自由派泼了冷水。胡萨克在

布拉迪斯拉发告诉斯洛伐克党的中央委员会说，要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捷克斯洛伐克人任意离开祖国。他指出，不能把国界线变成林荫大道，“混乱”必须加以制止，因为它干扰正常工作。

由于最近以来胡萨克成了苏联和波兰报刊大加吹捧的对象，他的讲话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的，他们预感到这位板着面孔的斯洛伐克人正在乔装打扮，或者被乔装打扮进入高位。布拉格的赌注已压在胡萨克一边，他被看作是迟早要取代杜布切克的人。在布拉迪斯拉发讲话中，胡萨克说内务部公安机构一定要加强——早在切尔纳谈判时苏联就是这样要求的——但他又匆忙向听众保证说，自由派用不着担心被捕或遭迫害。谈话后的第二天胡萨克在布拉迪斯拉发接见了库兹涅佐夫。

苏联打算要向什么人进行工作，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他们的选择毫不奇怪地落到了这些新“现实主义分子”身上。胡萨克明显地得到苏联的青睐。九月十一日切尔尼克总理同副总理哈莫乌兹、外贸部长瓦·瓦列什一起飞往莫斯科进行了一天的访问，表面上是去讨论经济问题。这是八月二十一日之后，切尔尼克第一次去苏联。但是这一次他受到了温暖热情的接待；布拉格流传说，切尔尼克是莫斯科选来进行一切重要谈判的官员，而胡萨克是被指定来监督国内政治事务，这被当作是孤立杜布切克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切尔尼克从莫斯科回来的同一天也是他、斯沃博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胡萨克签署一项保证艺术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有自由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的声明的日子。声明也呼吁捷克斯洛伐克人不要逃亡国外——这是比胡萨克在布拉迪斯拉发所讲的较为缓和的说法。

九月十一日正好是入侵后三个星期，苏联的坦克离开布拉格开到乡间营地。胡萨克和切尔尼克的活动据认为使库兹涅佐夫感到满意，“正常化”终于有了进展，苏联撤军的第一阶段可以开始了。步兵和装甲车仍留在市内，但自八月二十一日清晨以来布拉格第一次看不见威胁人的坦克了。在比尔森——那里用旗子拼出了“我们跟你们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的口号——斯沃博达总统告诉工人们说，“我们必须履行莫斯科协议，这样我们才能要求对方履行协议”，他说，“不得人心的措施”迫在眉睫——这是指作为苏联坦克撤离布拉格的代价的一部分，国民议会准备通过新闻检查法的正式行动。

付出的另一个代价就是再次加强了秘密警察机构。这也是莫斯科要求过的，胡萨克在本月早些时候也曾提及。我当然对这将怎么做感到兴趣，九月十二日上午我到内务部去采访公共关系部的负责人弗·杜布斯基大尉。他是一位穿着运动夹克的爱交际的年青人，我们边喝啤酒边谈。他向我保证说，他的部没有苏联顾问——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只是在后来我才发现，杜布斯基是属于为八月二十日夜入侵负责准备条件的沙尔戈维奇小组的。当时我对驱车在布拉格活动和到乡下去受到跟踪以及秘密警察对我的活动特别感兴趣一事就感到不愉快。那个星期我也发现，曾负责捷共中央安全的米·马穆拉又回到党总部办公。在布拉格之春早些日子被清洗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又在出笼了。

我采访内务部的第二天，切尔尼克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国民议会已通过了一项一般性的增强公安力量的新法案“以加强公共秩序”。他解释说，总之，警察和军队都要用来维持秩序。在二百五十七名议员投票恢复新闻法的新闻检查条款之后，切尔尼克讲了话。三个月前，也是在赫拉德强尼城堡的这个大厅里议员们作为“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投票取消了新闻检查。这一次投票时反对新闻检查的只有两人。这是时代的象征。副总理彼·佐洛特卡，一度在国际法院工作过的这位斯洛伐克人被任命来领导一个新建立的负责施行预防性新闻检查的新闻和情报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至少从立法方面又回到了九个月前的原地。而且切尔尼克又补充了一句，“在目前的局势下，没有夸海口的余地”，从而使人们的情绪普遍更为低落。

当九月将近结束时，布拉格是一个情绪正在变化中的城市，悲喜交加的城市。尽管有新闻检查，日报和周刊仍能保持着反抗精神。每篇文章都能使人民发出微笑，

相互议论着，“瞧，我们还活着，在折腾。”但在领导集团中对苏联意图感到新的不安。九月十四日杜布切克就这个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说：“我再三再四请求你们不要被任何人利用”；但他仍然是乐观的，在讲到他的日益凋零的自由化政策时说，“我们不准备放弃它”。

这至多只是一种相对的希望。杜布切克回避了新闻检查，也没有谈他的亲密同事们遭到清洗的事。他让越来越清醒的自由派人士姆林纳日来公开证实，第十四次秘密代表大会已被宣布无效。布拉格之春实际上留下的全部东西只是：继续为五十年代清洗受害者恢复名誉，到国外旅行的自由，准备建立捷克一斯洛伐克联邦制国家。除此而外，就只有悲痛。

在一个灰色的星期天，在圣瓦茨拉夫塑像脚下放着一首用钢笔写在被雨水淋过的纸片上的诗：

致死难者

谁能解除痛苦，谁能治愈创伤，
它在我们心中燃烧——谁能回答？
为什么？
死亡来自远方的铁和钢，
年青的生命在机枪下毁殇。
在烈士倒下去的地方，生命在继续前进。
谁不为亲爱的死者哭喊？
可是我国人民站立着，骄傲而坚强。
你定要把悲哀和反抗埋藏在心房，
那残酷的早晨啊，也一定不能忘！

人民感到愁闷，在可能的情况下表示了反抗。苏联人指责说，希克建议的经济改革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理论”之上的，会导致失业，降低生活水平，把“外国垄断资本”引入捷克斯洛伐克。十三名捷著名经济学家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公开信，反驳苏联的指责。领导过一九五六年作家造反的患病的诗人雅·塞弗尔特在电视上说，“我们的目标是个人自由，是国家的主权，是民主社会主义。”青年周刊《青年世界》发表了一幅有关捷克妇女拒绝同俄国人接触的漫画。漫画的文字说明是：一个苏联士兵对其同伴说，“对我来说，这里的姑娘没有性感。”

在不停的反复斗争中，苏联军队又占领了俄斯特拉发和斯洛伐克兹沃伦地方的直言不讳的党报报社，命令撤掉斯洛伐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报纸的编辑。九月十九日外交部长哈耶克在他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十天之后终于被迫辞去外长职务。这似乎完成了从政权中清除掉苏联所讨厌的人的任务。莫斯科进一步感到满意的是，听到仍任党的法律委员会的负责人姆林纳日承认，电台和电视台人员在入侵的日子里转入地下工作是“非法的”；但捷克自由派人士看到自己的一个伙伴转而反对进步事业则非常难过。在领导集团中他们的队伍在缩小，但在其他地方他们仍坚守阵地。

在布尔诺博览会上，大批群众象欢迎英雄般地欢迎

了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布拉格的自由派杂志《报道》在九月二十日入侵后合法复刊时，公布了一个民意测验的结果，被询问者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认为杜布切克是“我们生活中的领导人物”。《报道》还刊登了十九世纪捷克诗人扬·聂鲁达题为《前进》的诗，“……只有在人民的面前，我们才能低下头来。”在斯洛伐克北部举行了纪念弗·克列门蒂斯的集会。

在苏捷关系上，拉锯战仍在进行中。首先捷共中央主席团授权杜布切克就撤军问题同莫斯科重新开始谈判，他拟在九月底访苏，但由于仍在布拉格当总督的库兹涅佐夫的不同意被取消了。接着切尔尼克宣布，华沙条约国军队可能在几天之内撤离。但他又强调说，“少量部队……将留在我们这里，”证实了苏军至少有两个师将长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说法。（早先新闻记者已看到在为俄国人修建永久性的营房。）但与此同时，他又宣称，布拉格领导人在切尔纳会谈中没有向俄国人承担义务，从而又重新引起关于入侵的争论。这一点——以及“反革命”的问题——还得折磨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年。

为了给“反革命”一说进行辩护，苏联在九月底出版了一本题为《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书。据说是由“苏联记者”收集整理的。这本书很快就以“苏联白皮书”闻名于世，并译成了多种语言。书从捷克斯洛伐克和西方报纸文章中不顾上下文任意摘引，从每一个事例

都作出自己的结论。在惹恼捷克斯洛伐克人方面，它可以和占领军报纸《消息报》媲美，这份报纸迄今苏联部队仍坚持在捷全国散发。（一天晚上一名美国电台记者被苏联海军陆战队扣留，在卡车内呆了二十分钟，然后带了一大包苏联《真理报》和这种《消息报》被送回了家。）但是莫斯科认识到，现在到了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严肃的思想意识上的阐释的时候了。

这种阐释是以九月二十六日《真理报》上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为标题在头版发表重要文章的形式出现的。由评论家谢·科瓦廖夫撰写的这篇文章由于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有限主权论而广为人们所知，现在仍然认为是苏联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尽管后来否认它有此意图。它的主要突出点是，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正义的，如果社会主义看起来面临危险的话。共产主义世界是如此认真地看待这篇文章，以至于齐奥塞斯库总统以及其他人决心起来公开谴责这种“所谓有限主权论”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有害影响。

《真理报》这篇文章的有关部分如下：

> 苏联联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捍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所采取的措施，对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具有伟大的意义。……
>
> 我们不能无视某些地方出现的一些说法，说什么五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是违背马列主义的主权原则的，违反民族自决权的。

这种论据之所以站不住脚主要是它采取了抽象的非阶级的态度来对待主权和民族自决权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族人民和共产党当然有自由，也应该有自由决定各自国家前进的道路。

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决定既不能损害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损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整个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

这意味着，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无论谁忘记了这一点，只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就有片面性，他就背离了他的国际主义义务……

用列宁的话来说，就犹如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不能摆脱社会一样，一个单个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处于由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体系之中，它就不能脱离那个大家庭的共同利益。

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法律准则，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不能作狭隘的解释，形式的解释，不能脱离当代世界阶级斗争的总联系而孤立地加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输出和输入反革命。

每一个共产党有在本国运用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自由，但它不能脱离这些原则。

具体讲这意味着，每个共产党在其活动中首先必须考

虑到我们时代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即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必须着重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正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确实是使用了民族自决权的言词来掩盖所谓中立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退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要求。

但是，实行这样的“自决权”——换句话说，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会同它自己的重大利益发生冲突的，会有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

实现这种“自决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就能挺进到苏联的边界，而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就会分裂；这样的“自决权”实际上损害这些国家各族人民的重大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同这些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自决权相冲突的。

为了履行他们对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和捍卫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成果，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坚决行动，而它们也真的采取了行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

那些“不赞成”社会主义联合行动的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即这些国家是在保卫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整体利益。

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以其具体形式而存在，它有其自己的确定的国家界限，这种制度根据各国的特殊条件而向前发展，而且也没有人干涉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改进社会主义制度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但在某个特定国家社会主义本身遭到危险时，情况就根本不同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世界社会主义是各国劳动人民的共同成就；它是不可分割的，保卫它是世界全体共产党人和全体进步人民，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共同事业。

共产党和工人党布拉迪斯拉发声明谈到社会主义成果时说，“支持、巩固和保卫由各个民族英勇奋斗和自我牺牲为代价所取得的成果体现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

近几个月反社会主义右派势力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要做的不是涉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某一特征，也不是把马列主义的原则运用于那个国家的具体条件，而是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基础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侵犯。

这种细微差别对于听信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虚伪的胡说八道的人们来说是仍然不清楚的。在“民主化”的伪装下，这些分子一点一点地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想瓦解共产党和搞乱群众思想。偷偷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但他们没有受到本国应有的反击。

当兄弟国家的共产党人看到这个国家面临反社会主义的变质的危险的时候，当然不能拘泥于对主权的某种抽象理解而使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无所作为。

五个盟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也是同这些国家本身

的重大利益相一致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具体情况下，形式上遵守一个国家的自决自由就会意味着不是人民群众、劳动人民的“自决”自由，而是人民的敌人的“自决”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被推上反社会主义道路，即所谓“中立”会使它丧失民族独立。

世界帝国主义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想借助这种办法向这个国家输出反革命。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阻止外国对捷输出反革命，这就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真正主权，反对了那些想要剥夺它的主权，把国家奉送给帝国主义的人。

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共产党长期以来就采取措施，以最大的克制和忍耐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制止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进攻。而只是在用尽了各种办法仍无效果之后，他们才把军队开进这个国家。

现在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盟国的士兵以其行动真正证明，除了保卫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任务。

他们不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不是在字面上而是在行动上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决原则而斗争，他们要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能深思熟虑地决定自身命运而用不着担心来自反革命分子方面的恫吓，也不受修正主义与民族主义谎言的蛊惑，他们正在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斗争。

那些谈论社会主义盟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非法行动”

的人们忘记了，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法律……

决不可让形式上法律上的论证把对事情的阶级立场模糊起来。如果一个人这样做就失去了判断法律准则的正确的阶级标准，就是开始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尺度来衡量事物。……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盟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的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至关重大的利益，首先是保卫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的，这种行动将不断得到那些关心当代革命运动、各族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以及从内心深处关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把自己的名字同这个不寻常的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十一月十二日在波共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当社会主义的内外敌对势力试图扭转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当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危险——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这就不再仅仅是那个国家人民的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心的问题。”

《真理报》的评论员和勃列日涅夫都没有能提出一个定义，确定构成这种“威胁”的究竟是什么和由谁来召集社会主义国家去帮助所设想的受威胁者。勃列日涅夫主义只不过是苏联手中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而已。

就是在这种任意的主义和同样任意的“正常化”概念下，捷克斯洛伐克继续面临苏联的压力。九月底年青人对付这种威胁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求参加共产党，希望能从内部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入侵后的一个月内，就有七千二百人申请入党，百分之六十四的申请者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另一种办法就是赞颂捷克斯洛伐克的古代英雄。九月二十八日是圣瓦茨拉夫的命名日，数以百计的捷克青年人打算举着旗子游行到圣徒维特大教堂去。这座教堂位于赫拉德强尼城堡的后面，据说黄昏要在那里举行一次大弥撒。但是游行在一位高大的蒙古族脸型的苏联少校的严厉目光下被警察驱散了。这位军官是乘坐一辆载着武装伞兵的巡逻吉普车来的。捷克人表示他们感情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在秋季演出开始那天把地下室剧院挤得满满的，去看伊·苏希和伊·什利特尔音乐剧。剧院门上的横幅写着：“枪声压倒笑声时，剧院停演。”

历来典型的现象是，苏联的入侵或者施加压力的结果会使知识分子和其他政治上有牵连的人大量外逃。但这一次捷克斯洛伐克人还是留在国内进行战斗。许多布拉格之春时积极活动的知识分子入侵时正好在国外或入侵后马上离开，这些人秋季都陆续回国了。苏希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人还有作家帕·科霍乌特和伊·穆哈，电影导演伊·门泽尔和著名演员杨·维里赫。卢·瓦楚利克有人看到在瓦茨拉夫广场安祥地散步。雅·塞弗尔

特、瓦·哈维尔和扬·普罗哈兹卡集中精力保持作协的工作正常进行。当苏联报纸攻击当时不在职的作协主席爱·戈尔德斯图克时，作协作了有礼貌的回答，报纸发表了它的反驳文章。一群自由派编辑和作家发表了一个宣言，敦促知识分子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号召出国的人也回来，告诉他们说，“这里需要你们”。象过去一样，现在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是抵抗的主心骨。

与此同时，俄国人正忙于过冬的准备工作。捷克斯洛伐克第十三师撤出了布拉格以北二十五英里的姆拉达大军营，为指定常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师腾地方。这变成了首都郊区的苏军主要基地。其他的过冬部队驻扎在靠近西德边境的罗兹瓦多夫附近，摩拉维亚的奥洛乌莫茨地区和斯洛伐克东南部。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前来视察他的部队，并再一次告诉布拉格领导人说，“正常化”必须进行得更快些、更好些，多余的部队才能撤离。

十月三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胡萨克飞往莫斯科。（这次访问由于代表团成员中是否应有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事引起争论而被推迟，苏联人拒绝接待他。斯姆尔科夫斯基成了克里姆林宫讨厌的主要对象，因为俄国人认定他是延迟“正常化”进程的罪人。后来，他同意留在国内。）在两天的艰苦谈判中，杜布切克至少还为自由化的残留部分而辩护，而切尔尼克和胡萨克则又一次采取了“现实主义”立场。谈判结果签

署了一项责成布拉格进一步压缩捷克斯洛伐克自由的新协议。

公报是这样写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来履行莫斯科协议……他们将逐步作出努力来提高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反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采取必要的步骤使所有报刊、广播和电视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任用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人来重新加强党和国家的机关。"用坦率的话讲，这就意味着实行全面的新闻检查和清洗仍留在有影响位置上的进步分子。经过六周抵抗之后终于实行了这一明显的投降，所换来的是莫斯科愿意签订一项撤出占领军和苏联部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

但"投降"如同"正常化"一样对莫斯科和布拉格来说各有其不同的含义。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后的第二天，捷克的报纸爆发了一阵谴责华沙条约国宣传工具散布"谎言"和"侮辱"国家领导人的宣传运动，工会报纸《劳动报》等还指责它们"歪曲事实"，"散布谎言和流言蜚语。"布拉格的一位编辑被问道，根据最近的承诺，报纸要置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地位，他如何来解释上述谴责呢？他微笑着说，"我们这里在同很含混的概念打交道。"党的主席团发表了一份公报，保证最近的莫斯科协议不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国内又有人担心会进行政治逮捕。好象是故意表示蔑视莫

斯科，年轻的捷克人开始组织杜布切克拥护者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散发杜布切克像和像章，也对他的政治思想进行严肃的讨论。就这样继续跳着小步舞。

但是，现实仍然是一点也不容忽视的。十月十一日杜布切克发表电视讲话，向他的拥护者们建议说，“民主需要一定的纪律。”他的听众注意到，杜布切克的腔调也大有改变。听到他承认“自由化”纲领有缺点，听到他说“任何破坏同社会主义大家庭联盟的事情都是有害的，任何破坏党的领导作用，和任何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和经济基础的事情都是有害的，”那是很痛心的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靠拢苏联的思想路线，杜布切克说，捷克斯洛伐克懂得了，不能忽视我们国内活动对“我们社会主义盟国”的影响，无视“它们的意见和担心”是行不通的。

杜布切克一定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作出这一承认的，克里姆林宫对他忠顺给予了报偿。十月十四日切尔尼克又到莫斯科去同柯西金总理讨论驻军条约问题。两天以后柯西金来布拉格签署了条约，这实际上使入侵合法化，使莫斯科有权在捷克斯洛伐克驻扎人数未经透露但据信是不受限制的一支军队。在外交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安排得具有典型的共产党式的热烈场面，在仪式上现实主义者切尔尼克——因杜布切克留在后台——说，这个条约是在“面对西德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加强的复仇主义”而“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防御的一个步骤”。

从军事意义上说，八月入侵的目的达到了。条约没有明确规定苏联军队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期限——声称是个“临时性的”的安排——它的任务只是简单地解释为保卫社会主义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这当然就把全部灵活性交给了苏联人。借口存在对和平的威胁，需要进行军事演习，或者以任何可行的理由，莫斯科都有权在这个国家保持它所希望的数量的军队，并可不经协商派兵增援。

苏联军队现在正式驻扎在波兰、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前沿防线从北海边上的易北河口由北向南延伸到多瑙河上的布拉迪斯拉发，逼近维也纳，然后沿匈牙利同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线向东南方向延伸。从战略上讲，这一新安排填补了同西德和北大西洋公约南翼的巴伐利亚相对的突出部分，也给了俄国人在重要的维也纳交接点以东的多瑙河两岸的控制权。就华沙条约国军队的机动能力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自由使它们在防御和进攻两方面都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地区。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双方专家都同意的理论看，在不大可能出现的西方从南方进攻的情况下，控制捷克斯洛伐克能够给莫斯科大约四十八小时的防御缓冲时间。换句话说，苏联人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和西部保持足够数量的部队，能对西方的常

规进攻阻击两天，这是紧急的大量增援所需要的时间。

当然这是一种纯理论的说法。在核时代从西德出发，无论是从北面或南面向苏联巨大的地面军事机器发动常规进攻，这种概念非常谎谬，根本用不着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此类似，说是美国的或北约的部队会在和平时期渗入捷克斯洛伐克——在杜布切克型的共产党自由政权的容忍下——然后对波兰或者苏联发动直接进攻，也同样属于离奇的幻想。因此，从战略上看，苏联的入侵对苏联军事防御上的重要性是极少的。如果苏联确曾计划使用它强大的常规力量袭击西方的话，那么，入侵无疑是加强了苏联在中欧的进攻阵地。苏军指挥部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如此自如和迅速地把五十多万兵投入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实表明，它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发动一个类似的或更大规模的行动来进攻西德，而美国不到二十万人的军队同西德军队一起很难招架得住。但是这在战略上同样是荒唐的。苏联对西方发动地面进攻很明显地要招致核武器的报复，这样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好处就有限了。

因此，苏联取得在捷克斯洛伐克驻军的合法权利，只是赢得了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好处。它似乎满足了苏联近乎病态心理建立一个防疫区的需要——这一需要当然包括对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上的完全控制。在这种意义上，苏联领导集团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态度是较为严肃认真的，而不是象文件乍一看给人的印象那样，纯粹出

自思想理论上的厚颜无耻。在六十年代后期，苏联在思想方面对东欧是非常缺乏信任的，它感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分离”似乎构成了对整个制度生存的威胁。在苏联的眼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民主制”的成功试验可能——也许会——传播到东德、波兰以至于匈牙利。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是苏联入侵的主要支持者，这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没有完全忘记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人可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试验有好感，卡达尔也可能这样。因而，苏联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是极为严肃地体现了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是那些国家的政权——的切身利益。只有顽固的罗马尼亚拒绝欢迎苏联的“临时”驻军。但它三面受到包围。

由此又可以得出结论：八月入侵实质上是政治行动而不是军事行动。八月二十一日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连续几周、几个月的有力抵抗也许更加深了苏联的看法：要想使这个国家在从经互会到诗的性质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忠实地听从苏联的独裁，一支武装力量常驻捷克斯洛伐克是完全必要的。

柯西金和切尔尼克签订的条约规定，保卫西部边界的主要责任仍落在捷克斯洛伐克身上——这规定本身就同入侵是为了军事防御上的需要这一论据相矛盾——华沙条约国军队撤离以后（十月二十一日匈牙利部队首先开始撤离）苏联军事力量的部署突出地说明了苏联的真实意图。十一月初，当所有的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

部队以及苏联大部分部队撤出之后，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部署表明它并不具有什么战略价值，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治性的。苏联的基地从西到东南形成一条对角线，把这个国家切成两半。这条线的西端接近西德边界，然后跳到布拉格以北的姆拉达基地，继续向东南延伸到摩拉维亚，然后以斯洛伐克的东南部为终点。“活见鬼，这是什么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免遭西方进攻！”一位西方武官在研究了苏联军队的分布之后评论说。但是很清楚，这一部署为内部控制的目的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安全屏障。从姆拉达基地和姆拉达—博列斯拉夫司令部出发，苏联的装甲部队沿着宽广的E—14号公路南下，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重新占领布拉格。西部的部队可以同样的速度到达比尔森。捷克斯洛伐克中部的摩拉维亚可以从奥洛莫乌茨加以控制，增援部队可以很快从波兰南下。驻扎在斯洛伐克东部的军队可以控制斯洛伐克，它可以很容易地进驻布拉迪斯拉发。

围绕着这一新的重新部署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安全保密形势。苏联当局从没有作出任何一点努力来阻挠西方记者观察他们部队八月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九月和十月初的部署——比如说当我在《纽约时报》上报道布置可以带核弹头的飞毛腿导弹时，没有任何人向我说过一句话——可是，当部队开始撤离和重新部署时，整个行动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幕布。几位新闻记者因为在布拉格以南的贝内绍夫观看把苏联的装甲车装上火

车，就被逮捕和驱逐了。还有的人因在姆拉达地区偷看受到申斥。我有理由相信，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报道苏联部队沿西部——东南部轴线长期驻军并指明其政治动机的文章，是我被逐出这个国家的原因之一。

苏捷关于驻军的条约——它于十月十八日以二百二十八票赞成，四票反对，十票弃权在突然变得涣散的国民议会通过——规定苏联部队不得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但是只有极其幼稚的人才会认真对待这一句话。苏联军队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就构成了严重的政治干涉，而且由于双方自由地承认撤军将以"正常化"为条件，这种干涉作用就更为加重了。一旦有事，克里姆林宫会毫不犹豫地提出使用军队去帮助维持"公共秩序"以进行威胁。最后，条约的签订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再要求撤走占领军成为非法。所谓苏联军队是根据一项自由签订的条约安排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这幕滑稽剧就这样上演了。

但是所有这些仍然不足以说明，捷克斯洛伐克人已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对他们所作的一切和他们被整得服服贴贴了。仍然有进行反抗的报纸、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仍然有反抗的工人和学生；从根本上看，那里仍然有不肯就范的普通老百姓。

十月末，当占领军正在撤退时，我到纳霍德附近的波兰边境一带走了一趟。这个城市的人民不象是被征服了的人民。城市的中心广场仍然叫作托马斯·马萨里克

广场，主要街道仍然叫杜布切克大街。商店橱窗上装饰着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和马萨里克的像，准备庆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

汇集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万名最优秀人材的科学院十月底公布了一份一万二千字的文件，逐条驳斥了“苏联白皮书”中的论点。由科学院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分别负责准备的这份文件称苏联的解释是“谎言”、“捏造”、“歪曲马列主义思想”和“小学生的异想天开”。文件写道：

> 把社会主义看作完美无缺的制度这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必然要导致这种結论：把对缺点和矛盾的批评不加区别地看作是修正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同反革命和政治上反动等同起来。
>
> 反革命一般是指反动政府以军事援助、封锁、组织武装叛乱、阴谋破坏和抢劫等等手段……进行的干涉。
>
> 如果我们把这一概念搬到思想领域中去，那任何一种同当时的某种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意见都可以简单地被解释为反革命。这是一种危害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险的逻辑。

当然还必须注意到，科学院的评论不是由极右翼分子起草的而全是由严肃的马列主义思想家和共产党员起草的，它反映了与老的莫斯科教条相对立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苏军入侵和提出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发

表的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思想批判文章，而《报道》杂志却毫不迟疑地把它全文刊出，供所有捷克人阅读和评论。

当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临近的时候，布拉格领导人感觉到有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安，向居民发出了避免一切“极端态度”的警告。由斯沃博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签署的一份通告提醒说，随着不负责任的行动而来的将是可怕的后果。这是对待一项条约的古怪作法，这个条约明文规定苏联军队不干涉捷内部事务。但布拉格当局正在做的事显然是互相矛盾的。自从一九四八年直到布拉格之春从未正式纪念过一九一八年建立的马萨里克共和国的周年。但是今年宣布这个日子为国庆节。包括捷共中央、国民议会和民族阵线在内都订出了隆重庆祝的计划。布拉格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和彩旗的海洋——这跟前些年不同，那时十月二十八日是作为国有化节来庆祝的，这一天只挂红旗。用不着有很高的判断力就可以想到，准会发生反苏游行。群众反莫斯科的情绪变得更加激烈，因为政府正好在这一周宣布在工厂企业中停止组织工人委员会的试验，而这本是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至于苏联官员关于在这个节骨眼上庆祝一个民族主义节日的危险性向捷克斯洛伐克人说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政府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

在节日的前夕，马萨里克的像片和胸像到处都摆出

来了。在瓦茨拉夫广场上卖马萨里克像章的小商亭大发其财。十月二十七日政府决定拜谒所有已故的总统。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在市区的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墓地首先举行了纪念仪式，一个高级代表团献了花圈，但那里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前去观看。下午，一群人乘直升飞机去到拉尼的托·马萨里克和扬·马萨里克的小小墓地。有成千的人前去朝拜。然后共产党的代表们又飞往布拉格以南的塞泽莫沃－乌斯吉，贝奈斯就安葬在那里，他的遗孀孤独地生活在那里。

在布拉格，国民议会在赫拉德强尼城堡庄严地开会通过了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的联邦化法案，这是四月行动纲领提出的一项保证。在同一天政府开放了位于城堡后面的民族珍宝馆，让居民观赏波希米亚王冠上的珠宝，这是一九四八年以来的第一次开放。对于一个生活在苏联坦克威胁之下的共产党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步骤，但捷克人立即就把它变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无声示威：估计有十万人在刺骨的寒风里站着一公里多长的队去观看珠宝。只有在十月二十七日的早晨，当群众向前来参加国民议会会议的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大声欢呼时，沉寂才被打破。

十月二十八日——建国周年纪念日——在布拉格全城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对此谁也不感到特别惊奇。从早晨一直到深夜，大学生和工人们手拿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在首都游行，高喊“俄国佬滚回去！”

“打倒勃列日涅夫！”“乌萨里克万岁！”“我们要自由！”在瓦茨拉夫广场，愤怒的群众高喊“俄国杀人凶手滚出布拉格！”，向从身旁驶过的苏联军车吐唾沫。

一度出现过高度紧张的时刻。当隆重的纪念共和国成立周年的会议——整个内阁、捷共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议员和外交使节都出席了会议——中午在赫拉德强尼城堡结束之后，大群群众聚集在城堡大门前。他们挥舞着旗帜，咒骂俄国人，要求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出来向他们讲话。由于群众太多，警察对他们已失去控制。城堡警卫部队被召来阻止示威者冲破铁门，进入院内。警卫部队从里面顶着铁门，群众从外面——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推铁门。契尔沃年科大使和苏联武官只得在警察保护下从后门溜走。当已被解职的外交部长但还是议员的伊·哈耶克进入城堡前的广场时，群众拉住了他，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把他扛在肩上。

下午有一万人游行通过老城广场，一支游行队伍去到位于哈斯塔尔大街的苏军区指挥部门前去烧毁苏联《真理报》，并高喊“俄国佬滚回去！”装甲车和上着刺刀的哨兵守卫着指挥部，他们是不会忍受挑衅的。只是在受群众欢迎的教育部长弗·卡德列茨劝说年轻的示威者离去后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严重事件。警察设的路障和消防车的出现才阻止另一群年轻人越过伏尔塔瓦河去到布贝内奇区的苏联大使馆。晚上群众封锁了民族大剧院的入口处，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将作为主宾观

看在那里上演的斯美塔纳的爱国歌剧《利布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受到群众的欢呼，但群众阻止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高级轿车接近剧院。入侵以后最大的游行示威一直进行到深夜。第二天好象是为了继续这一精神，捷克斯洛伐克音乐家协会致函政府，要求保证艺术、科学和教育的自由。为了加重份量，音乐家还指责莫斯科干涉捷内部事务，从而违反了八月和十月协议。

现在抵抗明显在加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又重新获得自信，他们特殊的政治魔术又一次见效。十月三十日当联邦地位法签字生效时，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在布拉迪斯拉发受到群众欢呼。杜布切克好象从他的斯洛伐克家乡环境中汲取了新的力量，他在激动的讲话中保证，自由化政策要继续执行，只有“过火行为”才会受到约束。胡萨克也讲了话，但他的讲话大部分没有人注意听。布拉格的捷记者协会通过决议，要求记者有权充分了解政治情报，还要求取缔占领当局的报纸《消息报》。《报道》发表了十月十八日盖·塞卡尼诺娃一卡尔特科娃在国民议会的讲话，她是当时投票反对驻军条约的四名议员之一。她在议会中讲话说，占领是非法的，条约应具体规定何时苏联军队全部撤离捷克斯洛伐克。十一月一日布拉格电视台播送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几位“被告的见证人”——一位穿军装的上校、一名报纸编辑、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个工人——回答问题十分坦率。当向他们读到“苏联白皮书”中提供的入侵

前“反革命”活动例证的段落时，他们回答说：“这不真实。”这个节目当然是完全违犯不许讨论入侵问题的新闻检查条例的。但捷克人再次处于好斗的情绪之中。捷共中央思想周刊《政治》报的一篇社论表达了民族感情：“如果党和国家的领导这样来恢复对盟国的信任，以致使他们失掉本国人民的信任，那将是一场悲剧。”这当然正是杜布切克面临的困难抉择。

反苏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十一月六日，在俄国革命五十一周年前夕，捷克青年从布拉格许多建筑物上撕下了苏联国旗。当库兹涅佐夫和契尔沃年科出席观看为庆祝节日演出的《天鹅湖》时，警察不得不在民族剧院周围布置警戒线以防止反对他们的示威。十一月七日挂在政府建筑物上的苏联国旗被人撕下来，至少有十面被烧掉。整个下午，学生和工人群众在瓦茨拉夫广场附近一直同警察搏斗。黄昏以后开来水龙车驱散危险的群众。（这一天早些时候，捷克警察首次使用催泪弹来驱赶示威者）整个西方外交使团（希腊和法国外交官除外）都抵制了苏联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俄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守分子这时开始反击。在十一月七日的骚乱中有过把苏联部队重新召回布拉格的很大可能。但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保持经常联系的库兹涅佐夫决定反对这样做。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新方针是利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来削弱杜布切克及其进步伙伴们，俄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忍受再一次示

威，避免不必要的拖长危机时间。俄国人认为，如果使群众激愤起来，政治活动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自由派再一次感到压力在加大。十一月七日当杜布切克去到奥尔沙尼公墓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难烈士致敬时，他首先感到了这一趋势。当他离开时，来到墓地的一群老共产党员当面向他挥舞拳头，高喊“苏联万岁！”“苏军万岁！”杜布切克除了退缩了一下外，未作反应。早些时候，看起来面色很不好的杜布切克不得不同苏联将军和外交官一起到苏联士兵纪念碑前去唱国际歌。我注意到他的棕色头发变得灰白了。现在保守分子都从窝里爬了出来，发动一场反对杜布切克的运动。他们公开的组织叫作利本小组，是按他们聚会所在地布拉格一个区的名字叫的。这是由一名六十几岁的前啤酒厂工人约·约达斯领导的六百名亲苏的共产党人组成的大杂烩。但利本小组却得到苏联官员和象比拉克和皮列尔这样一些政治人物的高度赞赏。他们的活动越来越使进步分子发愁。

政府也采取措施来反对进步分子。十一月八日它命令《报道》杂志停刊一个月，同时也准备封闭捷共思想刊物《政治》。十一月十日清晨警察被召来保护在布拉格市中心开会的捷苏友协的会员。苏军歌舞团演出节目招待他们，他们还听了保守分子领导人答应回到“旧时美好日子”去的讲话，但受到外面愤怒群众的嘲笑。第二天切尔尼克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不再容许反苏的活动，

因为“它可能导致混乱和悲剧。”《政治》杂志同一天被封闭。但矛盾的是，也在同一天苏军指挥部把所有剩余部队撤出了布拉格。几乎在三个月之后，苏联的装甲车才最后从首都消失。

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十一月十四日开幕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据认为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将发动致命的最后打击。这种说法是如此之盛行，以至于布拉格的报纸认为有必要说，即将发生政变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双方都在紧张地工作。进步分子感觉到他们的事业不会变得太糟糕，因为有成千上万份拥护杜布切克的决议从全国各地源源发来。但是保守分子的计划也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胡萨克的计划也是如此。

全会开始后，杜布切克在其主要报告中答应党的新纲领应把“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同苏联军事存在的“严峻”现实调和起来。它听起来象似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苛求。中央全会最后发表的主要决议是如此之矛盾，结果变得毫无意义。斗争双方实际上都能从决议中各取所需，随意加以解释。

但是真正重大的事情是重新改组领导集团，它实际上是把杜布切克孤立起来，使他不能起作用了。精心策划出来的政变表现在组成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主席仍是杜布切克，但在新机构中他的唯一的一个真正同盟者是斯姆尔科夫斯基，而后者的政治权力却正在被削弱。执行委员会的真正权力是掌握在

胡萨克、切尔尼克和卢·斯特劳加尔三人手中。斯特劳加尔同时还是党的捷克局负责人。尽管不存在单独的捷克共产党，斯特劳加尔实际上变成了胡萨克的对应人物。胡萨克是斯洛伐克党的头子，斯特劳加尔是捷克局党的头子，切尔尼克是总理，他们手里掌握着各级大权。

执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义就不大了。斯沃博达总统、他精力越来越有限并常常不在布拉格，他已明显地接受了胡萨克——切尔尼克——斯特劳加尔的“现实主义”路线，看来在摊牌时不大可能支持杜布切克。不幸，八月他虽表现了自己的勇气，而现在却经常被比作贝当元帅。被胡萨克推荐来接任斯洛伐克党的工作的斯·萨多夫斯基当然完全站在胡萨克的一边。民族阵线主席埃·埃尔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肯定随大流。

在这种新安排下，苏联人就没有必要派象比拉克和皮列尔这样大的保守分子去参加执行委员会了。通过胡萨克、切尔尼克和斯特劳加尔来管理国家会顺利和容易得多——他们都是同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老百姓还不大清楚这三个人将要扮演的新角色。保留幻想是有益的。但是十一月全会实际上标志着布拉格之春的完结。

XX

展 望 未 来

十一月全会是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转折点，尽管苏联及其合作者还得再用十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准备好一九六八年就曾希望给予的最后致命性打击。苏联在十一月仍面临着基本上和八月份相同的问题，即捷全国人民对入侵及其后果深为反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以及胡萨克、切尔尼克和斯特劳加尔之流仍得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即使从实际意义上讲进步领导已被粉碎了，全国各地现在合法地驻满了苏联军队。

公众意见本身仍然是一个惊人的重要因素。从前哪一个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类似事情——在一个由苏联占领的国家肯定没有过——而新领导人所面临的现实是，稍微轻举妄动就会引起新的重大危机。（“我们并不真正需要领导人，”布拉格的一个著名记者在十一月底这样对我说，当时新的反抗行动以惊人地有条不紊的方式继续不断地出现。）因此，准确地或用比喻来说，苏联人和他们的伙伴们都不得不等待时机。全会后三

天他们还不得不容忍一次由几万名大中学生举行的静坐抗议，学生们要求恢复失去的自由。工业工人参加罢工的危险性是存在的，领导集团发疯似地发出保持安静和理智的号召。《报道》杂志，在它的编辑们难以想象地威胁要控告政府时，赢得了取消停刊令的成功。政府又一次作出了让步，以免激起事端，使它的丑闻四处传扬。又一次提出保证说，绝不会"回到五十年代"，不会有政治逮捕，绝不会进行迫害。至关重要的事是使局势稳定下来，让人民回去上班工作。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也面临着迅速恶化的灾难性的经济形势。生产率下降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入侵造成的破坏现在已反映到燃料和食品的短缺上。布拉格在深秋的寒冷气候里冻得发抖。

此刻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象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人要留在领导机关里而不提出辞职，以消除胡萨克及其同伙想要保持的党的团结的假象呢？一个明显的回答是，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两人过去和现在都是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决定一生不作任何有损于党的事情。他们两人八月里都被囚禁，解救出来之后，没有一句怨言或自怜。他们在苏联遭受屈辱，现在在布拉格又遭受屈辱，他们的权威日益下降，但他们都愿意忍受。第二个回答是，（它同第一个回答并不矛盾）他们两个感觉到，对他们的支持者，一般来说对捷克斯洛伐克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还可以提出一种解释：他们深信，只要他们还留在公共生活中——处于一种至少在理

论上说是重要的职位——就能在国内保存一点希望。他们同布拉格之春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他们的自愿隐退可能被解释为对他们所倡导的理想的背叛，说明进一步抵抗即使存在于人民心中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而且我也倾向于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十一月全会后在留给他们的短时间内，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继续作出的贡献要比他们可能意识到的要伟大得多。我相信可以证明，对俄国人和胡萨克来说，再没有比看到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离开和把阵地让给他们再使他们高兴的事了。如果杜布切克有历史感的话（他肯定有），那么他就会认为，他在一九六八年底和一九六九年大部分时间内做的工作，是通向他仍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会有的美好未来的一座桥梁。

举例来说，一九六八年底他的存在，是对胡萨克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定的调子的一种反驳。要把胡萨克的言论跟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区别开来是越来越困难了。不礼貌的捷克人开始把他叫作“俄国佬胡萨克”。例如，十一月二十日胡萨克在讲话中指责说，当前的危险“来自右的方面”和“来自日益增长的党外反社会主义势力”，他攻击报纸说，“右翼机会主义势力……在报社里得到很大权力”。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布拉格一位教授的话，他向我指出，“报道说我们完蛋了，那是说得太夸张了。”时常来我们布拉格办

公室的一个大学生对于我们的悲观感到震惊，他用英语说，“我们将战胜——只是时间迟早问题”。就在这同一天，弗·克里格尔在国民议会抗议占领军的报纸《消息报》对他的攻击，以斯姆尔科夫斯基为主席的议会主席团要求政府就散发这种《消息报》向苏联提出抗议。斗争仍在继续。

但是，苏联照例施加压力给予回敬。十二月八日，斯沃博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胡萨克飞往基辅去会见苏联最高领导人。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谈明显地既讨论了“正常化”中遇到的困难，也讨论了明年一月一日实行联邦制之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政府的人员构成。

我也感受到了压力。感恩节那天我被召到捷外交部去接受外国新闻司负责人杜费克的“严重警告”，他神秘地把我的活动说成是同一个报纸的常驻记者工作“不相容的”。当然我要问，他指的究竟是什么活动？杜费克在一个下属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避开我的目光说，“你是很聪明的，不会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坚持我的问题，但是完全无用。显然杜费克是接到指示，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后来才知道，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同一时间通知比姆大使说，已向我提出了“严重警告”。大使提出的问题同样没有得到答复。根据这一点我知道，我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只是个时间问题。

几个星期以来，我的捷克雇员连续被召到秘密警察局去，讯问关于我的活动情况。我在布拉格市内开车出

行老是被跟踪，监视是明显的。一天，一个年轻妇女，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共产党政治家的女儿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提供一份杜布切克本人写的东西。她说，她是杜布切克的朋友，出于对其历史使命的关切，他希望他关于事变的文章能在西方发表。这是不是象经常出现的那样是一种“引人上钩的行动”，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我的旅馆办公室里是有窃听器的；我客气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正在制造事端反对我——原因我不知道——我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十二月的第一周，我得到通知说，科学院编了一本“黑皮书”，详细记述了入侵那一周的事变，包括入侵那一夜秘密警察的活动和其他类似的宝贵材料。我可以得到一份副本，但看来把它从捷语翻成英语，并在布拉格加工改写成故事形式的东西是不明智的。“黑皮书”完全是个秘密出版物，我不愿用从外面雇的翻译人员；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愿使我的捷克助手卷进去。于是，我就决定把书带到维也纳去，那里有许多翻译可用，我的妻子和儿子也可以摆脱布拉格的困苦生活，得到短暂的休息。

十二月十三日回到布拉格之后，我被告知外交部希望下星期一（十二月十六日）接见我。我完全肯定，驱逐我已迫在眉睫。我想对了。又是杜费克在下属的陪同下接见我，他冷冰冰地建议我说，你既不听一个月前对你的严重“警告”，那你就尽快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吧。

我那时想要求他给予解释也是白费时间。杜费克同意，让我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境。但我一到旅馆，电台和捷通社就发表了外交部驱逐我的声明，理由是我“对秘密的军事问题”感兴趣，贿赂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收集军事情报，从政府和共产党那里得到机密情报。我倒希望，我真能从政府和共产党那里得到机密情报那就好了；但我仍然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布拉格政府，或者苏联政府要驱逐我。至于杜费克，据认为由于他卖力地掌管外国新闻工作而得到了报赏，于一九六九年中被任命为驻巴西大使。

怀着十分难过的心情，我把工作移交给《纽约时报》的一名同事，最后于十二月十八日离开了布拉格。一辆秘密警察的车子尾随我到机场，我飞往巴黎。许多捷克朋友和熟人的勇气使我深为感动，他们冒着风险来送我，祝我一路平安。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回到一个不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去的。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一个联邦制国家。切尔尼克仍任联邦总理，原化工部长斯·拉兹尔任捷克总理。他是激烈谴责八月二十一日苏联入侵的那些部长中的一位。斯·萨多夫斯基任斯洛伐克总理。胡萨克继续负责斯洛伐克党，斯特劳加尔则是其捷克地区的对应人物。

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度过一个严酷的寒冷的冬天。报

纸仍然进行着英勇的抵抗，工会威胁说，若把斯姆尔科夫斯基从主席团或议会主席职位上赶走，工人就举行罢工。他受到保守派共产党人的猛烈攻击，一个匿名的小册子把他描写成为“两面派”（这一说法在一九六九年谴责所有进步派政治家时变得很流行。）

但是所有这一政治压力和反压力都被一月八日的一桩悲剧性事件所掩盖了。一个名叫扬·帕拉赫的十八岁的布拉格学生在瓦茨拉夫广场中心自焚，象他在遗书中所说的，以此来抗议在捷克斯洛伐克侵犯自由。他的遗书说，他是一个青年学生自杀小组的“火炬一号”，他们要震动世界，让全世界都了解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发生的事情。帕拉赫由于烧伤第二天死亡。几十万捷克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沉寂地抒发他们无限的悲愤，它同时也是发自内心的对占领的抗议。在帕拉赫葬礼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表示全民哀悼和尊严的日子。布拉格学生把查理大学哲学院对面的红军广场改命为帕拉赫广场。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殉死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出现，使这个国家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胡萨克——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在所谓的十一月全会原则的基础上，即在一切事情上屈从苏联观点的基础上统一严重分裂的共产党这件事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帕拉赫的自杀给了共产党进步分子以勇气，斗争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减退。反抗是没完没了的。报纸简直没有办法控制得住。

当剧作家瓦·哈维尔在他房子里发现一个窃听器之后，他发表了他同警察就此事进行交涉的辛辣讽刺的报道，从而把此事变成了一桩大丑闻。苏联和胡萨克所需要的是进行残酷镇压的某种借口。

借口出现了——但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在斯德哥尔摩世界冰球锦标赛上以四比三击败了苏联队。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电视前观看或在收音机旁收听这场比赛的实况。冰球队的胜利是对苏联象征性的胜利和对八月入侵的报复。在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庆祝这一胜利。但是庆祝很快就变成强烈的反苏骚动。在布拉格，位于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民航办事处成了首要的攻击目标。示威者砸碎了它的霓虹灯，打碎了玻璃橱窗，冲进办公室，把家具和文件拿到广场搞起了营火大会。有人爬到圣瓦茨拉夫塑像上，把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插在上面。情况又象是入侵那个星期里一样。在国内其他地方，苏军司令部遭到袭击，军车被烧毁。在冲突中有六十五名捷警察受伤。

苏联表示了公开的愤怒。《真理报》三月三十一日写道，“近日来的事件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右翼反社会主义势力又在使局势严重化”。它攻击说，“参加反苏示威的人当中”有斯姆尔科夫斯基，虽则布拉格政府立即否认了此事。

四月一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和外交部副部

长谢苗诺夫来到布拉格。谢苗诺夫交给了斯沃博达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并口头警告说，如果政府不能维持和平，又不愿请求苏联帮助，苏军就要直接干涉，示威者将被坦克压碎。经过通宵会议之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了一份公报，批评报纸对待冰球骚动事件的态度，宣布了恢复平静的强硬新措施。四月三日杜布切克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我们正在经历八月以来最严重的日子……我向你们提出保持和平和纪律的迫切请求，也请求你们支持我们不能不采取的措施。"他是在主席团否决了他立即辞职的要求之后讲话的。当苏联人以一比零最后击败捷克斯洛伐克队而蝉联世界冰球冠军之后，为捷克斯洛伐克人增添了新的痛苦。

去年八月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报纸一直抵制的预防性新闻检查制度终于在四月四日实行了。警察措施加强了，在街道上出现了军警联合巡逻队。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受到指责。记者协会提出抗议，主席团的八人执行委员会就发表声明反击说，新闻记者不老实，他们"保护反社会主义势力"，无视党的政策。新闻检查是不能容忍反对派的。格列奇科元帅和谢苗诺夫在布拉迪斯拉发同胡萨克就如何发动反对杜布切克的最后政治行动举行了会议。然后格列奇科于四月十三日回国，对于局势又一次得到有效控制明显地感到满意。就在这前一天，布拉格电台开始时宣布，两小时之后又否认，苏联增援部队正在开进捷克斯洛伐克。

胡萨克公开伸手要权开始于四月十一日，那天他到斯洛伐克的尼特拉市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捷共领导——他的同事——的讲话，说他们“为反社会主义的和敌对的势力”大开方便之门。他说，杜布切克掌权以后，党给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自由活动余地”太大了。并说，“有必要在政治上击败敌对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并把它们从公共生活中清除出去。”

中央委员会会议计划于四月十七日在布拉格举行，但胡萨克却愿意留在布拉迪斯拉发他的斯洛伐克基地直到最后一刻，在远离首都压力的环境下订他的作战计划。一直到四月十五日晚他才在布拉格露面。在这一天，斯姆尔科夫斯基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声明说，在一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宣称，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危险是来自保守分子而不是来自“右翼”进步分子，这种讲话是错误的。但是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因为胡萨克放风说，斯洛伐克的中央委员将投票把他赶出中央主席团和执委会。

四月十六日胡萨克使出了他的高招。他私下会见了进步派的中央委员，说服他们相信，杜布切克已经变成对党和国家不利的因素，因为他的威信已降低到不能再有效地同莫斯科打交道的程度。他举出理由说，需要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享有党内两派的信任又能为莫斯科所接受。他耐心地解释说，面临的问题是争取尽快撤出全部苏联军队。在谈话中，胡萨克表示了自己对进步派基本

思想的同情，同时又委婉地对过去错误表示了惋惜。现在胡萨克逐渐得到进步派的支持。这是很高明的一招，因为这就在第二天的中央委员会上避免了一场恶战。当胡萨克离开决策会议室时，杜布切克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中央委员会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时半在赫拉德强尼城堡在胡萨克的同盟者、总理切尔尼克主持下举行。现在换班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官方公报说，"杜布切克第一个讲话，他简要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危机，它的原因，指出了解决的办法——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加强党的领导，不仅要说而且要开始行动，要尽快使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常化。"然后公报说，他建议更换领导：

> 杜布切克同志建议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机构的结构，以加强这些机构和全党的战斗力。
>
> 最后，他要求解除他第一书记的职务。他建议中央委员会选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担任这一职务。

斯沃博达、切尔尼克、斯特劳加尔和萨多夫斯基发言支持杜布切克的"建议"，中央委员会"就杜布切克同志的请求"进行了表决，再次把他选入主席团。然后全会"在无记名投票中以大多数票"选举胡萨克任第一

书记。

斯姆尔科夫斯基是这一天的另一个主要受害者，他被排挤出主席团（主席团成员从二十一人减少到十一人）。除了胡萨克和杜布切克外，新主席团还包括总统斯沃博达、总理切尔尼克、斯特劳加尔、萨多夫斯基、埃·埃尔班、工会主席卡·波拉切克、比拉克和彼·佐洛特卡。

对现年五十六岁的胡萨克来说，这是他同苏联签订入侵后的第一个协议和从莫斯科回来后发动的夺权运动的高峰。一个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坐过八年监牢的人竟然在一种实际上主张恢复与现代斯大林主义十分相近的体系的政策基础上掌了权，他的这种成功实在有点怪异。令人奇怪的还有，他的胜利正是由于他谴责了十五个月之前杜布切克掌权后他自己所力主推行的那种思想而取得的。

新的领导人意识到，撤掉杜布切克的职务是个冒险步骤，他的现有声望仍然是很大的。于是，斯沃博达和胡萨克都立即发表电视讲话，号召人们在向被他们赶下台的杜布切克致敬时要保持平静。斯沃博达觉得有必要说，“杜布切克同志的名字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中将永远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月全会以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胡萨克说，“保持平静。维护安定。支持这一事业。……我们希望，群众和每个公民广泛参加我们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和监督。我们不准备放弃我们一

月全会以后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我们一定要知道，该做什么和什么时候去做。”

胡萨克的上台当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创了自诺沃提尼垮台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时代。这个新的第一书记决心消除布拉格之春的任何痕迹，他把一九六九年的剩余时间用于这一目的。他认为，党必须按照苏联可以接受的传统路线实现统一；他的国家必须重新适应华沙条约、经互会以及莫斯科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的所有行动。如果说他在第二点上获得了成功的话，那么，在第一点上却不然，捷共始终还是分裂的；那一年的事变清楚地表明，捷克斯洛伐克人仍然没有心甘情愿地接受八月入侵及其后果。于是，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胡萨克开始了政治清洗（似乎忘记了他自己也曾经是清洗的受害者）。

但为胡萨克说句公道话，从一开始他就直率的警告捷克斯洛伐克，他不会容忍反对派。四月十七日他在中央委员会发表就职演说时说，“实行好人政策、使每个人都感到满意，那就无法前进一步。我们不搞好人政策。我们必须为我们所同意解决的问题进行无情的斗争，为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任务进行无情的斗争。”他向全党说，在三月份反苏骚乱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反革命”倾向；他还声称，“我不怕使用‘反革命’这个词”。

至于杜布切克，尽管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他早先的缺

点，他仍被任命为新的联邦议会主席以代替斯姆尔科夫斯基。因为还不能完全抛弃斯姆尔科夫斯基，胡萨克安排任命他为联邦议会民族院的主席。

尽管有些布拉格的自由派人士还安慰自己说，胡萨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不一定会变成莫斯科的工具，但苏联却毫不隐晦地对他表示支持。四月二十二日，即胡萨克上台五天之后，他去莫斯科参加列宁诞辰九十九周年庆祝大会。在那里苏共中央书记伊·卡皮托诺夫在胡萨克和切尔尼克鼓掌声中讲述了在苏联人眼里看来布拉格之春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又变成了什么："历史和生活表明，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反动派想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注定要失败的。"

一九六九年剩余的时间和一九七〇年的最初几个月最后清除掉了布拉格之春的残余。由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加强了，莫斯科和布拉格新领导都不再需要装样子了。一场大清洗把所有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试验有关的人都从有影响的职位上撤了下来，甚至连党籍都开除了。而那些拥护诺沃提尼政权的人又重新抬起头来。比如马穆拉成了俄斯特拉发党的头子，沙尔戈维奇成了比尔森党的头子。

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被解除党主席团的职务，斯姆尔科夫斯基失去了议会中的职

务。一九七〇年初杜布切克被赶出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成了政治上不起作用的人了。斯姆尔科夫斯基、帕维尔、哈耶克以及其他数十名领导人被清除出党。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扎托皮克上校在军队里被撤职，派去当一名搞城市环境卫生的职员。构成一九六八年试验核心力量的作家和编辑被安插到工厂和农场劳动。少数态度最为坦率的进步人士——其中包括象棋大师卢·帕赫曼和电视评论员弗·什库金纳一九六九年底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至今仍被关押。

在清洗过程中具有讽刺意味而纠缠不清的一件事是，胡萨克为保护杜布切克的人身安全以至于他的生命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象一九六九年底布拉格流传的那样，苏联和取得胜利的捷克斯洛伐克强硬路线分子又要求，杜布切克应以鼓励"反革命"罪加以审判。胡萨克却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的位子。

十二月杜布切克到安卡拉去就任新职，他的安全似乎得到保证，至少当时他躲过了审判。可能是那样，胡萨克个人希望杜布切克会利用这一机会寻求在土耳其避难，然后呆在西方。杜布切克也许考虑过这一点。但我们知道，杜布切克——尽管经历过各种艰难曲折仍然是一位有纪律的忠诚党员——在土耳其居留期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一句话。就我们所知，他从未企图外逃。

但是杜布切克的外交流放仍不足以使他的政敌感到满足。一九七〇年一月捷共宣布，他被停止党籍进行审

查，可能预示要正式处分他。在此后不久，奥·切尔尼克——与胡萨克一起是入侵后最早的"现实主义"派——被解除了联邦总理职务而由一度是诺沃提尼奴仆的斯特劳加尔来接替。接着事情就急转直下，无法抗拒了。

三月杜布切克夫人单独回到布拉格——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命令她回来可能是对她丈夫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五月二十五日捷共主席团在一次秘密会议中以七票对四票通过开除杜布切克党籍，投反对票的有胡萨克、斯沃博达总统、斯洛伐克总理彼·佐洛特卡和民族阵线主席埃·埃尔班。两天后杜布切克从安卡拉被召回。他的暂缓处理期结束了。五月二十九日斯特劳加尔总理说，不准备进行政治审判，但他预告性的评论说，可以用"法律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

六月二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在赫拉德强尼城堡开会，这就是杜布切克末日的开始。第一个动议就是要求正式解除他的大使职务。斯沃博达总统由于年迈体弱不能再斗争了，立刻就照办。晚上一份简短公报宣称，"卢·斯沃博达总统今天召回了驻土耳其大使亚·杜布切克，将任命他担任其他职务。""其他职务"如后来所知道的，是担任斯洛伐克一个工厂的办公室工作。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开除杜布切克出党，解除了切尔尼克刚接任不久的联邦技术和投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停止了他的党籍。佐洛特卡和埃尔班也离开了中央主席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布切克在被逐出他在四十八岁生涯中为之忠实服务了三十年的党的时候，正是两千字声明发表两周年的前一天。现在布拉格之春被正式埋葬了。“我们跟你们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的光荣日子消逝了，忧郁和失望笼罩着捷克斯洛伐克。

然而历史却有其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逻辑。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一九六八年所预示的东西跟克里姆林宫教条主义者理解的完全不同。一九六八年激起的希望是入侵及其长期的戏剧性后果所消灭不了的。当黑暗再次降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土地上的时候，希望看来仍然存在。十九世纪捷克伟大诗人扬·聂鲁达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写道：

> 即使雷鸣电闪，筋骨寒彻，
>
> 尽管多少世纪以来，我们遭受过多少苦难。
>
> 我们仍然要前进……

[illegible]

[illegible]